

版權信息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by Benedict Anderson  
 Copyright © Benedict Anderson, 1998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erso (The lmprint of New Left Book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權合同登記號 圖字：10-2009-163號

書  名　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世界

作  者　【美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譯  者　甘會斌

責任編輯　馬愛新

出版發行　譯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2597-2

關注我們的微博： @譯林出版社

關注我們的微信：yilinpress

意見反饋：@你好小巴魚

目录

[獻給 3](#_Toc68788510)

[題記 5](#_Toc68788511)

[致謝 6](#_Toc68788512)

[導言 7](#_Toc68788513)

[比較的幽靈 7](#_Toc68788514)

[“東南亞”的諸起源 7](#_Toc68788515)

[東南亞研究，東南亞人，東南亞專家 9](#_Toc68788516)

[作為東南亞勞工和資本家的“華人” 10](#_Toc68788517)

[東南亞：作為一個政治集團？ 11](#_Toc68788518)

[個人動力 11](#_Toc68788519)

[本書概貌 12](#_Toc68788520)

[第一部 分民族主義的長弧 15](#_Toc68788521)

[1 民族主義、認同與序列邏輯 15](#_Toc68788522)

[自由序列 15](#_Toc68788523)

[報紙 16](#_Toc68788524)

[商業中心的表演 17](#_Toc68788525)

[約束序列 17](#_Toc68788526)

[實踐 19](#_Toc68788527)

[2 復制品、光暈和晚近的民族主義想象 22](#_Toc68788528)

[3 遠距民族主義 27](#_Toc68788529)

[第二部 分東南亞：國別研究 33](#_Toc68788530)

[4 黑暗之時和光明之時 33](#_Toc68788531)

[5 專業夢想 44](#_Toc68788532)

[百科全書的政治 44](#_Toc68788533)

[雞奸和戲法 45](#_Toc68788534)

[專業夢想 48](#_Toc68788535)

[《加多羅科神秘書》 49](#_Toc68788536)

[尾聲 51](#_Toc68788537)

[6 雅加達鞋里的沙子 52](#_Toc68788538)

[7 撤退癥狀 55](#_Toc68788539)

[引言 56](#_Toc68788540)

[新階級的困境 56](#_Toc68788541)

[意識形態劇變 61](#_Toc68788542)

[8 現代暹羅的謀殺與演進 65](#_Toc68788543)

[早期模式 65](#_Toc68788544)

[政府謀殺 66](#_Toc68788545)

[武裝斗爭 66](#_Toc68788546)

[新資產階級 66](#_Toc68788547)

[新生的議會民主制 67](#_Toc68788548)

[鞏固時期 67](#_Toc68788549)

[地方性和國家性謀殺 68](#_Toc68788550)

[鄉村起義的失敗 68](#_Toc68788551)

[他寧政權 68](#_Toc68788552)

[議員和槍手 69](#_Toc68788553)

[附言 69](#_Toc68788554)

[9 菲律賓的地方巨頭民主制 71](#_Toc68788555)

[西班牙殖民主義，教會和混血精英 71](#_Toc68788556)

[民族情緒的滋長 72](#_Toc68788557)

[美國的殖民與全國寡頭集團 73](#_Toc68788558)

[日本占領及其后 74](#_Toc68788559)

[地方巨頭民主制的全盛時期 74](#_Toc68788560)

[費迪南德·馬科斯：最高巨頭 75](#_Toc68788561)

[馬科斯坐穩江山 76](#_Toc68788562)

[借勢“人民權力革命” 77](#_Toc68788563)

[巨頭們重整河山 78](#_Toc68788564)

[經營有方的賭場里的政治 79](#_Toc68788565)

[10 第一個菲律賓人 81](#_Toc68788566)

[11 難以想象 85](#_Toc68788567)

[去現時化（Demodernization） 86](#_Toc68788568)

[排除讀者 86](#_Toc68788569)

[刪除他加祿語 87](#_Toc68788570)

[刪節（Bowdlerization） 87](#_Toc68788571)

[去地方化 88](#_Toc68788572)

[去歐洲化 88](#_Toc68788573)

[時代錯誤 89](#_Toc68788574)

[附言 94](#_Toc68788575)

[第三部分 東南亞：比較研究 97](#_Toc68788576)

[12 東南亞的選舉 97](#_Toc68788577)

[通論 97](#_Toc68788578)

[暹羅 98](#_Toc68788579)

[菲律賓 99](#_Toc68788580)

[印度尼西亞 101](#_Toc68788581)

[結論 103](#_Toc68788582)

[13 共產主義之后的激進主義 104](#_Toc68788583)

[一段對照性的歷史 105](#_Toc68788584)

[泥沼里的足跡 106](#_Toc68788585)

[一種新主體性 107](#_Toc68788586)

[14 各尋生路 110](#_Toc68788587)

[15 多數族群和少數族群 116](#_Toc68788588)

[第四部分 所遺何物？ 121](#_Toc68788589)

[16 倒霉的國家（El Malhadado País） 121](#_Toc68788590)

[一 121](#_Toc68788591)

[二 123](#_Toc68788592)

[三 127](#_Toc68788593)

[四 128](#_Toc68788594)

[17 民族之善 132](#_Toc68788595)

[未生者 132](#_Toc68788596)

[已死者 133](#_Toc68788597)

[在世者 133](#_Toc68788598)

[索引 136](#_Toc68788599)

[注釋 156](#_Toc68788600)

# 獻給

我的老師：George Kahin

我的家人：Rory，Melanie和Louisa

我的合作伙伴：Ben Abel，Pipit和Komang；

Charnvit，Kasian和Thanet；Ambeth和Doreen

我的逗趣小子：Benny，Ade和Yudi；Ali；

Tuy和Teuy；Henry，Badick和其他調皮鬼們

Svetit vsegda，

Svetit vezde，

Do dnei poslednikh dontsa，

Svetit—

I nikakikh gvozdei！

Vot lozung moi—

I solntsa！

時時發光，

處處發光，

永遠叫光芒照耀，

發光——

沒二話說！

這就是我和太陽的

口號！

V.馬雅可夫斯基，《馬雅可夫斯基在夏日別墅中的奇遇》

（“Neobychainoe Priklyuchenie,Byvshee s Vladimirom

Mayakovskim Letom na Dache”），1920年

# 題記

1998年5月21日，適值本書校樣正在修改的時節，蘇哈托在掌權逾32年之后，突然辭去印度尼西亞總統職務。他這一決定的直接原因是武裝部隊領導層的一紙最后通牒：如果他不立即下臺，他將受到起訴。軍隊這么做是為應付這一周早些時候在雅加達爆發的大規模騷亂，它是殺害了帝利沙地大學（Trisakti University）六位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學生所引發的，也是已持續數周的全國性抗議經濟大災難活動的頂峰。那場災難讓印度尼西亞的貨幣貶值，摧毀了國家的金融機構，造成大量失業和基本商品的價格飛漲。對那一災難，這個民賊式的獨裁政府的任人唯親、裙帶關系、強勢壓制以及自私自利的政治操縱要負主要責任。當蘇加諾，這位在三十多年前被蘇哈托趕下臺的人，在軟禁中死去的時候，曾有數百萬人為他的逝世而哭泣。等到蘇哈托這個老朽暴君最終去見他的上帝的時候，將只有一雙雙干涸的眼睛。

蘇哈托的繼任者，那位布吉人航空工程師，副總統哈比比，是蘇哈托本人封授的，不應指望他能殘喘多久。獨裁政權崩塌過程中釋放出來的力量，如不徹底革新印尼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是不會甘休的。即將采取的第一個關鍵步驟，是印度尼西亞自1955年以來首次自由的全國大選，如果一切順利的話，那將在今年年底舉行。

# 致謝

非常感謝以下各書和期刊的出版者惠允重印下列文章：

“民族主義、認同與序列邏輯”，大體以《世界政治》（Cosmopolitics）一書中的同名文章為藍本，布魯斯·羅賓斯和謝平主編，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1998年。

“復制品、光暈和晚近的民族主義想象”，改寫自首次發表在《言論者》（Qui Parle）上的一篇文章，第7卷第1期（1993年秋/冬）。

“遠距民族主義”是兩篇文章的糅合。第一篇以“大流散”（Exodus）為題，發表在《批評探索》（Critical Inquiry，20［1994年冬］）上；第二篇叫“遠距民族主義：世界資本主義與身份政治的興起”，由阿姆斯特丹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發表。

“黑暗之時和光明之時”，最初發表于《東南亞昔日的感知》上，安東尼·里德和戴維·馬爾主編（香港：海尼曼出版公司，1979年）；后獲準重印于拙著《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中（紐約，伊薩卡：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90年）。

“專業夢想”是以1984年提交給“東南亞暑期研究所”的一篇論文為藍本，首次發表在拙著《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上（紐約，伊薩卡：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90年）。

“雅加達鞋里的沙子”、“第一個菲律賓人”和“各尋生路”（Sauve Qui Peut），最先發表于《倫敦書評》，分見第17卷第21期（1995年11月2日）、第19卷第20期（1997年10月16日）、第20卷第8期（1998年4月16日）。

“撤退癥狀”首次發表于《關心亞洲學者會刊》（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第9卷第3期（1997年7—9月）。

“現代暹羅的謀殺與演進”、“菲律賓的地方巨頭民主制”和“共產主義之后的激進主義”，最先發表于《新左派評論》，分見第181期（1990年5—6月）、第169期（1988年5—6月）、第202期（1993年11—12月）。

“東南亞的選舉”最先發表在《東南亞的選舉政治》上，羅伯特·泰勒主編，伍德羅·威爾遜中心出版社與劍橋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

“多數族群和少數族群”是我給《東南亞的部族群體和少數族群》一書所作導言的改寫，原書由賈森·克萊主編（馬薩諸塞，坎布里奇：文化生存出版社，1987年）。

“民族之善”是即將發表在《宗教與民族主義》中的一篇短論的改寫，原書由彼得·范德維爾主編（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8年）。

# 導言

### 比較的幽靈

1963年2月2日，在與我被教導著把它想象成“東南亞”的這塊土地初次相逢約莫一年之后，我有了一次奇特的經歷，那時我無以名之。當時的印尼總統蘇加諾要接受印度尼西亞大學的名譽學位，他臨時邀請了外交使團，與大學生和教員們一同出席。不知怎的我最后成了一位年長的歐洲外交官的耳語翻譯。蘇加諾在講他最愛的兩個主題：民族主義和領導者。本來風平浪靜，突然，他開始談起了阿道夫·希特勒，而且是以一種異乎尋常的方式——不是將其說成大屠殺的劊子手，甚至不是法西斯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而是說成一個民族主義者。更讓我倆驚詫莫名的是，這位總統必定是疑心沒幾個學生曾經聽說過希特勒，他試圖賦予元首的遙遠幽靈以地方生命，用他特有的、別人學不來的公共演講風格，像說腹語似的說道[[1]](#_1_108)：

比方說希特勒——哇，希特勒真的是絕頂聰明——也許他想說，光有物質基礎，幸福還是不可得的，所以他提出了另一個理想，這個理想他稱之為第三帝國（Dritte Reich）。這個第三帝國實實在在地會給德國人民帶來幸福。第一帝國是腓特烈大帝的帝國，是老腓特烈領導的帝國；第二帝國是就在世界大戰之前還存在著的那個，而今在世界大戰中被摧毀了。“來吧，讓我們建造起一個第三帝國，在這第三帝國里，嗨，姐妹們，你們會活得很快樂；嗨，兄弟們，你們會活得很快樂；嗨，孩子們，你們會活得很快樂；嗨，你們，德意志的愛國者們，你們將目睹德意志加冕為王，凌駕于世界所有民族之上。”兄弟姐妹們，希特勒如此描繪這些理想，真是太聰明了！

我順著他的講話低語的時候，老外交官變得越來越不安和疑惑。“你有把握嗎，他真是在說這個？”他再三問我。我已經多次聽過蘇加諾用他那腹語式風格講述孫逸仙、凱末爾、甘地、德·瓦勒拉和胡志明，那些時候他想提醒他的同胞們，民族主義是一種普世之物，而且同國際主義不可分割。我極力向外交官解釋這一點，但沒有成功，他怒氣沖沖地回到了大使館，比從前更確信蘇加諾是個瘋狂而危險的江湖騙子。

對我而言，我感到暈頭轉向。在我的年輕生命里，我是頭一回被邀約透過倒轉的望遠鏡來看我的歐洲。蘇加諾自認是個左派分子，他也明知希特勒統治的恐怖。但他似乎是平靜安詳地看待這些恐怖，虔誠的基督徒就是以這樣的平靜安詳，沉思以上帝的名義干下的數世紀的集體屠殺和摧殘折磨；或者，是他保持了輕快的距離，如同我的學校老師談到成吉思汗、宗教裁判所、尼祿或皮薩羅。從今往后要像從前那樣想到“我的”希特勒，那就難了。

我找不出一個好名頭來稱呼這種體驗，直到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紀之后，那時我在菲律賓，為了自學西班牙語，結結巴巴地讀何塞·黎剎（José Rizal）的極端民族主義的小說《不許犯我》（Noli Me Tangere）。在故事之初有一個令人頭暈目眩的瞬間。年輕的混血主人公，長期旅居歐洲之后，最近返回了1880年代的殖民地馬尼拉。他從馬車車窗望出去，看到了市里的植物園，發現他也是（可以這么說）處在倒轉的望遠鏡的末端。這些園圃自然而然（黎剎說是maquinalmente）、不可避免地隱沒到它們在歐洲的姐妹園子的意象當中去了。他不再能夠實際平常地體會它們，而只能近在咫尺同時又遠在天邊地看著它們。小說家引人注目地把這一無可救藥的雙重幻影的動因命名為：el demonio de las comparaciones[[2]](#_2_103)。原來那就是1963年所遭遇到的，我心里說道：比較的幽靈。

### “東南亞”的諸起源

對我來說，“東南亞”一直是個再好不過的場所（locus），可以由此努力適應這類揮之不去的幽靈。作為一種意義深遠的想象物，它年齒極淺，比我本人的還淺。不必驚怪，它的命名出自外部，甚至在今天，居住在它的大約175萬平方英里的土地（更不用說水域）上的幾乎5億人口，極少有人認為自己是“東南亞人”。較老的中國概念“南洋”，模模糊糊指的是由海路可達的一片“南方”區域[[3]](#_3_98)。后來日語里的派生詞南方（nampō），寬泛而有彈性地延展到美國人稱之為西南太平洋的地方。“東南亞”本身只是在1943年夏，隨著蒙巴頓的“東南亞司令部”的設立，才作為一個重要的政治術語問世；該司令部是更傳統的印度司令部的支脈，但是它駐扎在康提，所司的領土職責包括錫蘭和英屬印度的東北邊疆（兩者都不在今天的“東南亞”），卻排除了荷屬東印度群島（直到1945年7月），還有菲律賓。然而這一命名顯然是對下述事實的反應：歷史上首次有一個單一勢力——裕仁天皇的軍隊勢力——有效地控制了英屬緬甸和西屬—美屬菲律賓之間的整片地帶[[4]](#_4_98)。

幾乎正好在同一時間，學術界開始嚴肅地運用這個術語，首先是盎格魯—撒克遜那兩個海上帝國的學者們[[5]](#_5_90)。這股新浪潮可以說在1941年已經露頭，那時了不起的緬甸學者、前英國殖民地的公務員約翰·弗尼瓦爾（John Furnivall）發表了他的《東南亞的福利與進步》一書——是在紐約，兩年后緊接著發表了《東南亞的教育進步》——又是在紐約。1942年，美國政治科學家魯珀特·埃默森（Rupert Emerson），與他的同事倫諾克斯·米爾斯（Lennox Mills）和弗吉尼亞·湯普森（Virginia Thompson）一道，出版了《東南亞的政府與民族主義》。左翼美國人布魯諾·拉斯克（Bruno Lasker）于1944年出版了《東南亞各民族》，1950年又出版了精彩的《東南亞的人性枷鎖》。英國殖民地官員維克多·珀塞爾（Victor Purcell）在1951年寫成了不落俗套的《東南亞華人》。次年，英國歷史學家夸里奇·威爾士（Quaritch Wales）在其《古代東南亞的戰爭》一書中，犯了時代錯誤，將“東南亞”的世紀推遠到歐洲人到來前的往昔。隨著英國前殖民地官員D.G.E.霍爾頗具官方權威的《東南亞史》于1955年問世，這個概念堂而皇之地正規化了（雖然霍爾在該書的第一版中沒有把菲律賓包含在內，這一缺席在以后的連續再版中部分得到彌補）。

為什么姍姍來遲？又為什么最后一蹴而就？首先，這里缺乏一種歷史性的霸權勢力，就像奧斯曼土耳其人對近東或中東，哈布斯堡家族和波旁家族對“拉丁”美洲，莫臥兒人對“印度”，以及讓“中國”成為一種貌似可信的有界幻象的北京歷代君王那種權力。其次，一旦伊斯蘭教（從十三世紀開始）和基督教（從十六世紀開始）打破了印度教—佛教相混融的文明態勢，這個地區就呈現出非同一般的宗教異質性，而印度教—佛教文明的遺跡如今尚名列世界奇跡之中，如柬埔寨的吳哥，爪哇的婆羅浮屠，暹羅的大城府，緬甸的蒲甘和末羅漢等。[[6]](#_6_84)今天，緬甸、暹羅、老撾和柬埔寨各自信佛，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文萊是穆斯林占優，菲律賓主要是天主教徒，而越南尤其繼承了儒教、道教和大乘佛教。但是無疑地，起關鍵作用的要素還是這一地區形形色色帝國主義的奇特歷史[[7]](#_7_82)。這里只有比利時人和意大利人不見蹤影。英國人在緬甸、馬來亞、新加坡和北婆羅洲，荷蘭人在東印度群島，葡萄牙人在東帝汶，西班牙人和美國人在菲律賓，法國人在老撾、柬埔寨和越南；加上半獨立的緩沖國暹羅，在倫敦和巴黎這對冤家的殖民地間苦苦支撐。再有，這形形色色的帝國主義并非像非洲大部分地區所發生的那樣，在十九世紀晚期一擁而至，而是數世紀間前前后后趕來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封建主義的十六世紀末葉，荷蘭人在重商主義的十七世紀，英國人在啟蒙主義的十八世紀，法國人在工業主義的十九世紀，美國人在機動化的二十世紀到達此地。每個帝國勢力跟它的競爭國互相猜忌、明爭暗斗，把自己的領地同其余地區隔離開來，結果到二十世紀初，巴達維亞（雅加達）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更了解阿姆斯特丹，而不大了解他們的遠祖曾交往密切的柬埔寨；他們在馬尼拉的兄弟族類對馬德里和紐約的了解，又超過了對南中國海對面一衣帶水的越南濱海地區的了解。而且，即便是在這個飛機、電報、電話的時代，這些殖民地也是距宗主國最為遙遠的。越南之于巴黎，菲律賓之于馬德里或華盛頓，東帝汶之于里斯本，馬來亞之于倫敦（除了人種斑駁陸離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之外），都比各帝國版圖內其他任何地方更遠。僻遠、異質，還有可謂宗主國的分割，這個地區統一命名如此之遲，也就不足為怪了。

然而二十世紀伊始，這一區域有史以來首次開始形成邊界，這要特別歸功于墨卡托的遺產[[8]](#_8_82)。今天的緬甸，在1885年到1937年間，曾是殖民地印度的組成部分，是它唯一的佛教省份。但就在那時候，連續的、繪成地圖的邊界線已經給定，大體上延續至今。巴黎明確標示出中國領土在哪里終止，法屬越南的東京從哪里起始，它消除了數世紀以來滲透性的相互聯系，更別提今日越南的某些地區被合并到中華帝國里的那一千年了[[9]](#_9_78)。二十世紀初，新幾內亞島位于東經141度以西的那一半屬于荷屬東印度，如今它是東南亞的一部分。然而東邊一半就不是。這半邊的以北部分，在1885年和一戰之間，是凱撒·威廉蘭（Kaiser Wilhelmland），隸屬于同樣可笑地喚作俾斯麥群島的一個德國殖民地。以南部分是英國人的。1920年后，這南北兩部分漸次變成了一個虛弱的單位，由澳大利亞的次生帝國主義控制。如果我們不但想到巴布亞新幾內亞被排除在東南亞之外，還想到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最近拒絕了錫蘭/斯里蘭卡的加入申請，我們就能看清這幅地圖的真正重要性。回溯一千年，錫蘭同東南亞有著文化、商業甚至政治的密切聯系，它還和緬甸、暹羅、柬埔寨、老撾共同信仰小乘佛教（穿過孟加拉灣的雙向朝圣路線存在好幾個世紀了，至今依然如故）。它的農業、氣候、食物和文化極其類似于東南亞的很多地區。可是它最終卻被——也許不太舒坦地——釘在了“南亞”。

造成最后一蹴而就的是太平洋戰爭、飛速的戰后去殖民化、冷戰的發動，以及美國人想取代日本人做本地區唯一霸主的持續努力。這一地區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帝國主義在1942年初到1945年間的冷不防地恥辱性崩潰、1943年起越來越孤注一擲的日本對“土著民”的武裝和軍事訓練、有時受到遠道而來的盟軍援助的抗日游擊隊的興起，還有在緬甸和菲律賓展開的日軍和盟軍之間創巨痛深的激戰：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當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以后，歐洲人不可能昂然卷土重來。在亞非殖民化區域的別的任何地方，這樣的事情從沒發生過。它也意味著，繼大約140年前的西屬美洲之后，東南亞成了唯一的這樣一塊殖民化區域：這里爭取獨立以及更多東西的武裝斗爭是家常便飯。不同尋常的是，在拉美的最西端，即菲律賓，這個過程在1896年已經開始了，那時候，由博尼法西奧（Andrés Bonifacio）、阿奎納多（Emilio Aguinaldo）、馬比尼（Apolinario Mabini）領導的一場既早熟（對亞洲而言）又晚熟（對拉美而言）的起義，于1898年締造了一個自由的菲律賓共和國，雖然它不久即被美國鎮壓了。緬甸、老撾、柬埔寨、越南、印尼，某種程度上還有馬來亞，實際上都在為獨立而戰，大多取得了苦澀的成功——也漸漸意識到彼此在干同樣的事業。1947年初，泰國進步的民選總理比里·帕儂榮（Pridi Phanomyong），在他被軍方推翻之前的短暫時光里，發起了一個流產的“東南亞聯盟”，想建立反帝互助的區域網絡[[10]](#_10_76)。

然而，是冷戰在亞洲的揭幕真正開啟了使東南亞成為像它今天那樣一種想象的現實的漫長歷程。在美國看來，大亞洲的主要國家都有一個多少比較固定的地位。日本已經被美國人占領了，唯華盛頓的軍事和經濟機器馬首是瞻。印度在分治危機之后，在尼赫魯和國大黨的無與爭鋒的領導權下，似乎鐵定是準英屬的。中國嘛，唉，1949年后“丟失”給共產主義了，但是它太龐大了，頂多適合閃電式的、半秘密的干涉。印巴和中國之間地帶的那些新國家則另是一番景象。在幾乎所有這些國家，土生土長的、通常是武裝起來的、由共產黨人領導的運動質疑盟國企圖創建的戰后秩序的合法性。在1949年的緬甸，即取得正式獨立一年以后，兩個競爭的共產主義政黨，加上各式各樣的族群反叛團體，讓吳努（Unu）政府差不多只控制了仰光。東面的法國殖民地，1946年末爆發了第一次印支戰爭，一年后胡志明宣布越南獨立。當這場戰爭在奠邊府趨向尾聲時，共產主義運動傳遍了老撾這個山地國家，稍后又傳入西哈努克的柬埔寨。在菲律賓，美國人重新扶植了一個腐敗的地方巨頭階層，來領導已被正式承認為獨立（當然是在1946年7月4日）的這個國家，這引發了一場嚴重的共產主義起義（1948—約1954年），它是以戰爭年代的人民抗日軍（Hukbalahap）為班底的。在印尼，起初看上去，本土的左派已經在1948年被忠于革命總統蘇加諾和副總統哈達（Hatta）的軍隊制伏了，但在主權移交之后，印尼共產黨卻出人意料（而又合法）地恢復了元氣，不過十年時間，成為共產主義集團以外最大的共產黨。在馬來亞（它直到1957年才正式獨立），1948年春之后倫敦發現，它面對著它的現代帝國歷史上最長久、最猛烈的抵抗——來自一個馬來亞共產黨，該黨是從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發展而成的。只有在暹羅，“常態”似乎占了上風；武裝的共產主義僅在1960年代中期才開始冒頭。

世界上沒有別的地區有這樣驚心動魄的傳略，拉美沒有，近東沒有，非洲沒有，南亞也沒有。新霸主打定主意，它不應像中國那樣“丟失”了。于是，1954年，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成立了，它初創于美國人的馬尼拉，后來總部設在曼谷，其用意就是挽救這整個后殖民地區免遭共產主義幽靈之害[[11]](#_11_72)。隨后十年里，東南亞的本地政府采取了兩種措施，要創建一個不那么全盤地受外人支配的區域性組織；這兩種措施最終都夭折了。由暹羅、菲律賓和當時的馬來亞創建于1961年的東南亞聯盟（ASA），最后無力解決因馬尼拉對北婆羅洲（沙巴）的主權要求而起的日漸升級的爭吵[[12]](#_12_70)。馬菲印尼聯盟（Maphilindo）是印尼的激進民粹主義總統蘇加諾1963年想出的妙計，打算包含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這些個“馬來”民族，然而一當白廳從馬來亞、新加坡、北婆羅洲以及從前編造出來的“白人拉甲的沙撈越”拼湊出“馬來西亞”，它轉眼間就塌陷了[[13]](#_13_68)。不過，1967年，當蘇加諾在一場大規模兇殺的狂歡中倒臺以后，一個較為持久的機構創立了，那就是東南亞國家聯盟，它最近——隔了三十年之后——接納了越南、緬甸和老撾，也許有朝一日會讓洪森的柬埔寨與沙納納·古斯芒的東帝汶加入進來[[14]](#_14_64)。

### 東南亞研究，東南亞人，東南亞專家

有一個領域，它迥異于外交官、將軍、情報機構和國家首腦們組成的領域，在它那里，東南亞更早也更成功地在變成一種現實。各色殖民主義制造了大量學術成就，這些學問被各殖民地框限于研究本地區——用英語研究緬甸和馬來亞，用美語研究菲律賓，用荷蘭語研究東印度群島/印度尼西亞，用法語研究越南、柬埔寨和老撾，等等。正像這樣，戰后美國的反共霸權給東南亞研究這個新領域奠定了最初的基石。從事這種研究的第一個學術計劃（programme）于1947年在耶魯大學創立，不久以后，我所在的康奈爾大學緊跟著設立了一個同類計劃。在1957年10月蘇聯發射人造地球衛星所造成的驚恐狀態下，隨著第二次印支戰爭爆發，相似的計劃在全美國繁衍開去。后來，這種模式蔓延到澳大利亞、日本、英國、法國、加拿大、德國、斯堪的納維亞等地，側重點各各有別。

美國開創的這種東南亞研究，與殖民地時代先已存在的那種學術研究之間，自始即有一種關鍵的差別[[15]](#_15_64)。殖民地時代幾乎所有的偉大學者——比如，約翰·弗尼瓦爾和戈登·盧斯（緬甸）；馬伯樂和保羅·馬斯（印度支那）；理查德·溫斯特德和R.J.威爾金森（馬來亞）；特奧多爾·皮若（Theodoor Pigeaud）和貝特蘭·施里克（荷屬東印度）；羅伊·巴頓和羅爾斯頓·海登（菲律賓）——都是或曾經是殖民地官員。他們一生有很長時期住在殖民地，對那里了如指掌。然而如此沉浸其中的前提條件是，即便他們私底下懷疑殖民事業，也不大可能公然說出來[[16]](#_16_64)。在戰后的后殖民時代，這類人物消失了。東南亞，或者至少是它非共產主義的區域，遭逢了成群的美國官員，他們要處理一切事務，從軍事、情報到教育和資本主義發展，但他們都是大忙人，也幾乎不通當地語言，很少有時間或意向去做殖民地的風平浪靜所容許的悠閑研究，他們走馬燈似的輪換崗位，以致不能深入理解任何東西。

結果，東南亞研究成了宗主國教授們的領地，他們主要并非美國聯邦國家的財政受益人，毋寧說是私立大學和州立大學，還有私人基金會（特別是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受益人。既然他們工作的架構——東南亞——是這一地區非殖民化和美國不依不饒的冷戰霸權的后果，他們的研究明顯集中在同他們殖民時代的前輩迥然有別的學科領域里：首先是政治科學，還有近現代史和人類學，而不是考古學、古代史和古典文學。這一轉變意味著它的領軍人物不是有著文官思想或官僚責任的人（很多人對非共產主義的反殖民民族主義懷著積極的、公開的同情，公然批評華盛頓政策的也不在少數）[[17]](#_17_58)。

稱之為東南亞研究的一個制度化研究領域，處在有著無限財力和巨大政治野心的一個大陸強國的中心，就眼下的目的來說，它的創建具有兩大后果。第一，教授們和研究生們跨越學科匯聚一堂，不是出于特殊的國家興趣，而是出于區域興趣。前者講授——后者聽受——這樣一些課程：東南亞史、東南亞政治、東南亞經濟、東南亞的神話與象征，諸如此類[[18]](#_18_56)。這種課程有一種實際的好處，它迫使所有學生橫跨一個極其多樣化的“區域”，多少帶著比較的眼光思考問題，并且把學生們聚到一處密切切磋，即便某人對古代越南感興趣，另一個對菲律賓公共行政感興趣，還有一個對爪哇人的神秘崇拜感興趣。（這也有不利之處，它往往把這些學生同研究朝鮮、斯里蘭卡、中東、中國等地的教授和學生分隔開來。）熱烈的學生課堂和個人關系最終延伸入學術的職業生涯，深深地與作為一個真實地點的東南亞捆綁在一起，并奉獻給它。這一奉獻也超越了直接的冷戰分界線，因為原則上，共產主義的、中立的和親美的國家都在一個單一架構內并列著被研究[[19]](#_19_57)。就此而言，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東南亞對美國大學中的人們來說，比對其他任何人都更為真實。第二，那時候美國有資源可以創建舉世無雙的“東南亞”圖書館[[20]](#_20_55)；它也有學術經費把感興趣的學生從諸多不同的國家吸引過來，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從東南亞本身那些出入自由的國家過來的學生。多年的學生生活，伴隨著他們共同的研究，跨國的友誼、愛情，有時還有婚姻，在1950年代已經開始造就一批年輕人，他們能夠想象自己是東南亞人，同樣也是印尼人，或菲律賓人，或暹羅人[[21]](#_21_56)。他們歸國后，一般待在國立大學、國家教育行政機構和資望較高的大眾傳媒的重要崗位上，常常會把這些個人關系維系幾十年。而且，這些學生中相當數量的人憑借在美國的學習，能夠以一種共同語言（在美國或別處）發表研究成果。對這類人而言，英語成了——這一點完全不曾刻意強調——東南亞真正的通用語，某種程度上也是它的現實性的保證；很久以后，外交官、政客、將軍甚至技術官僚們才作如是觀。

1960年代中后期，越南戰爭加劇為第二次印支戰爭，這產生了一個副作用，即東南亞在大學共同體內外的進一步成形。在美國大眾傳媒看來，越南差不多從來就位于東南亞——盡管考慮到它數世紀以來同中國的惱人的親近，還有它在河內的共產主義政權，人們本應可能視之為中國勢力范圍的一部分。當強制征兵開始帶來不良后果的時候，學院里注冊學習東南亞課程的人數暴漲，有關東南亞的圖書也越來越唾手可得。回想起來，更令人吃驚的是有那么多教授和學生，他們雖然在越南問題或越南語的知識上專業化程度不深，卻自認為有道德義務和知識能力，以東南亞研究權威的姿態，對這個國家及這場戰爭公開發表意見[[22]](#_22_56)。而且更有趣的是，這場戰爭（事實上它嚴重分化了東南亞專家）造成的校園生活的政治化和兩極化，對在國外求學——不管是美國還是其他地方——的東南亞學生產生了影響。人們可能發現，泰國和菲律賓學生針對戰爭進行抗議和游行示威，并同印度支那的民族休戚與共，而他們的政府與美國戰爭機器沆瀣一氣[[23]](#_23_56)。這些學生去游行示威，當然有他們自己的民族政治的理由，也有激進的、人道主義的理由，但是關鍵在于，他們視彼此為游行的同志，旁邊還有從事東南亞研究的美裔、歐裔、澳裔、加拿大裔學生，和他們一起抗議。在隨后的幾十年里，這些學生中有人成了真正民主化、包容性的東盟最為莊重博識的代言人之一。他們是這樣一類人：在曼谷他們敦促泰國政府公開支持昂山素季，在馬尼拉和吉隆坡他們抵制菲律賓和馬來西亞政府的企圖，這兩國政府可惡地熱衷于鎮壓要求東帝汶自由的會議，姑息蘇哈托政權。當然，成效不大。

### 作為東南亞勞工和資本家的“華人”

當歷史學家們開始——就在不久前——將東南亞想象成冷戰前和殖民前就已存在的古老實體的時候，可供發掘和審視這一實體的一個要地是中華帝國積數世紀之久的巨大檔案。從這個王國出發，佛教朝圣者穿越東南亞沿海地區，往返于中國與今日南亞的圣地之間，有的人留下了詳盡的旅行記述。東南亞的許多較大的王國都習于向當朝天子派遣使團，直到歐洲人中斷了這一活動為止；他們使團的目的是為了貿易、情報與政治合法性。帝國朝廷喜歡把這些使團說成是“朝貢者”，但也利用它們來搜集有關其“野蠻的”南部外圍的信息。（古代北京和當代華盛頓在這點上有一種諷刺性的相似。）因而并非意外的是，當代最卓越的“古代東南亞”歷史學家沃爾特斯（O.W.Wolters）——他的全部作品宏偉地跨越了今天被印尼、馬來西亞、越南、泰國和柬埔寨占據的領土范圍——剛出道時是個年輕的漢學家，為馬來亞殖民行政機構的一個部門工作，該部門被荒唐地誤稱為“中華屬國”部[[24]](#_24_54)。

福建和廣東，今日中國的這兩個東南沿海省份，其中有些男子往往不遵守經常很兇殘的帝國禁海令，從很早時期起就遷往東南亞，入贅當地家庭，做起了工匠、商人、港務長，有些情況下還成了有權有勢的朝臣。偶爾甚至更加高貴：當今的暹羅王室，這么說吧，有50%的“中國”血統；柬埔寨的諾羅敦家族也不亞于此。初來乍到，在一個陌生環境里，多數人沒法像他們自己被養育的那樣，養育他們的混血后裔。除非有意外的外部干預，他們的子孫會漸漸同化到當地種群里。這種同化比較輕松，因為最初的移民不知道他們是“華人”。他們絕大多數是文盲，通常講的是閩南語和粵語這類彼此聽不懂的話；因此他們認同于職業、宗族和老家，而不是認同于幾個世紀后方才浮現的民族。

有三股重要力量運轉起來，改變了這種逐漸潛移默化的狀況。首先是歐洲人的到來。他們對這些語言都茫然不解，他們的眼睛只盯著面相、服飾和職業，他們的野心傾注在掌控本地區的貿易上，所以他們決定，這一類人統統是“華人”，進而以這個決定為基礎采取行動[[25]](#_25_52)。（東南亞對“華人”的大屠殺在十八世紀由本地區第一批法西斯分子發起：巴達維亞/雅加達的荷蘭人和馬尼拉的西班牙人。）其次是十九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起義，它在中國東南造成一片狼藉，讓清王朝幾乎全盤喪失了對其南方海岸邊界的控制。近乎同時出現的汽船，以及資本主義殖民地東南亞這個勞動力匱乏的巨大市場，使得來自不同語言群體的年輕男子以空前規模大量移民成為可能[[26]](#_26_52)。最后是十九世紀末華人民族主義的登臺，不只是在中國本土的城市，而且（有時甚至更早）還在南洋[[27]](#_27_50)。特別是在今天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一地帶上，這些民族主義伴隨著識字率（不管是漢字還是羅馬字）的提高、報紙的出現、移民中的性別比正常化——這帶來了更加穩定的家庭生活。相反地，暹羅和菲律賓因不同原因，同化進展得相當快速平穩，那里的這種趨勢就大為遜色，對暹羅和菲律賓民族主義的認同反而強烈得多。

隨著1911年清王朝的覆滅，以及民族性的中華共和國的蹣跚出場，對東南亞那些自己以某種方式認同于華人，或者/而且被當地種群和殖民政府認作華人的人們來說，民族身份和國民身份的問題就開始變得迫在眉睫了。在后殖民時代，出于地方的、區域的和國際的一些原因，這個問題甚至變得更加咄咄逼人。地方上（至少在資本主義國家），歐洲人的政治經濟控制權的解除，為上升中的華人企業家急速提升經濟權力開辟了道路，同時使他們更嚴重地遭受本土精英的敲詐勒索和全國民眾的憤恨嫉忌[[28]](#_28_50)。區域上，華人商業利益鋪展得超越了國界，因為資本家尋求將風險和機會多樣化。與此同時，分別以當時左翼的北京和右翼的臺北為中心，中國兩個敵對的政權各施手段，企圖在當地的民族國家精英、地方反對派和流亡華人中網羅友朋。沒過多久，也就有了新加坡自治市這個異數：形式上是多族群或多種族的，而實際上是華人民族的又一種發展可能[[29]](#_29_50)，處在李光耀及其忠實追隨者的無限期政權控制之下[[30]](#_30_50)。

在后殖民時期，對相信華人是單一實體的那些人們（通常是外部觀察者）來說，把華人視為正在形成的一種名副其實的東南亞經濟的獨一無二、必不可少的跨地區基礎，這不算奇談怪論。隨著亞洲冷戰趨于緩和，隨著電子通訊技術發展起來，也隨著1970和1980年代的長期繁榮進一步拓深，這樣一種信念更是四處流傳：東盟的外交官們正極力從政治上和戰略上為東南亞所做的事，華人將會從經濟上做到。然而，這一景象是否符合現實甚為可疑。從一開始，本地區各民族國家的經濟，除新加坡外，本質上是競爭性的而非互補性的。有個驚人的事實是，在金融危機前的1990年代初期，區域內貿易仍然僅具次要意義。比如1992年，東盟內的出口額總計僅占總出口額的17.4%[[31]](#_31_46)。即便這個17.4%也是欺騙性的，因為進入新加坡倉庫的貨物其實不是為了本地消費，而是為了轉運到本區域之外[[32]](#_32_46)。菲律賓（5.9%）、暹羅（12.7%）和印尼（11.6%）的這些數字尤為不起眼。有關東盟內進口額的數據差不多是一回事[[33]](#_33_46)。東南亞各國也沒有充分投資在彼此的開發上——新加坡再次是個例外。金融危機以后，也隨著中國大陸和臺灣經濟實力的迅速增長，甚至這些低百分比都極有可能還要縮小。沒幾個觀察家注意不到，當艱難時世來臨之際，東盟國家及其資本家在彼此互助上束手無策，而且實際上往往是遵照那條古老而通達世故的法則行動的：各尋生路（sauve qui peut）。

### 東南亞：作為一個政治集團？

一個引人注目的事實是，當東盟于1967年組建的時候，邀請加入的公函被發送到東南亞的所有現存國家，而沒有發送給東南亞以外的任何國家。其中不但包括新加坡（它才剛剛成為獨立國家），還包括南越和北越、柬埔寨、老撾、緬甸，甚至產油的酋長國文萊（它十七年后才正式獨立于倫敦）。雖然后邊這組邀請函在當時無一被接受，但這份草擬于距北越春節攻勢僅數月的邀請名單，原則上是同冷戰慣例的斷絕，今天可以把它看作是邁出的第一步，要順著非洲、美洲和西歐的現行安排的路數，創建一個區域性外交集團。這里的核心理念是要創造出制度性約定，無須大國干預就能解決區域內的爭端，并且創造出一種聯合的“世界性存在”（world presence），那是當地任何國家單憑一己之力所做不到的。

這些目標實際實現的程度有限而模糊。對抗之結束不是由于東盟，而是由于蘇哈托將軍推翻了蘇加諾，東盟的創制者。馬科斯決定不再繼續提出菲律賓對沙巴的主權要求，是因為那時他發現，馬來西亞的政治領導人可以通過援助1972年——即他獨裁的元年——在菲律賓南部爆發的穆斯林（摩洛）分離主義叛亂，對菲實施破壞性的報復。但是，1960年代末英國軍隊從東南亞撤退，1975年美國在印度支那的戰略地位坍陷，都給東盟在本地摩拳擦掌提供了比較有利的環境[[34]](#_34_44)。焦點不出意外地落在印度支那。主要由暹羅、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牽頭，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開展起來，旨在防止東盟國家被迫接收從水陸兩路逃離河內、萬象和金邊那幾個獲勝的共產主義政權的大批難民。越南軍隊1978—1979年在柬埔寨大獲全勝之后，東盟緊接著同北京和華盛頓密切合作，阻止河內扶植的韓桑林政府僭取柬埔寨的聯合國席位，為波爾布特的武裝及抵制越南強加的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的其他集團提供各種支援。這樣，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期間，東盟更多是作為一個反越而非反共集團在發揮作用。這種局面的完結，靠的不是東盟之力，毋寧說是因為世界列強利用聯合國進行了協同干預，也是因為河內斷定它在柬埔寨的目標實際上已經達成。

由于東盟多數政府的威權性質，它也是軟弱乏力的。幾乎沒有什么政權容忍嚴厲的國內批評，它們的合作從一開始就依賴于“不干涉”彼此自行界定的內政[[35]](#_35_42)。如此一來，東盟面對菲律賓的摩洛問題，或者雅加達在東帝汶弄巧成拙的帝國主義，就無所作為了。最近將越南、老撾和緬甸的專制政府吸納進東盟，也不大可能減緩這種無能。東盟在如何處置洪森的柬埔寨這個問題上可恥的優柔寡斷，只不過證實了這一印象，更不消說緬甸和越南之拒不接受東盟有關偷越國境者的最新原則了。然而很顯然，在過去的十年里，東盟越來越多地設法讓自身在國際外交上受人重視，而且本地區早該發生的政治領導人的代際更迭可能打開通往民主化與更講原則的聯盟的道路[[36]](#_36_42)。

### 個人動力

1958年1月我進入康奈爾大學讀書，是出于最膚淺的原因：好奇。那時印度尼西亞出現在報紙的頭版，因為它有個龐大、合法的共產黨，也因為中央情報局培植的一場內戰一觸即發。碰巧喬治·卡欣（George Kahin）在康奈爾授課，這位學者寫出了有關某個國家現代政治的開山之作，在那年頭，大部分美國人和歐洲人很難在一幅世界地圖上找到那個國家[[37]](#_37_42)。然而卡欣還是美國第二家東南亞研究中心極富創造性的主任，他在身邊匯聚了一批不同凡響的教授級人才，精神飽滿地努力招收對每個正在涌現的東南亞民族國家感興趣的學生，假定他們有充足理由一起研究，互相學習。（因此對我來說，單就印尼本身進行研究在制度上就走不通了；只有把它放在區域背景下才行。）卡欣塑造我們品性的影響力的最后一個決定性方面是他的愛國主義。恰是由于他希望為他的國家感到驕傲而非羞恥，他的學術生涯過去是，甚至現在依然是由他的政治行動主義形塑的。他在1950年代初曾被剝奪護照，因為他尖銳批評美國外交政策。后來，隨著美國對印度支那干預的加深，他將他的主要關切點轉向那里，而不是指向他最初的喜好——印度尼西亞[[38]](#_38_39)。回顧起來，我覺得卡欣似乎是戰后美國對東南亞霸權計劃的邏輯—歷史對立面。他的學生從他那里學到了政治與學術的不可分離。

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相較于東南亞其他國家，印度尼西亞肯定是個有待研究的特殊地方。卡欣禮聘了溫文爾雅的語言學家和詞典編纂學家約翰·埃科爾斯，后者出版了一種東南亞民族語言的第一部優秀的后殖民詞典，并通過他的授課，使得年輕的“印尼專家們”成為通曉當地民族語言的第一個規模可觀的東南亞專家群體[[39]](#_39_37)。卡欣還禮聘了出生于里加的俄裔猶太舞蹈家、考古學家和藝術史家克萊爾·霍爾特（Claire Holt），后者在1930年代的大多數時間里都居住在荷屬東印度從事研究，1950年代返回獨立后的印尼，重拾并擴展她早期的工作[[40]](#_40_37)。距耶魯幾小時車程的地方住著捷克裔猶太歷史學家哈里·班達（Harry Benda），他曾在1930年代后期為東印度群島的一家奧地利公司工作，還被日本人監禁過。這兩位老師給學生們帶來了對美國東南亞研究的帝國主義面相的歐洲式懷疑態度，還讓學生們喚起了對殖民地時代和獨立時代之間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明晰感覺。最后，1960和1970年代最具影響的美國人類學家之一，克利福德·格爾茨，在爪哇和巴厘島做了他最重要的田野工作；這是機緣湊巧，如格爾茨本人后來記敘所言。

那時候，印度尼西亞在某些方面或許是特別的，但它總是被放置在東南亞框架下來思考和研究。這個框架恰恰受到越戰那些年頭的經驗的強化，當時，對差別迥異的國家與問題進行研究的學者和學生們，在不同程度上被迫作為東南亞專家采取主戰或反戰的立場。這不光是為了知識或政治的理由。不論我們個別的學術研究興趣是什么，我們在一起走向成熟，一起學習研究，閱讀和批評彼此的作品；我們以某種方式被一個東南亞拴在一起，而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我們幫著賦予那個東南亞某種現實性。

這些就是機構環境，它們讓我在1972年4月被印尼禁止入境以后，能夠不當回事地轉向暹羅研究（1974—1975年），十年后又掉頭邁向菲律賓（雖然有一小段時間我認真考慮過聞所未聞的舉動：冒險闖到東南亞之外，去斯里蘭卡）。暹羅和菲律賓似乎是印度尼西亞的“自然”對照物；讓這種轉向和比較成為可能的那些資源，康奈爾應有盡有：精良的語言教學、杰出的教員團隊，還要感謝那時美金的威力、埃科爾斯無私的盡心盡力，和世界最好的東南亞圖書館。也是從容納了前印度支那大勢已去的（ci-devant）革命國家的這個東南亞出發，我后來才有機會走筆到更遠的地方。1982—1983年間寫作《想象的共同體》的初始推動力，就來自1978—1979年在中國、越南、柬埔寨三角之間（要是容許這種擬人化的話）爆發的第三次印支戰爭。但是我也不能忘懷從雅加達看希特勒的那種望遠鏡視野，它讓我從此不再可能把歐洲視為理所當然。

幾年后，蘇聯的解體結束了冷戰，事實上也結束了那種模式的共產主義，卻又鬼使神差地給西方的官方想象力召喚出新的幽靈：其中最顯著者是（邪惡的）民族主義。在這些形勢下，而且恰值我生命中這樣一個時期：在東南亞開展嚴肅的、全心投入的田野工作的機會，因種種原因日趨減少，于是我被逐步引向更廣闊的、也更裝腔作勢地具有理論性和普遍性的思索和構想。然而這些新近的研究依然扎根于東南亞，不管有多堅實。所以，即使如后文所示，我曾神游至秘魯（我不過在里約熱內盧待過幾天，那時最接近它），我的腳步也是從菲律賓拐入那個方向的：在某種舞臺照明下，菲律賓可以看起來像是從拉丁美洲的安第斯山沿海漂移到遠西去的。

### 本書概貌

本書意在展現國家研究、嚴格意義上的區域研究和“理論”間的關聯，以及它們在我們這段同質、空洞的時間中的集體嵌入。對本書的這種稀奇古怪的安排，尚需有所交待。

本書的核心是關于印度尼西亞、暹羅和菲律賓這三個東南亞國家的幾篇文章，我在它們每個國家都做過廣泛的田野工作，對其語言也略知一二。這幾項國別研究之后，緊跟著的一組文章，試圖在東南亞的架構內對這些國家進行某些主題上的比較。一前一后把這些文本包圍起來的，是五篇理論文字，它們幾乎全是探討民族主義各面相的。我的想法是邀請讀者先考量一些理論思索，然后轉向這些思索從中生發出來的經驗研究，最后回到開先那較為高深奧妙的風格中去。

自我被禁止進入蘇哈托將軍的印度尼西亞以來，迄今已逾二十五年了，但是這個國家依然對我的情感和想象施加了強大影響。正像我在別處描述過的，這“放逐”意味著1972年以后，我有關印尼的許多著述都是憑借文獻資料，而不是對一個活生生社會的直接經驗[[41]](#_41_37)。不過這也有好處，它把我的探索推回到十九世紀，并且從日常政治推向了意識轉型，后者使得當下存在著的印尼可以想象。“黑暗之時和光明之時”最初發表于1979年，是對爪哇人蘇多摩博士（Dr.Soetomo）驚世駭俗的自傳（但它真是自傳嗎？）的研究，他是印尼早期最富吸引力的民族主義領袖之一。今天回頭再看，我一眼就看出，這篇文章已經播下了《想象的共同體》的種子。因為該自傳觸及了縈繞著民族主義想象的兩大突出符號——死亡和光明。第二篇“專業夢想”是在十年后寫就的，研究了用爪哇語寫的、從當代印尼人的眼光來看令人反感的兩首長詩的幾部分，其中一首成于十九世紀初，另一首成于1860年代，那也許是爪哇殖民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距蘇多摩出生僅隔一代。寫作這篇文章的時節，我正在考慮如何修改和訂正《想象的共同體》，特別是如何解釋為什么在約莫1810年之后，全新的民族主義開始把自己描繪成古已有之的。對這兩首詩與民族主義者蘇多摩的回憶錄之間的認知鴻溝的考察，有助于我理直氣壯地得出我的理論結論：民族主義的興起意味著徹頭徹尾的意識改變，以致前民族主義的意識變得隔膜難解，于是只得代之以“歷史”和“傳統”。

這兩項研究興許染上了一種古文物研究的氣味，沒有恰如其分地傳達出我對當代印尼的持續介入。大約在“黑暗之時和光明之時”初次發表的時候，我有了一次在我算是非同尋常的經歷：被傳喚到美國國會兩個小組委員會去提供專業證詞。這兩個小組委員會此時正在斟酌，對蘇哈托政權在印尼施行的駭人聽聞的侵犯人權行為，以及它對葡萄牙前殖民地東帝汶的野蠻入侵（1975年，珍珠港紀念日）和占領，應當和可能采取什么措施。前邊我已提起過，我從不曾涉足東帝汶，對那里使用的語言也懵然不通，不過起碼我是關于那個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專家。再說，我有被印尼禁止入境的不可估量的優勢，這樣我不再為恐懼所困，害怕因肆無忌憚的直言招致拒絕入境的懲罰——那種恐懼讓我的大多數印尼通同事們謹慎地緘默不語。奇妙得很，準備證詞、提供證詞的經驗，讓我回想起越南戰爭時期的況味。好像“敵人”從來沒變——同樣閃爍其辭的國務院發言人，同樣滿嘴謊話的大使們，同樣酷好冷戰的軍官和諜報官員。從那時起，我越來越多地接觸流亡海外的東帝汶愛國者，接觸東帝汶事業支持者的日漸壯大的國際網絡。這種介入的新近結果是“雅加達鞋里的沙子”，它力圖解釋何以在占領二十年之后，蘇哈托政權還是不能把東帝汶人變成印尼人，何以東帝汶的民族主義比二十多年前雅加達入侵時傳播得還要深廣許多，印度尼西亞人又為他們統治者的野蠻蠢舉付出了何等代價。

我花了一年時間（1974—1975年）在暹羅，研究它的主導語言，閱讀它的歷史，追蹤它的政治。那是一段妙不可言的時光，因為在1973年10月，曼谷的大規模群眾性非武裝起義為現政權的垮臺創造了條件，那是沙立（Sarit Thanarat）與他的副手他儂（Thanom Kittikajon）和巴博（Praphat Jarusathien）領導的久立不倒的軍事政權，受到美國的支持、武裝和資助。在整個1974年和1975年的大部分時間里，暹羅是個極其自由和激動人心的地方，到處是學生示威、工人罷工、農民動員和針尖對麥芒的政治辯論。1975年春，這個國家舉行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真正的自由選舉，空前絕后地將大批左翼人士選入議會。同蘇哈托治下的印尼形成的優劣之別簡直難以想象。然而，幾乎就在這次選舉的同一時刻，美國在印度支那的地位猛然間灰飛煙滅，這在毗鄰的暹羅的保守主義陣營中造成了恐慌。1976年的特征表現為日漸加強的恐怖主義暴力運動，那是針對被視為左派的人們的，最后在同年10月6日的政變中達到極致。與政變同時發生的，是在曼谷本身的鬧市區對學生施行的令人發指的殺戮。緊接著，數以百計的才華橫溢、忘我獻身的青年逃到了游擊隊駐地，在那里他們最初受到泰國共產黨（CPT）的歡迎。

“撤退癥狀”寫于這次政變和殺戮的幾個月之后，是我初次斗膽發表關于暹羅的東西。寫作那時節，誰也料不到兩年之內越南會成功侵入柬埔寨，中國軍隊會進入越南，而這場三角戰爭會飛快導致泰共瓦解；這篇文章把1976—1977年的國內兩極化讀解成冷戰和此前四分之一世紀內美國的高壓性、改造性存在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后果[[42]](#_42_37)。因此，對1976年10月6日政變及其背景的分析在我看來雖依然切當，它以之作結的預測卻迅即證明是靠不住的。“現代暹羅的謀殺與演進”發表在十多年以后，那時一個腐敗、保守的文官政權在鏟除了任何有組織的左派之后，似乎在這個國家穩定下來；這篇文章是對“撤退癥狀”的一種深思熟慮的修正，也是論述東南亞“資產階級民主”的一些作品的肇端——這個主題在“東南亞的選舉”一章里表述得更加充分。

我在1972年初短暫造訪過菲律賓，主要為了訪友，當時就有預感：馬科斯快要宣布獨裁了。同年9月這個第一巨頭公布了“軍事戒嚴令”，這種預感被證實了。我后來再沒有重返馬尼拉，直到1986年2月之后，那時這個年邁多病的暴君，還有他那荒唐可笑的老婆及其華而不實的首飾，被美國人轉移到了夏威夷。這又是一段美好時光，就像1974—1975年間的暹羅。我的許多學生紛紛涌入阿基諾夫人（Cory Aquino）的菲律賓，而我發現自己也身不由己地步其后塵席卷進去。從青年時代起，我一直想學西班牙語，如今有充足的理由下手了，因為在近代菲律賓史上的英雄時代（1880年代到1900年代，其時這個國家正引領著亞洲民族主義的興起），幾乎全部文獻都是用那種語言寫的。靠著詞典、我殘剩的法語和拉丁語以及一間藏身的陋室，我用想得到的最愉悅方式自學西班牙語：讀原版的黎剎小說，偉大的激情燃燒的《不許犯我》和《起義者》。但并非只有黎剎一人攫住了我的想象力，還有最早的起義者博尼法西奧的勇氣、1898年革命共和國的設計師馬比尼的超凡才智和垂范后世的人品、盧納（Antonio Luna）的軍事天才、皮拉爾（Marcelo del Pilar）的洞徹世事和組織才能等。到1903年，這些人全死了，此時，美國人基本鞏固了他們的統治[[43]](#_43_37)。1988—1989年我住在馬尼拉，目睹了風雨飄搖的阿基諾政府不斷遭到右翼上校們離奇的政變圖謀的打擊[[44]](#_44_35)，不可能不反思這樣的問題：才具相當的卓越人物為什么不再出現了？為什么資本主義頭號大國的殖民地，卻顯然成了處在共產主義集團之外的這一地區的獨立國家中最多災多難的？

“地方巨頭民主制”寫于1988年，在“現代暹羅的謀殺與演進”之前不久，而且有著相同的基調，盡管它的綱要式論域是菲律賓的整個近現代史。這也是距離較遠地反思美國帝國主義（它的后果我在印度尼西亞、印度支那和暹羅早就以不同方式領教過）的時機，既然美國在馬尼拉的統治先于冷戰近半個世紀。此外，在1880和1890年代，黎剎及其同志們完全不像我能想到的東南亞其他地區的任何人，真的，他們的“時間”與東南亞時間太不同步，有必要把他們置于標準的東南亞框架之外來考察。人們可能會想起1887年這個樞軸點的問題——那一年，《不許犯我》在柏林出版。蘇多摩博士尚未出生。僅在兩年前，不列顛完成了對緬甸的征服；當黎剎正要脫稿的時候，法國人才初創他們的印支聯邦。在南方，倫敦對馬來半島的宗主權剛在1874年正式確立。

便于思考十九世紀晚期菲律賓的明顯背景，首先是自相矛盾地既殘敗又開明的西班牙帝國，四分之三世紀前它在南美已開始分崩離析；然后從那里出發，是形形色色殖民主義的更寬廣的比較框架。“第一個菲律賓人”是最近才寫的，試圖將黎剎定位在這些背景當中，同時篡改東南亞研究日漸硬化的骨架。這要擱在十年前我是不可能寫出來的，盡管大體上《想象的共同體》的世界性框架——尤其是論克里奧耳先驅者的那一章，本應激發我往這個方向尋索。“難以想象”草成于1990年代初期，考察了《不許犯我》在官方民族主義和獨立后的地方巨頭民主制這個時代的奇特命運。

隨后的一組文章，前已提到，力圖在東南亞的架構內進行形式的比較。前兩篇寫于1990年代早期，雖然風格迥異，可是緊緊相連。“東南亞的選舉”思考的是，當“自由選舉”在暹羅、印尼和菲律賓的冷戰中與冷戰后的發展軌跡里突然顯現時，它們展示出的矛盾特征。在譜線的兩端：為什么繁多的“自由選舉”對菲律賓的苦難無濟于事，而“自由選舉”的缺失對印尼卻是一場災難？“共產主義之后的激進主義”對比了暹羅和印尼共產主義運動的懸殊命運，以及拒絕態度所留下的不同后遺物——留給自今視之已很遙遠的日子里曾稱為“歷史的終結”的時代。這也是向博得我無限崇敬的幾位暹羅人和印尼人表示個人殷勤的機會。今天，在亞洲泡沫經濟破滅之際，它的語調可能看起來過分傷感。

“各尋生路”是這本書的出版時間內的意外事件逼我動筆的：一年前后發生了這起金融風暴。這一崩潰來得如此猝不及防，它直接的當地后果如此痛徹肺腑，它對世界經濟的長期影響如此不可預測，在副標題為“民族主義、東南亞與世界”的一本書里面實在不能理直氣壯地忽略它。我沒有聚焦于這次危機的直接起因，那如今已是盡人皆知了；我試圖提出人們不大問的這些問題：（東南）亞洲維持二十五年的“奇跡”之所以可能，其前提是什么？而今這些前提在多大程度上消失了？金融崩潰變化不等的嚴重程度與當今東南亞的政權制度之間，有什么關聯是我們可以合理主張的？然而這只是個初步的草圖，為此我應請求讀者的寬宏大量。

“多數族群和少數族群”起因于1987年的一次會議，那次會議主要是人類學家參加，由戴維·梅伯里—劉易斯（David Maybury-Lewis）的文化生存（Cultural Survival）組織籌備，要共同探討困陷在后殖民的東南亞民族國家中、或多或少受到壓制的“部落少數族群”的命運和前景。在麻省劍橋舉行的多次研討會在兩方面于我有益。其一，通過手邊那么豐富和多樣的令人生畏的材料，它們迫使我找出一個有用的可靠框架，讓這些材料的并置能夠變得清晰易解。我通過對“少數族群”（minorities）這個觀念在東南亞賴以形成、然后具體化的種種手段的思考，找到了這個框架。這些手段也就是，從十九世紀末葉起，宗主國的人口普查制度，圍繞人口普查建立起來的行政管理實踐，還有把真理抵押給它的“科學的”人類學，所有這些都移入了殖民地世界。從那時以來，我對作為權力敘事的人口普查的興趣穩步發展，結果幾年后為初版的《想象的共同體》做了一項重要的補充，即名為“人口普查、地圖、博物館”的那一章。其二，我對反殖民民族主義的長期傾心和興趣，阻礙了我看到它一旦與國家結盟所具有的危險潛力。對這種威脅的新承認是一個過程的起點，該過程在十多年后帶來了本書第十六章的那篇論文，它專門研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的《敘事人》（El Hablador）——一本關于現代秘魯及其亞馬遜“部落少數族群”的滿腹疑慮的、民族主義的杰出小說。原本只是撿起來隨便讀讀，它卻像一塊馬德琳蛋糕一樣對我發生作用，強烈而意外地喚起我對東南亞往昔的種種回憶。

一頭一尾的框架性研究先是由三篇“理論”文章組成，它們探究一般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的起源、性質和前景，盡力比我此前所曾做到的再深刻一點。我1993年4月受邀去芝加哥大學做卡彭特講座（Carpenter Lectures），這些文章就胡亂地淵源于此。它們依次考察了民族主義的隱含語法，民族主義意象作為沒有原件的復制品的獨特性，還有民族國家與民族認同之間的日漸脫節——這是當代大規模移民與通訊和交通上的革命引發的一個后果。在每次講座中，我都從我的望遠鏡在“東南亞”的大端說起：殖民地爪哇的蔗糖帶，當代馬尼拉鬧市區的黎剎紀念碑，以及曼谷的機場——在那里，易受誘惑的移民每天都啟程前往他們素不相識的雇主所在世界的各個地區。

在本書末尾，一是前已提及的對巴爾加斯·略薩《敘事人》的沉思，二是“民族之善”，它簡要地思考了，在民族主義誕辰大約兩百周年之際，為什么有可能也有必要禮贊一下民族主義，雖然有人會說這有悖證據。

# 第一部 分民族主義的長弧

## 1 民族主義、認同與序列邏輯

Wenn die Tiger trinkend sich im Wasser erblicken werden sie oft gefährlich.［如果老虎喝水時看見了自己的水中倒影，它往往會變得兇猛可怕。］

貝托爾特·布萊希特

本文的目的其實有三。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通過思考必定產生兩類對比鮮明的序列（seriality）的那些物質、制度和話語基礎，給現代世界里集體主體性的形成問題重塑框架。那兩種序列，我將稱之為自由（unbound）序列和約束（bound）序列。自由序列起源于出版物市場（尤其是報紙）與流行表演的表征中；舉世通行的復數名詞，如民族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官僚主義者和工人之類，皆其顯例。正是這種序列使得——比如說——聯合國（United Nations）成為一個正常的、毫不怪誕的機構。約束序列源于政府管理，特別是人口普查和選舉這類制度，典型的例子是這樣一些限定性族系，如亞裔美國人、布爾人、圖西人等。正是這種序列使得“聯合族群”（United Ethnicities）或“聯合身份”（United Identities）不可思議。第二個目的是，在民族主義和族群身份（ethnicity）之間，以及關聯地、間接地在普世性與“世界性的”混生（hybridity）之間，劃一條既可行又清晰的分析性界線。第三個目的是，部分地通過反思扎根于工業物質文明、將宇宙挪走為世界讓路的那些日常生活實踐，清除掉像“派生性話語”（derivative discourses）和“模仿”（imitation）這些怪物，它們曾被用來理解民族主義和一種極度標準化的政治觀的驚人全球傳播。我將大量使用本人取自從前的第三世界的闡釋材料，在過去一個世紀里，那個世界所經歷的變遷的速度與程度，峻急得讓這兩種序列性的興起猛然大白于世。

### 自由序列

中爪哇的小鎮得郎古（Delanggu），四面環繞著巨大而優良的糖料作物種植園，有殖民政府的，也有本地王室的。1920年2月29日，這里發生了該地區有史以來第一次露天公共集會。演講者們向著也許茫然不解卻又興奮不已的農民和糖廠工人們致辭。今天看來，或許甚至在當時看來，這其中奇特地引人注目者，恐怕莫過于哈吉·米斯巴赫（Haji Misbach）了。他是從麥加歸來的虔誠的朝圣者，熱心的共產主義者，一張黑面孔夾在閃爍著白光的太陽帽和剪裁得體的荷式白夾克中間。在演說中，他激憤地說出了如下的話[[45]](#_45_35)：

當前時代真可謂是djaman balik boeono［古代爪哇語的民間說法，意為“反了天的時代”］，因為過去高高在上的，如今必定摔翻在下。聽說在Oostenrijk［荷蘭語，“奧匈”］國家，眼下就有一次反了天去了，它原先受一個Radja［印尼語，“國王”］統治，現在處于一個共和國的治下，很多ambtenaar［荷蘭語，“官僚”］都被共和國殺了頭。一個過去的ambtenaar只能低眉順眼，因為他的喉嚨快被割斷了。所以，弟兄們，記住了！這片國土只屬于我們，不屬于別人。

其實，查理七世在1918年11月已經宣布放棄他的帝國—王朝權利。這樣一種翻天覆地在維也納和布達佩斯都已經接踵而至。庫恩·貝拉的匈牙利共產黨已經于1919年3月21日執掌政權，在該政權遭遇捷克人和羅馬尼亞人的入侵而倒臺之前的四個月里，它確實即刻處決了大批階級敵人。但是到11月25日，協約國扶持海軍上將霍希上臺，他也開展了自己的恐怖活動。米斯巴赫令人惋惜地落后了七個月（但只有七個月！），不管他有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雖然如此，他的話在許多方面，一如他正在侃侃陳詞的群眾大會，對中爪哇殖民地都是新鮮的，因為他向他的聽眾們講話的時候，滿懷著對“世界”另一側的奧匈國家之存在的深信不疑，而他自己的語言此時還沒有那個國家的名字，他本人終其一生也不曾親眼見過它。而且，他描述的革命事件被說成是與爪哇的事件同時發生的，因此可以說是在單一時間——天翻地覆的年代——框架內協調一致的。這種協同性容許他預期，剛剛在奧匈國家的君主和舊官僚頭上發生的事情，隨即也將在荷屬東印度的相應人物頭上發生。然而更令人吃驚的是米斯巴赫運用不起眼的單詞“一”（a）。“一個”君主，“一次”反了天去，“一個”共和國，“一個”前政府官僚——在每個情形下，“一”表示緊隨其后的是單一范疇—序列的一分子，該序列跨越了可見的爪哇和不可見的奧匈帝國。范疇的名稱可以無所謂地用荷蘭—歐洲語言、印尼馬來語或爪哇語表達，這也顯示出當時全新的一種生活見解：語言彼此是透明的，彼此滲透，彼此勘測疆域——它們同等地遠離或接近物質世界。這種平等性在米斯巴赫父親的青年時代是不大可能的，它要行得通，荷蘭語就得從殖民權力的語言這個位置上降下來，爪哇語也得從祖傳真理的語言這個地位上走下來。最后，人們注意到“天”字（boeono）的語義學負荷上一種深刻但肯定是無意識的轉變。它原來的意思是近似“宇宙”（cosmos）的某種東西，一種分等級安排的自然而垂直的天地萬物，從上帝（或諸神）經由國王、貴族和農民遞降，直到動物、植物和它們置身其中的景觀。恰是這個意思方可解釋，為什么小小的爪哇王公大言不慚地自稱“巴固甫握諾”（Paku Buwono，意為上天的鉚釘）或“哈孟古甫握諾”（Hamengku Buwono，意為上天的支柱），卻渾不覺其荒謬。但是米斯巴赫顯然是在“世界”這種全新意義上使用“天”字，這個“世界”是由看得見和看不見的人類所組成的水平的人世間，火山、惡魔、水牛、神仙都從中消失了。

考慮一下另一種對照，爪哇人/荷屬東印度人的對照，人們能夠生動領會這其中所涉變化的急轉性。在《想象的共同體》里，我探討了1913年的一篇典范的報刊文章，系米斯巴赫貴族氣的同時代人、反殖戰友蘇瓦爾迪·蘇占寧拉（Soewardi Soerjaningrat）所作[[46]](#_46_35)。它的標題是“Als ik eens Nederlander was”，最好可以譯成“假如我眼下是一個荷蘭人”。文章旨在點出荷蘭殖民者的矛盾行徑：一面歡慶荷蘭從拿破侖征服中獲得獨立，一面強迫他們征服下的土著人為那些慶典的花銷掏錢[[46-1]](#_46_1_2)。但是我們也能看出，蘇瓦爾迪的諷刺性修辭無動于衷地把這一匿名序列視為當然：荷蘭人。相比之下，如果人們看看蒂博內哥羅（Diponegoro）親王在被監押的流放中寫作的回憶錄，就會發現這種意義的“荷蘭人”從未出現過[[46-2]](#_46_2_2)。蒂博內哥羅親王是蘇瓦爾迪不算太遠房的老輩親戚，在1825—1830年間領導了反抗荷蘭殖民主義的長期武裝斗爭，因此今天他是獨立印尼首屈一指的歷史英雄。他以封建時代的手寫本風格，記下了他的顯達的敵人的個人名號和頭銜。如果這些敵人不是“荷蘭人”序列的組成部分，那么他本人也不是“一個”親王，或“一個”爪哇人。

還有一個詞缺席了蒂博內哥羅的憂郁的回想，那就是我們可忠實地譯為“政治”的東西。這種缺席一點也不是特異的。在亞洲和非洲幾乎一切地方，過去百年間都不得不為這個概念創造新詞，每個新造詞的誕生日通常都接近于民族主義的誕生日。要讓“政治”變得可以設想，成為一個界劃井然的生活領域，有兩件事必得發生。（1）專門化的機構和社會實踐必得歷歷可見，而且不能以陳舊詞匯漫不經心地曲解它們，那些詞匯屬于從宇宙論和宗教上加以維系的君主政體。它們就是普選、總統、審查官、政黨、工會、集會、警察、領袖、立法機關、聯合抵制，諸如此類——民族也是。（2）世界必得被理解為一個整體，如是，則不論其所包含的社會和政治系統、語言、文化、宗教與經濟體如何千差萬別，都有一種不言自明地處處發生的共同活動——“政治”。

在亞洲和非洲，“政治”詞匯幾乎總是先于它們的制度性實現，這有別于（比如說）“工業主義”或“軍國主義”，我們知道，后者是在它們想要表示的現象已經開動起來幾十年以后，才在歐洲創造出來的。人們先讀到政治詞匯，再按它們的模型仿制——所以最早的本土袖珍詞典往往是關于“怎么辦”的政治詞語匯編。

### 報紙

這樣的詞語匯編一般是通過早期的報紙和雜志傳布開去的，這讓人得以考慮按模型仿制（modelling）過程的特殊性質，以及可以說是構成該過程基礎的語法。這種仿制主要是靠序列化（serialization）發揮作用，而不是靠簡單的復制。1983年我討論過報紙在想象民族時所需的時間觀念的創生中所起的作用，我在那里強調，每份日報向讀者提供的那些明顯是無規則的事件，它們的日歷同時性具有重要意義[[47]](#_47_35)。現今我確信這是片面的。我完全忽略了另外兩種相互關聯的連貫性原則。其一是各地的報紙都把“人世間”當作它們的領域，不管它們怎樣偏頗地理解它[[48]](#_48_35)。一家報紙，將它的事件報道局限于它出版地所在的政治區域，這大概是違反自然（contra naturam）的。盧旺達的恐怖事件出現在東京的報紙上，斯德哥爾摩的報紙描述皮納圖博火山爆發，歐洲足球錦標賽決賽出現在仰光的報紙上，這一切看起來都如出一轍地絕對自然。其二是這種自然的普世性無論在何處，都被不自覺的詞匯標準化深深地加強了，后者徹底蓋過了報紙上本地新聞和外地新聞之間的任何正式界線。這不是什么新近的發展。在米斯巴赫的年代，秘魯、奧匈、日本、奧斯曼帝國——不論它們在人口、語言、信仰和生活狀況間的實際差異多么巨大，都以極其同質化的方式被報道。天皇或許住在日本國內，可是他會作為（一位）君主，現身其他各地的報端。甘地可能是孟買的圣雄，但在別處會被描述成“一位”民族主義者、“一位”鼓動家、“一位”［印度教的］領袖。圣彼得堡、加拉加斯、亞的斯亞貝巴——通通是首都。牙買加、柬埔寨、安哥拉——通通是殖民地。

這不是說真正的相似性不存在，因為在十九、二十世紀，日常的制度性仿制在全球各地如火如荼地展開著。毋寧說，恰恰是報紙的編排，憑借其不斷變化的內容的隨機性，妨礙了人們想象別的什么東西，這才是實情。我們甚至可以說，間或向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同時存在的想象力展現猶大之獅和天子（除了兩個完全隔離的廷臣和官吏小集團以外，其他人不能親眼目睹他們的真身），需要將之放置到一個單一的明確序列中去：帝王。這類序列是日常的一般概念，透過并跨越一切印刷語言滲入人心，但絕不是必定以單向流動的方式。僅舉一例：從中古時期以來，薩迪納（sakdina）這個詞就卑躬屈膝地指稱暹羅傳統的以君王為中心的地位體系，1950年代年輕的泰國馬克思主義者攫獲了它，此時含義大變；對他們來說，在一種普遍意義上運用這同一個術語，進而寫到中世紀歐洲的薩迪納社會體系，似乎再正常不過了[[49]](#_49_35)。薩迪納和“封建”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換（我們會看出，這正如“翻天覆地”與“革命”互換一樣）。這不表示它們說的全然是一回事，倒是表示，從曼谷到伯明翰，有兩個對應的序列，正橫穿一個單數的世界綿延開去，并準確無誤地勾繪出這個單數世界。這個例子也是一個象征，表明新的序列思維自始即有的運作方式：它既可能在報紙頁面上共時性地運轉，也可能縱貫同質的、空洞的時間歷時性地運轉。

正是從這種序列邏輯內部，一種表征的新語法形成了，這也是想象民族的先決條件。后期的殖民地環境對理解這一發展是尤為適宜的場所，因為我們可以在那里考察這種邏輯是如何以相同的方式——盡管是在各不相連的制度背景下，在白人統治者和有色人種的被統治者中間運行的。為了闡明這個過程，讓我們暫且繼續探討十九世紀晚期、二十世紀初期的荷屬東印度。

### 商業中心的表演

近至這個時期前，各式各樣的大眾本土戲院，包括名聞遐邇的傳統皮影戲，都是建基于一種或可謂之傳統形象（iconographic）的邏輯。那些故事由真人表演，或者由木偶表演，伴以操縱木偶者的畫外音；它們取材于地方傳奇或是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兩大史詩的情節片段，后者歷經數世紀，已經十分本地化了，只有極少數有文化修養的人才會意識到它們的印度起源。不但故事是觀眾耳熟能詳的，它們的表演在傳統形象上也是固定不變的。節目單是不可想象的，因為人物全都經由標準化的身體類型、發型頭飾、服裝樣式、談吐風格和全套姿勢，精心地區分開來了。只有一個因陀羅、羅摩或阿朱那，他們在登臺亮相的一瞬間就會被認出。不存在解釋這類人物的問題，他們往往被理解成舞臺以外實實在在的生命，因此演員的身份，甚至常常包括性別，都是不足掛齒的事情。很吊詭的是，支配著羅摩能夠可信地說什么的那些傳統形象規則如此嚴格，人們從來沒想過還要劇本，輕松的即興創作在當時司空見慣。

然而臨近十九世紀末，一種新型劇院在報紙商業中心成形，它以其特有方式招徠巡回的歐亞人和歐洲人劇團進行雜耍和輕歌劇演出。當本土演員以適中的票價上演方言版的《威尼斯商人》時，它的吸引力恰恰在于這個異域標題的爽心的神秘性（威尼斯？在哪兒？但人們在任何一幅印制的“世界”地圖上都能找到它——地圖中可沒什么天堂或地獄的插圖）[[50]](#_50_35)。像這類戲劇里的大多數人物一樣，夏洛克不能依照傳統形象加以呈現。迄今尚無任何慣例，說明他應該如何目視、穿扮、言語和舉手投足。傳統戲曲里不曾出現過猶太人，也沒有高利貸者。所以除了（用準社會學的話說）把夏洛克當作一個社會類型或類型組合，沒有別的辦法飾演他。男演員（此時性別就很要緊了）不再可以即興創作，而需要劇本和排練相助，才能表現出一個逼真的猶太高利貸者；這種逼真性有賴于讓觀眾相信夏洛克的社會真實性，換言之，他可以被置放在像殘忍的高利貸者、溺愛子女的父親和財迷心竅的守財奴這些彼此交叉的普遍序列中，也可以被置換。然而他的代表性不只是扎根于人們經驗的殖民地生活（誠然，誰都知道高利貸者、守財奴和溺愛子女的父親，可是在東印度群島，猶太人少之又少，幾乎見不到），也是建立在“表征王國”自身亦即出版物世界基礎之上的。在那里，虛構的夏洛克、哈姆雷特和珍妮維芙們不僅“合乎語法規則地”與真實的序列的都城、罷工、選舉和足球賽結成一體，也與圖片廣告連在一起，后者除非當作對序列的稱心商品之豐饒角的誘人提喻，否則總是莫名其妙的。

### 約束序列

與此同時，在社會高層，序列化向十分不同的方向推進著。1920年，正當哈吉·米斯巴赫在中爪哇的蔗糖帶發動革命運動時，殖民政權在其疆域內實施了首次“科學的人口普查”[[51]](#_51_35)。就世界范圍來看，這無疑顯得略遲了些，但還不算太遲。新獨立的美利堅合眾國是從事具有科學雛形的公共人口普查活動的首創之國，它于1790年進行了勉強過得去的全國人口統計，比法國、荷蘭和英國早了十年[[52]](#_52_35)。但是直到1850年，調查單位還是家戶，只有家長的名字被記錄下來。遲至1880年，華盛頓才成立了中央的人口普查辦公室，要到1902年，這個辦公室改名為人口普查局以后，方始成為一個常設的政府專職機構。放寬視野，我們注意到，只是在1853年，時值1848年歐洲民族主義動蕩平息之初，在布魯塞爾召開的第一屆國際統計學大會才正式通過一項決議，要建立基本的“科學”要求，以期獲得人口普查數據的國際可比性與普查內容和技術的標準化。[[53]](#_53_35)

這樣一項決議不得不在1855年的巴黎大會、1860年的倫敦大會和1867年的佛羅倫薩大會上反復投票表決，說明統計學家們把人口統計數據處理加以現代化和跨國化的這項政治運動，并非風平帆順。我們或許不應感到驚訝，只有等到國聯初期，這一運動才多少取得些成果[[54]](#_54_35)，更不必驚訝這是與婦女選舉權的陡然、急速擴展同時發生的。

如許多評論者注意到的，不但開展人口普查是一項繁雜、昂貴、公共性十足的事務，而且除了一些仍然頗可預料的例外，普查結果也是眾目睽睽下的公共文本。于是，我們業已簡要地運用于報紙和大眾劇院的那種“語法”檢查，原則上同樣應當適用于人口普查。以此觀之，我傾向于關注普查慣例的三個特具面相。

慣例之一是要整數不要分數，或者反過來說，要保證身體的一種幻影似的完整性。譬如，要是一種簡單的、設想的分類體系打算把全部人口歸入黑人和白人兩類，然后它偏偏撞上了混亂的現實，那里有相當數量的人群，比例不等地是混合血統的；一個合乎邏輯的選擇或許是，把1/2、1/4、1/8、1/16這些數字歸入“黑人和白人”一欄。但是既然慣例禁止這一可能性，實際的選擇要么是武斷地歸屬為黑人或白人，要么增生其他類別和子類別——不妨謂之“穆拉托人”（mulatto），“夸德隆人”（quadroon），“奧托隆人”（octoroon）[[55]](#_55_35)，這樣，混血性或分數性就能重獲整數的地位[[56]](#_56_35)。當然，這決不表示每個被統計者不會在同一次普查的其他諸多分類細目中匿名重現，而且在每種情況下都是一個整數；它反而意味著這種復雜的分數性是以隱顯墨水書寫的。從一方面說來，每個被統計者都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另一方面，它不過是若干縱橫交錯的序列匯聚之所。

第二項慣例是匿名性。可以說，在個人普查表格上完整記錄的姓名，是這些文件里高度機密的部分，國家要嚴守秘密。饒有興味的是，美國的這一高密級延續72年了。（而且，一個人可能因為在他那份表格上“秘密地”向國家撒謊而受罰。）[[57]](#_57_35)無名性慣例有兩個相連的現實效應，就像羅蘭·巴特過去常說的。一方面，它支撐了普查的真理，因為不管是誰，要拿他或她的個人知識和眾人感性認識那個世界來印證普查，就變得幾乎不可能了。另一方面，透過各整數的等價性，它勾繪出一個穩定的（十年期）社會場域，一頁頁莊嚴氣派的恒等總數行封存了該場域。這個無名的、表格式縱橫交織的場域（比方說，丹麥）是被序列性地、共時性地想象的，并被當作一幅自畫像。

第三項慣例是累計總數，它與報紙的序列想象物那歡騰的無界性形成鮮明對照。累計總數（在社會科學的行話里欣欣然膨脹成了“總體”，universe）其實是大多數二次統計運算所需要的，但它有其自身的政治世系，對此進行簡單回顧或許是有用的。順著一個家系可以追溯到威廉·配第（1623—1687），他是霍布斯的助手，亞當·斯密的“施洗者約翰”，隨著1691年他的《政治算術》出版而贏得了幾分身后榮名；對該書而言，可比的分析單位是當時存在的政治國家[[58]](#_58_35)。順著另一個家系，可以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紀“德國的”國家（Staaten）比較研究的財政學傳統，它最終使得格廷根教授阿亨華爾（1719—1772）經引申創造出了“統計學”（Statistik）一詞。甫一問世，這個術語迅即伴隨著辛克萊（John Sinclair）21卷本的《蘇格蘭統計紀事》，渡過英吉利海峽進入英語；該書是1791—1799年間出版的——當然是逐卷依次出版[[59]](#_59_35)。事實上，累計總數（totality）在被統計學自身的內在邏輯確立之前，開明專制主義時代政治上深溝高壘的國家就賦予了它初始形態：當時正趕上民族主義時代。

統計學邏輯和政治在人口普查中聯起手來，在同樣的現世邊界上切斷了每個序列（在二十世紀美國的人口普查中，蜂擁西進的“女性”、“黑人”、“開業醫師”全都同形同態地終止于太平洋和白令海海岸線）。但是與此同時，通過二者的相互作用，它們造就了報紙無力產生的某種東西——多數派（majorities）和少數派（minorities），它們是序列的、可聚合的、兩相對立的，起初是作為形式上的實體，沒多久就被安放在呈現政治現實的位置上了。（這里是一個源頭，托克維爾由此開始焦躁不安地設想最終是基于人口普查的各種暴政，時當1830年代，大西洋兩岸的英語國家正在組建統計學協會。[[60]](#_60_35)）

連接的橋梁當然是選舉權。新生的美國之所以能夠像這樣啟動這個宏偉領域，不過是因為它新穎的共和制和聯邦制特征。當君主和社會等級都不存在的時候，看起來主權只可能顯現在經選舉過程表達出來的公民意志上了。1790年的全國人口統計，以及此后直到米斯巴赫時代的十年一度的所有人口統計，主要用來從算術上保證公平分配國家立法機構的兩院選舉代表的席位。并非是選舉人數目以任何明顯方式與普查計數相匹配，而是無選舉權的婦女和未成年男性被假定要平均分布在各州，這樣戶主（如我提到過的，直到1850年，人口普查都只登記他的名字）就能代表他們——在統計分配的意義上。然而奴隸分布不均。他們或許是財產，但南方的奴隸主并不巴望著放棄每十年一次把他們當人來計數的機會。因而有了古怪的折中安排：經人口普查登記的每個不自由的美國人，被以分數形式計算成3/5個人，以便國會重新分配。這表明威廉·配第的政治算術已經枝繁葉茂了。

選票至上主義從美國星散四布，對人口普查的做法施加了不斷增長的影響，因為人民主權的觀念流傳開了，也因為國家獲得了一種福利與發展的使命，還因為選舉權擴大了。不久以后，選舉人開始影響統計類別本身，憑借這些類別，人口調查的機器才呼呼作響[[61]](#_61_35)。在新形勢下，人民第一次有了充足理由希望自己算一分子，如果計算方法可靠的話，而不是盼著自己被收稅員——他們是人口普查員的先兆——忽略不計。到二十世紀初葉，人口調查的這種“選舉”模式在宗主國里已經顯得這般正常，以致它甚至悄然滲透到殖民地獨裁政府里，在那里它反而會具有長遠的顛覆性后果。

菲律賓提供了這個過程的一個鮮活例子。1818年它開展了第一次嚴格的調查[[62]](#_62_35)，那次調查的類別名錄包括這樣一些無關選舉的奇特伙伴：difuntos（死人）、negros infieles（異教黑人）、tributos（納貢者）、mestizos españoles（西班牙混血兒）、morenos（棕色人）、individuos contribuyentes（個體納稅人）。它的設計者們顯然是居高臨下地主要從宗教和財政方面著想的。almas（靈魂）這個詞，以及infieles（異教徒）和convertidos（改宗者）之間的基本對立，是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出場。跨類別匯總是多數派—少數派分組的必要基礎，這里卻難得見到。沒有地方主義的形跡，也沒有密布在這個群島上的諸多種族語言集團的蹤影。[[63]](#_63_35)下一次人口普查，即1877年那次，是徹頭徹尾世俗化的，收稅人的陰影消失了。這次統計基于三條簡單的軸線，它們標明了居民的在場/缺席，他們是españoles（西班牙人）還是extranjeros（外國人）的身份，還有他們的膚色——blancos（白色）、pardos（褐色）和morenos（棕色）[[64]](#_64_35)。此處的一切散發著一種落后卻定然屬于十九世紀的獨裁政治氣味。然而1903年那次人口普查，是美國人在正式結束他們野蠻的征服戰爭后數月內施行的，它已經是以美國人特有的做法，按照選舉制原型組織起來的，它（依字母次序！）類型化了仿佛確定不移的25種“野蠻”或“文明”的本地種族語言集團、從白到黑的5種膚色，還有亂糟糟一堆出生地和國籍（如果關系重要的話）。[[65]](#_65_35)這次普查公之于眾的登記頁里，Tagalog和Ilocano這兩個詞后首次被標上號碼，那些說他加祿語和伊洛卡諾語的人們一看就可以認出。而官方普查的現實效應，亦即它宣稱“正在統計的東西從全社會來講是深深存在于‘那兒’的”，賦予這些符號一種沉靜的紀念碑性。更為引人注目的是，菲律賓的美國人（他們是不能想象不統計自身的，因為他們是何等超群地舉足輕重），由于調查表的這種類型結構，他們顯現為一個明顯的、封閉的、屈指可數的少數族群。一模一樣的事情后來又發生了，發生在1921年荷屬東印度的人口普查中，以及更一般地在二十世紀殖民世界的人口普查中。從某種角度觀之，我們可以把這些普查個個都看成是熏黑的內臟，相應的那種殖民主義的行將崩潰由此隱隱可辨。

### 實踐

這兩種序列化，一類是報紙塑造的，是自由的、非枚舉的，另一類是人口普查塑造的，是約束的、可列舉的。從二者作風的差別中，有兩種政治化和政治實踐的輪廓浮現出來，不過它們雙雙表明序列始終對集體身份的現代想象多么根本。

下面這段話可以讓我們生動領會第一種政治實踐的動力，它是我從Dia Jang Menjerah（“她投降了”）翻譯過來的，那是印尼最負盛名的作家普拉姆迪亞最初發表于1952年的一個迷人故事。它描述了故事女主人公十幾歲大的姐姐伊絲（Is），在日本人對印尼的野蠻占領（1942—1945）結束之后立即爆發的革命浪潮中，如何跑去參加激進組織印尼社會主義青年團（Pesindo）：

在這樣的時代里，對政治的滿腔狂熱，像浪濤似的向前咆哮著，失去控制。人人都覺得，仿佛她或他要不是政治性的，不爭論政治問題的話，就不能算真的活著。說實在的，哪怕沒有米糧，仿佛他們還能活下去。即便是學校教員，也被政治狂熱的流行病傳染了，他們過去自始至終可是“不偏不倚地”生活的；而且，只要可能，他們就拿自己所擁護的那種政治去影響學生。每個人都拼命給他那一派拉入新成員。學校也證明是他們爭斗的廣闊戰場。政治！政治！跟日據時的大米沒什么兩樣。不久充足的課程跟進了。有一些人，不過剛剛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有個一知半解，就在食品攤前，在街角，在大樓里，競相發表演說，把他們個個頭腦里轟鳴的東西一吐為快。而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我們村那貧瘠的石灰巖土地上，突飛猛進地成長起來。到如今，伊絲認清了她正在走進的這個社會。她找到了一個熟人圈子，比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們組成的圈子大多了。她眼下占據著那個社會里的清楚位置：作為一個女人，作為政府辦公室的一個打字員，作為一個自由個體。她成了一個新人，有新見解、想講的新故事、新視角、新態度、新興趣——這些新物事，是她設法從她的相識那兒采擷和收集來的。這一切，就在日常生活的苦難中進行著，無動于衷的樣子。[[66]](#_66_35)

伊絲的兄弟姐妹和父母這個圈子不存在序列。但是在她做出了微薄貢獻的革命時刻，她幼弱生命里第一次以序列方式想象自己：她是“一個”女人，“一個”打字員，“一個”自由個體，“一個”新人。這種序列化如此轉變她的意識，而今什么東西在她都新意盎然。但是這些有可塑性和普適性的序列，絕不會出現在人口普查中，這不單單是由于它們不能被列舉和匯總。[[67]](#_67_35)此外很明顯，她把這些序列看成是同一類的，所以做一個女人、一個打字員和一個新人，履行了而不是妨礙了她為祖國自由而斗爭的義務。我們也認識到，這些點到的序列是隨時可利用來進行萬花筒似的轉換、擴充和縮減的。什么都沒有釘牢在命定石上。明天，她可能成為“一個”革命者，“一個”囚徒，“一個”青年，“一個”間諜，甚至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即在1946年把艾德禮和尼赫魯都包含在內的那個無約束卻有根基的普遍序列，不過這些只是并始終是暫時的。如果伊絲現在認為她本人是這個騷動世界的一部分，可謂受到日常的一般概念的召喚去戰斗，那我們也要依照這相同的符號來理解她。我們不會分享她年輕女人的身份、她的打字技能、她的母語、她的宗教，或她的文化，但是她向我們說話，不是作為人種志上所謂的“報告人”（informant），而是某些序列的一分子，如果我們愿意依那些序列行事，它們是向我們敞開大門的。

關鍵是要注意到，她認為自己正參與其中的那大多數序列，要求她行動起來，扮演角色（act），這是它們的入場費。她將不得不學習如何“做”社青團的一個革命成員，好比別的人不得不學習如何“做”哈姆雷特，或罷工組織者，或民族主義者。但是她知道這一切是解放，而她惦記的最后一樁事情是她的認同或她的根。（我們從一開始就能感覺到，她要把自己拖向后來的悲劇。）

現代人口普查的序列邏輯好像在相反方向上展開。考慮一下普查似乎暗中引出的首要行動，亦即選舉，我們就可以起步追尋這一邏輯了。在最理想的狀況下，這種行動需要加入一天的長隊排隊等候，每個人依次進入一個圍起來的空間，它像公廁一樣奇異地私密，對它來說，放下的門簾似乎就相當于體面的衣裳。一旦入內，這些人就拉動相同的控制桿，或者在完全一樣的紙張上寫下標準化的詞語或記號。不遲不早就在那一刻，不管他們喜歡與否，他們停止“做”選民——除了在歸屬（ascriptive）意義上而外——直到因年而異的下一次盛會再度降臨。

選舉行動非同一般的極少性和周期性，提醒我們選票與普查細目表在以下方面多大程度上是同構的：它拒絕分數，它精心安排了可疊加的匿名性，還有它在適當時候會隱藏到嚴格受限的總計里。但是這也向我們顯示了它的現實的和象征的政治效能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授權（entitlement），連同它的詞源中全部反諷、過時的寓意。在一個人能夠“從事”選舉之前，他必須被授權去這么做，這要憑借一種法律行動，他絕非該行動的唯一受益者。他也不僅是“被授權”去選舉，選舉行為本身又“授權”別人代表他去行動。但是這個別人不是靠代理人權力進行活動，而是作為一個有界序列的代表。這種序列的有窮的數字占卦術（numerology），轉而又在交疊、分層、多數派/少數派的基體內發揮作用。正是這一點使得（比如說）下面的情形再正常不過：選舉一結束，除了職業政客，沒有誰看重獲勝的候選人賴以擊敗她或他的對手的準確數字；甚至投票反對當選者的那些選民，也覺得完全有資格在她剛一獲勝就向她提出要求。囊括各層級的選舉人多數的，始終是更高的一個整體。選民們腦子里總是記著總數——有資格的選民數n。

從這個構架里，影響集體主體性發展的兩大后果顯露出來，特別是在剛過去的半個世紀里。二者指向同一方向，雖然是出于略有不同的原因。

第一個后果是以選民數n為依據，按比例賦權。當二十世紀以選舉為基礎的服務型政府增加了它的職能、擴大了它的福利能力的時候，益發精巧的人口普查日益成為集成數據庫，各種規劃和預算分配都由此而來。結果，普查本身就成了一種較為顯著的政治化的目標。舉個極端的例子，在尼日利亞，多年來人口普查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無非就是因為害怕它會透露該國那些自我想象的族群集團的“真實”人數，進而會對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分配暗示些什么。另舉一個宜人些的例子：請注意在騷動不安的“長”1960年代，選民的壓力是如何導致荷蘭廢除人口普查的（最后一次在1971年進行）；直到今天，荷蘭依然是世界上拒絕這一政府管理的強大工具的唯一國家[[68]](#_68_35)。因1980年美國人口普查而引發的騷亂，更其標明了在何等程度上，普查中各種類別的界定透過它們在安排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的分配、調整利益預期上的作用，已經凝固成基本化的政治現實[[69]](#_69_35)。這樣的類別當中，族群類別證明它們的重要性無出其右。它們原本是在一個世紀前，在一個前福利的時代，構想出來倨傲地調控從歐洲不同地區涌來的移民流。然而，當1920年代切斷了大規模的新移民潮之后，由于通訊領域的革命，這些類別變成了甚至是全國性選舉動員的基礎。普查類別和賦權政治的強大連鎖效應，可見之于新近的一些美國想象物在政治上的興起，如西班牙裔選舉、亞裔美國人選區等；甚或可見之于選舉中的化種族（race）為族群（ethnicity），如“黑人”的例子所示。

在二十世紀后期的這種政治認同里，人口普查及其小兄弟隨機抽樣調查代替了鄰里和家鄉。這樣的認同不僅政治重要性漸長，也讓我們對族群和民族主義之間脆弱而清晰的界線看得更真切。族群政治是在人民首先作為選民的國家—民族賦權基礎上登上舞臺的，又是在既定普查的構架之內的比例性基礎上受到辯護的。當——或者不如說如果——一個自命的族群集團重新想象自身是個民族（比如就像魁北克人干過的那樣），并謀求獲得獨立國家地位的時候，那它會為了一種新的自成一體的普查，而廢置原來的普查。但是恰恰就在獨立之際，在一個新的總數n當中，比例邏輯再度出現。

第二個后果是認同政治（identitarian politics）的加強。我早先提到過的那些有界可數序列——人口普查是最好的典型——的本質主義蘊涵。但是我懷疑這種序列是在另一個層次、同一個方向上運作的。這樣來想：邏輯上，認同是對偶性（duality）的一個函數，它存在于當“b”突然碰到了“=b”的那一刻。這是一種干癟的、代數的方式，可以注解索因卡（Woyle Soyinka）對桑戈爾（Léopold Sénghor）提出的序列“黑人認同”（négritude）的辛辣摒棄：唯一的老虎無需老虎認同（Tigritude）。換言之，只有在兩只身份未定的野獸從彼此那流離失所的眼睛里映照出自身的當口，老虎認同才顯得必要。

“流離失所”（exile）這個詞用在這里并非事出無因。我們大家都非常了解，人們是怎樣喋喋不休地講到不單要“尋”“根”，還要“探索”、“發現”他們的“認同”，并且，天哪，“快要迷失”他們的“認同”了。但是這些尋找，它們口頭上是向內心轉移，走向一度是靈魂安宅之所，實際上向外行進，邁向真實的和想象的人口普查，在其中，托了資本主義、國家機器和數學的福，整數的身體變成完全相同的，因而可以作為序列累加成虛幻的共同體。

此外，在我們的時代，這樣的共同體不復局限于既存的民族—國家內部了。我在別處曾更詳細地論述過，二戰以后通訊和交通領域的革命同后工業的世界資本主義相結合，引起了史無前例的跨國移民[[70]](#_70_35)。

同樣的諸種力量運作起來，創造了“流散社群的”集體主體性，后者是想象的、人口普查式的，如有界序列一樣。對這一轉變，很少有文本比好意的《企鵝移民社群地圖冊》給人一種更具象征性的觀點了[[71]](#_71_35)。全書開頭花了七十多頁篇幅，敘述了公元前八世紀開始的猶太人大流散；接下來講述了亞美尼亞人、吉普賽人、黑人、華人、印度人、愛爾蘭人、希臘人、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最后以越南人和朝鮮人收尾。在每個實例下，引人注目的事情是作者堅持提供數字總計和小計——譬如說，全世界的亞美尼亞人總數，法國、格魯吉亞、澳大利亞或阿根廷的亞美尼亞人總數。同樣有啟示意義的是，這些總數被若無其事地（即使難以置信地）四舍五入了：1920年肯尼亞有42000名“印度人”，1250年葡萄牙有40000名“猶太人”。這些計數是帝國政府機器出于它們自身的原因、依靠它們自身的特殊邏輯算出來的；那42000名“印度人”到底有多少真的把自己看成“印度人”，是遠不確定的；在十三世紀的葡萄牙，要斷定誰是猶太人，牽涉到種種模糊性和任意性：還有必要強調這些東西嗎？其實，這類偽托歷史的地圖冊，遠非描述歷史的主體性，實則表現了某種當代的世界主義視野，那是以約束認同的準全球性擴散為基礎的。無論“華人”碰巧落腳在何處——牙買加、匈牙利或南非，他們照舊是可計數的華人，如果他們碰巧也成了那些民族—國家的公民，也無傷大體。假如這樣一本書今天在某些社會集團里大受歡迎，是不會惹人驚詫的——那些集團的成員被找到“流放中的”他們自身這種念頭所吸引，認為自己有權歸屬于古老的、然而在這全球化時代又驚人地遍布世界的有界共同體。

這其中是否有哪一點表現了意味深遠的世界主義，在我看來甚為可疑，因為它實際上只是一種普查式的、認同至上的族群觀的延伸，缺乏任何普遍基礎。它跟那位爪哇小女孩的差別之大，無物可及。那個女孩想象自己是一個“新人”，不是某個爪哇流散族的一個成員，她像哈吉·米斯巴赫一樣，讓自己加入動蕩世界的無邊際的序列，成為其堅定的本地成員。

## 2 復制品、光暈和晚近的民族主義想象

“世上無形無相者，無物堪比紀念碑。”羅伯特·穆齊爾（Robert Musil）在《生前遺著》（Nachlass zu Lebzeiten）中寫道。

它們樹立起來，無疑是要給人看見——其實是要引人矚目。然而同時，它們也包蘊著某種東西，要驅開注意，讓目光瞬即滾落，仿佛一粒水珠從油布上滑落，不作片刻停留。你可以沿著同一條街道走上幾個月，熟識沿路的每一個地址、每一個櫥窗、每一位警察，你甚至不會錯過誰掉在人行道上的一枚硬幣；但是有一天你大吃一驚：你抬頭盯著一座建筑物底樓的漂亮女服務員，這時才驀然發現一塊絕不算小的金屬匾額，上面刻著永不磨滅的字跡，你看出那寫的是從一八××年到一八××年，不會被遺忘的某某人在此生活和創作。即便是對比真人還大的雕像，許多人都有相同的經驗……你從來不看它們，而它們打算象征誰，你也往往一無所知，大概你只知道它是男是女。

穆齊爾接著嘲諷地說：

要是我們拿紀念碑表達美意的話，勢必得出結論說，它們向我們提出了與我們本性相悖的要求，為了實現這些要求，需要做細致入微的準備工作……紀念碑真該加把勁了，就像現如今我們大家都不得不做的那樣……為什么我們銅鑄的主人公不至少玩點花樣，拿他的指頭敲打玻璃片呢？這在別處早就不新鮮了。大理石群雕的人物們，為什么就不轉一下身，像櫥窗里制作更精良的人物那樣子，或者起碼眨眨眼睛？我們應當求之于紀念碑的、使它們引人關注的最低限度的東西，想來是歷經考驗的可信標識語（logos），就像“歌德的《浮士德》無與倫比！”或“著名詩人某某的戲劇思想一文不值！”一類。真不幸，我們的雕刻家們不諳此道。看起來，他們沒有領會我們這個喧囂和運動的時代。[[72]](#_72_35)

這位“生前出遺著的”作家或許從一般意義上講是對的，但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他那會心的淡淡評論尤為適用于晚近官方民族主義紀念上的困難；到二十世紀后期，所有那些民族主義都與國家聯姻了。[[73]](#_73_35)本文通過反思紀念民族先人的某些公共紀念物截然有別的命運，力圖探求這些特定的民族難題的潛在性質，以及這類民族主義的想象力僵局（imaginative impasse）。文中的大多數材料涉及美國及其漸遭淡忘的前殖民地菲律賓，既因為后者的民族想象深刻地受到前者的左右，也因為后者提供了一個發人深省的例子，說明晚近官方民族主義是如何在政治上遭遇抵制的。歐洲，這個發明了官方民族主義的地方，必定四處露出它的面容。

華盛頓特區的林肯紀念堂揭幕于1922年，那時肯定已進入收音機、T型車和飛機的時代，但是劈木人［林肯的綽號——譯注］并沒有如穆齊爾嘲弄地建議的那樣，在他的基座上慢慢旋轉；他的眼睛不開合，他的腳趾不輕敲，在他身下，也沒有簡約的標識語，像“林肯，天下第一總統”之類，盛大地裝點出來。另一方面，主管這項工程的官員細致地記錄說，和劈木人塑像在一起的，還有：

125只麥芝達電燈，配備了X射線反光罩，已經安裝在頂層空間……此外，在12塊玻璃嵌板上方約20英寸處，裝上了24只大功率的泛光燈，每只有約30×47英寸那么大，掛在中央的紀念大廳的天花板上，用以抵消從門口透進來的日光投在雕像上的怪異陰影。[[74]](#_74_35)

而且，在雕像腦后的墻上，確實有一句標識語，寫道：“在這神殿里/猶如在人民心坎里/對亞伯拉罕·林肯/這位聯邦救星的回憶/永志不滅。”[[75]](#_75_35)

這里活動著晚近民族主義特具的某種東西。劈木人的塑像被安放在一座“神殿”內，那是建筑師亨利·培根（Henry Bacon）仿效著安全屬于異教的古希臘的宗教大廈建成的。里面，麥芝達公司被召來將怪異、冷淡的陽光拒之門外，由此巧妙布置成對中世紀教堂明暗交替的內景的仿真效果。（如果人們把歷史設想為一場接力賽跑，這可能就是民族從宗教精疲力竭的手中奪過接力棒的時刻。）

標識語是以一種類似的邏輯在運作。我們首先再度得到保證，我們走進的這幢建筑是一座神殿，而且是“真實的”一座；這一點我們從它的立面去看可能猜想不到，從風格上說，它的立面跟許多銀行、大學生聯誼會會堂、保險公司和法院大同小異。另外，這座神殿是“祀奉之所”（enshrinement sites）序列的組成部分，“人民之心”也歸向這種場所；或者，也許“人民之心”實際上不過是一系列的神殿。所祀奉的不是林肯本人獨一無二的骨骸（仿佛他是一個近代圣徒），而是某種可以幽靈般地、無限期地復制的東西：他的“記憶”。這種祀奉還是“永遠的”——顯然是與“人民”、這個民族同始終的“永遠”，可不是要指向最后審判日。

無疑就是上面勾勒的精妙舞臺技術，創造出——特別是在黃昏以后——某種聲光表演（son et lumière）的在場，然而假如這尊塑像搬到赫斯特古堡（Hearst Castle）而神殿搬到達特默思學院里，這種效果會頓時無影無蹤。與此同時，林肯紀念堂與穆齊爾調侃的紀念碑共有著某些有趣的東西：永遠存在的從注意力中消失的可能性。人們可以從它無力給人指令上來理解這一點。下跪？脫鞋？繞著它逆時針地轉七次？吟唱？祈禱？乞求保佑？鞠躬？問計？獻上點東西？注目二十分鐘？似乎沒有哪一種特別有道理。[[76]](#_76_35)因為差不多人人都懂得，這尊塑像及其環境是復制品，而且是獨特的復制品，因為它沒有原型。[[77]](#_77_35)（或許這就是為什么有許多人，他們愿意肅然起敬，卻斷定該做的事情是拍照，單獨拍林肯，或者他們本人、家庭、朋友、情侶與林肯合影——在紀念堂管理當局容許他們這么做的無論幾個鐘點里。）

然而與此同時，林肯紀念堂的復制品立即與附近的杰斐遜的復制品聯系起來了。就在這一點上，我們開始意識到晚近官方民族主義的人物塑像的獨一特性，那就是這些塑像本身不是獨一的。人們一注意到馬志尼，就會被馬基雅維利、加富爾、但丁和鄧南遮爭來搶去，他們作為民族英雄可以毫不猶豫地相互替代，因為這個序列本身要求他們這樣。的確，雕像的漠然的可替代性，人們在拉什莫爾山上一覽無余。這表明英雄的民族紀念像沒有光暈，像人們在《宮娥圖》（在不管怎樣的照明下，哪怕是怪異的[[78]](#_78_35)）、哭墻或吳哥窟的本原性中感受到的那種光暈。在它們面前，人們不以為奇地發現自己被禁止拍照，而且這一禁令還讓人心悅誠服：一當它超出他們鏡頭之所及，他們就知道自己面對的是神圣之物。這一刻，他們不復是旅游人，而成了朝圣者。另一方面，民族英雄紀念像光暈無存這一事實，也意味著它們能夠輕而易舉地通過不同媒介流通——郵票、T恤衫、明信片、墻紙、海報、錄像帶、餐具墊等，沒有誰會覺得瀆神。最典型的大概要數美國錢幣。事情并非這么簡簡單單：五張華盛頓的復制品可以給你換一支上好雪茄，五張安德魯·杰克遜的復制品則可以讓你在普通旅館住一宿。其實遞降的聲望級序——華盛頓、林肯、杰斐遜、杰克遜，與遞降的購買力級序剛好相反（所以華盛頓值杰克遜的二十分之一，林肯值杰斐遜的一半），但是對此誰都滿不在乎，甚或念不及此。

如果我們考慮到，當光暈在復制品序列之內出乎意料地使人感知到它的在場時又是怎樣，就可以更清晰地理解這一狀況。1896年12月30日，偉大的小說家、詩人和道德家何塞·黎剎，在馬尼拉鬧市區被西班牙人統率的、本地人組成的行刑隊公開處決。他犧牲的第一個周年紀念日上，阿奎那多的革命政府發布公告，敦促愛國者們以他們認為適當的無論什么方式紀念他的殉難。當革命尚在征程中的時候，首個“黎剎紀念像”建造起來了。但它不是黎剎的一尊雕像，而是染上了共濟會色彩的一個抽象之物，只有他的兩部振奮人心的小說的題目刻在上面——好像在說：讀之！后當為汝國之自由而戰！

在革命的菲律賓共和國被美帝國主義鎮壓之后不久，種種塑像驟然在這塊領土那些平服的廣場上增衍開來，此前它們被嚴格局限于教堂的內部和立面。它們幾乎全是由當地種植園主（hacendados）或其他顯達立起來的，基座上鐫刻著他們的名字，而且很大比例的塑像是黎剎的復制品。由是啟動了黎剎的序列化，不單是靠他本身的機械復制，還靠他與別的立了塑像的已故英雄并排出現。在美國人發起對“菲律賓人”的普查計數后，他很快就開始被受過英語教育的新式精英稱為“第一個菲律賓人”。最后，在據說是他被行刑的地方，殖民當局允準豎立一座黎剎紀念碑，頂上是這位殉道者的一尊塑像；這里結果成了如今設計精巧的倫禮沓公園（Luneta Park）的中心點。1946年，美國準許菲律賓第二次獨立，自那以來，每當這位殉道者忌日的破曉時分，內閣就會群集在紀念碑下，舉行一個簡短、正式的儀式，這已成慣例；同時馬尼拉港的軍艦奇特地——考慮到這種場合——多次鳴炮致敬。幾個月后，在紀念第二個菲律賓人、革命家博尼法西奧的馬尼拉紀念碑前，將會發生非常相似的事情，只是規模稍遜。哎呀，博尼法西奧可是遵阿奎那多之命被處死的。到目前為止，一切都很典型。

但是如果誰在倫禮沓一直等到上午晚些時候，他將看到大隊大隊的朝圣者，從四面八方涌來，許多人穿著白色衣裳，或者是1896年革命最早的那種旗幟的顏色。他們清楚知道該干什么：依照各自的禮儀，他們吟頌，他們歌唱，他們禱告，他們跪拜，他們閉目靜思，他們列隊前進，他們手挽手，他們哭泣，他們祈福。人們不嚴謹地稱他們是“黎剎教徒”（Rizalistas），意思是說，他們有些人相信黎剎是再次被釘上十字架的基督，或者是菲律賓的基督，而倫禮沓因之成為各各他；另一些人相信他從未死去，而是在某個神山頂上，靜待他重返此地救贖他受苦受難的人民的那一時刻；[[79]](#_79_35)甚至還有些人相信，利用某些秘術，他的法力無邊的神靈是可以接近的，尤其是在某些神圣場所和時間——這包括倫禮沓紀念碑和國家所稱的黎剎節，還有別的時地。換言之，他仍然活在這里。這樣的人信賴的是靈媒，而非傳播媒介。政府故意對這些朝圣者不理不睬，[[80]](#_80_33)不僅是因為它并不賞識這第一個菲律賓人可能重返人間進行審判的觀念，而主要是因為它自身的禮儀有賴于黎剎的可替代性。但是在朝圣者們自己看來，黎剎是唯一者——不可代替，不可交易，不可序列化——而他迷人的光暈恰是從他《宮娥圖》般的獨一性中冉冉升起。

如果我們現在從民族先賢的復制品轉向安葬他們各自遺骸的官定場址，就不難發現劈木人和黎剎不同命運之間的相似之處。

美國似乎開了國家公墓的先河——但是我們不應驚訝，它是在獨立戰爭之后近一個世紀才這么做的。葛底斯堡戰斗結束之初，國會投票決定，撥款為新近的陣亡者——聯邦的戰士，南部邦聯的戰士，沒人認識的戰士，就在這塊戰場上修建一處特別墓地。每個死亡的選民或未來選民的遺體，都被授予屬于它自己的單獨的墳墓和墓碑。[[81]](#_81_33)但是葛底斯堡還有一種草就、試驗的性質，美國內戰的其他大血戰，沒有哪一場的死者被厚待以這種政治禮遇。眾所周知，是在一戰期間及戰后初期，這種原型方才進入——這么說吧——全面生產。正如人們可能料到的，最成功的生產商是那個最老牌的工業資本主義國家，那個大不列顛，它還（但只是勉強地）合并著愛爾蘭。

如托馬斯·拉克（Thomas Laqueur）精彩描述的那樣，1915年3月，詩人魯珀特·布魯克（Rupert Brooke）在斯基羅斯島（Skyros）戰死前夕，為了安葬當時和將來的陣亡者，一個官方的“墓地登記委員會”設立起來，緊接著又就開建在法英國人的永久公墓一事同巴黎展開談判。[[82]](#_82_33)到1916年3月，“一些［200個］海外戰場”的“角落”被倫敦選定，并計劃根據未來戰事的范圍，新增300—3,000個公墓。由此開啟了一個進程，它直到1938年才結束，那時節，1,850個這樣的墳場業已成形，大多數位于法國和比利時。從葛底斯堡那里，英國政府吸納了這個觀念：死者應當有其個人的、標記分明的墳墓，但是要盡可能整齊地歸并在他們戰死的疆場周圍。到1930年，大約557,520名大英帝國戰士——其中五分之四來自聯合王國——被認出來，葬在各自的標上名字的墳墓里。還有180,861具身份不明的遺體，也被埋進各自的墓穴里。對于清點出來的那些尸首滅失，或炸成碎片，或碾進泥沼的336,912人，所能做的就是，盡量靠近他們最后被記得還活著的地方，在那里立下石柱，鐫刻上他們的名字。總計超過了一百萬。

真正的英國創新在于保持這些公墓的運轉。如何做到這一點是特有啟發性的。關鍵步驟是民族—國家化（nationalization）——在該詞的任何意義上。首先，國家壟斷控制了一切尸身、一切紀念碑和一切公墓。陣亡者家屬被法律禁止將他們親人的遺體渡過英倫海峽運回家鄉。換句話說——這話大概會使布魯克驚呆的：是英國政府確保了如此眾多的海外戰場的角落“永遠屬于英國”。其次，英國政府盡其所能地要使得死者是民族的并一直如此（興許是遵循薩克森—科堡—哥達王室的喬治［又稱喬治五世］的精神吧，他在1917年7月17日發布皇室詔告，宣稱他，以及他的祖母維多利亞的其他所有男性后裔——如果他們是大英臣民的話，將采用“溫莎”［Windsor］這個民族姓氏）。達到這個目標的最重要手段是，常常要頂住國內的強烈反對，執意認為那些墳墓及其標志應該盡量整齊劃一，它們應該在管理嚴密的空間格網里規劃好。這里沒有什么東西可以明顯區分開中產階級與工人，軍官與軍士和列兵，英格蘭人與蘇格蘭人、威爾士人和愛爾蘭人。家屬獲準提交不多于66個字符的不管哪種銘文，那還得經受墓地委員會的審批，[[83]](#_83_33)還要按字母收費。這樣，即便近距離看去，也沒有哪座墓碑會鶴立雞群。參觀者可能得到這樣的印象：在每個巨大的公墓里，死者們——這么說吧——在一動不動地立正，縱然是橫臥著的。她也會被激發著開始計算那些可替代的象征性的整數，這種整數再常見不過地被加之于四分五裂的戰士的殘骸上，向我們表明，軀體計數對晚近的官方民族主義多么重要，而不僅是對人口普查或在選舉日才關系重大。

巴黎和華盛頓大不如倫敦那么成功，明白何以至此很有意義。在法國，政府沒有英倫海峽幫它堅持壟斷權主張。“親屬們”很快開始爭奪尸體，這隨著時間推移而愈演愈烈。強勢的天主教會直陳它厭惡公墓，因為它們如此顯眼地同傳統的宗教禮拜地點分隔開來，看似受到第三共和國反教權主義的瘴氣的污染。不以信仰來區別死者證明是辦不到的——基督教徒（無論新教徒還是天主教徒）的十字架，猶太人的六芒星形，穆斯林（他們有許多人來自早已變成宗主國法國的組成部分的那個阿爾及利亞）的清真寺一般的圓頂。就美國而言，它是個歷史上較弱的聯邦制國家，懸在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上保持平衡，無緣效仿白廳官方民族主義的民族—國家化。盡管一些有權勢的政客做出了不懈努力，要讓美國陣亡者留在法國、比利時和英國國土上的“美國”公墓里，在那里他們可以代表新近的、也許還有將來的美國在歐軍事榮耀；但是沒有得到什么系統的結果。[[84]](#_84_33)僅僅30%的陣亡者未能通過橫渡大西洋的長途旅行回到故鄉，其余70%的死者，正是他們的親屬而非國家決定了他們是私下安葬，還是葬于國家或民族的公墓里。無疑地，這一反利維坦的民主主義勝利的緣由之一是，共和國最近的戰事都發生在古巴和菲律賓，這些蠻夷之地，美國人不能設想竟愿埋骨其間。一種傳統已當其位，它后來將保證死于韓戰和越戰的許許多多美國人，不遠萬里尸骨還鄉。更奇特的是，沒過多久國會感到，對想去祭奠埋在歐洲的兒子的那些母親們（不是妻子們），不能不資助往返船票和其他開銷。不過有一種典型的美國式差別。白人母親們乘坐豪華的遠洋客輪的特別二等艙，住在高檔賓館里；黑人母親們對商用輪船就只能知足，寄宿在絕成不了五星的住房里。

如果民族戰死者的無名眾生的紀念命運就是如此這般，那么官方民族主義怎樣設法對待垂范天下的名人呢（他們大多死在自家床上）？法國展現了一個饒富意味的例子。

1764年，遵照路易十五的旨意，建筑師蘇弗洛（Soufflot）開始建造一座教堂，它要供奉巴黎的主保圣人圣熱娜薇耶芙（Sainte Geneviève），卻是按照從倫敦圣保羅大教堂學來的一種“古典”風格設計的。也許就是這種風格，確保了大革命期間它被賦予新命，成為改葬伏爾泰、盧梭這類民族圣賢的先賢祠。[[85]](#_85_33)所有權從王朝到民族國家的易手，透露在添加到它立面上的這句響亮廣告語中：Aux Grands Hommes la Patrie Reconnaissante（偉人們，祖國感謝你們）。1828—1830年間，它短暫地恢復了宗教地位，后來在1851—1870年間，在拿破侖那欺世盜名的侄孫（great-nephew，原文如此，應為侄子。——譯注）統治下，又再度如此。直到1880年代，“祖國的感謝”才贏得了對圣熱娜薇耶芙的穩固的法律勝利。但是光暈始終躲著先賢祠，即便它是一個吸引游人的經久不衰的名勝。如果有誰想知道為什么，部分解釋應當出自對它與拉什莫爾山國家公園相似點的思考，以及對“偉人們”這種民族序列的可替代性邏輯的思考。無論是華盛頓、杰斐遜、西奧多·羅斯福，還是林肯，都沒有葬在拉什莫爾山，但是就算他們全葬在那里，也不會有什么兩樣。游人們站在緊鄰一個巨型停車場邊沿的圍欄旁，仰視著“我們最偉大總統”的那些塑像（它們的身量是由彼此的存在予以保證的），然后就驅車各奔東西了。先賢祠亦然：游客們往前走之前，先看到了“偉大法國人”的一個個大名，那是一個約束序列，其中伏爾泰和盧梭可以相互代替。[[86]](#_86_33)這些軀體真的在那里，是官方民族主義的囚徒，但在這樣一個圣地里，這一點無足輕重，因為參觀的眼睛哪里都看，就是不看地面。

正如通常的情形那樣，“不成功的”陵墓尤能揭示它們競爭對手的成功背后的機制。早在1910年代，在諾特（Norte），即一位美國城市設計師所規劃的嶄新市立公墓里，一座小型的先賢祠建立起來，用于安葬菲律賓的民族英雄，事實上在美國統治時期，有相當數量的官方認可的這類英雄的遺骸歸存此地。今天，菲律賓幾乎沒有什么人還知道這個荒廢失修的先賢祠的存在。從外面看來，它尚可辨認出本來模樣，但里邊已經成了管理員及其家庭的公寓，沿墻的壁龕如今主要擺滿了玩具、盒式錄像帶、罐裝商品和廚房用具。發生的事情就是，菲律賓的伏爾泰和盧梭們設法逃離了，鼓動起忠心耿耿的、通常是家族的遺體爭奪者來把他們轉移到家鄉的神殿里去，在那里他們可能受到祖先崇拜精神指引下的照顧，而且，從官方—民族的視野消失之后，興許獲得了獨一之物的神奇光暈。與此同時，諾特公墓過著它自身的輝煌壯麗的生活，每年在萬圣節前夜臻于頂點，那時候，成千上萬的家庭源源而來，各自奔向自家的墳墓，同魂兮歸來的死者共度佳節：放風箏，玩牌或打麻將，抽煙或吸大麻，喝酒，祈禱，賭錢，準備祭品，掌摑孩子等。

這里有某種令人興奮的東西，人們在民族慶典上很少看得到，或許是由于這種儀式的結構不是序列性的，而完全是蜂窩狀的。每個家庭可能或多或少都在做著同樣的事情，但是每家的祖父母（abuelos）絕對是無可替代的，也引不起別人的興趣。菲律賓大多數總統安息于此，在沿著公墓主林蔭道的壯觀陵寢里，但是沒人注意到他們，哪怕是以拉什莫爾山的那種態度；只有他們各自的子孫來祀奉他們。

在復制品—雕像與死者之間的某個地方，是官方民族主義的那兩個奇異作品：倫敦的無名烈士墓和一戰死難者紀念碑。但是正如下文將明了起來的，它們最初的巨大成功充滿了矛盾性，而且依賴于某種獨一性的光暈，由于它們創建者的隱含計劃，那種光暈注定是要退去的。

英國政府似乎在一戰結束后的早期開創了這些紀念物，它自始即深憂這樣的可能性：假如這位無名烈士的身份得以追查出來的話，他可能逃逸或遺體被奪走——在諾特的意義上。譬如，寇松（Curzon）熱烈地堅持，無名烈士應當“依舊無名”。[[87]](#_87_32)因之，尋找合適的遺骸就被限制在大戰最初幾個月戰死的那些人，他們最大限度地腐爛了，可能是七分如塵，三分像人。軍方官員篩選出這樣四具遺骸，再從中抽簽選出一具，成為這條全面禁令的唯一例外：喬治五世國王陛下的死亡臣民不得返鄉。實際上，由一艘英國海軍驅逐艦橫渡英吉利海峽運送的，是十六只桶，里面裝了五十袋法國泥土。不過西敏寺大教堂的葬禮激起了驚人的情感噴發。在1920年11月11日以后的日子里，超過125萬人排著隊緩緩經過開放的墓穴。同一天，由君王揭幕的一戰死難者紀念碑產生了相似效果。數千悼念者在它周圍擺放花圈。

至于統治階級對這些事件的看法，我們最好求助于倫敦的《泰晤士報》，它評論說：

此前從來不曾有過這樣一份公告，一吐為快的公告，說我們全是平等的，全是一個軀體或不如說一個靈魂的一部分……我們所有人都是一支管弦樂隊的成員……在那肅靜的儀式上，有一種忘我，一種預言應當實現的渴望……即我們可以，真的，全都成為一個政治軀體和一個不朽靈魂的組成部分。[[88]](#_88_34)

透露內情的短語“一吐為快”，夾在“一份公告”和“我們全是平等的”中間，向我們表明那是虛偽的官方民族主義的叫賣。但是有意思的問題是，為什么這些新奇的儀式那時候對尋常百姓實際上“起作用”？較好的解釋或許出在兩個不同層面上。其一當然是國家對陣亡者的民族—國家化，以及他們被強使隔離在大不列顛境外，所產生的意外后果。數百萬的喪親者，無一獲許以諾特的蜂窩方式埋葬他們的亡人。用互補的方式，一戰死難者紀念碑的空洞性與無名烈士墓獨有的豐富性，使得其間可能插入私人記憶和悲傷。緩緩移動的瞻仰隊列的好處在于，每個吊唁者都有暫時的機會插入那種意念，還意識到她前后的人都在插入他們自己的東西，對此她當然不能與聞。這是萬圣節前夕嗎？另一種回答不過就是儀式本身的新奇性。人們在參加時，并未想到這些儀式將要年復一年無限期地重復，而且要在許許多多不同地方重復——換言之，那些儀式仍在序列的控制力與無本原的復制品的邏輯之外。它們在1920年那時還有獨一性的光暈。[[89]](#_89_33)但是這樣的成功，處在晚近官方民族主義和私人悲情的臨時接合點上，它始終是在一個定時器上跑步。序列化和復制的邏輯很快加入了游戲。阿林頓如今有了四座美國無名烈士墓，分別為一戰、二戰、韓戰、越戰而立，也有南部邦聯無名烈士墓。陣亡將士紀念日在星期五和星期一之間搖擺不定，為的是確保——在無盡的一系列日歷年（calendar year）中——一個悠閑自在的季春假日。

現在，當真正的死者同時被遺忘、復制、隔絕、序列化和無名化的時刻，我們回到了這個矛盾的問題，即我們只能稱之為無本原性（originlessness）的本原問題。在《想象的共同體》的最后一章，我示意說，十八世紀晚期的種種斷裂——它們本身是長期社會轉型的變向時機——突如其來地產生一種新意識。這一意識根植于同質的、空洞的時間中，造成健忘癥和疏離感，那與青春期帶來的對童年的忘卻如出一轍。一個深淵展現出來，它要求（也助成了）米什萊（Jules Michelet）發出亙古未有的宣稱，說他是為一代又一代死去的“法國”男女立言，而那些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法國人。恰在這個關鍵時刻，民族的敘事，連同其古怪的反系譜的目的論，都出現了，它們“順著時間上溯……［直奔］考古學燈籠搖曳不定的微光照到的隨便什么地方”。[[90]](#_90_33)

米什萊在要“拯救”無言死者的激情四溢、為天下先的個人聲稱中，尚且沒有真正意識到他本人就是一時的創始者（Originator）。可是一旦他存在于斯，供所有人閱讀，一個誰都可以剽竊的模型于是就位了。滑稽的是，沒有什么人、什么機構比這樣一些人更好地處在從事這類剽竊的位置上：貴族階層、后殖民精英，諸如此類人，他們希望借過去傳下來的世系而主張自己的合法性。那些迫使英王約翰簽署了拉丁文《大憲章》的人，據稱是講諾曼法語的大封建領主的后裔們，憑借米什萊的反向目的論，就這樣成了英國民族主義旗幟的名正言順的旗手。

## 3 遠距民族主義

在1860年代寫的一篇名文里，德高望重的自由主義天主教徒，祖籍那不勒斯的英國人，政治家—歷史學家阿克頓勛爵，有先見之明地警告說，三種強大的顛覆性思想正威脅著“現存文明”。這三大思想一是平等主義，矛頭直指貴族政治原則；二是共產主義（他想到的是巴貝夫，不是馬克思），矛頭指向財產原則；三是民族主義，或民族精神（nationality），矛頭所向是合法性（legitimacy）原則。就第三種思想，他寫道，它“問世最晚，當世最富吸引力，得勢的前程最遠大”。[[91]](#_91_33)如果看看我們四周的世界，130年后的世界，好像阿克頓說得對極了。貴族政治已經被當成一種危險的政治思想摒棄，而成人選舉權在幾乎一切地方都已是既存事實，或者是一種勢在必至、指日可待的前景。[[92]](#_92_33)形形色色的共產主義似乎已經退潮。但是合法性也幾乎處處被推翻，以至于當前聯合國的成員國數量四倍于它七十年前的前身國聯。幾百年間建起來的多語種大帝國，一個接一個地解體了——那廣袤的區域一度受治于倫敦、伊斯坦布爾、莫斯科、馬德里、里斯本、海牙、維也納、巴黎，甚至亞的斯亞貝巴。只有天朝帝國的殘軀猶在。

然而就在這一轟然的解體過程——也是解放過程——的同時，世界已然更形密切地整合到單一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去了，在我們時代的這個經濟里，按下一個計算機鍵，數十億的美金幾乎瞬間就能傳送到全球各地。如何理解一體化和解體這個乖謬的雙重運動呢？這些力量是相互矛盾的呢，抑或不過是單一歷史進程的對立面相？再有，資本主義正在制造新型的民族主義嗎，在其永恒的躁動不寧中？

探索這些問題的一個不錯的起點，是阿克頓論文的另兩段文字。第一段其實是從十七世紀偉大的教士演說家波舒哀（Jacques Bénigne Bossuet）的布道文章中摘錄的，我們的這位歷史學家贊許地提起它：

Ainsi la société humaine demande qu'on aime la terre où l'on habite ensemble; on la regarde comme une mère et une nourrice commune ... Les hommes en effet se sentent liés par quelque chose de fort, lorsqu'ils songent, que la même terre qui les a portés et nourris étant vivants, les recevra dans son sein quand ils seront morts.

［因此，人類社會要求我們熱愛我們共居的大地；視大地如母，如共同的哺育者……人人都想到，同一片土地承載了人，滋養了生物，待到它們消亡時將其接納入懷，于是，他們事實上都感到因某種強有力的東西而結合在一起。——譯注］

第二段是阿克頓本人的警句：“流放是民族主義的溫床。”[[93]](#_93_33)

阿克頓在試圖比較兩類政治忠誠，一種與合法性協調無間，另一種則與之格格不入。因為波舒哀沒有提到法國（撇開那法語），相反提到了一種普遍的社會狀態，在那種狀態下，人類感覺自己被生養他們的故土牢牢系在一塊，還將在她的懷里——他們這樣夢想——壽終正寢。對波舒哀來說，人們向往著就在他們出生和長大的地方終老，似乎再正常不過了。包含在由出生和死亡這兩個非自愿的、宿命性時刻所劃定的界線之內的這種靜態，與封建社會的社會公理同聲相應：即該社會被建成一種神定的、不可更易的等級制度。這同對本地土壤的深深依戀相結合，使得數以百計的這種共同體有可能平靜莊嚴地聚合成有合法性的龐大松垮的統治區（imperia），而且如有必要，它們可能通過王室聯姻、外交和戰爭，拆分到其他統治區去。[[94]](#_94_33)波舒哀的注意中心因此是在Heimat（德語，故鄉），或者也許更恰當地說是patria（西班牙語，家鄉），這個絕妙的伊比利亞語詞能夠從“父母之村”，經由“父母之鄉”和“父母之郡”，逐漸延伸到“父母之邦”（home-country）。

與之相對，阿克頓相信，“民族主義”源自流放，此時人們不再能夠輕松地夢想回到曾經生養他們的滋潤的懷抱。極有可能的是，這位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心里主要想到了他那個時代的偉大的民族主義領袖——馬志尼，加里波第，科蘇特，等等，他們很多人由于顯而易見的政治原因，長期生活在自己的故鄉以外，有時就客死他鄉。但是阿克頓所謂的流放的確老早就已開始。波舒哀已經是一個落后時代的人了，因為他出生于1627年，那是在清教徒的“先輩朝圣者”（Pilgrim Fathers）移民團在普利茅斯礁石登陸之后七年，在天主教的科爾特斯（Hernan Cortés）猛攻蒙提祖瑪的著名首都之后一個多世紀。自十六世紀晚期以降，數百萬的起碼名義上自由的歐洲人，數百萬的受奴役更甚的非洲人，可以謂之踏上了橫跨大西洋的“流放之旅”。這些遷移規模之大、路途之遠，都是史無前例的，使得里斯本、馬德里和倫敦必須發明古怪的新詞crioulo，criollo和“the colonial”，指代一種新型的流落異域的人和文化。對這種漸次浮現的流離意識，瑪麗·羅蘭森（Mary Rowlandson）的純樸回憶提供了一幅最為鮮明的圖畫。她是一位年方十九、剛剛出閣的馬薩諸塞女子，在1675年2月被一伙當地的阿耳岡昆部族（Algonquin）和納拉干西特部族（Narragansett）的斗士短時間劫持。她可憐巴巴地寫道：

我看見一個地方，那里有一群英國人的牲口，這讓我感到一絲安慰，雖然幫不了什么忙。不久我們來到一條英國人的小徑，我真喜歡它，我想我本來可以索性躺下去死掉。那天，正午剛過，我們到了Squaukheag，印第安人迅速分散到英國人荒廢的幾塊田地里。[[95]](#_95_32)

從她的用語中，我們觀察到奇特的、全然是克里奧耳語的自相矛盾傾向。一方面，她覺得不必向她的讀者解釋Squaukheag位于何處，更不消說如何念這個醒目地不屬歐洲的地名了。她的熟知并不出人意表，Squaukheag可以說就是順著這條路走去的那個地方，畢竟她在這個同樣不屬歐洲的馬薩諸塞出生并度過了整個青少年時代。另一方面，她看見了面前的“英國人的牲口”，一條“英國人的小徑”，和“英國人荒廢的幾塊田地”，雖然她從來不曾處在距英格蘭三千英里范圍之內。這些可不是從科茨沃爾德丘陵地帶（Cotswolds）或唐斯的有草丘陵地（the Downs）——可以說真實地點——拖曳過來的東西，而是一種想象行為，對十七世紀格洛斯特郡或薩里郡的一位年輕牧師之妻來說，這樣的想象決不會發生。它們之所以某種程度上準備好了成為“英國人的”，恰恰因為它們是在馬薩諸塞，不是在英格蘭，因為在瑪麗看來它們蘊藏著她的“英國”人民農業勞作的蹤跡。但是我們也可猜測，直到她被綁架的那一刻為止，她是就事論事地把牲口看成牲口，田地看成田地的。后來她落入阿耳岡昆人和納拉干西特人手里，被拽出了日常生活，就在她土生土長的馬薩諸塞的正中央，她發現自己處于可怕的流放之中：當此之際，她的“民族化”時機到來了。她沿著一條小徑掙扎著，就在她確信自己不可以躺倒死掉的節骨眼上，那條小徑變成英國人的了。當她最終被贖救出來，回到她出生的共同體中時，她的“民族主義的”震顫不見了。因為她已經設法差不多回歸故里了。然而這個故里是蘭開斯特，還不是美洲。[[96]](#_96_32)這里的悖論在于，我們今天能夠不費神地把瑪麗·羅蘭森理解為美洲人，正是由于她在囚禁中看到了面前的英國人的田地。

瑪麗·羅蘭森的故事在馬薩諸塞初版，一年之內，在大西洋對岸也出版了，而且證明很受歡迎，整個十八世紀累計出了三十版。[[97]](#_97_32)在新近聯合起來的王國里（瑪麗被擄是在蘇格蘭被擄之前二十年），飛快增長的閱讀大眾漸漸知曉了不合常軌、用英文寫作的女人們，她們從不曾涉足英國，卻可能被“野蠻人”拖過英國人的田地。她們是什么人？真是英國人嗎？非英國的英國婦女——“殖民地居民”（colonial）的照相底片開始顯現。

由于在英國人到北美建立殖民地之前一個世紀，西班牙人已下手在加勒比海和南美從事征服活動，所以非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很早就開始隱然聳現。早在1612年，馬德里人、多明我會神學家胡安·德拉·普恩特（Juan de la Puente）就寫道：“美洲的天空誘發出易變、淫靡和謊言：這些是印第安人典型的惡習，而那里的星座使它們成了生于斯長于斯的西班牙人的特征。”[98]此時克里奧耳人正從形象上創造出來，稍后將在文化和政治上變為現實。[[99]](#_99_32)我們在這里可以看到“土著”（the“native”）真正的歷史起源，尤其是如果我們回想起對德拉·普恩特長達一個世紀的怒斥的話——這種怒斥因橫跨大西洋雙向流動的印刷品的輕嘶而變得可能。“土著”這個人物形象有時藏在其他名目下，完好地挺到我們這個時代，歐洲如是，別的任何地方也相差無幾。

因為土著就像“殖民地居民”和“克里奧耳人”一樣，是一張黑白底片（white-on-black negative）。土著的土著特性始終是無所系泊的，它的現實意義是混合的、逆喻的（oxymoronic）。它的出現，是在摩爾人、異教徒、回教徒、野蠻人、印度教徒之類變成廢詞的時候，也就是說，不僅僅是在臨近真正的印刷品會戰之秋，有相當數量的越南人讀法語、寫法語，或許還說法語的時候，而且是在捷克人對德語、猶太人對匈牙利語都同樣如此的時候。民族主義的純正（由此還有清洗）恰是從這種混雜中開始浮現出來。

是什么讓所有這些發動機開動起來的？略有不同地說，是什么使瑪麗·羅蘭森（以及不久之后的倫敦）的不穩定的英國屬性成為可能？簡單的回答是資本主義，仰仗它的機構，自十六世紀中葉以來，數百萬自由的、契約約束的和受奴役的身體能夠穿越幾千英里海域進行運輸。但是這一運輸的物質實體——輪船、火器和航海裝備——是由墨卡托地圖與積累起來的巨量知識所指導的，前者受數學的啟迪，后者在印刷物中存儲和傳播。也正是憑借往返越洋的印刷物，這種不穩定的、想象的、帶著英國屬性和西班牙屬性的世界才創造出來。

遠距離運輸與印刷資本主義通訊系統的重要關聯，為十八世紀末葉第一次民族主義運動的繁榮準備好了基石。引人注目的是，這種繁榮首先在北美，然后往南在天主教的、伊比利亞的殖民地發生，那里的經濟全是前工業的。十八世紀下半葉，北美殖民地比宗主國有更多的印刷機，這一事實最好不過地預示了那個繁榮過程。所以情況就是，到1765年，用沃納的話說：“印刷品漸漸被看成是政治生活不可或缺之物，對亞當斯這些人來說似乎是世界解放的首要原動力。使印刷業的這次轉型尤其異乎尋常的地方在于，它不像十九世紀的出版物爆炸，實際上不涉及該行業的任何技術改進。”[[100]](#_100_32)

同時，在大西洋彼岸，隨后在全世界，新興的工業資本主義正開始創造更加地方性的流放形式。在本杰明·迪斯雷利1847年的怪異小說《坦克雷德，或新十字軍》里，他評論說“倫敦是現代的巴比倫”。[[101]](#_101_32)在這個逆喻里，一種囚禁敘事的回聲同奢靡和墮落的箴言式比喻的回聲一樣響亮。這是從迪斯雷利早兩年發表的小說《西比爾》的有名副題“兩個民族”中合乎邏輯地生發出來的。正在深化的工業資本主義那時已經在領土狹小（假如不算愛爾蘭的話，小于賓夕法尼亞與紐約之和）的單一國家中造出了“兩個民族”，不過它們決不對應于任何公認的族群或宗教共同體。當恩格斯1842年抵達曼徹斯特開始研究工人階級狀況的時候，喬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已經捷足先登。這個世界紡織之都有了一個火車站。火車頭啟動了它的世界性、歷史性的使命：將成千上萬的鄉村村民運到城市貧民窟。這個使命的劃時代意義，比之先前三個世紀跨大西洋的航船，也不遑多讓。[[102]](#_102_32)只有少數人將會返回家鄉，在村子的無知先人們安息的那些逼仄墓穴里盡其陽壽。蓋爾納精彩地描述了這種新穎的工業生活經驗如何劇烈地改變了這些人的生活，這種改變又如何使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愿意接納民族主義，但是他的描述應當以流放的符號來讀解。在英格蘭，看到“英國人的田地”正開始變得可能——從鐵路車廂望出去。與此同時，另一種流放正因工業資本主義為歐洲諸國生產的財富而露頭。因為這種財富促成了一種集中化、標準化、層級陡峻的公共教育體系的蔓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提醒我們說，就在《坦克雷德》出版之際，1848年動亂的前夕，全歐只有48000名左右的大學生，這個數字實際上低于俄亥俄州立大學當前的入學人數。[[103]](#_103_32)但在該世紀的下半葉，教育部如蘑菇般四處涌現——瑞典在1852年，英國在1870年，法國在1882年，孩子們開始被迫移居學校。[[104]](#_104_32)

1960年代中期，年邁的菲律賓人佩德羅·加羅薩（Pedro Calosa）接受采訪，被要求對比兩個時代的狀況——當前的時代，與他領導的反抗美國殖民主義的1931年起義那個時代，這時候他帶著懷舊的滿足感評論道：1931年那時“尚無青少年（teenagers）一說”。[[105]](#_105_32) 因為人的這個新類型——兒童與作為勞動力的成人之間的游蕩者——當時方始形成，是拜帝國主義者的大眾教育新機器所賜。但是泛而言之，青少年是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國家將其標準化的國語強加其上的所在。不管這種國語是該國國民普遍懂得的語言的一種社會尊崇的方言（如英國國王的英語），還是從多種地方語中確定下來的一種地方語（如奧匈帝國的德語），結果往往是地方語（vernacular）和方言（dialect）的社會和政治等級的重新分層與合理化；由于新教育日益同就業前景和社會流動機會掛鉤，情況就更其如此。難怪人們變得越發自我意識到他們的語言實踐及其后果。司空見慣的結果是一種流放。標準化的國語越是不再僅僅是行政官員們的內部語言，而成為一個宣傳性國家的官定語言，就越有可能在舊歐洲出現像克里奧耳人或土著民的角色：不是真正德國人的德國人，不十分像意大利人的意大利人，不說西班牙語的西班牙人。如同在美洲一樣，一種不穩定的否定性出現了。因此，到1919年改變了歐洲版圖的民族主義運動往往是由通雙語的年輕人領導的，1919年之后亞洲和非洲也沿襲了這個模式：沒什么比這更不讓人驚訝的了。一個男孩，跟母親學會了捷克語，從學校學會了德語，他怎么能夠拋卻在他講德語的同學身上未曾留下絲毫污染痕跡的一種捷克語？他怎么能不透過他的德語的倒轉的望遠鏡看去，認為他的捷克語仿佛處在流放中？

從目前勾勒的視角看，有人可能傾向于認為，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以及它們的可變終點，即如愿以償地成為民族—國家，是擺脫流放的回家之舉，是混居問題的解決之道，是為了在政治斗爭的暗室里從底片上沖洗出來的正片。捷克人終將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生并最后埋骨于斯，波蘭人則在他們的波蘭生生死死。文化生活和政治忠誠將徹底地、穩定地不妨說是按照波舒哀的方式校正一致。在歐洲以外的殖民地領土上，同樣的邏輯在推進著，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敷衍地或熱衷地。現代的有界國家疆域以墨卡托法繪成地圖，多少較為有效地管轄著，好像只是在靜候相稱的居民。這里，從某一視角看來，殖民主義好似一個噩夢纏身的口吃者。說它是口吃者，是因為就其本來的性質而論，它無從列舉這樣的居民。再沒有比菲律賓更好的例證了。到西班牙統治末期，以受保護領地（terre nourrice）的身份，它已有350年之久被想象成Las Filipinas（菲律賓）。但是Filipino（菲律賓人）？不過是宗主國的人對當地克里奧耳人這個極小階層的輕蔑稱呼：不錯，他們是住在菲律賓，但依傍著遠為人多勢眾的半島人、梅斯蒂索人、華人和土著民。直到1890年代的革命黨人才把它用作這個家園上全體人民的稱謂，他們最終包含了以上所有類別的成員，執拗地歸于自身一種共有的菲律賓屬性。殖民主義也是噩夢縈懷的，因為人們可以振振有詞地論證說，它在民族主義者本身變成歷史存在之前，就夢見了早發的民族主義。[[106]](#_106_32)由這種觀點出發，誠如過去共和主義美洲的模式原來所暗示的，在地圖上標出馬里，大概就得找出它的馬里人；標出錫蘭，就得找出錫蘭人；標出巴布亞—新幾內亞，就得找出巴布亞—新幾內亞人。但這絕不能說總是做得成功的。

人們因之就能明白，為什么民族—國家地位對十九、二十世紀的民族主義事業如此關鍵，那些事業毀滅了從專制主義時代繼承而來的龐大的、多語言混雜的帝制王國，以及比王國本身更長命、更龐大的殖民—帝國主義混合體。因為它——連同其典型的共和制度——被認為代表了想象的家園與想象的家園主人的一種新發現的結合，并通過有組織地運用它的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確保那一結合的穩固。是故，李斯特式理想似乎合情合理：自給的“國民經濟”，被關稅像護城河似的拱衛起來。

然而有諷刺意味的是，正當這個經典的民族—國家構想隨著1919年國聯的建立而全面開花之際，前進中的資本主義也開始侵蝕其基礎。像較早時代那樣，最突出的轉變發生在交通和通訊領域。地上，機動車日漸代替了火車頭，它們在上面馳騁的碎石路面的大幅擴張，絕不是只在國境線內才規格一致的。天上，除了像美國這類特大國和富國以外，商用航空生來就基本上是跨國的。一個人飛來飛去，是要離開或返回他的民族—國家，不是在國內四處旅行，而“國家領空”只有曇花一現的貌似真實的生命，隨后衛星的問世讓它成了明日黃花。這些變化的步伐和勁頭，生動展現在進入歷史上的移民地美洲的非移民外國人的統計數字上[[107]](#_107_32)：

1931—1940　1,574,071

1941—1950　2,461,359

1951—1960　7,113,023

1961—1970　24,107,224

1971—1979　61,640,389

1981—1991　142,076,530

（非移民數量超過移民的第一個十年是1930年代，而且比值已達3∶1。）

收音機甚至把不識字的人口也帶入了大眾傳媒影響范圍之內，它的收聽從未被有效限制在民族—國家的聽眾上。沒有哪家報紙能夠奢望支配地球衛星的那種覆蓋范圍，BBC或美國之音就能做到。后來，電話和電報、電影、電視、盒式錄音帶、錄像機及個人電腦，將收音機發動起來的幾乎一切東西都加速了，無限放大了。

這些進展已然有了并將繼續帶來無盡后果，正因為它們是高級資本主義的跨國化與全球經濟趨于陡峻的經濟分層的有機組成部分。如今現實就是這樣：全世界不到25%的人口占用了世界收入的85%，貧富差距正穩步擴大。在1980年代，8億多人——超過美國、歐共體和日本人口之和——“甚至變得更見赤貧，1/3的兒童食不果腹”。[[108]](#_108_32)然而，多虧了飛機、巴士、卡車乃至老氣的火車，這種不均和苦難從任何意義上說都比以往更靠近特權和財富。故而移民不再像前些世紀那樣，外移到新世界或澳新的那些邊緣地帶，而是內移到宗主國的中心區域。

1840—1930年間，大約3750萬移民（他們壓倒性地出自歐洲）來到了美國；平均每年近41.6萬人。1970年代，年均數字約為50萬人，到1980年代約為74萬人；80%的新來者是“第三世界”的。[[109]](#_109_32)保羅·肯尼迪提到說，眼下有些人口統計學家相信，今后三十年里，每十年會有多達1500萬移民進入美國，即是說，年均速率是150萬，這是1980年代的兩倍。[[110]](#_110_32)

這些估計數值業已證明只有些許夸大。早在1997年，美國移民和歸化局宣布，此前四年有不少于500萬的非法（更別提合法的了）移民潛入美國——年均速率是125萬人。[[111]](#_111_32)西歐在二戰結束與1970年代初的石油危機之間的三十年內，吸納了2000萬以上的移民。（若非斯大林鐵幕之助，這個數字原本會高出許多。）但在1980年代后期，數字膨脹起來，或許整個1990年代將繼續膨脹下去。德國的7900萬居民中，520萬（7%）是外國移民；法國，5600萬人中有360萬（7%）；聯合王國，5700萬人中有180萬（2%）；瑞士，680萬人中有110萬（16.3%）。[[112]](#_112_32)（即便是孤絕的、限制甚嚴的日本，據說也有一百萬左右合法或非法的外國居民。）而蘇聯經濟和政治的崩盤，已經開始促成人口流動，那是任何世紀末的大陸封鎖體系（Continental System）都無法阻遏的。

與此同時，我們時代的通訊革命深刻地影響了移民的主觀體驗。墨爾本的泰米爾人巴士司機離他的祖國（land van herkomst）只有區區十二小時飛行時間的距離。阿姆斯特丹的摩洛哥建筑工人每天晚上都能收聽拉巴特的廣播節目，毫無困難地買到他的國家最走紅歌手的盜版磁帶。東京郊區的非法外國移民、受黑幫保護的酒吧泰國男招待，向他的泰國同胞們放映曼谷出品的卡拉OK錄像帶。香港的菲律賓女傭給她馬尼拉的姐妹打電話，在電眼的閃爍中給她在宿務的母親匯款。溫哥華學業出眾的印度學生可以同他以前的德里同學天天保持電子郵件聯系。更不消說老在增長的雪片般的傳真了。

要是瑪麗·羅蘭森今天還活著的話，看起來似乎能夠在她小小的公寓臥室里，在她腳指頭那邊的屏幕上，在完善的電子安全中，“真正”看見英國田地和牲口。但是自然地，意義全變了。這特別是因為她只能看見屏幕的控制者選擇讓她看見的東西。她的眼睛永遠看不到比屏幕框更寬的地方。田地的“英國屬性”不是出自她的內心，而是出自她身外一個講述著的聯合大企業的聲音。更具體地，考慮一下這張馳名的照片：一位孤獨的伯羅奔尼撒客籍工人（Gastarbeiter），坐在他——比如說——法蘭克福的又黑又臟的房間里。墻上唯一的裝飾，是漢莎航空公司一張游覽帕臺農神殿的華麗旅游海報，它用德語邀請他去希臘度一個“陽光明媚的假期”。他很可能從沒見過帕臺農神殿，但是漢莎設計的這張海報向他也向任何游客確認了一種希臘身份，或許只有法蘭克福才促使他采取的身份。同時，它提醒他，他只要幾個小時就飛到了希臘，如果他攢夠了錢，漢莎將很樂意幫助他在他的故鄉（Heimat）度過兩周“陽光明媚的假期”。他極可能也知道，隨后他將重回法蘭克福的流放生涯。或者從長遠看來，他將發現自己年年在伯羅奔尼撒短期流放？抑或是在這兩地流放？他的孩子們又將如何呢？

在轉向這一粗描的1930年代后的流浪生活的政治后果之前，有必要簡單強調一下后工業資本主義兩個小而重要的關聯后果。試考慮個人身份的兩種通行天下、相當現代的官方文件：出生證明和護照。二者都在民族主義的十九世紀問世，后來變得彼此相連。沒錯，在全世界基督教化的區域，出生登記遠遠先于資本主義的興起。但是這些出生只是由教區教堂地方性地、依照教會規矩記錄的；登記是即將來臨的洗禮的前奏，標志著基督教徒的靈魂在新的肉體形態中出現。然而在十九世紀，登記由國家接手，那些國家正日益呈現出民族色彩。例如在工業發達的英格蘭，戶籍總署署長職位不過是在1837年才設立的。所有出生，不論隨后施洗與否，一律強制性登記，這是直到1876年才有的。國家的證明書確認每個嬰兒的父親和出生地，（通過血統主義或出生地主義）為幼兒獲得公民權與否創造了奠基性文件。（他或她不再是出生于埃格漢教區，而是聯合王國。）護照是工業時代里移民和民族主義力量會聚的產物，準備當嬰兒逐步變為成人時認可其政治身份。

出生證明和護照的聯結是在這樣一個年代制度化的，當時婦女還沒有政治參與的法定權利，父權制家庭是大體上不受質疑的規范。但在我們的時代，這一切都急劇改變了。當國聯成立——以及婦女選舉權正盛行起來的時候，美國離婚與婚姻的比率大約是一比八，而今差不多是一比二了。未婚媽媽生育的美國嬰兒比例，從1960年的4.2%驚人地增加到1990年的30.6%。[[113]](#_113_32)現代生活的國內漂泊和國際漂泊，也導致十九世紀的出生證明變得像一種偽鈔。譬如，設若我們獲悉瑪麗·瓊斯（Mary Jones）于1970年10月25日出生在德盧斯，父母是羅伯特·梅森和弗吉尼亞·瓊斯，甚或是羅伯特·梅森和弗吉尼亞·梅森，我們不能淡淡地推論說，她就是在那個德盧斯被懷上，在那里長大，或者如今住在那里。我們搞不清楚她的祖父母是不是葬在德盧斯，而且即便是，我們也沒多少根據可以料定，瑪麗總有一天會埋在他們身邊。弗吉尼亞還是梅森家的嗎？或者是瓊斯家的？或者又是別的什么人家？瑪麗同羅伯特或弗吉尼亞的聯系，有多大可能會超出定期的長途電話？她在多大程度上會被人認作、也被自己認作一個德盧斯人，一個梅森家的人，或一個瓊斯家的人？

出生證明的偽造性質，或者——我們應該說——它的低市場價值，也許因其贗品之相對稀少而得到確證。反之，大量的假護照以及它們博得的高價錢表明，在我們的時代，當人人都被設想成歸屬于聯合國某成員國的時候，這些文件具有高度的事實斷言性（truth-claims）。但是它們較少表明公民權，更談不上表明對一個保護性祖國的忠誠，而較多表明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權利；就此而言，它們也是偽造品。葡萄牙護照和孟加拉護照，即使真實不虛，也沒有透露幾分關乎忠誠或習性的事情，而是充分顯示了它們的持有人獲準在米蘭或哥本哈根找工作的相對可能性。我們全都在機場的移民隔板那里經歷過的隔離隊列，所標志的經濟地位遠甚于任何政治忠誠。實際上，它們對人力計收差別關稅。

現在讓我最后轉向政治領域。至少在兩個既有別又相關的政治范域，上面闡述的這些過程可能破壞了古典的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構想，后者立志要讓習性、文化、忠心和排他的政治參與完全一致。

第一個范域與后工業核心國家約略相當。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早期，那些所謂移民國家（主要是美洲國家，也有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有非凡的能力讓數百萬移民同化和歸化。加爾鐵里（Galtieri）、艾森豪威爾（Eisenhauer）、藤森（Fujimori）、范布倫（Van Buren）、奧希金斯（O'Higgins）、杜魯道（Trudeau）等名字就說明了問題。但是出生證明此時首先具有政治重要性，我們可以從憲法的這一限制性條款看出這點來：美國總統應當出生在本國邊境以內。因此一個人要么是美國人，要么不是。而且，為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服軍役，要遭受褫奪公民權的法律制裁，雖說這并非總是不折不扣執行的。這個制度何時才開始式微的呢？或許是在我們劃時代的1930年代，那時美國人被容許加入西班牙內戰中的國際縱隊？要么是在1940年代末，那時美國人被默許參加新生的以色列國的保衛戰？但是我想，既定規則中的這些失效之所以聽之任之，恰是因為人們相信這些法外事務是區區小事，涉及的是籍籍無名的小人物。再說，卷進去的那些美國人的美國身份從未被認真懷疑過。然而這些狀況自1960年代中期以后就開始改變了。安德烈亞斯·帕潘德里歐（Andreas Papandereou）生而是希臘公民，后來成為美國公民，再后來，趁著機遇的召喚，又成了希臘公民和希臘總理。在他的發展中尚可見某種章法。但是對長灘白手起家的百萬富翁金·凱薩維（Kim Kethavy）的1993年柬埔寨總統候選人資格，我們又將作何感想呢？用《紐約時報》的鄭重話語說，他“持有美國護照……他的競選總部的辦公室插滿了美國國旗。（按照美國移民法，凱薩維先生萬一獲勝，或將被迫放棄美國國籍——雖然他獲勝希望渺茫。）”[[114]](#_114_32)這里一切都有象征意義：凱薩維先生的國籍放在括號里，有案可查的報紙認為他只是“或將”被迫放棄它，假如他成了柬埔寨總統的話。沒有跡象顯示1990年代的《時報》覺得凱薩維先生——或美國政府——的行為有什么古怪或不妥之處。畢竟，美國公民米蘭·帕尼什（Milan Panič）和穆罕默德·薩希爾貝（Mohammed Sacirbey）最近已就任南斯拉夫總理和波斯尼亞駐聯合國大使，而塔格佩拉（Rein Taagepera）離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終身教授職位，不成功地競選過愛沙尼亞總統。這種現象也不是美國一家獨有；加拿大公民、計算機系統生產商蒂明斯基（Stanislaw Tyminski）曾與瓦文薩（Lech Walesa）對抗，競選波蘭總統。

這枚硬幣的另一面是，美國和其他老牌民族—國家里出現了一種族群認同，它相對于經典民族主義的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看起來像是私生子斯乜爾加科夫。美國變種的一個象征，也許是前些年喬納森·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的間諜罪審判。一個美國公民，卻為另一個國家刺探美國情報，如果誰認為這里邊可能有什么值得褒揚的，那在古典民族主義時代會顯得荒誕不經。但對同情波拉德的相當數量美國猶太人來說，這位滿腹怨恨的間諜被理解成代表了一種跨國族群認同（transnational ethnicity）。還有什么能夠如此顛覆性地模糊美國和以色列的公民身份呢？另一個象征是1977年亞力克斯·哈利（Alex Haley）的電視連續短片《根》（Roots）所吸引的眾多非黑人觀眾。（收看最后一集的有3600萬戶家庭，令人瞠目。）該劇凸顯了綿延不輟的“非洲人屬性”（Africanness），由此意在反駁大熔爐的意識形態——哈利的祖先們雖則已然美國化，多少還保持著那種屬性。幾乎沒有疑義地，《根》的流行多虧了這個可換位的主題，只要我們回想起特別是在1980年代，那些地地道道的美國青年一窩蜂地去為大學里的各種族群研究項目游說，他們也熱情洋溢地去研究自己生身父母往往已經決定拋棄的語言。從這些和別的沖動里冒出了文化多元論的意識形態綱要，它暗示說，十九世紀那種簡單形態的美國主義（Americanism）不夠用了，或者不可接受了。（可是什么形態夠用？很長時間以來，美國選舉的參與度一直在下降，到1990年達到極低點：僅36%的合法選民投了票。）

從（比方說）美國人到亞美尼亞裔美國人再到亞美尼亞裔美國人的這種轉變，正受到兩股力量的強化：一是前面談過的交通和通訊的普遍革命，二是當前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解體。例如，克利夫蘭的斯洛文尼亞血統的人就比盧布爾雅那還多，既然斯洛文尼亞已是獨立國家，在克利夫蘭以及在美國做一個斯洛文尼亞人，就顯得重要性有所提高。這樣的族群認同通常和《根》一樣有著濃厚的想象特征。我們多半會為這樣一些矢志不移的“愛爾蘭裔”波士頓人發笑，他們不懂愛爾蘭文學，不玩愛爾蘭的運動，不給愛爾蘭交稅，不服愛爾蘭兵役，不在愛爾蘭的選舉中投票，對這頭“老母豬”（Old Sow）的今日現狀僅有度假所得觀念。然而思考下面這件事就不那么好笑了：男女同性戀者在科克（Cork）的圣帕特里克節慶典上的閃亮登場，一點也沒有緩和包圍著紐約的姐妹慶祝會的憤怒情緒。[[115]](#_115_32)

歐洲那邊，相似的趨勢也在活動運作，甚至可能在歐共體內因經濟一體化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而變本加厲。英國的民族陣線、法國勒龐的運動、德國右翼極端主義的興起，都是“族群化”進程的征兆。[[116]](#_116_32)因為它們宣傳的要旨，本質上是要截然劃分政治民族（political nation）與假定存在的本原族群（ethnos）。就算一個黑人在聯合王國出生，在那兒念書、讀大學，在那兒繳稅，在那兒投票，還將埋葬在那里，但依民族陣線看來，他或她永遠都不是真正的英國人。類似地，在勒龐的想象中，今日的法國充斥著外國人，這不是指還揣著阿爾及利亞護照的移民，而是指“非法蘭西人”的政治法國公民。[117]我們由此可以想象，他從鐵路車廂的窗戶望出去，看到的不是田地，甚至不是“法蘭西人的田地”，而是“糟了，法蘭西人的田地”。種族主義是這些運動的一個強大影響因素，但我認為長遠來說，隨著歐洲人在全歐的更大規模流動，種族主義將不如族群化來得重要。

我一直在討論的所有那些急劇變遷所具有的第二類政治后果，跟移民自身有關。我們可以謂之“遠距民族主義”的東西，正顯山露水起來，這尤其是富裕的后工業國家政治生活族群化的產物。這類政治主要指向從前的第二、第三世界，它從不同方向撬開了古典的民族國家構想。最近對阿約提亞（Ayodhya）的巴布里（Babri）清真寺的災難性破壞，就是一個顯例，它把印度拖入印巴分治以來最大的危機之中。摧毀行動經過了精心策劃，由退役軍人和警察進行了大規模演習和訓練，它是“世界印度教大會”（Vishwa Hindu Parishad）官方發起的，該組織“從它住在北美和不列顛的支持者中間籌集了大量資金”。[[118]](#_118_32)不消說，這種支持者絕大多數是永久居留海外的印度人。[[119]](#_119_32)那些最頑固最狂熱的擁護者，執迷于一個獨立的卡利斯坦國（Khalistan），他們許多人不是生活在旁遮普，而是在墨爾本和芝加哥事業有成。賈夫納的猛虎組織在它們的暴力斗爭中強勁起來，是靠多倫多、倫敦和其他地方的泰米爾人社群撐腰，這些社群通過泰米爾網（Tamilnet）在電腦上互通聲氣。[[120]](#_120_30)不妨思考一下德國的，還有澳大利亞和北美的那些克羅地亞人的不良作用：資助和武裝圖季曼（Franjo Tudjman）的分離國家，逼迫德國和奧地利致命地、草率地承認它。[[121]](#_121_30)全球各地富裕的亞美尼亞移民，籌措錢財和武器以確保埃里溫對巴庫的軍事勝利，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122]](#_122_30)

假定遠距民族主義必然是極端主義的，這顯然是個錯誤。菲律賓境外有相當多的菲律賓人，他們捐助反馬科斯的斗爭，不是因為政治流亡；今天的菲律賓經濟嚴重依賴這些人從海灣、意大利、沙特阿拉伯、英國、加利福尼亞、中國香港、日本和西班牙寄回去的錢。不住在中國本土、反而常常是異國公民的華人，也向中國民主化運動給予了金錢和其他支持。

盡管如此，總的說來，今天的遠距民族主義讓人感到或許是未來的一種險惡預兆。首先，它是資本主義對一切人類社會實施的冷酷無情、日甚一日的改造的產物。第二，它造就了一種真誠卻又極不負責的政治。這些參與者幾乎不在他從事政治活動的國家納稅，不對它的司法系統負責，也許沒在它的選舉中投過哪怕是一張缺席選舉人票，因為他是異國公民；他不用擔心坐牢、刑訊或遇害，也不用擔心他的直系親屬。但是，在第一世界安居樂業的他，可以送錢送槍，巡回宣傳，建立洲際計算機信息網絡，這一切會給它們最終所向的地區帶來無法估量的后果。第三，跟支持全球人權或環境保護事業的活動分子們不同，他的政治既非時斷時續的，亦非心血來潮的。他深切意識到，他的流放是自我選擇的；他在電子郵件中主張的民族主義，也是在他依然決意定居于斯的那個族群化民族—國家里，塑造一種嚴陣以待的族群認同的基礎。就是那個把他邊緣化、污名化的宗主國，同時讓他能夠在地球的另一面，頃刻間裝扮成民族英雄。

# 第二部 分東南亞：國別研究

## 4 黑暗之時和光明之時

最后一位偉大的爪哇宮廷詩人（pujangga）龍加瓦西塔，就在他1873年死于舊時的王都梭羅（Surakarta）之前，寫下了一首絕望的詩歌，他題為“Serat Kala Tidha”（《黑暗之時》）。[[123]](#_123_30)這首詩的格調或可從以下數行略窺一二：

這王國的奪目光彩

如今已是過眼云煙

德行之教空留廢墟

再不見圣哲的典范

博學詩人的心靈啊

被那煩憂重重繞纏

眼看著種種的不幸

讓一切都變得黑暗

世界沒于無窮苦難

君王有王者的德望

宰輔才具堪稱圣賢

甫帕蒂事主無二意

僚屬盡心勤勤勉勉

可是誰能卓然如初

度過這劫數的時艱……

生當此瘋狂的時代

舉世皆醉我獨佯癲？

受煎之心痛何以堪

舉世皆醉我獨醒乎？

我將落得一身孑然

窮途末路餓死溝澗。[[124]](#_124_30)

一行行讀下來，這些詩行大多數是爪哇文化中傳統主題（topoi）的平凡變奏。爪哇的民間故事和宮廷文學都飽含著對大災變時代（jaman kalabendu）的程式化描述，亦即自然秩序中的洪水、地震和火山噴發的時代，與社會秩序中的饑饉、暴亂、失德的時代。這兩種傳統也都展現了由來已久的黃金時代意象——天下有序和社會康樂的年代，人人都在里邊扮演他的規定角色，等級井然，和風勁吹。按照爪哇的傳統思想，[[125]](#_125_30)這樣兩種時代之間的根本性搖擺，可以解釋成統治者的成敗：他能否靠著自律苦行和無私盡責，以及吸引或吸納其他充滿權能的人或物的能力，將宇宙的內在權能（power）盡集于他本人身邊和身上。統治者越完美，社會就越光明福樂。

如果我所引的詩行本身平凡無奇，它們喚起的奇特而痛苦的感受又作何解？其實就在于它們反常的并置。因為第2、8節屬于“黑暗之時”的主題，而第3節的前四行是“光明之時”經典意象的主要部分。從傳統爪哇的邏輯說來，如果“君王有王者的德望，宰輔才具堪稱圣賢”，那么天下和社會必然應當太平有序。但是接下來的兩行表現的恰是其反面。一個駭人的詞parandéné（可是）表達了龍加瓦西塔絕望而一反傳統的感覺：舊的世界觀不再有效，宇宙的循環運動失去了彈性，爪哇的權能已然萎縮。歷史上爪哇人經歷過多次“黑暗之時”，但總是滿懷信心地期待最終有個統治者將重聚權能，開創一個新的“光明之時”。然而在1873年，垂死的詩人講出了他的恐懼：現在是一個或許永不終結的“黑暗之時”。[[126]](#_126_30)

三十五年后，1908年5月20日，在殖民地首都巴達維亞，一小群爪哇青少年學生成立了他們稱作至善社（Budi Utomo）的一個組織。如今，印尼把5月20日定為“民族覺醒日”，年年慶祝。永積昭（Akira Nagazumi）有關這一組織早期歲月的杰出研究恰到好處地題名為《印尼民族主義的黎明》[[127]](#_127_30)——黎明標志著從黑暗向光明，從沉睡向覺醒的過渡。如果說永積昭和當代印尼人談起5月20日，都用了這些比喻性詞語，他們不是在有意地混淆年代。自二十世紀初葉以來，有多少報刊雜志，各以其所用之名，含蘊了光芒四射的意象啊！[[128]](#_128_30)卡蒂妮（Kartini）的著名書信集Door Duisternis tot Licht（從黑暗到光明），承載了相同的象征印記。[[129]](#_129_30)

我們如何看待這一意象的變化呢？有些學者傾向于認為它象征了從傳統向現代性的過渡，好像那些“在黑暗中行走的人看見了萬丈光芒”。譬如，范尼爾寫道：

在西化學校的氛圍中……年輕的爪哇人發現了一種生活，它跟他們在故鄉環境里熟知的那種大不相同。差異不僅是物質環境方面的，重要得多的更是精神環境方面的：也許可以僅僅略有出入地概括為科學—理性主義態度與神秘—泛靈論態度之間的差異。[[130]](#_130_30)

由此看來，至善社不過代表了印尼人以西方的（近代的）方式應對殖民狀況的最初努力。盡管至善社的名稱本身是爪哇色彩多于印尼色彩；盡管它的成員從族群上局限于格爾茨所稱的“內印尼”（Inner Indonesia），在社會地位上局限于普里亞伊（priyayi）學生和官僚；[[131]](#_131_30)盡管它的正式目標不包括政治獨立；[[132]](#_132_30)然而它的結構的新穎性似乎標志著同過去的清晰斷裂。如范尼爾所言，“至善社在印尼的場景下顯現為這樣一個組織：它是建立在個人的一種自由、自覺的聯合努力基礎之上的。”[[133]](#_133_30)至善社有它的綱領、分部、捐獻、公告和代表大會，看起來沒有本土的先例，反倒像是隨風播散的種子，從中長出了印尼民族主義運動。[[134]](#_134_30)

如果說印尼作者們通常不愿接受范尼爾的心理學和教育學的二分法，他們卻發展了自己的二分法，用道德的、政治的和世代的詞匯構想出來，以下這些俯拾皆是的對子就是明證：maju/kolot（進步/落后），muda/tua（年輕/老邁），sadar/masih bodoh（覺悟/懵然無知）。[[135]](#_135_30)在這兩種視角下，至善社似乎成了一種根本性的意識轉變的核心。但是這種轉變的許多事情仍然云遮霧罩。下文就是要初步嘗試照亮那一晦暗。

至善社是由STOVIA[[136]](#_136_30)醫科學校的學生在巴達維亞創建的，領導者是十九歲的東爪哇小伙蘇多摩（Soetomo），他后來成為他那一代最為卓越的民族主義領袖之一。范尼爾寫過，“在影響1920年代印尼的生活上，若說有誰比他更重要，那很可懷疑”，這樣寫時他可能夸張了一點。[[137]](#_137_30)但是蘇多摩作為1924年成立的以泗水（Surabaya）為基地的印尼研究會、1930年成立的印尼民族黨（Partai Bangsa Indonesia）以及1935年成立的大印度尼西亞黨的創始人，肯定是獨立前印尼政治的一個中心人物。[[138]](#_138_30)1938年他辭世時，有成千上萬人哀悼他，把他當作人民的忠仆。[[139]](#_139_30)他，荷屬東印度最先進的西式學校的一個成功畢業生，在那個世紀的前二十年可能被認為是進步、年輕和覺悟的化身。[[140]](#_140_30)純屬偶然，蘇多摩也是第一個寫某種像自傳一樣東西的印尼名人，他寫了有名的Kenang-Kenangan，這個題目可以譯成“自傳”（Memoirs），但其實最好翻作“回憶錄”（Memories）。因而看起來合理的是，研究這一“自傳”可以提供一些線索，提示出成為“覺醒”的一代之一員意味著什么，更一般地，提示出在那一代最不朽的政治人物頭腦里，過去、現在和未來是如何被設想和聯在一起的。[[141]](#_141_30)

然而在鉆研《回憶錄》之前，我們不妨回想一下蘇多摩生平的主要事實。他1888年7月30日出生在靠近東爪哇安褥的格貝（Ngepèh）村。[[142]](#_142_30)他的外祖父是一位富有的克巴朗（kepalang，地位很高的村首），早年曾在地方土著政府（Binnenlandsch Bestuur）供職。他的父親是個非常能干的教師和行政官，官至韋達羅（wedana）職銜，那是當時非貴族甫帕蒂家庭出身的爪哇人通常可能取得的最高官階。[[143]](#_143_30)蘇多摩由外祖父母養到六歲，然后被送進邦義爾（Bangil）的一家荷語小學（ELS）。這是他享有特權的教育背景的一個標志：在1895年，大概就是他入學的那一年，整個荷屬東印度只有1135名印尼人在這種小學讀書。[[144]](#_144_30)1903年，主要在他父親的堅決要求下，他進了STOVIA。那時他十四歲。1911年他二十二歲時畢業，隨后根據他當初入學的合同條款，在爪哇和蘇門答臘各地當一名政府醫生。1917年，當他被派駐布洛拉（Blora）時，認識了一位寡居的荷蘭護士，和她結了婚。兩年后他得到去荷蘭繼續醫學深造的機會，到1923年才回國。這時他已才望過人，當選為泗水市議會議員。可是不久之后他就辭去這個職位，組建了1920年代第一個也是最著名的一個政治“研究會”。自那時起直到他1938年去世，他埋首民族主義政治之中。[[145]](#_145_30)

這就是蘇多摩的生平概況，與蘇帕迪（Imam Supardi）那本隱蔽的圣徒傳中呈現的較完整圖像相符，是它的一種縮略形式。多大程度上，蘇多摩的“自傳”符合這個輪廓呢？一點也不。比如，自傳里事實上沒有談及在至善社創建之后三十年中他的政治得失。我們僅僅附帶著了解到他的政治活動——例如，當他憐惜地描述他妻子老要為拜訪他們荷蘭那個家的絡繹不絕的學生做飯時。[[146]](#_146_30)這部自傳的特有結構十分古怪，完全不合我們所設想的蘇多摩歷史生活的外形。前48頁專門講述他的父母和外祖父母，后57頁專講他的同窗（和政治上的同志），他的妻子，以及家里的一些仆人。只在中間30頁才真正述及他本人的生活——而且是以他在巴達維亞的學生時代結尾的。

在致讀者的簡介中，也在簡短的前言里，蘇多摩對這一安排有所說明：

正如在書的引言里提到的，作者寫作這本回憶錄的目的是要應允有些人的請求，他們希望聽說我的生活故事［riwayat］。在這本書里，我不會直截了當地記述我的生活[[147]](#_147_30)故事，因為我在引言中說過，我不是寫我的故事的合適人選。所以我只是從跟我的生活有聯系的各色人等的故事中擷取種種片段［pungutan］進行敘述，這樣，我的故事就能從這些人的故事的片段中擬想出來……[[148]](#_148_30)很長時間以來，從各個地方，我收到了寫作我的生活史（biografie）的請求。首先來自我本人的團體，這類請求就不在少數。而且，好些記者也提出相同的請求。但我一概拒絕了，因為我有一種看法，覺得一個人要記載某人的生活史，而那人尚未歸于永恒［belum pulang ke zaman yang baka］，換句話說他的生命圖景尚未完成，這是不合適的……[[149]](#_149_30)

所以我采納了另一種辦法，憑借它我滿有機會向我的先輩們和幫助過我的其他人們表達敬意，[[150]](#_150_30)由此能夠展露我本人的lelakon。[[151]](#_151_30)

記得爪哇有句諺語：kacang mangsa ninggal lanjaran，意思是說一個人的子孫永遠不會丟棄他的品質。從我描述的我的先輩的品質和人格中，讀者不難理解我的真實人格。[[152]](#_152_30)

作者的希望是……這本回憶錄……能夠用作一種工具，比較從前時代［zaman dahulu］和現時代［masa sekarang］的狀況。[[153]](#_153_30)

回憶錄的某些更要緊的主題也在這些謙恭的說明性語言中擺出來了，在我們進一步分析文本之前，值得稍作評述。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雖然西方學者習慣把這本回憶錄稱作自傳，蘇多摩本人卻從未用過這個詞，或者這個詞的任何一種印尼語言形式：他特別提到他長期拒絕寫作他的傳記（biography）的要求。而這本回憶錄在任何通常意義上都不是一部傳記。即使當他細寫他的先輩時，也沒有給我們提供他們的傳記，而只是他們“故事”的選段或“擷英”。蘇多摩不曾費心要把這些前輩人物放置到一個漸臻成熟的個人或歷史背景下。他們從一段段插曲中隱隱現出，那些插曲沒有注明時間，除了——我們將要看到——從前時代和現時代的重要標識。

如果我們不弄清近代西式傳記和自傳的性質和假定，我想我們將無從理解蘇多摩這種寫作手法。這些文學形式實質上涉及“人”與“歷史”的相互作用。“歷史”是理解人類與社會的演變的一種普遍、線性的框架。“人”是經歷、參與這一“歷史”的個別主體。研究一個人的一生因而通常是研究他向著其歷史角色的邁進和融入。如果父母和外祖父母出現在這樣的著述里，他們服務于闡明“人”從中浮現的一種社會、經濟和心理背景，或者是一種起跑線，據此判斷他在將來的賽跑中的表現。于是這類文本的基本趨向就是遠離祖先，走向“個人”。它們好比在畫布和畫架上繪油畫，不斷地添上小塊小塊的顏料，直到出人意料的一個整體——藝術作品——呈現出來。

我想我們在這本回憶錄里發現一種方法，它更像古典雕塑的方法，即在石料或別的什么原料的偶然性里發現本質形式。樸素的民間諺語“kacang mangsa ninggal lanjaran”所蘊含的人與時間的意識，大大有別于西方傳記和自傳里那些典型意識。因為正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此處的歷史不是顯得像畫家，賦予一個生命以本質意義，而是顯得像偶然性，像石料，透過它們去尋求一種本質特性。蘇多摩關于他父母的篇章無意顯示那種社會和心理環境，顯示這位民族主義領袖從中出發去實現他的天命；而毋寧是希望顯露出豆萁，豆子向著它，尋找回家的路。結果我們就見識了他的先人的人格（本性），他的生命向之而動。這種探尋不是為了個人實現或歷史唯一性，而是為了團聚和認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通過展示他先輩的本性，蘇多摩能夠邀請讀者（他們知道他的歷史角色）去領會他的本性到底是什么。[[154]](#_154_30)在這個背景下，歷史時間如此縹緲不定，年代學必定無關緊要，這就是為什么——我相信——在回憶錄的記載中，蘇多摩本人的生活與他先輩的生活在我們看來這么破碎、松散、漂流無依。[[155]](#_155_30)

第二，回憶錄總體上的憂郁調子是自始即定的。初稿甫一寫就，他深愛的妻子就亡故了，最后附加的部分，蘇多摩專述亡妻，用的是不加渲染、中心悲慟的語言，特點鮮明。他也記錄了他格外景仰的另兩個人之死。一個是他的密友古納萬，對他倆關系的親密程度，古納萬的兄長笈多博士稱之為wayang（木偶）和dhalang（操縱木偶的人）之間的關系；[[156]](#_156_30)另一個是他的父親，父親之死是件大事，據他自述，這對他突然間成為至善社的領袖人物十分關鍵。但是回憶錄的憂郁氣氛有著比這些個人喪痛更深層的緣由。我想，它源于我們在引自蘇多摩的前言的最后一段話當中見到過的東西，在那兒以及在整本回憶錄里，通過從前時代和現時代的反復對比透露出來。有些篇幅中，人們似乎可以清楚知悉這兩個“時代”間差異的性質，如果不是知悉它們之間過渡時刻的性質的話。蘇多摩記下了對格貝村民的問話，從前時代是什么樣子：“村民回答說：‘先生，卡吉村長（Lurah Kadji，蘇多摩的外祖父）時代可完全是兩碼事兒。’有什么差別呢？‘在那個時代，卡吉村長的時代，［卡吉村長］絕不許人們把土地租給［糖］廠。’”[[157]](#_157_28)他用這樣的話描述他外祖父的教育：

他是一個富人的兒子，那富人過去是當地的頭領。為這緣故，如果瞅瞅他那時代，他接受的教育堪稱完足。他一家家pesantrèn[[158]](#_158_28)地轉學，到哪里都有名師。由于他的游學，我的外祖父視野非常開闊。聽人們說，只是在塞潘姜（靠近泗水）的pesantrèn，他才獲得一種淵博的ilmu（學問）。[[159]](#_159_28)在那個時代，還沒有sekolahan。[[160]](#_160_28)除了學習古蘭經誦讀之外，他也學會讀寫爪哇文和馬來文，學了ilmu falak［天文學］，它解釋星星月亮的運行歷程。他還研習ilmu kebatinan[[161]](#_161_28)和ilmu kedotan（這種知識可以讓人刺不傷打不痛）[[162]](#_162_28)……在我外祖父的時代，年輕人非常愛好sport［原文如此］和藝術（kunst）。誰要是不會騎無鞍的馬，不敢在馬背上站立，誰就不是男人。誰要不會用弓箭，不會使長矛，也不是男人。舞蹈和nembang［傳統爪哇的歌唱］是自尊的年輕人必懂的藝術之一，而 rampok harimau 是風行全民族的一種運動。[[163]](#_163_28)

以下是蘇多摩對他外祖父向客人提供提神物的描寫：“誰要瞧瞧那個時代，我的外祖父給他的勞工杜松子酒［荷式琴酒］喝，這沒什么好驚訝的。也是在那個時代，即便人們已經開始醒悟［sadar］并覺得羞恥［malu］，依然有很多時候，我的外祖父會給客人提供鴉片……在舊時代［zaman kuno］，人們認為吸鴉片是高地位和奢華的一個標志與工具。”[[164]](#_164_28)

這些描述的含混性消蝕了原有的任何信心，原以為兩個“時代”對應了兩個歷史時期，或者對應了“傳統”與“現代性”。[[165]](#_165_28)無論何時何地，蘇多摩都沒有流露出對他外祖父所受教育的懷舊或輕蔑。我們所知的，只是難以捉摸的“如果誰要瞧瞧那個時代”。杜松子酒是荷蘭向爪哇的輸出品，說不定鴉片也是，至少有很大規模是如此，但是這里二者都顯得是舊時代的象征。[[166]](#_166_27)醒悟和羞恥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沒有明確的表示（這兩個單詞在回憶錄里出現過很少幾次，這是其中一次）。社會進化？政治發展？文化啟蒙？抑或是格爾茨所述的從durung Jawa（還不是爪哇人，不醒悟，不知道羞恥）到wis Jawa（爪哇人，醒悟了，知道羞恥）的轉型，讓小到爪哇的孩童，大到整體的爪哇社會都發生變化的那種轉型嗎？[[167]](#_167_27)

過去與現在之間的模糊關系，沒有什么地方表現得比下面這一段生動插曲更好的了，在此，蘇多摩描寫了他對外祖父實施的那種村莊懲治的不快。這位老人會把村里犯事的人捆在他的pendhapa（村公所的一種無墻的前庭）的柱子上，每次要捆上好幾天。“我成年的時候，已經深受穆爾塔圖里（Multatuli）[[168]](#_168_27)——爭取和保護我們人民權利的最早倡導者——的著作的影響，我問外祖父，什么權力［kekuasaan］給了他如此肆無忌憚的權利，竟以這種方式宣判村民。”[[169]](#_169_27)到這兒，有人可能預料會有一種傳統和現代、新和舊的常規對比。但是故事出人意表地向前發展，因為外祖父解釋說，他的懲罰措施其實是一種改革——以前，罪犯們會被送進鎮上的監牢里。在他看來，他們往往回來后成了麻木不仁的人，所以他就創造一種新型的、地方的審判體制，可以把他們留在村莊共同體之內。蘇多摩用以下的話作結：“所以，盡管我不贊同他的態度，但我能夠理解外祖父建立這些規章的理由。為此，雖然我已經受到新思潮［aliran baru］的影響，可我對他的敬重不減分毫，特別是如果我們瞧瞧他那時代的話。”[[170]](#_170_27)

蘇多摩這里提及的受穆爾塔圖里和所指不明的“新思潮”的影響，是回憶錄里語涉“新思想”的極為罕見的幾個例子之一。但是我們并沒有強烈地感覺到，其中的涵義就是發展的或進步的意思。成人蘇多摩不過是起先不理解他外祖父的改革罷了。既不存在對他外祖父行動的認可，也不存在對“新思潮”正確性的堅持。我們只是感覺到道德立場上某種不對稱的分隔。蘇多摩站在他本人的道德基礎上，已懂得理解自己的外祖父，依然尊敬他。但是這位老人對自己的良好判斷力沉著自信，并不理解蘇多摩。[[171]](#_171_27)

這種聯系和分隔的描寫，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在回憶錄里。先輩們保持著“完善”自足的形象，充分展露和代表了他們祖先的品質。當他們爭吵的時候，就像蘇多摩敘述的他外祖父和父親所做的那樣，是以一種渾不含譏帶諷的、擺明事實的方式爭吵。[[172]](#_172_27)就兒子的合適職業問題，父親反對老岳父的看法，然而是基于就事論事的理由：這些看法在實踐上和道義上都不合適。兩人被他們的爭執分隔開來，又被充滿他們體內的一致作風聯合起來。蘇多摩，他們的子孫，不但受到他們“品質”和“人格”的約束，還用一種奇特的、新穎的、超然的方式看待這一“約束”（bondedness）。他不說他的先人之見“不當”，恰恰由于他明白他們浸透在“時代”中。蘇多摩與他前人的分隔恰恰就在這個概念層次：他感到自己和他們嵌入在不同時代。而聯系是在那種多元化感知的層次上。這里是一種新的“觀察自我”（watching self）的跡象，人與文化間拉開距離的跡象。看起來也很像是蘇多摩在著手建構傳統之概念（idea of a tradition）。因為，除了把傳統理解為在分隔中造就聯系的方式、通過不重演而承認的方式之外，傳統說到底是什么呢？從前時代和現時代之間的分別，或許較少是歷史時期的分別，而更多是改變了的意識狀態的分別。

與此同時，假如我們不把zaman dahulu（現時代）這個語詞與zaman （時間，時代）一詞的其他用法并置而觀，我們就不會透徹領會“現時代”的含義。例如，我們發現蘇多摩寫道，“在我逃脫這飛逝時間［zaman yang fana］以后”，由別人來書寫他的生活經歷可能要好一些；[[173]](#_173_27)或者說，在一個人回歸“永恒時間［zaman yang baka］”之前，寫出他的歷史是不合宜的。[[174]](#_174_27)他反復說，在這個飛逝時間里，“無論苦樂，都不會持之久遠”。[[175]](#_175_27)另一段里，他運用了“飛旋的世界”（turning world）這個古老意象。[[176]](#_176_27)這些象征中當然有某種相當傳統的爪哇特性的東西，然而獨獨強調這一點可能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它們跟zaman一詞的其他用法之間的新關系。在傳統爪哇思想里，可以說人的生命運動與宇宙運動之間有一種自然共鳴。飛旋的車輪是靜與動、往與復的一種意象。宇宙時間的形式就是成與毀、又成與毀的形式。[[177]](#_177_27)人出生在這個飛逝時間里，過完他的生命，然后如蘇多摩所說，“回歸”永恒時間。這個周期結束了，另一代人又開啟新的周期。所以，對傳統爪哇人而言，死亡是生命向之運動的時點，在某種意義上，做一個爪哇人就是學習順應這種運動節律。[[178]](#_178_27)

顯然蘇多摩理解和接受這一種時間觀，即時間要么是飛逝的要么是永恒的，在該觀念里，那種分別可以說壓倒了其他一切分別。就此而言他是個傳統的爪哇人。但他也是一個在西式醫科學校里受過教育的人，對那種學校來說，達爾文主義是宇宙論的基石，而死亡就是落敗。[[179]](#_179_25)在這一意識模式里，宇宙再不會旋轉，只是不停地向上、向前運動，死亡不再是“回歸”，而是一個人的真正終結。蘇多摩于是完全曝露在演進的西方思想的根本分裂下——歷史是物種的發展，人生是個人的衰朽。回憶錄顯示，他不僅受到“新思潮”（帶著這個詞組里上緊了彈簧的全部反諷）的影響，還在兩種形若胡越的時間觀念內來理解它，由此在內心發現了一個記錄自我（recording self）。

在回憶錄的中心部分，蘇多摩的生活移向與今天當作民族史的東西的交匯點，即至善社的創建。蘇多摩敘述他本人的生活，首先是在格貝他外祖父家里度過的樂融融的六年時光。這部分刻畫了兩相映襯的主題：村莊生活的基本和諧，蘇多摩自己在這種生活里的討人嫌的破壞行為。對村莊生活基本和諧的表達，不是像后來的許多印尼民族主義領袖描繪它的那樣子，發表一些關于那種和諧及其意識形態和文化基礎的聲明。相反地，它顯現出來的方式既具有爪哇的典型特色，又極似印尼最偉大作家普拉姆迪亞的作品。以下是蘇多摩對村里一場盛會的描寫：

sambatan（向人求助以實施某項頗費人手的工程）的時間到了，一場大型的招待會就在我外祖父家的前庭（pendhapa）舉行。很多人在那兒用餐，所以偌大的前庭滿是人。廚房里也滿是人，忙著給那些正在吃飯的人服務。sambatan常在農忙時舉行。期間，稻田里滿心歡喜的村民們熱火朝天。幾十個人一起耕田或耙地。“嗬，嗬，嗬”或“駕，駕，駕”的吆喝公牛或水牛的聲音，不斷地此起彼伏。那些勞作的人們唱著丹邦（tembang）歌和烏蘭—烏蘭（uran-uran）歌，[[180]](#_180_25)使觀者和聽者心里洋溢著歡樂。

這種歡快幸福感染的氛圍，并非只有人類才會被它吸引，才能體驗到它。仿佛公牛和水牛也都分享了這份衷心的喜悅，分享了那悅耳的、興奮的丹邦和烏蘭—烏蘭歌的誘人聲音。緩緩地、步履穩健地、一步一步地，公牛和水牛向前走著，拖著犁和耙，反芻著。有時候，它們受了落在身上亂爬的蒼蠅的刺激，左右搖晃著長角的頭，還扇動著尾巴。聽到鞭子的噼啪聲，雖然蒼蠅纏擾不休，公牛和水牛繼續往前走，往前走，忠于職守，盡心成事。看到這樣一幕祥和景象，誰能在心里不同享那種新鮮的鎮靜從容？此時此刻，一切都是那么定心怡神。在這世上，還能冀望或希求什么更多的東西嗎？也許由于這種感受，由于自然和生物的安寧和諧，農夫們發現很難改變他們的本性，熱愛這份寧靜安詳的本性。11點左右，收工了，這時在前庭里，飯盤子、菜碟子、水罐子一排排擺好，等著那些要來就餐的人們光臨。吵吵嚷嚷的聲音傳來了，那是人們正往前庭趕來……我常常坐在前庭某個人的大腿上，面對裝滿蔞葉和煙草的各種竹盤子、木盆子，歡天喜地的，因為我正聽著那些在填飽肚皮的人講笑話。每個人吃飽喝足后，他們一個接一個地來到我那兒，領受他們的份額——一卷蔞葉，還有配料和煙草。認識我的人，或者膽子大的，一臉親切，笑嘻嘻地，會來撫弄此處不便提及的我身體某部位，逗我玩。誰會不覺得快樂，誰會不感到一種愿望，要滿懷摯愛，同那些農人結為一體？[[181]](#_181_25)

我的玩伴是沙迪敏（Sadimin）和真哥（Tjengèk），那時是小伙子。他們吹著長笛，一起照看我。真哥是個盲人男孩，但是好像他從不憂愁，老是樂呵呵的，開著玩笑。只是當他長笛吹響的時候，那聲音讓人悚然，又動人心魄，似乎在希望某種永遠實現不了的希望。[[182]](#_182_25)

關于這些描述，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它們充斥著聲音（sound）而非言語（words）。言語可能提到了，例如說到真哥的玩笑話，但我們對它們的內容一無所知。不必發出言語，除非是那些沒有含意的言語，[[183]](#_183_25)因為愉悅（以及真哥的痛苦）的感覺源于純粹的聲音。和諧的意象恰好是靠聲音和意義間天衣無縫的融合。（這種和諧只是被成年蘇多摩“敗壞”了，他通過寫下言語，試圖抓住有待抓住卻不可言傳的東西。）

與此相對，蘇多摩用毫不客氣的語言描述了他童年時代的自我。他嬌生慣養，可以隨意擺布他的外祖父母，喜歡向他們怨訴他的舅舅和姨媽們，然后看著后者直掉眼淚。[[184]](#_184_25)“我覺得自己淘氣透頂，像國王似的行動，想怎樣就怎樣地……對待和我有關系的人。”[[185]](#_185_23)后來他上學了，“花錢無度，趾高氣揚，還很得意我可以打著買書或買夾克的幌子，從父母那里哄來額外的錢；其實這些錢拿來招待我的朋友或別的什么人了，如果我偶爾會去吃點小吃的話。”[[186]](#_186_23)他愛打架，疏于學業，經常考試作弊。[[187]](#_187_23)他妒忌弟弟，覺得父母更偏愛弟弟。有一回，他感到被這種歧視傷透了心，騎馬來到樹林子里，又憤怒又自憐地嚎啕大哭。[[188]](#_188_23)他還慣于偷竊。[[189]](#_189_23)回顧起來，他童年的性格中，只有一個方面是他贊賞的——嫉視不公，愿意為之一戰。[[190]](#_190_23)但是總體而言，我們獲得了這樣一個人的清晰寫照，他有著爪哇人極為不齒的品性，也極不像他的先輩們，后者被以不同方式描述為真誠、勤勞、有遠見、負責任和“深摯”的人。我們不必懷疑，這里有些是事實，蘇多摩的確是個寵壞了的討厭小孩。然而有趣的是，他如此強調他干的壞事。[[191]](#_191_23)后面我們將明顯看到，中心意思確實不是這個“人”蘇多摩從淘氣的孩子成長為受人愛戴的民族領袖。

先已提到過，蘇多摩在進入STOVIA之前，被送到邦義爾的一家荷語小學讀書。在邦義爾期間，他和一位舅父住在一起。從生命的這段時光里，他給我們提供了兩則重要回憶。第一則是他從舅父那里學到的東西，他用非常奇怪的方式把舅父介紹給讀者。蘇多摩寫道：

［他］這個人，吃喝的規矩古怪（strange）得很，更不用說睡覺的規矩了……［他］極少像常人那樣吃飯，睡覺呢，主要在地板中央，在椅子上。所以，我在皈依伊斯蘭教［diselamkan——行了割禮］以后，因了他的教訓，也羞于吃得全飽。那時候我常常一天只吃一頓，而且提防著別太飽。照我舅舅的教誨，一個人要是發現自己正在吃美味可口的飯菜，就應當停箸，別再吃下去了。還有，每天晚上我必須到戶外散步，一晚上起碼兩次，他要求我學習如何掌控［berkuasa］我的思想過程。思想正像我自己心里的欲求那樣，務必要給它指明方向。為了這個目標，每天晚上我都得帶著寧靜的心凝望西方、東方、北方、南方，同時天與地也不會遺漏。那時候，我沒有完全理解這一切的目的。但如果我不盡這種義務，我的思想似乎就是不純的，迷亂的；而向前、后、左、右、上、下凝視的這種行為，將給我的內心帶來素凈的鮮活。[[192]](#_192_23)

這段話不同尋常的地方不是舅父的行為，對埋頭于kebatinan（神秘主義）文化的冥想實踐的一個爪哇普里亞伊來說，那種行為太平常了。相反，異常之處在于蘇多摩竟然會把那種行為說成是古怪的——然后接著表示它成了他的第二天性。我揣想，我們要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古怪”這個詞：舅父的行為在少年蘇多摩眼里顯出的古怪，他那時“還不是爪哇人”；新的“觀察自我”在記錄內在自我（batin）的久遠經驗時感到的古怪。

蘇多摩的邦義爾歲月第二個有意思的方面，是他談起的在他那所精英小學里的活動：“我的老師及荷蘭同學從未羞辱過我——事情完全相反。可是如果我聽見有人對其他爪哇學生說侮辱性語言，比如penthol[[193]](#_193_23)或者‘爪哇人’——我那聽著這話的耳朵就起火了。而且如果有什么不公正的［tidak adil］情境，我也會出頭，這樣我就常常跟那所學校的孩子們打架。我從沒贏過，因為荷蘭學生比我的朋友們高大強壯，他們會輕輕松松把我打趴下。”[[194]](#_194_21)這種敘述很切合實情。但在回憶錄里這是初次，蘇多摩正面地談到自己，縱然帶著點嘲弄。讀者在前面的段落里已經獲悉，蘇多摩父親的性格正是心系公正（keadilan）。[[195]](#_195_21)因而我們可以說，年輕的蘇多摩開始長得越來越像他先輩的品質了。但是他也主動表示荷蘭教師和同學沒有欺負他；“事情完全相反。”須明白這不是自夸荷蘭人對他的社會接受性，[[196]](#_196_21)而是以此說明爭取公正的斗爭必須無涉于個人利益（pamrih），[[197]](#_197_21)這很要緊。因為在爪哇傳統里，一個人尋求公正不是為了自己，而要出于對他的darma（義務，責任）的信守。因而這個故事就有了雙重意義：它既表現了對殖民地社會種族不公的日漸增長的（社會學）意識——從中發展起來一種逐步壯大的民族主義運動；也表現了一個塑造中的“深摯的”爪哇人。

敘述過他與荷蘭學童的沖突之后，蘇多摩描述了他返回格貝的假期。回到外祖父家里“就是生活在調皮搗蛋找樂子的自由里。在那兒我受到嬌慣和表揚，直至我覺得自己是個真正了不起的小孩”。[[198]](#_198_21)然而他緊接著記載的事，卻是他對雷電的日常恐懼。暴風雨來臨時，他會跑去把頭埋在外祖母的腿上。但這時他的外祖父會抓住他的手，“輕言細語地”對他說：Lé,kowé aja wedi karo bledhèg.Kowé rak turunan Ki Ageng Séla,mengko bledhèg rak wedi dhéwé.蘇多摩把這話給他的非爪哇語讀者翻譯成這樣：“孩子，[[199]](#_199_21)別怕閃電。難道你不是基·阿庚·斯拉的子孫嗎？想必閃電將慢慢怕你。”蘇多摩最后說：“由于他話里的堅定信念，漸漸地我擺脫了對雷電的恐懼，不管它們的轟鳴有多嚇人。”[[200]](#_200_21)

這段話緊隨在蘇多摩敗在荷蘭兒童手下的記敘之后，很難不從中看出，它遮遮掩掩地暗示了印尼人廣泛地反對荷蘭人的斗爭——“不管它們的轟鳴有多嚇人”。但是此外，我們可以注意到，這里的勇氣來自記憶——對一個人出身的記憶。往回長才長得大。

接下來，在題為“我為什么聽從了父親的愿望”一節里，[[201]](#_201_21)蘇多摩轉向他成為STOVIA一名學生的原因。這里，他描述了他父親和外祖父就他的前途問題發生的激烈沖突。外祖父拼命想要蘇多摩做大官。他素來敦促這個孩子說，假如他父親試圖送他進醫科學校的話，一定要拒絕。他的父親深為土著仕宦生活的挫折與屈辱所苦，寧愿兒子不涉此道。蘇多摩為什么聽隨父親意愿呢？他給我們講了兩條理由，令人略感吃驚的是，他還告訴我們各條理由是在幾歲上生效的。八歲的時候，他天真地被STOVIA學生的白色校服打動了，那看起來比政府官員穿的黑衣神氣多了。第二個理由是在他大約十三歲時“發生”的：

那時候我父親是草埔（Glodok）的副韋達羅，有一次剛巧我在家。清晨一大早我父親就得坐bèndi[[202]](#_202_21)去馬格丹（Magetan）。凌晨四點鐘左右，我母親已經坐在炭火前，烤制早餐面包，我和弟弟也醒了。我們看見父親從他房里出來，已經穿好官服，到我們面前站定，抱怨身為普里亞伊卻為地方土著政府效命的人的地位［derajat］……因為我父親一直抱怨啊抱怨啊，我就問他：“爸爸，那你干嘛做這工作呢？”我的問題立即得到回答：“要是我不做這工作，你們大家還能吃上面包和黃油嗎？”[[203]](#_203_21)korban（受難者）這個詞和它的意思我還懵然不解，但在我內心深處的自我［batin］里，我傾聽到它，我萬分敬仰我的父親。“我對你們只有一個要求，”我父親接著說，“我要我的孩子們長大后誰也別做地方土著政府的普里亞伊。”[[204]](#_204_21)

在這段話里，我們依然看見蘇多摩是個“還懵然不解”（belum mengerti）的孩子，或許人們會注意到，“還懵然不解”這個短語他從未用在后來接受的任何西式教導上面。但是這兒的敘述比事件更為異乎尋常。因為雖然我們可以肯定，“歷史地看”，蘇多摩的父親是用爪哇語跟兒子說話的，可是在這里他的言語呈現為印尼語。[[205]](#_205_21)我們還注意到，蘇多摩被korban這個詞迷住了，而它并沒有在他父親講的句子里出現！某種意義上說，發生了什么事一清二楚。在他的記憶里，蘇多摩一定在回想父親用爪哇語講的話，其中極有可能包含ngurban這個詞。這是爪哇語中道德與情感色彩濃厚的單詞之一，意思是為了實現某個偉大目標，或者幫助身陷困境的什么人，而隱忍待發。它恰好應和了蘇多摩在邦義爾的那位舅父的教誨。[[206]](#_206_21)于是少年蘇多摩就對一個他還不懂的詞語刻骨銘心，他還沒“意識”到它，但對它的領悟以后將使他“成為爪哇人”。然而此處的奇異之事是語際滑落（interlingual slippage）。因為這句印尼話幾乎不大顯出暗含著的道義交換（moral exchange）的意味，那種道義交換的確主要是在爪哇語的語境下才有意義。如果說蘇多摩前面把他外祖父的話譯成了印尼語，那么現在，也許不由自主地，他掉轉了方向，從印尼語回溯爪哇語。或許這就是為什么蘇多摩對他領會的訓誡語焉不詳。事情可能是，蘇多摩有點理解他父親所做的犧牲，出于感恩和敬仰，同意去上醫科學校，而不做“地方土著政府的普里亞伊”。或者也有可能，ngurban觀念的提點——為了某種更高目標，給思想和欲望指點方向——導致他逼迫自己進入一種制度，它將永遠把他摒于舊爪哇官僚精英和傳統地位等級體系之外。

接下來的部分將我們帶到STOVIA。作者的尊容——骯臟，淘氣，懶惰，揮霍——更加繪影繪形。他什么都吊兒郎當，因為假如他被開除了，他的外祖父會很高興，而他的父母不管出什么事都會支持他的。[[207]](#_207_21)我們對那西化的教室里發生了什么幾乎一無所知，只知道一些惡作劇。但是這部分的結尾是這些言深意遠的話：“即使我依舊揮霍、倔強、頑皮，但在我父親去往永恒時間之前約一年，僅僅在那時我才明白，我不用抄襲（nurun）也可以成就學業，因此我漸漸有了這種覺悟（kesadaran）：靠抄襲學習是學習的墮落。”[[208]](#_208_21)

初看之下，這似乎分外簡單明了：一個懶惰的男孩慢慢懂得作弊不好，幼稚傻氣。但我認為不止于此。蘇多摩的語言，特別是nurun和kesadaran這兩個詞，提示了兩種不同的復雜性。他先使用印尼語單詞meniru（模仿，抄襲），然后在括號里加上爪哇語詞源nurun，由此遞給我們一個暗示。[[209]](#_209_21)一方面，這看似清楚地影射了“模仿”西方的現代化過程的全盤問題，那些問題困擾了蘇多摩一代的印尼領導人。[[210]](#_210_21)蘇多摩1930年代的讀者無疑會在整個殖民經驗的背景下來理解“靠抄襲學習是學習的墮落”這句話。kesadaran是早期民族主義思想的關鍵詞，它被用于這個小小的課堂插曲，這表明了該敘述更廣泛的意義。另一方面，我們應當記得turun（傳宗）觀念在爪哇文化中的重要性。做一個真正的turunan（后代）意味著不拋棄先祖的性格或品質。模仿，就其趨近這種性格的意義而言，對爪哇道德觀的系譜至關重要。[[211]](#_211_21)我們已經看到，蘇多摩迄今為止所受教育的最要緊部分，就是他以外祖父、舅父或父親為榜樣，學著模仿的那些時候。因此上邊引的這段話，給了我們一種意味深長的印象：他的雙重教育南轅北轍，其象征就是“模仿”在荷蘭語和爪哇語中的對立意義。在荷蘭教室里，“不用抄襲”表示“抄襲”了荷蘭文化，易言之即認真吸納了它的價值觀；然而這意味著不模仿爪哇傳統，后者贊美模仿。但是它也預示了民族主義的解決辦法——憑借不模仿先祖來模仿他們。憑借成為好印尼人來做好爪哇人。

我們終于來到蘇多摩回憶錄的道義中心，這部分他稱之為“性格的改變”［Perobahan Perangai］。[[212]](#_212_21)它的內容簡單卻出人意料，而且實際上，大概為了特別強調，還講了兩遍。蘇多摩已經習慣了抄襲他那些更用功的同學的作業。然后有一天，一位老師問了全班兩個問題，一個是代數題，一個是物理題。蘇多摩看到誰都沒準備好回答，即便最聰明的也沒有，他就舉起手來，不過是想搞笑，卻發現他不知怎的竟知道正確答案，“讓自己大吃一驚”。這種突如其來的能力發生在這樣一種有趣的背景下：“學校校長在我的班上建立了一個新制度，堅持應當自始至終教授數學，以便學生們能夠持續不斷地使用他們的智力……讀者須知，我們班級到目前為止一直教的是只要有丁點智力（intellect）就能聽懂的課程，假如這人記性［geheugen］夠用的話。”[[213]](#_213_21)在這敘述里，教學法的改變同蘇多摩的發現聯系起來：“‘嘿，’我想，‘這么說我也有腦子了。’”換言之，一旦荷蘭課程停止死記硬背的學習和模仿，蘇多摩就開始覺察到自己的品質和能力。[[214]](#_214_21)“從那時起，我漸漸變得羞于再抄襲［nurun］。”[[215]](#_215_21)正是隨著這種對羞恥的覺悟（某種程度上是“成為爪哇人”，不過是在西方課堂的環境里），蘇多摩表明他的性格已經改變了，這樣他馬上就可以寫道：“僅僅是在我父親離我而去的大約兩年前，他的表情上才顯出他對我抱有希望。這可以理解，因為那時我的性格開始改變了。從童年一直到當時，我的生活始終仰賴他人。”[[216]](#_216_21)

大致在此時，他與父親的關系特征也開始變化。他不再是只有要錢的時候才寫信回家，而是跟父親通信，討論他弟弟妹妹的正確教育問題。“我父親開始有些尊重我了，我則貼近了他的內心。在這個幸福的狀態下，憧憬著家族興旺的美好前景，在一個理想瑰麗的時刻［zaman］，突然之間，萬萬沒有想到，在1907年7月28日，一封電報發來，告知我父親的死訊。”[[217]](#_217_21)

有鑒于蘇多摩先前說到他和父親的關系一點也不親近，[[218]](#_208_21)對他喪考翌日的情感描述可能看起來相當奇怪。

誰能同情我那時天降大難？[[219]](#_219_19)只有這個世上那些跟我同病相憐的人了。哪怕在那時候，更甭提現在了，我都無以言表我心中的憂思和灰暗；我最親近的朋友，雖然他們分擔了我的悲傷，卻也寬慰不了我。我想到了我母親的命運，我想到了隨著父親的去世，我那些弟弟妹妹的命運。就好像他們失去了保護傘，失去了依靠的支柱，失去了一切，他們發展所需的全部希望和根基。我們做錯什么了嗎？天主公正嗎？……那時候父親的逝世在我包含了這種意義：仿佛我遭到了懲罰，始料未及又無比嚴厲，它意味著喪失尊嚴，屈辱，和其余種種……我覺得人們改變了對我和我家的態度。恭敬之辭，慷慨之舉，甘言蜜語，還有我們一些熟人的和藹可親，都顯得并非真心實意，不過是一種外在的虛飾——而這是我父親去世的影響所致。[[220]](#_220_19)

前來安慰這家人的人們常常偷他父親的財物，閑話他的債務，猜測他給孩子們留下多少財產。“因此我感到煩惱和痛苦，我感到很丟臉，我感到榮譽掃地，我感到我活得像個被剝得赤條條的人，當著眾人一絲不掛……在這痛不欲生的時刻，看起來似乎陽光失色的當口，在這個時候，只有我的外祖父和舅父減輕我的負擔。”[[221]](#_221_19)在學校，他舉止大變：不再揮霍、淘氣和懶惰——以致他和朋友間裂開了一道鴻溝。“這樣我的生活改變了。夜里，是星星和月亮做我的朋友，幫助我凝神聚氣［mengheningkan cipta］，如此我才能作為長子成功實現我的責任……”[[222]](#_222_19)“我的思想和情感變得脫離了它們的環境，追尋它們生活的另一條航線，向著另一個方向進發，那將帶給它們繁花似錦的機會。”[[223]](#_223_19)

蘇多摩如今成了這個受損家庭的一家之長，不得不承擔起必要的責任。然而在他對那個時期的描述中，有趣的是他對外界（lahir）和內心（batin）的新感覺，以及他自稱親自體驗到的與世界的分離。[[224]](#_224_19)這種分離鋪好了道路，通向一個結局：它不是在回憶錄里描述成那般模樣，而是在上文所引的段落里預示出來。因為蘇多摩而今想要“迎合”他父親，履行家庭和傳統的道義責任。[[225]](#_225_19)但是他要靠“找到另一個方向”來做到這一點。

五個月以后，1907年底雨季開始時，瓦希丁醫生（Dr.Wahidin Soedirohoesodo）抵達巴達維亞暫作休整，長久以來他在募資，幫助有才智的年輕爪哇人完成西方教育。逗留期間，他去STOVIA向學生們演講。以下是蘇多摩如何描寫那次相會的，自那以后沒幾個月至善社就誕生了：

同瓦希丁醫生的相會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有著安詳的面容、睿智的舉止和談吐，還有解釋他的理想時的堅定信念。他抑揚頓挫而文靜的（rustig）［爪哇語，sarèn］嗓音，讓我的思想和精神為之一寬，帶給我新的理想和一個新世界，它們似乎能慰藉我受傷的心靈。跟瓦希丁醫生談話，聆聽他的志向……消除了為我自己的私人需要所限的那一切狹隘感情和目標。這個人（one）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這個人感到自己興奮不已，震顫遍及通身骨肉，這個人視野開闊了，感情高尚［halus］了，理想優美了……總之，這個人感受到了他在世上的最高義務。[[226]](#_226_19)

回憶錄的自傳部分到這里就結束了，此時蘇多摩剛剛十九歲，至善社尚未成立。書的余下部分記錄了蘇多摩的朋友、仆人，尤其是妻子的功勞。從這些書頁里人們可以推斷他往后生活的某些東西，但那不是書寫的中心了。在蘇多摩看來，我想，本質的東西都說過了。

假如他的生活——在他自己眼中——有一個線性的軌跡，假如它在某種意義上與世界的趨向平行并進，那么1907—1908年間的政治事件本應只是個開頭。但我認為如今應當明晰了，他的感知到的生命運動別是一種形態，政治（就我們理解的含義而言）成分不如道德成分多。為了更清楚地詳述這一形態，或許有益的做法是，求助于蘇多摩本人在別處使用的一個措詞——lelakon，生命中的指定進程，介于darma（義務）和命運間的某處。因為1907—1908年的事件——喪父和遇到瓦希丁醫生，離家和找到精神導師，反映了一個爪哇男人的生活過渡：從kesenangan（享樂）到kewajiban（盡責），從kenakalan（調皮）到kemuliaan（優異），從模仿到樹立榜樣。[[227]](#_227_19)

在這個連接點上，以下兩者間的奇特接合是再突出不過了：一面是巨大的、幾乎渾身奔涌的激情，亦即蘇多摩所記錄的他與瓦希丁醫生相會因而眼界大開的眩暈感；另一面是他展現的醫生本人的形象。我們不僅確實瞥見了一個極其傳統——雖然剛毅——的爪哇紳士，[[228]](#_228_19)還被帶回一個統一的世界，那里視覺、聲音和意義重歸一致了。“平靜”、“抑揚頓挫”、“安詳”，是蘇多摩用來描述瓦希丁醫生聲音和形貌的文辭，他早先已用于描述格貝的鄉村生活，舊時代的社交圈子。那時他“還不是爪哇人”，是一個搗亂分子。而今成了爪哇人，他和先輩們團圓了。

然而雖然他找到了他的asal（出身），他也不是在拿一個爪哇人成長的簡單故事款待我們。因為傳統的瓦希丁醫生給年輕的蘇多摩帶去了“新理想和新世界”。這些新理想、這個新世界是什么？是范尼爾寫到的西方科學和理性主義嗎？在這些事情上，蘇多摩所受的教育早就比那位老醫生高明多了。他在ELS和STOVIA學過多年，還諳熟荷蘭語，所以蘇多摩比他的啟蒙者遠為接近西方人構想的“新世界”。我寧愿相信，蘇多摩——興許還有STOVIA環境中的其他人——在瓦希丁身上覺察到一個榜樣：如何不必模仿就能步入殖民主義的西方世界；在更深層次上，如何不模仿一個人的先祖卻又模仿了他們，如何在一個人不復深潛于爪哇傳統中過活的時候又不拋棄這一傳統，如何讓觀察自我與內心自我協調一致。龍加瓦西塔已經用無力回天的國王之至善這個殘酷的逆喻，想象過黑暗之時。ratu utama（至善的國王），光榮爪哇的標志，不再可信了。然而瓦希丁表明，把形容詞和名詞分開是行得通的，甚至是絕對必要的。一旦分開，該形容詞的意義重心就從我們或可稱之為政治效能的東西轉移到倫理承諾（ethical commitment）：總而言之，轉移到一種趨于完善的道德能力（budi utama）。這種倫理承諾是任何人都可承擔的一種責任——不會排除爪哇青少年，特別是自己的名字就由su（卓越）和utama（完善）合成的這個人。[[229]](#_229_19)

但是承諾什么？在古老的爪哇傳統中，國王的至善意味著對國王權力的承諾。集中的權力帶來了共同體的豐產、興旺與和諧。社會安樂是權力對其自身的承諾的副產品。[[230]](#_230_19)然而一旦王權證明已軟弱無能，副產品就能迅速變成中心鵠的。

如果我們看看蘇多摩終生與之為伍的那些觀念，就會發現一個詞匯表和一種始終如一的風格。比如，蘇多摩幾乎全然不用以西方社會學為基礎的政治概念。[[231]](#_231_19)馬克思的那些范疇完全缺席，而它們對蘇加諾那整整一代人，從保守的到激進的成員，都是政治語言的中心。盡管蘇加諾和他的同時代人談到了Indonesia Merdéka（自由印尼），蘇多摩卻往往說起他的理想是Indonesia Mulia（光榮的，或完善的印尼）。Merdéka，自由，當然蘊含了激進得多、政治性強得多的目標。它是印尼人——或“革命的馬來人”獨享榮譽的一句口號，[[232]](#_232_19)在爪哇人中卻沒什么反響。Mulia則恰恰相反。上文（第98頁）引用的回憶錄那段話里，我們可以看到與mulia天生相配的東西，它似乎正是kemerdékaan（自由）的反面：kewajiban，或者義務。

正如謝勒（Savitri Scherer）微妙表明的那樣，蘇多摩將完善的印尼比作一支佳美蘭（gamelan）樂隊，其中每人盡量完美地演奏一種分配給他的樂器。從履行的音樂義務的相互紐結中，佳美蘭音調的絢爛（kemuliaan）實現了。[[233]](#_233_19)演奏一個人的樂器，就是履行一個人的lelakon，實踐一個人繼承而得或落到他的命運中的那些責任。蘇多摩振舉他的社會的這個想法，就是要使所有樂器都盡量完美地演奏成為可行。農民和工人必須有飯吃，被關愛，受教育，讓他們成為好農民、好工人，不忘他們的義務并能履行之。[[234]](#_234_19)1930年代，令蘇多摩的有些年輕的民族主義同仁很反感的是，他向通敵的貴族和普里亞伊吁求支持，所用的辦法是力勸他們“記住他們的出身”，換句話說，承受他們傳統所賦予的道德義務。[[235]](#_235_19)

因此我們思考蘇多摩的民族主義使命，也許可以參照一種音樂的明喻，這牽涉到將舊曲子系統地變調成新的基調，不同的音階，和改變了的配器法。回憶錄提供了這一點的一些明例。他的舅父在爪哇風格的自家里冥想，蘇多摩則在西式的STOVIA里冥想。他的外祖父在格貝創造了一個“有效的正義”體系，蘇多摩一輩子都在為誕生中的印尼尋覓一種有效的正義。[[236]](#_236_19)他的父親極力要有尊嚴地活在殖民地官僚機構的鎖鏈中，蘇多摩作為一個受外國人培養的醫生亦如是。他的先祖們——如他所描述的，認為婚姻是爪哇人世界里的連帶關系（solidarity）的鞏固；而蘇多摩呢，就其對他荷蘭妻子的感人描寫來看，似乎也是以同樣的眼光看待他自己的婚姻。[[237]](#_237_19)但是變調的中心意象是Budi Utomo（至善社），蘇多摩因創立該組織而青史留名。因為Budi Utomo在爪哇調性和印尼調性里都是完全可識別的。[[238]](#_238_19)它橫跨兩種語言，既前瞻又回顧，象征著一種投入的努力——下一代人可能會說是斗爭[[239]](#_239_19)，去努力實踐久存于記憶和想象中的某種東西。

在至善社歲月的出版物中彌漫著的光明、黎明和太陽的意象，既是爪哇和印尼歷史進程特有的，也是復活與新生的更廣泛象征。[[240]](#_240_19)它們是在人的生活似乎與世協進的時刻幻想出來的意象。當它們在時代進步觀念影響很大的狀況下出現時，我們可以預料，它們將與青年的形象聯系在一起。至善社的早期歲月顯然就是這樣。生命環節與線性歷史間的聯結有多密切，可以從蘇多摩最親密的朋友古納萬的一則言論來判斷，他說至善社的小伙子們的目標，是要“一直做發動機，從后面推動年長者”。[[241]](#_241_19)這一警句不僅利用了一個無疑是二十世紀的工業隱喻，而且在爪哇語境下，猛地顛倒了這句古老的教學箴言：tut wuri andayani——老馭少，完美到。[[242]](#_242_19)它是屬于青年的鋒利、激動的表達。

我們在蘇多摩回憶錄里找不到類似的東西。光明和黎明的意象在里邊稀薄得很。全書的語調是陰郁的，集思于死而非生。如果我們自問何以竟至如此，我想答案是簡單明了的。到1934年，蘇多摩雖然政治成就斐然，[[243]](#_243_19)卻已不再是民族主義運動的先鋒了。作為他那時代的要人，也作為爪哇人，他能夠洞曉，該運動的發展與他本人的生命軌跡正分道揚鑣。他的妻子已經回歸永恒時間了，他也正準備著不久以后隨她而去。是到了考慮遺產（warisan）的時候了，回憶錄所表現的其實就是一件遺產。

龍加瓦西塔傷悼“再不見圣哲的典范”。他的意思是說，老典范不中用了，所以不能流傳下去。蘇多摩（和他那一代人）重申了他們的出身，從而找到一個可以傳諸子孫的典范，這是他們無聲的勝利。

## 5 專業夢想

馬克·吐溫以其一貫風格說道：“所謂經典，就是人人希望已經讀過，卻無人想讀的東西。”傳統爪哇文學晚期的主要作品中，很少有比《真蒂尼》（Serat Centhini）更符合這句話了。[[244]](#_244_19)出于禮節，人們說它是名著，更有趣地（如我們將要看到的），說它是爪哇文化的一部百科全書，可它還從來沒有全文出版過。僅有的有分量的排印本，是一種用羅馬字印刷的八卷本，出版于七十五年前。[[245]](#_245_19)除了少許顯著的例外，西方學者和現代爪哇學者都忽視了它。[[246]](#_246_19)當人們沒有無視它的時候，主要是在它里邊搜尋有關爪哇藝術和宗教傳統的豐富資料。但是該書也標志著爪哇政治文化的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如果《真蒂尼》可以說有一個故事，它其實就是這么回事：1625年，信仰伊斯蘭教的繁華的東爪哇港口王國吉里（Giri），遭到中爪哇馬打蘭王國素丹阿貢（Agung）軍隊的血洗，之后，被征服的統治者的三個孩子（兩男一女）被迫逃亡活命。他們受到馬打蘭密探的追捕，失散了：大兒子查嬴格勒斯米（Jayèngresmi，后來以阿莽拉加王子［Sèh Amongraga］為人所知）逃往西邊，小兒子和女兒查嬴薩里和蘭璋卡普提（Jayèngsari和Rancangkapti）試圖往南方去躲避他們的追捕者。書里描寫了他們險象環生的流浪生涯，他們為了重聚，徒勞地尋找對方。然而他們卻被一個奇怪人物色博朗（Cebolang）連在一起，他最初露面時，只是阿莽拉加的小跟班，結尾的時候卻娶了蘭璋卡普提。色博朗被說成是住在蘇卡亞薩（Sokayasa）山上一位受人尊敬的圣人的獨子，但是圣人斷絕了與這個年輕人的關系，因為后者沉迷于賭博、偷盜和通奸。色博朗被逼無奈，只能靠他的機智活下來，成了一個云游四方的樂師、舞者，以及（因為缺乏更好的詞兒姑且稱之為）變戲法的人，掙得了他的口糧。

《真蒂尼》的主要人物都是亡命者或被驅逐者，居無定所，這個事實意味著它的舞臺背景跟傳統爪哇文學常見的那一種大有區別。沒有哪段情節發生在戰場上、宮廷里或都城中。馬打蘭的統治者不過是舞臺外一個不祥的、陰暗的幽靈。就大部分內容而言，書的背景是一連串村落和鄉村伊斯蘭學校（pesantrèn），男男女女的人物角色，也都是些奇阿依（kyai，傳統的伊斯蘭教的碩學之士）、桑特里（santri，他們的學生）、村首、商販、職業樂師、歌者、舞者、妓女和普通村民。這個環境及當中發生的遇合之事，讓作者有機會去繪聲繪色地描寫爪哇鄉村生活的諸多傳統層面——民間藝術、建筑、烹飪、耕作、儀式、動植物、宗教、醫藥、性行為等等，這些為《真蒂尼》贏得了舊爪哇百科全書的美譽。

### 百科全書的政治

安·庫瑪曾明確比較過爪哇和法國十八世紀主要的農村社會等級。因而她非凡地推動了這一進程：將舊爪哇歷史有意識地融入近代世界的更廣闊歷史中。[[247]](#_247_19)我相信，從她的比較延伸開去，反思一下領主—農民關系之外的階級關系，是有可為的。瞥一眼兩種百科全書，提示了一個有趣的出發點。一是我們自己的《真蒂尼》，一是狄德羅、達朗貝爾及其同人的百科全書，兩者的創作相距不到半個世紀。[[248]](#_248_19)雖然百科全書派的確預示了法國資產階級的掌權，但是他們最直接的圈子卻有著五花八門的社會出身；[[249]](#_249_19)而且，他們的《百科全書》特有的革命特征，跟歐洲其他資產階級的歷史興起并無確切的對應。因為他們的計劃，是要整理出龐大的、系統組織的方方面面知識的一個手冊，那些知識是他們那時代的職業學問家積累起來并可供其使用的。隱于其后的主導精神是敵意，不單敵視反動的成見（idées recues），也敵視成見背后的教會權威和國王權威。狄德羅和他的同人反對教會和國王的一般的（文化和政治的）權力，動員起了專門的行家里手的一個強大聯盟。實際上，這么做的目的是要表明，幾乎在任何主題上——從磁力的性質到語言的起源，平民或非神職的博學者通常都比公認的社會和宗教大人物“知曉得多”。就此而言，《百科全書》可以被有益地理解成一件武器，用在一個專業的、世俗的知識階層與舊制度的整個統治權（hegemony）結構之間的斗爭上。

于是我想，可以論證《真蒂尼》反映了一種相似的主導精神，盡管處于一個迥然相異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環境里。我們或可指明這首長詩的三大顯著的一般特點，由此開始這一論證。第一點，它濃密地布滿了看起來極像一本奇特百科全書詞條的東西。[[250]](#_250_19)比如有許多段落，其中有的有好幾節長，它們純粹是由種種清單構成的：爪哇甜食、可吃的淡水魚、托梁和榫頭、神學術語、音樂作品、山脈名稱、服飾、舞蹈，等等。這些段落不存在有條理的次序，讀來像是沒按字母表順序排列的、富有詩意的黃頁。而且很難讓它們合乎爪哇詩歌的傳統美學，那些詩歌幾乎總是照例要加以詠唱的。（英語里與此相似的或許是這樣一首歌，它由四十五個品牌的早餐麥片的名稱組成，不帶諷刺意味。）因此，人們獲得了鮮明的感覺：如此這般的段落，其實更多是想供人閱讀（查閱？）而非背誦的。換句話說，如果爪哇讀者（不是聽眾）想要查看所有不同類型的爪哇餅干或佳美蘭樂曲，他可以求助于《真蒂尼》來查出它們。這一切學問（ngèlmu）的源頭，不是教士，不是圣賢，不是貴族，而是內行的專業人士和編纂者。

《真蒂尼》的第二個顯著特點是文中對待諸如超自然存在與附屬于國王和朝廷的圣物這類話題的方式。因為該書處理它們，和處理魚、植物或食品的方式一樣，就事論事，博聞廣記。譬如，第85篇第4—5節給讀者提供了不帶感情色彩的一份目錄，其中包含了二十種典型的爪哇鬼怪和妖精，它不是按照字母表順序，也不是以恐怖程度為序編排的，而只是要符合威朗隆（Wirangrong）韻的韻律要求。

第三點，明顯缺乏對統治階級成員甚或別的任何人所施展的kasektèn（魔力）的描寫。[[251]](#_251_19)如果我們把《真蒂尼》與哇揚布爾哇（wayang purwa，傳統皮影戲）的故事，或者與《爪哇史記》這樣的王室編年史做一比較，這種缺乏的意義就顯而易見了。在哇揚戲故事里，貴族主人公默念的時候，天為之顫抖，海為之翻騰；他們在戰斗中射出的箭化為成千上萬的巨蛇或惡魔。一個主人公可能翩翩飛過天空，另一個主人公可能同時讓天上的一打仙女懷孕；還有一個潛到海洋深處，鉆進一位神祇的耳朵里，那神祇卻是主人公本人的微型變體。我們在編年史中可以發現，有一些神奇的光球降落到命定要當王的那些人頭上，還有，與琪都皇后（Nyai Lara Kidul）——全能的南海娘娘的神秘交感，遍及一個王朝的相繼各代，諸如此類。從《真蒂尼》對所有這些奇跡的否定里，很難不看到一種審慎的吉本式的搗毀圣像行動。

我淡淡勾畫的這些特色，其社會基礎可能是什么呢？跟十八世紀法國相比較，從中可以弄清什么東西嗎？有兩點似乎特別值得記在心上。第一，狄德羅和他的同人（confrères）在他們本人眼里是有技能的專業人士，亦即致力于掌握和發展特定類型知識的男人和女人。第二，由于印刷資本主義已經從十五世紀末開始在歐洲興起，作家在更大范圍的專業人士群體中的重要性非常之高。[[252]](#_252_19)（是故，對我們來說，代表十八世紀中葉的歐洲的，是狄德羅和伏爾泰，而不是專業的音樂家莫扎特和海頓，或者專業的畫家提埃坡羅和弗拉戈納爾。）相反，爪哇直到十九世紀晚期才遭遇印刷資本主義。這一遲到并不意味著舊爪哇缺乏一個可觀的專業人士階層，毋寧是說，既然印刷資本主義直至十九世紀下半葉才姍姍來遲，文人在這個階層里沒有任何特殊的聲望或政治地位。[[253]](#_253_19)他們身邊（而非其上）并排著各色專業人士：建筑師，他們構想、規劃和監管著爪哇無數清真寺、宮殿和堡壘的建造；木偶藝人達朗（dhalang），他們一代代地構建起皮影戲的多彩傳統；老練的樂師，他們創造了爪哇音樂類型的盛大氣派；伊斯蘭教學問許多分支的行家，更不用說還有舞者、優伶、雕刻工、鐵匠、畫匠、醫師、占星家、術士、民間植物學家、武術教師、竊賊等等。[[254]](#_254_19)這些人幾乎總是平民，但肯定不是平常的人。有的被招納去為王室宮廷和地方領主效力，尤其是如果他們知識和技能的施展需要大量人力和資金支持（比如建筑師），而只有這樣的政治和經濟權力中心才能提供那種支持的話。另一些人更喜歡行路的自由——加入到皮若所謂 zwervers en trekkers（流浪漢和跋涉者）[255]的難忘人群之中，向更大的社會市場兜售他們的專長（比如優伶和武術教師）。還有些人，像奇阿依和guru ngèlmu（傳授秘學的導師）之類，寧愿棲居在鄉野清靜之地，靠表達尊敬或驚奇的口碑為他們自己引來新手和顧客。

在十八世紀晚期，這個專家階層的規模（它占爪哇總人口的比例）尚無滿意的估計方法。[[256]](#_256_19)但是它一定遠遠大于統治階級。我們也不可能猜測到，隔行的行家們多大程度上彼此承認是同一階層的成員。有一點是清楚的：在不同程度上，他們意識到他們所知的東西、所做的事情，都是統治者所不能的。（爪哇貴族生而統治，無需發展專門化的知識，而像英國紳士一樣，采取一種專橫的業余愛好者地位。）但是由于社會聲望、經濟資源和政治權力的現行分配狀態，行家們幾乎總是被迫聽命于這些有特權的業余愛好者，而且常常賴以為生。這種普遍的服從并不表示他們不為自己的精湛技藝自豪，而僅僅表示他們被誘使隱藏或掩飾那種自豪。（有件往事我記憶猶新。1960年代初，我拜訪了梭羅的衰朽朝廷。一位年邁親王在做關于爪哇音樂特征的長篇大論，而那些同樣年邁的宮廷樂師們是怎樣正襟危坐，洗耳恭聽啊。只有當親王從視野里消失之后，嘲弄的微笑與挖苦的評論方才謹慎開始。）大規模生產的印刷語言那時尚不存在，就其本性來說，它本應是唯一的一種媒介，可以容許多樣的、個別的、專業的嘲諷形成有意識的、系統安排的聯盟。[[257]](#_257_19)

我們或可由此想到這半遮半掩的階級對立是為了知識的……“生產工具”的斗爭。它使以下雙方處于互斗地位：一方是天分高的平民，各懷獨門技藝；另一方是王室加貴族，一般化地宣稱擁有神圣權威和魔力。

### 雞奸和戲法

到目前為止我們探討了一些廣泛、一般的猜想。為了盡量使之顯得言之成理、生動明晰，現在我們轉向兩個主題，它們在對“傳統爪哇文化”的當代討論中幾乎從未涉及，卻仍然占據著《真蒂尼》——那個文化兜售最多的經典之一中的顯要位置。它們以相互反襯的方式，提供了前述初露苗頭的階級對立的異常清楚的輪廓。

在十九、二十世紀殖民地官僚和傳教士的“人類學”著作里，有一個典型的傳統主題，那就是心理陰暗地津津樂道土著無可救藥的戀童癖和同性雞奸。達雅克人、亞齊人、巴厘人、布吉人、爪哇人、巴塔克人、米南加保人，或者華人——不論這些民族在其他方面彼此差異有多大，據說他們全都強烈耽于這種惡習。[[258]](#_258_19)這個傳統主題用來表現所涉人口的原始或墮落，以及使之開化、基督化，使之在其他方面提高的緊迫需要。男風和雞奸也用來在“放蕩的”原住民和規矩的荷蘭人之間形成了極端的道德對照，后者自然帶著習慣性的恐懼看待這樣不自然的習慣。（不消說，一旦印度尼西亞成為獨立國家，說法就顛倒過來了：直到墮落的荷蘭人到場之前，這種令人憎惡的惡習在這群島上聞所未聞。）有關《真蒂尼》的好玩事情之一是，它舉出了很多例子，以絕對爪哇式的專門術語表明，男同性戀至少是多姿多彩的傳統爪哇性文化的一種不成問題的日常組成部分。（它包含了對雞奸、口交、相互手淫、多人性交和易裝癖的淋漓盡致的描寫，以及其他種種內容。異性性活動也以十分相似的方式描摹出來；《真蒂尼》就其覆蓋范圍而言簡直包羅萬象——抑或我們該說是百科全書式的？）

恰是男同性戀關系的司空見慣，使得一段特別的成對相映的雞奸情節格外給人啟發。這段情節的背景可以略述如下：因斑斑劣跡（包括多次與有夫之婦通奸）而被父親逐出家門后，色博朗當上了一個巡回演出小劇團的頭目，找到一條生路，那些演員中最要緊的人物是有點娘娘腔的年輕舞者努爾維特里（Nurwitri）。這個團體演奏各式音樂（但拿手的是受阿拉伯音樂影響的合奏，叫做德邦甘鼓樂［terbangan］），表演舞蹈，演示一系列的sulapan（我們或可姑且譯為“耍戲法”）。在旅程中，這個劇班到了達哈（Daha）的kabupatèn（地方行政中心），立即被當地的阿迪帕蒂（adipati，領主）雇去表演。這個領主陶醉于表演者們的絕技，不亞于他的眾多老婆、官吏、仆役和食客，而尤為醉心于努爾維特里——他穿著女人衣服，舞得美輪美奐。演出完畢，年輕的明星被邀去與急不可耐的阿迪帕蒂同床共枕，后者被說成是“已經徹底忘卻女人之愛”（supé langening wanita）。[[259]](#_259_19)努爾維特里識時務地順從了雞奸，靠他的調情極大地取悅主顧，主顧則在連續幾個次日早晨賞之以厚幣和昂貴服飾。幾夜歡娛之后，阿迪帕蒂的注意力轉向了更有男子氣的色博朗，命令他穿女衣跳舞。跟從前一樣，音樂和舞蹈勾起了這位大人物的性欲，他輕而易舉地讓色博朗陪他睡覺。第4章第54—60節描述了阿迪帕蒂如何雞奸色博朗，其樂幾何。劇班頭目被描繪成“床上功夫更勝努爾維特里”（lan Nurwitri kasornèki），翌日相應地受賞。[[260]](#_260_19)

至此一切正常。男人間的性關系似乎極類許多男女間的性關系。一個有錢有勢、社會地位高的老男人，享用一個有性吸引力、地位低的年輕人的“被動的”性交特權，并從金錢上或別的方面犒賞那人。然后某種離奇之事發生了，據我所知，在印尼文學中沒有可堪比擬的。阿迪帕蒂問色博朗，雞奸行為中哪一方得到的快感更強，插入者還是被插者。當色博朗說“被插者，強得多”（mungguh prabédaning rasa/asangat akèh kaoté/mirasa kang jinambu）時，那個老男人承認他意欲親身一試以斷是非。[[261]](#_261_19)于是色博朗雞奸了阿迪帕蒂。事情發生的時候，卻大不像色博朗所許諾的那樣。部分由于色博朗陰莖的尺寸，阿迪帕蒂經受了痛苦難忍的折磨。他的直腸飽受摧殘，第二天甚至無法落座。色博朗不得不在他的肛門處貼上特殊膏藥緩解痛楚。（這是《真蒂尼》中疼痛性交的唯一事例，這種東西也許暗示了該詩的“政治”。）

關于第二回合的雞奸，最直接的異乎尋常之處在于，通常的性傾斜方向（sexual declension）反轉過來了：年輕、迷人、位卑的男子被說成是支配著年老、色衰、位尊的男人。但是認真比較兩種雞奸，從中會浮現出更啟迪人的洞見。

在那第一回合交戰中，人們注意到如下細節[[262]](#_262_19)：老練的色博朗渾不費事地駕馭了阿迪帕蒂的陰莖。他被描寫成“靈活熟練地做著花樣百出的動作”（aluwes awasis ing satata taténing pratingkah）。他在被動的雞奸中的“技巧嫻熟”（baudira）遠超他的朋友努爾維特里。他其實被表現為“積極地被動”。這一對兒據說是在從事一場“甜蜜的戰斗”（adu manis）。不斷使用反身性動詞形式突出了他們活動的相互性：“他們扭成一團翻滾著，從相反方向猛挺對方”（dia-dinia dinaya-daya/dinua-dua）。阿迪帕蒂的性器被色博朗久經沙場的括約肌“擠壓著”（sinerot）。年輕男子的“反應”“不輸于”（tan wiwal dènya kiwul）他的搭檔。在有個時刻，他用畢恭畢敬的格羅摩語（krama）[[263]](#_263_19)忠告老男人“冷靜點兒”（ingkang sarèh kéwala），仿佛是說，“如果你想長于床笫之歡，就得控制自己的節奏”。他被描述成“筋疲力盡的”（lempé-lempé），但他的疲乏是一位有成就的體操運動員在艱苦訓練后的疲乏。（書中說阿迪帕蒂幾乎同樣疲倦。）黎明時分努爾維特里進房來站在這一對兒邊上，俏皮地取笑他的伙伴，這時色博朗報之以快活的咧嘴眨眼，滿不在乎地宣稱“咱倆是五十步笑百步”（aran wong wus padha déné）。最后人們看到，作者意指色博朗和努爾維特里之間串通一氣，暗算了阿迪帕蒂。色博朗“悄悄向他打個手勢”（ngeblongken），意思是說，他們成功蒙騙了這個貴族。當后者傻乎乎地自滿于他認為的對兩個年輕戲子的性支配，而放聲大笑時，這對家伙狡猾地實現了他們的目的：錢、寵愛、隨意出入這個行政中心女人們的閨房、對他們雇主的心理制服（他如今已被裝進色博朗的角色顛倒的圈套里了），還要加上性享樂。

這些細節清楚地表明：（1）色博朗被（有意）描繪成一個老于性事的行家（就這個詞的褒義來說）；（2）當他斷言被插入的一方比插入方能得到更大快感時，他不是在撒謊——前者實在得有正確的知識（ngèlmu）和經驗；（3）他從始至終保持了雄性氣質，迎合他的搭檔就好比一個優秀的拳擊手、摔跤手，或舞蹈家。沒錯，他的動作太輕盈了，阿迪帕蒂覺得那些動作像是一個艷麗婦人做出的，但是色博朗從未在心理上“屈服”于那個老男人。

顛倒過來的雞奸在幾乎每一方面都代表了一種鮮明的對比。[[264]](#_264_19)阿迪帕蒂允許年輕的冒險家用科柯語——表示親密和平等的語言層次（koko-kinoko kéwala）跟他說話，從而首先交出了他的社會和政治優勢地位。繼而他又求教知識，為此他承認了自己的無知，實際上他是向一位經驗豐富的老師請求指點。書中特地強調了色博朗陰莖令人難忘的大小，暗中對照了不曾言及的他搭檔那東西的尺寸。阿迪帕蒂被描述成“徹底服帖”（anjepluk）。更要緊的是，他明確地說已經“忘了他的男人身份”（supé priané），“感覺像個女人”（lir dyah raosing kalbu）。回想一下，當色博朗正被雞奸的時候，我們得知，在他的雞奸者眼里他似乎是個婦人，或者比婦人還好。相比于色博朗熟練接納了肛門插入，那個老男人卻表現出無力忍受最初的疼痛。“他淚流滿面，哀哀求饒”（barebel kang waspa/andruwili sesambaté）。“噢，停下……夠了……求求你，不要……拔出來……嗚……嗚……請停下”（lah uwis aja-aja//wurungena baé adhuh uwis）。的確，他如此喪失自控，竟不由自主地尿（kepoyuh）在床墊上了。色博朗心里“為之一動”（ngres tyasira），加快了他的抽插，好讓這磨難快些結束。（拿這個與色博朗早先的建議對比一下：那時他本人被雞奸，勸他的搭檔放慢一點。）最后，阿迪帕蒂“累得癱倒”（ngalumpruk marlupa capé），而那年輕人只對他覺得抱歉（sungkawa），全未提到什么疲累困乏。阿迪帕蒂自己是雞奸者的時候，他也是體力耗盡。不用說，色博朗也熟知用搗碎的草藥敷治貴族肛門的正確方法。沒有歡樂的玩笑，這一幕就收場了。

這成對相映的雞奸，每一方輪流扮演插入者和被插者的角色，表明了色博朗才是他主人的主人。在男人間性交的方方面面，他都是一個老練的行家，從不失去他的控馭自如或男人身份。事實上，恰是因為他保留了這些品質，他才能夠以明顯的誠實，堅持說從被插入中獲得的快感強于從插入中得到的。他迫使他的老爺先是接受了語言上的平等，然后接受了性屈服。另一方面，甚至當阿迪帕蒂是雞奸者的時候，他也沒有占到上風。而當他被雞奸時，他表現得像個處女，或剛入門的學生。

同時我們理當記得，《真蒂尼》一書有數千節詩，我們這里成對相映的雞奸僅占其中的一打詩節左右。我們不是在討論某種《爪哇領主查特萊的情人》。這個阿迪帕蒂并未體驗到性喚醒，對他的年輕伴侶不愛亦不恨。一旦他的直腸治愈，他能重新舒服地坐著，這個行政中心的生活又恢復如初。色博朗最終被驅逐了，但只是由于他被發現對阿迪帕蒂的小老婆們太放肆。因此很難相信這雙重雞奸的情節是什么就性論性的文句，或者具體點說是關于同性戀的文句。如果我們簡單地比照著看看變戲法，或許能更好理解它真正想說的東西。

前已提到，變戲法是《真蒂尼》中形形色色的諸多流浪者和跋涉者常備節目的基本內容。色博朗是書里首次出現的這等人物，但是他的煙火制造術，雖然讓人印象深刻，不久后將被其他老手蓋過。不管特定的“大師”是哪位，所有的戲法表演共有某些一般特征。它們始終是奇觀展示（tontonan）——就是說，變戲法的人與他的同伙是被花錢請來，在更多慶祝活動的背景下，面對觀眾展現他們的奇才。它們總是伴有音樂，時常伴有特定類型的舞蹈和舞者，也慣常伴有點燃的香煙繚繞。“變幻”（turn）的類型大致落入三類：（1）無生命的物體，在某個時段內，搞得好像有了它們自己的生命似的。比如，一個搗米杵似乎在裝它的容器內上竄下跳，一把彎刀和鐮刀又砍又劈，都沒有人力作用。[[265]](#_265_19)（2）各種物體暫時改變了性狀。例如，山尖狀的熟米飯（tumpeng），或某些樹葉，或不熟的椰子，用一個kurungan（半球形的柳條籠子）罩上；籠子拿開時，它們分別變成了花束、海龜和蛇。重新罩上籠子，然后再揭開，這些物體還原成了原先的真實形態。[266]（3）讓嚇人的事情發生，然后又一筆勾銷。這類變幻太有趣了，值得舉三個典型例子細細道來。

在有些慶祝活動期間，色博朗將他的樂師之一綁住手腳，再連同一個車輪放入柳條籠子里。[[267]](#_267_19)當其他樂師奏起基南蒂威臘特魯納（Kinanthi Wiratruna）曲子，香煙裊裊升起的時候，色博朗與他的異性裝扮的舞者圍著柳條籠子轉了七圈。拿開它時，那個被縛的樂師已解開繩索，正騎在一頭老虎的背上。旁觀者驚怖逃竄，在這過程里彼此踩踏。阿迪帕蒂穩坐不動，可是他確實問色博朗，“老虎是不是真的”（apa nora anemeni ingkang sima）。得到保證說不是的，他就吩咐年輕的魔術師“馬上打住”（yèn mengkono nuli racuten dèn-ènggal）。老虎和騎虎人回到籠子里。當籠子第二次揭開的時候，只見綁縛著的樂師和車輪，原模原樣。在另一場表演里，幾根燃著火的巨大高蹺（égrang）突然闖入站滿觀眾的觀看大廳，它們仿佛你追我趕，彼此交戰。[[268]](#_268_19)看起來好像整幢建筑快要葬身火海，幾乎人人都驚慌失措。這時現場一位見多識廣的老者告訴劇班，他們做得過頭了，必須結束表演。一個異性裝扮的舞者腰帶輕拂，就讓熾燃的高蹺頓時無影無形。然而結果是，在躲避虛幻火焰的奔逃中，有個小孩被踩踏得不省人事。[[269]](#_269_19)這下那個老者又命令魔術師救傷弭患。他們中有兩個人上前將小孩平放在一張席子上，拿一把鋒利的大刀將他身體割成兩半。男孩的母親悲痛得發狂，撲倒在尸體上，這時魔術師砍下了她的頭。驚駭莫名的觀眾相信他們目睹的一切太真實了，真實得可怕，所以他們斷定色博朗的人是惡靈附體了。這時候兩具尸體被壽衣覆蓋起來，異性裝束的舞者繞著尸體轉，從花環上摘下花兒來撒著，那花環構成他們戲服的一部分。轉眼間，母親和兒子活過來了，健康如初。第三個例子，色博朗劇班有兩個小演員，賈邁爾（Jamal）和賈米爾（Jamil），他們表演一場決斗。[[270]](#_270_19)戰斗過程中，賈邁爾的前額被一根撬棍擊中。他倒在地上，淹沒在血泊中，這時他的對手沖上來，拿重石砸他的頭和軀干。又一次，觀眾嚇得六神無主。接著，遵照這位優秀魔術師的指令，賈邁爾的尸體用長布裹起來，易裝的演員圍著它有唱有跳，伴隨著輕柔的昂格隆（angklung）合奏和飄揚的香霧。[[271]](#_271_19)原本喘著氣動彈不得的賈邁爾登時坐起來，生氣勃勃，安然無恙。而且，正如哪怕是最恐怖的奇觀展示在演出后總會發生的那樣，觀眾最后報以滿場歡呼。（很常見的是，變戲法和它的音樂的聯合效果是要喚起失控的性欲；觀眾里有些人互相摸胸部和陰部，甚至當眾性交。）

對所有這些戲法，特別是第三類戲法，我們作何解釋？換一種問法，哪種學問（ngèlmu）正在施展？甚至“變戲法”這個詞（conjuring）是這些sulapan變幻的恰當稱謂嗎？

我們是在談論一種不尋常的職業專門化，這種看法可以從兩個方向加以證實。首先，sulapan既非超自然事件亦非著魔的病癥。如果我們想想哇揚戲劇目、編年史、民間故事——或者哪怕是雅加達今天的閑言碎語，真實權力（kasektèn）的行使總是在世上產生現實后果，造成不可逆轉的變化。王國衰亡了，王子和妖怪被殺了，邪惡的村莊男孩永遠變成了猴子，流血政變（成功的和失敗的）確實發生了。相反地，sulapan一點不會撬動這個世界，一切始終要復歸原形。活人很快“被殺”，又同樣快地復活了。樹葉變成了海龜，然后又變回了樹葉。什么都沒有真正改變。每一“變幻”都缺少后果，就像我們前邊考察過的那些戲劇性雞奸一樣。

但是如果sulapan和kasektèn彼此全然不同，能說變戲法和著魔也是如此嗎？在某種意義上，它們明顯截然不同。在色博朗的奇觀展示期間，觀眾誤解了所看見的東西，魔術師造成的可怖幻象使當時看起來是他們真的著魔了。因為著魔如同kasektèn，的確影響這個世界。另一方面，對色博朗的人所表演的許多變幻，《真蒂尼》書中賦予了明確的名稱——比如gabus，réog和jaran képang，甚至到今天，它們指的還是帶來出神著魔的具體儀式表演。然而假如某些sulapan變幻與某些形式的著魔可能外觀上相似，它們的內在本質卻被認為根本有異。在sulapan（一種商業表演）中，說來說去，凡事都在人的直接掌控下，而如果處在著魔狀態中，人的控制則（至少暫且）讓位給精靈世界的控制。

其次，sulapan顯眼地包含了一種特有技術和專門詞匯。《真蒂尼》不厭其煩地告訴讀者，每場表演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樂器組合，什么曲子，什么舞蹈風格，什么戲裝。道具幾乎一成不變——柳條籠子、焚香、某類飾帶。有些變幻有其自身的專業名稱。也許這一切最突出的是racut這個詞的使用，它或可譯成“終止”（演出）或者“驅散”（幻影）。就我所舉的例子來看，總是只有寥寥幾個觀眾（一般是老人）沒有上當，這也是值得注意的。在觀眾倉皇逃散時，他們可能像阿迪帕蒂一樣樂不可支，但是他們設法確保事情不至于太出格。表演者于是被告知，把這些幻景收“回口袋里”。而且，同結束著魔狀態通常所需的儀式和時間相比，racut總是多么簡單啊（差不多像是關閉電流）！

然而不管《真蒂尼》中對技巧說過些什么，我們并非置身于金賽（Kinsey）或霍迪尼（Houdini）的世界（盡管興許離卡里奧斯特羅［Cagliostro］的世界不遠）[[272]](#_272_19)。色博朗被雞奸的時候，書里沒有告訴我們，他用了哪幾塊肛門肌肉讓阿迪帕蒂如此滿足，或者他是怎樣達成肌肉控制的。同樣，我們也從未被帶到幕后，了解獲得sulapan效果的實際方法。有時候讀者對它們多大程度上是造出來的效果也不明就里。因為雖然色博朗向阿迪帕蒂保證他的老虎不是真的，但書里也無動于衷地將一刀兩斷的男孩觀眾及他身首異處的母親說成是死人。或許我們應該用“魔法師”（magician）這個詞替代“魔術師”（conjuror）。因為前者融混了兩種古老含義：手法精湛的變戲法的人，他運用巧妙而普通的手段造成神奇的幻象；真正的神怪現象的涉獵者，但他為了愉悅觀眾，仍然是無用地耗費他的能量。由此看來，色博朗和他的魔法師伙伴的技巧，在十八世紀晚期爪哇的文化景觀中，占據了一個獨特位置。它們不是偽造者的技巧，但也不是有著kasektèn那種普遍、位高權力之人的技巧。

在此，重新與十八世紀法國做一比較不無裨益。關于狄德羅的百科全書，確定無疑的事情是，它旨在提供資料。它的詞條是帶著解釋的目錄，解釋了世界怎樣運轉，依什么原理運轉。它的目標是傳播啟蒙思想，傳播到盡可能廣遠的整個世界。但是《真蒂尼》的目錄什么都不解釋。它們提到了知識，可是這些知識依舊差不多是神秘莫測的。只有那些已經具備必要學問的人才能正確讀懂它們。爪哇平常百姓的啟蒙——更別提全世界的啟蒙，是這部書惦念的最末一樁事。

那便如何呢？雞奸和魔法可能是快活的源泉，但很難認為哪一個對任何社會（即便是舊爪哇社會）的生活不可或缺。我在這里濃墨書寫它們，是因為它們惹人注目地讓它們的高超修習者卓然有別于其他社會階層。這里的雞奸把老手與權貴分離開來，魔術同樣把行家和民眾分離開來：對民眾來說，色博朗學問的奧秘就像他們領主的kasektèn一樣高深莫測，也許尤有過之。雞奸和變戲法的無用與不必要也有助于勸阻這樣的想法：隨隨便便認定舊爪哇是一張無縫之網，彼此相扣的功能性角色，或者相互強化的恩主—附庸關系（patron-client ties）之網。（其他類型的學問，比如木偶操縱術或醫藥，正因它顯得有用，融入了社會，所以可能導致它的解釋者放松對成見的提防。）它們在《真蒂尼》中豐富多彩的世俗展示，連帶著林林總總的其他知識，表明某種新事物呼之欲出，一種對爪哇人領導權的可察覺的要求，雖然也許不是完全自覺的要求，這可以說是ngèlmu（學問）聯盟對kasektèn（權力）的罷黜。同樣很重要的是，色博朗像《真蒂尼》中別的能手一樣，施展學問來換錢。[273]領主與農民的舊爪哇日薄西山了。

### 專業夢想

至此樣樣清晰。也許是太清晰了。因為我此前看待《真蒂尼》，就好像它是社會的一面鏡子，或者一篇準民族學論文，允許我們推斷它的記載幾乎是直接抄錄了十八世紀晚期爪哇的生活。自然地，樂師們真的彈著他們的佳美蘭，達朗確乎操縱著木偶，而伊斯蘭教的神秘主義者們定然指導著年輕的桑特里。可是真有這樣一些色博朗嗎，他們優雅地雞奸了他們高貴的雇主，讓村民被他們用魔術變出的幻景嚇得狼奔豕突？誰能確定？另一方面，假如這首長詩反映的與其說是現實，不如說是……專業夢想呢？

色博朗的長技的不必要性可能誘使人們認為，它們是“真實”傳統生活的總目里叨陪末座、可有可無的因素。但是更寬廣地綜覽《真蒂尼》，我們會立即發現它的夢想性質。它里邊栩栩如生描繪的性生活也暗示了某種如夢似幻的東西。因為雖然書中塞滿了數十起交媾，它們發生在各種類型、各種年齡的男人和女人之間，卻只有一次提到了懷孕或生育，并且只是淡淡地順帶一說。（這就是書里同性戀和異性戀情節能夠看起來如此不動聲色就事論事地相似的原因。它的興趣在精湛的性技巧上，包括——順便提一下——女人的高超性技藝，而壓根不關心人口統計學或社會現實性。）

但是還有比生殖的缺席更大的缺席。我們先前談論過，爪哇統治階級被以某種方式從讀者視域里邊緣化了（如果不是排除的話），除了阿迪帕蒂這個例外。更引人注目的還是外國人的不可見。1625年阿莽拉加王子逃離吉里國的王室之家，那時聯合東印度公司已在巴達維亞建起了它的帝國亞洲總部（1619），從吉里沿爪哇北部海岸只需直線西行450英里就到了那里。到《真蒂尼》最終成書的時候，荷蘭人盤踞爪哇已有兩個世紀了，可是書里邊只能覓得區區幾個荷蘭語外來詞的蹤影。字里行間沒什么東西暗示了1670—1750年間大動干戈的烽煙彌漫，在這些戰事中，爪哇歷史上破天荒頭一遭，橫行劫掠的不單有荷蘭人和爪哇人，還有布吉雇傭兵（condottieri）、馬都拉軍閥，以及巴厘雇傭軍。這里絲毫沒有承認，自1740年以來，爪哇北部海港全都“在法律上”落入了東印度公司之手；或者承認，得勝的馬打蘭王國早就已經分裂成三個小而弱的內陸公國，它們的統治者統統是東印度公司的雇員。[[274]](#_274_18)沒有戰爭，沒有瘟疫，沒有捐稅，沒有徭役，沒有死亡。

相反，對《真蒂尼》大部分而言，爪哇呈現為幻境似的烏托邦：繁榮、知足、寬容、政治自主、性事精致的農村共同體衍生繁茂，專業人士在其間隨意漫游。他們游歷的時候，向民眾、也向同行展露他們的知識，受到無與倫比的尊重乃至心悅誠服的敬畏。沒有政治陰謀，沒有恐懼，沒有對高貴的笨蛋的俯首帖耳，沒有對無能而貪財好貨的治人者的恥辱倚賴。[[275]](#_275_18)

這個“完美爪哇”——受到它的術業有專攻的行家的仁慈協調，正是它的特征，顯露了《真蒂尼》剛剛萌芽的激進主義的限度。色博朗可能在性事上主宰了他的主人，并調戲后者的妻妾們，但是他的主宰是魔術師的那種主宰。如前所述，當阿迪帕蒂的直腸愈合以后，生活就恢復到這一對兒上床之前的狀態。什么都沒變。這些專家們的仁慈是作為傳統知識大家的那些人的仁慈。它有力地對比映照了哲學家們（philosophes）討人喜歡的惡毒，后者的知識根本不是傳統的，反而或隱或顯地是革命的。在爪哇，完美社會是在舊制度之前；在法國，它將隨著舊制度的廢除而到來。

恰是《真蒂尼》的詩學強調了它的政治立場，這種立場在大多數時候希望統治階級和外國壓迫者消失不見，而不是去攻擊他們。它的語調始終如一地冷靜、溫和、歡快——從來不是疏離、狂暴或絕望。它的作者們并不假意謙虛，對那時爪哇文學文化中可資利用的全部風格形式、韻律品類和復雜的修辭手段表現得駕輕就熟。但是這種棒極了的駕馭從不反諷性地運用，它幾乎總是起著使形式和內容相統一的作用。

### 《加多羅科神秘書》

如果像貝倫德似乎合理地論證的那樣，全本《真蒂尼》的寫作完成于1814年，那么這大概是如此一部博大、悅目、克制的爪哇杰作得以出現的最后的可能歷史契機。因為在1812年，萊佛士的人馬長驅直入日惹（Yogyakarta），廢黜了蘇丹，將版圖分割為兩個小公國，就像東印度公司1750年代在鄰近的梭羅干過的那樣。而且，在全部四個公國里，他牢牢控制著統治者的財政生命線，即稅款包收機構，自此以后從巴達維亞指揮它們。[[276]](#_276_18)1816年，由于維也納會議上的復雜交易，荷蘭卷土重來，替代了萊佛士：借維也納會議的光，奧倫治的威廉接替了路易·波拿巴，成為他的家族第一個君王，并被授予東印度公司在東印度的屬地，算是對英國永久占領錫蘭、好望角及其他很有價值的地盤的補償。中爪哇的經濟和政治狀況迅速惡化，引起1825年蒂博內哥羅王子揭竿起義，由此發生了五年爪哇戰爭，該地區大部飽受蹂躪。戰爭的高昂損失、尼德蘭自身的瀕臨破產（這是拿破侖時代的苛捐雜稅和1830年比利時的脫離造成的），導致了那一年野蠻盤剝的“強迫種植制度”（Cultuurstelsel）的設立，在1831年到1877年間給荷蘭國庫搜刮了有8.23億荷蘭盾之巨。[[277]](#_277_18)為了確保不再有更多的政治動亂，巴達維亞把一系列言聽計從、平庸無能、游手好閑的青年王子扶上了中爪哇的小型御座。在這漫長歷程里，kasektèn（實際權力）及其認定的擁有者越來越喪失可信度，以至于到1873年，梭羅的最后一位宮廷詩人龍加瓦西塔臨終之時絕望地寫到“典范無存”。[[278]](#_278_18)

這些背景資料可能有助于解釋《真蒂尼》和《加多羅科神秘書》（Suluk Gatholoco）之間的驚人差別，后一本書是爪哇文化下一部偉大的幻影集。內在證據清楚顯示，這首長詩作于1854—1873年間的某個時候（最大可能是在1860年代），也許是一位佚名作者獨力完成。[[279]](#_279_18)假如說《加多羅科》是一部經典，它也不過是那種地下的經典。當1873年著名的傳教士—學者普恩森（Poensen）讓這首詩的（大幅刪節的）版本大白于印刷時代的天光下的時候，他評論道：

從文學的觀點看，這本書沒多少價值……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端詳它的精神，那么作者會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他的榮譽和美德觀念，以及什么食物是人類可吃的這類事情上的切合實際的看法，顯示作者是個入世很深的人，全然缺乏諸如《務朗·列》（Wulang Rèh）、《特卡瓦蒂王子》（Sèh Tékawardi）等作品那種深刻的宗教氣質；從而也缺乏后者的文質彬彬。事實上，他常常招來我們的厭惡，因為他放縱自己把雞毛蒜皮的事兒都訴諸筆端，而且以污穢不堪的方式細說人們羞于啟齒的事情。[[280]](#_280_18)

對某種三流的爪哇“龐大固埃”的這幅素描，說服不了最顯赫的殖民地學者—大官胡格倫治，他公開指責這首詩是“一個肯定有鴉片癮的爪哇神秘主義者的異教空想”！[[281]](#_281_18)一點也不，自由主義的學者—官僚林克斯1909年發表意見說，這首詩是“對所有那些傳授秘義者的長篇廢話的厲聲譏諷”。[[282]](#_282_18)直到1951年，范艾克倫（Philippus van Akkeren）才出版了第一部完整的《加多羅科》，還附上了譯文，全面的、重要的注解，以及獨具慧眼的、人類學化的主題分析。[[283]](#_283_18)那時候，他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到來及隨后1945—1949年間的民族革命所迫，已經放棄了他在東爪哇的傳教工作。

爪哇只出過一個版本即1889年的一種有限的泗水版本，那時沒引起什么注意。[[284]](#_284_18)可是在1918年，這首詩成了波及整個爪哇的一場論戰的中心，當時發表在Djawi Hiswara——伊斯蘭聯盟（Sarékat Islam，其時最得人心的反殖運動）梭羅分部的機關報——的一篇文章引用了它的幾段話，特別是在有段話里，與書同名的那位主人公堅持說，他頻繁出入鴉片煙館，是對先知穆罕默德的忠實仿效。接著，就在那時很活躍的印尼語報刊和爪哇語報刊上，一場攜怨帶恨的爭吵展開了，而以泗水聲勢浩大的抗議示威而告終，那場示威是由倉促建立起來的大德先知穆罕默德軍（Army of the Most Reverend Prophet Muhammad）組織的。這支軍隊——哎喲——沒有武器，所以不得已滿足于向總督請愿，要讓Djawi Hiswara的編輯判刑。[[285]](#_285_18)從此以后，這首詩就永久轉入地下，沒有哪個印尼出版商膽敢去冒這樣的危險：被烙上叛教者或色情作品出版者（理由見下）的污名。[[286]](#_286_18)

這一腔怒火所為何事？共有397章的《加多羅科》一書的情節既簡單又奇特。第一部分，包含了第1、2章的短短13節，向讀者介紹了主人公加多羅科及其形影不離的仆從德馬甘杜爾（Dermagandhul），說主人公是加加爾國王蘇克斯瑪（Suksma Wisésa）的獨子。國王對孩子畸形、可憎的面目大為駭異，下令他在與世隔絕的冥想中度過他最初的十六年，陪伴他的只有德馬甘杜爾。十六年之期滿了，這個小伙子回到家里，他的父親立刻“剪掉”了他的頭發。但是由于這個儀式只讓他更見丑陋，他又動身去過另外四年的苦行生活，在一株神圣的榕樹上像蝙蝠似的倒懸著。這第二次冥想的報償是天下無雙的擅長語言的天賦。國王于是賜他加多羅科的大名，派他出去體察世界，告誡他要提防危險的敵手，女隱士佩爾濟瓦提（Perjiwati），她在一個山洞里冥想。

第2章第3—5節對加多羅科和德馬甘杜爾的體貌描寫，坦率提示了他們的名字所表達的含義。[[287]](#_287_18)Gatholoco是gatho（陽具）和ngloco（摩擦，手淫）的復合詞；Dermagandhul則將derma（緊貼）和gandhul（懸吊）組合起來，指謂睪丸；而Perjiwati的詞根是Parji（女性外陰）。換句話說，主人公及其侍從是能走會說的陰莖和陰囊，在某個層次上這首詩可以看作男人性發展的一個寓言。[[288]](#_288_18)

第二部分，包括第3—6章的共191節，記敘了加多羅科游歷途中的活動。在一場場賭博和一次次盤桓于鴉片煙館之間，他卷入了一長串尖刻的爭論，同“正統的”伊斯蘭教師（guru santri）爭辯神、人、天、伊斯蘭教義和其他許多事物的真實本性。憑借他的智慧和淵博學識（ngèlmu），每一次他都得勝了。一回又一回地，伊斯蘭教師甘拜下風，羞愧難當地逃之夭夭。

第三部分，包括第7—12章的共193節，講述了加多羅科同佩爾濟瓦提和她的四個侍女的相逢。在解答了這五個女人提出的一系列難解之謎以后，他獲得權利，可以進入佩爾濟瓦提迄今無人穿透的洞穴。德馬甘杜爾試圖尾隨而進，可是擠不進去。第一部分的主題復現了，因為加多羅科與佩爾濟瓦提間的“激戰”是性交的幾乎不加遮掩的描述。九個月后，一個男孩出世了，丑得恰似乃父，不過父母都很寵愛他。詩歌接著簡要思索了這一出生的意義與生命的本質，結束了全篇。

《加多羅科神秘書》的觀點和性質，最好是跟《真蒂尼》并列起來理解。首先，我們注意到兩個主人公的差異。阿莽拉加王子是舊爪哇名家的一個寬容、高尚的典范。[[289]](#_289_18)他英俊、文雅，擅長調和爪哇（印度教）—伊斯蘭教的神秘主義，性力充沛，傳統藝術修為高深。他懷著兄長般的興味對待頑皮的色博朗和他的戲班子。兩者都是體面人。加多羅科則獨樹一幟。他不但不遵從爪哇英雄的任何傳統模式（風雅的武士—騎俠、苦行的智者—僧人、穆斯林圣人，或者秉執正義的國王），而且好像他是被故意塑造成阿莽拉加的反面。如第2章第3和11節，第4章第1—5節所顯示的，他是一根丑陋、散發著臭味、滿嘴臟話、好抽鴉片、愛唱反調、通曉哲學、行走著的陽具。

第二，《真蒂尼》那種開化的百科全書知識徹底消失了。加多羅科及其創造者對名物清單和它們所表征的各色學問了無興趣。如今只有一種要緊的知識——那個至善男人（the Perfect Male）的神秘知識，加多羅科以憤激的狂熱和下作、有毒的機智為之辨析捍衛。在該詩長長的第二部分里，他的神學對手們代表了完全處于《真蒂尼》夢想之外的某種東西：逆喻的“錯誤知識”。前一世紀心安理得的調和早已煙消云散了，它曾支持將蘇非派神秘主義和前伊斯蘭的印度教—爪哇傳統靈活地熔于一爐。看起來像是這古老的文化猛地分裂成了針鋒相對的兩半：麥加指引的伊斯蘭正統教義，與范艾克倫不無理由地稱之為一種爪哇（文化）民族主義的東西，它走投無路，利齒畢現。

第三，性生活描寫作為該詩最后部分的核心內容，連篇累牘、不厭其詳地突出了《真蒂尼》沉默地加以忽視的一切：臭味、炎熱、黏液、流血、沮喪、懷孕、生育。加多羅科只有一個（還是女性的）性伴侶，他用極其粗野甚至粗暴的方式跟她交合。[[290]](#_290_18)同樣昭然若揭的是，這種性事只有一個目的：繁衍一個新的加多羅科，萌芽中的至善男人，準備有朝一日取代他的父親加入爪哇的宗教戰爭。與此迥然不同的是，在《真蒂尼》中，宗教和性愛間的關系無外乎戲謔和揮霍，就像這一段情節例示的一樣：色博朗在同兩個十幾歲的伊斯蘭教學生度過一個口交和互相手淫的不眠之夜后，若無其事地起床去引導伊斯蘭學校清晨的祈禱。[291]

最后是幻夢般的舞臺布景。《真蒂尼》的抹煞范圍被急劇擴展，完美爪哇變成了一種陰森可怖的月面風景畫。荷蘭人一如既往地不見蹤影（盡管荷蘭語外來詞匯的出現頻率顯著增加）。加加爾王國只提到一次，就在第1節，而它的“偉大國君”在第11節后永遠消失了。飄散無蹤的，還有那全部演員、魔術師、樂師、工匠、商販、耍木偶的，以及喧鬧村民們，他們是擠滿了《真蒂尼》每篇每頁的。加多羅科和德馬甘杜爾形影孤單地經歷他們的漫游生活。這樣子照明下的舞臺，爪哇看起來有如一塊超現實的國土，上面的路標只有鴉片煙館、巖洞、山脈和伊斯蘭學校。一幅想象的而非理想化的風景。

但是這一切本質上都不能使《加多羅科神秘書》成為“經典作品”的候選。讓這首詩不同凡響的東西，是在第2章第8節初次暗示出來的，那時讀者得知，歷經四年的倒懸于榕樹上的冥想之后，這位年輕的主人公“獲得了瓦尤（wahyu）和技藝/去駁倒他的同胞，言詞犀利/雖未學修辭，他卻深悉/論辯的百般巧計/不學作文，文學藝術盡藏心底”。[[292]](#_292_18)因為恰恰是《加多羅科》對“一切文學藝術”憤怒的、顛覆性的利用，表明了它的作者屬于最后一批絕望的舊爪哇文學行家之列。

比如看看開篇的詩行：“這里要講的故事/牽涉一個王國，威名赫赫/它縱橫廣袤，號加加爾/它的偉大國君，興起兵戈/驍勇善戰，無往不克/陛下的尊號，諱稱/蘇克斯瑪大王/君威凜凜統四方/率土之濱同服色。”[[293]](#_293_18)這一節單獨來看，是敘事詩標準的傳統開頭，應當悠悠然地、不吝筆墨地講述宮室之美、國家之富，如此等等。但是所有這些都省略了，在十八行詩內，我們讀到了對當作行走的陽具的加多羅科的描寫。這里的敷衍了事當中有一種極度的傲慢（仿佛在說，“你和我心照不宣，今天的爪哇沒有威名赫赫的王國、戰無不勝的國王，或者賓服的四海”）。

或者再看看，作者如何熟練自如卻出于迥然不同的非傳統目的，使用《真蒂尼》的高雅風格的那種引人聯想的頭韻和一語雙關的諧音。譬如，在第5章第34—35節，當加多羅科的對手罵他是“無尾狗”時，他利用asu（狗）與asal（起源，源頭）間的諧音來反敗為勝，將侮辱解釋成一個深刻的真理：他其實就是那至善男人。[[294]](#_294_18)又如第4章第32—33節，主人公通過玩弄klèlèt的雙重涵義（既指“鴉片丸”，又指“糞團”），詼諧地做了一個神學反駁。[[295]](#_295_18)很難用英語表達這種奇特、刺耳的詩意，它突然涌現，乃是由于單詞“糞塊”和“狗”與行云流水般的傳統文學妙筆猛地結合在一起：這是對爪哇文學而言還很新穎的一種多調性。不過讀者始終意識到，這一多調性是非常真誠的，既不是無聊地顯擺格調，也不是自覺地嘲諷經典著作的傳統。狗、真理、神、謎語、鴉片、穆罕默德、糞團——哪一樣都不比其余各樣享有特權的文學關系。這首詩的詞語依然“在此世內”，是它的真理的組成部分。沒有反諷。

《加多羅科》的多調性并未到此結束。我們須記得，這首詩像那個世紀以前的所有爪哇詩篇一樣，是創作來歌唱的，即便不總是大聲唱，起碼也是低聲哼。它的十二章與其說靠主題區以別之，不如說更要靠七種音樂性的韻律形式間的轉換，要創作出色彩各異的十二章，端賴這些韻律形式：阿斯瑪蘭達納（Asmarandana）、錫農（Sinom）、米奇爾（Mijil）、丹當古拉（Dhandhanggula）、甘布（Gambuh）、基南蒂（Kinanthi）和龐庫爾（Pangkur）。至少從進入十九世紀以來，它們就有一些廣為接受的用途：人們覺得，要利用它們的音樂來喚起和反映不同的氣氛，因應于不同的題材和主題。[[296]](#_296_18)《加多羅科》的作者著手系統地瓦解所有這些習慣的聯系。于是，舉例來說，詩里用阿斯瑪蘭達納將加加爾和蘇克斯瑪的榮耀出人意料地一掃而光，而這種韻律被從多方面說成是“專注的、憂愁的、悲傷的，然而是失戀那種憂愁或悲傷。適合涉及愛情之痛的故事”及“［喚起］哀愁”。[[297]](#_297_18)丹當古拉，在詩里被用于糞團和鴉片丸的深奧探討，據說它是“可變通的……如若用于教導的目的，嘹亮曉暢；如若用于愛情的狂熱，嫵媚動人”；而“輕快，怡然……則對收束一首詩很有效”。人們認為米奇爾“適合道德教育，但也適合愛情故事”，它卻被用在加多羅科和伊斯蘭教師之間第一次謾罵性的爭吵。最扎眼的是第5章第58、59節，加多羅科的敵手稱他和他的母親是“豬屁眼兒”（silité babi），主人公以牙還牙，原物回敬，這里是用錫農韻創作的，而我們得知，這種韻律的特點是“友好，清亮”，“適合道德教誨”。[[298]](#_298_18)

在每一情形下，效果就是讓書面詞語跟甜美歌聲的圓潤色質猛烈摩擦。[[299]](#_299_18)這本書的獨特力量恰好來自它在形式和內容間割開的傷口。這類專業技巧使人想起了一個孤獨的芭蕾舞女演員，在懸崖邊上單足旋轉。

### 尾聲

《加多羅科神秘書》作成后不久，爪哇殖民地的變遷開始加速，這首先是由歐洲（即便是落后的荷蘭）產業制度的深化與通訊革命刺激而成的。1870年代初，由于荷蘭的自由主義改革者與強大商業利益所施加的壓力，壟斷的“強迫種植制度”被廢除了。瓦礫之上，來了大群大群的種植園主、商人、律師、醫生和新式文官。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加快了他們的行程，而電報通訊的推廣讓他們同宗主國保持著前所未有的密切聯絡。一家當地報刊于1860年代開始發行，它先是被荷蘭人掌控，但很快有越來越多的歐亞混血兒、華人和原住民參加進來。[[300]](#_300_18)1880年代鐵路修起來了，原本打算將外銷的糖從爪哇內地的廣大種植園運出去，可是不久，每年都要運送數百萬的爪哇乘客。[[301]](#_301_18)與它們一道出現的，還有國家主辦、國家資助的學校教育體系的萌芽，這是（到那時為止）荷蘭人干預印尼群島約三百年里的頭一回。[[302]](#_304_18)

1900年后不久，初生民族主義的跡象清晰可見了，它是晚近殖民地資本主義所造就的新型專業人士孕育出來的：編輯和記者，機械工人和會計人員，學校教員和藥劑師，政客和調查員。隨著新世紀的緩緩流逝，主要多虧了印刷業和印刷資本主義，這類人從文化、社會和經濟上被安放在這樣的位置上：從事百科全書派那種專業知識的整理工作，反抗巴達維亞的舊制度。就像眾多人士（蘇加諾、蘇多摩博士、薩里爾［Sjahrir］、司馬溫［Semaun］等）的演講和著述明確表達的，這些專業人士的夢想在我們是耳熟能詳了：“至善印尼”——沿著黃磚路走的某段或短或長的路程。[[303]](#_303_18)然而如今，“至善爪哇”、“至善男人”都成了暗淡的想象物，鑒于“至善印尼”的夢想如同一切新的意識形式一樣，隨身攜帶著自己的健忘癥，就更是如此了。因此我們更有理由采納馬克·吐溫的忠告，回頭去研究舊爪哇的毀棄的地圖。

## 6 雅加達鞋里的沙子

葡萄牙的跨大陸帝國，在它的歐洲對手中間最為古老，維持時間最長，崩潰得最快，在它身后留下了最多的殺戮和破敗。它的持久性歸因于葡萄牙自身的落后和貧窮，這種貧窮落后排除了工業化的美國、法國、英國與荷蘭那種雄心勃勃的現代化殖民政策的可能性；也歸因于它的戰略位置——位于西班牙的腋窩，地中海的出入口，數世紀以來這為它贏得了英國海軍力量的撐腰。其崩潰最速，是由于薩拉查獨裁統治怪異的長命，以及它同時打三場“越南”戰爭的瘋狂決定——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幾內亞比紹，它們彼此相隔數千英里，上陣的是半雇傭的、前職業的軍隊，毫無獲勝希望。1974年4月，幻滅的軍官在里斯本發動政變，一年之內，帝國完蛋了。然而殺戮和破敗僅僅間接地是里斯本的責任。莫桑比克忍受的長達12年的兇殘“內戰”，是南非精心策劃和提供資金的。比勒陀利亞和華盛頓應為安哥拉的20年沖突承擔大部分罪責。而葡屬東帝汶（澳大利亞北部海岸外面的半個小島）的大屠殺，是印尼前將軍蘇哈托的獨裁政權干的好事，起初有美國的鼎力支持，后來在較小程度上又得到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大國、日本和澳大利亞諸國政府的支持。

當薩拉查獨裁政權垮臺的時候，在帝國這個偏遠的前哨站里，尚未發展出什么反殖民主義的游擊隊抵抗。盡管自十六世紀中葉以來葡萄牙就盤踞于此，近代的道路和交通體系卻幾乎一片空白；土著人口有六十余萬，多是泛靈論者，壓倒多數是文盲，說著兩打甚或更多的地方語言。極少數有文化修養的精英實際上是混血兒，不僅有葡萄牙人和當地人的后裔，還有偶爾部署在該島的非洲士兵的后裔；他們位居寥寥無幾的葡萄牙教士和官僚階層之下。沒有立法機關，沒有政黨，只有一家出版社的雛形。不消說，去殖民化的意思連一星半點也沒有的。

在里斯本掌權的左傾軍官們全神貫注于葡萄牙自身的動蕩政局，以及非洲領地上的種種問題，那里生活著相當數量的葡萄牙殖民者。東帝汶差不多被拋棄了，聽其自生自滅。當科斯塔·戈麥斯將軍（Costa Gomes，那時的共和國總統）晚些時候宣稱他曾以為它最終將變得像果阿，毗鄰的印尼人會和平并吞這片領土的時候，他不是在裝腔作勢。尼赫魯在1960年派遣部隊進駐果阿，滴血未濺。但他是有仁慈之心的人，是一個民主國家自由選舉出來的領袖；他賦予果阿人他們自己的自治邦政府，鼓勵他們充分參與印度政治。在每一方面，蘇哈托都與尼赫魯截然相反。

1974年4月之后一年左右的時間里，雅加達政府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去控制東帝汶，就差入侵了。羽翼未豐的東帝汶各政黨的領導人受到誘騙、賄賂和威脅，他們之間的敵對加深了，被人操縱了。這些陰謀在1975年的一場政變中臻于頂點，那次政變有印尼做后臺，是兩大政黨中較保守的一個即UDT（帝汶民主聯盟）發動的。但這次政變很快遭到它的左翼對手革陣（Fretilin，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的反擊，由此爆發了一場短期內戰，數千人丟掉性命。UDT領導人越過邊境逃往印尼的西帝汶，革陣掌控了這個殖民地，開始走向正式獨立，據許多外國觀察家說，這獲得了廣泛的民眾支持。

這下留給印尼擴張主義者們的唯一選擇就是入侵了，它在1975年珍珠港紀念日準時發起，那時來訪的福特總統和基辛格國務卿離開才幾個鐘頭。這次襲擊是一場亂了套的屠殺，印尼軍隊自相開火，在東帝汶首都帝力犯下了罄竹難書的暴行。東帝汶軍隊裝備的是高質量的、北約發放的武器——那是從葡萄牙駐軍手里獲得的，他們的表現可圈可點；革陣政府守住了它的陣地，守護了絕大部分民眾——讓雅加達節節受挫的源泉。

為什么蘇哈托、他的高級將領們，還有他無所不能的情報機構，選取了這個行動方向？最簡單的答案是，他們認為這事易如反掌。入侵之前大約六周，有關東帝汶的軍事政策的兩個核心創制者，阿里·穆托波（Ali Murtopo）將軍和穆達尼（“Benny”Murdani）將軍，訪問了我所在的大學，他們談笑風生地向焦慮不安的發問者保證，“三周內一切將塵埃落定”。基辛格本人建議雅加達“搞快點”。但是，此外還有別的考慮因素。印度支那在幾個月前剛剛“陷落”，依靠1965—1966年間對無數印尼共產主義者（和其他人）滅絕人性的屠殺而掌握雅加達大權的將軍們，不能容忍有個獨立的“左傾”國家居于臥榻之側。也有石油前景的因素：東帝汶沿海探明存在著遼闊的海底油田——1973年秋世界油價翻了兩番，而1975年初，印尼國家石油公司Pertamina有無法償還的百億美元之巨的債務，這使得那種前景尤為誘人。

與此同時，美國的角色至關重要，甚至重要得假如不是它，這次入侵可能原本不會發生。侵略中所用的武器大概90%來自美國。雖然1958年的一份美國—印尼協定明確禁止將它們用于印尼領土以外，華盛頓對這次違反協定之事睜只眼閉只眼，盡管中情局明明白白告訴它雅加達準備入侵了。1977年，為了對革陣的山區防御陣地實施大規模空中打擊，孤注一擲的印尼軍隊企圖獲得OV-10“野馬”反游擊戰攻擊機，這時卡特政府秘密提供了飛機，卻向國會和公眾撒謊說，軍用裝備禁運令已經下達。在聯合國，美國大使莫伊尼漢（Patrick Moynihan）全力以赴集聚支持力量，阻止聯合國的外交干預——他在回憶錄里夸耀了他的成功。

有兩個因素合起來決定了華盛頓的政策。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它的越戰時期的當權派對蘇哈托感激不盡，因為后者在1965—1966年掃除了社會主義集團之外世界上最大的（也是合法的）共產黨（而且不費美國人一滴血），還因為后者隨后推行的經濟政策，讓資源豐富的印尼向外國投資與貿易門戶大開。其次是美國在那個時代的戰略盤算，當時蘇聯軍事（特別是海軍和空軍）力量正如日中天。印尼盤踞在連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道上，蘇哈托提出秘議，允許美國核潛艇通過印尼海域，而如今這海域包括了東帝汶沿海的深水海峽，于是核潛艇不會浮出水面讓蘇聯衛星監測到：這等報價美國人難以抗拒。

1977年底，雅加達預備好了一次決定性的防線突破，特別要用它的“野馬”攻擊機扔炸彈、燃燒彈和化學脫葉劑，摧毀內地的田野和村莊。數以萬計的村民被迫逃進印尼控制的沿海平原，在那里他們被驅趕到印尼軍方控制的陰慘慘的“重新安置”收容所里。1977—1979年間，全部東帝汶人口約有三分之一死于饑饉、傳染病，以及無情的戰斗。如彼得·凱里（Peter Carey）指出的，這個死亡人數就比例而言遠遠高于波爾布特的當代柬埔寨。[[304]](#_304_18)但是印尼政權長期封鎖這個島嶼，讓它隔絕于世；美國駐雅加達大使也和該政權合謀，不讓國會和美國公眾知道這個悲劇。在這期間，革陣政府的幾乎所有高層領導人，包括能干的軍事指揮官洛巴托（Nicolau Lobato），都被殺或投降。

到1980年代伊始，大多數關注東帝汶的觀察家們相信，斗爭差不多結束了。然而今天，東帝汶比過去二十年里任何時候都更接近于真正的獨立。荷蘭人從十七世紀早期到二十世紀早期統治著東印度群島，沒遇到多少麻煩，主要是因為在1700年到1900年間，荷蘭像葡萄牙一樣，是個軟弱、貧窮的帝國主義小國，它在歐洲的戰略位置使它成為倫敦的有用附庸。然而到1900年，荷蘭資本主義的引擎正全速運轉，在海牙，“新帝國主義思維”深入人心。這意味著大規模資金投向殖民地通訊基礎設施。它意味著——誠然是在比較保守的程度上——對原住民的現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它還意味著一個警察國家的創生，這種國家能夠以1880年代后期無法想象的方式進行監視和鎮壓。從發展、教育和約制的這種爆炸性結合中，印尼民族主義驟然生長出來，不過幾十年的工夫，就要了荷蘭統治的命。

蘇哈托和他的將軍們，唉，他們太不熟悉自己國家的近代史了，結果他們在1980年代動手做的事情，跟荷蘭人在本世紀初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而且，像一切“次生帝國主義者”（second imperialists）那樣，他們決心要暴露他們所取代的老邁帝國主義的缺陷。巨額資金被投向東帝汶的基礎設施，主要是、但絕非完全是為了軍事目的。他們建起了一個精心安排的學校等級體系，最后建了一所大學。入學學生人數比葡萄牙時代高出50倍，文盲率從1972年的90%降到1990年的42%。他們指望這將幫助灌輸印尼語言、“新秩序”國家意識形態及對雅加達的忠心。在陰險的天主教徒特務王——穆達尼將軍庇護下，一個鎮壓機構創立了，它很快就凌駕于法律之上，因為它被屏蔽在外部世界以及大多數印尼人的視線以外。它無惡不作：系統的刑訊、失蹤、無限期監禁，不一而足。1980年代的這些后果，全然就是1920和1930年代荷屬東印度出現的那些。

到1990年，葡萄牙時代沉悶的、小小的帝力，人口增長了不下五倍。識字的、受過教育的東帝汶人群體發展起來并極大膨脹，雅加達的殖民主義類型的經濟卻只為他們提供了有限的、低下的工作。這些年輕人熟練掌握了印尼語，就像七十年前年輕的印尼民族主義者精通荷蘭語一樣，這樣他們諳熟他們的統治者，憑借印尼語，又有多種渠道接近印尼知識階層和印尼新聞界，并通過這兩者接近外部世界。此外，他們認識到他們正在被殖民化，盡管蘇哈托政權吹噓說在推進同化上大獲成功。這一現實的最顯著表現莫過于此：雅加達頻頻提到，他們對印尼為他們所做的一切“忘恩負義”。遇到麻煩的殖民主義者總是提到土著的忘恩負義，民族主義者從來不會。1977—1979年的大屠殺留在年輕東帝汶人的童年記憶中，他們還直接經歷了1980年代的有計劃鎮壓。就這樣，雅加達大大加深和擴展了東帝汶民族主義。

由于另一項政策，即鼓勵天主教化，蘇哈托政權不經意地削弱了自身的目標。1965—1966年的大屠殺部分地被合理化為一場反對共產主義無神論的十字軍東征，緊接著，政府堅決主張所有印尼人都屬于某個有組織的、世所公認的宗教。政府自身對好戰的伊斯蘭教心存疑慮，鼓勵人們改宗東帝汶天主教會，那時政府有千般理由信任它。天主教的軍官和文官在這個國家的安全機構里是一股強大勢力，勢單力孤的天主教少數群體總是暗地里仰仗這個政權保護他們，對付穆斯林。到這個十年末期，東帝汶勢不可擋地成了天主教的，這尤其是因為天主教會是唯一的機構，可以給人們提供某種有限的保護，不受軍隊之害。然而這時，一個意外的問題產生了。在沉重的外界壓力下（除了貪圖石油的澳大利亞之外，沒有哪個國家承認印尼是合法兼并東帝汶），梵蒂岡決定直接管理東帝汶的教徒，而不是依靠印尼的主教團。急速壯大的東帝汶教會配備了本土教士，他們習慣于使用當地的混合語，即德頓語（Tetun），開展教區工作，并在可能的情況下，使用葡萄牙語跟外部世界交流。如同早期愛爾蘭的情形那樣，教士階層變得認同于一個受到粗暴殖民化的種群的民族主義。最能代表這種轉變的人，是表面上怯生生的年輕人卡洛斯·西門內斯·貝洛（Carlos Ximenes Belo），他1983年被任命為帝力主教，到這個十年末，他已成為他的同胞們的忍耐力的一個大無畏的、直言不諱的象征。

就在1988年底，蘇哈托在撤銷了穆達尼的總司令職務后斷定，東帝汶形勢一片大好，某種有控制的公開化（glasnost）的時刻已經到來。這片國土小心翼翼地向普通印尼人開放，甚至向外國游客開放，一位年輕有為的新教徒將軍魯迪·瓦魯烏（Rudy Warouw）被派去推行一種“懷柔”政策。但是時機不當，這種舉措無論如何都來得太晚了。

國際上，曾令蘇哈托成為華盛頓寵兒的冷戰正走向終結。葡萄牙加入了歐洲共同體，它的飽受良心折磨之苦的領導人開始運用否決權阻止歐共體同東盟發展商貿關系，因為印尼是東盟最大的成員國。1990年8月，薩達姆·侯賽因侵入、“并吞”（absorb）了首鼠兩端的科威特酋長國，引發了1991年2月的大規模國際軍事行動，旨在——據官方說——阻止他做出蘇哈托1975年干的那種事，即占領與“合并”（integrate）一個小鄰邦。在非洲，面對厄立特里亞民族主義者的軍事威力，門格斯圖（Mengistu）的埃塞俄比亞正土崩瓦解，這又是極似東帝汶的一個案例。而自從大赦國際（Amnesty International）1976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迄今，國際人權運動的勢力有增無已。

隨著東帝汶的“開放”，成千上萬的印尼投機客（carpetbagger）涌入這片國土，想利用政府政策和外國捐贈者造就的商業機會。私有企業這種和平的“二次入侵”被年輕的東帝汶人普遍解釋為雅加達策劃的詭計，要把他們降低為他們自己國土上人口統計學的少數群體，這樣一旦就其前途舉行公民投票，蘇哈托政權可以指令一個可靠的多數群體贊成合并。外來訪客的出現，最有名的是1989年晚些時候教皇約翰·保羅的到訪，給東帝汶人造成這樣的感覺：他們還沒有被外部世界遺忘，而他們也找到越來越多的機會與之交流。他們首次開始組織爭取獨立的示威，雖然慘遭鎮壓，但還是清楚表明，斗爭焦點已從山區疏疏落落的武裝集團轉向了大批的城市化青年。

1991年11月12日凌晨，轉折點到來了，由年輕人組成的浩浩蕩蕩的和平游行隊伍穿過帝力走向圣克魯斯教堂的公墓，向一位年輕活動家的墳墓獻花，那位活動家最近剛被印尼保安部隊殺害。出于至今尚不明了的多種原因——很少有人相信是瓦魯烏將軍下的命令，約兩百人的全副武裝的軍隊出現了，居高臨下朝著被公墓高墻所困的哀悼者射擊。至少有二百五十人當場被射殺，另有許多人受了重傷，其后失蹤的不下三百人。這類大屠殺以前常常發生，但這一次被兩個勇敢的英國人施塔爾（Max Stahl）和考克斯（Steve Cox）錄了像拍了照，他們設法將這些膠卷偷運出境。施塔爾的錄像帶先在英國電視上播出，然后全世界都播放了，結果它比堆積如山的書面證據有著更為直接的政治沖擊力，那些書面證據是各種人權組織積累起來的，記錄了過去十六年印尼的野蠻統治。

國際上的喧嘩如此囂囂，蘇哈托被迫斷然解除瓦魯烏將軍和他的直接上司、銳意進取的第九軍區司令官的職務。（由此一個進程開始了，東帝汶不再是軍事晉升的快車道，它搖身變成了精明的軍官們避之猶恐不及的地方。）當沙納納·古斯芒（Xanana Gusmão），這位詩人、洛巴托死后地下游擊隊的傳奇領袖，最后于1992年底落入軍隊之手的時候，判他死刑根本不可能了。他是由該政權恭順的司法系統審判的，不過是在多少還算公開的法庭上，先被判處無期徒刑，隨后改判二十年徒刑。（正是像這樣子，在1948年底，荷蘭人發現不可能判處民族主義領袖蘇加諾死刑，因此將他下獄。蘇加諾很快掙脫囹圄，把他的國家帶入議定的獨立。）

圣克魯斯慘案以后，雖然鎮壓依舊，東帝汶卻第一次成為印尼國內一個公開的政治議題。因為到這個時候，政府對信息的近乎壟斷開始崩解，這要感謝CNN，尤其要感謝傳真和電子郵件革命。官方聲明的調子日漸趨于守勢。外交部長阿里·阿拉塔斯（Ali Alatas）告訴印尼新聞界，東帝汶就是“我們鞋里的沙子”，蘇哈托則說它是“我們臉上的丘疹”——這些說法，他們決不會用到他們真心以為屬于印尼的任何省份。破天荒第一次，較有勇氣的印尼記者親身去調查，看看現場究竟發生了什么事。雅加達有些日報刊載了若干“小故事”，它們其實是對一個受踐踏社會的稍稍改頭換面的經驗描述。爪哇沙塔亞瓦札那（Satyawacana）大學知名的環保主義者阿迪宗德羅（George Aditjondro）公開陳詞支持東帝汶獨立，而且當政府不許他出席在葡萄牙舉行的有關東帝汶的國際會議時，他拒不服從政府禁令。這時候政府騷擾他，但不敢監禁他。印尼政治東帝汶化的尤為顯著的證據在1994年底出現了：正當蘇哈托歡迎參加APEC峰會的克林頓與其他國家元首之際，一群東帝汶學生闖入了美國駐雅加達大使館的大院，場面壯觀，策劃精細。數日之內，雅加達都市區司令官、機敏而胸懷大志的亨德羅（Hendro）將軍被解職，他是三年內第三位栽在東帝汶人手上的將軍。除了聽任這些學生被安全護送出去流亡葡萄牙，政府一點兒轍也沒有。

發生在雅加達的這一戲劇性行動的成功，在東帝汶產生了強烈反響，它在那兒被當成“歷史如今站在年輕人一邊”的又一信號。后果之一是東帝汶青年與控制了地區市場、多數是穆斯林的投機客之間暴力沖突日益頻繁，最后以1995年10月蔓延該領地大部的城市騷亂而告終。成百的——也許是成千的新移民被迫逃回他們西里伯斯島和爪哇島的家鄉。那個政權，先前已經宣布有改善的狀況容許撤回大量駐軍，眼下感到不得不派遣新的部隊；后果則可想而知——大肆逮捕和野蠻行徑，而這不過代表了走進死胡同的政治。爪哇的少數死硬派穆斯林知識分子，憤憤然接受他們逃跑回來的同宗教友的目標，要求懲辦那些“不忠的基督徒”，這時蘇哈托卻玩不起伊斯蘭牌：他的政治和軍事伙伴中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太多了；有影響的知識分子與有勢力的印尼華族商人也是如此。他也知道，要削弱他的政權，最快莫過于讓宗教間暴力的燎原之火四處蔓延，超出東帝汶，燃遍印尼的種族—宗教群類的大拼盤。

這一切導致美國政策有一種顯著的（盡管是逐步的）轉變。在維也納召開的上次聯合國人權大會上，美國投票反對印度尼西亞；國務院阻止向它出售某種軍用飛機。克林頓在東京G7會議上溫和地責備了蘇哈托，旗幟鮮明地支持在加利（Boutros-Ghali）秘書長主持下重啟印尼—葡萄牙會談。與此同時，長期得到兩黨支持的國會關注點，微妙地從東帝汶人的人權轉向了他們的自決權。在這一轉向中，蘇哈托的上了年紀、印尼普遍騷亂日漸增多的跡象，還有統治精英中間的勾心斗角，無疑都發揮了作用。

對雅加達來說沒有出路。重返1970年代末的殘酷無情，那想都甭想；而1980年代的“發展”恰恰帶來的是東帝汶民族主義和天主教信仰的增強。表明了對這一絕境的意識的，莫過于新近出版的穆達尼將軍的回憶錄。這本書主要是作者的政治和軍事勛業的自吹自擂的一覽表；但是對東帝汶事務他三緘其口，只說了1975年那搞砸的入侵，這被歸咎于未指名的督辦者。或許最終的突破點將不得不等到蘇哈托政治或身體的死亡，盡管他過去已經顯示了現實主義與出人意外的改弦更張的能力。沒有哪個似乎可能的繼任者將有這樣的力量或能力，得以長久抵抗印度尼西亞帝國主義冒險事業的退潮。

## 7 撤退癥狀

君王無道久

十德俱悖逆

萬物陷大難

異象兆其跡

乾坤失軌轍

禍殃散四極

迦梨神烈焰

映照云如漆

昭披耶河水

如血洶涌急

狂癲攫原野

昏黃天郁滯

林深鬼競出

城荒人往匿

瓷瓦浮波間

葫蘆墜淵底。

《先知哀大城（Sri Ayutthaya）》（公元十七世紀前后）

### 引言

就其本身來說，軍事政變在現代泰國史上不是什么新東西。自1932年推翻絕對君主制的那次政變以來，已經有過至少八次成功的政變，以及許多不太成功的政變。[[305]](#_305_18)因此絲毫無須驚詫，有些西方記者和學者說1976年10月6日的那些事件在泰國政治中非常典型，甚至是在不合時宜地同民主調情三年之后，向常態的某種回歸。[[306]](#_306_18)然而事實上，10月6日標志著泰國史上一個不折不扣的轉折點，至少有兩條不同的理由。第一，1973—1976年間合法的左翼反對黨，其大多數重要領導人都加入了越來越勇猛和成功的游擊隊，不像他們歷史上的前輩那樣，在監獄或流亡中吃盡苦頭。第二，這次政變不是精英內部的突然襲擊，而是達兩年之久的公開恫嚇、毆打、暗殺等右翼活動的頂點，10月6日精心策劃的暴徒武力鬧事本身就是那些活動的最好象征。[[307]](#_307_18)

統治集團實施的政治謀殺已經是現代泰國政治的常規特征，不論是在1930年代后期鑾披汶·頌堪（Phibunsongkhram）元帥的獨裁統治下，還是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頌堪—炮·西耶儂（Phao Siyanon）—沙立（Sarit Thanarat）三巨頭統治下，[[308]](#_308_18)抑或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的沙立—他儂（Thanom Kittikajon）—巴博（Praphat Jarusathien）政權。[[309]](#_309_18)但是這些謀殺（有時伴之以酷刑）一般屬于“行政”性質，由正規的國家機構執行，往往是秘密從事。公眾對發生了什么事知之甚少，更必定不曾有影響地親預其事。1974—1976年間那些暴行的引人注目之處，在于它們非行政的、公開的，乃至暴徒的性質。1976年8月，曼谷人目睹了此前不可思議的奇觀：總理克立·巴莫（Kukrit Pramote）的私人宅邸被一大幫醉醺醺的警察大肆洗劫。[[310]](#_310_18)2月，社會黨總書記汶沙儂（Boonsanong Punyothayan）在他的郊區宅第外面遭到職業槍手伏擊，遇刺身亡。[[311]](#_311_18)受雇用的流氓們展示了大異傳統的暴力方式，比如不問好歹地公開轟炸，[[312]](#_312_18)這與更早時期的審慎縝密的謀殺形成鮮明對比。1976年3月25日，在猜納（Chainat）舉行了一次新勢力黨選舉集會，一顆手榴彈投來，當時有十個無辜者喪命。[[313]](#_313_18)而10月6日令人發指的私刑處決就發生在全暹羅最光天化日的地方——王家田（Sanam Luang），王宮前宏偉的商業廣場。

本文打算探討這一新強度、新方式的暴力行為的原因，因為這些暴力是暹羅當前社會、文化和政治危機的癥候。我的論證將順著兩條相互關聯的路線發展起來，一條涉及階級構成，另一條涉及意識形態劇變。

泰國社會的階級結構自1950年代末以來變化迅急。首先，新的資產階級各階層出現了，固然規模尚小，力量尚弱，但在一些緊要事項上與舊式的封建—官僚上層階級離心離德，甚至有點敵對。這些新階層——包括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是被1960年代越戰帶來的大繁榮孕育出來的，那時節美國人和美國資本以絕對前所未見的規模涌入這個國家，日本人飛快地尾隨而至。正是這些階層為近乎流行的右翼運動提供了社會基礎，那種運動明顯有別于較早時期的貴族與官僚的右傾行為。這絕非暗示說，將軍、銀行家、官僚和皇族的舊統治集團不再掌控現實政治權力的要沖，而是說，這些集團發現他們有了新的、或許是威脅性的、“大眾”的同盟者。[[314]](#_314_18)

意識形態劇變也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美國滲透的影響，而且主要表現在1973—1976年“民主化時代”爆發的思想革命。面對沙立—他儂—巴博獨裁政權對傳統主義符號的粗陋操縱以及那些符號的思想虛無性，許多年輕泰國人做出回應，逐漸公開質疑老式的獨尊的文化的某些核心元素。政府對此的反應是，大大增強對一種好戰的國族—國教—國王（Nation-Religion-King）意識形態的有意識宣傳和灌輸，這種意識形態不同于以前占主導地位的“因循守舊”（bien-pensant）的“傳統主義”。國族—國教—國王與其說是被普遍視為“天然地屬于泰國人的”，不如說愈發明確地變成了少數特定社會圈層的意識形態棍棒。這種自覺的右派意識形態宣講的明顯聽眾是新資產階級各階層，宣講者既有該階層自身內部的狂熱分子，也有統治集團當中某些狡詐的操縱者。

### 新階級的困境

在1950和1960年代，大多數西方社會科學家認為暹羅是一個“官僚制政體”，即完全由一種大體上自我賡續的（self-perpetuating）、現代化的官僚組織支配的政治系統。[[315]](#_315_18)在這個官僚階層下面，只有一個卑賤的華人商業階層和一個未分化的農民階層，兩者都只有低度的政治意識，差不多被排斥在政治參與之外。官僚和農民的關系被認為通常是和諧的、非剝削性的，[[316]](#_316_18)只涉及稅收、勞務、順從與安全、昌盛和宗教認同之間的傳統交換。多虧了十九世紀偉大的卻克里（Chakkri）王朝君主們的機智和遠見，暹羅在東南亞國家中獨領風騷，沒有屈服于歐洲或美洲的帝國主義，從而逃脫了強索高額地租、外居地主所有制、長期性的農民債務和鄉村無產階級化的種種禍害，它們在殖民化區域里是很典型的。暹羅經濟（1960年代前決不是高度發達的）根本上掌握在華人移民手里，他們由于其外來的、邊緣的地位，從來不能發揮一種活躍的、獨立的政治作用。[[317]](#_317_18)這幅祥和、剛強、獨立的暹羅的圖像，在有些緊要方面是虛妄不實的。西方資本、西方“顧問”和西方文化傳教士，對1850年代之后的暹羅施加了決定性的影響。[[318]](#_318_18)另一方面，如果與越戰期間美國和日本的滲透所導致的各種變化相比，1960年代之前的歲月真算得上“黃金般的”。遲至1960年，曼谷仍然能夠被說成是“東方威尼斯”，是一個靜謐的老派皇家港口城市，運河、廟宇、宮殿星羅棋布。十五年后，許多運河被填平了，筑成了道路，許多寺廟成了斷瓦殘垣。首都的整個重心已然東移，離開了昭披耶河畔的皇家庭院和華人聚居區，來到一個嶄新的都市區域，那里外表上和政治上都是巍峨的辦公大樓、銀行、賓館和購物廣場當家作主。這座城市以癌擴散的速度膨脹開去，吞沒了周邊的農村，把稻田變成了投機性的房產開發、瞬息萬變的郊區和龐大的新貧民窟。[[319]](#_319_18)

這種轉變在較小規模上也發生在某些府會城市，它是由外在于暹羅社會的種種力量引發的。根據三個彼此關聯的因素來說明這些力量，或許不無助益。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因素無疑是1945年后，美國不客氣地將歐洲殖民列強從它們戰前在東南亞的經濟、政治和軍事統治權上趕走了。[[320]](#_320_18)第二是華盛頓決定使暹羅成為它的全區域范圍內擴張行為的樞軸。曼谷不但成了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的總部，也是美國在毗鄰的老撾、柬埔寨、緬甸和越南或公開或秘密的林林總總行動的指揮部。[[321]](#_321_18)第三個因素——它的重要性別具一格——是技術革命，它使得大眾旅游業成為二戰后遠東地區的一項重要產業。（此前在該地區，旅游是上層階級的奢侈品。）就這種產業而言，曼谷是天然的節點：它不僅是該區域的地理中心，而且在美軍和本地獨裁政權的保護下絕對安全，尤其是它還提供了現代享受（國際大飯店、舒適的帶空調的交通、最新潮的電影）與有異國情調的古跡的不可抗拒的組合體。[[322]](#_322_18)在東南亞別的地方，殖民列國通常已經在沿海地區建起了文化平庸、以商業為導向的首府城市，它們遠離了古老的本土帝都。（因此旅行者不得不進行曠日持久的遠游，從雅加達到梭羅，從仰光到曼德勒—阿瓦，從西貢到順化，從金邊到吳哥。）

如果說美國對暹羅的滲透是二戰后的一個普遍特征，1959年后滲透的程度和步伐仍然有明顯區別，那時沙立的絕對主義獨裁政權建立起來了。他的前任鑾披汶元帥，是圣西爾軍校與戰前歐洲統治下的世界的相對雅致的產物。反之，沙立則是個鄉巴佬，是皇家軍事學院的產品，是戰后美國全球霸權時代上臺的人。正是他于1950年首次訪問華盛頓之后，親自主管泰國軍隊的美國化（在組織、理念、訓練、武器等方面）。[[323]](#_323_18)他在掌權前同五角大樓保持了近十年的密切關系，這意味著1959年后，他感到將暹羅和美國空前親密地聯系在一起輕松又自然。[[324]](#_324_18)在其他方面，從華盛頓的觀點看來，他也是個理想的獨裁者。他愿意也熱衷于使“發展”成為他合法性訴求的一部分，在制訂和貫徹發展計劃時接受美國培養的技術官僚的建議。[[325]](#_325_18)作為無可爭議的“鐵腕人物”，他比前任有大得多的權力敏捷果斷地采取行動。[[326]](#_326_18)最重要的是，沙立盡其所能地為暹羅吸引外國（尤其是美國）資本，相信外資是鞏固他本人及其繼承人的統治的必要工具。因此罷工被禁止，工會被強制性解散。外國公司的分支機構不僅獲準大體仍為外資所有，而且可以在暹羅買地，大幅免稅，甚至獲許自由地將技術人員帶入這個國家，而罔顧現存的移民法律。[[327]](#_327_18)泰銖被按照最正統的經濟學原理來管理，直到1960年代后期都是穩定性的一塊磐石。

執政五年后沙立死于肝硬化。但是他的繼承人，他儂和巴博，繼續遵循他的政策的基本方略。他們統治的開端與約翰遜對越戰的升級大致同時，他們伶俐地逮住了由此提供的機會。華盛頓受到鼓動，把暹羅當成一艘靜止的巨型航空母艦：在1968年這個高峰年，泰國境內大約有50,000名美國軍人，美國人還被許可建造和運作至少八個較大的軍事基地，另有數十座較小的軍事設施。[[328]](#_328_18)泰國統治者在軍事援助方面受到充足回報，不但如此，龐大的美國軍事存在帶來了快速的經濟擴張，首要的是建筑與服務部門。[[329]](#_329_18)與戰爭相連的經濟大繁榮發展起來，它建立在早先沙立時代的“戰前”繁榮基礎上，但遠遠超過了后者。正是他儂—巴博政權眼看著賓館、飯店、電影院、超市、夜總會和按摩院擴散開去，那是白人商人、士兵和游客的洶涌而至催生起來的。

如果說繁榮本身基本上是美國（和日本）的投資與花銷推動的，那么泰國人分享其收益的方式則受到政府政策的重大影響。其中最具決定性的政策之一是沙立當年的一項法令：取消容許的土地擁有的既定限額——50萊（rai）（相當于20英畝）。[[330]](#_330_18)這一法令為大規模土地投機奠定了法律基礎，只要繁榮本身還在延續，這種投機就持續增加。而且投機浪潮不限于曼谷。當美國人修筑和鋪平了通往老撾和柬埔寨邊境的多條長距離戰略公路（特別是“友誼”公路）時，[[331]](#_331_17)大城市和小地方的投機客們接踵而至，非常廉價地從勉強糊口的農民手里全部買下路旁的土地——那些農民哪里曉得土地是一種可以投機的商品。[[332]](#_332_17)土地投機是這樣一種經濟活動，其中法律技能、“內部消息”、“門路”及獲得銀行低息貸款的渠道等尤為重要。因此不用詫異，房地產興旺的主要獲益者不僅是傳統的泰國華人商業階層，還有中、高級官僚（軍官和文官）與政治人脈好的地方顯貴。炒得最嚴重的地皮往往是最接近曼谷的地方，那是資金賴以嘩嘩流進的漏斗。中部泰國的情形很能說明問題：在披汶時代（學者們一致認為）土地租佃不是個大問題，但到1960年代后期，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報告顯示，不到30%的農田依舊是自有自耕的。[[333]](#_333_17)

作為上述諸因素產物的泰國經濟的普遍“搞活”（dynamization），有助于造就或擴大至少四個社會圈層（social formations），它們對我們此處的目的很重要——也就是說，它們的生存主要依賴于繁榮的延續不輟。在商品化過程飛速展開的那些農村地區，位居要津的顯貴、稻米加工廠廠主、商人、村首等等，一夜暴富，其中大量新財富被重新投入土地。隨著農村地主所有制的發展，這就有了年輕人和失去產業者的與此相輔相成的外出，他們流向興旺的城鎮中心。[[334]](#_334_17)在城鎮，尤其是在曼谷，移民流產生了政治上反復無常的兩種社會群體：一是大批的失業或半失業的年輕漂流者，他們無論是留在城里還是回到村里老家，都是前途渺茫；二是這樣一些數量可觀的人，他們能夠在迅猛增長的服務型職業中找到一席之地，借此改善自己的處境。這支小資產階級大軍包括理發師、皮條客、指甲美化師、干洗工、私人汽車司機、裁縫、女按摩師、導游、機動車修理工、酒吧招待、接待員、出納員和小店主。這個新興的小資產階級很大程度上服務于第四個群體，并依賴于它的富足。那部分人多是城里土生土長的，總體上是個新興的中等資產階級，在某些方面同樣密切地勾連著外國資本和泰國國家機器。

表7.1和7.2可以幫助說明泰國階級結構中的這些變化的性質，并粗略顯示中、小資產階級的絕對規模以及它們占總人口的相對比重。B類的超常增長，A、F和I類（主要是中/上和小資產階級職業）的大幅增長，清楚揭示了十年間繁榮的社會學影響的性質。[[335]](#_335_17)取自197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其中上述幾個大類被分解成諸多細目，使我們得以粗粗估算出（見表7.2），到1970年的時候，中、上資產階級構成了勞動人口的大約3.5%（或可分成3.0%和0.5%），小資產階級約占7.5%。[[336]](#_336_17)

記住下面這一點總是有用的：社會群類（social groupings）一旦通過家族加強了它們自身，就變成了社會階級——這里家族是一種關鍵制度，在一代人內把權力、財富和地位聯成一體，又將它們傳給下一代。在沙立—他儂—巴博時代的暹羅，階級形成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各層次教育的大規模擴張，這部分是出于美國顧問和泰國技術官僚的“現代化”要求，但也是官僚機構對有向上爬的抱負的新生社會群體（和其中的家族）的需要的反應。1961年，全部五所大學有15,000名學生注冊；到1972年，十七所大學里有100,000名學生注冊。[[337]](#_337_17)從1964年到1969年，公立中學入學人數從159,136增加到216,621；私立中學人數則從151,728增加到228,495；公立職業學校人數從44,642增加到81,665。[[338]](#_338_17)“傳統上”（就我們此處的目的而言，是指從1880年到二戰），教育分化嚴重。極少數上層階級接受了有紳士派頭的西式教育，而絕大部分人口要么不上學或上公立小學，要么在佛教寺廟里受點兒教導。[[339]](#_339_16)不管哪個層次的教育都不曾產生對國家有重要意義的社會流動；相反，每一層次都幫著將它的受教育分子維系在他們現存的社會、經濟地位上。西式高級教育潤飾那些早已是生而治人的人。國家初等教育初級得似乎引不起什么改變命運的后果：它的存在更其是泰國政府的一個姿態，政府關心的是向外部世界展露一副現代的面孔，而不是響應農民的需求。佛教教育基本上是倫理和宇宙論導向的，沒有準備提供與職業有關的技能（雖然對一小撮平民來說，在僧伽分層考試體系中的成功會帶來平步青云的社會流動）。[[340]](#_340_17)





所以，1960年代教育擴張的真正意義，在于它主要發生在中、高等教育上。[[341]](#_341_17)有史以來第一次，許許多多泰國人開始渴望讓子女接受職業導向的教育，而且也存在這樣一些機會；過去的歷史表明，這種教育是社會地位提升的象征或途徑——尤其是穩固的國家官僚機構上層的進入許可。[[342]](#_342_17)正是以這種眼光，我們務必理解在沙立及其繼承人治下大學激增的政治意涵：它是一種符號確認，確認這繁榮昌盛不是運氣而是進步，它的賜福必將傳給家族內的下一代。人們有可能這樣去想象：在同一個屋檐下，父親是個成功的干洗工，兒子則是含苞待放的內閣部長。[[343]](#_343_17)因此大學繁榮起的作用是，在社會學意義上鞏固經濟繁榮，又從文化上肯定它。[[344]](#_344_17)

不過，不管泰國大學在數量、規模和入學人數上怎樣飛速擴大，許多有志家庭還是不能讓他們的孩子進去讀書。于是，在某種程度上，同樣快速擴張的技術學院、職業學院、商學院和其他學院就成了次優選擇。在這一切分層騷動的背景下，我想我們必須理解“大學生”（student）一詞本身在語義上的重大變化。早先那個年代，“大學生”幾乎是“國家精英成員”的同義語，是遠在他的國人這蕓蕓眾生之上的差不多最高層的人物。然而到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社會流動已經造成如此景況：“大學生”或許仍有高層的內涵，但也可能表示類似這種意思：“鄰家那個上了法政大學的小子；我的孩子卻沒上成。”以一種上代人會覺得不妥的方式嫉妒和憎惡大學生變得可能了。

然而即便對那些成功讓子女躋身大學的父母而言，“大學生”概念也有了曖昧難言的回味。流動性中的悖論在于，向上運動也是離心運動。沒上過多少學的父親們，根本上是工具性地看待大學教育的，他們發現自己常常被大學生子女舉止、目標和品行上的始料未及的變化嚇壞了，因為在大學和師范學院里，這些方面日漸受到從美國和中國滲透進來的反傳統觀念的影響。[[345]](#_345_17)人們一定想象得到，那些中、小資產階級的父母們，當他們的兒子蓄著“亂糟糟的”長發，言語無禮，道德上吊兒郎當，觀念上非圣無法，紛紛回到家里的時候，他們是如何憂心和憤怒：這種人究竟怎么能夠官場得意呢？

大約在1971年或1972年，黃金盛世正在消退之感開始彌漫開來。美國人正從印度支那撤軍，長期以來暹羅邊境上共產主義聯合的幽靈，開始呈現為一種危險的現實。官僚機構，曾是眾多社會希望的終極目標所系，也膨脹到了飽和點；大學文憑漸漸地不復保障它們一度被假定會保障的東西——穩定的、地位高的工作。[[346]](#_346_17)在長時間的物價平穩之后，兩位數的通脹率給泰國經濟猛然一擊。[[347]](#_347_17)當大繁榮看起來行將落幕時，某種不安和不滿在它的受益者中間發展起來。只要獨裁政權還在經濟、治安防衛和教育部門中“開工生產”，被排斥在政治參與之外一直是可以容忍的，但是隨著問題日積月累，它就變得遠非那么可忍了。再說，無論他儂還是巴博都沒有沙立那種令人畏懼的個人勢力。[[348]](#_348_17)

在這個背景下，滾雪球似的群眾大示威就有了格外重要的意義，那些示威把他儂和巴博拖下了臺，當時是1973年10月，世界石油危機爆發的那個月。[[349]](#_349_17)毫無疑問，新興資產階級各階層決定性地貢獻出大批人群，站出來支持學生與知識分子的要求：要有一部憲法，要尊重公民自由。甚至可以證明，是這些階層確保了示威的成功——假如示威群眾是由貧民窟居民而非通常穿著考究的城里人組成的，獨裁者原本可能贏得對鎮壓的更多支持。

與此同時，資產階級各階層的參政應更多看作是他們最近歷史的產物，而不是他們未來政治角色的預演。其實明擺著的，他們完全缺乏政治經驗，因而對結束獨裁的后果會是什么，茫然無真知灼見。這個政權同時因兩種緣由受到指責，一是未能更充分地迫使美國對暹羅盡責，二是對華盛頓奴顏媚骨。（正面則是一種急火攻心、茫然不解的反美民族主義，它表達在像這種情緒的組合中：“你們為什么在印支讓我們失望？”“瞧你們是怎么敗壞我們的姑娘們的！”）巴博的公然腐敗，他儂的兒子納隆（Narong）與巴博的女兒之間的王朝婚姻，以及他借助裙帶關系的閃電掌權，全都冒犯了資產階級的情感。國王和某些高級將領出于各自的原因支持示威者，即便只是間接支持，這也很重要。最后，我們必得記住，大學生的要求本質上是合法的（合憲的）和象征性的。誰也沒有料想這些要求會生發出什么危險的或人所不欲的東西。的的確確，大學生們在示威的最后日子里搗毀了不少警察局，可是難道他們沒有以十分負責的態度，保持交通的暢通無阻，之后又清掃街上的臟東西嗎？隨著腐朽無能的獨裁者的垮臺，繁榮、和平、進步將在國王及其開明親隨的仁慈管理下恢復，那些親隨包括資深的法官、可敬的教授和干練的銀行家。

這些期望無一近乎實現。差不多在1973年10月示威的同時，世界石油危機爆發了。到1974年初，暹羅開始感受到危機引發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混亂。1975年春，美國在印度支那的地位土崩瓦解了，快得令人目瞪口呆。而今暹羅不再是美國的東南亞帝國的安全樞紐，反而臨近它脆弱的外圍。似乎可以設想，從今往后新加坡將扮演曼谷的角色，泰國首都自身則扮演萬象的角色。暹羅發現它的經濟嚴重衰退了，這是它邊界以外那些事件的一個直接后果。[[350]](#_350_17)1973年10月后的自由主義政府公開承諾保障公民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農民和工人組織工會、示威與罷工的權利，這似乎是雪上加霜。訕耶·探馬塞（Sanya Thammasak）政府（1973年10月—1975年2月）采取了現實的（即便是怯懦的）措施，直接答應工人們的要求。[[351]](#_351_17)沒錯，在一定程度上，那些立足未穩的新企業特別易于遭受利潤降低和工資要求提高之間的擠壓之苦。[[352]](#_352_17)在獨裁制下，中產階級發達了，工人卻不得不接受可憐的收入；如今工人們時來運轉了。然而資產階級各階層作為一個整體越來越出離憤怒，這有著更復雜的根源。首先，工會的發展本身預示了一種危險，即暗中破壞此前總體上盛行的恩主—附庸的“家族”式雇主—雇員關系。[[353]](#_353_17)（有社會地位野心的資產階級分子，從對其部屬扮演準封建的角色中獲得了精神收益，低估這種收益或許是個錯誤。）第二，許多罷工發生在像交通運輸這類部門，在這里，對資產階級群體來說，要將個人的麻煩解釋為對公眾利益的冒犯尤為輕巧。第三，也許是最重要的，泰國新聞業的權要部門，它們處在龐大的商業利益集團的掌握之中，頻頻彈起這樣的調子：這種罷工是反國家的，因為它們嚇跑了“國民經濟”如此仰其鼻息的外國投資者。因此要將整個經濟的頹敗諉過于工人的不負責任，簡直易如反掌。

最后，在另一個平靜的領域里，獨裁政府種下的惡果到自由主義時期顯現出來：中學、職校乃至大學的畢業生中間，失業率節節攀升。[[354]](#_354_17)實際上，教育繁榮及其提高地位和安全感的指望，都跌入低谷。在這種狀況下，大學生的形象——待在家里的失業（找不到工作的？）游民，或是店里廠里不安分的搗亂煽動者——成了新資產階級各階層中間理不清的全部怨憤和挫折感的首要焦點，這并不讓人大驚小怪。[[355]](#_355_17)

我們可以設想那時一個惴惴不安、突然生成的資產階級——潮涌而來的第一代轎車擁有者和駕駛者部分造成了曼谷嚴重的交通問題[[356]](#_356_17)，他們直面著拮據的經濟景況，將至未至的更糟的困境威脅著他們；他們不僅擔憂長期繁榮的終結，而且種種恐懼感縈繞心頭：害怕這繁榮是一條單程的歷史拋物線的一部分，害怕沙立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害怕他們發于巷陌微塵，又將終于巷陌微塵。再者，我們必須知道，這個資產階級特別容易表現出對窘迫境遇的偏執狂反應，他們沒多少政治經驗，對政府只有些簡單觀念，但是恰恰因此有一種強烈意識：“亂局不該怪他們。”（依托當時環境，我們能夠想象遷怒于腐敗、大學生、共產黨人、外國人或華人的這種偏執狂。）結果，在1975—1976年，出于后面將要論及的原因，激進化的大學生——資產階級的成功者，但似乎唾棄那種成功——漸漸成了這一受驚的怒火指向的主要目標。為什么真誠支持1973年10月的群眾大示威的同樣一些人，有許多在三年后歡迎獨裁政府卷土重來呢？我想這就是解釋。

不過他們不是10月6日暴行的直接行兇者。為此我們仍需努力辨認出兇犯，并將他們置入迄今為止所勾勒的廣闊的社會學架構中。毫無疑問，最臭名昭著的施暴人是“紅牛”（Krathing Daeng，即紅衛隊），不光在1976年10月6日，還在先前兩年間，他們都是施暴人。記者和學者們（我想有點誤解地）賦予這些流氓一種準社會學的可敬身份，把他們簡單認作是職業學校學生。這論點認為：既然1973年10月警察鎮壓之際是職業學校學生而非大學生首當其沖，那么將紅衛隊攻擊大學生解釋為表達了一種率真的憎恨，長期遭受苦難的地位卑下的職校學生對養尊處優、傲慢膽怯的“學院小子”的憎恨，也就似乎有理了。[[357]](#_357_17)紅衛隊—職校學生間的等同，也許在許多人心目中被一系列慘烈（但多數無關政治）的沖突加強了，1974年末和1975年，那些沖突發生在相互競爭的各職業學校的青少年之間。[[358]](#_358_17) 既然這些男孩彼此槍彈相向，而槍和炸彈也是紅衛隊喜愛的武器，那就容易跳到這個結論：后者在政治上代表了前者。

下面這段話摘自保守的《曼谷郵報》某篇文章，提示了一幅更為復雜的紅衛隊畫像：

另一個有意思的人是杜伊（Doui），他被任命為［紅衛隊］一支機動分隊的頭目，那支部隊能夠快速地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杜伊學嬉皮士的樣兒留著一頭長發，臉上長個大傷疤，他說他手下有50人。這些人大多是雇傭兵，他說，他們住在黎府，作為該地區道路修筑的安保部隊。

我從前是當兵的，但是后來我做了雇傭兵。我喜歡軍服，可我不喜歡軍隊里有太多紀律和規定。我喜歡我行我素的自由，蓄長發，想穿什么穿什么。[[359]](#_359_17)

曼谷的消息靈通人士證實說，紅衛隊的許多核心干部都是過去的雇傭兵和因違反軍紀從軍隊除名的人，他們的部屬主要由失業的職校畢業生、中學輟學者、街頭無業少年、貧民區惡棍等等組成。[[360]](#_360_17)紅衛隊受雇于ISOC（國內安全行動指揮部）內各派系以及專門從事警務和情報工作的其他機構，[[361]](#_361_17)它征募新人，主要不是基于意識形態承諾，而是靠高工資的許諾、豐富的免費烈酒和逛妓院的優惠，還有名揚四海的誘惑。引人注目的是，這些酬勞如何折射了成功的大學生進入政府部門時預期的特權（金錢、聲望、出入夜總會和按摩院可以報賬）——至少處在一心往上爬的小資產階級環境下會如此預期，正是從那種環境里冒出了紅衛隊。[[362]](#_362_17)易言之，這些流氓扮演的政治角色有一種社會學基礎。新興的、脆弱的小資產階級的孩子們，困在一個廣泛失業的時代，[[363]](#_363_17)得不到政府部門的工作，又瞧不起工廠里的工作，他們是反（不成功的）大學生和反工人的宣傳的易感對象。

還有一個群體是鄉村童子軍（Village Scouts），并未少摻和1974—1976年的右翼暴行，[[364]](#_364_17)但公共形象稍微體面些。它建立于1971年，由邊防巡警（BPP）和內務部聯合領導，那時顯然被構想為一種輔助正規軍的、反共的鄉村治安防衛組織。[[365]](#_365_17)然而在自由主義時期，它發展出一支可觀的城市分部，發揮了動員各種右翼勢力的重要作用。如果說在1973年10月前，鄉村童子軍是軍隊強權人物、內務部長巴博與在BPP中勢力極大的皇室之間審慎競爭的舞臺，那么當獨裁者垮臺以后，它更是明目張膽地成了構建一個激進主義保皇派的工具。甚至在獨裁政府下，宮廷就已利用種種公共關系技術，拼命把自身與經濟繁榮的受益者們綁在一起。[[366]](#_366_17)當1973年10月后童子軍擴編時，這種經驗證明非常有用。童子軍的領導層多出自富人和中年人，地區官員、鄉村聞人和城市新富。[[367]](#_367_17)這樣的人不僅在意識形態上傾向于擔負如許職責，而且有私人資財能幫助組織既快速發展，又在相當程度上獨立于國家官僚機構。[[368]](#_368_17)由BPP司令部系統安排的“訓練計劃”，本質上是政治性的：右翼僧侶的講座、游行檢閱、宣誓、敬禮、選美和賽舞、參觀軍事設施、皇家捐贈典禮和“歌詠會”。[[369]](#_369_17)從右翼角度來看，鄉村童子軍美就美在，該組織是靠以下這個互惠之舉運轉的：對宮廷而言，它提供了持久不輟的公開證據，證明在曼谷上層階級之外，在地區首府、小鎮甚至某些村莊的“禮俗社會”中，存在著對皇室的激進政治支持。（它的名號里的“鄉村”［“村莊”］一詞，給出了一幅令人欣慰的——盡管是欺騙性的——田園共同體的圖景，那種共同體是從組織上予以保證的，可以說，它是國族和國王間天然紐帶的一種具體表現。）另一方面，對童子軍領導人而言，有了皇室的庇護，他們對起而抗議的農民和學生激進分子采取的那種私人化、地區化的鎮壓行動，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合理化為維護國族—國教—國王之所必需。

除了紅衛隊和鄉村童子軍，還有右翼暴力行為的其他一些行動者，它們組織和指揮要稍遜一籌，但同樣是大繁榮及其后一段焦慮時期的產物。一般而言，這些人來自安保機構的邊緣和/或新設部門：內地警察和平叛人員，由于世界經濟蕭條和美國的戰略撤退，他們眼看著預算、編制和晉升機會都減少了；被派往南方任職、職業生涯走入死胡同的官員（不管是因為缺乏良好的關系，還是因為在別的地方政績不佳）；還有美軍基地棄用的衛兵。[[370]](#_370_17)這些人發現自由主義年代的經驗幾乎在每一方面都令人沮喪、擾亂人心。他們習慣了要別人嚇得服服帖帖，經常對人施加專橫的地方權威，尤其是要享受法律和批評的實質豁免權，[[371]](#_371_17)所以他們被1973年10月以后容許的出言不遜、揭發黑幕的新聞記者深深激怒了。作為靠薪水為生的人，他們因為通貨膨脹，也因為兼職和勒索機會的某種減少而受傷。1960年代官僚機構大擴張給了他們機會進入政府部門，如今他們也面臨與非官僚的新中小資產階級那部分人相同的前景：停滯，如果不是衰退的話。從這失意和怨恨中，生發出對獨裁制全盛時期的懷舊，對獨裁制那些桀驁不馴的敵手的暴怒，這就不算出奇了。

### 意識形態劇變

上文簡述的經濟和社會變化又引發了文化危機，理解這一文化危機深度的途徑之一，就是從暹羅與它的區域鄰邦之間一個顯著差異入手。大多數東南亞國家，部分由于它們殖民化的歷史，承襲了一套與自身特性相稱的、本質上是激進—民粹主義——即便不是左翼——的政治詞匯和修辭。在別的任何地方（也許菲律賓例外）都很難找到一種沉著自信的保守意識形態：實際上，自十九世紀以降，保守的文化一直處于認識論的休克與政治的守勢中，它的民族主義信任狀也飽受懷疑。在暹羅，主要由于這個國家躲過了直接的殖民控制，直到最近，情況幾乎完全顛倒過來。[[372]](#_372_17)泰國兒童教科書里的英雄人物，從來不是記者、工會領袖、教師和在殖民當局大牢里蹲過多年的政治家，而首先是統治王朝的“偉大國王”。事實上，一直到1973年，人們大概難以想象，泰國兒童的某個英雄竟然曾坐過牢。主流的修辭往往是保守、因循和尊王的。恰恰是左派老是處于守勢，針對說它是“中國的”、“越南的”、“非泰國的”和“反君主的”（這最末一項清楚顯示了皇家象征與民族主義象征間的有效等同）那些指責，急于捍衛它的民族主義信任狀。這樣說想必不為過：在10月6日的鎮壓行動之前，即便是堅定不移地站在左派立場的那些人，也接受了這一禁忌：不可批評作為制度的君主制或者作為個人的君主。[[373]](#_373_17)

誠然，十九世紀的賢能君主們，特別是拉瑪四世和拉瑪五世，通過向歐洲帝國主義列強的機敏讓步，以及在列強間巧施計謀，的確在某種意義上“拯救”了暹羅免遭征服和殖民化。但是我們可別忘了事情的另一面：“拯救”暹羅使這些統治者成了泰國史上最強大同時也最依附的君主。因為如果說在十九世紀內這些歐洲大國威脅到暹羅，它們也干凈利落地消除了她的傳統之敵的威脅——緬甸人、高棉人、越南人和馬來人。泰國軍隊沒有跟任何人打過一場大仗，幾達百年之久（約1840—1940年）。[[374]](#_374_17)舊敵太弱，新敵太強。這種外力生成和維持的安全使統治者們能夠空前地專心于他們國內權力的鞏固。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即便這種鞏固也只有多方仰賴歐洲的顧問、技術、資金和武器才行得通。[[375]](#_375_17)在一種預示了沙立“專制主義”的模式下，這個王朝得以利用外力造就的安全與外力產生的資源，最大限度地增強國內控制。正當暹羅最徹底地聽任歐洲人擺布時，泰國的“絕對君主制”也最接近于實現。[[376]](#_376_17)

1932年，大肆膨脹的“西式”文官機構和軍事機構，突然變成了皇室的主人，它們早先不過是皇家擴大自身權力的工具而已。1932年政變的領導者們決定性地讓君主制直接的、實際的政治權力壽終正寢，雖然不曾試圖采取任何非同小可的措施永久性削弱它的文化中心地位和“民族主義”聲望。“泰國”——披汶終將這樣稱呼暹羅——依舊被定為（立憲）君主制。拉瑪七世曾深深卷入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的政治危機之中，當他于1935年遜位時，政變領導人立即將皇位交予民族傳奇救星拉瑪五世（朱拉隆功）的一個孫子，萬幸的是，當時他尚未成年。[[377]](#_377_16)二戰期間這個男孩在瑞士上學，這一事實不過保護了君主制的清白，使它免遭披汶與日本軍國主義勾結的玷污。

然而也有一種看法認為，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的披汶時代確實標志著暹羅實實在在的文化—意識形態變遷。因為這個獨夫竭力通過民族主義宣傳使他的權力合法化。很大程度上，他有能力讓官僚機構——首要的是他實際權力所系的軍事部門——顯得是民族利益的公共看管人。比以往清晰得多的是，民族與君主制成了思想上可分的兩個概念，而政府（最根本的是武裝部隊）是其中一個的代理人，是另一個的拱衛者。[[378]](#_378_16)在一些重要方面，這種發展有助于將君主制供奉為民族的某種可貴的保護神。[[379]](#_379_16)

盡管如此，披汶的過深卷入1932年政變，以及他對1934年波沃拉德（Boworadet）親王的保皇黨反政變的鎮壓，還是讓他遭到皇室家族的持久痛恨。因此在他的第二個公職任期內（1948—1957），他不能如己所愿地利用君主制的符號資源。[[380]](#_380_16)也許不得已而求其次，到1956年當他感到權衰勢微時，他轉而求助于民主制的符號。[[381]](#_381_16)

正是沙立元帥展現了披汶早期軍國主義的“幕府將軍式的”全部潛力，進而顯著改變了泰國政治的整個意識形態氛圍。沙立是皇家軍事學院的國產產品；在1932年政變及其后續中，他太年輕，還不能扮演什么重要角色；也不像披汶，他甚至從未假裝對憲政主義或民主主義觀念感興趣。這樣就沒有什么大不了的障礙能阻止他迅速與王宮重修舊好。掌權后不久，沙立發動一場系統運動“修復”君主制，而且在給了它新的光輝之后，強固了自己的位子。在披汶時代，國王和王后幾乎不敢越國都一步。現在他們被送出去，滿世界長途旅行，同別國首腦尤其是歐洲君主們親切會談；形形色色歐洲王室成員的回訪受到鼓勵——如此等等。[[382]](#_382_16)自絕對君主制時期以來不曾舉行過的王室禮儀，而今恢復生機。[[383]](#_383_16)國王和王后不僅頻頻出面與泰國百姓接觸，而且也被派出去，通過仁慈的捐贈，幫助“融合”部落少數族群。我們幾乎可以說，在沙立統治下，發生了傳統角色的一種奇怪置換：陸軍元帥扮演了統治者角色（犯罪的懲罰者，[[384]](#_384_16)稅收的征集者，軍隊的調度者，總體而言的政治權力大佬），統治者卻扮演了佛教僧侶領導層的角色（把權威神圣化的人，無私美德的典范）。所以我們不必驚訝，當獨裁制坐穩江山時，君主制在某些方面變得更為“神圣”了。

沙立不滿足于利用君主制，他還利用佛教。1962年，他消除了分權的、頗為民主的現存僧伽組織，代之以僧王（Supreme Patriarchate）控制下的一個專制、集權體系，把柔順媚主的人塞進這個機關。[[385]](#_385_16)在他的授意下，兩位得人心的、有自由思想的高級僧侶被褫奪了教階，并因莫須有的罪名遭到起訴（一個被控同情共產黨人，另一個被控雞奸）。[[386]](#_386_16)最后，很大部分僧伽被動員起來支持（對不信佛教的山地部族）“一體化”（integrationist）、反對叛亂的計劃，尤其是在不太平的北部和東北。[[387]](#_387_16)佛教符號和制度被玩世不恭地操縱著，給政權生成合法性，此舉多得前所未見。[[388]](#_388_16)正是在沙立時代，這個小三重奏“國族—國教—國王”由溫和的箴言變形成了好戰的政治口號，而且越來越被認為就是這樣子。[[389]](#_389_16)

然而，要是從上文推斷君主制和僧伽的聲望是以相同方式受到獨裁制與大繁榮的影響，那可能就錯了。我們已經看到，有充足理由相信君主制這一方面是提升了地位。“皇室的復興”與繁榮之始重合，對許多新近發家的泰國人來說，這種重合很難說是偶然。在你來我往中，發展肯定了御座的合法性，御座又賦予發展以道義光輝。另一方面，看起來很清楚，資本主義的強大世俗化影響同時腐蝕了佛教的權威，特別是在貴族和上層資產階級社會集團里。這些階層的男孩們越來越不樂意做和尚，哪怕是象征性地做一段時間，更不要說終生獻身于宗教信仰了。信念堅定的年輕和尚往往出身于低等階級和鄉村背景，這種情況比以前更為多見了。可想而知，結果是僧伽自身內部激化的政治—宗教沖突。[[390]](#_390_16)數量日增的年輕僧人，尤其是出自貧窮的東北部的那些僧人，走向社會激進主義[[391]](#_391_16)和對宗教教義的左傾解釋。[[392]](#_392_16)另外一些人，比如聲名狼藉的吉滴烏斗（Kitti Wuttho），公然把佛教與極右意識形態聯系起來。[[393]](#_393_16)于是通過這一切方式，僧伽被直接帶入政治沖突當中。

到目前為止我們只考慮了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傳統諸要素的轉變。但是正如弗勒德相助表明的，在該傳統的反對者當中，變化也在發生。學生和知識分子尤其受到越南戰爭的深刻影響。越南人抵抗美國巨無霸的勇氣和毅力喚起了越來越多的景仰。曾在1960年代后期赴歐美留學、前程似錦的許多大學生，受了反戰運動影響，也參加了反戰運動。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正洪水滔天，毛澤東反官僚制思想的國際威望正當鼎盛。在暹羅自家，龐大的美國軍事存在正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猖獗的賣淫、沒父親的混血嬰孩、吸毒成癮、環境污染，以及泰國生活諸多方面的庸俗的商品化。到1970年代早期，日見強烈的反美（和反日）民族主義正顯山露水，其象征是1971年出版的一本影響很大的書那滿腔仇恨的書名：《白禍》（White Peril）。[[394]](#_394_16)1972年，學生們在曼谷成功組織了一次抵制日貨運動。[[395]](#_395_16)

然而獨裁政權強加的審查制度（無可否認，他儂治下比沙立治下寬松些）向幾乎每個人隱瞞了發展中的思想騷動的真實程度。1973年10月14日以后，審查制度一夜間無影無蹤，批評性的詩篇、歌曲、戲劇、散文、小說和書籍的一股日見浩蕩的激流，先是在首都，然后在外地，泛濫開去，令公眾驚訝不置。這些作品里有很多都是在獨裁政權下寫作或譜曲的，但從未得見天日。[[396]](#_396_16)而10月那些日子本身的激進化感受，以及自由主義時期的自由風氣下大學生中間的政治意識猛增，這些因素造就了另一些作品。

1973年10月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后果采取了兩種截然對立的形式。左派那面，一種幾乎令人眩暈的興奮感、偶像破壞和創造力生成了。有一段時間里，仿佛人們說、唱、做不管什么事情都行。右派那面，一種錯覺迅速扎根：新成立的自由主義政權是顛覆性觀念突然流行的原因。很快地，民主政權因為獨裁政權及其與美日資本主義的串通所引致的種種后果而遭到責難。

可以預料，有意打造來支撐沙立獨裁政權的那些意識形態工具，漸漸與這個問題連接起來：國族—國教—國王。這中間，國教是最次要的，起初沒有引發多大激動。但是在國族問題上，左派很快進入攻勢，或多或少按照以下思路論證它的立場：正像披汶與日本通敵一樣，沙立及其繼承人也把國家出賣給了美國人。泰國歷史上以前從未有過幾達50000人的外國軍隊駐扎在泰國領土上。政府聽任經濟勢不可擋地落入外國人手中。在民族認同的一切言論之下，獨裁者漠然地容許泰國社會和文化的腐敗。這個過時的政權那么奴性十足地追隨美國人的反共主義和對中國擴張主義的妄想癥，而面對尼克松—基辛格馬基雅維利式的靠攏北京，它只剩下可笑的呆若木雞。概而言之，右派的政策業已證明不僅是貪腐的、機會主義的，也是鼠目寸光和終必破產的。

長遠看來意義更大的是一種哥白尼式視角轉換的清晰征兆，這種視角關乎保守的泰國意識形態的核心元素：君主制的歷史中心地位和民族主義合法性。集·普密薩《今日泰國封建主義的面目》的風行一時就是這一點的明證，因為這部論證嚴密的書，專心一意論述十九世紀前（故而也是歐洲帝國主義東來前）的暹羅，根據壓迫的統治者與抗爭的被統治者之間的基本沖突來解釋泰國史的全部歷程。但是集·普密薩的書不過是1973年后出版的大量學術性和新聞性著作之一，那些著作究問泰國的過去，所用范疇暗中拒斥或邊緣化了傳統的保皇主義—民族主義神話。努力從這樣一些文化—意識形態發展中揣想日常的社會反應，這很有用處。我們一定會想到，泰國大學生當著父母的面討論暹羅的十九世紀，但談論的重點不是偉大的拉瑪五世國王，卻是農業的商品化、買辦群落的增長、外國的滲透、官僚機構的權力擴張，如此等等。僅僅運用社會過程和經濟力量的語匯，就是對作為國史主角或國史化身的泰王中心地位的否定。的確，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繞過傳統歷史范疇的做法，雖則肯定常常是年輕人懷著幼稚的慢待或狂妄的輕蔑之心胡搞一氣，卻可能比直截了當否定王室的聲望和權威看起來更有威脅。[[397]](#_397_16)（我們絕不應低估代際敵意加劇意識形態對抗的力量。[[398]](#_398_16)）

現在應該有可能更清楚地理解，為什么在自由民主政府成立、審查制度廢除之后沒多久，對“大逆不道罪”的起訴就開張了。[[399]](#_399_16)事情并非單純是統治集團被激進化的大學生的敵對修辭惹惱了。倒不如說，泰國社會盤根錯節的全部危機開始圍繞著君主制這個象征具體化了。長期經濟繁榮的結束，教育飛速擴張所帶來的意外挫折，代際疏遠，[[400]](#_400_16)還有美國的戰略撤退與軍事領導能力的讓人生疑所引發的驚慌——這些相互勾連的危機被心神不寧的新資產階級各階層錐心刺骨地體會到了。對這些階層而言，君主制既是一道護身符，又是一種道義托辭。該制度的歷史厚度和穩固性仿佛是防止動亂和分裂的一種魔法。不管他們生活多么腐化，也不管他們經濟和文化上其實有多依賴外國人，這些階層的成員們感到，他們的民族主義自尊，要靠他們對君主（民族傳統的縮影）的忠貞給予道義保障。因此對君王合法性的任何攻擊，即便是間接的，都必然讓他們覺得是對那個托辭的威脅。

1974年的隱憂（它引致了第一樁大逆不道罪的審判）后來被印支事件無限加重了。1975年春季的數周之內，萬象、金邊和西貢通通被共產黨軍隊攻克。在短時間里，主要后果是驚慌失措的資本外逃。在稍長時期里，君主的實際（相對于象征）角色發生了關鍵變化。因為幾乎不用懷疑，12月老撾君主制的廢除攪得人心惶惶：拉瑪九世最后或許是他的家族的末代君主。（五年前高棉王朝喪于右派之手，實際上曾經引起喝彩。）[[401]](#_401_16)于是國王在他的公開講話中，日益采取一種背水一戰的保守主義反共路線。王室的轉變適時地被所有右翼集團注意到了，他們因而大受鼓舞，繼續暴烈地采取攻勢。

由于右翼分子在大眾傳媒特別是廣播電視[[402]](#_402_16)中的穩固地位，1975年秋發動起來的這一攻勢，到1976年春（特別是為四月議會選舉開展的競選運動期間）即進入高速運轉狀態。比如，泰國民族黨黨首巴曼·阿滴列山（Pramarn Adireksan）將軍，利用他對國家控制的媒體的行政權力，公然喊出口號“右派干掉左派！”——這種事一年前他是沒膽量做的。[[403]](#_403_16)被右翼分子控制的各家電臺，特別是極右的裝甲師廣播電臺（Armored Division Radio），請人寫了暴力歌曲并不停播放，如“Nak Phaendin”（人間惡棍），“Rok Phaendin”（地上人渣）等。吉滴烏斗“佛教贊同殺死共產主義者”的名言得到廣泛、持久的宣揚。當然暴力也不單是口頭上的。前面提到過，1976年春夏，人們目擊了一整套肉體暴行。

關鍵之處在于，整個右翼攻勢圍繞之展開的樞軸是君主制，后者愈益認同自由主義政權的敵人，并處其羽翼之下。所以很有特色的是，1976年10月6日推翻現政權的爆發點，竟然是一樁純屬捏造的“大逆不道”案。十來天前，9月24日，佛統那兒的兩個工人，因為張貼傳單抗議前獨裁者他儂偽裝成僧侶重入暹羅，結果被幾個當地警察毆打至死，尸體還被懸吊起來。[[404]](#_404_16)政變前兩天，一個激進的學生劇團在法政大學的菩提樹（Bo-Tree）庭園上演了一出戲劇，生動再現了那起謀殺，這場演出也是驅逐他儂的全國性運動的組成部分。[[405]](#_405_16)狂熱的右翼報紙《暹羅之星》將演出照片稍作加工，暗示“被扼死”的一個演員化妝化得像太子。[[406]](#_406_16)在狼狽為奸的伎倆中，裝甲師廣播電臺播報了這起對王室的毀謗，敦促市民們去買一份《暹羅之星》報紙，要求懲罰這種對皇家的“殘忍攻擊”。[[407]](#_407_16)行私刑的暴眾由此發端，為軍事接管鋪平了道路。

也許值得強調的是，這類陷害與串通一氣的媒體運動在泰國政治中是極新之物。當沙立陷害披莫丹和薩沙納索蓬，或是炮·西耶儂謀殺反對派國會議員時，他們是關起門來以行政手段犯下罪行的。1960年代的大眾傳媒總是提醒說，政府會嚴厲處置那些共產主義者和顛覆分子。然而在1976年，陷害被展現在光天化日之下，并邀請公眾為顛覆報仇。

這一點的原因在于，被國內外的發展所削弱的舊統治集團，一直在尋找新的國內盟友，終于在舊獨裁政府造成的迭遭打擊、迷茫憤怒的中小資產階級中間找到了。像國族—國教—國王這些公式化表述被提煉發揮和加以運用的露骨方式，既表明了一種漸增的普遍意識，感到他們不再真正具有支配地位了，也表明了因1970年代的文化革命而起的現實的憂懼和仇恨。[[408]](#_408_16)

10月6號的后果于是指向兩個相異又相連的方向。一方面，政變明顯加速了泰國政治的世俗的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對君主制的直接、公開攻擊森然迫近。[[409]](#_409_16)自由化的和激進的大量群體，漸漸明白他們在曼谷現存秩序里沒有位置，于是紛紛流亡異鄉或參加游擊隊，人數空前。另一方面，一度占據統治權的右派，其政治觀念和符號變成了自覺的口號，有著日益特定的社會支持者。在1950和1960年代，對許多泰國保守人士來說，真誠地把泰國左派視為一種外來的少數族群（“其實是”越南人、中國人，或諸如此類），把反共斗爭視作一種崇高的民族圣戰，尚可自圓其說。如今，這樣的觀念就算對右派也愈益難以置信。10月6號事件加快了這一進程：右派（幾乎是不知不覺地）慢慢承認它卷入了內戰。長遠來看，這種變化很可能證明是決定性的，因為現代歷史表現得清清楚楚，除了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之外，任何革命運動，只有贏得或被授予民族主義的榮銜方可成功。[[410]](#_410_16)

## 8 現代暹羅的謀殺與演進

1983年，暹羅最叫座最流行的東西之一，是一部非同凡響的電影，名喚Mue Puen。英語廣告把這題目翻譯為“The Gunman”（槍手），不過另一種或許更佳的譯法當是“The Gunmen”（槍手們）。因為導演邀請觀眾思忖兩個受雇于人的刺客——英雄和惡棍——之間的差異，他們一個為私人企業干活，一個為政府干活。在開始的閃回鏡頭里，兩人被展現為一對戰友，效命于中情局付錢的“秘密”雇傭軍，在1960年代末的老撾作戰；他們在那里練成了使用高性能自動步槍的神槍手。然而在一次慘烈的交火中，英雄受了重傷，被他那怕死的戰友扔下，任憑敵人擺布。電影的故事正片被設定在當代曼谷，講述了兩位主人公以后的職業生涯。英雄有條腿嚴重殘廢了，形式上靠做理發師謀生，但我們很快看到，他暗地里是個收費高昂的職業殺手。他的主顧是富商們，他的槍下鬼亦然。

另一方面，惡棍已成為曼谷都市警察一個名聲遠播的特種部隊小組的頭目。他精于將罪犯誘入陷阱，在那里以冷冰冰的、百步穿楊的精確性擊倒他們。大眾媒體通常稱他Mue Dam（黑手），因為當他準備為雇主即政府殺人時，持槍那只手上招搖地戴著黑手套。換一個社會，他興許就是某個暗殺小隊的天然老大。

電影向我們展現了殺手們的處境和動機，由此從道義上把他們區別開來。英雄已經被妻子拋棄了，照料重病的孩子的責任，也全落到他本人頭上。謀殺是他唯一的手段，可以籌集到為小家伙施行昂貴的外科手術所需的款子。惡棍殺人是想補償他對早年的懦夫行徑的記憶，想獲得媒體的關注，還想讓酒鬼老婆佩服；他跟她的性關系明顯是施虐狂的。因而他利用政府特許的殺手地位，滿足各種令人厭惡的私欲。但是唯恐觀眾以為惡棍是一種疾病所致的反常情況，導演不忘給他配了個小警察心腹，后者在替政府暗殺中獲得了更陰森的快感。

很難想象這樣一部電影會在東南亞其他地區攝制，別說放映了。而且我想，就算在暹羅，除了1980年代，其他時間也做不到。特別有趣的是，泰國警方只是成功堅持對電影公開發行前的原始拷貝做了兩處改動。英雄的大主顧不能表現為一個兼差的高級警官；被黑手槍殺的蒙面摩托車匪徒不能表現為年輕婦女。另一方面，這部電影受到公眾喜愛，其中也有費解之處。我們容易理解，為什么年輕觀眾會喜歡邪惡警察這種稀奇的電影場面。但是他們會喜歡一個為了金錢殺害“無辜者”的英雄嗎，即便他是最賣座的明星索拉朋（Soraphong）飾演的？我猜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他的受害者明顯是中年男性、非常有錢（換言之即大資本家）的話。又假如銀屏上之所見與泰國社會的當代現實之間存在某種共振的話。

這個現實——或者準確點說，我此處關心的那部分現實——就是，1980年代暹羅的政治謀殺已經呈現出一種全新的特征，說來奇怪，該特征興許是未來的一個好兆頭。因為它似乎牽連著一個經久不衰的軍事—官僚獨裁傳統的消逝，以及穩定的資產階級議會制政治系統的取而代之。為了更清晰地透視“槍手們”與急變中的泰國政治結構之間關系的輪廓，略述一下此前暹羅的政治謀殺模式大概有些好處。

### 早期模式

暹羅歷史的近代時期習慣上說始于1855年。那一年，維多利亞女王的代表、“自由貿易即耶穌基督，耶穌基督即自由貿易”這句不朽格言的創造者包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用一紙條約，迫使泰國廢除了有礙帝國主義經濟滲透的一切實質性壁壘，把他的商業之神硬塞進來。[[411]](#_411_14)在1855年以前，政治謀殺的模式，恰好就是人們對這樣一種社會可能預料的那樣子：在該社會里，政治參與多數時候僅限于一個小之又小、主要是族內通婚的“封建”上層階級。遇害者往往是這個階層的成員——王公、貴族、廷臣、高官，大體上，他們的行刺者亦然。如果平民侍衛或軍士參與其事，那極少是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而是遵恩主之命行動的。政治謀殺是一樁家族內部事務，父子相殘，叔侄相斗，同父異母的兄弟鬩墻。多數謀殺發生在皇城根下，那里是政治逐鹿唯一現實的競技場。國家古風尚存，而且屬統治者個人所有，所以在處決和謀殺、“國家”殺人和“私人”殺人之間，沒有什么明顯的觀念分野。

1855—1932年間，這種上層階級內部謀殺的模式中止了，很可能是由于擔心歐洲的政治干涉，也多虧了歐洲的經濟介入。曼谷的政治領導人可能看到，在東南亞鄰邦，統治集團放縱自己從事族內殘殺，于是歐洲帝國主義者找到了心安理得的借口進駐都城，確立法律和秩序，或者讓一個“正統的”、聽話的、要求擁有當地王位的人復辟。另一方面，十九世紀下半葉飛速擴張的自由貿易經濟，通過做大可分的餡餅，減弱了精英內部競爭的殘暴性。（比較一下暹羅的經驗和緬甸的情況不無啟示：緬甸君主制最后那血雨腥風的幾十年，被兩次英緬戰爭奪去了它領土上一半以上的歲入基礎。）這些環境狀況一直十分穩定，甚至于當舊貴族階層面對來自拉瑪五世（1868—1910年在位）所創的近代官僚制的那些“新人”的政治經濟挑戰時，沖突都被滴血不濺地解決了。

1932年后，這才開始出現有幾分類似1855年前的模式的某種東西。那時，自命的絕對主義君主制在一起不流血的政變中被推翻了，政變是平民出身的軍官和文官策劃的，他們自稱“民黨”（Citizens Group）。[[412]](#_412_14)1930年代后期，重大的刺殺企圖直指民黨的兩位最高軍事統帥，披耶·帕鳳將軍和披汶·頌堪將軍，這是他們圈內人干的；而這個依舊帶有濃重的私人所有色彩的國家，則依恃“合法的”處決，施以暴戾的報復。到這時，對這樣的殺戮會招致外來干涉的現實憂慮已不復存在，因為帝國主義列強連他們長期享有的治外法權都正在放棄。與此同時，立憲君主制的草創——以及創建新（比方說，披汶）王朝在二十世紀的不可能性——原則上意味著，有遠為廣泛的社會集團參與政治經濟支配權的斗爭。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當1932年民黨的殘余分子、他們的追隨者和某些潛在繼承者內部的暴力沖突噴涌而出時，這個模式變得愈加明晰。我們可以把1949年3月3日對四位前內閣部長的暗殺當成這一時期的典型，他們全是來自貧困的東北部的文官，卻被警察總監炮·西耶儂的兇殘asawin（“武士”）殺害了。[[413]](#_413_14)這四位遇難者跟炮·西耶儂生活在同一個社會環境里；他們在首都遇害；他們之死無關乎廣義上的階級沖突甚或地區沖突。正如1855年前的時代那樣，若問這謀殺是政府還是私人所為，那幾乎是不著邊際的。的確沒有任何形式的法律過程介入進來；但是即便有，我們從這一時期所謂弒君者審判中對清白無辜者的依法處決可知，法律機制輕輕巧巧就移用于私人謀殺。[[414]](#_414_14)不過這種看法也沒錯：炮·西耶儂和披汶掩蓋這些謀殺的笨拙舉動，說明他們意識到二戰后政治公眾擴大了。

### 政府謀殺

在依靠1958年政變上臺的陸軍元帥沙立的專制政權下，政治謀殺一如現代泰國史上其他諸多方面那樣，呈現出新的特征。[[415]](#_415_14)在他這個時代，政治謀殺受害者的范圍向外向下擴展，而兇手比以往更清楚無誤地變成了政府本身及其雇員。下列處決提供了這種變化的事例：1958年處死五個“臭名昭著的”縱火犯，1961年處死兩個左翼的前議員，1962年處死一個號稱的共黨首領。[[416]](#_416_14)這些受害者完全處于沙立精英圈子之外（他可能從沒見過其中任何人）；他們都被指控危害國家安全；都是由公認的國家代理人公開行刑的。[[417]](#_417_14)這些殺戮的真正原因，不過是要向如今是全國性的報刊讀者和廣播聽眾們，以及潛在地向選民們，樹立沙立的絕對獨裁者形象。[[418]](#_418_14)換言之，這些殺戮是以一種公共關系精神與大眾傳媒風格搞出來的。

大眾傳媒受眾群（政治謀殺需要演給他們看）的出現，也意味著別的某些政治殺戮必得對他們保密。1971—1972年在博他侖府發生的紅油桶（Tang Daeng）屠戮案件，就是這個悖論的恰當例證。[[419]](#_419_14)這些屠殺，意在恐嚇有同情共黨嫌疑的當地農民群體，但全國受眾是無法接受的，對后者，即便沙立繼承人的軍政權也感到多少要強裝尊重。類似地，作為1973年10月軍政權垮臺（見下文）的直接后果，學生活動分子得以披露地方層面公開、全國層面保密的班那賽（Ban Na Sai）事件，重創了國家安全機構的合法性。[[420]](#_420_14)作為法律的國家與作為機構的國家之間的醒目裂隙正在揭示出來。

### 武裝斗爭

沙立、他儂和巴博時代的另一個重大變化，是泰國政治兩大新型參與者的異軍突起。其一是泰國共產黨（CPT），自1965年后，它在國家的外圍地帶開展日漸成功的武裝斗爭。[[421]](#_421_14)泰共領導人不屬于舊式的都城政治精英，也不企圖直接參與都城政治。他們小心翼翼地待在國家劊子手的勢力范圍以外。他們是在偏遠的農村地區從事斗爭，那些地區傳統上近乎毫無政治價值，但在如今這個按領土界定民族—國家的時代里，它們漸漸被國家接納為重要的政治舞臺。由于泰共在許多鄉村共同體里成功動員了低地農民和高地少數族群——其實就是讓他們參加全國奪權斗爭，這些人開始加入政治殺戮的潛在受害者行列。在政府平叛運動的早些年里，針對鄉村人口的暴力（包括謀害）很大程度上是中央政府機構本身的特權。但是當沖突深化、泛化時，隨著泰共的武器不單攻擊政府的官方使者，還攻擊政府的當地民間支持者，于是在謀殺領域的“國營部門”旁邊，出現了一個重要的“私人企業”部門。在東北、北部和南部，自發組織的治安團體、村子里的無賴、賺外快的保安人員，諸如此類，紛紛開始加緊活動。槍支的前所未有的可獲得性（全仗了美國對泰國軍隊和警察的援助，以及美國在老撾的“秘密戰爭”），大大加劇了農村政治中的暴力水平。[[422]](#_422_14)特別要緊的是，有數量可觀的農村和小鎮的泰國人，他們在美國人的錢夠用時被征入輔助正規軍的安保部隊，一旦錢花光了就復員。[[423]](#_423_14)復員則表示他們不再受雇于政府；但是他們將軍事化的態度和恐怖主義的技能帶回了私人生活，我們將要看到，那種態度和技能在1970年代開始獲致真正的商業價值。在此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最后一點是，中情局的秘密部隊是一支雇傭軍，它的新兵完全就是這樣理解它的。這樣，我們或可說，雇傭槍手這個職業——對暹羅而言一個嶄新的職業——直接源于美國打的印支戰爭，因而自始即帶有政治性。

### 新資產階級

泰國政治的第二個新參與者可以統而言之為官僚制外的資產階級。它的起源是泰國華裔商人與商貿社群，他們活躍于曼谷、春武里、北欖和興盛的南部的幾個市鎮。[[424]](#_424_14)在1940和1950年代，他們還人少財薄，政治影響微不足道（尤其因為許多情況下，同化的過程尚未完成）。然而到1960年代初，完全同化的一代泰國華人正值上中學、大學的年紀，那時恰逢越戰帶來的大繁榮如火如荼。他們及時趕上了利用1960年代高等教育的大發展，利用繁榮帶來的就業大擴張和多樣化。[[425]](#_425_14)

暹羅在歷史上從未如此被洪水般涌來的外國經濟資源所淹沒——這不僅是由于美國對軍事基地和戰略性基礎結構發展的資本投資，也是由于美國對泰國政權的直接援助，以及日本和美國在一個低工資、無工會社會里的大量私人投資。這一洪流有三個尤可注意的后果。第一，它絕非一股腦集中在首都區域，而是對東北部、北部和南部許多地區產生了直接和間接的較大影響。第二，它促成了一個商人階層的浮現，他們遠不像舊式的泰國華裔商人那樣同現代官僚針鋒相對。這個階層的領導者中間，有大賓館、購物廣場、汽車經銷商、保險公司，當然還有銀行的所有者和經理人。[[426]](#_426_13)這些人穿戴得像官僚，挨著官僚住在新郊區的住宅群里，進餐、聚會、購物、旅游，都是官僚去的同樣地方。1960年代以降，他們越來越多地出于一個單一的公共機構——大學。第三，它與泰國華人銀行系統的閃電般興起配合無間，而且實際上可能是這種驟興的主要原動力。這些泰國華人銀行沒有被日本和美國巨頭擠到一旁。的確，它們受益于外國人所面臨的掌握泰語和漢語上的困難（這些語言令人生畏的書寫就更甭提了），敏捷地動手開發國內資本市場。它們很快發現，在這繁榮歲月里搞好地方業務大有賺頭。1960年代早期，大多數府會城市里最最宏偉的大廈是府尹辦公大樓，那是支配著泰國社會、政治生活的舊官僚統治的象征。十年后，泰國這許多的愛德華七世時代風格的建筑，在壯觀的玻璃—混凝土—大理石高樓面前黯然失色，曼谷大銀行的地方分支機構就駐在那種高樓里面。

### 新生的議會民主制

因而我們需要從兩個角度來看待官僚體制外的資產階級的興起。第一個、也是很常見的角度強調為數眾多的知識青年的出現，他們中有一部分使全泰學生中心（NSCT）在1970年代初一時成為可怕的政治力量。早在1960年代末，他們已經不再能夠像先前的大學生那樣，被官僚機構接納。但是他們意識到，他們置身于傳統上是為新一代統治階級承擔重任預作準備的機構里，所以他們覺得有參政的自然權利。他們許多人如今來自外地各府，就此而論，他們期望不僅在曼谷，也在他們最終成就的職業生涯的任何地方，行使那種權利。這樣，地區上出現非官僚的、重要的小知識分子階層，就有了現實可能性，這在泰國史上尚屬首次。第二個不那么常見的角度主要關注小鎮企業家的實力增強，他們有的獨立經營，有的給首都大公司做代理，以銀行信貸與地方生活普遍快速的商業化為基礎壯大起來。在多數地方市鎮，這類人很快賺得堪與駐在當地的政府官員相匹敵的收入，進而養成相仿的生活方式和地位派頭。而且，既然官員會常規性地調任別處，而他們無須如此，他們就打下了堅實的地方根基——社會根基和商業根基。這些根基要產生地方權力，唯一必要的是，中央政府機器的統一和權威——那是地方官員的后盾——大大削弱。

歷史的“斷裂”隨著1973年的民眾運動到來了，10月14號，那場運動以他儂—巴博政權的垮臺而告終。[[427]](#_427_13)誠然，要不是國王和軍隊統帥吉·西瓦拉（Krit Sivara）將軍的高層派系干涉，這個二頭政治原本不會垮臺。但是吉·西瓦拉搞掉他的長官，不靠政變，靠的是給學生和知識分子——聯合了曼谷的人民大眾，包括中產階級、下中產階級部分——的行動主義煽風點火，這個事實顯示，他本人認識到傳統形式的“合法性政治”不復可行。國家變化太大了。1973—1977年間的事件表明，縱使反動集團依然強勢，這種認識甚至在國家機構內部也在周流蔓延，結果該機構不能以其先前的目的統一性展開行動。

正孕育而生的是那種典型的資產階級政治體系，我們所熟悉的議會民主制。這是一切壯志凌云、富實自信的資產階級感到極為愜意的那種政體類型，恰恰因為它最大化了他們的權力，最小化了他們對手的權力。如果我們認為1973年是暹羅的1789年，那么我們可以在某個單一視角內觀察整個后續時期（直至今日），那就是資產階級斗爭的視角，這個階級努力發展和維持它的新政治權力（以議會形式制度化了），防止左右兩派、民眾和政府機構的威脅。這十六年間政治謀殺的模式充分證明這個視角很管用。

### 鞏固時期

這個時期大概可以合理地分成兩段：1973—1978年，1978—1989年。第一時段是極不穩定、極不確定的時段，摸著石頭過河的資產階級處在一種外露的矛盾地位上。一方面，它需要民眾的支持（理想情況下主要通過選舉機制傳達出來），以便強化它的正當性和權力，防備軍人和文官。在這一斗爭中，“民主”是一件在國內有威力、在國際有令名的武器。另一方面，它也感到需要政府機構鎮壓性武器的支持，以便遏制城市地區的“民眾過激行動”，跟農村地區新興的泰共戰斗，而且考慮到美國在印支地位的急劇衰落，還要保衛民族—國家不受東邊共產黨統治的新鄰國侵犯。[[428]](#_428_13)在第二時段，資產階級的主要問題是抵擋安全機構中的機會主義分子和極右分子的種種圖謀，這些人企圖利用“外部威脅”，訴諸假平民主義的、“反資本主義的”公共修辭，重獲他們舊日的統治地位。

在資產階級的成功斗爭中，報刊的重要性不應被低估；首屈一指的是流行報紙《泰國日報》（Thai Rath）的重要作用，它擁有全國性的龐大讀者群，代表了另一種想象的民族共同體，與議會制度或舊政權的國族—國教—國王口號所想象出來的民族共同體并排在一起。多數報刊即使不是明確反對軍人—官僚的圖謀（更無論政變），至少是疑慮重重。畢竟，成功的報紙是大型商業企業，它們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們起碼在一定程度上抒發了讀者的心聲。相應地，這一時期報刊的角色可視作新資產階級政治優勢地位的盟友。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在這一時期，資產階級對它的權力變得如此自信，對議會制度在保護它自身利益方面的價值如此肯定，以致表現得愿意容許本階層中存在暴烈的內部競爭。我們在1980年代目睹了議員遇刺的奇特壯觀場面，暗殺他們的不是共產主義者或軍事獨裁者，而是其他議員或想做議員的人。

在轉而細察這兩個時期政治謀殺的對比性模式之前，我們可以再度提醒自己，是什么原因讓議會制度那么吸引當前泰國這種新中產階級。首先，面對專橫跋扈的文官和軍人官僚機構，它拓寬了通向政治權力的縱向和橫向渠道。要被選進議會，人們不必具備大學學位，也不必在青春年少時進入過某種機構等級體系的下層。女性身份不再是致命的政治弱點。因此，在社會、政治的垂直流動上，受教育不多者和非男性就有巨大的——至少是理論的——增長。與此同時，在以地域為基礎的選舉體系中，府籍不是什么特殊障礙，甚至可以是一種優勢。一個人可能根基在那空沙旺，仍然做著內閣部長；其實，情況可能是，一個人只有牢牢地把根基定在那空沙旺，他才能夠獲得內閣席位。議會由是給了府縣精英們機會，得以繞開內務部那強大的、以地域為基礎的等級體系，也得以按照他們自己的條件，在官僚機構自身的首都總部，即Krung Thep Maha Nakhon（天使之城）、又叫Bangkok（曼谷）的這座城市里，設法脫穎而出。更一般性地說，基于選舉的議會體制比其他任何政體類型更有助于縮小各府與首都之間的權力差距：這自然就是它們何以對府縣名流如此富于吸引力的緣由。[[429]](#_429_13)第二，官僚機構權力的縮減，往往削弱了由官僚機構控制和保護的專賣權體制，后者到頭來總是使資產階級臣服于政府機構。這種專賣權當然會讓特定的商人或商人集團撈到好處，但卻有損這個階級的普遍利益。第三，選舉政治以更細微的、技術性的方式關照資產階級利益。金錢對支撐選舉成功至關緊要，金錢也正是資產階級最為豐厚的天賜資源。[[430]](#_430_13)另一方面，選舉政治如果能夠穩固確立的話，它的聲望有助于使議會外政治活動喪失正當性，特別是罷工、示威和民眾運動，資產階級不大可能控制得了它們，而且有時會深感恐懼。最后，像暹羅這樣的國家里，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封建”殘余依然強大；很明顯，在這里，議員的位子可以提供機會，讓人在地方層次上變得有權有勢，那種權勢比工業社會一般情形下要煊赫得多。因此，暹羅議會制的鞏固與所謂“昭魄”（chao phaw）的招搖現世同時發生，這并非偶然。“昭魄”是黑手黨那樣的政客—資本家，他們靠使用暴力、政治關系、控制地方市場和非法行當，成為令人畏懼的土皇帝。

### 地方性和國家性謀殺

這下我們可以回到政治謀殺的主題了。從1974年底到1976年10月6日政變這段時期，典型的受害人是與NSCT有關聯的中產階級學生活動分子、農民組織的帶頭人、工運分子與揭發丑聞的左傾記者。[[431]](#_431_13)謀殺似乎可分為兩大類。（1）地方性謀殺——通常針對農民領袖、工運分子和記者，他們被認為危及了包括地主、商人和腐敗的村首在內的地方要員們的權力或利潤。這些謀殺多系私人所為，當地要員們就從越戰時期囤積下來的大批職業殺手、前保安人員、賺外快的警察和小匪徒中雇用槍手（mue puen）。[[432]](#_432_13)（2）國家性謀殺，一個顯眼的例子是社會黨領袖汶沙儂博士，他于1976年2月28日在曼谷遭到伏擊行刺。但是，對杰出學生領袖不時的暗殺，以及最重要的，1976年10月6日那天在曼谷法政大學發生的大屠殺，構成了這個普遍類型。這些受害者沒有威脅到特定的私人利益。毋寧說他們是被當作政府的敵人，或者是被惡意地說成這樣子，為了一些馬基雅維利式的理由（譬如，要創造一種氛圍，政府機構能夠借此貌似成理地逆轉議會制的潮流）。所以殺手們差不多是這個機構的直接代理人。[[433]](#_433_13)10月6日在法政大學對學生的殘殺，特別利于說明第一類和第二類謀殺之間的區別。因為這一次的受害者，有不少人是資產階級自身的特權孩子們（一個人只需在工作周的隨便哪天，去看看法政大學校門內的學生們那一張張泰國華人的臉，再看看校門外小販們那一張張泰國泰人的臉，就能體會這一點）。簡直沒有理由認為泰國資產階級祈盼這些殺戮——首都以外任何地方都不曾重演這一幕。

所以，由政府代理人執行的“國家性”謀殺，是反中產階級的，意欲恢復1973年10月14日前的那種政治秩序。由私募雇傭兵實施的“地方性”謀殺，是親中產階級的，意欲恫嚇下層階級的成員及其自命的民權保衛者。

### 鄉村起義的失敗

已經合理論證過，暹羅、泰國議會民主制和/或泰國中產階級，在泰共鄉村起義的失敗中，得益于一次飛來的好運，那是拜1978年12月開火的柬越中三角戰爭所賜。誠然，泰共領導層決定仍然全盤忠于北京立場，這使該黨遭受了重創。它因之喪失了它在老撾和柬埔寨的安全潛伏地，喪失了它在越南培訓干部的機會，甚至喪失了它在云南的大功率無線電廣播發射機。（總理江薩將軍精明得很，深悉同“小瓶”［鄧小平］及其羽翼搞好關系的好處。）[[434]](#_434_13)但是也可以論證說，這次損失之所以特別嚴重，是由于泰共已經在同這樣一個問題進行斗爭：怎么處置數百名中產階級青年活動分子？——他們在血雨腥風的1976年10月6日政變后趕緊逃到了它的叢林保護傘下。這些活動分子來自年輕得多的一代人，來自生活優裕的家庭，博覽群書，能說會道，還有參與國家層面的合法政治的一點兒實際經驗，他們發現很難機械地接受泰共的許多立場，而黨對1978—1979年危機的遲鈍反應讓這種接受變得幾乎不可能。總理江薩老謀深算，實行全面大赦，讓活動分子們能夠安全回家。耐人尋味的是，泰共沒采取什么措施阻止他們，即使這“大規模叛逃”的奇觀加劇了它早已遭受的嚴重政治損失。是國際政治的發展與泰共自身的內出血，而不是泰國軍隊的戰場勝利，造成了泰共的衰落；總的來說，毫無疑問，這一衰落主要使泰國的新資產階級得利。1978—1979年后，資產階級沒遭遇左派或底層的任何嚴重威脅。到那時，它也不再被國家東部邊境的越南軍隊的存在嚇得驚慌失措了，雖然軍方竭力想造成這種效果。資產階級認識到越南力量的真實限度，認識到暹羅在獲得美中日軸心的堅定后援上的優勢。

但是柬越中戰事剛巧是在后10·6的他寧右翼政權垮臺之后爆發的，正是他寧的興衰對理解資產階級時代泰國政治的變換中的動力很有啟發。

### 他寧政權

他寧本人是個思想古怪而極端的泰國華人法學家，[[435]](#_435_13)并無自個的任何政治基礎，也不代表任何重要集團或機構。他被任命為總理，反映了宮廷和將軍們之間的沖突。王室被最近老撾君主制的廢除嚇壞了，它又被認為跟后者有關聯，所以它想要一位強硬的反共分子，但還得是文官（因為它從未對軍人放心）。將軍們更關心權力而非反共，想讓他們當中的一位上臺。起初宮廷占了上風，但好景不長。他寧政府的虛夸言辭荒唐可笑，結果不久它就被民間叫做“蛤蜊內閣”；[[436]](#_436_13)由于它的無能與意識形態的極端主義，它很快讓幾乎每個人都敵視它。但是它的領導者們一本正經地看待他們的歷史使命——反共，還有文官至上和（右翼的）法治，以致做出了現代泰國政治上絕對開天辟地的事情：把一個高級將領判處死刑并立即執行。無可否認，差拉·希蘭西里（Chalard Hiransiri）將軍，1977年3月一場未遂政變的首領，在他競逐權力的短暫過程中企圖謀殺宮廷紅人阿倫·德瓦塔辛（Arun Dewathasin）將軍，但是，假如是一個真正的軍政府當權，他極不可能還會被處以死刑。[[437]](#_437_13)差拉的命運的確是一個因素，它有助于解釋，為什么江薩將軍在當年10月發動的不流血的成功政變，從一開始就被宣揚為是一縷“克制”的清風，是恢復起碼算準議會制政府的先聲。這種宣傳的受眾不單是美國和西歐（“國際輿論”），而且首先還是泰國資產階級。[[438]](#_438_13)江薩本人煞費苦心地在公眾場合表現得像慈祥、戀家的資產階級，他是這么做的第一個泰國政變領導人。例如，在一次漂亮的戲劇性行動中，他讓媒體拍攝了他親自在家為曼谷十八君子煮面條的場景，這十八人是因“大逆不道”的嚴重指控，自1976年10月6日以來遭到監禁的學生。這一切統而言之，甚至在印支政局紛亂和泰共垮臺之前，他寧政權的興衰也證實了泰國政治中資產階級權力的持續鞏固。

### 議員和槍手

最后，我們可以轉向最近的過去，轉向“槍手”的主題。1978年后泰國報刊的任何讀者，想來都留有深刻印象：關于昭魄和phu mi itthiphon（“勢要”）的故事驟然奪人眼目，地方政治生活新近危險四伏。議員被“來歷不明的槍手”殺害已經是家常便飯了，盡管很少有什么案子像刺殺“Sia”雅俄（Jaew）[[439]](#_439_13)那么場面壯觀——這位春武里名震江湖的昭魄，遭到一伙人像軍隊那種陣勢的伏擊，那伙人開著裝甲車用沖鋒槍掃射。暴發戶大亨、大投機商和/或走私者以及法官（地方大佬或潛在的大佬）等排在議員后面，也都常是槍下之鬼。這些人似乎業已取代了農民領袖和學生活動分子，后者如今幾乎不再是攻擊目標了。然而有充分理由認為，殺人者和1974—1976年那些兇手是同一些人，至少是同一類人：mue puen，職業殺手。他們的主顧幾乎總是受害人的同為資產階級的政治、生意對頭。（兇案極不平均的地理分布，說明政府本身很少或全未卷入。）

所有這些兇殺表明，在1980年代，議員這種知名人物也獲得了穩定的市場價值。換句話說，成為一名議員不僅提供了賺錢撈權的大好機會，而且很愜意地有望長久這么干下去。因此一個人殺掉他的議席競爭對手，這可能是值得花點功夫的——但在1950和1960年代卻不可想象，那時議會的權力和壽命被看得很低。

眼下我們在暹羅所目睹的，是它的“美國時代”所造就的經濟、政治賽道的鞏固。幾乎不間斷的三十載繁榮給予這個國家全東南亞（新加坡自治市除外）最發達、高產的資本主義經濟。曼谷的大銀行將從前做夢都想不到的貸款注入各府縣，這些資金可以用于生產性的企業家活動，也同樣可用于政治和犯罪。各銀行間在所有層次上的競爭，意味著每家銀行都有濃厚興趣發展政治代理人和盟友。作為許多議員的財務上的莊家，銀行能夠以某種方式施加直接、獨立的政治影響，那在中央集權的、權威主義的軍人執政下很難辦到。而且，議員群體是全國選民的代表，這就用一種新的合法性光環掩飾了銀行權力（以及大工業和大商業集團的權力）。這是一種實在的、寶貴的資產。因而可以暫且下斷語說，資產階級各階層——從曼谷巨富的銀行家到地方小鎮野心勃勃的小業主，大多數都認定議會體制是最適合他們的體制；他們如今信心十足，相信自己能夠抗擊一切敵人，堅持這一體制。這些敵人依舊存在，尤其是在軍隊和文官機構里。但是它們似乎處于長期衰落中。盡管官場對“邪惡勢力”（這是美化自己的宣傳，想要暗示“仁善勢力”是官僚機構獨擅之物）嘖有怨言，它還是漸漸讓自己適應新體制。[[440]](#_440_13)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職業殺手對議員的暗殺可以看成是一種歷史的征兆。議會民主制不費力地贏得了自由知識分子的擁戴。但是他們還不足以支撐它。數量可觀的人，來自全國各地，無情、富有、精力過人、爭強好勝，他們也必得愿意投入這個體制。在暹羅，這樣的人為了當議員，準備好了彼此廝殺，這指明了某種真正新出的東西而今就位了。

電影《槍手們》反映了這種形勢。它拒絕站在政府謀殺一邊反對私人謀殺——政府也沒打算強使它改變想法。它讓觀眾們寬心，新資產階級世界安如泰山。畢竟，如果資本家在遭到謀殺，他們的殺手既不是共產主義者、學生激進分子，也不是警察國家的代理人，而只不過是資本家同類的雇員。對電影觀眾中間的失敗左派來說，這里想必有這樣全然有意的潛臺詞：起碼有一些資本家正在被殺，殺他們的人，是美帝國主義加上不公正社會體系的受了重創的犧牲品。為1976年10月6日的一種夢中復仇。

### 附言

在完成本文的過程中，我從我的一位最近重返美國的泰國學生那兒收到一篇記敘文，講的是新近一次很有代表性、細節很豐富的暗殺，我實在忍不住把它稍加刪改，放入此處。

1990年4月伊始，披帕先生（Phiphat Rotwanitchakorn，人稱“Sia Huad”［滑頭大亨］），曼谷東南春武里地區的一個顯赫昭魄，蔚為壯觀地遇伏身亡，他的司機和貼身保鏢（當地警察局的副巡官）也未能幸免。他久已知悉自己是暗殺的目標，幾乎從不離開他那寬敞的、戒備森嚴的宅第。但是清明節那天，即泰國華人家庭祭祖的時節，億萬富豪泰差拜普（Tejaphaiboon）家族在春武里的私人墓地舉行儀式，他的好友、該家族一位杰出的曼谷銀行家邀請他出席。[[441]](#_441_13)他覺得不能不去，因為這位朋友先前曾授予他10億泰銖（40,000,000美元）的信貸額度，使他得以出高價擊敗昭魄對頭傅錦南（Kamnan Poh），競得對春武里商業區一座大型商貿中心建筑項目的控制權。“滑頭大亨”擔心喪命，叫上他的弟弟和幾個職業槍手坐另一輛車跟在后面。從墓地返回時，他甚至換了車，指望躲開敵人。但是行刺者開了三輛車，第一輛猛撞進而阻擋了他弟弟那輛車。然后他們追殺他，瘋狂掃射了大約五分鐘，此時他的車停下了，里面三人全部喪命。然而為了核實這一點，一個跛腳槍手（不是索拉朋嗎？）從車里鉆出來，戴著面具，走近那幾具尸體瞧了瞧，一群越來越浩蕩的好奇看客圍著他。

“滑頭大亨”最初給一個地方昭魄做個卑賤的打手，職業生涯由此起步。當他的老板被殺的時候，他自立門戶，找了當地一個政治領導作新庇護人。他最小的妹妹隨后嫁給了春武里一位著名議員的公子，這位議員后來成了內閣部長；在選舉時節，“滑頭大亨”親自為他效力，當“拉票人”。他的財富和權勢增加了，他的敵人的數量也增加了。他專做土地投機，在那些已經列入工商業開發時間表的地區，他命令他的幫伙用最殘酷的手段，逼迫有地小農把土地賤賣給他。他還卷進了一起成功的陰謀，搞垮了一個當地市長（也是政治老板），將他本人的親信安插到市政府里。他及其幫伙對待當地警察的傲慢架勢，給他招來了許多穿制服的敵人。這樣，當勢焰熏天的傅錦南（他因競拍商貿中心建筑項目落敗而懷恨在心）點頭批準時，想讓“滑頭大亨”死的許多人組成一個反對他的聯合陣線，湊齊了一百萬泰銖（40000美元）和大量槍支。

這次喋血之后約莫一個月，警察拘捕了涉案的數人，包括死者的幾個昭魄對頭、一些政客和槍手，以及最重要的，特種警察部隊的四名成員——據稱是實際執行的刺客。[[442]](#_442_13)

廣泛傳言說，這次暗殺行動的主腦是傅錦南，雖然沒有哪家報紙雜志膽敢這樣講。但是如今誰敢碰他呢？就在殺人后一周，傅錦南慶祝了他在新成立的沈蜀區（Saensuk，靠近旅游勝地芭堤雅）第一次區長選舉中獲勝，舉辦了一個萬人舞會，其中包括社會行動黨的幾個內閣部長、其他知名議員、流行歌手和電影明星。論排場，論轟動，它都遠在總理差猜·春哈旺當選總理時舉行的舞會之上！有記者問到“滑頭大亨”之死的問題，傅錦南回答說：“在春武里，壞人必須死。”但是也許死得不像“滑頭大亨”那么壯觀。眼下，為槍手所殺正在成為資產階級的階級特權。畢竟，誰愿意付給槍手百萬泰銖，取一個窮人的性命呢？

## 9 菲律賓的地方巨頭民主制

1987年3月9日，科拉松·阿基諾總統撒了一個極富啟示的公開謊言。在對菲律賓華人聯合商會所發表的氣勢恢宏的演說中，她把自己突然出現在他們面前說成是“回歸故里”，因為她的曾祖父是個從中國東南的福建省過來的貧苦移民。[[443]](#_443_13)念及菲律賓近乎破產的經濟和280億美元的外債，[[444]](#_444_13)無疑地，她急切需要在馬尼拉商業階層的這個強勢群體中鼓動起團結感、信任感，因而夸大其詞也情有可原。然而真相是，總統原名科拉松·許寰哥（Corazón Cojuangco），是菲律賓寡頭政治集團內最有錢有勢的統治家族之一的成員。她的祖父，就是那位身無分文的移民的推定兒子，是唐·梅萊西奧·許寰哥（Don Melecio Cojuangco），1871年出生于中呂宋的馬洛洛斯。他畢業于多明我會的拉特蘭圣胡安學校（Colegio de San Juan de Letran）和師范學校（Escuela Normal），還是打拉省一個功成名就的農民（agricultor，亦即hacendado，農場主）；在1907年他36歲時，被選入菲律賓議會（Philippine Assembly），那是美帝國主義者當年建立的準立法機關。[[445]](#_445_13)他的一個兒子（科拉松的叔父）于1941年當上了打拉省長，另一個（她的父親，唐·何塞）是該省最負盛名的眾議員。1967年，他的一個孫子（她的堂兄），愛德華多·“丹丁”·許寰哥（Eduardo“Danding”），在馬科斯支持下成為打拉省長，此后一直算得上馬科斯最聲名狼藉的密友之一。另一個孫子（她的弟弟），何塞·“佩平”·許寰哥（José“Peping”），那時就是打拉省的眾議員之一，今天又成了眾議員——是這個國家最有權勢的半打政客之一。她嫁給小貝尼尼奧·阿基諾（Benigno Aquino, Jr.），后者在不同時期擔任過打拉省長和參議員。這樁婚姻把她和中呂宋的另一個核心統治家族連在一起。老貝尼尼奧·阿基諾在美國統治后期已經是參議員，因為與日占政權勾搭成奸而丑名長存。當前，她的一個大伯子阿加皮托·“巴茨”·阿基諾（Agapito“Butz”），是參議員；另一個大伯子保羅，是人民力量黨（Lakas ng Bansa，她的選舉聯盟的三個主要“政黨”之一）的黨首；有個姻叔埃米尼奧·阿基諾（Herminio）是眾議員，表兄埃米迪奧·“丁”·陳華哥（Emigdio“Ding”Tanjuatco）和小姑特雷西塔·阿基諾—奧雷塔（Teresita Aquino-Oreta）也是眾議員。[[446]](#_446_13)一個舅舅，弗朗西斯科·“科芒”·蘇穆隆（Francisco“Komong”Sumulong），是眾議院多數黨領袖。科拉松本人也不像她的競選海報宣稱的那樣，在成為總統時僅僅是個家庭婦女。有十三年之久，她擔任了許寰哥家族控股公司的財務主管，該公司掌控著一個巨大的金融、農業和城市房地產大帝國。[[447]](#_447_13)

不過，在阿基諾總統1987年3月9日的聲言當中，有一個真實的內核，這個內核對理解現代菲律賓政治的獨特性提供了有用的指南。她娘家姓的后綴“-co”，是這個國家寡頭集團內為數可觀的其他統治家族共用的：Cuenco（昆哥），Tanjuatco（陳華哥），Tiangco（田哥），Chioco（喬哥）等。它源于閩南話的“哥”，是對比自己年長的男子的尊稱；它表明她的家族起于華人梅斯蒂索之中，這個混血群體在西班牙殖民政權下發家，在美國人統治下將他們的財富與政治權力合為一體。[[448]](#_448_13)正是這個群體的支配地位決定性地將菲律賓與西屬美洲和東南亞其余地區分別開來：在西屬美洲，梅斯蒂索混血兒往往當權，但不是華人梅斯蒂索；在東南亞其余地區，華人梅斯蒂索，甚至任何梅斯蒂索混血兒，都無緣染指政治權力，唯暹羅是個模棱兩可的例外。這是如何發生的呢？

### 西班牙殖民主義，教會和混血精英

到1560年代西班牙人前來征服的時候，菲利普二世的帝國已臻極盛，這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群島，是帝國最后的大獵物。伊比利亞人的精力專注于歐洲和美洲。真正到菲律賓游歷過的寥寥幾個西班牙人，發現當地沒什么可以饜足他們的欲壑。快速致富的一個重要源泉，不在開礦，而在與中華帝國通商。馬尼拉很快成為“大帆船貿易”（galleon trade）的轉口港，靠這種貿易，墨西哥銀元換來了中國的絲綢和瓷器，然后穿越太平洋最終運抵歐洲，把貨物轉賣掉，利潤驚人。做這種生意并不需要太多才能或勤奮，一個人只需住在馬尼拉，有對路的政治關系，同云集這個轉口港的中國商人和匠人們建立聯系即可。[[449]](#_449_13)

采礦的缺乏，以大農場為基礎的商業化農業的缺乏——它要到很晚才有，不但意味著西班牙人集中在馬尼拉地區，也意味著不存在任何持續的興趣，去大規模利用作為勞動力的本土（或輸入）人口。與此同時，西班牙人到來前的菲律賓有別于緬甸、暹羅、柬埔寨、越南或爪哇，缺少具備可觀軍力或官僚權力的任何國家，這個事實意味著，最初的征服及隨后的鞏固僅需小小的武力。小股的衛戍部隊，分駐在各處，大體就夠使了。[[450]](#_450_13)因此，在外省，西班牙在菲律賓的權力很大程度上靠了教會居間協調，這種程度是美洲各地（巴拉圭除外）都比不上的。

熱心從事天主教改革運動的教士們運氣不錯，找到了大批還是“泛靈論者”的土人。佛教和印度教不曾延伸到這么遠。雖然伊斯蘭教從今天是印度尼西亞的那塊土地昂然挺進，它卻只在棉蘭老島及鄰近的南部島嶼地區站穩腳跟。在那里它可能受到遏制，雖然從未被制服。[[451]](#_451_13)當此之際，一場聲勢浩大的改變信仰運動發動起來，致使當代菲律賓有90%的人是基督教徒。[[452]](#_452_13)（只是在二十世紀的韓國，亞洲的基督教化才達到可相媲美的成功。）這場運動最值得注意的特點在于，它的施展不是通過西班牙語這個媒介，而是通過數十種地方語言，那真是難于上青天。一直到西班牙統治告終，頂多5%的當地人口能夠比較熟練地使用殖民者的語言。西班牙語始終沒有成為一種流布四方的通用語，就像它在美洲做到的那樣；結果，群島各地區的農民和漁民們不能彼此交流，只有他們的統治者才有一種在全群島內共用的言語：1900年的時候必定如此，在較小程度上甚至今天依然如故。

教士統治權的另外兩項特征對菲律賓社會結構的演化產生了持久后果。一方面，十六世紀的時候，菲利普二世把爭吵不休的各修道會分配到不同島嶼上，到十八世紀后期，在卡洛斯三世的最后一任總督、開明的何塞·巴斯科·巴爾加斯（José Basco y Vargas，1777—1787）鼓勵下，它們開創了商業化農業。正是它們建起了事實上最早的大農場。但是這些“聯合企業”仍然是公共機構的財產，而不是家庭（統治家族）的財產。修士們可以隨意跟當地婦女生孩子，卻不能娶她們，或將財產傳給后人。終有一天，得勝的美國人會霸占修士們的土地，就像十八世紀波旁家族剝奪耶穌會的土地一樣；這些土地也會像成熟的芒果，落入阿基諾總統的直系先祖之流手里。[[453]](#_453_13)因而菲律賓從未有過一個實力強大的克里奧耳農場主階級。

另一方面，至少在早期，天主教會真誠憧憬著讓天朝基督教化。從一開始，它就熱切著手改變西班牙人通常稱之為“生理人”（Sangleys）的宗教信仰。[[454]](#_454_13)這在四海為家的父親那里不太走運，在這些父親跟當地母親生的孩子那里卻立竿見影。西班牙的殖民地法律幫了忙，它給這些孩子指定了一個明確的司法地位：梅斯蒂索人（mestizos，沒過多久，這個詞一般表示華人和當地婦女的后代，而不是西班牙人和“土人”的后代）。這些孩子經由他們的母親被基督教化，在他們自己的行會（gremios）里組織起來，被迫通過穿戴與眾不同的服飾和頭飾來防止政治易裝癖，他們以及他們往后的婚生后裔，逐漸形成殖民地社會的一個獨特階層。有些情況下，也許只有他們姓名上的后綴“-co”透露了遙遠的天朝出身。

然而，要不是英帝國主義相助，他們興許依舊是一個邊緣的污名化群體。當馬德里加入七年戰爭時，倫敦做出的回應之一，就是于1762年占領馬尼拉，此后兩年一直控制著它。當地的生理人，由于經常受伊比利亞人的勒索和蔑視之害，于是聯合起來支持入侵者；后者在撤退的時候，卻漠然地將這些卑微的盟友丟下，任憑他們從前的壓迫者復仇心切的發落。后來大多數生理人被驅逐出菲律賓，法律禁止新的移民幾達一個世紀。這種驅逐所造成的真空，梅斯蒂索人填補進去了，他們接管了許多當地貿易，開始學修士的樣兒，進軍小型的大莊園。[[455]](#_455_13)

但是就世界歷史來看，他們比在美洲的拉地諾混血兒同類晚了幾代。他們當中，還沒有鄉村豪強，沒有律師，只有很少的教士或出口商人；特別是沒有知識分子。教會一貫地反動，掌控著印刷業和現有教育機構，而后者是何其蹩腳的仿造品啊。因而1810—1840年間震動美洲的民族主義巨變，在菲律賓群島直到1880年代才有了相當之物。

不過，十九世紀對梅斯蒂索人不薄。人們本來預料，丟掉美洲以后西班牙人會成群結隊趕來。但是最后的大帆船是在1811年起航的。西班牙自身被無休止的沖突鬧得不得安生。再說古巴要近得多，富得多。有新的人群到來，但要緊的新來者不是西班牙人，而是盎格魯—撒克遜人（英國人和美國人），此外還有生理人，如今當然叫“中國人”了。1834年，馬尼拉完全向國際貿易開放，沒多久宿務城和其他小港口紛紛效尤；對中國移民的禁令廢止了。中國人的紀律、儉樸和干勁，迅速將梅斯蒂索人逐出島間貿易和城市小買賣。另一方面，1834年后經濟的國際化又為梅斯蒂索混血兒（如今在400萬總人口中已達25萬之數）獻上了農村的新機遇，跟英國人和美國人的商行合伙的機會。這些生意預見到菲律賓農業全面商業化的發展前景，為此提供了必要的資本和商業銷路，使梅斯蒂索混血兒得以首次成為真正的農場主。

內格羅斯島如今已是菲律賓的上乘“糖島”，它的近代史最能說明盎格魯—撒克遜人、梅斯蒂索人與華人之間的這種交互作用。當英國業界1857年在那里開辦第一家糖廠時，這個島嶼幾乎荒無人煙；到該世紀末，它的人口增長了約有十倍，有274家蒸汽動力的廠子在運轉。[[456]](#_456_13)如果說是英國人供給資金、跨洋運輸和市場，那么，是來自班乃和宿務的梅斯蒂索人（他們受到涌入港口城市宿務城和伊洛伊洛的華人的威脅），在經管著種植、加工甘蔗所需的農民勞動力的輸送。轉眼之間，這些邊遠地區的資本家已經學著西班牙人的榜樣，以暴發戶的宏大氣派，搖身變成“封建的”農場主。所以在1987年夏，當土地改革的謠言風傳馬尼拉時，女眾議員霍滕西婭·斯塔克（Hortensia Starke），西內格羅斯的糖料作物大種植園主之一，會這樣對報紙講道：“你的土地就好比你最漂亮的衣服，這件衣服會給你帶來好運。要是有人拿走了它，他不過是想擾亂你，扒光你。”[[457]](#_457_13)

### 民族情緒的滋長

下一步將是接受教育。在這個殖民地，要獲得一種嚴肅的教育不容易，因為教會猛烈反對馬德里自由主義的侵襲，掌握了大多數當地學校。但是梅斯蒂索人日漸增長的財富，經濟的國際化，還有汽船，它們結合起來，使不少年輕的梅斯蒂索男子有機會到歐洲學習。他們很快被叫作ilustrados（知識人），在1880年代造就了殖民地第一批真正的知識分子，開始對蒙昧的教權主義展開文化反攻，后來又討伐西班牙的政治統治。[[458]](#_458_13)同等重要的是這一事實：他們上相同的學校，讀相同的書，為相同的雜志寫稿，娶彼此的姐妹和堂表姊妹為妻，于是他們開創了一種泛菲律賓（摩洛地區除外）的梅斯蒂索階層的自覺聯合，在這片土地上，他們的長輩業已形成分散的成團成簇的地方巨頭。就在那個世紀末，正是這些人開始自稱“菲律賓人”（Filipinos），這個稱呼過去僅指稱西班牙克里奧耳人。[[459]](#_459_13)

那時他們或許有財富有知識，但是沒有政治權力。十九世紀晚期，西班牙在經濟上軟弱無力，政治上四分五裂，不能明智地應對成長中的梅斯蒂索人的種種要求。鎮壓是當時的通例，竟至于在1896年處死了才華橫溢的梅斯蒂索博識者黎剎。他的兩部遭禁的偉大小說，《不許犯我》和《起義者》，用西班牙語無情地諷刺了教士的反動、世俗的暴政，以及他本階級的屢見不鮮的機會主義和貪得無厭。[[460]](#_460_13)

然而，并非不足為奇的是，勢在必至的起義不是肇始于知識人。1892年，安德烈斯·博尼法西奧，出身馬尼拉工匠的一個貧困潦倒的自學者，依循共濟會的先例，組建了一個秘密革命社團，取了一個動聽的他加祿語名字：Kataastaasang Kagalanggalang na Katipunan ng mga Anak ng Bayan（至高至尊民族兒女協會，簡稱“卡蒂普南”）。[[461]](#_461_13)“卡蒂普南”這個稱號已經暗示了它的影響范圍和局限。使用他加祿語，而不用只有少量精英才理解的西班牙語，這表明博尼法西奧有意吸引和動員殖民地土著大眾。另一方面，那時候他加祿語僅中、南呂宋的民眾會說，在棉蘭老島、米沙鄢群島乃至講伊洛卡諾語的西北呂宋，人們都不懂。[[462]](#_462_13)1896年8月，博尼法西奧在馬尼拉發動了一場準備不足的暴動，旋即遭到鎮壓，但這場運動迅速蔓延到周邊省份，在那里，領導權日益落入年輕的梅斯蒂索人掌握之中。[[463]](#_463_13)西班牙人專心于1895年2月古巴爆發的革命運動，未幾即放棄了菲律賓的斗爭。1899年，一個菲律賓共和國宣告成立，首腦是阿奎納多“將軍”，來自甲米地省的年輕元首（caudillo），他曾在1897年通過司法判決殺害了博尼法西奧。[[464]](#_464_13)

然而那是個脆弱的共和國，同玻利瓦爾夭折的“大哥倫比亞”有不少相似之處。它在穆斯林的西南部毫無立足之地；米沙鄢群島有些地方似乎有可能走上獨立之路；甚至在呂宋，形形色色的宗教幻想家，以及發揚博尼法西奧激進主義傳統的農民民粹主義者，都要爭奪梅斯蒂索人的領導權。[[465]](#_465_13)而且，梅斯蒂索將軍們自身（包括費迪南德·馬科斯和小貝尼尼奧·阿基諾各自的祖父）開始遵循他們美洲前輩的模式，自立為獨立的元首。人們幾乎可以說，要不是因為威廉·麥金萊，二十世紀初葉的菲律賓群島可能已經分裂成三個弱小的、元首橫行的國家，國內政局同十九世紀的委內瑞拉或厄瓜多爾一般無二。

但是麥金萊政府在威廉·赫斯特的慫恿下，1898年4月同西班牙開戰，號稱同情菲律賓（和古巴）革命者。一周之后，海軍準將杜威在馬尼拉灣消滅了西班牙艦隊；到12月《巴黎條約》簽訂的時候，菲律賓被賣給了美國人。從那一刻起，“平定”代替了“同情”。到1901年，阿奎納多投降了，其他多數地方巨頭也步其后塵，盡管有些地區的農民抵抗持續到1910年。

### 美國的殖民與全國寡頭集團

美國的殖民改變了一切。[[466]](#_466_13)首先，它通過經常極其野蠻地粉碎任何對抗，確保了群島的政治統一。[[467]](#_467_13)即便是西班牙從未完全征服的穆斯林地區，也向馬尼拉俯首臣服，由此可能喪失了它們主權獨立的最后機會。第二，它大幅提升了梅斯蒂索人的經濟地位。美國殖民政權決定沒收到目前為止掌握在修道會手里的大量肥沃農地（約40萬英畝），并把它們公開拍賣。梅斯蒂索人甚至早在西班牙人統治晚期就已是富裕的農場主，他們是有錢有興趣利用這個機會的群體，結果以前的教會財產多數落到了他們手中。更重要的是，1909年后，通過佩恩—奧爾德里奇法案（Payne-Aldrich Act）的條款，菲律賓被納入美國的關稅壁壘之內，這樣它的農產品就可以寬松、免稅地出口到世界最大的國內市場，而且在那里，價格（尤其是糖的價格）往往大大高于世界標準。

然而，恰恰首先是美國的政治革新，造就了一種穩定、顯著的“全國寡頭集團”。關鍵的制度變革是逐步創立一種美國國會式的兩院制立法機關，它（至少在下議院）建基于單一選區的、勝者全得的選舉。[[468]](#_468_13)新的代議制度證明有效順應了梅斯蒂索新富們的野心和社會地理學。他們的經濟基礎在莊園農業，而不在首都。他們的地方領地也被這個國家紛繁多樣的語言保護起來。他們可能全說精英的、“全國性的”語言（西班牙語，后來是美國英語），但是也各自說著他加祿語、伊洛卡諾語、邦板牙語、宿務語、伊隆哥語和別的一打語言。如此一來，任何一個既定選區內的競爭，在電視出現前的年代里，就被有效地限制在一小撮勢均力敵的當地巨頭中間。但是國會不但由此給他們提供了接近國家層次的政治權力的保障通道，也讓他們定期聚首都城。在那里，他們參與一種由美國人嚴厲地充當裁判的文明“競技”，變得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彼此熟識。他們可能互相厭惡，但是他們出席同樣的招待會，上同樣的教堂，住在同樣的住宅區，在同樣的時尚街購物，和彼此的老婆偷情，安排彼此的子女通婚。他們正在首次形成一個自覺的統治階級。[[469]](#_469_13)

美國殖民的時機對正在浮現的寡頭集團及其統治方式也有深遠的構成性影響。1900—1930年的美國，是伍德羅·威爾遜所哀嘆的“國會的政府”的美國。這個宗主國沒有強大的、集權的職業官僚；官職仍然極大程度上是政治恩賞的事情；腐敗的城市機構、貪污的縣政府大樓的鄉村集團，仍然無處不在；而總統的權威，除開戰時之外，仍然掣肘良多。所以，二十世紀東南亞的其他現代殖民政權都是通過龐大、專制、白人操縱的官僚機構在運轉，美國在馬尼拉的政府卻與此不同，那時它確信梅斯蒂索人對母國的利己主義的忠誠，于是只建立了一個簡之又簡的行政機構，而且很快將其大部分職位移交給土著。1903年，菲律賓人僅僅占據了該行政機構里總共約5,500個職位的不足一半。到1921年推行“菲律賓化”政策的總督—將軍（民主黨人）弗朗西斯·哈里森（Francis Harrison）任期屆滿時，這個比例升至（總共14,000個崗位的）90%；到1930年代中期的時候，美國人只占據了1%的文官職位，大多數是在教育領域。[[470]](#_470_13)（美國的權力依靠軍事優勢和關稅。）和美國的情況一樣，公務員通常將他們的就職歸功于議員恩主，而且一直到美國統治時期終了，國家的文官機構始終虛弱而分裂。

新的寡頭們很快領會到，國會體制如何能夠有助于擴充他們的權力。早在哈里森時代，美國人就默許了對菲律賓中央銀行的劫掠。下院議長老塞爾吉奧·奧斯梅尼亞（Sergio Osmeña,Sr.）和他的朋友們幫自己弄到幾乎是無息的巨額貸款，為建造糖業中心提供資金，欣欣然地無視放款銀行隨之而來的破產。從更一般的意義上說，國會對錢袋、對高級司法職務的掌管，讓這個寡頭集團懂得，“法治”是對它的財產和政治統治權最為有力的普遍保障，如果是它制定和操縱法律的話。（我們將會看到，正是馬科斯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對“法治”的中止，引發了該寡頭集團很大一部分人的驚恐和敵視。）

美式政治系統的最后一個特征值得強調一下，那就是省級和地方選舉機關的大擴散——在缺乏專制的地區官僚機構的情況下。從很早的時候起，梅斯蒂索地方巨頭領悟到，這些機關如果掌握在正確的手里，就能夠鞏固他們當地的政治王國。不出所料，這“正確的手”是他們親屬和朋友的手。親兄弟、叔伯、堂表兄弟擔任高級職務，子侄們擔任初級職務。[[471]](#_471_13)這就是“政治統治家族”——阿基諾家族和許寰哥家族位列其中——的起源，它使得菲律賓政治跟東南亞其他任何國家的政治都有著天壤之別。

那時是興盛時代。然而1930年后，烏云開始匯聚。由于大蕭條重擊了美國，華盛頓面臨著來自工會和農場組織的日益增加的壓力，它們反對菲律賓勞動力和農產品流入美國，硬要這個殖民地獨立。不過獨立是地方巨頭們渴望的最末一件事，雖然他們體面地不能當眾這樣說；原因恰恰在于，獨立威脅了他們發大財的路子：進入美國市場的通道。再者，他們而今從西班牙語轉向了英語，他們的子女此時正在曼哈頓和波士頓上學。他們也缺乏帝王孑遺，這種孑遺經過適當改造，可以支撐起高棉人、緬甸人和印尼人想象的“民族傳統”：梅斯蒂索人卻沒有吳哥、蒲甘或婆羅浮屠供其驅使。因此，1935年他們接受自治政區的地位，是真的心不甘情不愿。唯一的明顯好處是創設了一個菲律賓人行政首長。文雅、卑鄙的梅斯蒂索人曼努埃爾·奎松（Manuel Quezon）成為自治政府總統。[[472]](#_472_13)

### 日本占領及其后

六年之后，1941年12月，日本帝國的軍隊向南突襲。幾個星期的光景，大多數美國人倉皇逃走，包括麥克阿瑟將軍，他逼迫奎松總統和奧斯梅尼亞副總統與他同行。[[473]](#_473_13)寡頭集團的剩余部分（一兩個有名的例外暫且不論）慌不迭地跟侵略者合作。這些通敵者中最著名的是阿基諾總統的公公和她那位副總統的父親，前者成了日占議會的議長和親日的“群眾組織”卡利巴皮（Kalibapi，報效新菲協會）的理事長，后者即老唐·何塞·勞雷爾（Don José Laurel,Sr.），他在1943年當上了東京扶持的傀儡共和國的總統。[[474]](#_474_13)

可是通敵也無濟于挽救以大農場為基礎的出口型經濟。日本不會容許向美國出口，而美國的轟炸機和軍艦在1942年后也力保沒幾粒糧食運達日本。由于物價飛漲，日本的苛捐雜稅也增多，一支支抗日游擊隊在偏遠的鄉村地區壯大起來，它們有時是弱小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領導的；于是奉為圭臬的“法治”開始崩壞。從前的佃農和無地勞工膽氣壯了，霸占了農場土地，種植他們日常生存所需的莊稼而不種糖料作物。許多人如今拒絕繳納過去的橫暴地租，而且蠻橫地威脅向他們索求的地主管家。特別是在許寰哥家族和阿基諾家族所在的中呂宋，那兒鄉村的貧困和剝削最嚴重，這種農民與游擊隊攜手合作組成人民抗日軍，襲擾日本人，暗殺他們力所能至的菲奸。[[475]](#_475_13)不用奇怪，很多寡頭把他們的莊園丟給倒霉的管家，自個兒退居馬尼拉，在那里，他們把老練的手腕轉向發戰爭財。[[476]](#_476_13)

人們或許預計，打回來的美國人會為這些寡頭的通敵行為懲罰他們。華盛頓的高官們倒真是吵嚷著要這么干。可是現場的那位解放者，當然就是麥克阿瑟，他同戰前的寡頭集團有著密切的私人聯系和商務往來，而且他像摩洛哥的利奧泰（Lyautey）一樣，喜歡向土著男仆們趾高氣揚地擺出總督派頭。[[477]](#_477_13)那時奎松已經去見他那粗心大意的上帝了，麥克阿瑟在1946年安排了他的梅斯蒂索老友（也是出名的菲奸）曼努埃爾·羅哈斯（Manuel Roxas）當選為新獨立的菲律賓共和國第一任總統。[[478]](#_478_13)

羅哈斯只在位兩年，就跟奎松做伴去了；但這兩年是成果豐碩的兩年。一紙特赦令頒行，所有“政治犯”（主要是因通敵罪蹲了班房的寡頭兄弟們）通通赦免。1947年，菲美簽署協定，允許美國繼續控制它的23個大大小小的陸海空軍事基地，延期99年（和1900年的時候一樣，這對華盛頓最為要緊）。[[479]](#_479_13)1935年憲法被大加修正，以致給予美國公民“同等”權利，去使用這個新獨立共和國的資源（作為回報，菲律賓寡頭集團獲準在規定時期內，可繼續進入受保護的美國市場。）[[480]](#_480_13)這一舉動還有額外獎金，因為它確保了對菲律賓啟用泰丁斯復興法案（Tydings Rehabilitation Act），提供6.2億美元資助那些可以證明自己遭受了500美元以上的戰爭損失的美國人和菲律賓人。[[481]](#_481_13)（既然那時菲律賓的人均年收入只有這個數的四分之一，那么參議員泰丁斯的慷慨解囊，地方巨頭們是菲律賓的主要受益人。）

下一個目標是全盤恢復戰前的農業和政治秩序。由于三個基本原因，這一目標事實證明是難于達到的。首先是獨立本身的代價：國內政治競爭搬掉了美國人的一手主持；國家集中控制武力部署的能力大為削弱；[[482]](#_482_13)國庫不復有外來保障；經濟飽受戰爭摧殘，瀕于破產。其次，至少在中呂宋，出現了一個有人民軍武裝力量作后盾的膽大妄為的農民階層，他們既然被羅哈斯的花招否定了憲政參與的權利，也就沒什么理由要遷就通融了。最后是選舉權的急速擴大，在那天真的年代，聯合國成員國地位使得這一點無法拒絕。

### 地方巨頭民主制的全盛時期

因此正是在羅哈斯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菲律賓目睹了這個國家如今臭名昭著的“私人軍隊”的橫空出世。這些武裝幫伙從馬尼拉和農村地區的游民分子中召集人馬，由它們的莊園主主子出錢，恐嚇非法的占地者、農民協會和左翼政治領導人，目的是恢復無人與爭的地方巨頭統治。[[483]](#_483_13)“軍閥”這個詞進入了當代菲律賓的政治語匯中。不用奇怪，新軍閥們發現，他們的私人軍隊對一種眼下已沒有裁判的選舉政治也很管用。1949年的總統選舉，羅哈斯的副總統、羅哈斯死后的繼任者埃爾皮迪奧·季里諾（Elpidio Quirino）獲勝了；[[484]](#_484_13)這次選舉不但一如戰前那般腐敗，還極其血腥和弄虛作假：這與其說是由于中央的管理部門，不如說是由于在普遍選舉權和階級對抗尖銳的狀況下，國家權力和地方巨頭野心之間的失調。[[485]](#_485_13)（代表這個時代獨有特征的，就是菲律賓最負盛名的作家尼克·華金所謂拉克松家族的“血腥采邑”，它位于這個糖料作物大種植園主的西內格羅斯樂國里。面對省長拉斐爾·拉克松兇殘的“特種警察”和“平民警衛隊”[[486]](#_486_13)，馬尼拉實際上無計可施。）

這可是美國人始料未及的。再說，中國剛剛“失去”，越南看起來可能要重蹈覆轍，毗鄰的馬來亞和緬甸爆發了嚴重的共產主義叛亂。愛德華·蘭斯代爾（Edward Lansdale）上校被派往菲律賓，借助季里諾的國防部長拉蒙·麥格賽賽（Ramon Magsaysay）的力量恢復秩序，后者是那個時代沒有地方巨頭血統的屈指可數的杰出政治家之一。多虧了軍事援助和其他援助所投入的區區百萬美元，菲律賓的自然隔離，人民軍受限制的呂宋根據地，以及人民軍領導者自身所犯的種種失誤，蘭斯代爾勝利了。[[487]](#_487_13)到1954年，人民軍起義被蕩平了；數以千計的呂宋貧苦農民徙居“空蕩蕩的”棉蘭老島[[488]](#_488_13)（在那里他們迅即陷入跟當地穆斯林的劇烈沖突中）；麥格賽賽施展策略，坐上了總統位子。[[489]](#_489_13)

1954—1972年這段時間，可說是菲律賓地方巨頭民主制的全盛時期。[[490]](#_490_13)寡頭集團沒有面對任何重大的國內挑戰。隨著獨立后的關稅壁壘緩慢增強，通向美國市場的渠道在減少，不過，通向政府金融機構的完滿渠道彌補了這種倒退。在推進經濟獨立和進口替代工業化的幌子下，匯率被操縱，專賣許可證被瓜分，大額的、低息的、往往有借無還的銀行貸款被分發，國家預算都在分肥立法中揮霍掉了。[[491]](#_491_11)有些更富創業精神的豪族，進入了多個商業領域：城市房地產、賓館業、公用事業、保險業、大眾傳媒，等等。由相互競爭的多個巨頭家族所擁有的新聞業，是出了名的自由不羈。[[492]](#_492_11)它揭露每一樁可能形態的腐敗和權力濫用（只是各家報刊的所有者的那些爛事不在此列），但是，用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奧諾弗雷·科爾普茲（Onofre Corpuz）的話說：“菲律賓沒人曾經聽說過一起對貪腐行為的成功起訴。”[[493]](#_493_11)這個事實清楚表明了重新鞏固卻又分散化的寡頭集團權力。就是在這黃金時代里，科拉松·阿基諾的父親唐·何塞·許寰哥，將打拉省10300公頃的路易西塔大莊園（Hacienda Louisita）中的7000公頃搞到手，再把經營權轉交給他那精力旺盛的女婿小貝尼尼奧·阿基諾。[[494]](#_494_11)

但是地方巨頭民主制在它自身之內包含了敗落的種子，大約1960年代末，這些種子明顯開始發芽了。對國家和私人資源的無節制、寄生性的巧取豪奪，使菲律賓倒向長期滑落的軌道：它從1950年代東南亞地區最“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跌成了1980年代最蕭條、最貧窮的社會。到黃金時期尾聲，這個國家5%的掙錢者大概拿到了總收入的50%左右。與此同時，超過70%的政府歲入來自稅率遞減的銷售和消費稅，只有27.5%來自所得稅——大半是外國公司繳納的。[[495]](#_495_11)加上高于3%的典型地是熱帶地區的天主教出生率（自1850年以來，它讓這個群島的人口增長了8倍），結果就是社會底層的大面積貧困化。[[496]](#_496_11)

### 費迪南德·馬科斯：最高巨頭

獨立菲律賓的地方巨頭民主制，也帶來了政治系統運轉上的長期變化。寡頭們越來越聽從毛主席的建議，用兩條腿走路。馬尼拉是總統寢居之處，國會議事之所，政治分肥的資金在這里瓜分，許可證和貸款在這里到手，這里的教育機構節節壯大，這里進口的娛樂活動欣欣向榮。豪族開始紛紛將莊園交給女婿和管家打理，自己遷到古都市郊新修的豪華居住區里。福布斯公園就是這些高尚住宅區（beaux quartiers）中最早興起的，至今依舊名聲最響；這種高尚住宅區在東南亞仍然是社會學上獨一無二的。在這個區域的其他地方，奢華的住宅同窮人的寒舍混雜在一起。[[497]](#_497_11)但是福布斯公園這個黃金聚居區，作為一個建筑群，有武裝保安維持治安；哪怕只是去它的街上，也需要出示身份證明。

這種向馬尼拉的偏移，結合著人口的增長與戰后選舉權的擴大，使政治生活貨幣化了。靠溜須拍馬贏得選舉，即便是地方選舉，是越來越行不通了。競選費用在1960年代以幾何級數增長，尤其是因為這個時期目睹了私人軍隊的進一步發展。相比于1940年代后期，這些武裝隊伍如今主要用于寡頭集團內部的競爭。[[498]](#_498_11)當科拉松·阿基諾的夫君坐在一輛黑色奔馳車里，周圍帶著手持阿瑪萊特自動步槍的保鏢，競選參議員席位時，他是在遵從1960年代末的一般慣例。[[499]](#_499_11)參議員小塞爾吉奧·“塞爾金”·奧斯梅尼亞，在1969年總統競選中敗給馬科斯之后，帶著漂亮的、有牢騷的漠然抱怨說：“我們武器不如人、力氣不如人，財氣不如人。”[[500]](#_500_11)那時候，菲律賓是全世界謀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每十萬人中有四十人被殺。

因此賭注緩緩增大了，美國時代的限制松弛了。問題的癥結是總統寶座，它始終有潛力攪亂地方巨頭民主制。我們早先注意到，這個體制的穩定、這個寡頭集團的團結，有賴于菲律賓國會，是它為所有你爭我奪的地方豪族提供了大致平等的出頭之地。然而一人獨占的總統位子是不可分割的，在獨立年代里漸漸看起來是無與倫比的獎賞。老奸巨猾的老寡頭們預見到了可能的麻煩，從美國借來了總統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法律條文——于是這個官位就可以靜靜地在這個排外小集團里流通。但是，有人會違背這些規則，企圖自立為終身的最高巨頭：這只是時間問題。1960年代遍及第三世界的軍政權和一黨專政政權的蔓延，使這種違背似乎更加正常：實際上它甚至可以被當成從“西方的”意識形態羈絆中解放出來的一個標志，機會主義地證明自身的正當性。

最后的不安定因素是教育。前已提及，在西班牙統治時代，教育設施極為有限，唯一可用的“全國性”語言是西班牙語，頂多不過5%的本地人口有機會使用它。世俗的、二十世紀的美帝國主義是一種不同的野獸。殖民政權堅信盎格魯—撒克遜的世界霸權，堅信英語作為資本主義和現代性的語言的這種地位，它不費吹灰之力就逐出了西班牙語，[[501]](#_501_11)大大擴展了英語的學校系統，結果到1940年代，菲律賓有了東南亞最高的識字率。[[502]](#_502_11)獨立之后，菲律賓寡頭集團像第三世界其他寡頭集團一樣，發現確立它的民族主義信任狀的最簡便法門，就是擴張廉價的學校教育。到1960年代初期，大學學位不再是統治階級的禁臠。

英語教育的大擴張造成了三個截然不同的、政治意義重大的新社會集團。最小的是激進知識分子階層，多數出身于城市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通常畢業于菲律賓大學。其中有個米蘇阿里（Nur Misuari），1960年代末他在穆斯林的西南部組建了摩洛民族解放陣線。更出名的是何塞·瑪麗亞·西松（José Maria Sison），他脫離了人民抗日軍之后的頹敗的共產黨，自立門戶，仿效那位“偉大的舵手”創建了新人民軍，這支軍隊如今已是一股全國性勢力，是寡頭集團的主要對頭。[[503]](#_503_11)（英語的流行，以及后來“街頭他加祿語”作為對美國霸權的民族主義反應而流行，使群島范圍的大眾傳播——在寡頭集團之下——成為可能，這在博尼法西奧或人民抗日軍時代是不可想象的。）

規模第二的是循規蹈矩的第一代技術官僚階層，它也包含了美國大學的畢業生。它和激進知識分子出身于極其相似的社會階層，地方巨頭民主制的種種不公現象不大激怒它，倒是這種制度的膚淺、腐敗和技術落后讓它惱火。這個集團也深恨自己無權無勢。當馬科斯最終于1972年宣布戒嚴令、抬出他的“新民主”的時候，它云集到他的麾下，相信它的歷史時機來了。它對他忠心耿耿直到1980年代初期，在維系華盛頓計劃者們、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外國的一切現代化主義者對他的信任上，長期以來一直不可或缺。

最大的集團——雖然并不特別大，是較為廣泛的城市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選民：中間層次的公務員、醫生、護士、教師、商人、店主等等。在政治和道德見解上，它或許可與1890—1920年間美國的進步黨（絕對不是人民黨）相比。1960年代，它在如下運動中初次登上政治舞臺：政府誠信、城市更新、對政黨機器和軍閥政治的嚴打，還有市政當局和新郊區的法律解放。正如所料，這個集團在取向上既反寡頭集團又反人民大眾。要不是它受過英語教育，要不是肯尼迪總統確保了美國移民法的一項大變革，它興許在1970和1980年代的菲律賓政治中唱過大戲了。可是這些因素給它提供了誘人的替代選擇，以至于到1980年代中期，遠不止一百萬的菲律賓人（主要來自這個階層）橫渡太平洋移居美國，大多數是永久移民。[[504]](#_504_11)資產階級的這種失血，短期看來是削弱了寡頭集團的一個強勁政治對手，長遠看來卻使它喪失了一個重要政治盟友——這正是阿基諾政府沒多大機動余地的原因之一。

在1972年宣布戒嚴令之前，馬科斯政權久已開始深溝固壘，它是一種復雜得富于啟發的混合體。[[505]](#_505_11)由一種觀點觀之，唐·費迪南德可視為地方巨頭之首或軍閥之首，因為他把舊秩序的破壞性邏輯推向了它的自然結論。代替諸多私人化“保安部隊”的，是單一的私人化“國家警察部隊”；代替一支支私人軍隊的，是唯一一支私人大軍；取代柔順的地方法官的，是一個扈從的最高法院；取代無數私囊和腐朽市鎮的，是一個私囊或腐朽國家，被總統的密友、殺手和走狗們控制著。

但是從另一種觀點觀之，他是個有獨創性的人；這一則因為他聰明絕頂，再則因為他像他那怪誕的夫人一樣，出身于寡頭集團相對低級的外圍。無論如何，他是第一位看到了逆轉傳統權力流向的可能性的菲律賓精英政治家。他的所有前輩都踐行著梅斯蒂索最高地位的系譜學——從私有財富到國家權力，從地方政治大佬的控制權到全國性的領導權。但是幾乎從他1965年初登總統大位起，馬科斯在精神上已走出了十九世紀，領悟到在我們的時代，財富服務于權力，關鍵的牌是政府。馬尼拉的路易·拿破侖。

### 馬科斯坐穩江山

他是從軍隊入手的，在那之前，軍隊不具有政治重要性。[[506]](#_506_11)武裝力量的規模迅速擴大，它的預算額度增加，關鍵職位分給了來自說伊洛卡諾語的西北呂宋的軍官們，馬科斯本人就是從那里起家的。預謀了數月的宣布戒嚴令的最終決定，得到了軍隊統帥部的呼應——科拉松的堂兄愛德華多·“丹丁”·許寰哥和國防部長胡安·“約翰尼”·恩里萊（Juan “Johnny”Ponce Enrile）是僅有的文官同謀。[[507]](#_507_11)文官機構跟上來了，特別是早先認定為要做技術官僚的雄心萬丈的那部分人。政府將要從馬科斯指認的國家首敵——共產主義者和寡頭集團手中拯救這個國家。

馬科斯以另外兩種令人眼界頓開的方式運用國家（而非大莊園）的權力。其一是對付美國人，其二是對付他的寡頭同儕。

他比別的任何人——包括菲律賓左派——都更清楚地懂得，菲律賓對華盛頓而言，就像塞浦路斯之于倫敦。蘇比克和克拉克機場的大型基地無關乎菲律賓自身的防衛，一切都關系到維持美國在環太平洋地區的帝國權力。由此可知，馬尼拉應當將這些基地視為奢侈資產，出租時可以索要更高昂的租金。[[508]](#_508_11)菲律賓軍隊亦當如是。邦納的大作《與獨裁者跳華爾茲》，詳細記載了馬科斯如何將（非戰斗）部隊的一支工兵營租給林登·約翰遜，從中撈到可觀的私人收益。1965年約翰遜正忙于租用亞洲雇傭軍，支撐美國干涉越南所求的“國際十字軍”形象。與南韓人相比，同是雇傭軍，馬科斯得到了全亞洲最優厚的價錢。（在這項成就中，他那壞得出奇的老婆居功至偉，她撒錢開路，躋身華盛頓上層圈子，自蔣介石夫人的風光歲月以來，還沒有哪個女強人如此登峰造極。[[509]](#_509_11)）但是他也有富于想象力的傲慢無禮，試圖以美國人長期以來對待菲律賓人的習慣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據邦納記述，馬科斯給尼克松的每次總統競選運動各捐了百萬美元——當然是拿“國家的錢”，由此加入了第三世界專制者的那個精選群體（蔣介石、樸正熙、巴列維、特魯希略、索摩查），他們積極介入了宗主國的政治。[[510]](#_510_11)

就寡頭集團而論，馬科斯直指命脈——“法治”。從最初的時候起，馬科斯運用他的無限制戒嚴令權力，忠告夢想著反對或攆走他的所有寡頭們，財產不是權力，因為軍事管制的筆那么輕輕一劃，財產就不再是財產。[[511]](#_511_11)洛佩斯家族（根基在伊洛伊洛）的傳媒帝國，它對馬尼拉最大供電商的控制權，突然間就被剝奪了。[[512]](#_512_11)稍后，500公頃的奧斯梅尼亞莊園被拿出來進行“土地改革”。[[513]](#_513_11)他們哭告無門，因為法官們受盡恐嚇，立法機關滿是馬科斯的盟友和食客。但是馬科斯對擾亂既定的社會秩序不感興趣。那些順風倒、回避政治一心圖財的寡頭們通常未受驚擾。臭名昭著的“密友們”，從社會學上看，是一個混裝的袋子，里邊不僅包括費迪南德和伊梅爾達的親戚，還包括受優待的寡頭和相當多的“新人”。

一開始，這個戒嚴令政權就有堅實的（雖則有限的）社會基礎。它的反共的、“改良主義的”、“現代化的”和“法律與秩序”的修辭，吸引了一些群體的支持：受挫的、想做技術官僚的人，權能低下的許多城市中產階級，甚至還有農民階級和城市窮人的某些部分。贏得絕對權力后不久，他通報說政府從私人手里清繳了不下50萬支槍，鼓起了人們對可見危險減少的公共生活的希冀。[[514]](#_514_11)在舊人民軍經常出沒的中呂宋地區，一場有限的土地改革成功造就了一個自耕農新階層。[[515]](#_515_11)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也隨著這個政權的貪欲和暴虐日趨顯著，這種支持很多都難以為繼。到1970年代末，技術官僚們是一支風頭不再的勢力，而城市中產階級日益察覺了馬尼拉的腐敗，大學系統的敗壞，被壟斷的大眾傳媒的卑屈和荒謬性格，以及國家的經濟衰退。

這個政權的真正受益者——除了馬科斯黑手黨（mafia）以外[[516]](#_516_11)，是兩股軍事力量：國民軍和新人民軍。戒嚴令本身賦予前者空前的大權。但是馬科斯也利用受寵軍官管理從他的敵人、公營公司、市鎮等沒收的資產。上層軍官那種生活派頭，此前是只有寡頭集團才習以為常。[[517]](#_517_11)軍事諜報機構成了政府的千里眼和竊聽耳。對軍隊濫權的法律限制簡直不復存在了。如今只有一個主子，他決定任命和升遷。不錯，這個“老大人”在領導層上塞滿了從他那說伊洛卡諾語的家鄉來的聽話的祿蟲，但仍有足夠的位子可供分配。

另一方面，獨裁政權刺激了共產主義游擊武裝的快速壯大和較為緩慢的地理擴散。它們有組織地延伸到城市區域，這同它們擴大鄉村支持相比，意義并不稍遜。這個政權最后那些年頭里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是，某種民族主義—馬克思主義語匯被一些人群逐步采納了：顯要的資產階級知識階層，教會統治集團的下層，更一般地還有中產階級。[[518]](#_518_11)似乎只有好戰的左翼才提供了擺脫困境的某個出路。

1983年8月21日，小貝尼尼奧·阿基諾在馬尼拉機場被無恥地暗殺了。以后拆解這個政權的故事眾所周知，此處毋庸贅述。更要緊的是理解取代它的那個政權。

### 借勢“人民權力革命”

那位死難者的遺孀背后的初始同盟既廣泛又（易變地）深厚：她那時首先是科拉松·阿基諾，而不是科拉松·許寰哥。這個同盟是建立在一股來勢洶洶的浪潮基礎上的，即對那個“老大人”及其馬尼拉小姐（manileña）“豬小姐”的厭憎。從右派人士數起，它包括：國民軍野心勃勃的中、下級軍官，舊政權的刺目腐朽與它的男一號（premier danseur）的重用同族最終讓他們壯志難酬；一度滿懷憧憬的技術官僚與馬尼拉工商業界不算密友的那部分人；教會的幾乎所有派別；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階層中沒有加入新人民軍的各群體；自稱“奮斗目標導向群體”的各色人等，他們自認為是新近合法的左翼力量的先鋒；還有寡頭們。

這個同盟太過歧異和不相協調，不能維持太久。在“人民權力革命”兩年后，它范圍變得窄小多了，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更緊密地抱成團。先行離去的是它的右翼和左翼。“軍隊改革運動”（RAM）的活動分子們曾在1986年2月憑著背叛馬科斯而發揮了關鍵作用，對這些莽夫而言，唯一真正尚可的舊政權繼承者是一個軍政權，或者是在他們領導下的一個軍人主導的政府。但是這條路沒有任何值得當回事的國內支持力量，而且對正沐浴在太子港的電視光環下的華盛頓來說，無論如何是不值一議的。再者，里根政府內冷眼旁觀的現實主義者們洞若觀火：菲律賓軍隊派系分裂太重、太無能、太腐敗、太自大、訓練太差，不能給它任何便宜行事權。[[519]](#_519_11)一系列滑稽的暴動，在1987年8月28日的格雷戈里奧·“格林戈”·霍納桑（Gregorio“Gringo”Honasan）兵變中達到高潮，它們不過證明了前述判斷的明智。左翼方面，情況更復雜一些。新人民軍是其中實力最雄厚的部分，它從戒嚴令政府獲益匪淺，而今不得不決定如何應對新的勢力格局。到底是正面反對阿基諾政府，還是全力改變它的內部均衡，這個問題在1986—1987年間引起嚴肅爭論。由于種種原因（它們太錯綜復雜，我們不用糾纏于此，而且其智慧迄今尚有待判定），1987年初，擲出的骰子贊成對抗。[[520]](#_520_11)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合法左派崩潰了，“奮斗目標導向群體”明顯衰弱了，后者到霍納桑喜劇那時節，已經喪失了他們的“目標”之外的幾乎一切。從這些發展狀況中，當代阿基諾聯盟的現實的、不平衡的、不穩定的伙伴浮現出來：寡頭集團，城市中產階級，還有教會。

新政府的第一年里，當時“人民權力革命”依然熱情高漲，聯盟的地位較低的伙伴們樂觀向上。市場開放的新聞業的恢復，極大擴展的集會和組織的自由，以及馬科斯密友的專賣權和專買權的消滅，讓中產階級各界人士興奮得忘乎所以。他們能夠完全復歸原來的正常狀態了。工商業將重拾信心，菲律賓將改道走上進步之路。好心的美國人站在他們一邊。誠實的技術專家的專長終將得到恰當的賞識和酬報。知識分子階層（或者至少它的主體部分）如今感到可以自由地同激進左派脫離關系；它有一個新家，在廣播電視上，在報刊出版界里。

此外，阿基諾總統的核心集團不但包括樞機主教辛海梅（Cardinal Sin），還包括許多理想主義的人權律師，左翼—自由主義的記者和學者。也許是效仿現代國王們的榜樣吧，科拉松本人竭盡所能地以善良的市民階級的形象出現在公共場合。而今人們叫她Tita（阿姨）。阿姨是個勇敢、虔誠、質樸的家庭主婦，心里只想著如何讓侄子侄女們過得最好。唐·何塞·許寰哥控股公司的財務主管、路易西塔莊園的女共同繼承人，都基本上隱遁不見了。有一種感人的信心：國家的問題正通向合乎實際的解決。她啟動了與新人民軍和穆斯林造反者的談判。一項重大的土地改革將要頒布法案——這一土改不會觸動中產階級，但它許諾要逐漸削弱新人民軍還在壯大的農村根據地。美國人將提供數額巨大的資金，支持重建憲政民主。而人民權力將通過自由、誠實的選舉，為總統創造一個進步的立法搭檔，給予中產階級夢寐以求的領導國家的機會。教會領導層在很大程度上同懷這等企盼，相信新形勢將容許教會再度變得意識形態統一、組織紀律嚴明。[[521]](#_521_11)這個時期的流行語是“民主空間”，也許可最貼切地解釋成“中產階級在軍隊、寡頭集團和共產主義者之間縱橫捭闔的余地”。

新政府的第二年就讓這大多數幻想破滅了。同穆斯林和共產主義領導人之間的談判，因為實質上同樣的原因而失敗了：阿基諾政府發覺自己不可能做出有吸引力的任何讓步。頭腦里縈繞著民族主義夢想，即便那些似乎準備接受“自治”而非獨立的穆斯林領導人，依然要求自美國殖民時代以來念念不忘的一塊穆斯林自治區。然而，從蘭斯代爾—馬格賽賽政權開始把人民軍潛在的和實際的農民支持者遷入棉蘭老島的“空”地至今，靠了自發的移民、土地投機者、伐木和采礦聯合企業、大型的農業綜合企業等等，該島已經迅速“基督教化”了。就算阿基諾政府愿意（實際上它可不想）向穆斯林的夢想讓步，那將要求它或者被迫遷移這好幾萬“基督教徒”——如果不是好幾十萬的話（可是遷往哪里呢？），或者把他們留給情有可原地在氣頭上的穆斯林，任憑政治發落。它要靠它自身的美國時代的夢想過活，夢想一個統一的菲律賓，再說軍隊也不會容忍“軟弱”，這支軍隊跟穆斯林人作戰所遭受的傷亡，遠過于同共產主義者交手。對新人民軍，形勢并無二致。阿基諾總統拿不出什么東西不是共產主義者已經有的，或者是軍隊有可能容許的。[[522]](#_522_11)

美國人也不甚濟事。里根政府全神貫注于自身的生存，以及一打的“更要緊的”外交政策上的燙手山芋。它自己在財政上的大手大腳意味著如今對菲律賓是愛莫能助了，即便是在軍事援助方面（照舊有一星半點，大約是它想要供給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的那個數）。對菲律賓實施一項“馬歇爾計劃”的會談，隨著揚長而去的汽船的喧嘩聲息影絕跡了。而海外中產階級紋絲不動。它的成員或許定期回到家鄉，滿載著送親戚的禮物，可是他們斷定菲律賓中產階級的前景變幻莫測，不值得大規模投資。[[523]](#_523_11)在該政權的第一年里，有許多鼓吹掃除美軍基地的大無畏言論，可是到了第二年，形勢已經很明了了，那些基地將巋然不動：阿基諾政府覺得自己真的經受不住和華盛頓沖突，而且，關閉基地所必然導致的收入和就業的損失是不堪設想的。（在1980年代，美軍仍然是這個國家的第二大雇主，僅次于菲律賓政府。）美國人的確提供了一項重要幫助，那就是在面對各種滑稽的政變企圖時，政治上旗幟鮮明地支持政府。這些政變在1987年8月的“格林戈”套環里草草收場。

然而這個政權聯盟的中樞問題是“重建民主”，這表現在1987年5月11日重新啟動的參眾兩院選舉，和1988年1月18日的省長、市長及其他地方官長的選舉。中產階級的愿望是，這些選舉不僅會把臨時的阿基諾政府置于一個堅實的憲政基礎上，還會向軍隊和共產主義者有力顯示民心所歸。再有，它們還將把人民權力轉化成憲政權力，足可實施據認為對中產階級未來的領導權前景必不可少的某些國內改革。

### 巨頭們重整河山

正是在此時此地，這個統治同盟內的資深合伙人終于按捺不住出招了。第一年里這個寡頭集團過著心神不寧的日子。科拉松本人也許還足夠硬朗，她的一些親密顧問就不是這樣了；大眾傳媒那時還被中產階級城市改良派從意識形態上支配著，不停地煽風點火，贊成一場有望破壞新人民軍鄉村權力基礎的土地改革。甚至世界銀行也同日本和美國的高官們一道，在堅決主張同樣的邏輯。而且，直到那一系列選舉之前，總統掌握著無限制的權力，誰能保證她不會在某個意志薄弱的瞬間，做出什么要命的事情？

這種恐慌是現實的，雖然可能沒有確鑿的根據。土地所有者支持有序改革委員會（COLOR，有500名富豪成員）匆匆成立，它給科拉松送去了以血（幸好，是他們自己的）簽名的決議書，威脅一旦實施重大的土地改革，他們將采取不合作主義。“支持（產糖的）內格羅斯獨立運動”開展起來，宣稱預備好了武裝抵抗即將來臨的馬尼拉的不義之舉。[[524]](#_524_11)律師們被新聞界說成是“快忙瘋了”，他們要把農業用地重新歸類為“工商業”用地，要把多余的地皮退出來記在未成年的親屬名下，欺詐性地把抵押日期提前，等等。[[525]](#_525_11)

1986年所需要的，跟1916年、1946年一樣，是地方巨頭民主制。如果選舉能夠立即自由舉行，寡頭集團有望恢復1972年前它對“法治”的掌控，并讓人人——中產階級、軍隊、他們的佃戶，還有“賤民”——都各安本分。

1987年5月11日舉行了全國選舉，要選出24名參議員和200名眾議員。結果真叫人稱心如意。且讓我們援引一項信息豐贍的菲律賓研究為證：“200名眾議員當中，130人屬于所謂‘傳統的政治家族’，另有39人是這些家族的親戚。只有31位眾議員沒有1971年前的參選記錄，而且同這些老牌統治家族沒有瓜葛……24名當選參議員中，有少許非傳統人物，但是這個班子大體上是由1972年前的政治世家的成員構成的。”[[526]](#_526_11)新當選的參議員約翰·奧斯梅尼亞是自治政府副總統老塞爾吉奧·奧斯梅尼亞的孫子，1969年競選失利的總統候選人小塞爾吉奧·奧斯梅尼亞的侄子，他告訴媒體：“不能盡心為公，一個家庭成員也嫌太多；茍能盡心為公，十個家庭成員還嫌不夠。”[[527]](#_527_11)

24位獲勝的參議員候選人中，有23位是作為科拉松·阿基諾的支持者，也作為她的競選聯盟里各種徒具虛名的政黨黨員參選的，就此而言，上述結果被廣泛解釋為科拉松·阿基諾的勝利。[[528]](#_528_11)下院發生的事大同小異。[[529]](#_529_11)但是，把這個結果叫做科拉松·許寰哥的勝利，或許更好一些。前面引用過的那項研究提到：“屬于統治家族或與之有關的169名眾議員中間，有102位參與了1986年前的反馬科斯勢力，而有67位來自親馬科斯的黨派或家族。”寡頭權力波詭云譎的萬花筒晃悠了一下。

并不是說，老謀深算的地方巨頭們認識不到某些新現實，包括總統本人對民眾的真正吸引力。（相當數量的馬科斯同黨倒向她這一方。）當國會終于在1987年夏末開幕時，它正式宣布將開展土地改革，并任命“局外人”做參眾兩院主管農村事務的委員會主席。但是沒過幾天，下院農村改革委員會主席、眾議員博尼法西奧·希列戈（Bonifacio Gillego），一位改宗“社會民主”的前軍事情報官員，就在哀嘆這樣的事實：他的委員會的21名成員中，有17人是地主——包括總統的弟弟何塞·許寰哥、總統的姻叔埃米尼奧·阿基諾，還有內格羅斯的那位悍婦霍滕西婭·斯塔克。[[530]](#_530_11)

隨著1988年1月18日省和地方選舉的展開，舊制度的更全面復興來臨了；總共有15萬候選人，以美國人的方式（à l'américaine）競逐約16500個職位——平均每個要職有9個追求者。[[531]](#_531_11)這些選舉實在是有一種典型特征，當之無愧地值得評點一番。在有些地方它們代表了興沖沖的權力重整。比如在宿務島，埃米利奧·“利托”·奧斯梅尼亞，參議員約翰的兄弟，贏得了該島的省長位置；同時他的堂兄托馬斯，小塞爾吉奧·奧斯梅尼亞的兒子，擊敗了來自一個對頭大家族——即梅斯蒂索人的昆哥家族的候選人，也成了宿務市市長。[[532]](#_532_11)往北去一點，在杜拉諾家的領地里，82歲高齡的老拉蒙·杜拉諾（Ramon Durano, Sr.），在他的一個暴虐兒子赫蘇斯·“唐”·杜拉諾的幫襯下，挫敗了作為對手的另一個兒子，成功當選達瑙市市長。選舉后的那天晚上，失利的候選人撒迪厄斯·“德奧”·杜拉諾（Thaddeus“Deo”Durano），被家族內的刺客伏擊，在宿務市一間急救病房里奄奄一息。[[533]](#_533_11)那個老軍閥，戒嚴令期間是宿務的馬科斯核心黨羽，這次卻是以民主黨—戰斗黨聯盟的候選人身份參選的。該聯盟是阿基諾總統的弟弟何塞·許寰哥的政黨組織，何塞成功招募了馬科斯一派的其他許多地方巨頭，聚到他姐姐的旗下來。相同的勝利也發生在奧隆阿波——沾蘇比克海軍基地之光興起的商業區，女眾議員凱瑟琳·戈登的丈夫理查·戈登當上了那兒的市長；在西內格羅斯，眾議員何塞·卡洛斯·拉克松如今有當選省長小丹尼爾·拉克松做伴了；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并不是說，老牌統治家族無論如何都可以隨心所欲。在靠近首都馬尼拉的一些地方，中產階級改革者們動員起普通民眾和“較小的”統治家族，要瓦解舊封地。勞雷爾的政黨組織在八打雁省潰敗，使組織不力的副總統薩爾瓦多·勞雷爾顏面無光。在黎剎省，科拉松的舅舅、眾議員弗朗西斯科·“科芒”·蘇穆隆的王國被毀掉了。在邦板牙省，內波穆塞諾家族（Nepomucenos）、拉薩丁家族（Lazatins）和林加德家族（Lingads）出局了。在洛佩斯家族的伊洛伊洛領地，奧利弗·洛佩斯—帕迪利亞（Olive Lopez-Padilla），前副總統費爾南多·洛佩斯的女兒、眾議員阿爾韋蒂托·洛佩斯的姐姐，競選省長時打出了附庸風雅者—莊園主的絕妙口號“讓伊洛伊洛回到洛佩斯家”，但是仍然大敗虧輸。[[534]](#_534_11)在棉蘭老島的卡加延—德奧羅，被《馬尼拉公報》說成是“自本世紀初以來”就掌控著這個地方的福蒂奇（Fortich）大家族，顏面掃地。[[535]](#_535_11)同樣有趣的是某些軍人的參政。在東北呂宋的卡加延流域，前中校魯道福·阿吉納爾多（Rudolfo Aguinaldo），霍納桑叛軍的一位要員，嚇退了當地巨頭（杜帕雅家族［Dupayas］和圖松家族［Tuzons］），攫取了省長職位。在北伊羅戈的馬科斯老巢，副省長之位被前上校羅蘭多·阿瓦迪利亞（Rolando Abadilla）從軍事監禁中奪得；他曾經是馬科斯領導下的首都衛戍司令部情報安全大隊的恐怖頭子，被普遍懷疑是幫助謀劃暗殺科拉松丈夫的一個暴徒，也是1987年1月和4月的流產政變的一個主謀。[[536]](#_536_11)

甚至新人民軍也被間接引誘進來。據廣泛而可信的報道，在它過去擁有政治—軍事優勢的許多地區，該團體向候選人收取可觀的費用，方才允許他們不受干擾地競選；而且它對意氣相投的候選人處處給予非正式的支持。[[537]](#_537_11)這不是說內戰大大緩和了。就在投票結束一兩天后，霍滕西婭·斯塔克的比諾大莊園（Hacienda Bino）被焚為廢墟，恩里克·羅哈斯（Enrique Rojas，全國糖料作物種植園主聯合會的一位高官）的拉普利希瑪莊園（Hacienda La Purisima）也難逃同樣的下場。[[538]](#_538_11)

### 經營有方的賭場里的政治

這些變化無常的結果需要放在更大的框架下來觀察，以便恰當理解它們的含意。以下的關鍵事實須得謹記在心：全國2760萬合格選民中，高達81%的人投了票。[[539]](#_539_11)每1400位選民就要攤上這個或那個選舉職位。每個職位的平均競爭者人數約為9人。在多數地方，競爭以一種極新的樣式顯得“嚴酷”——41位候選人在短短的競選運動期間被對手（不是新人民軍）暗殺。[[540]](#_540_11)從右翼到左翼，幾乎所有政治領導人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競爭，而且可以想象他們多多少少是獲益的。無論何處，地方恩庇組織正在取代馬科斯時代集權化的委任制的統治機器。

在任何一家經營有方的卡西諾賭場，賭桌被操縱得從統計上有利于賭場老板。為了吸引顧客，老板必須讓他們不時贏上一把，甚至是大贏。贏一場是對玩家的技術和上天的眷愛的美妙證明。輸一場則顯示了他/她的倒霉或愚蠢。不管是贏是輸，賭徒都會盡快回到賭桌上來。地方巨頭民主制的“21點”也是這樣。改革的每一局部勝利預示了一個食利者的前景，每一失利則表明算計失誤或運氣不佳。然而在當周或當年末，莊家總是賺錢。

真相在于，美國式選舉制依然饒富吸引力，哪怕是在（或許特別是在）它同這樣一個國家里的西班牙式地方巨頭政治緊密結合的時候，這個國家地理上散碎，種族—語言上分裂，經濟上破產。它橫向地分散權力，卻縱向地集中權力；分權部分地掩蓋了集權。“任何人”都可能選上：看看巨量的、非強制的投票人數；看看競逐的候選人數量（你也可以參選）；看看壞透了的上校們（他們在各省競選好過在首都搞陰謀）；看看勞雷爾家族和內波穆塞諾家族的（興許是暫時的）失勢；看看新人民軍的選舉收費，從某種角度說，這同選舉時期軍閥的勒索如出一轍。[[541]](#_541_11)恰恰由于競爭激烈現實，人們很容易被說服去為——不妨說——阿森納或切爾西歡呼，而不費心思索這個事實：這兩支隊伍都是甲級隊，而且，人們是從外部看臺在觀賽，不是在場上參賽。

但是當然，斷斷不是每個人都很享受自己做觀眾的體育。在1月18日選舉后不久，有個好奇的記者去采訪了許寰哥家族的路易西塔莊園的一些雇工，他們剛剛大量投票支持阿森納。科麗阿姨（Tita Cory）成為總統，對他們的生活有什么影響嗎？“我們習慣了免費得到大米和糖，現在我們得掏錢。我們習慣了從自家院子的水泵里得到免費的水，現在我們得為抽起來的水掏錢，因為糖廠的糖蜜滲到我們井里了。”日工資？干田里的活兒漲了2.50比索（0.12美元），廠里工人漲了8比索（0.40美元）。工作強度？在好年景里，通常每周兩到四天。一位老人講到，他試圖坐公交車到鄰省邦板牙干點額外工作，好過日子：每天工資40比索，交通費花去23比索，還留下凈收入17比索（0.85美元）。這樣跑一趟還是有意義的。記者得知，有個工人，他說在這莊園里，馬吃得比勞工好，這話被一家國際雜志引用了；管理層“傳喚”了他，他不得不收回那一誹謗。但是有個受訪者斷言：“這話當然是真的。馬吃的是澳大利亞谷物和雞蛋，我們簡直吃不到肉。”[[542]](#_542_11)所有接受訪問的人，要么不肯告知他們的姓名，要么請求不要透露他們的身份。

## 10 第一個菲律賓人

很少有國家比菲律賓更給人一種深沉的歷史迷茫感。自亞洲觀之，1896年反對西班牙統治的武裝起義，使它成為該地區所有其他反殖運動的有預見的先驅。那次起義取得了暫時勝利，在1898年建立了一個獨立共和國。自拉美觀之，它和古巴一道，是西班牙宗主國殖民地中最后擺脫枷鎖的，比其余殖民地晚了七十五年。受了三個半世紀的西班牙統治之后，它深深打上了天主教改革運動的烙印，卻又是這個帝國里西班牙語從未廣為傳習的唯一殖民地。可它也是全亞洲在十九世紀擁有一所大學的唯一殖民地。1890年代，僅3%的人口懂“標準西班牙語”，但正是西班牙語的讀者們和作者們想方設法把反抗殖民統治的運動，由無望的農民暴動變成一場革命。今天，多虧了美國帝國主義，還有菲律賓的“亞洲人”新認同，除了少數學者，幾乎沒人理解革命英雄們賴以相互交流并與外部世界交流的這種語言，更別提理解二十世紀前菲律賓歷史的書面檔案了。一種實質上的腦白質切除術完成了。

革命這一代的核心人物是何塞·黎剎，他是詩人、小說家、眼科專家、歷史學家、醫生、好辯的隨筆作家、道德家和政治幻想家。1861年他出生于一個混合了華人、日本人、西班牙人和他加祿人血統的富有之家：在弗洛伊德之后五年，康拉德之后四年，契訶夫之后一年；和泰戈爾同年；在馬克斯·韋伯之前三年，孫逸仙之前五年，甘地之前八年，列寧之前九年。三十五年以后，他以煽動1896年8月博尼法西奧起義的莫須有罪名被捕，被西班牙軍官指揮的、本土士兵組成的行刑隊處死。這次處決的執行之所，就是如今風光旖旎的倫禮沓公園，它面朝馬尼拉灣的海岸線。（在西班牙世界的另一面，何塞·馬蒂，這位古巴民族主義的英雄，已經在前一年的行動中就義。）就在黎剎赴死的這時節，列寧剛被判處流放西伯利亞，孫逸仙開始在海外組織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甘地正在南非從事他的反殖抵抗運動的早期實驗。

黎剎獲得了那時殖民地能夠得到的最好教育，清一色是宗教修道會提供的，特別是多明我會和耶穌會。他后來無情地諷刺這種教育，但是它讓他掌握了拉丁語（和一些希伯來語）、古代典籍的扎實知識，以及西方哲學乃至醫學的初步知識。蒙昧的西班牙所提供的東西，與文明、先進的帝國主義列強在同一個東南亞地區所提供的東西做一比較，又是讓人迷惘的：法屬印度支那、荷屬東印度，或英屬馬來亞和新加坡，要到二戰結束后才有真正的大學。很早以來，黎剎就表現出過人的文學才能。十九歲時他參加了一次公開的文學競賽，獲得一等獎，擊敗了用母語寫作的西班牙對手。

黎剎是在現代政治開始傳入這個殖民地的時代成長起來的。在十九世紀，西班牙比其他任何宗主國更受難于深重的國內沖突，不單是為了王位繼承的沒完沒了的卡洛斯黨人戰爭（Carlist wars），還有世俗的自由主義與古老的貴族—教士秩序間的紛爭。1868年光榮革命將淫蕩的伊莎貝拉二世趕出馬德里，自由主義的短暫勝利對遙遠的太平洋殖民地產生了直接影響。革命者當即宣布，他們的勝利理當惠及各殖民地。重申對耶穌會的禁令，關閉修道士的機構，這似乎預示了海外修道會反動權力的終結。1869年，第一位“自由主義的”總督德拉托雷（Carlos Maria de la Torre）抵達馬尼拉，據說引起群眾高呼“自由萬歲！”（Viva la Libertad!）這種場景，在英屬印度或法屬阿爾及利亞，是多么不可想象。在他的兩年統治期內，德拉托雷不僅采取行動賦予原住民、梅斯蒂索人和半島人平等的法律權利，還穿著便裝、不帶武裝警衛，在馬尼拉四處閑逛；這些舉動使保守派的殖民地精英惱羞成怒。然而光榮革命的失守在馬尼拉引發殘暴的反動，其頂點是1872年公開絞死三名在俗（即非修會的）教士（一個克里奧耳人，兩個梅斯蒂索人），他們被誣告策劃了甲米地兵工廠的一場短時嘩變。

黎剎一家是這次反動的直接受害者。1871年，當何塞十歲的時候，他的母親被控毒殺鄰人，被迫徒步二十英里到監獄，在那里待了兩年才放出來。他的哥哥帕西亞諾（Paciano）是被絞死的三教士的首領布爾戈斯神父（Father Burgos）的得意門生，也險些被捕，只得中輟學業。面對這樣的環境，1882年，在兄長的支持下，何塞悄然離國，前往西班牙尋求相對的自由，繼續他的醫科學業。

隨后五年他待在歐洲，時學時輟，卻也周游了列國——到過俾斯麥的德意志和格萊斯頓的英格蘭，也到過奧匈帝國、意大利和法蘭西；帶著癡迷的、天資非凡的通多語者（polyglot）的輕松，學會了法語、德語和英語。歐洲在兩個相互關聯的方面決定性地影響了他。最直接地，他即刻開始領會到西班牙自身的落后，這是他的自由主義的西班牙朋友們常常扼腕嘆息的。這種見解使他處于殖民地的印度人或越南人通常不可得的一種地位，也是美國人來到馬尼拉后他的年輕國人們不可得的一種地位：他能夠從一個優勢位置去嘲笑宗主國，幾代人以來，宗主國就憑恃同樣的優勢嘲笑土著人。更意義深遠的是，他遭遇了一種感覺，后來他形容為“el demonio de las comparaciones”，這個難忘的短語或可譯成“比較的幽靈”。他以此表達一種新生的、躁動的雙重意識，從此以后，這種意識使他不可能在感受柏林的時候不立刻想到馬尼拉，或者在感受馬尼拉的時候不立刻想到柏林。這里確實就是民族主義的起源。民族主義靠比較為生。

在為《團結報》（La Solidaridad，一群堅貞的“土著人”組織的小團體的機關報，這群人在宗主國為政治改革而奮斗）寫稿的令人沮喪的幾年之后，正是這個幽靈引導他創作《不許犯我》，黎剎的兩部偉大小說的第一部，他將因為它們被永志不忘。他恰恰在1887年2月21日午夜前完稿于柏林，那是在格萊斯頓第一部《地方自治法案》（Home Rule Bill）被否決的八個月之后，康拉德《阿爾邁耶的愚蠢》發表的八年之前。他二十六歲。

《不許犯我》的兩大極驚人特色是它的范圍和文體。它的人物來自晚近殖民社會的每個階層，上起那位思想自由的半島人總督，下及殖民社會各種族層級——克里奧耳人、梅斯蒂索人、支那人（chinos、“純種”華人）直至目不識丁的土著（indio）百姓。書中擠滿了多明我會修士、靠不住的律師、受虐待的教士小廝、腐敗的警察、耶穌會士、小鎮豪強、梅斯蒂索女學生、無知的伊比利亞投機客、受雇的惡棍、絕望的知識分子、攀龍附鳳的善男信女（dévotes）、騙人的記者、女演員、尼姑、掘墓人、工匠、賭徒、農民、女買賣人，等等。（黎剎從不會不給哪怕是他書中最邪惡的壞蛋展現溫情和痛苦的機會。）不過，這部小說的地理空間嚴格限制在殖民地首都馬尼拉的近郊。西班牙始終在舞臺之外，即便有那么多人物都是此時或彼時打那兒來的。這種限定使得黎剎最早的讀者們明白了，“菲律賓”是自成一體的一個社會，即使住在其中的人們迄今尚無通名。他是想象出這一社會整體的第一人，這解釋了為什么而今他被緬懷為第一個菲律賓人。

小說的文體更加驚世駭俗，因為它結合了兩種有天壤之別的、乍看之下水火不容的體裁：音樂戲劇和諷刺故事。雖然它的枝節內容涉及流浪漢的冒險事跡，情節卻是純正的歌劇。小說是從富有、英俊、天真地懷抱理想主義的梅斯蒂索人唐·克里索斯托莫·伊瓦臘說起的，他長期旅歐游學，剛剛回國，計劃著要讓他的故鄉、他的祖國（patria）現代化，要娶他青梅竹馬的情人瑪麗亞·克拉臘，她是富裕的土著巨頭唐圣蒂亞格·德·洛斯·桑多斯的漂亮的混血千金。起先，他受到了恭敬熱情的歡迎，但是很快黑云壓城。他發現他的父親瘐死獄中，是被冷酷的圣方濟各會修士達馬索神甫陷害的，而且尸體已被丟進海里。以后他會知道，達馬索是他未婚妻的真正父親。同時，年輕的本堂神甫薩爾維暗地里垂涎瑪麗亞·克拉臘，還掩蓋了謀殺一個教士小廝的事情。漸漸地，伊瓦臘也了解到自己家系的邪惡血統，他的祖先是個殘忍的巴斯克人，來菲律賓淘金，把許多當地農民搞得傾家蕩產，后來自己也上了吊。伊瓦臘和一些人交上了朋友，其中包括思想不羈的當地哲人唐·塔席奧、有自由主義觀念的當地巨頭，甚至總督本人，還有神秘的土著反叛者埃利亞斯。（這兩人間有一席對話，涉及在菲律賓政治改革是否可行或一場革命性劇變是否在所難免的問題，直到今天仍然是菲律賓進步話語和歷史編纂學的一部分。）在這期間，教士們及其各種當地同伙陰謀拆散伊瓦臘的婚姻，阻撓他在家鄉建一所現代學校的計劃。最后，薩爾維神甫得知有一場針對他所在鎮的策劃好的反叛襲擊，就誣告伊瓦臘是煽動者和出資人。這個小伙子在一波波反顛覆的逮捕、拷打、處死中下了獄，但是靠埃利亞斯的搭救逃了出來，最后成了個亡命之徒。瑪麗亞·克拉臘為了避免被迫嫁給自己不愛的一個乏味的半島人，選擇了做修女；她拿她生父的通奸丑事和他當面對證，迫使他幫她立下誓約。她消失在一所女修道院，可是薩爾維神甫已設法得到任命，成為那里的精神導師，所以“無名的恐怖”靜候著這位不幸的姑娘。

有人可能會說，到目前為止，一切都是普契尼式的。然而這一音樂劇的情節中不僅點綴著對殖民地地方社會熠熠生輝的速寫，也點綴了小說家本人的以損害他自己的創造物為代價的抑制不住的笑聲——于是《托斯卡》變成了戈雅的《狂想曲》。試看這部小說的著名開頭：

十月的最后一天，唐圣蒂亞格·德·洛斯·桑多斯，也就是遠近知名的甲必丹蒂亞格，舉行了一次晚宴。雖然他一反常規，直到當天下午才宣布這事，但很快就傳遍了畢農多和它附近一帶，成為這個地區唯一的談話資料，就連西班牙舊城也不例外，因為在那個年代，甲必丹蒂亞格是公認的一個最殷勤好客的主人。誰都知道，他的家正像他的祖國，除了商業貿易、新的思想和大膽的主張之外，其他一切，都是來者不拒的。

這次晚宴的消息一經宣布，就像雷鳴閃電，把馬尼拉這個地方，由于天主的無窮智慧而創造出來、又由于他的大慈大悲［cariñosamente］而成倍繁殖的食客、幫閑和寄生蟲都轟動起來了。這些人，有的忙著找皮鞋油，有的忙著找紐扣和領帶，但所有的人都絞盡腦汁，各自盤算怎樣用最親熱的口吻去和主人打招呼，以便造成一種氣氛，顯得自己和他交情深厚，或先想好一套托詞，萬一去遲了，該怎樣表示歉意。

晚宴是在安祿加大街的住宅舉行的。我們雖然已經忘記了它的門牌，還是要設法把它描繪出來，讓人們一望而知——只要它沒有給地震震塌。我們相信這幢房子的主人不會自己把它拆毀，因為在菲律賓，這種事通常由天主或大自然來完成。我們的政府和老天爺也訂了不少合同，拆房子的事一向是老天爺包辦的。[[543]](#_543_11)

或者看看這部小說最后一章（“收場白”）的起首段，它緊接在故事已到達無情的哥特式結尾之后出現：

我們這部書里的人物，有些還活在人世，有些已經下落不明，因此，要寫一篇真正的“收場白”是不可能的。為了公眾的利益，我們倒是樂意把他們，從薩爾維神甫直到唐娜維多利娜，統統殺光，可是這我們也辦不到……那么就讓他們活下去吧！反正養活他們的是這個國家，而不是我們。

作者同讀者、人物和現實的這種調侃，讓人想起五年前出版的馬查多·德·阿西斯諷刺性的《布拉斯·庫巴斯的死后回憶》，這在嚴肅的十九世紀小說中是極不典型的，它賦予《不許犯我》一種特殊魅力。是它注定了將這部書搬上舞臺或銀幕的民族主義努力總是落空。確實正是這同樣的笑聲，為黎剎招來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們害得他英年早逝。

今天要再像1897年的愛國的年輕馬尼拉人那樣，把《不許犯我》讀作一顆政治手榴彈，是不可能了。我們全都有比較的幽靈蹲在我們肩上。它不過是推定存在的菲律賓人曾經寫過的第二本小說，第一本是二三流的、試驗性的劣作。那么由受殖者所寫的其他偉大小說又怎樣呢？美洲殖民地沒有，東南亞其余殖民地也沒有，非洲要等四分之三個世紀之后才有。與宗主國西班牙相比又如何呢？有人說黎剎從加爾多斯（Galdós）那里借鑒良多，尤其是后者1876年的反教權小說《佩菲塔夫人》（Doña Perfecta）。但是黎剎的小說在廣度和深度上如此鶴立雞群，所謂“借鑒”太可疑了。在他篇幅浩大的通信中，黎剎從未提及加爾多斯——此人在殖民問題上的意見完全是正統的。黎剎衷心仰慕的唯一一位西班牙作家，壓根就不是小說家，而是才高好諷的記者德拉·拉臘（José Mariano de la Larra），他在1887年風華正茂的二十八歲上自殺了。

那么泰戈爾呢，黎剎的真正同時代人？在此我們看到一種深遠差別。泰戈爾是古老博大的孟加拉文學傳統的繼承者，他的小說多是用孟加拉語寫就，是為英國治下龐大的孟加拉人口而寫的。黎剎的母語是他加祿語，那是一種少數民族語言，在多語言的菲律賓群島上大概只有兩百萬人會說，又沒有散文寫作的傳統，大概只有幾千人會讀。當他援用“tú,que me lees,amigo o enemigo”（“你們讀我書的，朋友或是敵人”）這話時，就告訴了我們，他為何用西班牙語——他的同胞只有3%的人能理解的一種語言寫作。他的小說既是寫給朋友看，也同樣寫給敵人看。在英國對印度的統治下，這種事情直到一個世紀后薩爾曼·拉什迪的作品方才發生。

黎剎不會知道，選擇用西班牙語寫作，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黎剎就義五年之后，貪婪野蠻的美利堅帝國主義摧毀了獨立的菲律賓共和國，再度將這里的居住者降到殖民地臣民的地位。美語作為表現真理、具有國際地位的新語言，被引入菲律賓，透過日漸擴張的教育系統推廣開去。到二戰前夕，它已（勉強地）成為這個群島上最通用的語言。西班牙語漸漸隱沒，結果到菲律賓被給予準獨立的1946年，它已經無法認讀了。不光是黎剎本人的小說、散文、詩歌和政治文章，還有1880和1890年代那想象民族的整整一代人的作品，都變得難以理解了。如今，卓越的反殖宣傳家皮拉爾、革命的設計師馬比尼、共和國慘遭暗殺的天才將領盧納，他們的大多數著作，都依然埋葬在西班牙語之中。

于是有了這種怪誕的形勢，它逼得菲律賓人通過譯文來閱讀該民族最受敬仰的這位英雄的作品——既譯成了各種地方方言，也譯成了美語。于是也有了一種翻譯政治學。把《不許犯我》翻譯成菲律賓大部分的主要語種，是非失敗不可的，這不僅因為許多西班牙人物“說著”他加祿語、宿務語或伊洛卡諾語顯得多么荒唐可笑，還因為敵人讀者群自動消失了，而且像梅斯蒂索人和土著人說蹩腳的西班牙語、西班牙殖民者失口說出蹩腳的他加祿語這類諷刺性描寫，本身是不可翻譯的。最顯赫的美語譯本是嗜酒如命的反美外交官格雷羅（Leon Maria Guerrero）于1960年代譯出的，至今仍是中學和大學的指定讀本，但是同樣有致命缺陷：以官方民族主義之名做了系統刪節。性、反教權主義，以及任何可察覺的與當代國家有重大關系的話，通通被毫不留情地刪除了，目的就是將黎剎變成一個無趣的、僵死的民族圣人。

這把我們引向眼前的譯本，它大致是在黎剎犧牲百年紀念的時候完成的。幾年前，菲律賓最杰出的學者之一，多琳·費爾南德斯（Doreen Fernandez），對黎剎文本的錯訛深感不安，動身去尋找一位語言上有能力翻出可信譯本的同胞。她終于找到了，那就是索萊達·拉克松—洛欽（Soledad Lacson-Locsin），一位年老的上層階級婦女，生于本世紀很早的時候，早得黎剎的西班牙語是她的第二天性——那絕不同于1880年代的馬德里西班牙語。這位老嫗就在去世前，完成了《不許犯我》及其1891年的更猛烈續篇《起義者》的新譯本。

新譯本在很多方面都是先前譯本的巨幅提高，裝幀美觀、腳注充分，有益讀者又不嫌繁瑣。但是粗野的美語影響痕跡猶在，更不必說那種基本的意識蛻變了，就在黎剎犧牲后一年左右的時間里，那種蛻變第一次造就了“菲律賓人”（“the”Filipino）這一民族觀念。

在黎剎的小說中，西班牙語單詞filipina和filipino仍然表示它們傳統的意思——也就是克里奧耳人，出生在菲律賓的、“純”西班牙血統的人群。按照傳統的帝國慣例，這一階層夾在半島人（出生于西班牙的西班牙人）與梅斯蒂索人、支那人和土著人之間。小說散發出傳統類型的民族主義，但這種民族主義涉及對祖國（patria）的熱愛，無關乎種族：filipino從來沒有出現過在二十世紀才有的種族—族群含義。然而到1898年，即黎剎犧牲兩年后，當馬比尼開始寫作的時候，filipino的舊義不復存在了。因此眼前這個譯本的根本困境在于，filipino/filipina始終是以Filipino/Filipina這樣一種不合時代的形式出現的：舉個例子，“el bello sexo está representado por españolas peninsulares y filipinas”（“這種女性，正是以伊比利亞半島的和克里奧耳的西班牙女子為其代表”），被荒謬地譯作“這種女性，正是以西班牙的半島人婦女和菲律賓婦女為其代表”。

另一個問題是原作的政治與語言復雜性被簡縮了，這無疑是因為拉克松—洛欽夫人恰恰生得太晚了，沒趕上西班牙統治時期的精英教育。黎剎讓種族主義的圣方濟各會修士達馬索輕蔑地說，“cualquier bata de la escuela lo sabe”，這時他嘲弄地插入了他加祿語bata，代替了西班牙語muchacho（男孩），以此顯示殖民地歲月怎樣讓這位修士的語言無意中成了混合語。當拉克松—洛欽夫人把這句話譯成“這點事隨便哪個學童都曉得”時，那種效果不見了。黎剎引用了他熱愛的十九世紀他加祿詩人巴爾塔薩爾（Francisco Balagtas）的三句詩，引的是原文，沒有翻成西班牙語，造成必要的文化間的不諧之音；但是如果引用這首詩，用的語言是它周遭文本的同一種語言，就抹煞了這種效果。反諷的章目“Tasio el loco ó el filósofo”（塔席奧：瘋子還是哲人）縮減成了“塔席奧”，而且人們不會猜到，章目“一天的好天氣預示在早晨”原本是意大利文。譯者對黎剎經常諷刺性地使用未經翻譯的拉丁語也感到為難。

在他們本國受到尊崇的先知寥寥可數，而黎剎就是其中之一。但是這種尊崇的條件，數十年來一直是他的不可利用性。拉克松—洛欽夫人恢復了這位偉人憂傷而煽動性的笑聲，從而改變了這一點。這種笑聲是太需要了——假如人們想到所有那些“在馬尼拉這個地方，由于天主的無窮智慧而創造出來、又由于他的大慈大悲而成倍繁殖的食客、幫閑和寄生蟲”。

## 11 難以想象

在艱難的1950年代末，菲律賓國內當權者們開始籌備何塞·黎剎博士誕辰的百年大慶——他生于1861年6月19日。黎剎不僅是最偉大的民族英烈——1896年被搖搖欲墜的西班牙殖民政權處以極刑，也是一位天分奇高的詩人、歷史學家、科學家、記者、語言學家、諷刺作家、政治活動家，尤其是小說家。很久以來人們普遍承認，他的兩部小說，《不許犯我》（1887年出版于柏林）和《起義者》（1891年出版于根特），是菲律賓文學的代表作，在菲律賓民族主義“覺醒”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不幸的是，這位“第一個菲律賓人”用西班牙語創作了這些作品，那種語言是晚期西班牙殖民時代的高雅語言和通用語言。更不幸的是，1899—1942年的美國殖民政權最終——不全是蓄意地——蕩除了西班牙語在當地的使用，逐步灌輸美語取而代之。只有少數富裕的梅斯蒂索和克里奧耳家庭還用西班牙語。由于公共教育在華盛頓贊助下鋪展開去，最后美語比任何一種菲律賓本土方言都（略為）通行一些。[[544]](#_544_11)這些發展的一個結果是，到1950年代，黎剎的兩部小說，原文已經讓人讀不懂了。英語譯本確實存在，但都是在殖民時代譯出的，有的甚至是外國人翻譯的。[[545]](#_545_11)所以，當獨立之世，值此百年慶典的大喜之期，發起一場最佳新譯的有獎競賽，似乎是再合適不過了。

然而這場競賽不僅僅是民族紀念的一個慶典。在1950年代中期，出乎大多數人的預料，這位英雄成了一場激烈政治論戰的中心。一群參議員和眾議員，為了報復極端保守的天主教領導層某些高官對國家選舉過程的冥頑干預（他們這么認為），倡議一項法案，要讓所有學生，不管是國立還是私立學校的，必須閱讀黎剎這兩部小說。教會處在很尷尬的境地。這兩部小說的主要反面人物都是教士：冷酷的圣方濟各會修士、好色的圣多明我會修士、貪權的耶穌會士。兩部書都包含了輝煌的篇章，其中無情嘲諷了十九世紀教會思想和傳道實踐的蒙昧的中世紀精神。雖然教會領導層非常樂意把黎剎當作民族英雄來紀念，甚至宣稱他在就義前夜已放棄了共濟會的和自然神論的觀點，但是，他們堅決反對堂區學校（parish-school）學生大量閱讀這位偉人寫的東西。接著就發生了五光十色的政治喜劇，結果是教會的戰術性勝利和戰略性失敗。不要求學生們讀這兩本特定的書，可以替換成別的煽動性稍弱的書。但是教會領導層，如其對手所愿地，被置于一種似乎要審查這“第一個菲律賓人”的難堪狀況下。

被新譯本競賽激發起來的那些人中，有位萊昂·格雷羅（Leon Ma.Guerrero，1915—1982），當時是菲律賓駐圣詹姆斯宮廷的大使。[[546]](#_546_11)對格雷羅，后邊我還有更多話要說。這里說一點就夠了：他流暢的譯本大獲成功，很快在中學和大學圖書館取代了一切舊譯。正如費爾南德斯提到的，它們成了“大家如今所讀的唯一譯本”。[[547]](#_547_11)可以有把握地說，今天真正讀過這些小說的美語版的幾乎所有中青年菲律賓人，讀的都是格雷羅版本。

大約二十年前，當我初次閱讀這些譯著時，我不懂西班牙語，而且既然它們讀來如此輕松流暢，我——以及我所認識的任何人——從沒有想過，它們有什么異常之處。但是五年前，我選擇了研究菲律賓民族主義，認識到我需要學會閱讀西班牙語，于是決定通過對照格雷羅譯本讀《不許犯我》和《起義者》原文，自學西語。這種美妙、費勁、逐行的閱讀立即讓我豁然明白，格雷羅的譯本以極有意思的方式系統地歪曲了原文。既然格雷羅本身是一個成熟老練、深富教養的人，西語也是運用自如，要說這種系統歪曲是由于草率或不勝任的緣故，看起來實在不可能。那又是何故呢？我在隨后的篇幅里想要提出的意見是，那些歪曲主要是由1890年代和1950年代之間的民族主義意識上的一個根本變化造成的，也是由獨立后馬尼拉“官方民族主義”的蹣跚興起造成的。[[548]](#_548_11)

在試圖理解格雷羅譯的《不許犯我》時，記住他的《導言》的某些奇怪特征很要緊。[[549]](#_549_11)他一開始就說他的譯本是一種“嘗試”，想讓這部小說“在黎剎誕辰百年之際，能合新一代講英語的菲律賓人的意，并且除了他們之外，在其他講英語的民族［peoples，原文如此！］中擁有更廣泛的讀者。”他接著說，從前的譯本一概不能令人滿意。

母語是英語的那些人操觚這部書時，他們缺乏對菲律賓社會環境的感受或理解。菲律賓人試作時，依我之見，他們又受困于對原文的過分崇敬，導致扭曲的意義解釋。兩者通常都塞滿了無數的解釋性腳注，這些腳注討人厭煩，令人泄氣，雖然它們肯定對外國人有幫助，甚至對不再知曉先輩習俗的眾多當代菲律賓人也有幫助。

他聲稱，在自己的新譯本中，他極力給予“讀者‘原著的流暢筆墨’，和這樣的《不許犯我》：假如黎剎親自操刀，用英語為當前一代菲律賓人寫作，大概就是如此這般了。”最后他評論道：

黎剎的文風往往不太可能吸引現代人；再者，西班牙語比起現代英語來，能夠表現得更加華麗、動情。因此我容許自己有更多的自由意譯某些段落，否則那些段落可能激起世故的竊笑，特別是瑪麗亞·克拉臘陽臺上的戀愛場景，那是菲律賓幾代多愁善感者們的賞心樂事。

這些開場白中有某些用心良苦的東西。這位民族英雄的小說要做得“合乎”年輕一代菲律賓人（中學生和大學生？）的“心意”，“他們不再知曉先輩習俗”——七十年前的先輩。它要翻譯得好像是黎剎在1950年代為格雷羅的同代人寫的。它要意譯，好預防世故的竊笑，縱使這意味著讓菲律賓幾代多愁善感者失望。既然不大可能是格雷羅認為中學生常常世故地竊笑，我們或可揣測，他想到的竊笑者是外國人，特別是美國和英國讀者。人們獲悉，刪節和現代化（對此格雷羅直言不諱）是必要的民族主義手段，以便讓黎剎繼續活在菲律賓青年心中，防止他的菲律賓人的榮光遭到盎格魯—撒克遜人取笑。至此一切了然。不過格雷羅對《不許犯我》的實際作為，初看起來，似乎跟這些明言的意圖幾乎不搭界。

我們可以在以下（有點隨意加的）七節標題下，概括格雷羅翻譯策略的關鍵要素。這種策略，一以貫之地運用到組成《不許犯我》[[550]](#_550_11)的幾百頁文字中去了。

### 去現時化（Demodernization）

雖然《不許犯我》的故事被安排在（不久前的）過去，因而主導時態是過去時，但也常有向現在時的滑奏轉調，這是黎剎大膽嘗試的文體的特征。可是，這種現在時，個個都被格雷羅系統地變成了過去時。例如，在精彩的開頭，黎剎惡毒地寫道：“Cual una sacudida eléctrica corrió la noticia en el mundo de los parásitos,moscas ó colados que Dios crió en su infinita bondad,y tan cariñosamente multiplica en Manila”（Rizal 1978，第1頁）。我們或可將這段話單調地譯成：“［唐圣蒂亞格舉行晚宴的］消息像雷鳴電閃，在馬尼拉這個地方，傳遍了由于天主的無窮德性而創造出來，又由于他的大慈大悲還在成倍繁殖的寄生蟲、食客和幫閑的那個世界。”然而格雷羅把最后那串做定語的短語譯成：“由于天主的無窮智慧而創造出來，又由于他的慈悲為懷而曾經成倍繁殖的”（第1頁；此處及其后的著重號系我所加）。另一個簡單的例子是黎剎尖刻諷刺“圣地亞哥”的富裕鎮民那一段，說他們凌虐窮人，卻為那些死去的魂靈虔誠地花錢買赦罪令、望彌撒，因為他們從那些魂靈那里繼承了財產。“A fé que la Justicia divina no parece tan exigente como la humana”（第73頁）。這句話意思是說：“真的，眼下看來神的正義不如人的正義那么苛求。”但是格雷羅寫道：“他們那時覺察到，滿足神的正義比滿足人的正義要容易些”（第79頁）。

每一次，格雷羅的更改的效果壓根不是“更新”黎剎的小說，毋寧說是把它推向深遠古老的過去。仿佛他想讓自己安心，上帝不再仁慈地繁殖馬尼拉的寄生蟲和食客了，他老人家終于變得和人類一樣苛求正義了。

### 排除讀者

整部小說中，黎剎不時地轉向讀者，對他們說話。好像作者和讀者就是鬼魂或天使，在作者的快樂邀請下，他們無形無相地鉆進修士的小屋、小姐的閨房、總督的豪宅，聚在一起偷聽那里正在發生的事情。這一技巧擱置了時間，把讀者深深地引入敘事中，調動了她的情緒，逗弄了她的好奇心，給她提供了居心不良的、窺探隱私的快感（這種技巧以奇特的方式預見了電影的技巧）。一個簡單的例子是這個過渡段，它介于兩個場景之間，前一個場景是達馬索神甫把唐圣蒂亞格推入后者的書房密談，后一個場景描述了兩個多明我修士之間有點熱烈的圖謀。黎剎寫道（第45頁）：“Cpn.Tiago se puso inquieto,perdió el uso de la palabra,pero obedeció y siguió detras del colosal sacerdote,que cerró detras de sí la puerta.Mientras conferencian en secreto,averigüemos que se ha hecho de Fr.Sibyla.”即是說：“甲必丹蒂亞格開始不安起來，不知說什么好，可是他照辦了，跟著神甫的笨重身軀走了進去，神甫在他身后關上了門。趁他們在室里密談的時候，我們來看看錫維拉神甫在干些什么。”格雷羅的譯文是這樣的：“他讓甲必丹蒂亞格非常不安，都不知道該怎么回答，只得順從地跟著身材魁梧的神甫進去了，神甫在他身后關上了門。這會兒，在這個城市的另一處，學問精深的圣多明我會修士錫維拉神甫，已經離開了他的教區住宅……”（第48頁）

復雜一些的例子在首章可以見到。黎剎寫道：

Pues no hay porteros ni criados que pidan ó pregunten por el billete de invitacion,subiremos,oh tú que me lees,amigo ó enemigo,si es que te atraen á tí los acordes de la orquesta,la luz ó el significatívo clin-clan de la vajilla y de los cubiertos,y quieres ver cómo son las reuniones allá en la Perla del Oriente.Con gusto y por comodidad mía te ahorraría á tí de la descripcion de la casa,pero esto es tan importante,pues nosotros los mortales en general somos como las tortugas:valemos y nos clasifican por nuestros conchas;por esto y otras cualidades más como tortugas son tambien los mortales de Filipinas.（第2頁）

這大致是說：

客人進門時，沒有門房也沒有仆人問他要請帖。既然如此，那么，讀者諸君，我們也步上臺階，進去看看吧；不論是敵是友，要是你醉心于里面動人的音樂、燦爛的燈光，或者那些挑動食欲的杯盤之聲，要是你有意想看一看在這被稱為“東方明珠”的城市里，夜宴是怎么舉行的，我們就進去看看吧。就我來說，如果不因事關重要，我倒樂意省掉這番敘述之勞，不來描繪這幢房子。但是我們這些凡人，一般都很像海龜；我們對我們的甲殼評頭論足，又根據它們分個三六九等。在這方面，甚至在其他方面，菲律賓的凡人們至今也都像海龜。

格雷羅令人驚詫地把這一華章譯成：

客人進門時，沒有門房也沒有男仆會問他要請帖。如果他被絲竹管弦之樂、銀盤瓷器挑逗食欲的叮當之聲吸引了，又如果一個外國人，興許很想知道，在這所謂的“東方明珠”上舉行的夜宴是怎么回事，那么他徑自走進去好了。人都像海龜一樣，被按照他們的甲殼分類和評價。在這方面，事實上也在其他方面，那時候菲律賓的居民們都是海龜。

黎剎機智的含沙射影的聲音一下子被壓抑了，作者和讀者之間豎起了一道無聲的墻，而且再一次地，原文中急迫的、當代的一切，被掃進了歷史。事情當然不單單是格雷羅也許對這樣的前景感到不自在：即便在獨立的菲律賓，居民們仍舊根據他們的甲殼被分類和評價。因為原文讓它的讀者不可思議地成了問題：amigo ó enemigo（是友是敵）？誰是這些enemigos（敵人）？必定不是其他菲律賓人？必定不是西班牙人？畢竟，《不許犯我》是寫來鼓舞菲律賓青年的民族主義的，是為菲律賓民族而寫的！西班牙讀者到底會“在里邊”干什么呢？[[551]](#_551_11)

### 刪除他加祿語

黎剎的西語文本點綴著他加祿語的單詞和短語。它們有時候用來取得單純的喜劇效果，有時候用來加深讀者對半島西班牙人、克里奧耳人、梅斯蒂索人和土著人之間的沖突的意識。但是最常見地，它們如同維多利亞時代發展起來的印式英語那樣，不過反映了地方方言對宗主國語言的偶然滲透罷了。比如，冷酷的西班牙圣方濟各會修士達馬索神甫會說：“Cualquier bata de la escuela lo sabe!”（第16頁）。bata是他加祿語單詞，指男孩或女孩，但是這里顯然意指“男孩”。格雷羅（第19頁）把這句話譯成：“這點事連小學男生也知道！”就好像黎剎寫下的是muchacho（西語，男孩）而不是bata。在別的地方，一些他加祿語單詞，諸如salakot（一種當地草帽），timsim（一種煤油燈），paragos（他加祿人的雪橇），或者sinigang（一種當地食物），它們非但沒有保持原貌（盡管1960年代初的菲律賓年輕讀者可能切身地熟悉它們），反而譯成了“當地草帽”、“原油燈”、“當地雪橇”和“當地菜肴”，像是從西班牙語翻譯過來的。[[552]](#_552_11)類似地，他加祿語感嘆詞naku!，aba!，和susmariosep!被草草刪去了事，雖然幾乎所有人物的西語談話中都夾雜了這些詞。[[553]](#_553_11)考慮到人們很難想象，即便是1960年代早期最為美國化的菲律賓人，竟會彼此說到“當地草帽”和“當地菜肴”，這種翻譯立場就尤為怪異。再說，那時候馬尼拉的多數居民，還相當熟悉這種或那種形式的美式他加祿語（Taglish），其中他加祿語和英語不斷交換和融合，如此一來，原作《不許犯我》的這種混合語確實本來看去是令人欣慰地“當代的”。[[554]](#_554_11)譯本中對它的刪削再度起了疏遠而非拉近這位民族英雄的作用。

### 刪節（Bowdlerization）

很顯然，格雷羅刪節了讓他不舒服的許多段落——提及政治或宗教事務的段落、罵人的話，還有說到肉體功能的地方。第一類的絕妙例子是一段俏皮的話，黎剎討論了甲必丹蒂亞格對某些宗教圣像的迷信崇拜：

No había él visto por sus proprios ojitos á los Cristos todos en el sermon de las Siete Palabras mover y doblar la cabeza á compás y tres veces,provocando el llanto y los gritos de todas las mujeres y almas sensibles destinadas al cielo?Más?Nosotros mismos hemos visto al predicador enseñar al público,en el momento del descenso de la cruz,un pañuelo manchado de sangre,é íbamos ya á llorar piadosamente,cuando,para desgracia de nuestra alma,nos aseguró un sacristan que aquello era broma...era la sangre de una gallina,asada y comida incontinenti apesar de ser Viernes santo...y el sacristan estaba grueso.（第28頁）

這大致是說：

難道他不是靠他那對豬眼似的小眼睛親自見過，就在神甫宣講耶穌臨終七言的時候，所有的基督圣像都一齊動彈起來，一齊點了三次頭，因而引起全體婦女和命定要升天堂的敏感靈魂痛哭流涕嗎？我們自己就曾看到，布道的神甫在談到把耶穌從十字架上放下來的時候，向大家展示了一塊血跡斑斑的手絹；正當我們又要一拋虔誠之淚時，真叫我們的靈魂遭殃的是，圣器管理員告訴我們那不過是個玩笑，手絹上的血跡原來是雞血，他們已經把那只小雞當即烤來吃了，盡管那天是耶穌受難節……圣器管理員吃得可胖呢。

格雷羅只翻出了這些：“難道他不是靠他那對小眼睛親自見過，就在耶穌受難節神甫宣講臨終七言的時候，那些圣像一齊三次抬頭三次垂頭，感動得教堂里的全體婦女、甚至命定要得拯救的所有敏感靈魂，涕泗交迸、虔誠呼號嗎？”（第32頁）看起來，華人梅斯蒂索人的輕信被奚落是一回事；而允許這第一個菲律賓人，以其挖苦的語調，去嘲笑教士玩世不恭地操縱普通菲律賓人的虔誠，以及嘲笑那種虔誠本身，這完全是另一回事。于是黎剎那輕松滑稽、頑皮搗蛋的第二句話就被省略了。

黎剎經常讓他筆下較粗野的人物爆粗口，使用的是印刷上的常規技法“p——”。這個“p——”可能表示putangina這個混合語詞，它是西班牙語puta（妓女）和他加祿語inay（媽媽）組合而成，意即“你媽是雞婆！”（在馬尼拉街頭，這個罵人的詞兒每天可以聽到很多遍，它真是“小學男生都知道”的話。）另一個也許更可能的所指是puñeta，這個表達實在太下流了，確保了它不被馬德里皇家學院的權威西語詞典收錄——我們可以把它譯成“你手淫啊！”然而，每一情形下，格雷羅要么干脆抹掉“p——”要么把它譯成“該死”，或者再大膽一點，“真他媽的”。[[555]](#_555_11)如果誰在馬尼拉四處溜達，他所見到的最普遍、獨特的墻壁涂寫是：Bawal umihi dito，即“此處不許小便！”就像地中海國家的男人們一樣，無論何時何地感到尿急，菲律賓男子習慣于差不多當即就地一撒為快。一般而言，男男女女都把撒尿看得平平淡淡。因此難以理解的是，黎剎讓他的人物撒尿的地方，這些段落都被譯者刪掉了。然而更驚心的是格雷羅對一個有名段落的處理，黎剎在此描述了“圣地亞哥”老墓地的廢圮狀態。他這樣譏諷地寫那些骸骨和骷髏：“Allí esperarán probablemente,no la resurreccion de los muertos,sino la llegada de los animales,que con sus líquidos les calienten y laven aquellas frias desnudeces.”（第56頁）意即：“它們等在那兒，很可能不是等待死者的復活，而是等著野獸的到來。野獸們會用尿液溫暖它們，給露在外面的寒骨沖個澡。”格雷羅顯然被這種諷刺嚇得退縮了，他告訴我們：“它們在那里等著，不是等待死者的復活，而是等著野獸的注意，好溫暖它們的寒軀，洗滌它們的裸體。”（第61頁）從這句話里，年輕讀者可能輕易想到的，不是公豬的尿流如注，而是幼鹿舌頭的溫柔舔觸。

### 去地方化

《不許犯我》中的幾乎所有場景，都要么設在“圣地亞哥”（現在的卡蘭巴，也是黎剎的家鄉），要么設在馬尼拉。涉及馬尼拉的那些章節，到處提到街道、教堂、居民區、咖啡館、廣場、戲院等等，處處可見對它們的描寫。在過去的這個世紀里，這些地方當然有的已經消失了，還有一些改了它們的名字和用途。然而不管是誰，只要他在馬尼拉住過較長時間，依然完全可以認出其中大部分的。這些地方和地名的密集，屬于有這樣一種效果的因素，它能給予讀者最逼真的感受，覺得自己被深深拖入小說之內了。狄更斯的手法幾乎一模一樣，他運用詳細的倫敦城市地理，使比爾·賽克斯和費金、丹尼爾·奎爾普和小耐兒的世界活靈活現。所以格雷羅刪除了這些尚可辨識的地名多達80%，就莫名其妙了。運用西語原版，人們很容易跟著黎剎的英雄和惡棍們在這都城四處活動；但是如果使用格雷羅的美語譯本，這基本上行不通。還有，黎剎間或把他那時走紅的音樂廳和小歌劇的“明星們”搬上舞臺：查那奈（Chananay），葉鶯（Yeyeng），馬里亞尼托（Marianito），卡瓦哈爾（Carvajal），如此等等。這些名人起的作用，就像伍迪·艾倫、帕瓦羅蒂、麥當娜在關于當代紐約的一部博文奧義的小說里可能起的作用一樣。他們無需介紹，因為1880年代的每個讀者自然而然地知道他們是何許人。格雷羅刪除了所有這些明星，用一種匿名的集體身份如“馬尼拉最著名的演員”代表他們。[[556]](#_556_11)令人疑惑之處在于，格雷羅一定有足夠廣博的學問，知道在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和普魯斯特的小說中，提到今天已被忘卻的演藝名人，這根本不會妨礙——反倒是增強了——他們向讀者呈現的這些世界的直接性和逼真性。雖然1950年代的年輕菲律賓人肯定不認識葉鶯是“誰”，可他們能夠認出她的名字是他加祿語，從而明白她是一個菲律賓女子；雖然“卡瓦哈爾”是個西班牙人名，可有位當代的梅斯蒂索人電影小明星也叫這個名字。人們想必會認為，保留黎剎的那些人名原本有助于讓1880年代的社會環境更加接近現代讀者，而不是使他們對那個環境感到隔膜。

### 去歐洲化

黎剎雅人深致，憑借他的耶穌會教育，通曉拉丁語和古代世界。他懂西班牙語、英語、法語和德語，也粗識意大利語和希伯來語。[[557]](#_557_11)他還博覽歐洲文學。因此不必奇怪，讀者會發現《不許犯我》中到處是沒有譯出的經典名句（經常用于精妙諷刺的目的），也到處提到和引用大名鼎鼎的歐洲大師們。格雷羅處理這些被提及的人與言的辦法，就是盡一切可能，消除它們或使之歸化。有時候這種效果怪里怪氣的。比如，在兩個多明我會修士的陰謀商議中，黎剎讓年長的教士說道：“Temo que no estemos empezando á bajar:Quos vult perdere Jupiter dementat prius.”（第47頁）意即：“我怕我們已經在走下坡路啦。朱庇特想讓誰滅亡，就先讓他瘋狂。”黎剎沒有翻譯拉丁語，因為他設想讀者能夠理解他的警句。他讓兩位修士，在滑稽的賣弄學問中，提到羅馬人的主神，雖然教會的神父們老早就已經把歐里庇得斯的神秘的希臘邪神（daimon），轉變成了基督教的上帝（Deus）；這樣黎剎也是在取笑多明我會修士。格雷羅去掉了拉丁語和帶刺的話，把這句話譯作：“上帝要誰滅亡，必先使其瘋狂。”（第50頁）結果是黎剎的雅致笑聲被抹掉了。

在另一段引人注目的話里，黎剎寫到達馬索神甫的陰險樣子“os acordareis de uno de aquellos tres monjes de que habla Heine en sus ‘Dioses en el destierro',que por el Equinoccio de Setiembre,allá en Tyrol pasaban á media noche en barco un lago,y cada vez depositaban en la mano del pobre barquero una moneda de plata,como el hielo fria,que le dejaba lleno de espanto”（第4頁）。[[558]](#_558_11)大意是：（他那模樣）“讓你不由得想起海涅在《流亡的天神》里描述的三個修士中的一個來，他每當秋分那一天的午夜在蒂羅爾搭船過湖的時候，總在船夫手里放上一枚冷若寒冰的銀幣，嚇得那可憐的人毛骨悚然”。格雷羅譯成這樣：“讓人想起德國故事里的那三個修士中的一個來，他在午夜時分要渡過蒂羅爾湖，每次都在船夫手里放上一枚冷若寒冰的銀幣，使那個船夫不勝驚駭”（第5頁）。在黎剎嘲弄地使用“la palanca del mundo”（第91頁），分明以此指稱阿基米德的有名杠桿的地方，格雷羅把這博學的惡意漂白了：“我認識到孩子們每天看見鞭笞，就會毀掉他們的同情心，也會扼殺做人的尊嚴感，這種尊嚴可以撼動（move）世界。”（第99頁）（讀者完全可能把這兒的move理解成“感動”［stir the heart］。）黎剎稱他的主要女惡人為“美杜莎”（第262—263頁）的地方，格雷羅就直呼其名“慰藉夫人”（Doña Consolacion，第299—300頁）。商博良（第217頁）變成了“名滿天下的埃及學家”（第247頁）。智慧老者塔席奧，黎剎說他是一個“filósofo”（第62頁），即philosophe（哲人），狄德羅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和懷疑主義的菲律賓代表人物，到格雷羅筆下成了沒有語境提示的“學者”（scholar，第67頁）。消失的人物還有克洛伊（Chloe）、亞克托安（Actaeon）、白雪公主、萊奧尼達斯（Leonidas）、普洛托（Pluto）、阿耳戈斯（Argus）、阿里阿德涅（Ariadne）、彌諾斯（Minos）、巴克斯（Bacchus）、愛神阿斯塔蒂（Astarte Genetrix）和“長著無數乳房的以弗所的狄安娜”，以及別的許多人。[[559]](#_559_11)

既然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格雷羅以他的反美民族主義為傲，這一切里邊就有一種奇特的反諷。因為他的去歐洲化翻譯的效果，不是讓黎剎菲律賓化，反而讓他美國化了。

### 時代錯誤

從1880年代到1950年代，運行于菲律賓的“官方的”社會—政治分類系統多有變遷，而翻譯中的時代錯誤的最突出例子，全都以不同方式與此相關。開篇的一些小小細節就能讓人對此有所感覺。比如，黎剎（第27頁）引人發噱地說到一個富人家里媚俗的圣米迦勒像，這位天使長“embraza un escudo griego y blande en la diestra un kris joloano”，意思是說，他“左臂挽著一塊希臘式盾牌，右手揮舞著一柄霍洛人的格利斯短劍（a Jolonese kris）”。格雷羅的譯文是：他“一條胳膊上挽著一塊希臘式盾牌，另一只手揮舞著一柄馬來人的格利斯短劍（a Malay kris）”（第31頁）。除了典型的拉開距離的時態變換之外，[[560]](#_560_11)明顯的形態變化是“霍洛人的格利斯短劍”變成了“馬來人的格利斯短劍”。黎剎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把“kris”排成斜體，在這個群島上，無論過去現在，誰都知道那個單詞，知道那種短劍。穆斯林市鎮霍洛那時是、如今依舊是這種精良的傳統武器的最佳制造者之一。格雷羅把“kris”用斜體標出，就使它作為某種“外來的”、需要向年輕菲律賓人解釋的詞/物凸顯出來。“Malay”（馬來人的），這更古怪了。一種讀法是，它可以指馬來亞/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民族，他們確實也制造格利斯短劍；這樣的讀解將會加重該武器的外來性——好像暗示1960年代菲律賓人對它一無所知。但是這個單詞也可以并且看似更合理地“從種族上”理解，意指像“馬來人—波利尼西亞人”之類的人口類型，一般認為其中包含了菲律賓人、占人、馬來人和印度尼西亞人。設若如此，這里的“Malay”將有助于擦拭掉這一事實——菲律賓的穆斯林過去/現在是宗教上的少數派，被占總人口90%的基督教多數派圍困起來，從而強調這種格利斯短劍“本質上是菲律賓的”。

如果我們看看黎剎使用族群、種族和政治術語的方式，問題就會越積越多。總體而言，他堅持晚期西班牙殖民者的分類：半島人（即出生于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克里奧耳人（即出生于菲律賓或拉美的西班牙人），梅斯蒂索人（即混血兒，包括西—土、西—華、華—土混血和其他復雜情況），生理人和支那人（出生于菲律賓之外的華人），土著（indios or naturales，菲律賓群島上的“印第安人”或原住民）。但是有時候，他前后不一地使用梅斯蒂索人和克里奧耳人這對術語，以致它們顯得相互重疊甚至相當。這種矛盾性是1880和1890年代的特點，當時政治、文化和社會的變遷正在使舊等級制遭到懷疑。記得這一點同樣要緊：filipino這個詞，那時才剛剛開始發生語義的重大轉換。對這個國家——人人都叫它Filipinas或Las Filipinas——中的大多數人來說，遲至十九世紀末葉，filipino基本上是克里奧耳人的同義詞，亦即生于群島的血統純正的西班牙人，而且它始終是按西語的格式拼寫的，字頭是小寫的“f”。但是幾乎不知不覺地，向上流動的西班牙梅斯蒂索人和華人梅斯蒂索人也開始自稱filipinos，他們不時地與傳統的filipino克里奧耳人結盟，在政治上對抗控制了殖民地軍、政、教大權的半島人。1900年后，也就是黎剎遇害、1896—1898年反西革命運動成功之后，它迅即獲得一種主要是政治的涵義，指謂這個國家的全體“子女們”，不問其種族血統是什么。它還變成了大寫體。可是在黎剎小說里，它從未在二十世紀的這種意義上使用過。

格雷羅對這些術語的處理格外說明問題。首先，意指梅斯蒂索女人或克里奧耳女人的filipina（出于某種原因，黎剎幾乎不用這個形容詞或名詞的陽性形式），一般都被譯成Filipina，后者指的是菲律賓的女性國民。克里奧耳人幾乎消失了，梅斯蒂索人往往依照盎格魯—撒克遜的種族主義風格，被譯作“半純種人”（half-breed）。例如，對那個華人梅斯蒂索人唐圣蒂亞格·德·洛斯·桑多斯，黎剎會心地寫道：“si se criticaba á los mestizos sangleyes ó españoles,criticaba él tambien,acaso porque se creyese ya ibero puro”（第29頁）。（“要是有人非難華人梅斯蒂索人或西班牙梅斯蒂索人，他會隨聲附和，也許因為他自己已經自認是純粹的西班牙血統了。”）格雷羅則寫道（第33頁）：“要是他聽到對華人半純種人和西班牙半純種人的批評之聲，他會添油加醋，也許因為他自己已經自認是純粹的西班牙血統了。”當愚蠢、自負的唐娜維多利娜想指定一個遺產管理人管理她的家產的時候，黎剎說（第239頁）她“pensó en un administrador peninsular,no confiando en los filipinos”。且不說其他種種，僅上下文就已經讓黎剎表達的意思一清二楚了：“她曾打算從西班牙半島找一個人來給她管理家產，因為她不信任克里奧耳人。”但是格雷羅把這句話現代化、民族化、荒謬化成這樣子：“他務必是來自西班牙的一個西班牙人；她可信不過菲律賓人”。（第273頁）黎剎原文是“pregunta una criolla”（第325頁，意即“一位克里奧耳姑娘詢問說”）的地方，格雷羅譯成“一位半純種姑娘插話說”（第373頁）。也許這一切中最惹人矚目的，是黎剎對瑪麗亞·克拉臘婚禮的來賓名單的說明與格雷羅譯文之間的對照。黎剎說該名單“únicamente españoles y chinos;el bello sexo está representado por españolas peninsulares y filipinas”（第329頁，意即“只有西班牙人和華人；女客們也只限于半島西班牙人和菲律賓的［克里奧耳］西班牙人”）；格雷羅的譯文是：“只有西班牙人和華人；女客們也僅限當地西班牙人和自伊比利亞半島來的西班牙人”（第379頁）。這是譯者沒有誤譯filipinas的唯一地方。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種典型的思維在運作。在黎剎的原句中，filipinas表現為一個形容詞，限定了españolas（西班牙人），所以“Filipina Spaniards”（菲律賓婦女的西班牙人）將是不可容忍的明顯誤譯。此外，對1960年代的年輕菲律賓人來說，讀到菲律賓婦女（而不是菲律賓人）應邀參加這種限制甚嚴的婚禮，大概會覺得奇怪。格雷羅巧妙的解決辦法是，給出恰當的譯文，但同時也要確保黎剎原文里filipinas的存在不露一絲痕跡！

在試圖破解格雷羅翻譯策略的意義之前，有必要對這個人本身說上幾句。他生于1915年，即美國從西班牙手里奪取菲律賓的統治權十六年之后；卒于1982年，即菲律賓（第二）共和國宣告成立的三十六年后。他出自馬尼拉的格雷羅大家族，一個梅斯蒂索人的中產之家，那是真正當得起書香世家稱號的少數家族之一，歷經三代，造就了一些卓爾不群的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561]](#_561_11)

他的祖父萊昂·格雷羅一世（Leon Ma. Guerrero I，1853—1935），以“菲律賓植物學之父”著稱，是知名的科學家、教育家、記者和愛國的保守主義政治家。這位圣托馬斯大學的植物學教授，在阿奎納多于1898年夏宣布成立革命共和國之后，開始積極參政議政。他為阿奎納多的《菲律賓共和國報》（La República Filipina）撰稿，是革命立法機關的一員，在阿奎納多第二屆內閣任過職，還幫助領導菲律賓代表團，與舒曼委員會（Schurman Commission）進行和平談判。當1907年美國人建立殖民地議會時，他作為國民黨黨員，代表布拉干省第二選區，做了一個任期的議員。隨后，他回歸學院生活，當選為馬尼拉書院（Liceo de Manila）首任院長。他的一個兒子，塞薩爾·格雷羅（Cesar Ma.Guerrero，1885—1961），成了顯要的神職人員，先是做林加延的主教（1929—1937），以后又做圣費爾南多的主教（1948—1957）。但是，有傳言說他在1942—1945年間與日本占領軍合作，為此他后來受到叛國罪的指控，多虧了教會統治集團的院外活動，這個案子最終撤訴，但他的令名是被糟蹋了。萊昂的另一個兒子，阿爾弗雷多·格雷羅（Alfredo Ma.Guerrero）博士，是一位富有的、有口皆碑的醫生，他就是我們這位譯者的父親。

這個家族的旁支同樣出眾。萊昂一世的兄長洛倫索（1835—1904），是個名聞遐邇的職業藝術家，也是菲律賓最著名的畫家胡安·盧納（Juan Luna）和伊達爾戈（Resurrección Hidalgo）的恩師。他的一個兒子，費爾南多·格雷羅（1873—1929），這位“革命詩人”，至今仍因他的愛國詩篇為人追念。革命期間，他充任盧納將軍《獨立報》（La Independencia）的年輕的正式撰稿人，后來又成了一些民族主義報刊的激情似火的編輯，如《復興報》（El Renacimiento），《先鋒報》（La Vanguardia），《祖國報》（El Patria），還有《民意報》（La Opinión）。他也進了美國時代的第一屆議會。洛倫索的另一個兒子，曼努埃爾·格雷羅（1877—1919）博士，在圣托馬斯大學教醫學，也為《菲律賓共和國報》和《民意報》工作，還發表了一部生動活潑的短篇小說集，書名為《文學散文集》（Prosa Literaria）。費爾南多的一個兒子維爾弗里多還健在，是著名的劇作家、導演和菲律賓大學的教授。曼努埃爾的一個女兒伊萬杰琳娜（Evangelina），是位西語作家，1935年因其《心靈萬花筒》（Kaleidoscopio Espiritual）榮獲索韋爾獎（Zobel Prize）。格雷羅家族的人，一直到我們的譯者這一代以下，在家里仍然悉數說西班牙語；但是在公共生活領域，前兩代人與萊昂·格雷羅和他的遠房堂兄維爾弗里多這代人之間有一道清晰的裂痕，前者主要用西班牙語寫作，后者幾乎全用美語著書立說。[[562]](#_562_11)

格雷羅，一個年輕的殖民地居民，對他的書香門第有濃厚意識，輝煌的職業前程看來是命中注定的。1935年，他在耶穌會的馬尼拉雅典耀大學（Ateneo de Manila）以最優異成績獲得文學士學位；1939年，在菲律賓大學以最優異成績獲得法學士學位。1940年，他二十五歲，已經在雅典耀大學教法律了，還任職于副檢察長辦公室。他最初的任務之一，是起草一份辯護狀呈遞給菲律賓最高法院，敦請駁回青年費迪南德·馬科斯不服謀殺罪的上訴（也許因為首席法官老何塞·勞雷爾自己年輕時也被迫洗刷這樣的謀殺指控，馬科斯贏了上訴）。這期間，格雷羅成了科拉羅·雷克托（Claro Recto）的門生，后者是一位富有的律師，國民黨的政治家，親西班牙的文人。這層關系將要多方面決定他以后的職業生涯。雖然在巴丹和科雷吉多爾他都和美國人并肩作戰，但據卡洛斯·基里諾說，他已經因美國人沒能保護他的國家而感到幻滅了。于是，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他重操舊業，恢復了美國時期很受歡迎的一欄節目，即晚間廣播政治評論；他用了一個化名，叫伊格納西奧·沙勿略（Ignacio Javier），也就是耶穌會兩位英雄的合體：羅耀拉的圣依納爵（St.Ignatius of Loyola）和圣方濟各·沙勿略（St.Francis Xavier）。1943年，雷克托當上了何塞·勞雷爾的戰時共和國的外交部長，這時年輕的格雷羅也加入到外交使團中去，從1943年到1945年擔任菲律賓駐東京的新大使館的一等秘書。當勞雷爾和雷克托都因戰時通敵（像格雷羅的那位教士叔叔塞薩爾一樣）被美國人（極短暫地）監禁起來的時候，這位年輕的時事評論員—外交官實在是太小的蝦米了，不值得興師問罪。短時的烏云蔽日之后，1947年他東山再起，做了參議院的法律顧問，后來又加盟雷克托的生意興隆的法律事務所。到1954年他三十九歲的時候，在狡猾的卡洛斯·羅慕洛（Carlos Romulo）手下當了外交部副部長。他是個了不起的“1950年代的成功人士”，似乎沒有理由不應當再上層樓。接下來事情開始出岔子了。

他做了一系列主題為“亞洲人的亞洲”的未加審核的演說，它們讓羅慕洛和美國大使館大為震怒，也讓那些從中嗅出戰時日本宣傳主題的某些回響的人們憂心忡忡。這些演說的語氣似乎使他的觀點緊密呼應著參議員雷克托的觀點，后者當時出于自身的原因，正提出一種中立主義的、暗地里反美的外交政策立場。可此時參議員本人和麥格賽賽總統已經勢同水火。接著格雷羅就被打發去倫敦任大使，在那里他從1954年一直干到1962年。

更糟糕的還在后頭。1959年10月，他作為派駐聯合國的菲律賓代表團成員，出席了紐約的一場外交午餐，在這兒他陷入了與美國代表團成員沃爾特·羅伯遜（Walter Robertson）的激烈爭執，后者是杜勒斯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又有權勢又反動。據說羅伯遜提到雷克托時嗤之以鼻，還以恩人的姿態歷數美國對菲律賓的大公無私的政策，這惹惱了格雷羅。羅伯遜最后說道：“你太粗魯了……你要知道，你是這樣跟我講話的第一個菲律賓人。”對此，據稱格雷羅回敬道：“麻煩在于你不習慣菲律賓人對美國人頂嘴。”[[563]](#_563_11)華盛頓隨后表態，任何重大的外交聚會都不歡迎格雷羅。1960年他成了國際糖業理事會主席，1962年淪落為駐西班牙大使。在這期間，他的恩主、參議員雷克托于1960年底亡故。當親美的、也是美國人做后盾的馬科斯上臺的時候，格雷羅終于同流了，竟至于在1975年發表了為戒嚴令政權辯護書。辯護書原題為《今始于昔》（Today Began Yesterday），無論對他的名聲還是他的前程都沒多大好處。他開始酗酒，1982年郁郁而終。[[564]](#_564_11)

格雷羅就是在這種種遭際下從事他的黎剎翻譯的，因而它們十分重要。他的《失去的伊甸園》導言注明的日期是“1959年黎剎日［12月30日］”，也就是和羅伯遜爭吵后僅僅三個月；《起義者》導言注明日期是“1961年，黎剎誕辰百年的五一節”，也就是雷克托死后沒幾個月。看來合理的推斷是，由于意識到沒什么指望在高層政治中扮演更大的角色，他像他的家族里先行一步的其他人一樣，轉而去打造他的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和文人的名聲。實際上，緊跟著這些翻譯，他很快撰寫了一部英文的黎剎傳記并獲了獎（他后來稱，只花了一個月就完成了！），還有一部西班牙語的文章和演說集，題為《是耶非耶》（El Si y el No），1963年榮膺索韋爾文學獎。

把如此巨大的精力奉獻給黎剎，取得的成就卻如此古怪，這是本文最后部分要考慮的難題。

兩條一般的探究理路浮現出來，它們將在不同層面上被究詰到底，但全然不必相互齟齬。兩者從彼此映照的視角出發，邀請我們去思索政治時間的流逝。

第一條理路是近乎普世的時代推移：從民族主義主要是一種民眾造反運動、外于政府也反對政府的時代，過渡到它部分地被改造成新—舊政府的合法化工具的一個時代。在黎剎短暫生命——年僅三十五歲——的最后十年里，他是想象和動員菲律賓大眾民族主義的核心人物，這種民族主義反抗兩個政府：以馬尼拉為基地的專制的、教權主義的殖民地政府，和以馬德里為基地的、半是自由—共和政體半是教士—君主政體的、有分裂傾向的宗主國政府。這一任務需要進行一場艱苦卓絕的破壞和建設的運動。必須撕去殖民地政府及其反動的教士同盟的假面具，同時必須想象出一個菲律賓，它與母國西班牙各成一體，涇渭分明。在不同方面，小說作為一種文學體裁（黎剎算是開菲律賓風氣之先），對這兩個目標是完全合用的。[[565]](#_565_11)因為它讓人有可能把“菲律賓”（Las Filipinas）想象成一個包含了許多社會類型的有界的社會學實在，[[566]](#_566_11)那些社會類型在每個社會層次上，彼此間進行著日常的、“同時的”互動。但是它也容許讀者，從無與倫比的辯論細節中，了解到剝削、野蠻、偽善、懦弱、盲信、愚昧、無知和腐敗的積弊，是它們讓殖民統治成為可能。換言之，小說與黎剎非凡的諷刺才能配合得天衣無縫。正是在這種語境下，我們可以注意到，《不許犯我》的有些修辭風格和手段對黎剎的目的多么不可或缺，而格雷羅恰恰要盡其所能地清除它們。這部小說是以（不久前的）過去為背景，這或許有其必要，但是作者急切地向讀者保證，上帝繼續在馬尼拉仁慈地繁殖著食客和幫閑。在殖民地獨裁統治下，普通讀者大概沒有機會親眼目睹多明我會修士或總督的陰謀詭計；但是作者會牽著這些讀者——不管是敵是友——的手，讓他們無形中偷聽到那些陰暗的勾當。人人都了解到，在有政治家風度的宣言與虔誠的說教的門面下，統治者和他們的夫人、情婦、姘婦們下流地咒罵，撒尿，混用著他加祿語表達和常常不合語法的西班牙語，講點兒拉丁語錯誤百出，而且他們恰恰住在這條街上，把一些人發配到那座監獄，在這家戲院觀賞俗不可耐的歌舞雜耍表演，又在那座修道院里密謀。黎剎駕輕就熟地運用最令人信服、最直接的社會現實主義來表現這一切，這是他的首要戰略：于是有了puñeta（你手淫啊），susmariosep（他加祿語的一種嘆詞），Yeyeng（葉鶯），Pasay（帕賽城），salakot（一種當地草帽），Jolo（霍洛城），如此等等。這里的東西無不是戰斗的號令。

可是在1950年代的獨立菲律賓，這一切還有多少是真正承受得起的？1942—1945年間，這個國家經濟上、身體上、道德上都飽受摧殘，因為美國主子和日本主子在它上面交戰。從1948年到1953年，它經歷了本世紀以來第一次嚴重的造反運動。美國軍事基地和美國強加的對等協定（Parity agreement）束縛了它的真正自由。然而它是被1890年代梅斯蒂索人革命精英的子孫們統治著，他們已經在美國殖民體制下大發其財，大撈其權，他們曾經跟日本占領政權合作，如今堅定地意欲成為他們自家名實相副的主人。

對這個獨立后的當權派而言，隨著它的不穩定的國內和國際威望的發展，黎剎爺爺似乎顯得既是朋友又是敵人。他有西班牙人—華人—土著的混合血統，也有安逸的生活境況，所以他是他們中的一員。他的英雄行為和自我犧牲堪為萬世師表。他是唯一的這樣一位菲律賓人：西班牙和德國的街道用他的名字命名，他的著作被翻譯成了印地語、法語、印尼語、英語和俄語。他的雕像遍布在一百個菲律賓小鎮的廣場上。他是農民中間流傳甚廣的一種大眾神秘崇拜的核心人物。因此他擔當了菲律賓民族主義真理的首席保證人——某種意義上甚至是它的托辭。

但是他也是一個敵人，特別是因為他本人就是個民族主義者（這與圣女貞德和威廉·退爾不同），而且他還寫啊寫啊寫個不停。到1950年代，他所寫的許多東西是擾亂人心的，即使不是顛覆性的——對他的民族主義譯者亦然。黎剎譴責過對婦女的壓迫：雷克托卻在一戰后單槍匹馬阻止菲律賓效仿美國賦予女性選舉權。黎剎嘲諷過通敵叛國的梅斯蒂索大莊園主：格雷羅卻是國際糖業理事會主席，而菲律賓議會就被這些通敵叛國的糖業大亨們把持著。黎剎無情奚落天主教統治集團：可是在1950年代，菲律賓大主教魯菲諾·桑多斯（Rufino Santos）無疑是殖民時代反動的西班牙知識階層（clerisy）[[567]](#_567_11)的精神后裔；格雷羅的叔叔塞薩爾主教，本來可能輕易漫游到《不許犯我》或《起義者》的書頁中去。也許就是這些考慮促成譯者做了某些刪節，而且通過去現時化、排除讀者和去地方化，使黎剎的菲律賓盡可能地遠離他自身時代的菲律賓。

但是與這些狹隘的考慮相比，另一些考慮也許更深遠、更重要。正是獨立的現實使群島上官方民族主義的出現成為可能，從某個角度看來甚至是成為必要。這一形式的民族主義，作為國家的派生物和甲胄而浮出水面。它不僅在官方的紀念儀式上，也在一種系統的計劃中自我彰顯；那種計劃主要（雖說不是獨一地）借由國家的教育系統，旨在創造和傳播官方民族主義的歷史、官方民族主義的英雄先賢祠，和官方民族主義的文化，傳遍它年幼、初生的各階層公民之中——自然地，是為了國家自身的利益。這些利益首要在于灌輸對它自身的信仰、敬畏和服從。

我們能夠理解，這個黎剎，在社會觀念上顯得過激，反偶像崇拜，含譏帶誚，泥土氣重，道學腔濃，他不是那么容易適應這項計劃的。從官方民族主義的觀點看，英雄應當讓人崇敬，不是讓人贊賞；供人看，不供人聽——也不供人讀。不用詫異，官定的黎剎是西班牙王城的博物館里靜默的烈士蠟像，是手里拿著（合上的）《不許犯我》和《起義者》兩本書的雕塑，是《我的訣別》（Mi Último Adiós）這首哀婉之詩。[[568]](#_568_11)如果說黎剎在這方面是典范，他也絕非獨一無二。殘廢的革命政治家馬比尼，有一座紀念他的博物館，官方提到他時，尊之為“崇高的癱瘓者”，可是他的暢達、尖酸的西語作品，大多仍未翻譯成英語或他加祿語。安東尼奧·盧納，革命共和國的這位最富創造力的將軍，紀念他的雕像多的是，可是它們不會告訴人們，他是共和國總統阿奎納多下令暗殺的；他的那些精彩信件和其他著作，當代公民們也無緣親炙。“偉大的庶民”博尼法西奧，在馬尼拉北部一個破落地區，有一塊引人注目的紀念碑追念他，但是這位偉人的話，鐫刻在碑的基座四面，是用他為躲避西班牙殖民政府的安全機構而設計的密碼——普通百姓也不解其意。[[569]](#_569_11)結果總是相當于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沒有聯系，只有樣板。

在萊昂·格雷羅成年生活的多數時間里，他是菲律賓國家的一名忠誠敏慧的仆人。很難不懷疑，在他的黎剎翻譯中，這個國家的要求有意無意地充當了他的戰略指南針。

不過，對格雷羅譯本引出的諸多問題，如果我們簡單歸因于獨立后的精英良知敗壞，或者歸因于官方民族主義的需要，我不相信我們解決了問題。因為這些解釋都不能圓滿說明去歐洲化、去他加祿化，以及最重要的，時代錯誤。

至此我們不得不轉向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后果。至少從本文的觀點看來，這些后果之至要者，是美語取代了西語成為群島上的通用語，還有菲律賓人自我觀念的一種根本重塑。自此以下，我將試圖證明，這些轉變真的使黎剎的“菲律賓”（Filipinas）實際上不可想象。

上文提到過，根據1939年（美國殖民統治確立四十年后）的人口普查，不足3%的人口聲稱懂西班牙語，卻有超過26%的人表示會“英語”。這兩個數字很有意思，本身就需要加以解釋。雖然的確有許多位高權重的殖民地官員鄙視西班牙語（和西班牙文化），卻不能說消滅這種語言是美帝國的一般政策：畢竟，波多黎各（它本質上是美國殖民地）基本上依然是說西語的社會。事情的真相是，即便在西班牙統治末期，也只有5%的菲律賓人口通曉西語。[[570]](#_570_11)然而考慮到黎剎那一代精英舒適地把西班牙語用作交際語，我們決不能懷疑，假如第一共和國得以幸存下來，它的教育機構想必會立即推廣西班牙語，以之為國語。美語的成功不旋踵而至，是由于殖民政權建立了第一套近代國家教育體制（1899年后的第一代人中，入學人數擴大了500%），同時使熟諳英語成為取得激增的官僚職位和大多數專門職業的必備條件。于是對成千上萬有抱負、想往高處走的菲律賓人來說，這種語言就是社會、政治和經濟升遷的門路。[[571]](#_571_9)天主教學校朝著同一方向發展，盡管緩慢一點。[[572]](#_572_9)與此同時，雖然美語由此取代了西語，成為這個殖民地的權力語言，但是它們二者同各地方言（尤其是他加祿語）的關系大不一樣。在伊比利亞統治的幾個世紀里，這些方言有不少詞匯和短語滲入了西班牙語，后者無論怎樣都未受標準化教育系統的“監管”。這一點說明了《不許犯我》全書中他加祿語色彩的隨意蔓生，哪怕是在西班牙人嘴上。然而美國人來得太晚，太強勢，存在時間也太短，結果沒和他加祿語打交道，而他們的學校強化了這個立場。[[573]](#_573_9)因而在菲律賓流傳著一個神話，說美國教師一旦發現學生在課堂上講他們的母語，就會嚴懲不貸。[[574]](#_574_9)（或許這就是美國人教育出來的格雷羅從他的《不許犯我》英譯本中刪除他加祿語的原因？）

然而除了語言變化外，還有宗主國統治的更廣泛影響，這種統治幾乎在每個方面都與之前那個政權截然不同。二十世紀初葉，美國地大財豐，高度工業化，世俗化，共和制立國，沒有文化底蘊，在一定限度內是民主治國。[[575]](#_575_9)西班牙國小財薄，農業為本，教權當道，半君主制立國，深受古典文化熏陶，民主程度極低。在美國殖民政權治下，曾經權勢熏天的天主教會被貶到政治的邊緣地位。1909年佩恩—奧爾德里奇關稅法案通過以后，菲律賓穿越到美國保護主義的高墻后面，第一次造就了一個財大氣粗的莊園主寡頭集團。邊遠地區，特別是棉蘭老島，都被納入了剛剛一體化的資本主義經濟當中。盡管選舉基礎非常有限，但菲律賓國家領導層還是選舉產生了。新的美式教育體制建立起來，它培養出律師和工程師，而不是神學家和古典學者。[[576]](#_576_9)美國的統治還與商業廣播和電影的問世同時發生，后者至少對菲律賓城市社會造成了全面深遠的影響。想著上面這一切，我們也許就能更好地理解，為什么格雷羅要將他的《不許犯我》去歐洲化，為什么他會說有如此之眾的菲律賓年輕人“不再知曉先輩習俗”。與亞克托安和克洛伊、商博良和哲人一道，一整個世界都消失了——不僅是對年輕菲律賓人。在帝國主義的宗主國自身，古典文化的流風遺韻大多絕跡了。在這方面，1950年代的華盛頓和馬尼拉相差無幾。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對菲律賓、對菲律賓社會的想象上的根本變化，這種變化始于1880年代，但要到兩代人之后才完滿實現。我們或可公式化地表述該變化，簡單說來就是：黎剎是愛國者，而格雷羅是民族主義者。[[577]](#_577_9)

比如，非常引人注目的是，黎剎臨刑前不久創作的那首優美的詩歌，陳辭對象并非是他的菲律賓男女同胞，而是他的親愛的祖國（patria adorada）。實際上詩里提到的僅有的幾個人是他的直系親屬，還有那位“可愛的外國人”（dulce extranjera），他的不幸的“愛爾蘭”妻子約瑟芬。也許我們不應為這種形式的獻詞感到驚訝。黎剎去過美利堅、西班牙、意大利、法蘭西、德意志、不列顛、比利時和香港，可從未到過伊羅戈、比考爾或米沙鄢群島。他對棉蘭老島的有限認識還要感謝西班牙當局，是它把他流放到達皮丹（Dapitan）。（在這點上他絕對堪稱他那時代知識人的典型。）盡管如此，他可深知“菲律賓”（Las Filipinas）為何物，它的面貌在地圖、地圖集、報紙和圖書中可以尋見。[[578]](#_578_9)菲律賓已有大約350年歷史了。[[579]](#_579_9)它就在那兒，在想象中受到愛戴——作為一個地方，一個家園（Heimat）。但在他那時代，如我們早先講到過的，群島上形形色色的常住民尚無一個通名：filipinos還主要是指西班牙克里奧耳人。當然，他的確提到了pueblo（人民），可是它的輪廓仍然模糊難辨，特別是因為他經常用它指稱卡蘭巴或馬尼拉的當地居民。他畫出的真正界線，是在“親愛的祖國”的熱愛者、正義的熱愛者與他們的敵人和壓迫者之間的那些界線，帶著布雷丁所稱的“克里奧耳愛國主義”的特征，是政治的、道德的和情感的界線。因此，他給《起義者》題獻詞，緬懷殖民政府1872年公開絞死的三位愛國在俗教士——克里奧耳人何塞·布爾戈斯和哈辛托·薩莫拉（Jacinto Zamora），華人梅斯蒂索人馬里亞諾·戈麥斯（Mariano Gómez），他不認為這有什么好大驚小怪的。他讓梅斯蒂索人成為《不許犯我》的男女主角，也覺得稀松平常。[[580]](#_580_9)這兩部小說里滿是來自殖民地社會各個傳統階層——克里奧耳人、梅斯蒂索人、土著，甚至半島人[[581]](#_581_9)——的愛國成員和殘暴成員。

前面我們評論過，黎剎與他那一代革命家的成就之一，就是漸漸地開始想象一種新的歷史之人：菲律賓人（the Filipino）。至少是為了極其政治化的目的，土著人、梅斯蒂索人和克里奧耳人都消融到這種菲律賓人里了。1899年后，半島人要么已回西班牙，要么如果留下來的話，注定要變身為“菲律賓公民”——又是一種新想象。隨著時間的流逝、民族主義的播延、選舉權的擴大，及國家的重獲獨立，“菲律賓人”日益取代“菲律賓”（Las Filipinas），成了言辭的和真心的忠誠對象。格雷羅是這種隱秘巨變的顯著產物。他的《不許犯我》導言系心于菲律賓人，對菲律賓（the Philippines）甚至只字不提。[[582]](#_582_9)而且，這些菲律賓人如今很大程度上已被設想成一個族群—種族統一體。不僅在格雷羅身上，也在他那時受過教育的大多數菲律賓人身上，這種觀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致黎剎看待他周邊世界的方式幾乎變得難以理解。正是在社會類別系統的這一轉變中，我猜我們可以發現格雷羅《不許犯我》英譯本里的時代錯誤這道難題的解答。因為年輕菲律賓人會在西語原本的任何忠實英譯中，立刻看出他們不存在于小說篇章之內。當然filipinas會出現，不過她們并不是今天的Filipinas（菲律賓婦女）：她們是“純種的”西班牙克里奧耳人。這一轉變，再加上盎格魯—撒克遜種族主義的影響，可能有助于解釋格雷羅的奇怪做法——用“half-breed”（半純種人）譯“mestizo”（梅斯蒂索人，殖民地的一個社會、法律范疇），而罔顧這個事實：按這些術語說來，黎剎和他本人也都是“半純種人”。但是在1950年代，第一個菲律賓人是“半純種的”，這不是匪夷所思嗎？

我們也不應該——卻極可能——忘卻另一種轉變，它小規模地肇始于1930年代，今日則達到高潮：這就是不計其數的菲律賓居民越過古老群島的邊界，向遠方永久遷移。起先是去夏威夷和阿拉斯加；然后，當肯尼迪政府改革了美國移民法律之后，去加州和大陸美國的其余地方；最后，在馬科斯和阿基諾統治下，去歐洲、南美、中東、香港、日本、新加坡——哪里有希望就去哪里。因為這種大規模遷徙產生了數十萬計的移民，他們來自菲律賓，卻不再是它的國民，不再是家鄉山水間的人物。但是他們深深依戀于一種“認同”，對于該“認同”，格雷羅料必理解得透徹，而何塞爺爺大概會覺得驚愕莫名。

但是要說轉變已告完結，怕是操之過急了。菲律賓歷史的書寫老是這么支離破碎，轉變未竟很可能就是原因之一。在菲律賓教文體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Culture,and Sports）主持編寫的一本標準歷史教科書里，菲律賓兒童被教導說，他“血管里流淌著40%的馬來人血液，30%的印尼人血液，10%的尼格利陀人（Negrito）血液，10%的中國人血液，5%的印度人血液，2%的阿拉伯人血液，還有3%的歐美人血液”。[[583]](#_583_9)再有，所有菲律賓人都來自別的某個地方：“阿埃塔人或尼格利陀人是最早來到菲律賓的。”[[584]](#_584_9)相反，奧諾弗雷·科爾普茲，這位前教育部長和菲律賓大學校長，卻在“塔邦人”（Tabon Man）那里找到了菲律賓人始祖。塔邦人的零星工具，在巴拉望的一個遙遠洞穴里被發現了，據說可追溯到至少公元前6萬年。[[585]](#_585_9)親西班牙的文人尼克·華金寫道，“1521年前我們可以無所不是，獨獨不是菲律賓人；1565年后我們什么都不是，單單只是菲律賓人”，[[586]](#_586_9)這全仗西班牙征服帶來的技術和文化革命。然而對一些著名的天主教歷史學家來說，菲律賓歷史的真實進程，在半個地球之外的基督教誕生中就有其神意的起源。[[587]](#_587_9)

最后來一條思辨性評論或許不為無據。戴維·布雷丁在對西屬美洲思想長期演化的研究中，向讀者證明得一清二楚：彼此對立的沖動如何始終在起作用，并且，隨著美洲各地愛國主義的發展和轉型，這些對立變得更加尖銳。幾百年間，克里奧耳人和梅斯蒂索人竭力想辦法，要宣稱蒙提祖馬和他的誘騙者科爾特斯，阿塔瓦爾帕和殺害他的劊子手皮薩羅，是他們的聯合祖先。今天，在民族主義興起差不多兩個世紀以后，我得知整個墨西哥只有一座科爾特斯塑像，它還被小心地隱藏在墨西哥城的一個僻靜處所。但是，如今用來公開歌頌阿茲特克和瑪雅祖先的語言，卻是那位隱身的西班牙征服者的語言。科爾特斯被抹煞了祖先地位，瑪雅（比方說）被抹煞了語言地位，這種雙重抹煞作為精英們的民族主義的一種適宜特質，令人印象深刻。那些精英深刻意識到他們雜交而成的歷史和文化。我們時代的民族主義夢想著“純粹”（purity），又發現很難纏綿于“純粹的混雜”這種逆喻。為什么黎剎小說的克里奧耳人—梅斯蒂索人世界如此之速地變得如此難以想象，也不可能翻譯呢？大概最后這就是原因所在。

### 附言

在上文征引的同費爾南德斯的訪談中，格雷羅得意地提起他在翻譯那個著名場景上的成功，該場景中，還不陰險、還年輕的慰藉夫人（Doña Consolacion），同她的丈夫爭辯“Filipinas”怎樣發音。值得檢視一下他的成就的奇妙特性。

西語原文如下：

—Una de las bellas cualidades de esta señora era el procurar ignorar el tagalo,ó al menos aparentar no saberlo,hablándolo lo peor posible:así se daría aires de una verdadera orofea,como ellos solía decir.Y hacía bien!porque si martizaba el tagalo,eì castellano no salía mejor librado ni en cuanto se refería á la gramática,ni á la pronunciación.Y sin embargo su marido,las sillas y los zapatos,cada cual había puesto de su parte cuanto podía para enseñarla!Una de las palabras que costaron más trabajo aun que á Champollion los geroglíficos,era la palabra Filipinas.

Cuéntase que al día siguente de su boda, hablando con su marido,que entonces era cabo,había dicho Pilipinas;el cabo creyó deber suyo corregirla y le dijo dándole un coscorron:“Dí Felipinas,mujer!no seas bruta.No sabes que se llama así á tu p—país por venir de Felipe?”La mujer,que soñaba en su luna de miel,quiso obedecer y dijo Felepinas.Al cabo le pareció que ya se acercaba,aumentó los coscorrones y la increpó...“Pero,mujer,no puedes pronunciar:Felipe?No lo olvides,sabe que el Rey Don Felipe...quinto...Dí Felipe,y añadele nas que en latin significa islas de indios, y tienes el nombre de tu rep—país!”La Consolación,lavandera entonces,palpándose el chichon ó los chichones,repitió empezando á perder la paciencia.“Fe...lipe,Felipe...nas,Felipenas,así ba?”

El cabo se quedó viendo visiones.Por qué resultó Felipenas en vez de Felipinas?Una de dos:ó se dice Felipenas ó hay de decir Felipi?Aquel día tuvo por prudente callarse;dejó á su mujer y fue á consultar cuidadosamente los impresos.Aquí su admiración llegó al colmo;restrégose los ojos:A ver...despacio!—Filipinas decían todos los impresos bien deletreados:ni él ni su mujer tenían razon.

“Cómo?”murmuraba,“puede mentir la Historia?No dice este libro que Alonso Saavedra había dado este nombre al país en obsequio al infante D.Felipe?Cómo se corrompió este nombre?Si será un indio el tal Alonso Saavedra...?”

逐詞逐句直譯過來大概是這樣：

這位夫人有一點可愛的特性，就是她不愿意懂得他加祿話，至少表面上要裝作不懂的樣子，盡量把他加祿話說得非常糟糕：這便可以顯得自己是一個她所常說的真正的“Orofea”［西語Europea之誤，意思是“歐洲女人”］。真是萬幸！因為如果說她宰割了他加祿話，那么不論就文法或發音來說，西班牙話的命運在她嘴里也好不了多少——盡管她的丈夫以及椅子、靴子等等都盡了最大的努力來糾正她。她在學某個西班牙字上所花費的氣力要比商博良辨認象形文字所費的氣力還要大，這個字就是“Filipinas”。據說行完婚禮后的第二天，她跟她的丈夫（他那時還只是個下士）說話的時候，她提到了“皮利賓”。下士覺得自己有責任糾正她，于是給了她一巴掌說：“念‘菲利賓’（Felipinas），婆娘！別那么蠢！你不知道你他媽的這個國家的名字應當念‘菲利賓’，是從‘菲利普’（Felipe）這個字來的嗎？”這個女人當時正沉湎于新婚燕爾的甜蜜幻想中，想做一個溫順的妻子，便念了聲“菲勒賓”。下士覺得她有長進了，便又給她添了幾巴掌，呵斥道：“婆娘，你不會發‘菲利普’這個音嗎？記住，你應該知道這個國王，唐菲利普——五世……念‘菲利普’，然后加上字尾nas，這個拉丁字尾是‘印第安人的島嶼’的意思。——這就是你他媽的這個國家的名字！”

當時還是一個洗衣婦的慰藉夫人輕輕摸了摸被打疼的地方，耐著性子重復念道：“菲—利普，菲利普—恩，菲—利—笨，對啵？”

下士心里一亮。真的，怎么會是“菲利賓”而不是“菲利笨”（Felipenas）呢？要么叫“菲利笨”，要么就得管“菲利普”叫“菲利皮”，這兩者誰對呢？

當天他覺得不吱聲是慎重之舉。離開妻子以后，他便迫不及待去查書。他簡直驚訝得要死；他揉了揉眼睛。讓我們看看——慢慢的，別忙。菲律賓（Filipinas）！所有字跡清楚的書上都是這么寫的。他和妻子兩個人都不對。

“這是怎么回事？”他自言自語說，“難道歷史還會撒謊嗎？書上不是明明說阿隆索·薩阿維德拉是以皇太子唐菲利普的名字給這個國家命名的嗎？那么怎么會寫得不對呢？會不會這個阿隆索·薩阿維德拉是個土著呢？”

格雷羅的譯文則像這樣子：

真的，這位夫人有一種可愛的脾性，就是千方百計要忘掉他加祿話，至少裝出她不懂的樣子，盡量說得蹩腳，這樣她就顯出她所說的道地“Yorofean”［歐洲女人］的神氣。幸好；要是說他加祿話被她故意糟蹋得不成體統，那么不論就文法或發音來說，她的西班牙話也好不到哪兒去，雖然她的丈夫傾盡全力來教她，還有他的靴子、順手抓到的一把或兩把椅子來幫忙，都不頂用。她在學某些西班牙字上所花費的氣力要比最杰出的埃及學家辨認象形文字所費的氣力還要大，“Philippines”這個字就是其中之一。

據說行完婚禮后的第二天，她跟她的丈夫（那時還只是下士）說話的時候，她吐了個詞兒：裴利芬。下士覺得自己有義務糾正她，給了她一巴掌稍示懲戒，說道：“念‘菲利賓’，娘們！別那么蠢。你難道不曉得，你這該死的國家是隨國王菲利普的名字起的名兒嗎？”他的妻子那時還沉浸在蜜月美夢中，勉力聽他的話，念道：菲利芬。

下士覺得她有長進了，又賞了她幾巴掌，呵斥道：“你不會念‘菲利普’嗎，婆娘？別忘了國王菲利普……五世……反正，你說‘菲利普’，再加上詞尾pines，這個拉丁詞尾的意思是‘黑鬼的島嶼’，這就是你這該死國家的名字！”

慰藉夫人當時還是一個洗衣婦，她用手指輕撫她丈夫那幾巴掌留下的痛處，有點不耐煩地重復念著：“皮利普——皮利普……賓——皮利賓，對嗎？”

“不是‘皮利普’（Peeleep），不是p！”下士咆哮起來，“‘菲利普’（Feeleep），是f！”

“為什么呢？你怎么寫‘皮利普’？是p還是f？”

下士認為這一天的明智之舉是換個話題，趁機查查詞典。結果他簡直驚奇得要死。他擦了擦眼睛。讓我們看看……慢慢的，不要急……但是千真萬確，是菲律賓（Philippines）；他和他的妻子都錯了，既不是p也不是f，而是ph。

怎么回事，他低聲自語道。難道詞典錯了嗎？要不然，這本詞典是不是哪個蠢蛋土著寫的？

這一段里黎剎的笑聲是針對慰藉夫人那位半島人（生于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夫君的粗暴、無知和愚蠢。他甚至將這個殖民地的西班牙名字弄錯了，也弄錯了據說在十六世紀創造了該名字的那人的大名：阿爾瓦羅·德·薩阿維德拉。他以為這一命名是為了紀念菲利普五世（1683—1746），即十八世紀波旁王朝的開創者，黎剎可能確信他的讀者知道這位無能并死于蠢行的西班牙統治者。但是作為一種次要主題，黎剎還不動聲色地羞辱了慰藉夫人裝“歐洲女人”的差勁矯飾：他讓她脫口爆出了他加祿語的疑問助詞ba。這一切笑料在格雷羅譯文里被刪得一個不剩。

另一個次要的靶子是西班牙語，因為“Las Filipinas”并不是可以從“Felipe”合乎邏輯地推演出來的一個詞形，不管下士和他的年輕妻子如何“按邏輯”極力要做到這一點。但是在格雷羅的譯文中，這個靶子變成了菲律賓人區分p音和f音的困難。

然而這其中最發人深省的，還是格雷羅省略了最后一段。這樣就沒有了撒謊的歷史（History）。用心良苦地，阿隆索/阿爾瓦羅·德·薩阿維德拉，這位賦予菲律賓四百五十年后依然在使用的名字的人，還有他以此紀念的那位西班牙君主（皇太子菲利普，后來成了布羅代爾的哈布斯堡反英雄的菲利普二世），就像我們今天說的那樣，“弄失蹤”了。又一個科爾特斯？

# 第三部分 東南亞：比較研究

## 12 東南亞的選舉

### 通論

“國家”層次的選舉在東南亞是晚近的一項新發明，它是用來產生一個立法機關，后者的地位和管轄權與現存的行政機構名義上近乎相當。[[588]](#_588_9)就本文要討論的這三國而言，相應的發生時間分別是：菲律賓1907年，荷屬東印度（今印尼）1918年，暹羅（今泰國）1933年。每個事例中，新發明都是在政治危機后應運而生的，也是對政治危機的敏銳反應：在菲律賓，危機是1896—1898年的反西革命，以及美國對反叛運動的殘酷而代價慘重的“平定”；在荷屬東印度，是一戰后荷蘭自身內部的短暫革命高潮，還有爪哇伊斯蘭聯盟（Sarékat Islam）的驚人壯大；在暹羅，是1932年6月24日政變所導致的絕對主義君主制的垮臺。

這種模式密切仿效了在西歐和美國選舉制度的歷史演變中可以觀察到的那種模式，選舉制度就是從那些地區輸入東南亞的：換言之，國家層次立法機構的發展與選舉權的擴大，是一定程度的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后果，而不是其前因。在美國，我們只需想想婦女選舉權和民權運動，連帶著想想它們在選舉之外苦心孤詣的一應政治活動，當1920年憲法第十九修正案和1965年《民權法案》通過的時候，這些活動登峰造極。在歐洲，我們想起了歷史上那些騷亂，它們曾導致法國三級會議和俄國杜馬的召開，還有十九世紀初期英國天主教徒的政治解放。

這些先例很清楚地表明了選舉制（electoralism）的兩面性。就積極一面說，即便在選舉幾乎不自由或非競爭性的時候，選舉中的投票權也被理解為現時代完整公民權的最突出象征：它讓渡了合法的地位和權利。因此在那些向著民族—國家的自我定義進發的政治實體中，推進成人普選權的力量不可抗拒。（事情的這一面有多重要，可以從預料中人們對這樣一項法令的反應看出來：如果人們十年內未行使投票權的話，就要按法令被剝奪投票權。）選舉制的第二個關鍵的積極面是，它展現了一種前景——尤其是向社會下層階級，即在稍縱即逝的決定性歷史時刻，制定可強制實施于國家疆域內爭斗著的相關各方的法律。立法能夠一舉做到無數的罷工、示威、有計劃的怠工、限產超雇、靜坐抗議、游行、暗殺和祈禱會所做不到的事情，恰是因為后者無可避免地是地方性或區域性的、松散短促的，也沒有法定效力。如果我們考慮到1850—1950年間聯合王國所通過的一系列法律（它們禁止童工，保護女工，保證最低工資，發展社會保障，使工會和某些類型的罷工合法化：西歐多數地區都有與此類似的法律），那么選舉政治的魅力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再者，這樣的法律不僅是合乎時宜的，而且由于它們是從選舉過程中產生的，不是家長式行政機構的恩賜，因此被認為基本上不能取消。

與此同時，對西歐選舉過程的信任也是基于這一普遍假定：法律一經立法機構頒布，將通行全國，合理無偏。這條假定又是從強大而集權的官僚機構的預先存在推原而來，那種機構傳承自絕對主義時代，法國大革命以后在不同程度上適應近代需要，變為文官機構。（美國形成了這一模式的顯著例外，由此給菲律賓造成種種后果，本文將在菲律賓那一節對此加以討論。）

至于硬幣的另一面，我們只需提醒自己，1965年民權法案不單是為了賦予數百萬南方黑人公民權，也終結了——或者說淘汰了——靜坐抗議、自由游行、暴動等等。國會似乎在說：“畢竟，現在你們有投票權了。”但是從多方面來看，正常的投票行為都是一種異常的活動。在法律或政府決議所確定的某個特定日子里，同樣由它們規定的某幾個鐘點之間，到通常是地方當局安排的地點，人們加入往往素昧平生的一群人的行列，依次進入一個單人空間，拉動那里的杠桿或者在紙片上打上記號，然后懷著與進來時同樣的平和慎重走出去——不發一問。這大概是在理想的獨居狀態下可設想的唯一政治行動，它全然是象征性的：因此它幾乎同其他一切形式的個人政治參與截然相反。如果說它還有普遍意義，它只是通過數學合計才獲得這種意義。從這個視角出發，我們會輕易得出結論：在正常情況下，選舉制的邏輯是朝著馴化（domestication）的方向，即距離化、間斷（punctuating）和隔離。要是有誰問這種馴化是為誰的利益而生，他就直接觸及了“代表”的問題。

自然，眾所周知，當選的立法機關的社會—經濟面貌和性別面貌迥異于它們的選民：比如，議員和他們的選民比起來，幾乎總是富有得多，教育程度高得多，是男子的可能性大得多。這種天壤之別的原因盡人皆知，我們無須在此逗留。有待強調的要點毋寧是，選舉制有一種效果，即傾向于把活躍、經常的政治參與限制在專家——職業政客——圈子，他們不但熱中于他們那制度化的寡頭賣主壟斷，而且他們大半是從特殊的社會階層征召的，最常見的是中產階級和上層中產階級。如果有人因此認為，向接受其條件的那些群體開放的選舉體系，反映了資產階級政治支配的特征，正如絕對君主制反映了貴族統治的特征一樣，那么，他也許就處在一個不錯的位置，可以比較性地思考現代東南亞的選舉制。

### 暹羅

在軍人和平民的一個密謀小集團組織的不流血政變中，暹羅的絕對君主制被推翻，緊接著，選舉鳴鑼開張。這些平民大多數是政府官員，而這起密謀的首要仇視對象，是皇室與沾親帶故的貴族世家那些庸碌之輩近乎獨霸了官僚機構——特別是武裝部隊——的高層職位。[[589]](#_589_9)但是政變集團對合法性的正式主張既依賴于民族主義，又依賴于憲政民主的開創。

然而，1930年代暹羅的經濟與社會結構又使得這第二項主張基本無效。這個國家未被直接殖民化的好運道，以及拉瑪五世（1868—1910年在位）奉行的保守政策，兩者合力幫助泰國大量農村人口免受資本主義的直接沖擊；這還意味著，存在于1930年代的那種非官僚的資產階級，與當時尚勢單力薄的工人階級相似，多有華人移民血統。而且那時識字率沒什么長進。只是在1920年代，一部關于義務性初等教育的法律才頒布了；它執行得那么漫不經心，結果到1950年代末，這個國家只有五分之一的府中過半人口完成了小學教育。[[590]](#_590_9)實際上，嚴格的選舉制的社會基礎尚付闕如。于是，選舉權受到限制，早期的議員有很大比例是被任命的。在這樣的形勢下，軍隊——國家的最有力臂膀——一躍而成主導勢力，而下迄1970年代泰國政治中的統治權都屬于幾乎不加掩飾的軍人獨裁政府，這就不出人意料了。

要到沙立元帥獨攬大權（1958—1963）和越南戰爭開戰的時期，這種局面才開始改觀。在世界銀行督促下，泰國政府解散了許多無效率的國有企業，國家史無前例地向外資敞開門戶。曼谷和華盛頓的密切關系意味著資金的巨額注入，這些錢除了擴充與裝備軍隊和警察之外，也用于發展基礎設施和通訊。與此同時，高等教育機構劇增，使得十年之內大學生人數漲了四倍。結果產生了一個非政府的新中產階級，它既包含原有華人資產階級被同化的子女，也包含泰族人；不過工人階級實際上變成了泰人為主而非華人為主。到1970年代初，日本投資正趕超美國，經濟大繁榮起步了，一直持續到1997年，中間只有一些小波折。[[591]](#_591_9)

1960年代后期，當資產階級民主的社會經濟基礎正如此這般地悄然建立起來的時候，政治結構卻開始顯露瓦解之兆。鐵腕的沙立已經在1963年酗酒致死，他的兩位副手，他儂元帥和巴博元帥，不具備他的果敢無情。隨著越戰升級，泰美關系愈見密切，結果到1968年時，約有5萬美軍駐扎在泰國土地上。他們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帶來刺目的賣淫活動、美亞混血兒童的出生、現代化毒品非法交易的蔓延，也喚起了日漸高漲的民族主義反應。美國的軍事存在還激起北京與河內去鼓動迄今一直很溫順的泰國共產黨發動農村游擊運動。對付這些游擊隊，泰國軍隊越來越覺得吃力。送去美國深造的泰國青年深受反越戰運動的影響，該運動激烈批評華盛頓在東亞和東南亞那些唯利是圖的威權主義衛星國。

在1950年代末的全盛時期，沙立發現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廢除現行憲法和立法機構，甚至都不用虛張聲勢要舉行什么選舉。可是在1960年代后期，隨著這位鐵人的死去，他儂—巴博政府只得給自己草擬一套保守的憲法，恢復選舉，以此應對國內外日益增長的壓力。這是時代的信號：雖然獨裁者們匆匆拼湊了一架選舉機器，在地方守軍、警察和內務部的支持下，他們贏得了鄉村地區的絕大多數票，但是他們在曼谷——泰族和泰籍華人新資產階級的首都，也是工人階級主體部分的首都——卻一敗涂地。當軍隊和官僚各派系中間的競爭威脅到獨裁者的議會多數派的團結時，獨裁者的應對之策是，在1971年11月發動了一場反對自個的創造物的表面莊嚴內里滑稽的“自政變”——此時恰值基辛格剛剛秘密造訪北京過后，尼克松正式訪華和毛主席碰頭的前夜。華盛頓這樣子對待所謂的“赤色中國”（泰國軍方領導人在一代人的時間里一直對民眾強調它的危險），而且不向“親密盟友”暹羅打招呼，這叫該政權意氣消磨，而鼓舞了那些痛恨它的人。1973年秋，要憲法要選舉的主張，先是由一小群自由主義大學生和大學講師發起，猝不及防地迅速擴大為驚人的暴動，把50萬人引上了曼谷街頭——如此規模的激進政治參與，在泰國史上甚至找不到相仿佛的先例。[[592]](#_592_9)

對這些導致獨裁政權遽爾垮臺、他儂和巴博恥辱潰敗的示威活動，雖然大多數學生領袖堅持說它們的目標是恢復立憲政府和選舉民主，但沒有理由料想大多數抗議者的首要目標就是如此。訕耶教授的過渡政府從1973年10月中旬延續到1975年2月，在這期間，國家經歷了比此前或此后任何時期都更多、也更多樣的政治參與：新聞審查幾乎消失了，讓資產階級的編輯、記者和讀者們欣喜不已；真正的工會很快組建起來，靠罷工和游行逼迫接受一大堆要求；農會創建起來，力促各種土地改革；中學生們不驅逐他們憎厭的校長誓不罷休；各色人等都堅決主張撤除美國的軍事存在，等等。

選舉終于在1975年初舉行了，這一定是暹羅曾經經歷過的競爭最激烈的選舉，它產生了一個議會，破天荒第一次，有三個溫和左傾的政黨贏得了不可輕忽的少數議席。沒有政府黨從最高司令部和內務部里操縱選舉，也許這個事實同樣重要，如果不是長遠看來更重要的話。因此出現了保守派和中間派政黨的增生，它們中的聯盟構成了在1976年10月6日流血事件之前掌權、由政治家領導的兩屆內閣的基石。時值“大繁榮”在這個國家許多地區造就著一個新的地方企業家階層，這些狀況容許權力在曼谷外出現一種嶄新的水平分散。對企業家階層的人來說，資產階級選舉民主帶來了可觀的收益。一個議會席位就開啟了參與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之外的政府決策的直接通道，從前，在那些機構面前，他們不得不老是像個依附者。誰想獲得一個席位，他/她不必受過良好教育，不必在首都交結權貴，也不必非男性不可：只要他/她地方根基牢固，金銀夠使就行了。（這一時期財大勢大的曼谷銀行向各府的大肆擴張，也打開了許多新的信貸機會。）牌打對了，一個人就能利用這一切，連本帶利贏回內閣職位（這在以前不可想象），再用那個內閣職位擴充他的金融資源，進一步鞏固他的地方權力基礎。[[593]](#_593_9)

1975—1976年間的議會制政府并非一事無成。就美軍人員撤離進行談判，為鄉村發展提供大筆資金（這是對地方議員新勢力的一種反應），都是它的成就。可是它未能履行它最要緊的和解職能。罷工和示威在繼續，漸漸變得更加暴力，因為內閣既不能制定真心實意的勞工法或土改法，又不能鎮壓騷亂。1975年春，印度支那的舊政權意外倒臺，嚇得暹羅的國王、軍人和新資產階級張皇失措。由此引發了1976年右翼的議會外動員，以及遞增的暗殺活動——受雇的職業殺手對學生積極分子、左翼政治家、勞工和農民領袖等的暗殺。

政治的極化在1976年的流血事件中達到頂點，該事件驅使多數合法左派轉入地下活動，或者轉入泰國共產黨的叢林戰，或者流亡海外。然而10月6日后成立的獨裁政權跟1958—1973年的獨裁政權相比，已是面目全非。它是軍隊各派系、皇室與右翼職業政客之間復雜交易的脆弱結果，由一位極端主義的平民法官領銜，而這位法官把軍方得罪太甚，一年內就被軍隊罷黜了。一場軍事政變，竟然被當作是支持克制與和解，當作是支持漸次恢復議會制政府，向公眾呈現出來，這在泰國歷史上還是頭一回。

當此關鍵時刻，暹羅的政府撞上了大運。1978年越南人入侵柬埔寨，緊接著中越開戰，促使北京與曼谷結盟以支援波爾布特。曼谷的要價是中共撤消對泰共的支持（此外，由于支持北京的反河內政策，泰共立即丟掉了它在越控的老撾和柬埔寨境內的安全基地）。泰國左派無可救藥地分裂了，變得士氣低落，奄奄待斃，而江薩將軍的政府又精明地施行全面大赦，嚴格遵守大赦令的條件。于是到1980年，70年代末期的危機氣氛云開霧散了。再沒有令人生畏的左派了，曼谷獲得了華盛頓、北京和東京的鼎力支持。

對緩過勁來的泰國資產階級而言，現在時機已到，該重新開始為政治統治權而戰了，這主要通過持續施壓，尋求恢復定期選舉與議會控制的國家行政機關。1980年代期間，選舉舉行得非常有規律，產生了沒有左翼代表、地方企業家獨領風騷的幾個議會。[[594]](#_594_9)這十年里多數時候是炳·廷素拉暖將軍（General Prem Tinsulanonda）擔任首相，他的內閣總是建立在多個政治黨派的聯盟基礎之上。這個新的選舉體系正逐步確立得何等穩固，可以從以下三種政治新現象得到最好說明：（1）強勢將軍們變得熱心擁護選舉，擔任議員（江薩本人，阿鐵·甘朗逸，差瓦立·永猜裕，以及其他人）；（2）新式政治暗殺出現了，目標不是大學生、工會運動積極分子、農民協會領導人，而是議員和想要成為議員的人。這些謀殺一般是其他議員和想要成為議員的人收買槍手干的——證明1980年代議席前程的市場價值飆升了；（3）1991年5月［原文如此。應為1992年。——譯注］反對素金達將軍政權的大暴亂，是拿著手機的資本家和議會政客們（包括以前的高級軍官）指揮的，不是大學生積極分子或工會活動家。[[595]](#_595_9)他們的目標明擺著：全面恢復以選舉為基礎的議會制政府，他們知道它最符合他們的利益，也自信能夠駕馭它。他們還相當有把握，在當前的國際、國內勢力格局下，選舉最終會實現他們的和解承諾。

然而，自十九世紀末葉以來中央集權的官僚制日漸發展，多少能夠推行全國性的政策；而在此之后，資產階級選舉制才歷史性全面涌現。所以這就有了兩面神的另一面露臉的可能性，亦即：在勞工、社會福利、土地法等領域的意義深遠的立法，有朝一日會從行政上貫徹下去，變成不可逆轉的社會收益。就此而論，選舉民主制呈現出長遠來看的某種真正前景。

### 菲律賓

在菲律賓，全國性選舉是美國征服者于1907年引入的。這一創舉的直接背景是亞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896年反抗西班牙統治的成功的起義運動，它發端于馬尼拉近郊，隨后蔓延到呂宋島大部，捎帶著波及米沙鄢群島部分地區。雖然這場運動主要是小鎮要人和地方紳士領導的，它也引來了民間各階級的廣泛參與，既有成年男子，也有女人和青少年。因此美國人平息革命的干預行動需要無情的軍事戰役，它可能奪去了二十五萬菲律賓人的性命作為代價。但是殖民地政策制定者們自始即意識到，穩定的殖民統治有賴于創造出一個菲律賓政治領導者階層，這個階層有濃厚興趣與征服者通力合作，遣散造反民眾。[[596]](#_596_9)他們很快便決定，第一個必要步驟是建立全國性立法機構，它起碼應代表1898年革命共和國從中吸引了一批擁護者的那些殖民地區域（南端的穆斯林最初就被排除在外）。

自然而然地，所引進的選舉制形式模仿了美國自家的，即便模仿得有些拙劣滑稽。記住這一點不無裨益：在二十世紀頭十年里，美國具有所有工業大國中堪稱最腐敗的選舉制形式。婦女被排斥在選舉之外，數百萬成年的非白種男性也是如此。人頭稅和不公正的選區劃分翕然成風，縣政府大樓各派系和城市政黨組織從中漁利。南部和西部地區的暴力活動，遠比在發達的西歐各國更成其為選舉政治的組成部分。而且，那時候的美國總體缺乏全國性的職業官僚機構，在這方面顯得極其另類——英國、瑞典、德國或法國都已經出現了。

這種背景生發出殖民時代選舉制度的奇怪的惡性特征（它們在一些重要方面讓人想起V.O.基對差不多同一時期美國南方政治的經典研究）。[[597]](#_597_9)首先，菲律賓選舉的語言、財產和教育的限制性條件設置得非常之高，遲至二戰前夕，只有大約14%的殖民地成年人口有權投票。這一機制事實上將合法參與權限制在一個小小的階層中，那些人掌握了英語或西班牙語，并且/或者家產殷實。其次，美國制度是單名選區制，還要求候選人在選區里有依法登記的住所，它與殖民地的種族—語言上的異質性相結合，呈現出一種異乎尋常的寡頭色彩。（西班牙語從未像在拉丁美洲那樣，成為那里的通用語，而英語不過剛剛開始侵入。）所以地方巨頭政客們不僅能夠盤踞在當地的錢權關系和恩庇關系的圍墻后邊，也能夠盤踞在語言的圍墻后面。（我們憶起殖民地大政治家曼努埃爾·奎松的沮喪：僅僅在馬尼拉以北一百英里開外，他就不得不將他的公開演說加以翻譯。[[598]](#_598_9)）這套體系另有一條維持穩定的好處，這讓我們迂回地想起泰國1980年代的選舉制度。它跨越整個群島分散權力，同時確保各省的巨頭們在馬尼拉有差不多平等的代表權。最后一項惡性特征是：寡頭集團這種分權化體制的發展，又加上未能創建一個職業的中央官僚機構。《哈奇法案》（Hatch Act）之前的美國慣例[[599]](#_599_9)遷移到了菲律賓，產生一個迅即菲律賓化的政府機器，它聽命于國會的寡頭們，跟東南亞其他任何殖民地比起來，更腐敗，更不統一。

但是政治機制本身不足以穩固殖民政權。正在興起的這個體系的真正黏結劑，是通向先進工業世界這一最高關稅國家的自由經濟入口。關鍵的農產品是糖，它能夠由奴隸似的、慘遭剝削的勞動人口，以極低廉成本生產出來，卻在美國以遠高于世界市場的價格出售。因此在美國統治時期，家財萬貫的地方糖業大亨迅速崛起。其他地方巨頭也發了一筆，因為華盛頓廉價出售了從西班牙修會沒收的40萬英畝肥沃農地。另外，他們對殖民地立法機關的掌控，使他們得以從飛快搞垮的菲律賓中央銀行這類機構掠奪國庫。所以，殖民地全國立法機構的選舉搞了三十五年，沒能產生哪怕一部代表菲律賓全民利益的重要立法。這一切使得美國的維穩工程格外成功。在東南亞地區，撇開落后的馬來亞不論，菲律賓是1930年代沒有發生嚴重民族主義運動的唯一重要殖民地。

二戰期間以及隨后一段時間里，菲律賓突然陷入了一種新的參與危機。在日本占領下，菲律賓大莊園農業的美國市場崩潰了，選舉機制凍結了，各色武裝游擊隊生成了，其中最強大的一支（在呂宋）由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活動家們聯合指揮。往后，獨立勢在必行，美國國會基于自身的理由，執意允諾菲律賓1946年獨立。在聯合國的新天地里，1946年取得獨立地位的一個國家，不可能阻礙婦女參加選舉，殖民歲月的排斥性選舉權不復可敬或可忍。

這場危機的解決之道有兩個基本特色，在這兩者當中，選舉制度都是中心要素。第一，地方巨頭寡頭集團認識到，要想重塑昔日地位，除了與美國密切合作，別無他法。一方面，這意味著啟用有關戰爭損害賠償的《泰丁斯法》，它取決于所謂“對等”修正案的通過。[[600]](#_600_9)菲律賓憲法這條修正案的通過，需要得到國會四分之三的選票支持，那個國會由于是在獨立后擾攘不寧的狀況下選出來的，首次包含了戰時舉義的左派代表——菲律賓左派擁有數量可觀的國會代表，也僅此一次。于是曼努埃爾·羅哈斯總統捏造了選舉舞弊的罪名，設計褫奪了這些代表的席位，由此開啟了分裂進程，引起了1948—1954年的人民軍起義。緊跟著這一舉措的，是動用國家警察部隊和各種私人軍隊，恢復日據時期多半被主人拋棄的那些大莊園里的秩序。在美國的大力贊助下，人民軍被殘酷鎮壓了，結果是普通百姓的政治無行為能力達一代人之久。[[601]](#_601_9)

第二是選舉制度對這樣一個國家里獨立時各自為政狀態的因應，這個國家沒有協調一貫的官僚機構，也沒有夠格的職業軍隊，[[602]](#_602_9)警察和私募武裝暴徒的控制分散在地方寡頭手中。戰爭造成的大破壞，與城市化發展相伴隨的人口穩步增加，還有選舉權的規范化，都意味著舊式的地方巨頭權力本身不再夠用了。維持這個寡頭控制體系，戰前就靠用錢用槍，而今更要求運用得淋漓盡致，這導致對國家財政的進一步掠奪。另一方面，美國選舉慣例的擴展證明具有意想不到的好處；各級政府里的選舉職位驚人地繁育，以至于到1980年代中期，每1400位選民就要攤到一個選舉職位——這在當代暹羅簡直不可想象。這種發展不是讓什么真正的民主化成為可能，而是使選舉參與有可能被引向以恩庇關系為基礎的本地政治組織的復雜網絡。流傳著一句笑話：菲律賓人人都有關系，不是和占據著這個選舉職位的這個人有關系，就是和占據著那個選舉職位的那個人有關系。

這個又傷財又為患的體系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打算鞏固地方巨頭的統治權，而無論如何不是城市資產階級所積累的新政治權力的表達。這個階級在1950年代開始壯大，但還勢單力薄；1960年代初，它的確努力改革選舉體系，所循的路線像是半個世紀前美國的進步運動。但是這些努力終歸失敗，在這期間，美國移民法的改變鼓勵了越來越多的城市中產階級菲律賓人卷起行囊奔加利福尼亞而去。當1960年代后期新一代活動分子涌現時，他們主要致力于議會外政治，其巔峰是武裝的、非法的、反叛的CPP-NPA（菲律賓共產黨—新人民軍）的成立及后來的飛速擴張。與此同時，地方巨頭民主制的高昂成本（金錢上、暴力上的）引起對國家的更猖狂劫掠，由此導致1972年馬科斯獨裁政權的建立。[[603]](#_603_9)

這里同十年前暹羅的沙立—他儂—巴博獨裁政權形成一種富于啟示的對照。這三個武夫和馬科斯一樣都是強盜，這一點不容置疑。但是他們做賊的程度輕得多，他們所偷的錢還在國境之內。他們的權力是建立在一支國家軍隊（菲律賓從未有過的東西，原因已如上述）和一個集權化官僚機構的年深日久的等級制度基礎之上的。所以，他們絲毫不因成功的泰國華人企業家階層的壯大而感到憂懼（他們正是從這個階層而不是從國家斂聚私財）。另一方面，馬科斯終其一生一直是個地方豪強，是個把他的權力可謂“親手”植根于恩庇關系和軍隊、警察機構的政客，他視軍、警機構如同他的私人衛隊。于是悖論出來了：文官的馬科斯政權比泰國陸軍元帥們的政權野蠻得多，嗜殺得多；正當泰國軍人政權領導著一場大繁榮起飛之際，“商人”馬科斯卻通過他的密友壟斷系統，葬送了菲律賓經濟。

馬科斯的地方巨頭獨裁政權最終在1986年被多種力量的怪異會聚擊倒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首要因素竟是非法的菲共—新人民軍，它完全在任何選舉過程之外活動，可是建立了參與性政治組織的一張全國巨網，向下一直延伸到村莊（barrio）層級。菲共—新人民軍的迅猛發展讓美國心驚膽寒，以致終于轉而反對馬科斯，最后把他硬拖到夏威夷的金色監獄里。[[604]](#_604_9)當然，最直接的因素是選舉制本身。雖然馬科斯是奎松政治上的私生子，可他無力做到沙立那種絕對主義。因此末了，他栽倒在選舉的烈焰中。[[605]](#_605_9)那時候，他已經疏遠了不是他的密友的那些大資本家、天主教會、四分五裂的殘余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階層、許多年輕點兒的軍官、普通民眾的很大部分，以及最要緊的，勢力依然強勁的許多地方巨頭，他們渴望恢復舊式的寡頭權力的水平分散。可笑的是，馬科斯靠著慣常的粗暴手段，其實本來贏了1986年選舉（從技術上說），但恰恰因為這只是選舉上的勝利，結果終結了他的統治。回答他的勝利的，先是一場兵變，緊接著是馬尼拉的大規模民眾暴動，成千上萬本已心灰意懶的市民出人意外地參政了：人民力量運動。

如同曼谷1973年10月14日以后的情況那樣，有一小段時間，菲律賓政治比十九世紀末葉以來任何時候都更為開放，參與性強。但是這個過渡期既沒有帶來政治生活中脫胎換骨的分化，也沒有帶來像1976年10月6日那種成功的右翼軍事政變（不過已經盡力而為了）。軍隊太虛弱，太分裂，太無能。沒有強大的文官機構助其一臂之力。軟弱的菲律賓資產階級由于移民和螺旋下降的經濟，多年來一直都在失血。菲共—新人民軍為內部問題所苦，未能采取什么斷然舉措：再說，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的1986年也不同于四人幫、勃列日涅夫和印支凱旋的1976年。世界共產主義此時處于急速的、無可挽回的衰退之中。因此1986年的最終受益者是地方巨頭們，他們在科拉松·阿基諾及其兄弟佩平·許寰哥的領導下，總體上恢復了前馬科斯時代那種以選舉為基礎、和平共處的國會舊體制。[[606]](#_606_9)最為顯著的莫過于這一差別：1986年后菲律賓選舉制度是復辟性的，同一時期泰國選舉制度卻是改革性的。也難以想象，這個體制將來會演變到如此地步，以致廣泛的選舉參與得以產生建設性的立法，可在全國范圍內真正貫徹下去。

### 印度尼西亞

在保守的荷蘭殖民統治最后二十年里，確乎存在著勉強算數的全國性立法機關——所謂Volksraad，亦即國民議事會（People's Council）。像菲律賓國會一樣，殖民政權建起它來，意欲謹慎地籠絡人心。但是它的選舉基礎還要單薄些；它包含了荷蘭官員和種植園主的大量代表；它的成員有許多都是任命的；而且它根本沒有實權。因此，大眾的民族主義運動和伊斯蘭運動基本上視之如無物，它也從未有效實現哪怕是它為此而生的那點小算盤。日本占領當局建立的那種國民議事會權力更小，成員全是指定的，不過它確實包含了荷蘭統治時代相當數量的民眾運動領導人。[[607]](#_607_9)

太平洋戰爭末年，美國人已經開始打回菲律賓了，于是當1945年8月中旬日本帝國崩潰時，那里不存在權力真空。東印度的情況不是這樣，荷蘭人長時間里不可能靠軍事手段卷土重來，他們自己在1945年深冬才從納粹占領下解放出來。結果是“革命”（那時印度尼西亞每個人都立馬這么叫它）的自然爆發。

但它是一場特殊類型的革命。比如說，它不是由紀律嚴明的單一政黨謀劃和領導的；它的合法武裝力量不過是大量badan perjuangan（準軍事組織）中的一部分，那些組織政治信仰各異，軍事訓練和裝備水平不齊。它的權力高度分散，結果當1945—1946年的社會—革命運動在（比如）亞齊和東蘇門答臘消滅可恨的通敵的統治階級時，一個孱弱的全國領導層卻無力阻止。那么多人在大蕭條時期，特別是日占時期遭受的苦難，摧毀了一度是全能的殖民地官僚機構的威信；在1930年代，該機構90%的官員系“土著民”充任。到1948—1949年間，戰斗實際上成了反抗荷蘭人的游擊戰，這種斗爭經驗使得西印度尼西亞那些爭奪地區上的人民進一步政治化了，也招來了更廣泛的民眾參與。革命年月里不曾舉行全國范圍的選舉，但蘇加諾總統和哈達副總統十分英明細心，任命了所有主要政治集團和準軍事組織的代表們進入革命議會，即所謂Komité Nasional Indonesia Pusat（KNIP，印尼中央國民委員會），這尤其是因為缺乏一個獨大的政黨、一支統一的軍隊、一個有凝聚力和權威性的官僚機構。共和國要想存活下去，需要這種參與。[[608]](#_608_9)

誰要是察看一下這個時期的政治照片——它們攝入了穿著短褲和涼鞋的內閣部長們，他會深受震動：在服飾和住宅上，KNIP成員同他們周圍的普通市民差別多小啊。與菲律賓國會的豪奢兩相對比，乍一看令人震驚，但是如果我們想到，在殖民時期，荷蘭人和印尼華人徹底掌控著經濟生活，不存在一個有實力的土著或梅斯蒂索人農業富豪集團，獨立的本土資本家尚處在嬌弱的幼年時代：那種差異就不足為奇了。職是之故，在革命時期，領導權掌握在年輕的昔日政治活動分子和軍閥手里，他們在社會出身或經濟資源上相去不遠。（從前的政治犯蘇丹·沙里爾［Sutan Sjahrir］三十六歲就做了總理；從前的私立中學教師蘇迪爾曼［Sudirman］三十歲成了最高司令官。）

同荷蘭人達成的最終政治協議（1949）把主權留給了這個遼闊的群島國家，但就它的財政、物質基礎設施和現代經濟部門而言，它是沉疴難愈。它沒有空軍也沒有海軍，而且自1942年以來國家的東西兩部分大體上被切斷了。由于這些實際原因，獨裁的、威權主義的政治體制根本行不通，即便那些勢焰熏天的政客或上校們有這樣的意向。再者，同海牙的協定規定，殖民當局于1946年后在它們軍事控制區建立的各種地方傀儡小議會，其成員應當與KNIP合并，組成更大的獨立議會。這些成員有許多人相信，如果進行自由選舉，他們當選的希望甚為渺茫，所以他們一再拖延必要法規的通過；直到1955年，印尼才舉行了迄今為止唯一一次全國范圍的自由選舉。

同時，面對龐大的、無組織的一大幫武裝隊伍，要解散它們困難重重；而獨立協議的某些直接成果，譬如荷蘭保留西伊里安，荷蘭公司資本免于國有化，等等，又引起各式各樣的失望情緒。民族主義運動和革命的參與傳統與這些因素相結合，造成有些省份的武裝叛亂，和另一些省份好斗的議會外政治活動。

因此選舉是刻意安排來疏導與抑制這些勢力和不滿。事實上可以說，這次選舉最終成了二戰以來東南亞地區所舉行過的最開放、參與性最強的選舉：成人普選，競爭性的新聞界，暴力或非法操縱極其罕見，金錢的角色驚人弱化，等等。有幾十個政黨參選了，盡管最終得分上四大黨傲視群雄；這四大黨即馬斯友美（Masyumi，印尼穆斯林協商委員會），伊斯蘭教師聯合會（Nahdlatul Ulama），印尼民族黨，以及印尼共產黨（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PKI），它們各有數百萬選民支持。[[609]](#_609_9)尤為重要的是印共的成功，它是東南亞地區熱心于參與競選、而體制也容許它這么做的唯一共產黨。（它贏得的民眾選票的百分比，幾乎等于拉莫斯在1992年菲律賓總統選舉中險勝時所得。）

然而這一選舉上的成就將要產生諷刺性的后果。像四大黨的其他各家一樣，共產黨沒過多久就發現，在居住著絕大部分選民的廣袤、落后、文盲蟻聚的鄉村印尼，若要在選舉上干得漂亮，最有效的法子是吸收村莊村首和其他當地要人入黨。一旦這些人歸順了，通常黨就可以指靠他們去爭取他們村民的選票，無需黨親自出馬，原本浩大的、花錢不菲的競選努力，就輕松多了。（畢竟，投票是很簡單的行為，一般只涉及極低的個人成本。）但是，村莊村首往往占有或控制了村里大部分土地，所以要想吸引他們，就需要選舉綱領不危及他們的利益。此外，在這次選舉中，也在1957年接踵而至的爪哇省級選舉中，共產黨的成功，開始讓各層次的選舉職位同黨員們有了私人利害關系。于是無怪乎，唐納德·欣德利老早就講到了印共的“馴化”（domestication），選舉制在這種馴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610]](#_610_9)相同的邏輯促使黨的領導人解散了中爪哇殘余的共產主義游擊隊，將工會和農民組織的領導者納入控制中，這些組織的好戰性威脅到黨的議會成就所依憑的和解。另一方面，共產黨的選舉勝利使它的競爭對手及軍隊領導層大感恐慌。部分出于這種恐懼，1957年戒嚴令頒布，終止了選舉政治；1958年發生了大規模區域叛亂（馬斯友美因卷入叛亂也被取締了），1959年蘇加諾及軍隊領導人建立了“訓導民主制”（Guided Democracy）。[[611]](#_611_9)

雖然蘇加諾出于他自己的盤算，在破壞議會制政權上與軍隊合作，他卻并不樂意成為軍隊的囚徒。由于認識到有必要從政治上抗衡他的將軍們，他成功地保護和鼓勵了（如今的）三大黨繼續筑造它們的政治基礎，以此回報它們對他的個人權威、尤其是對他的外交政策的堅定支持：可選舉是沒有的。缺乏選舉的緊張政黨競爭有一個很大程度上出乎預料的后果，那就是訓導民主制時代超乎尋常的群眾政治化和群眾動員，特別是在1963年5月蘇加諾廢除戒嚴令之后。在三大黨各黨內部，權勢和活力從黨的議員轉向了黨的群眾附屬組織，如工會、青年和婦女團體、農民組織、知識分子社團等——雖然蘇加諾任命的“互助合作”（Gotong-Royong）議會自始至終堅持開會，但這些附屬組織肩負著黨的重擔，要連續不停地爭取蘇加諾的寵幸，爭取能確保那種寵幸的、有組織的民眾支持。

這種群眾動員既伴隨著經濟的崩盤和惡性通貨膨脹的抬頭，也為后者所加劇，特別是在1963年后。經濟狀況的惡化主要起因于1957年對各荷蘭公司的倉促國有化，還有后來它們的被軍方接管和管理不善，更別提資本主義大國對蘇加諾的積極外交政策及所謂的縱容共產黨人所抱的敵意。于是政治歇斯底里癥潛滋暗長起來，在1965年10月1日的所謂政變之后，為軍隊主導的針對左派的大屠殺鋪好了路。這場清洗中，有五十萬人被殺，身陷囹圄者無數，他們在慘無人道的狀態下被囚禁經年。

此處不必花費時間，一一論及1971年以來蘇哈托的“新秩序”軍政府定期舉行的系列選舉。它們受到小心翼翼的操縱，以便為“專業集團黨”（Golkar，政府的選舉機器）帶來對外似乎可信的三分之二多數票，產生一個不具備任何真正代議性的唯命是從的議會。為了證明該政權的高度威權主義和集權化特征的合法性，它所使用的比較有效的宣傳策略之一就是，從前的政治體制助長了激烈的社會沖突，促成了不穩定的、破裂的政府。然而請注意，這里對1950年代的選舉政權與1960年代前期非選舉的訓導民主制之間差異的看法，忽略了一些具體內容；看到這點很重要。沒有多少證據表明，選舉政權本身造成了嚴重的社會沖突；證據確鑿的倒是，無選舉的訓導民主制才引來這等后果。自由民主制也沒有被共產黨人，甚至沒有被作為一個整體來看的諸黨派搞垮；相較而言，這時期各內閣本身還要穩定一些，后來它們被軍方和軍隊各派系以及（在較小程度上）被蘇加諾弄得更是飄搖不定——他位居軍方和內閣中間，掌控著訓導民主制政權。[[612]](#_612_9)

另一方面，訓導民主制的奇異經驗也讓我們得以出乎預料地思索選舉制諸面相。它所促成的激烈的競爭性政治動員，正是不行選舉的結果。不存在可以暫時、間斷地裁定孰勝孰敗的機制，因而對權勢的爭奪最終只能靠暴烈的強制性手段來決定。由這個角度看，選舉制的安撫層面似乎更有亮色——因為我們隨即就可提出這樣的問題：假如1964年舉行自由選舉，它是否可能防止1965—1966年的血洗？

主要靠了石油、大規模外國援助和投資，新秩序政權經濟上大獲成功，由此，印尼的社會結構在過去二十五年里變遷頗巨。有史以來第一次，一個有實力的印尼人資產階級被創造出來，跟殖民時代延續下來的印尼華人資產階級并肩而立——縱使它政治上還嫌軟弱，而且過分集中在首都和其他少數幾個大城市。我們應該由此認為蘇哈托就是印尼的沙立嗎？應該由此預計終究會有一場中產階級斗爭，去爭取一個非軍事化的、真正選舉的政府嗎，既然左派的任何政治威脅早已用暴力消除殆盡？這種前景絕不是天方夜譚，但是我們理應注意到其間顯著的不可比性。沙立統治著一個小國家，它在族群和宗教上總體說來是純一的，它不曾遭受殖民資本主義的劫掠、日本的軍事占領、慘酷的革命獨立斗爭，或滅絕人性的屠殺。雖然他和他的嫡系主宰著這個國家，軍隊本身卻并沒有構成一個統治階層，這尤其是因為他們有一個中央集權的、相當職業的文官科層機構可資利用，這個機構上承專制主義，它的權威從來沒有像印尼的官僚機構那樣，遭到通敵、通脹和革命的致命敗壞。君主制的延存意味著即便是在沙立的獨裁統治下，也沒有蘇加諾或蘇哈托式的獨占的終身領導權的可能性。華人移民同化進入泰國社會的程度很高，這里還缺少典型的殖民地的種族化經濟等級：這些也意味著當泰國資產階級開始志得意滿的時候，它不會如印尼的情形一般，在結構上沿著種族/宗教分界線分裂開去。

蘇哈托統治著高度集權的國家機器，它很大程度上是他本人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間的創造物。但是軍方對它的滲透，較之沙立的官僚機構所曾遭遇的，要深重得多。它很不自信，全無自主傳統。它不像泰國的文官部門那樣，根本上是以法律為基石的。（暹羅的法官享有威望，而他們的印尼同儕感受到的是普遍的蔑視：比較一下這兩者不無用處。）在這個意義上，后蘇哈托時代的印尼國家機器實在是前途莫測。比起泰國行政機構來，它演化成使西歐選舉制的前景富于吸引力的那種結構，可能性似乎低多了。

### 結論

未經殖民化的暹羅，就在美屬菲律賓與荷屬東印度著手選舉之后，開始了它的選舉歷程，如今擁有最近似西式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政體，這一點起碼從表面上看夠諷刺的。不過僅僅是表面而已。兩面神的陽面給了人們這樣的期望：選舉將會具有讓很大部分選民滿意的貨真價實的政策成果。這意味著必得有一個連貫協調的文官行政機構，它能夠施行因選舉而致的各種政策：即是說，要有一個強大的政府。有充分的歷史根據認為，在普及大眾選舉制度之后，建立這樣的政府難乎其難。所以暹羅大概很幸運，在一位泰國國王創建近代式官僚機構過去半個世紀以后，才啟動了它的選舉制度。殖民地政府雖然貌似專制主義，其實通常都很虛弱，一則因為遠方宗主國的外來支配，再則因為它們國內僵化的種族等級體系。由于已經講過的諸般緣由，菲律賓在現代時期有個異常軟弱的政府，盡管選舉制度早在二十世紀伊始就建立起來了。在印尼，晚期殖民機構龐大的土著部分始終易于遭到叛國的指控，到革命初期即近于消失了。也是從那個意義上說，選舉制度先于一個真正強大的全國性文官行政機器的創建，為此付出的部分代價，就是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里，任何名副其實的民意代表被有效取消了。在選舉沒有給廣大社會集團帶來什么看得見的積極政策后果的狀況下，以下發現應該不會令人驚訝：只有處于罕遇的有利歷史環境中，當選舉票數可以理解為對統治者的根本否認時，選舉才有意義。現代東南亞的最顯著例證，不出于本文分析的這三國，而出于緬甸：1960年和1990年選舉的一邊倒的拒絕主義選舉結果。

兩面神的陰面是安撫作用，以及解除民眾參與方面多種實踐的合法性的傾向。為什么在我們這個時代，許多獨裁政權，像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印尼的新秩序等，都認為定期開展選舉是有用的呢？這就是原因之一。由此我們也容易理解激進左派的矛盾情緒：一般性地對選舉制度態度矛盾，個別性地對意大利和印度主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地方性選舉成就態度矛盾。因為這些成就的取得是要付出代價的：黨的領導層被同化到政治階層中去了，在激進事業中永遠位于中心位置的那種民眾參與卻被邊緣化了。

## 13 共產主義之后的激進主義

有人或許以為，“共產主義之后”（after communism）是一種不復雜的觀念、經驗，或社會—政治狀況，但在我想要討論的兩個東南亞國家，即殖民化的、穆斯林的印尼與未殖民的、佛教徒的泰國里，“共產主義之后”意義迥乎有別，這進而影響了當代激進主義的想象。所以為了布好背景，我們有必要介紹一下這兩國各自的共產主義發展軌跡。

說起來，荷屬東印度是蘇聯之外有共產黨的第一個亞洲“國家”。印尼共產黨（PKI）創建于1920年5月23日。在一戰后最初歲月的相對自由的氛圍下，它發展得很迅猛，尤其是在種植園勞工、碼頭工人和鐵道員工中間。當時殖民地沒有大學，又只有極少的原住民前往荷蘭接受高等教育，是以它的領導人混雜了印尼的自學成才者和初中畢業生；此外還有零星的荷蘭激進分子，不過殖民政府很快就將他們下獄或逐出。雖然黨的年輕領導者常常跟一些穆斯林政治要人爭辯不休，黨還是輕而易舉地在穆斯林群眾當中培植了一群追隨者；當共產黨發出在1926—1927年舉義的千年至福號召時，正是在殖民地最大的兩個穆斯林省份里，得到了大無畏的、盡管是災難性的響應。荷蘭人不費多大力氣就粉碎了起義，處死了一些領導人，流放或監禁了其他許多人。殖民時期的剩余時間里，黨沒有像樣地存在過。直到印尼人銘記稱頌的他們的“1945年革命”爆發以后，印尼共產黨才開始重建，當時正處在日占政權瓦解、荷蘭人遲遲未返的間隙，一個幼弱的印尼共和國呱呱墜地。隨后發生的斗爭艱苦卓絕，一直持續到1949年末，那時海牙終于承認移交主權，在這期間，獲釋的、重返的和新生的共產黨人發揮了重要的，但斷非主導性的政治作用。

然而代際差異早已昭然。老一輩許多人精通荷蘭語，有些甚至為荷蘭本土的反納粹地下組織效過命；他們曾在國外游歷，或者被驅逐到那里，自覺地自視為世界革命運動的一部分；不少人有歐洲朋友，有時還有歐洲老婆或情人；他們同進步的當地華人親密協作；他們歷練成了“活動家”（地上的和地下的）、工會運動積極分子、宣傳家、罷工組織者，偶爾還是“恐怖分子”。他們毫無合法的議會政治的經驗。第二代人是在殘暴的日本占領期間成年的；他們往往只懂丁點荷蘭語，從未出過洋，沒有外國朋友；他們不喜歡華人（所以當他們1951年控制共產黨的時候，就拒絕華人公開入黨）；他們是熱烈的民族主義者，而且首要的是屬于黨的男人和女人，因為他們是在草創的共和國旗下涉足政治的，那個共和國想靠這樣的政體傾力治國安邦：有議會機構，有政治黨派，還有它們的各種附屬組織。

革命差不多走到中途的時候，冷戰鋪天蓋地地漲潮了，日益使得共和國的國內政治兩極化。結果在1948年秋天，爪哇發生了一場雖短卻極其血腥的內戰，穆斯林掌舵的政府污蔑左派是賣國的莫斯科奸細，無情地鎮壓了他們。許多老一輩領導人被處決或謀殺，若非荷蘭人在12月發起最后的大規模軍事努力要撲滅共和國，可能會有更多的人喪命。大量的第二代共產主義者逃脫了監禁，加入了短期的游擊隊斗爭，即使只是以不重要的身份。1949年的最后幾天，戰斗結束，一個統攝印尼全境的自由民主共和國成立了，此時這代人出頭接管了黨，重建黨的黨員身份和聲譽。

他們這種努力成效斐然，原因十分復雜，這里一言難盡。這么說就夠了：早在1955年普選（印尼迄今為止舉行過的唯一一次自由選舉）中，共產黨就已嶄露崢嶸，成為四大黨之一，背后有數百萬選民，在統治中心有一個代表它的很大的議席份額。黨的選舉成功的關鍵條件之一是，它臨深履薄地慎對國內問題，對外采取強硬的民族主義立場，這使它得以與其他政治黨派結成有效的聯盟，開始讓人們忘卻1948年的“叛國”。雖然實際上黨的選舉成就使它致力于和平、合法的議會政治，有幾分像陶里亞蒂的意大利共產黨（PCI）的作為，但是它不肯下決心公然這么說；這樣，當1959年左傾的蘇加諾總統與大體屬右翼的軍方領袖合作，以“訓導民主制”取代憲政民主制時，黨的領導者們覺得別無選擇，只有跟進。訓導民主制是一種威權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體制，在該體制下選舉將不再舉行。

訓導民主制從1959年持續到1965年，在它的治下，共產黨的群眾附屬組織——青年、婦女、農民、種植園工人等群體的組織——繼續飛快地壯大，因為它們比擅長議會活動的共產黨本身更好地適應了無選舉的競爭政治的狀況。到1965年，印共領導人宣稱它是擁有兩千萬黨員的“大家庭”，榮幸地成了全世界這類共產主義家庭中，除社會主義集團之外最大的一個——其實說不準。但是，類似的穆斯林大家庭及所謂世俗—民族主義（資產階級）大家庭的發展，與這一成就不相上下，導致日漸加劇的分裂對立，特別是當惡性通脹來襲、經濟螺旋下降的時候。黨死抱住它的合法性不放，而且不管怎樣它手里沒槍。

在國有化經濟那些比較先進的部門，黨幾乎插不進手，因為它們被恨之入骨的軍方控制著。黨的領導人試圖彌補這個弱點，叫囂著支持蘇加諾反西方的對外政策，支持發動文化斗爭去反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這么做是是永遠不被寬宥的。

1965年10月1日，毀滅開始了，其時有一小群軍官，名義上由總統府警衛營一個無名中校率領，暗殺了六名高級將領，占領了首都部分地區達數小時。這起“政變”——假如它算的話——旋即被陸軍戰略后備隊司令官蘇哈托將軍鏟平，他繼續操縱午夜謀殺案所喚起的恐懼感，掀起了根除共產黨的運動，譴責共產黨策劃了政變圖謀。從1965年10月中旬到1966年1月下旬，印尼共產黨真的被消滅了。至少有50萬人，也許多達百萬人，不是被軍隊本身殺死，就是被軍隊武裝和保護的穆斯林與世俗—民族主義的警備隊殺死。另有不計其數的人被認為跟共產黨有瓜葛，遭到監禁和刑訊。差不多黨的整個領導層都受了極刑，通常連裝裝樣子的正式法律手續都沒經過。

1966年3月，當蘇哈托事實上攆下了蘇加諾，自己做了國家首腦時，共產黨被宣布為非法，就連散發著馬克思主義氣味的任何東西，也一并查禁。共產黨從此一蹶不振，不只因為獨裁政權情報機構的冷酷效率，還因為黨的領導人在他們的追隨者眼里已經信譽掃地了。這些領導人怎么竟能聽任慘劇發生，將面對強敵毫無還手之力的兩千萬支持者棄置不顧？更糟的是，大量的激進分子，希求自己活命，在蘇哈托的古拉格里，變成了他們自己人的告密者，有時甚至是刑訊者和行刑人。

請注意這個時機：1966年，正值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林登·約翰遜的美國日益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莫斯科的勃列日涅夫新領導層處處顯出舍我其誰、氣勢逼人的跡象。也許這是世界共產主義成就的頂點。

### 一段對照性的歷史

泰國的共產主義發展史要簡短些，也有很大差別。比起荷屬東印度來，未經殖民化的泰國遭遇資本主義的攻擊要緩慢得多，而且它這種資本主義不受特大的種植園農業綜合企業左右。當政時間很長、才智過人的拉瑪五世（朱拉隆功，1868—1910年在位）的政策，就是盡量不驚擾本土的泰國社會，以方便為前提；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撞擊，因而主要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遷來的年輕男移民帶入的。不打算回中國老家的那些人，多數娶了泰國女人，大約在拉瑪五世統治末年，產生了人數可觀的泰語稱之為lūk jin（意即泰國華裔）的第一代人。泰國華裔中有少數人，在社會—經濟地位上向上攀升，成為這個國家萌芽中的資產階級，他們大量聚集在皇都曼谷，以及沿鐵道線興起的較小城鎮里，國王是出于戰略—政治目的開始筑建這些鐵路的。其余的泰國華裔，構成了這個國家真正的工人階級，直到二戰以后還是如此。

正是在這些移民及其子女中間，以及在逃離印度支那法國殖民主義的那些越南人中間，泰國的共產主義萌生了，那是在推翻絕對君主制的1932年不流血政變之后很久，而恰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于是，泰國共產黨（CPT）在1941年才成立，比荷屬東印度晚了一代人；它的社會基礎是那些很大程度上仍屬外來戶的少數族群，不是“本地人”；它具有城市特征，不是半城/半鄉的；它朝北面向中國，不是朝西面向歐洲和蘇聯。在二戰后短暫的自由主義文官統治時期，它的影響開始擴散到規模不大的泰國知識分子階層，在1947年泰國軍方大權獨攬之前，它甚至設法選出了一棵獨苗議員進入議會。美國有意將泰國當作它對抗亞洲共產主義的堡壘，在它的強烈敦促下，泰共被宣布為非法，此后一直如此。與同時代的印尼共產黨相比，反差之大可能是最醒目的了。然而，泰共實在太弱，軍方主控的泰國當局地位穩固，所以被捕的共產黨人通常在監獄里受到善待，拷打和處死的事難得一見。

這種形勢在1960年代很快改變了，因為越南戰爭加劇，美國在泰國的軍事存在大肆擴充。亞洲的共產主義國家，特別是中國和越南，認為沒有理由不支持泰共；在說服地下的共產黨轉向泰國農村邊陲并開展游擊斗爭上，它們的影響起了決定作用。那是在1966年，正當印共在印尼橫遭摧毀之時。隨著越南戰事的遷延，泰共穩步擴張了它的基地，雖然嚴重依賴北京與河內提供資金、武器、訓練和意識形態指導。黨的領導層壓倒多數是泰國華裔，甚或就是“中國人”，這一點使這種聯系尤其牢固。另一方面，美國的軍事存在（1968年有48000名美國軍事人員駐扎泰國，更無論美國在基礎設施、在泰國軍隊和警察上的巨大開銷）激起了泰國社會的大變遷，速度遠快于它過去所曾經歷過的。經濟大繁榮起錨了，它立刻充實了中產階級，不過泰國華裔仍然在其中占主導地位。連帶著，公共教育（特別是大學層次的）驚人擴張，不到十年約莫擴大了500%。

1973年10月，反對獨裁統治的以大學為根據地的小規模抗議活動，突然間一下子膨脹成了首都的大規模民眾示威；由于軍方自身的內部分歧，以及年輕君主拉瑪九世的干預，獨裁政府轟然垮臺。在1973年10月和1976年10月間，泰國擁有它曾經歷過的最開放、民主的政治體制，此前和此后都未嘗見。被壓抑的不滿——對不公平的土地法、對腐敗、對罷工禁令、對美國宰制的不滿——猛然公開化，急速的政治極化開始了，推動著特別是大學生活動分子倒向左派，其他許多人，擔心走上越南戰爭那條路，則倒向了右派。正是趁此時機，泰共將它的地下勢力迅疾地重新伸展到城市地區和知識分子階層；已經有一代人的時間，那都是做不到的。1975年，一股暗殺學生、工人和農民各組織領導人的浪潮，為1976年10月6日事變鋪平了道路，那時軍人獨裁政權再次如狼似虎地強加于民。對曼谷鬧市區傳統上主張進步的法政大學，鎮壓尤為狠毒，學生們被公開射殺、吊死、活活打死。直接后果是自由主義和左傾的年輕人大量逃亡至游擊隊區域，在那里，泰共起初歡迎他們，保護他們。

隨著1975年印度支那的陷落/解放、老撾君主制的廢除（這讓保守的泰國王室驚恐萬狀），以及泰共潛在領導干部的劇增，中央情報局曼谷站的頭目在1977年初陰郁地預測說，泰國將會是淪入共產主義之手的下一張多米諾骨牌。他犯的錯誤不可能比這更離譜了。與他的預言相反，三年之內，泰共幾乎輸得兩手空空，再不能在泰國政治中發揮絲毫重要作用；十五年前，這種命運就已降臨印共頭上了。何以至此呢？

關鍵因素是1978年底開仗的中、越、柬三角戰的爆發。泰共正上年紀的泰籍華裔領導層決定與鄧小平共命運，于是，在老撾勢力很大、如今又成了柬埔寨主人的越南人，終止了一切合作，封鎖了邊境的全部庇護所。然后，北京的馬基雅維利動身去曼谷，與泰國軍方領導人結成反越聯盟，交換條件是北京斷絕對泰共的幾乎所有援助，包括云南的大功率、很頂事的泰國人民之聲廣播電臺。這些事情證明是對黨的致命打擊。它的隊伍里內部分歧發作了，年輕的、受過大學教育的1976年流亡者們，通常加入了反對年長者的行列。與此同時，有智謀的軍隊新領導層決定徹底大赦游擊區投降的所有人，而且他們恪守了承諾。到1979年末，人員大流損開始了，這與黨的國際孤立狀態一道，敗壞了它的威望和政治發展前途。1980年，我們還要說什么嗎？此時恰逢羅納德·里根在成功地競選總統，他的競選部分基于這一綱領：對抗以莫斯科為核心的從未如此強大的“邪惡帝國”。

這其中有兩點需要強調。第一，無論印尼還是泰國，“共產主義之后”的開端，是在斯大林帝國土崩瓦解之前很久，甚至是在有什么人能夠想象這一崩解的發生之前很久。第二，這兩國共產主義的后遺影響全然不同。

印尼1965年10月1日前支持左派的那些人，很少受過大學教育，他們在理論上所知道的馬克思主義，是以較為簡單的斯大林主義和早期毛主義面貌出現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們壓倒多數是本土的印尼人，不是印尼華人少數族群的成員。他們的政治經驗在于議會的和準議會的合法政治。他們是民族主義者，決心讓人忘掉1948年他們的敵人對其“賣國”的指控。如果他們好歹活下來了，他們的“共產主義之后”的生活意味著折磨，在常常殘暴不仁的狀況下受到未經審判的漫長監禁，妻離子散，還有持續不斷的社會擯斥，密不透風的軍事監視，和一旦獲釋后的無業可就。

在泰國，共產主義最能干的新成員，特別是1975—1976年以后，有相當數量是泰國一流大學的學生。雖然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有些來源于文化大革命的中國和越南，但作為1960年代的孩子，他們也接觸了北歐和美國的新左派馬克思主義，以及葛蘭西、阿爾都塞和法蘭克福學派。他們往往喜愛瓊·貝茲和鮑勃·迪倫，但是對隨便哪位合法的印共干部來說，這兩人在國際舞臺上出道太晚了，不會讓人想到去欣賞他們。這些1960年代的孩子們有相當數量是第二、三代的泰國華裔，是被同化了的中產階級的產物，那個階級自1950年代晚期以來有長足發展。正如移民的子孫常常發生的情況那樣，他們決意展現自己愛國心切的泰國身份（Thai-ness——這是他們厭惡泰共領導層順從北京的一大理由），但是有點刻意而不自然。他們只有極短暫、極淺表的議會政治經驗，是由議會外行動主義與游擊區生活塑造成人的。但是他們的“共產主義之后”的生活，多數情形下是漸趨正常的（盡管有顯著數量的人吸毒或自殺）。一旦泰共被摧毀，他們或是回到家里，幫著打理家族生意；或是重返大學；或是出國留學，主要在歐洲、美國和澳大利亞；要不就決定參與議會政治，它是1980年代開始在泰國真正生根的。他們沒怎么受到刁難，個中緣由特別在于，他們是過去教育優異、如今功成名就的那個資產階級的孩子們。

### 泥沼里的足跡

如果我們要審視這兩國的“共產主義之后的激進主義”，前述這些差異必須牢記在心。然而，有點奇特地，存在著有幾分隱秘的連線，把二者連接起來，這些連線就是民族主義、歷史和出版物。

先說印尼。今日印尼婦孺皆知的、也許是地位最高的激進分子，是才華橫溢的自學成才作家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即人們通稱的“普南”），他的小說被譯成了數十種語言，當奧斯陸[[613]](#_613_9)的輪盤轉到這個地區時，他還是東南亞機會最大的諾貝爾獎候選人。普南的政治履歷與眾不同。他生于1926年，1948—1949年作為民族主義革命者首次被荷蘭人監禁，后來在1959—1960年因為公開為華人少數族群聲辯，又坐了蘇加諾的牢，最后在1966—1978年成了蘇哈托獨裁政府的階下囚，因為他從1950年代末直到1965年是左翼知識階層的意見領袖。而今，印尼大屠殺過去了差不多三十年之后，他的著作仍然全部被禁，私下傳閱這些書的大學生們，招致了長期徒刑的判決。他的作品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他的四部曲，那是他在1970年代中期，在遙遠的布魯島囚犯隔離區開始創作的，他的創作辦法是向他的獄友們口頭敘述。這四部曲不嚴謹地用一位迄今為止鮮為人知的民族主義先驅的生活作基礎，他名叫迪爾托·阿迪·蘇里約（Tirtoadisuryo），是出身于爪哇貴族之家的一位青年人，在二十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創辦了第一份民族主義報紙，幫助推進了反對荷蘭殖民統治的第一次激進運動，在坐牢和默默無聞中結束了生命。

這些小說的題目就揭示了它們的特性的某些東西：《人世間》，《萬國之子》，《泥沼里的足跡》，《玻璃屋》。[[614]](#_614_9)前兩部宣告了印尼文學中前無古人的某種觀念（1965年前的印共也一定會對之皺眉蹙額的）：印度尼西亞這個“人世間”是所有熱愛印尼的人的，不僅僅屬于它的持有護照的公民；印尼民族主義的這位英勇創始人是各國那些解民于倒懸的民族主義者們的繼嗣。第三部書名喚起了這樣一些人的形象，他們參加了1910年代、1940年代、1960年代和1990年代的斗爭，留在身后的卻是一無所有，只除了“泥沼里的足跡”；第四個標題模仿福柯的邊沁式全景監獄，在荷蘭殖民政權想讓殖民地凡事皆歸監控之下的雄心中，諷喻了印尼這個當代警察國家。

小說向我們展示的這位年輕的激進主人公，不僅忙于從他遇到的法國人、荷蘭人、日本人以及住在爪哇的其他外國人那里了解世界，從世紀之交正將整個地球紹介到殖民地諸城的新報紙上了解世界，他還注定相繼要娶幾位外緣女子中最外緣的為妻：一個令人憐憫的歐亞混血美女，一個逃避垂死的清王朝野蠻統治的華人移民，還有一個兇悍的穆斯林，來自這個散亂鋪開的群島殖民地的東部極遠邊陲（從爪哇看來）。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所有四部小說中占有首要地位的人物，不是年輕的主人公，而是他的第一個岳母，在她初次行經之后，她就被微賤奴媚的爪哇父母賤賣給一個酗酒、貪淫的荷蘭種植園主，但是她完全掌握了她此后的命運，克服重重困難與殖民地秘密警察本身較量。（普南用了一記出人意料的妙著，讓第四部小說的敘述者是高級土著特工，被荷蘭人派去監視和糾纏主人公，直到后者死去為止。）

雖然這些小說把時間設定在1896—1916年間，即“共產主義之前”，它們根本上卻以“共產主義之后”的印尼為指向。老式馬克思主義的痕跡，在許多情節里都昭然可見，這些情節如種植園主、領主代理人、殖民官員、土著貴族及秘密警察的壓迫，農民、小商人、記者、婦女和少數族群的反抗等。但是我們（激進的印尼人）與他們（白人殖民者與其合作者華人賤民—企業家）對立的軸線消逝了，這條軸線自1940年代以降，無論對左派抑或右派，多少已成常軌。更險惡的人物一般是將來所稱的“印尼人”，而男女主人公不但是民族身份混雜的一群人，而且他們的文化和政治信仰紛繁各異。或許我們不該對這一切大驚小怪。在1970年代末，那時這批手稿寫完了，普南充分意識到，為了使他歷經十二年可怕監禁之后得以安全釋放，明尼阿波利斯的眾議員唐納德·弗雷澤以及大赦國際功不可沒；他也意識到適成對照地，“現存的”共產主義政權對他的狀況無動于衷。監獄昭示了共產黨人證書與道德勇氣之間的鴻溝有多寬。與此同時，他在奮筆疾書，言外之意直指野蠻的獨裁政府，這個政府在它的公民中間主張自身的合法性，理由是“西方民主制”和“一切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完全不適合印尼民族，據說該民族的源頭只在于也全在于一個古樸純凈、有千年之久、200%純土著的往昔。

還有一種印尼激進主義，它可以描述得稍簡略些。卡塔維查亞（Pipit Rochijat Kartawidjaja）現在四十歲出頭，比普南小了不止一代。他在柏林過著岌岌可危的日子，因為他的護照很久以前就被剝奪了，借口是他那煽動性的、傲慢無禮的著作，但是他拒不放棄公民權和尋求政治避難。他的幸存下來，部分是由于他同德國綠黨和社會民主黨里邊的活動家建立了密切的私人關系。1965年那時候，他的父親是一家國有糖料作物種植園經理，是個虔信的穆斯林，飽受種植園工人的共產主義工會的抨擊。他還是個上初中的小孩，自然被家庭忠誠拉進當地一個反共青年團的行列，一當時機來臨，這個青年團就加入到matanza（屠宰）之中。有些屠夫就是卡塔維查亞的同學友朋。對他所目睹的場景的種種回憶縈繞腦際，揮之不去，可是他無法條理連貫地思考它們或見諸行事，直到他去德國學習電氣工程。在那里他娶了一位二流的印共知識分子的女兒為妻，大屠殺時這位知識分子碰巧離開了印尼。但是他跟他岳丈的關系冷若冰霜。自1980年代初以來，他因為三件事成了印尼自詡的激進分子中的聞人。其一，冷嘲熱諷的文章汩汩涌出，筆鋒直搗雅加達獨裁政府，就這些文章而言，最顯著的特色是它們超現實地混雜了政府官話、街頭俚語、反語的馬克思主義詞匯、猥褻描寫，以及純詩的筆致。目的不外是讓這個政權及其專制的發展語言去神秘化。其二，是對印度—爪哇古代傳說的一系列再加工或新想象，那些傳說支撐起了爪哇的小傳統和大傳統。在這里，克利須那神和阿周那可以作為公共信息官、異裝癖的妓女、大學教授或宗教騙子，平等地談話。他的規則就是“什么話都可以說”。其三，是對他中學時遭遇大屠殺的記述——站在屠殺者一邊的記述，獨一無二，理當馳名。他堅定地認為，大屠殺決不應忘記，它們也不應成為哪一天更多的大屠殺的基點。對于把他和他的伙伴們引向屠宰場的那種不長腦子的認同，他耿耿于懷。這意味著推倒了“我們”和“他們”之間讓人寬慰的任何隔墻。

我只能引用這篇題為《我是印共分子還是非印共分子？》[[615]](#_615_9)的奇文的兩小段話，試著表現它的風味。第一，對順著布蘭塔斯河流經他家鄉的那些可能是共產黨人的尸體，他寫道：“通常這些尸體不復有人樣。腦袋沒了。肚皮劃開了。臭得難以想象。為了確保他們不沉河，這些皮囊被精心地綁在或釘在竹樁上。他們從諫義里出發，沿著布蘭塔斯河流下。當尸首堆積在木筏上，印共黨旗在上方獵獵招展的時候，這種起航達到了它的黃金時期。”第二，關于當地妓院的失業，他回憶說：“一旦對共黨分子的清洗發動起來，嫖客們就不來尋歡了。原因只有一條：妓院門前懸掛著許多男共產黨人的那話兒，像掛出來待售的一根根香蕉，大多數嫖客——和妓女——都嚇得要死。”無論是對逃過一劫的老共產黨人，還是對實施這恐怖的政府和政治集團，這都是一種令人十分惡心的語言，因為它讓這個問題無法回答：我是劊子手還是非劊子手？但卡塔維查亞不是在對他們講話，而是在對一個年輕的印度尼西亞講話，如果它開始進行根本的思考（它有朝一日必定會那么做），它也將直面在“共產主義之后”這個世界紀元而非印尼時間里，“共產主義”和“非共產主義”的意義問題。

### 一種新主體性

在當代泰國，它不是一個驅鬼的問題，也許反倒是個召鬼的問題。泰共的覆滅一定程度上伴隨著輕聲嗚咽，而不是駭人的巨響。雖然它的傾覆早于蘇聯的解體，但是時間相隔如此之近，嚴肅反思二者之一的人，很快就不得不反思另一個。頭腦激進的泰國思想者們，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自由地、常常愜意地生活在一個欣欣向榮、富得俗氣、腐化透頂的資產階級半民主制下，不像他們的印尼同志，生活在心狠手辣的軍政權淫威下。他們許多人最后擁有了可敬的職位，待在大學、媒體中和泰國議會里。對他們來說，問題典型地是這樣一些：泰共的灰飛煙滅，是像它的保守主義敵人始終宣稱的那樣，因為它從來沒有真正成為泰人的嗎？他們自己忠誠于它，是天真年幼的幻覺的產物嗎？他們徹頭徹尾誤解了本國的文化與歷史嗎？難道除了早早考慮福山的名言，尾隨在亞當·斯密和托馬斯·杰斐遜的沒完沒了的行列后面以外，就再沒別的事可做了嗎？

我們不應感到驚訝，最重要的激進思想者是學院派學者，而不是流亡的或被禁的非正統歷史的想象者；他們殫精竭慮思索他們何以政治受挫，他們得勝的對手的力量何在。不過，這種思想幾乎總是聚焦于歷史，雖則方式大異其趣。且讓我們僅僅簡單討論三篇重要文本，它們是197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活動分子在最近十年里所作，其中兩人是泰國華裔。

第一篇是社山·巴色軍（Seksan Prasertkul）的論文。他是1973年10月那些令人熱血沸騰的時光的杰出學生活動分子，1973—1975年間進一步激進化，在越南和老撾短期受訓，1976年后奮勇參加武裝游擊斗爭。像他許多同代人一樣，社山到1980年代中期得出結論說，泰共領導層不但被一種“華族性”（Chineseness）嚴重致殘，這種特性導致他們荒唐地、災難性地同“小瓶”的北京休戚與共；更要緊的是，他們幾乎不假思索地將泰國民族主義拱手讓給反動的佛教僧侶、右翼的軍隊領袖，尤其是讓給緊緊攫住大傳統和民眾想象力的君主制。在他看來有一種暹羅史的建構至為根本，據這種歷史說，暹羅是被心無私念、高瞻遠矚的一連串君王們從帝國主義手下拯救出來，并開始走上現代性之路的，那些明君始于我們從尤伯連納（Yul Brynner）的精彩表演中認識的拉瑪四世。在廣泛細致的檔案研究基礎上，他寫成了一篇“馬克思主義的”學位論文，不過將傳統的左翼和右翼歷史編纂學完全顛倒了。[[616]](#_616_9)比如，他能夠證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那些老是被人輕鄙和邊緣化的“中國人”和“泰國華裔”資產階級，非但遠不是一群烏合的買辦，反而正是他們剛健有力地捍衛了泰國經濟的獨立性，使之不受英帝國主義之害；而此時君主政體和貴族卻已向英帝國主義繳械投降，后來又與它狼狽為奸。他還令人信服地主張，泰國自由化和現代化的首要推動力，其實是英國的自由貿易帝國主義，它單方面地、滿不在乎地摧毀了重商主義的壟斷體系，后者是舊皇權秩序的根基；然而同時，它又因此抽走了本地資產階級消滅舊制度的歷史政治任務的基石。因此，舊社會秩序許多成分茍延殘喘到了當代泰國，一種虛妄無稽的、神秘化的泰國史敘述也出現了。他論證說，泰共最大的失誤中，有它對嚴肅的歷史研究的輕視，它對斯大林式庸俗馬克思主義未經三思的采納，以及由此導致的它長期不能造就一種統治性勢力。

第二人是通猜·維尼察古（Thongchai Winichakul），他是全國聞名的活動家“曼谷十八君子”之一，他們在1976年流血政變以后以“大逆不道”罪名被審判和定罪。通猜是泰國華裔，比社山小很多，思想上漸趨成熟的時期，正趕上我們回顧起來所稱的“福柯時代”。所以他從另一個方向激烈攻擊當代的舊制度。他做了一項出色的微觀研究，研究了十九世紀曼谷制作的各種地圖，以及圍繞著這些地圖的機構和話語，從而能夠言之鑿鑿地表明，具有一種霸權性保守文化的不朽“泰國”或“暹羅”，是1870年代的發明。[[617]](#_617_9)歐洲帝國主義者們引入墨卡托繪圖法，建立以數學為基礎的測量學，想象連綿不斷的無形邊界，這造成了福柯式的“斷裂”；在那斷裂時刻之前，王朝的疆域是由它們的中心界定的，統治者認為他們的臣民是無限可變、用途各異的一群群勞役勞工、步兵和納稅人，對這些人要問的最后一個問題才是他們的“民族”。為什么“泰國”統治者的軍隊中充斥著中國水兵、馬來領航員和越南弓箭手，這就是原因之一。通猜進一步表明，在1870年代之后，新的皇家繪圖部門如何開始以歐洲人的方式，創造出全盤假想的歷史地圖，這些地圖將他諷刺性地所稱的“泰國的地理體（Geobody）”推回到傳說的往昔的薄霧之中。這樣一種主張說：遠非持續、毅然、愛國地捍衛始于古代的泰國，統治階級實際上在稍多于一個世紀之前發明了這個泰國，而且發明它的那種方式有力支持了該階級的統治權。不消說，它的推論顯見是顛覆性的。但是通猜也認為，他的目的是為多樣化的另類歷史敘事開啟一個巨大空間，那種敘事是去中心的、地方化的、平等主義的、民眾的。如此以往，道路將被掃清，有利于未來對歷史主體性的反霸權的左翼借用。

最后是加信·泰差皮拉（Kasian Tejapira），一位泰國華裔，三人中年齡最小的，小得無緣參加1973年10月的暴動，卻也是1970年代晚期忠誠的地下馬克思主義者。跟另外兩人不一樣，大約在世界共產主義自我毀滅之際，他才著手他的研究。或許正是因此，他的研究深受本雅明影響，旨在半反諷地復原1940和1950年代朝氣蓬勃的泰國馬克思主義。他周密省察了其中的形容詞（泰國的）和名詞（馬克思主義）之間的歷史關系，認識到以為馬克思主義可以無摩擦地遷移，從一種文化到另一種文化，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那自始至終不過是幻覺罷了。他是這么想問題的第一個泰國知識分子。他還認為馬克思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里的某種文化商品，在不同時代，它有著可描繪的各不相同的“需求”和“供給”。[[618]](#_618_9)他也是思慮及此的第一人。他的著作博大精微，非此處所能撮其要，但從下面這段出自它的開篇的引文里，我們能夠略窺其旨：

在二十世紀最后十年，身處現今這個后共產主義世界里，對英語讀者來說……這樣一本書一定顯得多此一舉：它論述的是差不多半個世紀前，在一個遙遠、恬適的第三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中，以其轉世化身出現、如今已歸西的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學說；甚至這本書的“存在權利”似乎都很可疑。畢竟，過去十年間，泰國的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理論、實踐與組織已經證明是破產了，土崩瓦解了，就像世界各地其他國家里它的大多數同黨一樣。那么為什么要費工夫讀——且別說寫——這具政治遺體的如此冗長乏味的訃告呢？我的回答是，共產主義雖死，但共產主義的幽靈還纏著我們；這死者與活人有過如此長期、猛烈的交鋒，如果不在它的親密對話者的文化心靈上打下深刻的烙印，它是不會逝去的；還有，就其本身而言，唯有通過對共產主義鬼故事的書寫、閱讀和理解，活著的人們才能充分感知到他們自身潛意識的文化自我。

他這樣收束全文：

泰國依舊殘存著文化抵抗的基本要素，那種抵抗是長期致力于有摩擦地結合馬克思主義與泰國文化所鍛煉和形塑出來的。只要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的現代浩劫仍然降臨到泰國人頭上，就會有日新月異的激進分子重整旗鼓，將這些要素鑄成強大的文化武器，為他們自身的和人類的生存與尊嚴而戰。

也許在這里，我們這三位泰國激進學者邂逅了普南和卡塔維查亞。他們以不同方式，不停地寫呀寫呀寫呀，要找回天使退去的腳下那散落的碎片的可貴精華；這絕不全是為了他們的同胞。現代的過去——共產主義是其中如此核心的部分——必須加以深切的再檢視，再探詢，可能的話復原，因為，借用薩蒂亞吉特·雷伊（Satyajit Ray）的話說，我們等著聽前方雷聲隆隆。

## 14 各尋生路

1998年3月11日，恰在蘇哈托指揮了一場將“民族之父”蘇加諾趕下臺的武裝政變32年以后，這位印尼總統憑借傀儡的“人民協商會議”的一致投票，開始了第七個五年總統任期，在宣誓就職時，他說了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們經歷的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那種經濟增長，今后我們再不會安享了。”[[619]](#_619_9)這一番話，是新英格蘭的制造業城鎮、賓夕法尼亞和比利時的煤鋼帶、澳大利亞和美國西部的廢棄城鎮的語言，在那些地方，資本主義由盛及衰，只留下滿目瘡痍和破落的社會體系。這番話也激起筆者就“亞洲危機”提出兩個相關問題，在當代報刊雜志對“亞洲危機”近因的連篇累牘的分析中，它們很少被提出來。第一問是：什么因素使得世界銀行所謂過去二十年的“亞洲奇跡”成為可能？第二問：是不是蘇哈托的預測不但對印尼有效，對東南亞其他先進國家也有效？[[620]](#_620_9)

如果誰在1950年代預測，一代人之內“奇跡”要在該地區發生，這人一定會被認作癡人說夢。印度尼西亞剛遭受了長達十年的軍事占領、戰爭和革命的毀壞，識字率頂多10%。即便十年之后，印尼全國積累的收入，也比美國大型大學的收入高不了多少。菲律賓經濟在殖民時代就很虛弱，到1950年代早被交戰的日、美軍隊踐踏成一堆瓦礫。除了（或許）有四分之一人口掌握的美式英語外，這個國家缺少一種國語把它結成一體。暹羅是個睡意沉沉的谷物出口國，就算在1960年代，它也缺乏全國性的、行之有效的初等教育系統。馬來亞的錫加橡膠的殖民經濟已是有氣無力，這個殖民地成了一塊戰場，宗主國英國的軍隊與強大、無畏的共產主義暴動對壘。還須多說嗎？

似乎可以不無道理地認為，這一“奇跡”之成為可能，要滿足四項基本條件，而這些條件僅僅存在于從南韓延伸到印度洋東岸的、由沿海資本主義國家組成的狹長地帶。

第一項條件是該地區冷戰的特具弧形。二十世紀第三個25年里，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的冷戰比這兒“更熱”，后來由于1970年代中期北京—華盛頓恢復邦交，也許又沒哪個地方冷卻得更快，更顯著。美國人打過的僅有的兩場大戰都在這個地帶：在朝鮮半島上，他們被迫接受了代價高昂的平局，而在印度支那，他們遭遇了更慘痛、更恥辱的戰敗。東南亞的每個大國——印尼除外——都發生了持久、嚴重的共產主義叛亂，印尼本身到1960年代初還允許共產黨合法存在，那是社會主義集團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美國人從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上大舉干涉所有這些國家，唯馬來西亞例外，在當地共產主義造反運動的整個非常時期內，它依舊是個殖民地。臭名昭著的多米諾理論就是專為東南亞發明的。為了撐起這一排搖搖晃晃的多米諾骨牌，華盛頓全力以赴扶植這樣的政權：效忠于它，資本主義經濟繁榮，威權主義，反共——通常但并非一律是軍人統治。[[621]](#_621_9)許多政權通過防御協定同美國拴在一起，美國人還在有些國家布下了花樣百出的軍事設施。大敗虧輸只是鼓勵華盛頓在它余下的政治牌背后投入更多武力和財力。美國的這個熱帶對跖區領受的五花八門的“援助”，世界上別的地區無出其右。

另一方面，印支“陷落”后鞏固起來的華盛頓—北京反莫斯科聯盟，意味著自1970年代末期直至蘇聯解體，東南亞那些國家如果愿意，就能繼續從華盛頓的冷戰慨贈中獲利，不會面臨什么嚴峻的國內或國外麻煩（我們下文將看到，菲律賓部分是個例外）。跟這整個過程很相似的事情，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區都不曾發生過。

第二項可能條件是該地區地緣上接近日本這一造化。東京到十九世紀末才姍姍來遲參與帝國主義游戲，它面對著北部邊境的沙皇帝國，固守東南亞、支配中國的歐洲列強，同時美國人正橫渡太平洋快速推進——阿拉斯加，夏威夷，中途島，威克島，關島，菲律賓。從1895年取得臺灣、1910年強奪朝鮮入手，日本統治階級試圖運用經濟、政治和軍事手段，為他們的國家在東亞和東南亞創造一個霸權區域，要與美國在西半球的霸權區域相當。最終結果是1937年中日戰爭的開火，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的爆發，1942年東南亞大部地區的被攻取，和1945年8月原子彈的一炸而潰。戰后恢復期間，從前的野心并未消失，只是采取了本質上是經濟的外觀。華盛頓自信它對日本的政治、軍事控制，又熱衷于將日本經濟建成亞洲資本主義活力的基石，所以沒有在東京的道路上設置什么真正的障礙。但是在戰后初期的年月里，毛澤東的中國向日本資本關閉，而南韓人對日本殖民主義的苦痛記憶也決不會讓他們持更歡迎的態度。東南亞是可獲得的唯一現實的機會，特別是因為歐洲列強如今已喪失它們在那里的殖民堡壘。從1950年代開始，通過一系列的戰爭賠償協議，東南亞國家獲得了購買日本產品的大量資金支持，東京的經濟勢力范圍急劇擴大：先是在暹羅，那是它二戰時期的同盟；后來在其他新興民族國家，它們曾在日本軍事統治下有過不那么愉悅的經歷。到1970年代初，日本已成為該地區最最重要的外國投資者，既是自然資源（木材、石油等）的開采者，又是工業和基礎設施發展上的投資者。這一切意味著東南亞是世界上得天獨厚的地區：最富強的兩大資本主義國民經濟體深深地、總體上合作地卷入此地四十年。后來，當南韓和臺灣作為主要的資本輸出地發動起來以后，它們追隨頭雁，增強了業已甚巨的原本限于美日的資本與技術流入。[[622]](#_622_9)

第三項可能條件極具諷刺性，它就是中國成功的共產主義革命。在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之外建設強大、專制的社會主義經濟，這種毛主義的構想阻礙了中國在東南亞扮演重大的經濟角色，或者說，阻礙了中國與東南亞競爭，直到1980年代中期。[[623]](#_623_9)只有在那時，這個過去的“中央王國”，連同它那廣大的國內市場，它那受著中共鐵腕統治的一貧如洗、一望無際的大群農民和工人，才開始從美國、日本、歐共體、臺灣乃至南韓吸引巨額投資。因而到1990年代，中國大陸終于有機會在制造業出口上打敗東南亞了，這種形勢看上去一定會無限期地延續下去。回顧起來，可見這個亞洲第一大國離奇地隔絕世界市場四十年，東南亞奇跡部分地就是托它的福。

最后一項條件間接聯系著第三項。從鴉片戰爭到中日戰爭開火，在這悲郁的衰落世紀期間，數百萬年輕人，多是文盲男子，離開福建和廣東沿海地區，前往勞動力貧乏的東南亞的歐洲殖民地以及暹羅。[[624]](#_624_9)這些人講的是（總體上）彼此不通的話，比如閩南語、粵語、客家語、海南話和潮汕話，一直到世紀之交，他們大多數極少自認是中國人。他們按宗族、家鄉的村莊或地區，也按語言群體識別他們自身。在環境有利的地方，特別是在佛教的暹羅和基督教的菲律賓，與當地人通婚，接受同化，這很普遍，時間一長就造成一個獨特的混血社會階層。在不太有利的環境下，比如在（穆斯林的）馬來亞與荷屬東印度，按殖民者的決策，他們往往被強行隔離聚居。然而1900年后，這種情況開始改變。婦女們開始從廣東和福建過來了；學校開始建起來了，教孩子們全漢語的書寫，也教官話口語；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民族主義取得了各種新進展。在這個時候，移民社群變得更加根深而穩定。盡管大部分移民久居貧寒（比如直到二戰，他們構成了暹羅和馬來亞的真正的工人階級的主體），但是數量不菲的人，憑借勤奮工作的習慣與背井離鄉帶來的自由，順著職業階梯一步一步地攀升——小買賣、企業主、專門職業，甚至政府機構。尤其是在荷屬東印度，這些人漸漸形成一個明顯的中間層，介于殖民行政機構與絕大部分是農民的本地人之間。

然而在這同一時期，土著民族主義開始在東南亞興起，最早是在菲律賓，最后是在柬埔寨、老撾、馬來亞和新加坡。歷史上第一次，這些移民及其后裔常常發現自己左右為難：一邊是種族主義日甚一日的殖民政權，它們蔑視、剝削但也保護他們；一邊是本土文化保護主義的民族主義者，這些人鄙視他們是外鄉人，是殖民者的協從，但又嫉妒他們的經濟成就。歐洲殖民主義的瓦解，這些前殖民地于戰后的獨立，都加劇了他們處境的不安定性。殖民地的子民身份能夠輕松持有，但一個民族國家的現代公民身份卻不能。[[625]](#_625_9)種種選擇須得做出，但談何容易；其中的難處，由于分別以北京和臺北為中心的兩個敵對政權的出現而加重了，它們二者都熱望吸引南洋移民的忠誠，卻無一有能力——或者甚至很有心——為了他們的利益進行保護性干預。然而與此同時，殖民主義的終結敞開了太平洋戰爭之前夢想不到的經濟上發跡的機會。

獨立后的總體社會趨勢——雖然國與國之間廣有變異——是向上流動的“土著”力保他們自身在政治領域有一種堅不可摧的地位，特別是在急劇擴張的國家行政機構里，而重中之重又是在軍隊和警察部門里。印尼和馬來西亞的這種趨勢尤為顯著；可是即便在暹羅，它已經擁有大批“華人”政治家，卻難得覓見一位聲稱有如此血統的高級軍官或警官。[[626]](#_626_9)此外，國立大學或公開或隱蔽的歧視“華人”政策，據信是要限制他們在公共部門乃至某些專門職業中的發展機會。這一切的后果是激發華族人將精力和雄心凝聚到商業部門——合法的和非法的。蘇哈托的印尼當屬這種種趨勢的極端例子。從1966年3月到1998年3月間，已知有華人血統的，無一人曾經做過內閣部長、高級文官、陸軍上將、海軍上將或空軍中將；甚至在議員中間，華人也是寥寥。然而，估計占總人口5%、據稱是華人的群體控制了國內經濟的70%—80%，而且蘇哈托周圍最大的親信資本家，幾乎全部恰是出自這個群體。這樣一種勞動的“種族”分工刺激了政府官吏一方的大量尋租活動，制約了一個茁壯的“土著”企業家階層的成長，使得邊緣化的華人少數族群成了“奇跡”的真正的國內發動機。

這樣一些可能條件，有多少還將繼續存在于二十一世紀初葉呢？冷戰期間美國對東南亞的異常投資不會再現了，那種投資讓一個個暴政成為可能：1948—1977年間的泰國將軍們，菲律賓的馬科斯政權，蘇哈托的望不到頭的新秩序（Neues Ordnung）。美國在菲律賓的基地撤離了，這個國家對它的前殖民主子而言，如今已成鳥盡之弓。暹羅不復被視為反對什么東西的堡壘。就算是廣土的印尼，連同它那2億的眾民，而今也更多被當作包袱而非盟友。馬來西亞久立不倒的總理馬哈蒂爾的反西方鼓噪，只不過為他在華盛頓博得一個聳肩而已。

日本在這一區域有著恒久的地緣政治利益，但是很可能，以1985年《廣場協議》為標志的這個國家的“歷史時刻”，還有在1980年代橫掃美國的反日大恐慌，都已過去了。眼下這個十年間，東京掙扎著要從1980年代末破滅的泡沫中奮力自拔，卻鮮見奏效。它沒有能力多施援手，助東南亞戰勝金融危機，就是這一衰弱的明證。另一方面，雖然中國的政治前景充滿變數，但是極有可能，歷史上它在東亞和東南亞的那種中心作用，不久它將重新承擔起來。它擁有的資源遠勝東南亞任何國家，很長時期內它將是世界市場上不可一世的競爭者。因此，也許只有海外華人會留下一項經久的奇跡要素，縱然這個要素也有其可疑、脆弱的層面。

然而，即使說“奇跡”的這些可能條件多數已經消失或可能行將消失，也未必表示相關國家不能利用超常增長時期，為更加自立的長遠發展奠定基礎。畢竟，不論德國還是日本，都在遭遇戰敗、經濟破產和外敵占領之后，在一長代人時間內東山再起，又成了經濟大國。極度民族主義的南韓提供了一個更切近的對照，它利用美國人撐腰的冷戰專制政治所帶來的增長機會，以及它自身對其強大鄰國的歷史恐懼，造就了一個工業社會，生產出世界一流的工業品：有充分理由認為該國將迅速從金融危機中恢復元氣，不久重新擔當起它早先在全球經濟中的那種角色。故而我們要問的關乎東南亞的核心問題是，“奇跡”時代積累起來的資源和資產，多大程度上被用來為它的可能條件暴減的日子做好準備。

為探索這個問題，哪怕只是蜻蜓點水、掛一漏萬地探索，有三個明顯的著眼點：一支有技能、受過良好教育、能夠提升各國的附加值層級的勞動大軍的發展；國內儲蓄和投資的使用；以及對國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關切。這三點當然是緊密聯系的，其中對未來至為重要者是第一點。

我們或可考慮不曾殖民化的暹羅，就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它還一直被世界銀行宣揚為一個樣板，一切有遠見的“第三世界”國家都可以效法它，因為過去三十年里，它的增長率極高。1980年代末，它的中學適齡人口，只有區區28%的人確實在上不管什么樣的中學。[[627]](#_627_9)據可靠估計，到2000年，該國70%的勞動力將受過小學及以下層次的教育。[[628]](#_628_9)高等教育機構培養出來的工程師，只及暹羅所需的一半。泰國的職業學校，不以它們灌輸的高級工業技能聞名，更因它們學生團體間的野蠻斗毆著稱。它的大學仍以國立為主，客氣點說，其質量是“參差不齊的”，這尤其是因為教授和講師薪俸羞澀，于是花了大量時間在校外做兼差或投機。末了還有一個現象，它在資本主義東南亞的其他各地也都看得見：許多上層和中層階級的父母，決定盡量避開國民教育體系，送子女到當地的“國際”中學念書，進而依據各自的收入水平，送去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讀大學。這些年輕人有的永不回國，回來的那些人很少愿意在祖國的教育系統里謀飯碗。

相比于馬來西亞，菲律賓的大學適齡青年的入學比例足有三倍多（38%對7%），[[629]](#_629_9)但是學生們大多處在低劣的文憑加工廠里，學校差不多什么都沒教給他們。兩國都不具備有效的、以工業為導向的“職業”教育體系。它們都經歷過嚴重的青年人才外流，特別是由于英語語言殖民主義的那種有銷路的遺產。在馬來西亞，聰明的年輕“華人”，面對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歧視，一直在大量地去國離鄉。馬科斯給菲律賓帶來的深重苦難，啟動了“土著”菲律賓人的大規模移民，其中不少人拿著當地大學的文憑，他們移居世界各地，做女傭、護士、酒吧招待、妓女、私人司機等等。（他們寄回家的錢是對菲律賓外匯收入的最大單項貢獻。）印尼情況更糟。威權主義政府惡化了教育問題，它經常認為學生是個易變的危險群體，它還更多地運用教育系統灌輸政治忠誠，而不是激發有創造力的青春心智。[[630]](#_630_9)

教育政策之所以有這些缺陷，一個關鍵的原因是，多年以來，工業發展的主要投資者來自該區域之外，特別是美國、德國、日本、韓國和臺灣。所有這些投資客都在尋找低薪、聽話和沒有組織工會的工人；后三國還尋求離岸平臺，它能提供進入美歐市場的低關稅通道。對這樣的投資者來說，在業務的直接需要之外從事職業培訓，很少有利可圖或有資源可用。再說，他們發展起來的制造工廠同國內經濟與社會只有微弱的背后關聯，往往運作得有幾分像飛地。結果，有錢的外國人和窮苦的本地人做了出口開發型增長的許多現實工作。但是這種形勢的延續始終有賴于勞動力的低工資、低技能狀況；有點顯著改善就刺激投資者轉移到更窮的國家，比如越南。然而只要GNP數字繼續上升，該地區就不會有什么政府嚴肅地從結構上謀及未來，一直到金融危機迫在眉睫。

恰恰由于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深深依賴外國投資拉動，國內的投資者，尤其是政治關系不錯的那些人，就把他們的活動云集在受保護的經濟部門：銀行、房地產、建筑和自然資源開發。金融危機來臨的時候，印尼有兩百多家銀行，大多數不可靠而且有政治關系，幾乎全都負債累累。曼谷城市銀行估計有70萬套閑置的住房和辦公室。馬來西亞政府下令修建了世界第一高樓，不料竟發現它的場地大半租不出去。蘇哈托政府在飛機制造業上投入了數十億美金，盡管如此，它的產品缺乏FAA（聯邦航空局）安全認證，幾乎無人問津。諸如此類，一個個白象工程前仆后繼。正是奇跡的長久延續，不但刺激了統治階級，也刺激了新中產階級，利用他們的高儲蓄水平，投身到各式各樣投機的、非生產性的和尋租的活動中去。

19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人為的低利率與東南亞地區流行利率之間的巨大差距，又助長了這些或許是“自然的”傾向。對東南亞的金融家們來說，從東亞借錢，又便宜又幾乎無限制，然后在他們國內市場放貸給各色人等，大賺一筆：這簡直易如反掌。在估值過高的當地貨幣與美元掛鉤的狀況下，美國施加壓力要求“自由化”，而世界銀行又執著地推銷當地證券市場，這進一步加重了投機傾向。

東南亞的資本主義國家當中，只有印尼和馬來西亞證明賦有豐裕的礦產資源。然而在1950年代，所有國家都擁有廣袤、豐產、形態各異的森林以及儲量豐富的沿海水域。如今，菲律賓業已成為全世界環境受破壞最重的國家之一。暹羅的森林近于消失（只在最近十年，政府才頒布了一項國內伐木禁令，貫徹還不得力），肆無忌憚的泰國伐木人就把他們的魔爪伸向了貧困的鄰國緬甸和老撾。去年印尼的大火，燒毀了婆羅洲和蘇門答臘的幾十萬公頃森林，污染了居住在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南部的數百萬人的空氣。這些大火是蘇哈托家族卵翼下的企業集團的貪婪之果，為了開辟出廣闊的種植園，那些集團覺得燒掉偏遠的人群、動物群和叢林本身，來得比較省事。[[631]](#_631_9)高技術，高高在上的日本人、韓國人，還有其他漁業公司，嚴重消耗了海洋環境，損害了貧窮的當地人的利益。在“奇跡”時代的大多數時間里，印尼與馬來西亞有石油和/或天然氣的大礦之利，也有歐佩克能夠在不同點上強加的石油價格之利。但是這些礦藏是有限的，再也不能以1970和1980年代那樣的規模開采了。又一個北賓夕法尼亞？

太過悲觀或許不對；但是，特別是假如誰想到拿南韓作比較，他很難不得出結論說，“奇跡歲月”被東南亞那些領導人總體上短視、揮霍無度、甚至誤國害民地虛耗了。

余下的事情，是要比較性地思考創造了奇跡的東南亞四大國的政治軌跡，以便評估金融危機在各國的可能后果。譜線從一端的菲律賓，經馬來西亞和暹羅，延展到另一端的印尼。

在“奇跡”歲月的多數時間里，菲律賓被看作一個可悲的例外：它是在別國紛紛呼嘯前進之際卻陷入貧窮的唯一資本主義民族國家——還是唯一的美國前殖民地。不過在金融危機期間，它的貨幣比泰國泰銖、馬來西亞林吉特、當然還有印尼盧比都要堅挺一些；而且這個國家甚至正在擺脫而非落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掌握。這何以可能呢？

答案在于馬科斯政權的性質以及它在1986年2月垮臺的原因和時機。除開他是文職政客這一點以外，馬科斯是東南亞冷戰“火熱”時期一個典型的暴君。1965年他第一次當選總統，時值林登·約翰遜開始把大批美軍送往越南。菲律賓的美軍基地，特別是蘇比克灣的海軍基地和克拉克機場的大型空軍基地，對打這場戰爭非常重要。馬科斯為這些設施索要高額租金，出租菲律賓軍隊到越南服役，對菲律賓領土上貯藏核武器樂得保持沉默，叫喊著支持美國的戰爭事業。反過來，當1972年他的合法總統任期將滿時，他建立了自己的強盜獨裁政府，或許也是由于給尼克松最近兩次總統競選運動的財源提供了大筆私人捐贈，華盛頓對此若無其事地睜只眼閉只眼。1972—1986年間，馬科斯家族及其親信密友們，完全依賴美國的持續支撐，有條不紊地掏空了不甚強大的菲律賓經濟，意外促成了南部穆斯林勞民傷財的分離主義叛亂，還激發了不久即蔓延至幾乎全國各地的毛主義反叛運動。然而到1980年代伊始，東南亞的冷戰的“火熱”階段結束了，里根的白宮中那些更冷靜的頭腦認識到，馬科斯獨裁政權必須滾蛋：它正在從政治和經濟上毀滅這個國家，對美國一點好處也沒有。[[632]](#_632_9)于是中情局積極介入了反對該政權的民眾運動，最后，正是美國軍用飛機突然將這對千夫所指的夫婦從他們的宮殿帶到夏威夷的鍍金牢獄里。科拉松·阿基諾接掌總統寶座，立即多方面地恢復了馬科斯之前的地方巨頭民主制。她的丈夫在1983年結束美國的流亡生涯剛一歸國，就遭馬科斯黨羽暗殺。當極右的軍國主義者企圖推翻她的政府時，華盛頓斷然挫敗了他們（尤其是在1989年12月）。

1986年那時正當“奇跡”的巔峰期，菲律賓卻事實上破產了；然而同時，也正因這個緣故，它逃脫了冷戰體制。一方面，阿基諾被迫采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療法：解除管制、自由化和緊縮開支（這持續到她的繼任者拉莫斯統治下），但是她合情合理地能夠全盤諉過于她那可憎的前任。另一方面，出于種種復雜的原因，其中包括皮納圖博火山爆發，火山灰掩埋了克拉克機場，美國人開始逐步關閉他們在菲律賓的軍事設施，這個過程在1991年結束。[[633]](#_633_9)隨著馬科斯的倒臺，共產主義叛亂失去了動力，分裂得派系林立，漸趨于樹倒猢猻散。政府同穆斯林造反者的主要集團最終勉強達成一項協定。寡頭制的、然而競爭性的現行政治體制看上去相當穩定，不存在有力理由認為菲律賓不會以它在1990年代間呈現的適度步伐軋軋前行。總之，由于菲律賓十年前就破產了，不曾經歷“泡沫”，而且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就有一種“正常化的”、半民主半寡頭的、后冷戰的、文官控制的政治系統，所以它蒙受金融危機之苦最輕微。

相比之下，馬來西亞和暹羅受到更重打擊。馬來西亞在冷戰的“火熱”時期，在一些重要方面是個異類。這個國家1963年才創建起來，那時白廳安排了一個草草拼就的混合體，馬來亞、新加坡、沙撈越和沙巴這兩個婆羅洲地區囊括其中，但1965年新加坡就脫離出來了。[[634]](#_634_9)馬來亞半島本身是在殖民政府粉碎了當地強大的共產主義運動之后，于1957年方才獲準獨立的。馬來西亞繼承（而后改進）了殖民政權嚴酷的反顛覆法與冷血的安全機構，但并未繼承叛亂本身。部分由于這個緣故，也部分因為倫敦執意（至少在哈羅德·威爾遜任首相期間）保持它自身在東南亞的勢力存在，華盛頓對馬來西亞的干涉，比對該地區其他任何國家的干涉都要少。馬來西亞自建國以來，一直是一成不變的威權主義政府，但是這種一成不變的基礎無關乎冷戰，而全在于馬來人種族群體（52%）的一種集體決心，在面對較大的“華人”（35%）和較小的“印度人”（10%）這些少數族群時，要壟斷實際的政治權力。這意味著，所有總理必得是馬來人和文官，他們誰也不曾被公然的暴力趕下臺。[[635]](#_635_9)同時，馬來領導人非常英明睿智，允許華人和印度人有約束、從屬性地參政。形式上，政府始終是族群有別的三個黨派所組成的一個聯盟，也始終有少數族群的內閣部長。馬來人企業家享受了許多優惠待遇，通常是在受保護的部門，并處于政府的庇蔭下，但是這從不曾被推到極端，以致徹底疏離生意興隆、活力四溢的少數族群商業階層。這就產生了一種非凡的政治穩定性，它在多年時間里激勵外國投資源源流來。石油和天然氣的可觀收益也為穩定政府財政提供了基礎。雖然投機熱和對高不可攀的特大工程的嗜好在1990年代侵襲了馬來西亞，腐敗也急劇增多，但有兩個奇特因素保護它免遭重創。第一個是它與富裕的新加坡之間怪異的競爭—共生關系，后者位于從柔佛出發的一條短堤對面。這個“華人”占壓倒多數的城市國家，至今已被李光耀專制政府統治了四十年，它老是對自己所處的位置戰戰兢兢：兩個說馬來語的、近現代有過反華暴力史的伊斯蘭國家把它夾在中間。因此它有萬般理由要幫襯吉隆坡，而它的財富使它有機會這么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第二個因素說來夠古怪的，是馬來人領導層自身的狹隘地方觀念，他們感到有必要公開強調馬來/伊斯蘭價值觀，而且，他們在老大哥印尼面前有自卑情結——我們甚或可以這么說。[[636]](#_636_9)

對馬來西亞而言，在較遠的將來，主要困難想必是它的教育體制的落后，和許多馬來人中間的食利者心態，他們在一代人的時間里，是政府慷慨解囊的享有特權的受益者，那種模式讓人想起科威特那樣的地方。[[637]](#_637_9)就眼下來說，這個一成不變的政府應對經濟危機，是靠加強它的威權控制呢，還是靠容許更民主的參與和更現實的公共問責，尚需留待日后觀察。[[638]](#_638_9)

相比之下，實際上從東南亞冷戰的“火熱”階段伊始，暹羅就是美國人的一個前線國家。早在1932年，文武官員的一個小集團推翻了專制主義君主政權，自1930年代末以降，軍方在披汶·頌堪元帥的領導下，勢力蒸蒸日上，把暹羅引入太平洋戰爭，成了日本人的盟國。日本戰敗后軍方一時名聲掃地，1947年通過軍事政變重掌大權，立即跟華盛頓結成同盟。OSS（戰略情報局，即中情局的前身）從前具有傳奇色彩的頭目，“瘋狂的比爾”·多諾萬（“Wild Bill”Donovan），被艾森豪威爾派往曼谷任美國大使，這是那時代特有的事情。在鐵腕人物沙立及其副手們的政權下（1958—1973），美國主宰進一步加強了。越戰高峰時期，大約有5萬美國軍事人員駐扎在泰國土地上，該國被一張軍事基地的網格所覆蓋，從那里實施對印度支那的海陸空襲擊。與此同時，美國向暹羅注入了巨額款項，以供軍事基礎設施、農村發展以及教育之用；到1960年代末，日本人也正漸漸成為強大的投資勢力。

隨之而來的社會變遷，（到1970年代中期）已經造就了大批新中產階級，（1965年后）同樣也造成了節節高的共產主義叛亂。這些發展狀況，與對美國同盟不斷增長的反抗一道，激成了1973年10月曼谷那突如其來、前所未見的群眾動員，它在國王拉瑪九世的審慎相助下，把獨裁者們趕下了臺。自由憲法頒布了，暹羅經歷過的最公正選舉舉行了。到1976年3月，美國的軍事存在撤離了，和北京的友善關系啟幕了。然而同年，印度支那的多處共產主義勝利引發了泰國國內的極端對立，最終演化成1976年10月6日的流血政變，然后有數千名理想主義的、激進化的學生逃往共產主義游擊區。

一個極右的軍人主導政權的鞏固，在那時看來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如我們所見，亞洲的冷戰此時迅急降溫。1977年10月，極端分子又被另一場政變推翻，領導政變的是狡黠多智的江薩將軍，他向游擊區的大學生們發布大赦，而且重視培養同北京與河內的良好關系。[[639]](#_639_9)江薩的靈活政策被1979年中柬越三角戰爭幸運地推進了，在那次戰爭中，忠于北京的泰國共產黨失去了它在印支的穩固后方，也失去了它新吸收的、極度民族主義的學生擁護者。到1980年，該黨已淪落得不足為慮，陪它一起淪落的是其他任何明顯的左派。

于是在1980年代初，其時受到中日美三國支持的暹羅，已經根本上走出了冷戰階段。盡管這個十年的多數時間是一位將軍充任首相，但他的內閣是一些組織松散的保守政黨所形成的各種聯盟。經濟“奇跡”為規模空前的賄選行為提供了資源，大企業和地方顯要的政治權力穩步提升，受害的是軍方和行政機構。1991年軍隊再度短暫掌權，不過不是拿傳統的“紅色恐慌”為理由，而是借口文職政客的腐敗；但是他們在1992年“流血五月”的中產階級大動員中被趕跑了。[[640]](#_640_9)

這段插曲的一個寶貴結果，是贊成根本性憲法改革的一場運動——它要削弱腐敗的行政部門的集中化權力，遏制賄選，加強政黨紀律，提高問責性。1997年7月泰銖崩盤，讓那些最起勁地抵制改革的集團臉面丟盡。新憲法最近已經頒布，它在大多數方面都是進步的。金融危機本身并未造成政治動蕩，甚至沒有造成較大的示威游行，僅僅導致一個腐敗的文官內閣垮臺并被另一個略老實點的內閣取代。此外，由于長期成功地將“華人”融合進幾乎所有社會階層，到目前為止，不存在任何種族主義的攻擊替罪羊行為。泰國的政治精英層，靠著唯國際風向是瞻，如愿撐住他們自己的地位已達一個半世紀；在順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上，他們也很少驚怪抱怨；他們（也許正當地）寄望于該組織的是，當失業率上升、物價暴漲時，他們將會得到回報。基于前面列舉的種種原因，奇跡在某個時候重返暹羅似乎不大可能，但是有充足理由相信，這個國家的后冷戰政治秩序靈活通變又根深蒂固，足可確保在不遠的將來經濟適度復蘇。

然而印尼完全是另一回事。其實在1964—1965年間，印尼經濟就已垮了，原因在于惡性通脹、軍隊對大型國有部門的貪腐管理，以及蘇加諾的獨裁主義政策。經濟崩潰作為主因造成了一種心理氛圍，在這種氛圍下，1965年10月到1966年1月間，一場浩大的屠戮發生了，直指合法的、赤手空拳的印尼共產黨及其支持者，付出的代價是至少50萬人的生命，還有其他無數人多年的監禁——未經審判，卻常常受到嚴刑拷打。[[641]](#_641_9)后來沒多久，那位激進的民粹主義總統、華盛頓眼里的妖怪蘇加諾緊跟著下臺了。當時，美國軍隊正陷入印度支那的泥潭，蘇聯的軍事力量似乎進步神速，此時此刻，社會主義國家集團之外最大的共產黨遭到可怕毀滅，這立即給大屠殺的主事者蘇哈托將軍贏來了美國贊助。1966年春，印尼第一個“熱”冷戰政權，尾隨著恐怖活動建立起來了。

在早期歲月里，獨裁政權對美國的心愿百依百順，也因為這么做，它得到豐厚犒賞。美國培養出來的一個新古典經濟學家團隊掌管了經濟，他們止住了惡性通脹，將許多國有化公司私有化或者歸還給原來的外國所有者，鼓勵外國投資開發國家豐富的自然資源或投向制造業。印尼和美國達成一項密約，允許美國核潛艇通過印尼海域，無須浮出水面以致暴露在蘇聯衛星的追蹤眼皮之下。作為回饋，華盛頓組織了“支援印尼政府間集團”（Intergovernmental Group for Indonesia，IGGI），這是美國、日本與歐洲資本主義大國組成的一個大財團，要在本世紀的下一個二十五年里，給印尼的“發展”專款大量、穩定地輸液。這些政策，既是蘇哈托權力鞏固的關鍵根基，也是1970年代、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印尼奇跡的關鍵根基；它們給剛發現富藏石油的印尼帶來的效能，被1973年歐佩克的石油提價行動大大增強了。華盛頓那么稱心如意，以致1975年12月后，當蘇哈托決定入侵并占領葡萄牙從前的小殖民地東帝汶時，福特和卡特政府竟對這一事實裝聾作啞：實現這次入侵，用的武器九成是美國造，嚴重違背兩國1958年的雙邊武器協定。進而，它們還在國際論壇上為雅加達辯解，又秘密提供越戰中使用的威力極大的OV-10攻擊型武裝直升機，幫助摧毀東帝汶人的抵抗，摧毀東帝汶的農村環境和社會，真是太有效了！（20萬以上東帝汶人，亦即總人口的1/3，在1975—1979年間非自然死亡。）

隨著時間的推移，蘇哈托政權漸漸改變了它的內部特性，改變方式將具有非同小可的長期后果。在早年，他是將軍們的統治小集團中的首席執政，他的權力是軍隊的權力，他的權威是基于恐懼，基于美國人收拾的經濟穩定化的有益影響。那時候，富得出了名的人是高級軍官們，最負盛名者是蘇托沃（Ibnu Sutowo）將軍，他久居國家石油公司即“佩塔米納”（Pertamina）總裁之職，想方設法弄得它在1975年歐佩克成就如日中天時破了產。然而時間一長，蘇哈托把他的袍澤們撇在一邊，創立了個人獨裁統治，雅加達的饒舌之徒今天稱之為“我們的泰坦尼克”。手段不外兩招。

一方面，他改進了扎根于龐大的官僚機構之中的選舉體制和執政黨，這保證他徹底控制著立法機關和人民協商會議（它選定總統，為政府政策制訂大政方針）。他狡猾地創立和資助了兩個名義上的反對黨，一個給虔敬的穆斯林，另一個給基督徒和害怕這些穆斯林的其他人。[[642]](#_642_9)這些機制，還有他從國內外源頭上可以弄到手的無限資金，使無盡系列的裝模作樣的“自由選舉”成為可能，也使他本人得以永久連任總統，遇不到反對。[[643]](#_643_9)

另一方面，他開始利用十分招人嫌惡的印尼華人少數族群，確保他對全國財富的個人控制。在該政權初期，蘇哈托與“赤色中國”斷絕了外交關系，關閉了華人學校和報刊，強迫華人改名，改得聽起來像穆斯林或爪哇人，還立法規定 tjina/cina（大致相當于“中國佬”）是這些人的官方稱謂。[[644]](#_644_9)他后來看樣子逐漸認識到，對華人的政治—文化壓制與強制集中居住，能夠達到別的目的。一方面，華人被全盤取消了正式的政治權力，那種程度是前所未見的。[[645]](#_645_9)與此同時，“華人少數族群”受激而群聚于商業，他們中的小股精英在蘇哈托的私人保護下，被拔擢到超級大亨的地位。在這種“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體制下，我們可以說華人有經濟權而無政治權，而本土的印尼人（蘇哈托的對手或接班人會從中升起）或許有政治地位，卻沒有富集的、獨立的財源。

這些“宮廷大亨”也是為蘇哈托大家族聚斂驚天巨富的代理人，馬科斯家的贓物，雖鼎盛時期，[[646]](#_646_9)比之這一巨富也相形見絀。他們超級大亨的地位有賴于憑借政治手段，將關鍵經濟部門重新組成卡特爾和壟斷化，特別是銀行業、進口貿易和自然資源開發。蘇哈托的“皇子公主們”和其他親屬，在這些大亨的公司里獲贈大量股權，從大亨持有的銀行拿到無限度貸款，對特殊的出口商品（如丁香）和進口商品（如塑料）擁有分拆的壟斷經營權。[[647]](#_647_9)上層樹立的榜樣，在“奇跡”年月里向下蔓延，結果印尼經常與尼日利亞和中國為伍，被列為世界上最腐敗的三個國家之一；因此像它這樣一個國家，1960年同南韓的發展水平相當，三十年后卻完全被后者超越。

時光流逝也一定會有它的社會、政治后果。蘇哈托當國家元首，為時之久超過世界上任何一位非君主的領袖——另兩個人除外：卡斯特羅，還有差距不大的多哥的納辛貝·埃亞德馬（Gnassingbe Eyadema）。[[648]](#_648_9)很多年來，他可以依靠對1965—1966年大屠殺的記憶，讓印尼公眾政治上噤若寒蟬。但是今天，要到45歲左右的人才可能保留著這種記憶，大多數印尼人都遠遠小于這個年紀。蘇哈托政府依舊抬出“潛伏的”或“死灰復燃的”共產主義幽靈，證明它的壓制是正當的，可是這冷得結冰的冷戰修辭誰也說服不了。而今率領軍隊的將軍們，在大屠殺發生之際還是嘴上無毛的軍校學員，比他們的總統小了整整一代。[[649]](#_649_9)1990年代初，人數多得多的新一代工廠工人涌現出來，其中許多是婦女，他們越來越無所畏懼，通過罷工和其他形式的反抗，逐漸消蝕了政府對勞動力的公司控制。因奇跡而生的新中產階級，早先的感恩戴德，已經變成對資本主義亞洲最后一個冷戰政權的貪婪與壓迫的沮喪感和怨憎感，特別是因為他們眼瞅著別的地方處處在歡快地松綁減壓。

印尼盧比的災難性崩盤（比該地區其他任何一種膨脹的貨幣所遭遇的崩潰都劇烈得多）意味著，不論印尼人還是外國人，人人都感到，經濟危機不可分地牽連到政治危機，這在印尼現代史上要第二次出現了。很可反映這種形勢特點的是，盡管經濟破產了，“發展之父”蘇哈托的政治機器仍然確保了他全體一致地再次當選總統，他那位半癡的門徒、德國培養的航空工程師哈比比當選為副總統。[[650]](#_650_9)他的張揚好勝的女兒“杜杜”（Tutut）出任社會事務部長，他最喜歡的華人大亨做商務部長，同時他的女婿是軍隊精英薈萃的戰略指揮部的司令官。[[651]](#_651_9)兩個政黨，幾十個社會組織，在經受多年的壓制和操縱后，似乎已肢殘力怯，不能組織目標明確的社會運動，就是靠那種運動，南韓、菲律賓和暹羅才擺脫了它們的冷戰政治體制。結果，迄今為止，全體居民對金融危機之痛的反應，竟主要是針對他們鞭長可及的華人鬧鬧事，或打劫后者的財物——典型地是在鄉野小鎮上。這種騷亂的效果只不過是進一步摧殘了經濟。

蘇哈托心知肚明：在全世界所有宗主國眼里，他被當成一個大問題，而不再是有用的盟友。他知道克林頓希望他垮臺；大屠殺那會兒，克林頓還是個學生。但是當他的泰坦尼克下沉的時候，他將緊抓不放。他太老了，太守舊了，太驕傲了，不愿卷鋪蓋走人。[[652]](#_652_9)新秩序是由他建的，也是為他建的，沒了他不可能茍存。可是有了他，它也在劫難逃。還沒人清楚地知道在他之后可能如何，這種不確定性與日俱增，只是加重了對永久受損的國家前途、對暴力和混亂肆虐的可能性的普遍憂懼。在天上或地下的某個地方，蘇加諾想必在搓他那雙鬼手。

## 15 多數族群和少數族群

人們很容易忘記，少數族群（minorities）是與多數族群（majorities）協同形成的——而且這在東南亞還是晚近的事。該地區任何一種本土語言，都缺少表達這兩個概念的傳統語詞。它們誕生于政治和文化革命中，造成這種革命的，是殖民地國家的成熟和與之作對的大眾民族主義興起。前者根本改變了統治的結構和目標，后者改變了統治的合法性。

東南亞晚近的殖民地國家，跟它的所有前輩們不同，它是從地圖和司法上想象自身的，自認為是精確標明的地理邊界之內的最高權力，而那種邊界又是國際法從外部加以認可的。因此它著迷于條約、協定、治外法權和邊界委員會。這種對國際法的服從——再沒有比對無人居住的南極洲的莊嚴分割更好的例子了——有另外一面，就是國內的專制主義，它被認為是一種國家權利，其廣度和深度超過了古代東南亞的任何一國。（東南亞比較研究學者中的佼佼者約翰·弗尼瓦爾談到了“利維坦的鑄就”，此話并非無的放矢。）而且，在十九世紀的東南亞殖民地，這種起源于十七、十八世紀歐洲絕對君主制的國家權利，背后支撐著它的是一種復雜精致的官僚機構、無往不克的軍事威力，以及工業資本主義那永不安寧的動力。

正如殖民地國家從它的歐洲君主制先驅那里借鑒良多一樣，二十世紀民族主義也從它的對手那里廣借博取，所依憑的恰是較早時期以來席卷歐美的相同學說。人民（the People）新近被設想為與殖民地統治者相對立的一個政治實體，他們將繼承后者的至上權利（summary rights），但由于決定性的承認機制，又使自己服從當時最新的國際法的那些程式。這個悖論清晰地表現在各主權國家爭先恐后加入聯合國及其公約、議定書、下屬組織和語言中。

然而，“東南亞殖民地國家”這個正式的抽象名稱，掩蓋了結構、能力和目標的繁復多樣。最早的歐洲征服者葡萄牙人，十七世紀的時候已經被荷蘭人排擠到一邊去了，此后只在僻遠的小小帝汶島的圖上一半勉強容身。直到今天，葡萄牙像愛爾蘭似的，依舊是歐洲的第三世界國家。西班牙，這個自十七世紀以來每況愈下的宗主國，在十九世紀結束之前從東南亞掃地出門了；它對菲律賓的不通于時的前工業化統治，留下了跟其他殖民強國迥然不同的殘余。在另一端，工業大國——英、法、美、日——直到十九、二十世紀才紛至沓來，卻以它們開創的廣闊疾驟的變革，大大彌補了它們的遲來。小國荷蘭落在這兩端之間的某個地方。

而且眾所周知，歐洲的殖民地國家與該地區從前存在過的政治實體，兩者間幾乎沒有或者一點沒有匹配之處。國名足可說明事實：菲律賓是以十六世紀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的名諱命名的，除了不斷煩擾西班牙直到它結束統治的幾個新生的穆斯林蘇丹領地以外，菲律賓不包含任何真正意義的國家；“印度尼西亞”和“印度支那”這種擬古的復合詞是現代的發明和地圖上的地帶，部分或全部覆蓋了很大一批傳統王國和公國；馬來西亞是從大英帝國最后一次舊貨清倉當中興起的，它的詞尾“亞”（-ia）暴露了它的現代性。即便像緬甸和越南那種殖民地，看上去最像是歐洲人到來之前強盛的中央集權國家的直系后裔，其實跟它們相距十萬八千里。廣袤的英屬緬甸，在其存在的大多數時間里，是英屬印度的外圍部分，本來可能最終成為東面的克什米爾。在印支出現兩個講越南語的重要國家也并非難事，就像南方群島上出現了講馬來語的兩個國家一樣。同樣地，暹羅雖然幸免于殖民化，它仍然發現自己承襲了不管怎樣雜七雜八的領土，這些領土是競逐的歐洲列強留下來當作它們間的緩沖帶的。

考慮到這些形勢，二十世紀東南亞的民族主義運動在反抗利維坦的斗爭中，面對著難以克服的重重困難；這些斗爭不應由于其領袖如今多已辭世而被遺忘。除一種例外，全部優勢都在敵人那邊——財富、武器、科學知識、外部支援等等。統治者唯一的關鍵弱點是，由于他們自身的種族主義所作所為，他們成了一望而知的少數族群，興許是東南亞歷史上最早的少數族群。這里的要害在于，他們是自認的（白人）少數族群。世紀之交他們從宗主國來到這里，此時多數統治已成為宗主國政治上的合法性規范，并且這種規范正通過報紙和教室迅速向亞洲傳播。如此一來，即便在他們自己眼里，他們也不可避免地變得不合法。正是這一點最能夠解釋，為什么二十世紀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很少以絕然的帝國主義信念頑抗到底。

民族主義者有不少人深諳這個弱點，特別是曾在歐洲本土待過一段時間的那些人；從他們的觀點看，中心問題是創造一個政治多數派，一個人數眾多的“我們”。這場斗爭的性質、時機和深度，在決定二戰后那些民族國家對待疆界內新少數族群的政策上，比其他任何東西作用更大——那些國家疆界原是由殖民主義劃定的。

我們一開始就應注意到，歐洲人自然而然地是用多數（派、黨、族群）—少數（派、黨、族群）語匯進行思考的始作俑者。他們是東南亞最先實施人口普查的統治者，普查中使用的基本分類網格，不是納稅人或應征士兵，而是種族群體。[[653]](#_653_9)由于歐洲人的族群想象發生了變化，在后繼的普查中，這樣的許多種族群體事實上“消失”了，但是無疑地，幾乎所有群體首先存在于歐洲人的思維中。正是為此，歐洲人老早就尋求以他們為中心建立“多數同盟”，反對他們心存忌憚的那些群體，后者可能打出“多數派”旗號危險地與他們一爭高下。

若想有資格成為同盟伙伴，需要一定的規模、權力、現代性和凝聚力。基督教化的群體是最合適的早期例子，正是因為它們在族群時代前就已存在。十七、十八世紀的殖民主義者，往往依據宗教而非族群對臣屬人口進行分類，因為他們是從宗教方面設想敵人的。由于殖民統治者自身越來越不認真看待基督教，于是這些一度被認作基督徒群體的，就被重新歸類為種族群體。荷屬東印度的摩鹿加人和英屬緬甸的克倫人就是有益的例證。

今天，可能從人種學上歸類為摩鹿加人和克倫人的那些人，很大數量壓根不是基督徒，但他們主要是微末草民。顯要群體一直是這樣一些：他們皈依了基督教，然后接受教育，受到照顧，供職于殖民地的軍隊和警察部隊，去對付同樣被構想為種族群體的其他人，尤其是假定的多數族群緬甸人和爪哇人。到了二十世紀，喚起人們注意的，正是他們的摩鹿加身份或克倫身份，而不是他們的基督教信仰，這合乎政治類別的普遍世俗化。基督徒身份也可能在潛在的多數族群內部加以利用，就像越南那樣；或者用來創造一個超種族的多數群體，就像菲律賓一樣，在那里，直到西班牙統治終結，摩洛穆斯林的南方人始終是有利用價值的妖孽。每個事例中，基督徒在統治同盟內都被賦予一席之地，哪怕是從屬性的。

另一個重大的同盟建構策略是創造出“華人少數族群”。在這點上，印度尼西亞的荷蘭人提供了有代表性的早期實例。將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初葉聯合東印度公司（VOC）的記錄與本地記載兩相對照，我們了解到，當地法庭僅僅視之為高等官員的權貴，VOC則斥之為“果然是華人”。聯合公司迅即為這些“華人”發展出一套單獨的法律體系；他們顯然沒想到自己是“華人”，他們不認得漢字，如果他們說的話是非本土的語言，那也是彼此不通的大陸方言。公司權力的增長，意味著加大對華人的隔離，表現在諸多方面：法律地位、必需的著裝和發式、居住地、流動的可能性，等等。到十九世紀，這些政策在爪哇制造出一個不說華語的華人少數族群，它與任何土著聯盟都漸行漸遠，被套在巴達維亞的大篷車上。西班牙在菲律賓的政策殊途同歸。在暹羅，華人同化到了統治階級包括皇室家族之中，下迄二十世紀亦然，那種輕松自然，清楚反襯了殖民地族群政治其實多么違背常情。在十九世紀殖民前的馬來亞，富裕華人與馬來統治者之間關系親密，這又是一個適例。

為殖民主義的多數派游戲添入的最后一種指認的族群，是只有符號性的、準司法的重要性的那些群體。作為一個集體，我們可以把他們看作山地部落、刀耕火種的臨時農田的農夫、“石器時代人”，諸如此類。一般說來，這是些真實的或統計的群體，人數很少，地處偏遠，沒有值錢的經濟資源。

在十九世紀，以及二十世紀的多數時間里，他們通常沒人理睬，既然他們不值得花費錢財去認真管理。我們可以想想馬來亞的原住民（Orang Asli）、荷屬東印度的巴布亞人，和呂宋的山地部族。如果他們是被白人動員起來的，那么一般都是在最后關頭，為了抵抗多數族群民族主義者。占了新幾內亞島半壁江山的西伊里安，是個有代表性的例子。當地人口實際上很稀疏，分散在好幾百個小共同體中，相互間語言不通，到二十世紀他們才被正式并入荷屬東印度，然后就被仁慈地晾在一旁，直到印尼民族主義革命成功在望。然后，他們被集體地視為一個非印尼人的新興種族群體（美拉尼西亞人，巴布亞人，伊里安人，隨便什么人）的一部分，以此為據，被征召到荷蘭人的同盟中。荷屬東印度的成員，他們可以是，但印尼的成員，他們不是。

1950—1963年間，荷蘭人做出了瘋狂的舉動，不無成效地造出一個伊里安人種族群體——它最終成了民族主義集團。諷刺的是，荷蘭人成效的媒介，竟是印尼語！我們發現，英國人作為緬甸外圍族群的代言人，法國人作為他們的印支山民的代言人，動用了相似的策略，只是形式不那么極端和怪誕罷了。就民族獨立后企圖利用這些邊緣人口而言，荷蘭人也不是絕無僅有的。美國人玩世不恭地利用越南山民對付越南共產主義武裝力量，利用基督徒摩鹿加人對付蘇加諾政權；國際石油公司在獨立后的緬甸贊助了族群叛亂，利比亞和馬來西亞的馬基雅維利們援助了南菲律賓的他們的穆斯林兄弟——只要這符合他們各自不同的算盤。

當然，階級也是有的。在東南亞大多數地區，白人少數族群試圖在潛在的多數族群那些地位較高、生活富足的階級中間塑造盟友，辦法是讓他們變成地主或官僚。這樣做的靈驗程度不等。他們并非總是可以信任。在菲律賓，有些最活躍的早期民族主義者就是富有的華人梅斯蒂索地主階級的成員。另一方面，馬來西亞的老貴族階級，雖然不堪大用，卻幾乎被徹底收買。

只是還有一點尚需注意，殖民地的族群政治，在它垂死的日子里，呈現出一種重要的、特有的制度色調。當立法機構勉強開始在殖民地專制國家的甲殼內形成的時候，白人少數族群不但屢屢代表過多，而且設立了受保護的族群席位，以各種手段操縱選舉系統來獲得所需的結果。理由總是說，縱然這些種族群體往往又小又分散，但作為種族群體，它們需要特別的、有保障的代表權。之所以出現有名無實的聯盟構建，主要就是因為，這些受到承認的種族群體的代表幾乎從來不是真正選舉產生的。相反，他們是殖民政權欽點的，通常是從各群體內最有特權、最保守、最肯勾結外族的分子中指定。

長遠來看，殖民地族群政治單靠一種普查—司法基礎不可能維持久遠，必得有它自身的文化才行。而且，這種文化總有一個容易滑脫的基礎。新的人口普查分類法幾乎處處都是靠一種政治—道義地理學維系的。潛在的多數族群人口——緬族人、越南人、爪哇人——被標舉出這樣的特點：沒有雄性氣概，背信棄義，好勇斗狠，自甘墮落，還封建守舊。而誠實、勇敢、信義、真摯和忠貞等特性，盡歸于同盟的伙伴即少數族群。無休止地重復來重復去，這些刻板印象最終生效了。少數族群不但極慣常地認為新生的多數族群是墮落、怯懦或奸詐的，而且更加一本正經地認為自己又誠實又勇敢又守信，哎呀，還忠義。因此，新發現族群的這些被描繪出來的虛假特征，迅速深深扎根于疾變的政治環境中。

這些類型實際上有多易變，如果我們考慮一下殖民地在地圖上的特定伸展就能明白了。假如緬甸整個并入印度，就像它本來可能被輕易搞定的那樣，緬甸族人將成為少數族群同盟伙伴，如同帕坦人或俾路支人一般，而且最后肯定也會變得誠實勇敢忠義。假如高棉人未曾并入印度支那，我們可以確信，他們不會被當成碌碌無為、頭腦簡單的貪圖安逸者來憐憫，而將被詆毀為波爾布特的原型。在馬來亞，馬來人對英國人扮演克倫人和高棉人的角色；在沙撈越，他們又對布魯克白人羅阇（Rajah）們扮演緬族人和越南人的角色。

華人再次是個樣板。雖然直到1890年代有些東南亞華人才意識到歐洲人自十七世紀以來執意認定的事情——即他們終歸是華人，他們在獨立后的東南亞的處境早有他們殖民時期的命運為前兆。被隔離，職業受限，習慣在統治聯盟中充當低級伙伴。他們拼命地試圖讓自己適應民族主義政權，如果可能的話，要爭取隨便哪個外部強權（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美國，日本，英國，等等）的大力支持，只要他們在作為國際資本中間人的日常角色中高攀得上。

當我們轉而比較性地審視民族主義的興起時，記住殖民時代的狀況是絕對必要的，因為正是殖民經驗深刻塑造了民族主義。該地區兩個講馬來語的國家，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提供了性質各異的案例。在第一個案例中，我們須記得，全世界主要憑借一種亞洲語言施政的重要殖民地，只有荷屬東印度一家：荷蘭人對他們自己語言的威望自信太弱，又太吝嗇，以致不能向教育投資，而教育是讓荷蘭語變成通行整個群島的行政語言所必需的。因而在1920年代，行政用的馬來語得以變成印尼語（Bahasa Indonesia），這種轉變不費周章，而且已有殖民地全境的支持者。殖民地的遼闊和群島特征，致使到1870年代甚至有數百萬之眾的爪哇人也成了人口統計學的少數族群，這種狀況再兼以殖民政策的出奇保守性，很早以來就向民族主義者們指明，必須建立最廣泛的可能聯盟。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分裂得很厲害，有穆斯林、世俗民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但是他們一再試圖找到一種妥協辦法，盡量廣泛地招募人馬，不問族群出身。青年華人知識分子和職業政治人士也參加進來，成為這派那派的民族主義者，而不是首先是華人。即便是在得寵的基督徒摩鹿加人中間，他們也采取積極措施進行招募，雖然成效不大。如果民族主義運動有一個非白人的敵人，那它就是在荷蘭人的多數派中構成關鍵的次屬成分的通敵貴族階層。殖民地之為階級沖突所分裂，遠超其他沖突。反殖革命的經歷只是加劇了這些趨勢。引人注目的是，在印尼舉行過的唯一自由選舉（1955年）中，初露頭角的族群政黨盡數表現黯淡，四大意識形態政黨盡皆從所有種族群體中募得新人。當獨立后族群對抗（有些被美國利用了）增強的時候，所產生的武裝叛亂，除了一次例外，都以提升本族群在印尼之內的地位為目標，那次例外是分離主義的（基督教）南摩鹿加共和國。每次對抗中，政府都有出身于這些種族群體的國家領導人真心實意站在它的一邊。如今，印尼政治的基本特征依舊是階級沖突，族群政治扮演著次要角色。看看兩次極明顯的例外，政府對于西伊里安和前葡萄牙殖民地東帝汶的政策，我們即可了悟這一點。所有種族群體的印尼人通通認為伊里安是祖國的組成部分，伊里安人是印尼人同胞。他們自覺其雙重認同：既是種族群體的一員，又是國家的一員，所以他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伊里安人就不能心平氣和地跟他們一樣。1960年代，有一場真正的民間運動，要將伊里安的印尼人同胞從荷蘭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1963年主權移交的時候，自群島各地奔來的許多理想主義人士自愿為當地人效勞。就算是今天，前往西伊里安的移民來自諸多不同地區，特別是蘇拉威西和摩鹿加群島。但是1965年后軍隊起而掌權，那支軍隊由于某些多屬偶然的原因，于今掌握在爪哇人手里，卻以為自己是印尼人的軍隊；而伊里安精英層又受了荷蘭人鼓勵，自認為是一個初長成的巴布亞國的領袖，于是他們與雅加達政權間不可避免的沖突，就日益被放在族群視角下加以闡明了。島上寶貴的礦產資源的發現，進一步刺激了實質上代表階級利益的這個政權像對待有著滾滾財源的其他每個地區那樣對待西伊里安。同樣，蘇哈托政權1975年對東帝汶的入侵，以及自那時以來的野蠻占領，過去沒有、我相信現在仍然沒有任何充分的族群動機。該政權認為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Fretilin）的左翼獨立政權威脅到它的權力，決心斬草除根，不管當地人要付出何等代價。誠然，也許恰恰因為蘇哈托政權不認為東帝汶人是印尼人，它才這樣更加冷酷無情。

馬來西亞表現了對比鮮明的一個案例，族群身份在那里完全支配了政治生活。這個人煙稀少的半島，需要大量勞動力才能讓興旺的錫礦和橡膠種植園運轉起來，這導致英國殖民當局在1870—1930年間輸入了無數華人（從中國東南）和印度人（從馬德拉斯管區）。人口流入如此之巨，以至于到二戰爆發前夕，移民數量超過了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本土人口。因而殖民政權企圖這樣來創建它的二十世紀政府：不但招募本土的馬來人上層階級當官，還招募作為整體的馬來人少數族群。于是在印尼民族主義興起兩代人之后，馬來民族主義出現了，雖然它不過爾爾；它以對抗當地華人為職志，遠甚于對抗白人；馬來語表現為一種族群語言，而不是一種超族群的政治溝通手段。在各個階段，英國人都同他們的當地伙伴密切合作，旋即產生了司法和政治上基于族群的管理等級制。獨立后的馬來西亞政府，幾乎事事直接追隨殖民時期英國人政策的路數。英國人的豐功偉業在二戰后的初期來臨了，當時它面對著馬來亞共產黨的武裝起義。由于社會結構方面的原因——種植園和礦山勞動力那種偶然的族群構成，馬共密集地在華人中吸收成員，但是它并不自認為是個族群政黨，千方百計想讓馬來人農民和內陸山區的“部落”原住民加入。英國人逮住這個機會，污蔑起義者首先是族群成員，在打擊他們時把族群政治玩到極致，最要緊的是剝奪了華人社群很大部分人的公民權，強化了保守、聯英的馬來人領導層的地位。自從1957年遲來的、平心議定的獨立以來，政治依舊沿著族群分界線制度性地分裂；想要打破這種模式的一切真誠努力，都被毫不手軟地壓制了。

然而事實上，結果并不像人們可能預料的那么壞。馬來西亞的政治謀殺一直比印尼低得多，即便是按人口比率來算。華人這個近乎多數的族群，人數太龐大了，經濟上太重要了，國際上的關系太好了，不能夠對他們大開殺戒。馬來的多數派政治令馬來人政治領袖堅持說，東馬來西亞的本土非馬來人民（達雅克人、卡達山人，等等），其實是馬來人；他們還鼓勵馬來原住民的馬來化；他們與其說是壓迫或遏制這些人民，不如說是拉攏他們加入虛構的馬來多數族群。這的的確確對這些新成員的身份認同構成了威脅，但是起碼在當地看來居心還算良善，這些群體較明智的領導人應當利用這種居心。

至于華人，形勢復雜一點。馬來西亞推行的極端形式的族群政治有一樁咄咄怪事，那就是華人對它的維持至關重要——而且不只是出于經濟原因。由于過去二十年里馬來人精英層損民以自肥，馬來人社群內部的階級沖突已經表面化。若非存在著華人的威脅，這些沖突必將變成馬來西亞政治中的關鍵裂隙；結果，轉彎抹角地，華人竟是現存政治結構的延續所必不可缺的。雖說如此，延續現行的政治安排也以一種狹隘的馬來人方式，加強了國家安全機構；也延緩了馬來半島上真正公民社會的到來。

位于這兩個截然相對的例子中間的，是緬甸（靠近印尼一側）和菲律賓（靠近馬來西亞一側）。如同在馬來西亞一樣，緬甸的英國人實行了一種不尋常地復雜而果決的族群政治。殖民地立法機關包含了指定的少數族群代表，他們是從有限的（主要是印度人和華人）選民中挑選的。緬甸有大片大片的地區被隔絕開來，成為所謂“表列地區”（Scheduled Area），由仰光直接、獨斷地統治，完全不受立法系統管轄。這些地區居住著英國人定為中國人、克欽人或撣人的民族，通過征聘其成員作為忠心、傳統的領導者——幾乎總是在最保守、最有特權的部門，同盟的構建就實現了。只要國內安全系統配備的是當地人員，這些人就大量募自普查的少數族群，特別是克倫人（識文斷字的基督徒克倫人）。殖民地軍隊也是循著族群分界線組織起來的。

如同在印尼那樣，起源于城市中心的民族主義運動，在調動起一個政治多數派上面臨著可怕的困境，可是它精神抖擻，全力以赴。格外引人注意的是，殖民時期不存在族群性的反殖政黨或組織。反殖的最終組織形態，即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包含了出身于各大少數族群的人們，如印度人和華人。同樣地，在1945年后的時代里，主要反對派也從各大少數族群招兵買馬。像在印尼一樣，有一種努力（用了照例必有的含糊其辭）要創造雙重認同；一個人完全能夠既做好阿拉干人、孟族人或緬族人，又做好緬甸國民（Burmese）；正如一個人可以是米南加保人、巴厘人或爪哇人，又是印尼人。只要這種民族主義還有本土的目標對象，其中就會包括英國同盟的外圍成員，即緬族官僚、基督徒克倫人警官和撣人貴族。

但是緬甸在兩個核心方面有別于印尼。一則是它有一個現實的人口統計學的多數群體，它被設想為族群：照人口普查來看，緬族人的數量超過了其他所有種族群體相加之和，而緬甸語不能像印尼語有幸成為的那樣，毫不含糊地成為超族群的語言。二則緬甸運氣不佳，不是一個自由漂浮的群島。它跟印度和東巴（后來的孟加拉）、中國及泰國接壤，與每個鄰國都同有某些少數族群。這些鄰居個個都以不同的方式，出于不同的緣故，通過向緬甸政治舞臺內部的角逐者提供庇護所、資金、武器或政治支持，介入緬甸政治。

記得這一點也很要緊：戰后獨立的緬甸政府極其虛弱。1947年，緬甸的民族主義英雄昂山被一個敵對的緬族政客暗殺，一年之內，政府淪落得要保衛首都本身。醒目的是，反對派根本不是首先出于族群因素，而是來自兩個多族群的共產主義政黨，還有基督教的克倫族軍事人員——后者一時接受了英國的暗中軍事支持，擔心一旦英國人走了，他們前途難料。所有這些集團都想要中央的權力，不是要與之脫離。雖然1950年代又有其他武裝集團加入這些造反者行列，包括有些帶著族群標記的群體、靠毒品撐持的軍閥，以及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逃竄而來的國民黨軍隊的殘兵難民，但動力依然如故。政府和它的敵人都在尋求多族群的聯盟。只有1960年當選的吳努政府才犯了明顯排他性的錯誤，企圖定佛教為國教，這個過失在1962年后被奈溫的軍政權糾正了。

如同在印尼一樣，緬甸較深的沖突線仍然是階級沖突。人們常說1962年發動的國有化的激進計劃是針對印度人和華人少數族群；但事實上這一攻擊對付的是一般而言的后殖民中產階級，包括各種緬族群體。軍政權想要在跨越族群分界線的農民和工人中間樹立牢固的階級基礎，發現自己面對著許多族群精英，他們有英國人撐腰，一度避難于“表列地區”。并不使人驚奇的是，這些精英自命為與緬族宰制相抗衡的族群身份的捍衛者，試圖以此守住他們的地位。

相對于緬甸，菲律賓形成了顯著的反差。該國含納的種族—語言群體遠多于緬甸，可是族群本身在它的政治中僅扮演了次要角色。要解釋這種局面，有兩個因素須得謹記。第一，三個多世紀的天主教殖民主義和福音傳道，到二戰時造成了90%的人口是基督徒，無論怎么說這都是一個龐大的多數群體。第二，由于復雜得此處難以深究的種種原因，殖民統治產生了一個強勢的華人—梅斯蒂索人大莊園主上層階級，他們跨越種族—語言界線互相通婚，在掌控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上利害與共。實際上，菲律賓是東南亞存在這樣一個樹大根深的地主上層階級的唯一地方。它在菲律賓天主教中擁有巨大的多數派基礎，這給它平添了權力和能力，恰恰為此，它發現從美國人手下獲得政治獨立輕而易舉，此時距美國人從西班牙人和反西革命分子那里奪取這塊殖民地還不足五十年。同樣的因素使得上層階級漠視與南部穆斯林少數族群建立強固聯盟的任何需要。甚而引人注目的是，這些穆斯林人受到粗暴對待，不是當作族群，而是當作宗教的離經叛道者。不奇怪，這最后造成了現代東南亞歷史上為數不多的真正分離主義運動之一。

從前文我們可以得出什么結論呢？首要的是，族群政治根源在現代，不在古代歷史中，它們的狀態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政策決定的。（未經殖民化的暹羅，族群政治是東南亞地區最輕微的，這可不是偶然造化。）其次，族群性與宗教和階級的更深層力量錯綜地絞結在一起。從這個角度來看，考慮將少數族群分為三種類型，相應地各具不同的問題和前景，或許不無裨益。

在所謂外來少數族群中，最顯明的例子是華人。如今華人壓倒多數集中在城市中心與當地經濟的較先進部門，他們的未來難解難分地捆綁在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上。在天主教的菲律賓和佛教的暹羅，他們做出了必要的文化順應，形成那些社會上、中層階級整合無間的組成部分。在印尼和馬來西亞，由于荷蘭與英國的殖民地政策，這種整合遠為不足；然而華人是這兩國現存政治—經濟秩序的運行所斷不可缺的，他們依舊掌握著與其人數極不相稱的經濟權力。這兩國最大的差別在于，印尼的人口統計學因素排除了華人以這種身份提出族群性要求的可能性，而馬來西亞的同樣因素卻激發了多數主義希冀。只在東南亞的這一大國中，華人身份才是中心政治議題。不用驚訝，華人遭遇最慘的國家一直是印度支那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緬甸，這與其說是因為他們的族群身份，不如說是因為他們的階級地位。

值得結盟的本土少數族群這一門類，指的是這樣一些種族—語言群體：他們的人口統計學規模與政治經濟的復雜性，足可使之成為全國性聯盟政治的重要選手。然而同樣這些特征也表示，每個群體都被按照階級——有時還有宗教——從內部割裂了。它們還總是意味著，群體的文化同它一個世紀前的樣子關聯不大，群體的認同是一種現代的認同，不管怎樣用意識形態來解釋它。無論我們想到的是克欽人、伊洛卡諾人還是米南加保人，他們都已積極參與全國性政治多時了，而且是在不同的聯盟里，他們在大多數意識形態陣營和社會階層都有代表。難于想象有任何形式的國家政權，竟會將他們排除在外。不同政權只會引來他們的不同階層，其族群性將借此表達出來。然而我們也應當預料到，他們的重要程度會與時俱變，還會根據國家系統內可能選手的數量而變。選手數量越大（如印尼），靈活的聯盟政治的發展余地就越寬；數量越少（如馬來西亞、緬甸），不對稱的拘執幾率越大。所有這些群體都習慣了一定程度的雙語使用，因為他們廣泛參與了現代教育體制和現代政治。他們的前途看來不太灰暗；政治、意識形態、教育，常常還有經濟，都離不了他們。

在這個類別之外，是對可想到的任何多數派都可有可無的那一切群體，因為他們人數很少，地理上遠離政治中心，對國民經濟微不足道，缺乏西式教育。一般而言，他們在殖民地民族主義政治中無所作為，因而不便對獨立后的民族主義政權輕言要求。司空見慣地，他們的內部分層程度很低，他們的職業多樣性亦然。在國立大學或國家軍隊的軍官隊伍里，很少能找見他們的成員。有些情況下，全國性的共產主義政黨培養過他們，但這往往給他們招來沉重的鎮壓。因此他們難以在每個陣營有立足之地，更遑論在其中舉足輕重。

多數情形下，他們的卑微愿望不過是別打擾他們，或者讓他們恬然自適，慢慢適應外部世界。但是這個外部世界——不光是民族—國家，更重要還有全球權力的大發動機，不會聽任他們自然發展。他們可能坐守在外界覬覦的寶貴礦產或森林資源上；他們的生存農業可能被國際官僚和國家規劃者認為是破壞生態的；人口的壓力可能驅使低地人走上人們的山區僻地；他們還可能很倒霉地住在敵對國或敵對世界集團之間的敏感邊境上。就是他們的與世隔絕讓他們不懂私有財產的儀軌慣例、聯盟政治的手法，甚至不懂現代自我防衛所需的組織辦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通常不是種族群體；為了存活下去他們可能不得不學會依種族群體的身份去思想與行動（這很像最近美國印第安人或土著美國人不得不被想象成種族群體，以便保衛那些不然就有滅絕之危的多種多樣的群體）。然而變得族群化——亦即參與民族—國家之內的族群多數派的政治和經濟活動，這其中的代價也不要小覷了。它常常意味著成為基督徒（在暹羅或印尼），要不就是穆斯林（在馬來西亞）。它幾乎總是意味著他們曾經享有的那種文化的自主與自足的完備走到了盡頭。最能說明這種苦澀的矛盾的例證，是過去二十年里伊里安和東帝汶族群認同——以及潛在的民族認同——的出現。這些認同是美洲印第安人式的認同，因為它們就在試圖保衛種種非族群的地方性認同的過程中，隔斷和遮覆了后者。在命途多舛的環境下，這樣的認同可能招致蓄意的壓迫而不是有害的忽視，但是它們也開辟了一條路徑，可以發展出一種必要的政治、經濟上討價還價的能力。或許，在二十世紀的末尾，這是唯一的出路吧。

# 第四部分 所遺何物？

## 16 倒霉的國家（El Malhadado País）

### 一

今后，原住民將不被喚作印第安人或土人；他們是秘魯兒女，是秘魯公民，他們將被稱為秘魯人。

何塞·德·圣馬丁

我來到佛羅倫薩是為了把秘魯和秘魯人忘掉一個時期，但想不到今天早晨卻又撞上了這個倒霉的國家。（Vine a Firenze para olvidarme por un tiempo del Perú y de los Peruanos y he aquí que el malhadado país me salió al encuentro esta mañana de la manera más inesperada.）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

文明的記錄，無一不同時是野蠻的記錄。

沃爾特·本雅明

在過去兩百年的相當長時期里，敘述國家似乎大體上是一樁簡單明了的事情。成群結隊的歷史學家，有優秀的有蹩腳的，在民俗學家、社會學家、統計學家、文學批評家、考古學家，當然還有國家本身的協助下，制造出汗牛充棟的著作，幫助現有的和將來的公民們想象他們政治共同體的演變史和前景。在他們的方法、取向、資料庫和政治觀點方面，能想到的差異或許應有盡有，但這些“歷史學家”往往認為他們的文本是“文明的記錄”，或者說是進步的故事，不管這進步多么蜿蜒曲折，因為國家總被視為具有歷史的真和道德的善，毋庸多疑。各種政治的和其他的理由擺在那里，讓我們深信這樣的著作之流會無限延伸，既然民族—國家需要它，而且在廣闊的公共舞臺上，民族—國家的合法性仍然被普遍承認，甚至備受強調。

不過，至少書寫的工作是日見其難了。越來越多地，這種工作是熟練工的團隊和委員會在干。越來越多地，清晰的“敘述線條”（narrative line）被攪得模糊難辨，模糊它的，是長時段（longue durée）的統計分析，還有來自世界史（Weltgeschichte）、女性主義理論、第三期的馬克思主義、身份政治等等的攪和。今天，能夠憑一己之力認真承擔起敘述國家之任的、有真才實學的歷史學家是非常罕見了：尤其是因為這樣的人常常慎思過本雅明的錐心的格言。事情的真相是，團隊生產的國家史，就照我們這個世紀的晦暗末葉所出版的那樣，喚不起如火的熱情，甚至好像還引出些許不安。

但無論如何，歷史學家注定要被取而代之，被他們的年輕接班人，也被歷史時間自身的流逝：對此他們了然于胸。他們被人追念的最大希望在于這一種發展機會：追隨修昔底德、塔西佗、吉本、米什萊和布克哈特的足跡，從歷史學的移動宿營地悄悄擠進文學的安定靜居地。然而在這些封神封圣的靜居地，他們又不經意間接觸到較優秀的小說家——還有別的人。如果他們在仍和我們相隨的民族主義時代完成工作，他們會發現自己面對著令人生畏的競爭。

我在《想象的共同體》中主張說，作為大眾商品的小說的歷史性問世，與民族（nation-ness）的興起密切相連。民族和小說二者都是為同時性所化育，同時性則因源于時鐘的、人為的“同質、空洞的時間”而成為可能；然后，它們又由“社會”所構成，后者被理解成一個有界的、處于歷史之內的實體。這一切給人類開啟了道路，可以想象跨代的、明確劃界的大共同體，組成共同體的是絕大多數彼此素昧平生的人們；還可以推定這些共同體在向著無盡的未來不停滑行。小說作為一種文學體裁的新穎性，就在于它能夠共時地表征這一有界的、位于歷史之內走向未來的社會。（民族史學將以歷時性敘述補充這種共時性。）

這條論證思路，今天在我看來并非一無是處，不過它導向了一條未申明的假設，即民族和小說間的那種深層的原初親和性意味著它們將始終互相契合：民族將繼續充任小說的自然架構，雖則是沒明說的架構，而小說將總是能夠在不同水平上表現民族的現實和真理。對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葉而言，做出這條假設相當容易。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左拉的皇皇全集，甚至還有普魯斯特的作品集，都給我們提供了對他們那個時代法國的無與倫比的敘述；梅爾維爾和馬克·吐溫之于美國，狄更斯、艾略特和勞倫斯之于英格蘭，托馬斯·曼和穆齊爾之于德國和奧地利，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岡察洛夫之于俄羅斯，谷崎潤一郎之于日本，皆可作如是觀。[[654]](#_654_9)在亞洲和非洲某些新近非殖民化的地區，這種能力依然十分醒目。

然而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這種親和性已經明顯褪色了。小說從前那個頗為統一的世界，已經通過市場細分的宏大過程在崩壞：哥特式小說、犯罪小說、偵探小說、色情小說、科幻小說、“機場”小說，還有嚴格的歷史小說，它們各有其形式慣例和讀者群，后者絕非必定是作者的國人同胞。在譜系另一端，早期現代主義革新的一個關鍵層面是嘗試著超越或擾亂“同質的、空洞的時間”。從民族這方面看，事情也在飛快變化。1945年，（自認為是）沒有國家的民族，數量肯定大于有國家的民族。今天情況不復如是。有國家的民族——民族—國家——越來越不需要小說。這一點的最好標志是兩個機構的普遍存在：信息部和文化部，一個世紀前人們幾乎聞所未聞。民族的表征越來越多地處于它們的監管之下，而且成了視聽媒體的工作，由專業化的政府公務員和廣告人之流擺弄著。越來越多的昔日偉大小說，為了得到一個被人賞鑒的機會，必須忍受時代誤植的侮辱，被好萊塢拍成電影，被BBC分集連播，[[655]](#_655_9)或者通過標準化的全國課程向青少年強行灌輸。

除了以上這些，由于本書別處討論過的種種原因，我們這個世紀的艱難時世讓十九世紀民族主義的至少部分烏托邦成分可信度日衰，對它們而言，普世進步是基本原理；最富才華的小說家由此受了影響。這不等于說其他本原性的烏托邦成分不會頑強存活下去，而是說它們面臨著意義的矛盾，上個世紀的大小說家們可不曾感到被迫窮于應付這些。

讀過幾遍多麗絲·薩默（Doris Sommer）的《核心小說》之后，我想到了：要審視本世紀末期的作家還可能怎樣力圖描繪民族這個問題，最佳地點是拉丁美洲。[[656]](#_656_9)西半球包含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大批民族—國家，它們幾乎全是反抗歐洲宗主國中樞的那些革命斗爭的產物。但是美國和海地太自成一格了，不適合進行方便現成的地區內比較；它們是其中最老資格的民族—國家，一個興而做了世界霸主，另一個衰而落入窮途末路。然而余下部分（巴西除外）卻共享著一種優勢語言和宗教，也有國內暴力肆虐的相似歷史。這個地區造就了本世紀最杰出作家的一部分，可是如果要誰舉出其中某個民族—國家，說它的當代形勢理當讓人由衷樂觀，那他大概要大犯其難了。

薩默利用了上述這一切，尤其是拉丁美洲使用西語的許多民族—國家所提供的從事比較的無雙機會，去思索一個多世紀里民族—小說關系的命運。她的闡釋很復雜，盡管我對它感恩不盡，此處還是不能多有論列。論證的一部分是從這樣的觀察開始的：這個地區與眾不同，因為只是在獲得了正式的國家地位以后，小說才盛行開來。[[657]](#_657_9)于是在它的青年時期，小說主要和這種時代結伴而行：經歷了革命戰爭及其元首橫行的后繼局面的多難歲月以后，人們不遺余力地創造秩序和進步。她把十九世紀那些公認的“經典作品”解讀為多種多樣的努力——其中有些比別的更見成效，要吸引公民—讀者參與到鞏固國家的工程中來。實現這個目的的首要法門，是讓這樣的讀者卷入情侶們浪漫的苦樂之中，那些情侶典型地被塑造成體現了后殖民社會的最尖銳沖突：地區之間、物質環境之間、經濟制度之間、階級之間、種族之間的沖突。在這樣的小說中，色情被民族化了，民族主義本身被色情化了。情人們幸福的障礙，被認為是民族福祉的障礙；他們幸福的獲致，或至少在望，被當成民族的烏托邦未來的預兆。[[658]](#_658_9)薩默論點的最后一部分是，由于“統一和發展的希望”消逝了，繼續生產出帶著這種民族構建色調的優秀小說的可能性與時俱減了。“魔幻現實主義的”悲觀論的興起，從較長時段來看，不僅是對十九世紀民族主義“天真的樂觀主義”的傾圮做出的反應，也是因感到二十世紀拉美馬克思主義運動未能為民族進步別開生面而做出的反應。但是結果證明“魔幻現實主義”并非唯一的可能之事，或許甚至不是最有教益的可能之事。

幾年前，當我第一次閱讀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奇異小說《敘事人》（El Hablador）時，我立即覺得又碰上了比較的幽靈；因為它立即讓我的腦海里浮現出印尼巨匠普拉姆迪亞的《布魯四部曲》，在一段更久遠、相輔相成的時期里，還有菲律賓民族英雄何塞·黎剎的偉大的西語小說（它們是獨立前的煽動性小說，拉丁美洲可從未見識過）。何以故？《布魯四部曲》最初是作者在望不到頭的1970年代，在印尼的魔鬼島即布魯島上，向他的難友們口述的；它也是一項卓絕的、莊嚴肅穆的努力，要在“這個霍亂時代”書寫民族；它還是以“魔幻現實主義”為對照/參照而寫出來的。[[659]](#_659_9)（這一章不是詳論普拉姆迪亞的地方。但是需要寥寥幾句說明的話，將“東南亞”和“拉丁美洲”之間的空間/時間連接起來。）前三部是以第一人稱敘述的，附帶了不少歐洲古典教育小說（Bildungsroman）的東西，近似于薩默研究過的那種民族小說。[[660]](#_660_9)它們給讀者展示了，在1900年代初期，一個有特權的、受過很高教育的年輕爪哇男子，是如何拜形形色色的外國和本土導師之賜，而漸漸發展出民族意識和良知的；這種經驗又是怎樣引導他去開創民族主義運動的。對第四部，讀者們肯定會大吃一驚。原來他們迄今讀到的一切，都源于殖民地秘密警察的卷宗，特別是一個職位很高但不公開露面的土著民的文件。這個土著民講述了《玻璃屋》，他的使命就是跟蹤主人公，直到后者早死、繼而在政治上被遺忘，書中把他表現得被他的受害人弄得神魂顛倒，迷了心竅。事實上他是如此魂迷心亂，竟公然到處暗示說，他篡改了卷宗里的記錄，因而那些記錄不再能夠斷然認定為純凈無瑕的真相。[[661]](#_661_9)最后，普拉姆迪亞的本國讀者（這些小說遭禁了，但半秘密地流傳著）知道，殖民地時代任何時候都不會容許任何土著民成為秘密警察的頂級官員。這種晉升要到五十年后才出現。《玻璃屋》的文件保管員和文件編檔員—篡改者——也是最終的敘事者，是一種敵托邦的預期敘述。但是他敘述著，他敘述之物的范圍，不外乎就是民族。

我想有必要先講這些半是離題的話，然后再轉到對《敘事人》的細致講述和反思上，那將占去本章余下的篇幅。它們呈現了一種視野，可以說是從東南亞用望遠鏡觀察一部世紀末的、拉美/西班牙/秘魯的民族主義杰作。幾乎不消說，我運用西語的能力很有限（僅有的一點是跟黎剎學的），我的拉美和秘魯知識更是匱乏。的確需要強調的是，下文是探討《敘事人》，不是對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全部作品的總論，也不涉及他的生平，盡管這部小說包含了顯是自傳性的豐富成分。

最后再插兩句話：秘魯一千六百萬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四倍于意大利的國土上。圣馬丁正是向秘魯兒女和公民們發出了他那解放的/滅絕主義的著名諾言。

### 二

略薩這部小說一開頭就是敘述者（我們或可叫他“MVLl”，但后邊我將稱之為N.）在佛羅倫薩，他在那里已暫趨于忘掉他的“倒霉的/受詛咒的”國家，還有他的秘魯同胞。[[662]](#_662_9)但是他的目光被街邊的櫥窗吸引住了，櫥窗里包含了三四幅照片，它們“使我驀然回味起秘魯叢林地帶。寬闊的河流、高粗的樹木、老朽的獨木舟、架在支柱上搖搖欲倒的茅舍，還有那一群群男男女女，他們半裸著身子，涂抹了油彩，從閃光的照片上不眨眼地注視著我”（第7頁）。[[663]](#_663_9)這些照片系一位后來病故的意大利人所攝，“既不蠱惑人也沒有藝術感”（第8頁），它們是關于秘魯亞馬遜地區的一個遙遠部落瑪奇根加的，它“就在不幾年前實際上還與文明隔絕，以一兩個家庭為單位散居四方。只是到了目前，這些單位才開始群居在照片拍下的地方，但仍有許多還住在叢林里”（第8頁）。有兩幅照片，N.從中認出了“新光”和“新世界”這兩個新村落，三年前他到訪過那里，當時他是暑期語言學院（the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的客人，該學院則是一個有爭議的美國新教宣教士組織。然而讓他著魔的那幀照片，表現了入神的瑪奇根加人，沐浴在余暉中圍成一圈，中間站著一個男人，很大程度上處于濃重的陰影中，正在揮手講話。他立刻認識到這個男人是個有特殊角色的人物，這種角色翻成西班牙語，可以說就是hablador：敘事人，話匣子，大喇叭，饒舌者，吹聊齋的人？（稍候我們將考察這個問題。）

第二章里，N.把我們帶回到1950年代初，那時他是圣馬科斯大學的新生，跟薩烏爾·蘇拉塔斯交了朋友。薩烏爾有個外號，叫“鬼臉兒”，因為他的右臉上長了碩大一塊黑紫色胎記。我們得知他是堂·所羅門的兒子。堂·所羅門是在1930年代移居秘魯的波蘭猶太人，他和一個幾乎目不識丁的天主教克里奧耳女人同居了一段時間，薩烏爾出生后才娶了她。然后為了家庭，堂·所羅門改宗天主教，但“從未被承認”。他的妻子因癌癥早逝以后，父親帶著兒子搬到利馬。于是堂·所羅門重新皈依猶太教，還把他的小男孩領去城里的猶太教堂，孩子不勝其煩。這兩個男人相依為命，和一只饒舌的鸚鵡（un lorito hablador）一起住在父親的小店鋪里。鸚鵡名叫格雷戈爾·薩姆沙（第12頁）。我們順便了解到，薩烏爾在所有作家中最推崇卡夫卡，《變形記》都會背了。

有個假日里，薩烏爾去拜訪了住在秘魯亞馬遜地區邊緣的一個親戚，之后他對秘魯本土小部落的生活興趣日濃，傳教士、割膠工人、礦工、伐木工以及這個民族國家的推進，使它們面臨滅絕的威脅。后來證明他尤感興趣的是尚存的瑪奇根加。他開始專心致志于人類學，對他的大多數大學同輩（包括N.）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漠不關心。第二章花了很多文字，講述N.和薩烏爾之間就后者的叢林經驗展開的討論。薩烏爾總是說：“人們在亞馬遜地區干的事簡直就是犯罪……你設身處地為部落想想，哪怕只想片刻時間。他們還有能去的地方嗎？幾個世紀以來人們把他們從自己的土地上驅走，把他們擠入大森林，每次越擠越深。然而令人驚異的是，盡管苦難重重，他們并沒有消亡……難道你不該對此脫帽致敬嗎？”（第22頁）N.回憶道：“有時……我會故意逗引他。說破究竟，他到底想干什么？為了不改變一小撮部落——它們不少還停留在石器時代——的生活方式和信仰，難道秘魯的其余部分就應該放棄開發亞馬遜地區嗎？為了讓七八萬亞馬遜土人繼續平靜地拿弓箭彼此射殺、施行縮頭術和膜拜王蛇，難道一千六百萬秘魯人就得放棄四分之三國土上的自然資源嗎？……不，鬼臉兒，我國不能不發展。馬克思不是說過嗎，進步總是伴著流血而來的？這樣做不管有多悲慘，都只能加以接受。我們別無選擇。對一千六百萬秘魯人而言，如果發展與工業化付出的代價只是讓這幾千赤身裸體的人必須理發，洗去身上的紋飾，變成混血人——或者用人種學家極其可憎的字眼來說，是受了同化——唉，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第23—24頁）薩烏爾認為他的印第安人不管怎的更高等嗎？“高等？不，我從沒這樣說過或信過，老弟……也許更低等，如果根據嬰幼兒死亡率、婦女地位、一夫多妻制或是一夫一妻制、工藝和工業來提出問題的話。別以為我在把他們理想化，我絲毫沒有這個意思……那里有很多東西會讓你厭惡透頂，老兄，我不否認這點。”（第26—27頁）薩烏爾接著提到說，有些部落把生下來就帶有生理缺陷的嬰兒殺掉，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存活不了。“‘我就通不過這種考試，老兄。要是我，他們早就把我消滅掉了……據說斯巴達人就是這樣，對吧？他們會把像格雷戈里·薩姆沙那樣的小怪物從塔伊耶托斯山頂上扔下去，是不是？’他說著，笑了。”（第27頁）“‘但是他們對遭遇事故活下來的人卻很寬宏大量……我們沒有權利消滅他們。’”（第28頁）他問N.是否真想將他們變成“‘像利馬街頭那些半開化的土人那種呆頭傻腦的人和漫畫式人物’”。（第28頁）

隨著時光流逝，事情變得很清楚，雖然薩烏爾完成了人類學學士學位，目的是讓老父高興，他卻開始深信人類學是不道德的，無意做一個學者。這兩位學院的朋友，在他們同時待在圣馬科斯大學的最后年月里，漸漸疏遠了。

第三章是這樣開頭的（要感受它的力量，我們應當先在西班牙原文中凝神默想它）：

Después,los hombres de la tierra echaron a andar,derecho hacía el sol que caía.Antes,permanecían quietos ellos también.El sol,su ojo del cielo,estaba fijo.Desvelado,siempre abierto,mirándonos,entibiaba el mundo.Su luz,aunqué fuertísima,Tasurinchi la podía resistir.No había daño,no había viento,no había lluvia.Las mujeres parían niños puros.Si Tasurinchi quería comer,hundía la mano en el río y sacaba,coleteando,un sábalo;o,disparando la flecha sin apuntar,daba unos pasos por el monte y pronto se tropezaba con una pavita,una pérdiz o un trompetero flechados.Nunca faltaba qué comer.No había guerra.Los ríos desbordaban de peces y los bosques de animales.Los machcos no existían.Los hombres de la tierra eran fuertes,sabios, serenos y unidos.Estaban quietos y sin rabía.Antes que después.（第30頁）

［后來，地上的人們開始流浪，向著正在下墜的太陽直奔而去。從前，他們待在同一個地方，不流浪。太陽是他們天上的眼睛，固定在適當的位置。永遠睜著，不眠不睡，看著我們，溫暖世界。太陽的光芒極為強烈，塔蘇林奇卻經受得住。沒有傷害，沒有狂風，沒有暴雨。女人們生出純真的孩子。塔蘇林奇想吃飯了，就把手伸進河里，撈出一條鯡魚，搖頭擺尾的；要不他漫無目標地放出一箭，穿過林子走幾步路，馬上就發現了被箭射中的一只小野火雞，一只山鶉，或是一只喇叭鳥。從不缺少食物。沒有戰爭。魚滿河，獸滿林。瑪斯柯人還不存在。地上的人身強智明，鎮定團結。他們心境平和，不慍不怒。這是后來以前的事。］

這長長的一章剩下部分就這樣不具名地進行下去，在這過程中讀者開始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瑪奇根加的宇宙論、歷史、恐懼和日常生活。在斷斷續續的間隔中，他們的世界被“倒霉的/受詛咒的秘魯”這個黑暗的外部勢力刺入的種種意象出現了：比如，有幾處提及“割樹出血”的恐怖時期，讀者可以理解為1900—1918年短暫的橡膠熱；還提到過“白人神父”，那顯然是傳教士。但是誰在講述這一章？臨近結尾時我們才被告知他必定是什么人：

Apenas asomaba su ojo del sol en el cielo se ponían bajo techo,diciéndose unos a otros:“Es hora de descansar”,“Es hora de prender las fagotas”.“Es hora de sentarse a eschuchar al que habla”.Así lo hacían:descansaban con el sol o se reunían a oír al hablador hasta que empezaba a oscurecer.（第62頁）

［太陽的眼睛剛一在空中露面，他們就躲到屋頂下，互相說道：“該歇著了。”“該點柴火了。”“該坐下來聽那人講故事了。”他們就這樣做了。他們日出而息，或聚聽敘事人講說，直至天色暗淡下來。］

到第四章，N.又把我們攥在手心了。他敘述了1958年中期，在他動身去西班牙深造的前夕，一位朋友給他提供了一架小飛機上的位子，那架飛機要把暑期語言學院的宣教士們送往亞馬遜地區。他回想起圍繞該學院的爭議，許多人認為它是美國佬、新教徒和英語語言帝國主義的代理人。[[664]](#_664_9)這次旅行給N.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即便四分之一世紀后在佛羅倫薩仍然歷歷在目。“這也是秘魯，只是在那時我才完全意識到它：一個尚未被馴服的世界。”（第71頁）對土人的剝削令他驚駭，但是“有過這樣微乎其微的機會嗎，一個秘魯政府，不論政治傾向如何，愿意承認部落在叢林里的治外法權？顯然沒有。既然如此，何不改變維拉科查人（Viracochas，瑪奇根加語，表示‘秘魯人’——我們姑且這么說好嗎？），好讓他們換種方式對待土人呢？”（第76頁）接著發生了與施耐爾夫婦的會面，他們是一對富有同情心的、年輕的美國傳教士夫婦，講到了“支離破碎的瑪奇根加社會業已墮入的那種衰敗、悲觀的深淵”（第80頁），讓N.大為震驚。施耐爾先生描述了他們無休無止的潰退：因為印加人，因為西班牙征服者，因為天主教傳教士，因為各種形態的資本主義。他們沒有酋長，核心家庭之外別無組織。他們沒有固定的個人名字。他們數數只能數到四，超過四就說是“多”。自殺很頻繁。他花了整整一年時間想跟他們有所接觸，最后他做到了，僅僅因為他決定光著身子去找他們。N.記得自己很欽佩施耐爾夫婦幾乎像瑪奇根加人那樣生活的意愿，盡管他們有水上飛機、無線電、現代醫藥和《圣經》的后援。

是在談話快結束的時候，敘事人的話題才談到了。施耐爾夫婦說他倆從沒碰上一個。瑪奇根加人經常回避這方面的問題，但是他們確實提起敘事人的時候，總是飽含著敬意。這種人不是巫醫也不是薩滿。怎么翻譯這個瑪奇根加詞語呢？施耐爾夫婦躊躇不決地討論，然后才屬意于hablador。這個名稱“規定了他們。他們講事。他們的嘴就是這個社會的連接紐帶，因為生存斗爭已逼得它四分五裂，散落四方。多虧了敘事人，父親才有了兒子的消息，兄弟才有了姊妹的消息，也多虧了敘事人，全部落的生生死死、大事小情才能讓人人都知曉”（第90—91頁）。最后，施耐爾先生說：“此外還能得知更多的事情……我感覺敘事人不僅傳播當前的消息，也講述過去的事情，興許他也是社群的記憶系統，發揮的作用類似于中世紀的吟游詩人（jongleur）和行吟詩人（troubador）。”（第91頁）

N.一回到利馬，就同薩烏爾見了事實證明是最后一面，做了最后一次探討。N.向薩烏爾解釋說，正是敘事人這個理念讓他多么感動。“他們是活生生的證據，表明講故事不單是為了娛樂……講故事是某種元始的東西，是民族存亡所系的某種東西。”（第92頁）

薩烏爾對敘事人的簡慢冷淡態度讓N.很吃驚。“現在我明白了，當他說對這種所謂敘事人從無耳聞時……他是在說謊。”（第93頁）反過來，平時和顏悅色、幽默善良的薩烏爾，卻對語言學院痛加攻訐。“他們是最壞的壞蛋，你那些傳播福音的語言學家們。他們鉆進部落是為了從內部摧毀它們，正像穿皮潛虱似的。他們鉆進了部落的精神之中，信仰之中，潛意識之中，存在方式的根本之中。別人竊奪它們的生存空間，剝削它們，或者把它們進一步趕往內陸深處。最壞不過從肉體上消滅它們。你的語言學家們更精妙。他們想用另一種方式干掉瑪奇根加人。把《圣經》譯成瑪奇根加語！想想看！他們的目標是將這些土著的文化、神祇和風俗從地圖上抹掉，甚至腐蝕土著的夢境。他們在本國后院，對紅種人和其他民族就是這么干的。”（第93—94頁）“尊重這些土著的唯一方式是別靠近他們。別碰他們。我們的文化太強大了，太富于侵略性了。凡是它觸碰過的，都會被它吞沒。”（第97頁）在亞馬遜地區也許還為時未晚。“把印加人變成一個夢游者和臣仆的民族的那種巨創，尚未在那里發生。”（第98頁）

N.記載說，他隨后在西班牙和法國攻讀研究生期間（大約是1958—1963年），他寄信給薩烏爾，在有關瑪奇根加敘事人的某個歷史研究中請求援之以手，但沒有收到回信。他向馬德里的退休多明我修士請教，研究從前的旅行者記述，進展不大。1963年，薩烏爾的人類學教授路過巴黎，告訴他堂·所羅門決定想終老以色列，所以和兒子一起移居那里了。薩烏爾始終沒有完成博士論文。但是N.很懷疑：“我想薩烏爾不是那么容易就登臺讀經的。因為他與秘魯已經血脈相連，他為秘魯存在的問題——起碼為其中某一問題——犯愁發怒，不能自已，不可能一夜之間，像換件襯衫似的萬事皆拋。”（第105頁）

第五章是第三章的一種延伸，我們可以說又回到匿名的瑪奇根加敘事人那里。但是有點差別，因為現在敘事人轉而令人驚異地講述風俗的起源。風俗始于帕恰卡姆埃（Pachakamue），世界上第一個女人的弟弟，他有一種威力，可以通過命名來創造與變化人和動物，甚至無須有意為之。他攪得世界大亂，第一個女人的丈夫雅康托羅（Yagontoro）殺了他，割下他的舌頭埋了，以為這樣一來世界就得太平了。

Pero,a poco de estar andado,se sintió pesado.Y por qué,además,tan torpe?Asustado,notó que sus pies eran patas;sus manos,antenas;sus brazos,alas.En vez de hombre que anda,era ya carachupa,como su nombre indica.Debajo del bosque,atragantándose de tierra,a través de los dos vírotes,la lengua de Pachakamue habría dicho:“Yagontoro.”Y Yogontoro se había vuelto,pues,yagontoro.（第130頁）

［但他沒走多遠就感到乏力了。為什么走得這么慢呀？他害怕了，發現他的雙腿變成了蟲腿，雙手變成了觸須，雙臂變成了翅膀。他原來是個會走路的人，現在成了一只負鼠，正合他的名字。原來，在樹林地底下，帕恰卡姆埃的舌頭被土悶得夠嗆，仍然憑著刺穿它的兩根箭頭，說了聲：“雅康托羅。”于是雅康托羅就真的變成了負鼠。］

也許恰恰是在《變形記》的這一叢林版的、混血的扼要重述中，讀者才開始確信，敘事人一定是薩烏爾·蘇拉塔斯。

第六章里，N.跳過了二十五年，跳到了1981年，當時他幫著在搞一個電視節目，叫做“巴別塔”。他獲悉暑期語言學院打算離開秘魯，于是決定抓住時機做一檔有關瑪奇根加的節目。“這個主題從未遠離過”他的心思。其時，終于已經有對瑪奇根加人進行的眾多優秀人類學研究完成，他提到了一些“真有其人的”美國、秘魯和其他研究者的名字，[[665]](#_665_9)但是非常奇怪，這些作者誰都沒提及敘事人。涉及他們的全部言論，似乎到1950年代左右就中斷了。難道他們絕跡了嗎？可是1930和1940年代的多明我修士還頻頻提起他們啊。

重返亞馬遜，N.發現施耐爾夫婦準備離去，他們對自己長期勞動的成果感到欣慰。現存的大約5000名瑪奇根加人，如今有一半定居在永久村落里，有學校和農業合作社。今天，在他們的漫長歷史上第一次有了酋長，因為現在他們“需要權威機構”了。（第157頁）N.思忖道，他們有了“《圣經》、雙語學校、傳播福音的領袖、私有財產、貨幣價值，無疑還有換來的西方服飾”。可這合適嗎？會不會瑪奇根加人“正從自由自在、獨立自主的‘野人’，開始變成鬼臉兒所說的‘呆頭傻腦的人’呢”？（第157頁）

“盡管他們從沒放棄他們的語言、他們的神祇、他們的風俗，他們卻不再是那一小股不屈不撓的悲劇性人物了，不再是分解成微小的家庭東逃西避的社會了，那時他們總在逃避白人，逃避混血人，逃避山地人，逃避其他部落，靜候著、堅忍地接受他們無可逃避的個人和社群的消亡。這個散居在廣袤潮濕的森林深處，靠幾個漫游的講故事的人為它供給循環的元氣的社會行將消失，一念及此，悲傷之情止不住地向我襲來。”（第158頁）

但是N.觀察到，一扯出敘事人的話題，即便是已經同化的瑪奇根加人也要么否認他的存在，要么一言不發。施耐爾夫婦告訴他，他們和瑪奇根加人一起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紀后，仍然對這些講故事的人幾乎一無所知。“那是非常奧秘、非常隱私的事情。”（第169頁）施耐爾先生描述了兩次半面的邂逅，第一次大約是在1971年。他搞不懂敘事人所講的東西，講故事的幾個鐘頭緩緩流逝的時候，他困得睡著了。第二個敘事人非常古怪：也許是個阿比諾人，臉上有一大塊紫斑，他對這位年輕傳教士嫉如寇讎，講故事的時候始終背對著他。施耐爾再一次地犯了困，茫然不解地睡過去了。N.評論說，正是那時他才認識到，瑪奇根加人不是在掩蓋作為一種抽象習俗的敘事人，他們是在掩護他，因為他要求他們這么做。

回到首都，N.發現了真相，原來堂·所羅門根本沒去以色列，1960年10月23日在利馬去世并葬在那里。似乎沒人知道他的兒子怎樣了。“但是我知道，我心里想，我全知道。”（第182頁）

到第七章，讀者們最后一次回到敘事人那里。引起幻覺的敘述同時也日趨個人化。敘事人短暫地以“格雷戈爾—塔蘇林奇”的身份出現，他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只馬丘科伊蟬（machucoy cicada）。他描述了他是怎樣成為敘事人的：看起來似乎很偶然——沒有死藤水也沒有善良的巫師（seripigari）相助。他早就是一個傾聽者（eschuchador）了，最后發覺人們在背后叫他敘事人。然而這一章的核心，是重述猶太人歷史和他們的神“塔蘇林奇—耶和華”的一長節，它這樣起頭：

El pueblo que anda es ahora el mío.Antes,yo andaba con otro pueblo y creía que era el mío.No había nacido aún.Nací de verdad desde que ando como machiguenga.Eso otro pueblo se quedó allá,atrás.Tenía su historia,tambíen.Era pequeño y vivía muy lejos de aquí,en un lugar que había sido suyo ya no lo era,sino de otros.（第207頁）

［我現在屬于這個流浪的民族了。從前，我隨另一個民族一同流浪，還以為那是我的民族呢。那時我算不上出生了。我真正出生是當我作為一個瑪奇根加人流浪的時候。原來那個民族已經落在身后了。它也有自身的故事。它是個小民族，住在離這兒很遠的地方，那個地方曾經是它的，后來不是了，屬于別人了。］

接下來是這個民族中一個男孩出世的故事，男孩長大了，說他是塔蘇林奇吹出來的，是塔蘇林奇的兒子，是塔蘇林奇本人，也就是三位一體。他將一點點鲇魚和木薯變成一大堆。人們認為他是個敘事人，許多人拋棄了那個民族的習俗和禁忌。善良的巫師們擔心民族要消亡了。所以他們殺了那人，從此這個民族災禍連連。但是他們沒有消亡。塔蘇林奇—耶和華的民族既不好戰，也從未贏過戰爭。他們被驅散在世界各地的叢林里。他們游歷，逃竄，流浪，這樣子活下來。更大的民族，更強的民族，都銷聲匿跡了，誰也不記得他們了。這個民族得以幸存，是因為它忠于它的習俗，它的禁律。“人們寧愿人人一個樣，寧愿別人忘掉自己的習俗，殺死自己的善良巫師，違背自己的禁忌，而去模仿他們那一套。”（第211頁）因而要保持對一個人的義務的忠誠，也就是做該做的事，“這是我從你們身上學來的”。“我們想悄無聲息地消亡嗎？也不。”（第211頁）

這篇敘述最后是一則故事，說敘事人發現一只鸚鵡媽媽試圖啄死她的一個幼雛兒，因為它生得畸形，腿是扭曲的，爪子只是殘根。他趕跑了鸚鵡媽媽，留下小鸚鵡給自己作伴。

Duerme aquí,dentro de mi cushma.Como no puedo llamarlo padre,ni pariente,ni Tasurinchi,lo llamo con una palabra que inventé para él.Un ruido de loros,pues.A ver,imítenlo.Despertémoslo,llamémoslo.Él lo aprendió y lo repite muy bien:Mas-ca-r-ita,Mas-ca-ri-ta,Mas-ca-ri-ta....（第224頁）

［它就睡在這兒，睡在我的寬袍子里。我不能叫它父親，或者親人，或者塔蘇林奇，所以我用我給它造的字眼稱呼它。這也是鸚鵡的叫聲。我們看看，盡力學學它。我們來叫醒它，我們來喊它。它自己已經學會了，重復出來惟妙惟肖。鬼—臉—兒，鬼—臉—兒，鬼—臉—兒……］

末章把讀者帶回到佛羅倫薩的N.那里。他想知道，瑪奇根加人是不是挺過了毒禍、“光輝之路”極左組織，還有1980年代一股腦撲向亞馬遜地區的殘酷軍事鎮壓。“我曾經的那位朋友，曾經是猶太人、白種人、西方人的薩烏爾·蘇拉塔斯，在跟著他們流浪嗎？”他沉思著（第230頁）。在1960年代，其他理想主義的秘魯青年逃向了四面八方，但薩烏爾做得不同，他精心抹掉了他的出走和意圖的一切痕跡。“他鐵了心地決定要改變他的膚色、他的姓名、他的習慣、他的傳統、他的上帝……他離開了利馬，決意永不回來，此后永遠成為另一個人。”（第232頁）N.疑心他作為猶太人，認同于游蕩的、受迫害的小民族。他的紫斑也讓他成為秘魯社會邊緣人中的邊緣人。但是真正的奧秘不在于此，在于他進而變身為敘事人。“轉變為敘事人，就是在僅僅不太可能之事上更添不可能。”（第233頁）

因為能夠像敘事人那樣講話，就意味著他已經達到這等境界：他感受著并寄居于那個文化最內里的東西，他沉潛于它的神秘莫測，他穿透了它的歷史和神話的神髓，親身體嘗它的祖傳的禁忌、意象、欲望和恐懼。這意味著以可能做到的最深刻方式，成為地地道道的瑪奇根加人……我的朋友薩烏爾放棄了他過去所有的和本來會有的一切，為的是在這二十多年里頂風逆浪，特別是反現代性和進步之道而行之，奔波漫游于亞馬遜森林地區，維系周游的故事講述者［Contadores de historias］的無形血脈之傳統于不墜：這件事不時地闖進我的腦海里，并像在新光村里，在星光熠熠的黑夜中我第一次得知此事的那天一樣，蕩滌著我的胸懷，比愛情和恐懼來得更為猛烈。（第234頁）

N.最后描述自己往外看到了旅游城市佛羅倫薩夜間不經心的雜亂無章，以此收束了他講的故事。離開他的房間將是徒勞無益的。因為“不管我躲到何處，想尋覓躲避炎熱、蚊蟲、我的精神亢奮的一個避難所，我都會繼續聽見那位瑪奇根加敘事人的聲音，就在左近，噼啪不止，追憶不及”（第235頁）。

### 三

那么“歷史上的”瑪奇根加人（Machiguengas，或者是較少西班牙化的名稱，Matsigenka）怎樣呢？[[666]](#_666_9)據信他們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他們只是間或臣服于印加人的極盛王國，而且由于他們住在橫跨安第斯山和亞馬遜河的叢林，與世隔絕，結果他們在西班牙帝國主義時期實際上不為外人所知。甚至Matsigenka這個當代稱謂（它的字面意思是“人類”），也是大約七十五年前才在外人間變得平常。有關他們的最早文獻之一，注明年份為1865年，作者不詳，其中說道：“他們中間找不出任何村社紐帶的痕跡。每個家庭都單獨生活，偶爾會和別的一些家庭一起生活。只有戰爭期間他們才會選出一個頭人。”[[667]](#_667_9)1860年代他們的隔絕狀態開始完結，那時外人紛至沓來，不少人來自巴西和玻利維亞，想尋找金雞納皮，它是制造奎寧的原料，當時（東南）亞洲和非洲的英、法帝國主義者大量需要奎寧作退熱藥。十九世紀最后二十年里，秘魯政府日益關切牢固確立和保衛它那漏洞百出的東部邊疆，并開始資助探險者，最為臭名昭著的探險者中，有維爾納·赫爾佐格（Werner Herzog）曾搬上銀幕的費爾明·菲茨卡拉爾多（Fermín Fitzcarrald）。

但是現代性的旋風沖擊瑪奇根加人不過是二十世紀前二十年的事，當時秘魯經歷了一場暴風驟雨般的橡膠熱，直到東南亞和非洲的殖民地產品占了上風。亞馬遜地區的大規模橡膠采割急需勞動力，這引生出“偷襲”（correría）這一可怖慣例，它發展成大肆的苦工劫掠。溫和勤勞的瑪奇根加人成了它喜愛的目標之一。傳教士們后來估算，他們總人口的大概60%喪生了，死在“唯一生效的法律是‘44口徑［溫切斯特步槍］法’”[[668]](#_668_9)的這樣一個地區，死在使用奴隸勞動的這個政權下，其間伴隨著拷打、殺戮、焚燒房屋、綁架婦女兒童以及此前未聞的種種疾病的傳播。[[669]](#_669_9)正是在這個時期，亞馬遜地區的土人漸漸被秘魯人普遍認為要么是國家發展的工具，要么是應該掃滅的障礙。1900年前后，多明我會著手進行認真的傳教工作，至少有部分瑪奇根加人逃向他們尋求庇護。然而橡膠熱的結束并不意味著奴隸般剝削的結束——橡膠之后，糖料作物種植園又來了，然后是采礦，最后是伐木。（據說奴隸制度半遮半掩地一直堅挺到1960年代。）

對瑪奇根加人來說，1960年代因兩大變化而顯得不平凡。一方面，暑期語言學院駐扎進來了，當時號稱“世界上最大的新教傳教士組織”[[670]](#_670_9)，它為1970和1980年代有關瑪奇根加人的現代人類學研究的猛增拓寬了道路，其他活動姑且不論。[[671]](#_671_9)另一方面，費爾南多·貝朗德·特里（Fernando Belaúnde Terry）在他首任總統期間（1964—1968），指派給亞馬遜地區的地位是秘魯的最后邊疆，它的開發將把這個“倒霉的國家”從貧窮和人口過剩中拯救出來。破天荒第一次，政府親自積極推進新大莊園主的拓殖。貝朗德被推翻之后，胡安·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Juan Velasco Alvorado）的激進軍事政權一定程度上試圖逆轉這項政策，就創立了其實是亞馬遜土著“居留地”的保護區，其中的土地不可轉讓。但是1980年貝朗德一重新上臺，立即恢復了密集的資本主義開發的諸項政策，照這樣，瑪奇根加人將被同化，被教育（到一定程度），被西班牙化，被轉變成定居勞動力。

到1980年代后期，瑪奇根加人的數量是多少，估算出來各不相同，在5000到12000之間。也許有一半人已被圈進七個村落，那些村落一總名為“土著社區”（Comunidades Nativas），內有一種初具雛形的政治組織，是自上而下強加的，不得民眾信任。[[672]](#_672_9)由于資本主義殖民化使獵物和魚類銳減，并使臨時性農田園圃日益難覓，傳統的維生之道越來越舉步維艱。傳統的巫醫，亦即善良的巫師，正不斷消失。[[673]](#_673_9)即便如此，人口估計值的極端離差說明，相當部分的瑪奇根加人依然在“逃離，總是逃離”，追尋生計、和平與自治。

只余下一事尚需補充，它對我們當下的目的是決定性的。《敘事人》講述的瑪奇根加近現代史大體準確，它所描述的他們的傳統宇宙論、“社會秩序”、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也都十分符合刊行的學術著作：只一樁突出的事情例外。恰如N.無意間提到的，這些專業報道中，哪怕稍涉敘事人習俗的，連一篇也沒有。[[674]](#_674_9)

### 四

巴爾加斯·略薩用hablador意指什么？這個單詞的日常意思是“談話者”“話匣子”“吹牛者”“碎嘴子”——壓根不必太當回事的某個人。小說向我們提示了這種“輕”，就在對薩烏爾的lorito hablado的描述中，那是一只“饒舌的”小鸚鵡，它不懂它在說什么。多麗絲·薩默注意到，表示“講故事的人”或“敘事人”的慣用的莊重詞語是narrador，cuentista，和cuentero，因而hablador似乎是有意為之的準新造詞（quasi-neologism），與罕用的詞escuchadores（也許可譯為hearers，heeders［諦聽者，聆聽人］）置換了常用詞oyentes（listeners，audience［聽者，聽眾］）適相匹配。[[675]](#_675_9)

幾無疑義的是，作者腦子里所想到的，是Erzähler（講故事的人）的形象，沃爾特·本雅明出了名地將這種人物與小說家和新聞記者（略薩的兩大副業）并置對立。[[676]](#_676_9)值得提醒一下我們自己，這種人物的總體特征是什么。“雖然講故事人之名我們也許很熟悉，但以其鮮活的直接性示人的講故事人，斷非一種當代的在場人物。他已變成與我們疏遠的事物，而且越來越遠……講故事的藝術行將消亡。”[[677]](#_677_9)“口口相傳的經驗是所有講故事者都從中汲取靈思的源泉。”[[678]](#_678_9)本雅明說，這樣的人在中世紀歐洲出自兩個群體，一是浪跡江湖的人，比如水手，他們從自己遠游的經驗中帶來故事；一是安土定居者，比如安居耕田的農夫，他們通曉當地的傳統和傳說。本雅明接著說：“所有這一切點明了任何一個真正故事的性質。一個故事或明或暗地蘊含某些實用的東西……無論哪種情形，講故事者是一個對聽者有所指教的人。但是如果說‘有所指教’在今天已開始變得有股陳腐氣，這是因為經驗的可交流性每況愈下，結果我們對己對人都無可指教。”這個進程“已逐漸把講故事從鮮活的口語王國剝離出來，同時正在造成于消逝之物中瞥見一縷新型美的可能”。[[679]](#_679_9)

對于長篇小說，本雅明寫到它的關鍵特點在于它對書本和印刷術的發明的依賴。“小說與所有其他散文體式——神話、傳說，甚至中篇故事——的差異在于，它既非來自口述傳統也不參與其中……講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親歷或道聽途說的經驗，然后把這種經驗轉化為聽故事人的經驗。小說家則閉門獨處，小說的誕生地是離群索居的個人。此人不復能夠以值得效仿的方式表達他最深切的關懷，他既缺人指教，對人亦無以指教。寫小說意味著在人生的表征中把不可通約性推向極致。小說置身于生活的豐盈之中，透過表征這豐盈，顯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680]](#_680_9)（我們馬上就會看到，這一描述對《敘事人》多么貼切。）

對于新聞業，本雅明說：“每天早晨都把全球的新聞帶給我們，但我們卻匱乏值得注意的故事。這是因為任何事件傳到我們耳邊時，都早被解釋得通體清澈。換言之，于今幾乎無物裨益講故事的藝術，幾乎事事都裨益消息的傳播。”再者，“消息的價值曇花一現便蕩然無存。它只在那一瞬間存活，必須全副身心交給那一瞬間，不失時機地向那一瞬間解釋自己。故事則不同。它不耗散自己，它凝聚并保藏其活力，雖年深日久，也能釋放出這種活力。”[[681]](#_681_9)

在本雅明對講故事人的說明中，還有另外一種成分，那就是死亡的至要性。“恰如人在彌留之際其生平的意象在他心中翻滾湍流，展示種種他所遭遇卻未及深諳的自我，同樣，臨終人的表情和面容上無法忘懷之事會陡然浮現，賦予他一生巨細一種權威，連最悲慘破落的垂死之人也對周圍的生者擁有這種權威。這權威便是故事的最終源頭。死亡是講故事的人能敘說世間萬物的許可。他從死亡那里借得權威。”[[682]](#_682_9)我們或許記得，就是這種權威，小說家或新聞記者求之不得。

本雅明的觀點讓我們得以更清晰地看出《敘事人》的主要奇特性——它是一部小說，卻涉及的是“故事”，也涉及“迷戀”講故事人的敘述者，還涉及喜愛講故事人這一理念的小說家。薩烏爾有能力（我們可以這么說吧？）成為講故事的人，這一點早在N.告訴我們鬼臉兒“崇拜”卡夫卡、會背誦《變形記》的時候，就表現出來了。（本雅明的論文是以列斯科夫的無與倫比的故事為主要話題，但如果他以這位布拉格的大師為樞軸，原本也無妨的。）不過這種能力，只有在“我曾經的那位朋友，曾經是猶太人、白種人、西方人的薩烏爾·蘇拉塔斯……鐵了心地決定要改變他的膚色、他的姓名、他的習慣、他的傳統、他的上帝”的時候，才能變為（想象的）現實。拿與本雅明相去不遠的話來說，成為一個敘事人意味著“已經達到這等境界：他感受著并寄居于那個文化最內里的東西，他沉潛于它的神秘莫測，他穿透了它的歷史和神話的神髓，親身體嘗它的祖傳的禁忌、意象、欲望和恐懼。這意味著以可能做到的最深刻方式，成為地地道道的瑪奇根加人”。但有更甚于此者。薩烏爾被刻畫得不僅變得扎根鄉土，像中世紀扎根土地的農人那樣（或者像傳統的瑪奇根加敘事人那樣，設若真有其人的話），而且自遠方給瑪奇根加人傳來故事，將之編入他的如癡如醉的聽眾們的習語和經驗中。這些故事當然首先取材于卡夫卡，但其后也取材于猶太人悠久的精神史，以及他們因那第一個“前猶太人”即耶穌基督的永恒追隨者所致的受難史。再有，從各方面來說，他都如本雅明評論講故事的人那樣，是“正直人”，他的故事里帶著善意的指教。

N.寫道，“這個散居在廣袤潮濕的森林深處，靠幾個漫游的講故事的人為它供給循環的元氣的社會行將消失，一念及此，悲傷之情止不住地向我襲來”，這時，薩烏爾“從死亡那里借得權威”這一點就彰顯出來。仿佛是敘事人的聲音宣布了困于臨死之痛的一個社群的遺言，它由此控制了“聆聽者”的心，沒有哪位小說家能夠企及。同時，這種權威也源于，薩烏爾無可挽回地從“秘魯”消失了，而N.喉嚨哽咽地意識到，他很久以前就已聽過老朋友的遺言。

正是在這點上，一部關于Erzähler/Hablador的小說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問題，變得不容回避。在N.同薩烏爾的最后一次談話中就有那個時機，當時N.描述了他何以被敘事人的理念感動至斯。“他們是活生生的證據，表明講故事不單是為了娛樂……講故事是某種元始的東西，是民族（pueblo）存亡所系的某種東西。”他之被感動，是因為講故事似乎恰好落在小說的可達范圍以外，不管國家的文學督察員可能希望后者有多典范。它默默地與成千上萬部其他小說在廣闊而不斷增長的出版物市場上較著勁，在這個市場上，作者和讀者間幾乎從不謀面，除非是在想象中。而且，這位小說家所謂pueblo，首先是指民族的想象的共同體，它絲毫不是元始的，它日常的循環著的元氣不是小說，而是報紙、廣播、電子傳媒，還有“消息”的其他提供者。因此，正是對某種不可得之物感到的痛楚，“蕩滌著……胸懷，比愛情和恐懼來得更為猛烈”。[[683]](#_683_9)

很可能，對這種不可得性感到的這種痛楚有其美洲淵源——盡管隨著民族—國家鋪散到世界各地，這樣的痛楚不再局限于某個地區。因為美洲產生了最早的民族—國家，而那種可能性的先決條件，是它們作為歐洲海外殖民地這一地位。這些殖民地在廣袤的土地上，動用駭人的暴力，將異類的人強扭在一起：白人移民；種類繁多的土著——如果沒遭滅絕，也已陷入悲慘絕境；很多情況下還有無數非洲裔的奴隸，更別說他們的混種后裔了。這些社會，歷史上沒有先例，而又被數千英里海路之外看不見的宗主國控制了幾個世紀。列斯科夫的故事，像果戈理的故事一樣，仍然能夠間接地向我們轉述，那是他們碰到或聽說的講故事人的故事，因為他們全部來自——不是遼闊的沙皇帝國本身，而是帝國內那古老的、依然龐大的說俄語的人群（而且帝國也不被當成一個民族）。他們無需會腹語術人的技巧。但是征服美洲的歐洲人不是傳統的農民，幾個世紀以來他們強行推廣其風俗、宗教、經濟生活和語言，使用了如此卓有成效的殘忍手段，在這種成效基礎上制造出如此陡峻的種族等級，以致這個半球發現，不可能產生那種又親切又瘆人的列斯科夫式故事，它可能這樣開頭：是薇拉·彼得羅夫娜告訴我這個故事的：在1834年的寒冬里，有人看見四匹馬躺在伏爾加河中央，直挺挺地凍僵了。[[684]](#_684_9)（這樣幾句話綿密的英語表達，還沒有嚴重歪曲俄語原文的那種渾成性［seamlessness］。）

然而在美洲，西班牙語、英語、葡萄牙語始終無力達到這種渾成性，因為它們明顯根源于征服，混雜不純，也因為本土社群的故事，如果幸存下來的話，不得不經由靠不住的翻譯過程，以印刷品形式呈現。敵人的手處處留下它的印記，不論那個敵人是表現為人類學家、傳教士、本堂神甫、官僚、文學家，還是混血兒掮客。[[685]](#_685_9)這種狀況，沒人比小說家、非敘事人巴爾加斯·略薩更了然了。這就需要小說家的匠心獨運。這么說吧：如果我們可以設想不斷逃避中的瑪奇根加人有真實的敘事人，我們也可以設想明目張膽或偷偷摸摸地給他們的故事錄音。但是這些磁帶，轉錄成文字后，將會是秘魯的西語讀者們（他們是作者的第一受眾）無法理解的。可以說，本真性有了，可讀性沒了。這就是為什么小說從一開始就需要說雙語的秘魯人——或前秘魯人——做中間人。他就是薩烏爾·蘇拉塔斯。但絕不是有了這位中間人就萬事大吉了。小說家給自個兒分派了艱巨得多的任務。可以這樣來講這項任務：為敘事人創造一種有說服力的聲音，它盡量遠離任何自認的秘魯人的聲音，但同時又根本毀損了它自身的本真性。此即靈感勃發的混成作品（pastiche）的一些精致特征。

完成這一艱難使命的主要技術手段有兩個。第一是敘事人的故事以西班牙語道來，沒有譯文地位的任何聲稱。這最明顯。第二是所有“薇拉·彼得羅夫娜”的非列斯科夫式缺席。這重要得多。敘事人講述的時候，他的故事沒有出處。小說中不存在這種地方：N.自稱是“報告”敘事人所言。[[686]](#_686_9)實際上，這樣一種可能性，被小說布置的特有結構排除了。因為N.最后一次見到薩烏爾是在二十年前，在利馬，在后者據推測成為敘事人之前：而且自然地，兩個年輕人是用帶著學生腔的西班牙語交談的。這些手法表現/坦承了小說所需的某種欺騙性。然而幾乎同時，作者可隨意揮灑的全部天才都被調動起來，在諸多書頁上，為秘魯人喚起震撼人心的瑪奇根加人摹像：他們逃離，總在逃離（huyendo,huyendo siempre），正是要逃離秘魯人。在小說最后一句話里，那不可能實現的一對意圖輝煌地暫時聚攏了。N.說道：“dondequiera que me refugie tratando de aplacar el calor,los mosquitos,la exaltación de mi espíritu,seguiré oyendo,cercano,sin pausas,crepitante,inmemorial,a ese hablador machiguenga.”這些詞語是精心挑選的。N.在尋找微不足道的、意大利的避難所，躲避炎熱和蚊蟲，不是huyendo（逃離）絕種的幽靈；他是個冷靜超然的oyente（聽眾），不是心醉神迷的escuchador（聆聽者）；敘事人薩烏爾并不是瑪奇根加人（更何況是略薩的虛構）。可是N.說他聽到的一切近在耳畔，噼啪不止，追憶不及。那是Erzähler（講故事的人）的難解之聲。

我們還有待考慮小說家更廣泛的意圖和抱負。不管幸或不幸，反正他似乎毫不含糊地談論過這些。在1993年10月的一次訪談中，薩默問他，他決意讓薩烏爾是個猶太人，是不是因為他關心瑪奇根加人——以及其他瀕臨滅絕的少數族群——與猶太人的歷史命運間的相似性。他的回答顯然使她大感意外。“他說，恰恰相反，是它們差異的極端懸殊。它們復活了社會、地理的種種差異，而協調這些差異是十九世紀民族主義統一的宏偉規劃，承繼自殖民時代的一種規劃。印第安人和猶太人位于秘魯的極限上，共同代表了秘魯；這種極限，好比北方干燥多塵的皮烏拉城與安第斯山南部悶熱潮濕的叢林那樣的地理—歷史極限，是《綠房子》勉強一齊支撐起來的。他解釋說，亞馬遜印第安人原始、貧窮，猶太人通常富有，是世界主義的，二者處于這個國家人口對立的兩端。這部小說是一種努力，以盡可能最富包容性、最氣度恢宏的方式來談論秘魯，也就是以它的人口統計學的兩個極端為關注中心來談論秘魯。”[[687]](#_687_9)

《敘事人》是一部民族主義小說，這毋庸置疑，但有意思的問題在于它的民族主義是如何“表演出來”（performed）的——如通行的行話所說，特別是按照略薩談到的“十九世紀的統一的宏偉規劃”表演出來。

我們或可這樣子開始探究：看看薩默式的一對“情人”，薩烏爾和N.，他們交織的命運邀請（秘魯）讀者進入民族身份（nationhood）的色情之中。薩烏爾根本不算富有的世界主義的猶太人。堂·所羅門是個下層中產階級移民，他的兒子是非猶太母親所生，從某些觀點來看，壓根不是真正的猶太人。薩烏爾是個不信教的人，從未跨出國門，對非秘魯的任何東西（Erzähler卡夫卡除外）表現得渾無興趣。到末了，他被N.說成是什么身份都變為了“前××”（除了不是“前秘魯人”）。在學生時代他和N.展開的辯論中，他絕不是世界主義的“普適”人權的行動主義分子。他可以談起印加人的活著的子孫們，說他們是“夢游者”或“呆頭呆腦”，他們的崩潰到了這步田地，只有同化才算明智；他又為瑪奇根加人辯護，那種腔調，可以合理地稱之為微民族主義（micronationalist）或土著主義（indigenist）的。此時我們可能首先料想，在小說的進程中，他將變成捍衛土著權利的活動家，幫助他們政治上組織起來，順著這條路打造出地方的、全國的和國際的聯盟，從而使他們自己融入、適應非瑪奇根加的世界。不過當然，這樣的預期無一實現。

N.對這位未來的敘事人的執迷之愛全無回報——1958年后他寫給薩烏爾的信都杳無回音。薩烏爾的激情專一地獻給了一個弱小的民族，這個民族在逃離，盡人力所及遠離利馬；實現這一愛戀的前提是拋棄秘魯。乍看起來，這里沒有什么類似于民族統一主義者的愛戀，后者是反映十九世紀宏偉的民族主義規劃的那些典范小說里常有的。然而，正是因為薩烏爾起先是秘魯人，因為瑪奇根加人生活在秘魯疆域之內，不是在巴西或哥倫比亞——也就是說，他們是“秘魯人”和“秘魯兒女”，屬于圣馬丁的烏托邦公式那一家系，他才命定會愛上他們。N.懷疑薩烏爾是否真的移民以色列的最初理由似乎一語中的：“他與秘魯已經血脈相連，他為秘魯存在的問題——起碼為其中某一問題——犯愁發怒，不能自已，不可能一夜之間，像換件襯衫似的萬事皆拋。”

那么N.呢？這才是富有（至少無財務之憂）的世界主義人物，如果哪兒有這種人的話。他在馬德里和巴黎讀書，對暑期語言學院的“美國佬”傳教士溫情脈脈，在但丁的家鄉試圖“忘掉”他那“倒霉的/受詛咒的”國家。然而他也明顯是西班牙征服者和第二解放者的后嗣。以下是他在1958年：“我們是乘一架小型水上飛機旅行的，在有的地方則要乘土著的獨木舟。在狹小的河道中穿行，河道被茂密的植物覆蓋，白晝猶如黑夜。大自然——那參天的大樹、波平如鏡的湖水、亙古如斯的河流——以其強力和孤寂，讓人覺得這是個新造的世界，渺無人煙，簡直是植物和動物的天堂。可是當我們到達各部落的時候，我們發現自己直面著史前時期。狩獵者、采集者、射手、流浪者、非理性的人（los irracionales）、魔法師、泛靈論者：那是我們遙遠的祖先過的那種最素樸、最原始的生活。這也是秘魯［también, eso era la Perú］，只有在那時我才完全意識到它，一個todavía sin domar［尚未被馴服？/將要被馴服？］的世界。”[[688]](#_688_9)在他大學時代和薩烏爾爭辯中間，N.也采取——雖然一定程度上不過唱唱反調而已——標準的自由民族主義立場，贊同以叫做“秘魯”的這一宏偉規劃的名義，讓“史前史”不可避免地、可望仁善地同化到“歷史”之中。[[689]](#_689_9)進步有其自身的“強力和孤寂”，一個好秘魯人所能勉力做的上善之事，是誠心美意地盡一切可能的力量，緩和同化的沖擊，力阻往昔元神耗盡。這樣，從巴爾加斯·略薩的訪談偏斜出去，原來代表“秘魯”社會和地理極端的，不是富有的世界主義猶太人與原始土著，而是大都市的自由民族主義知識分子與堅忍地逃避他們、走向滅絕末路的那些人。

小說從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末的這一長時間跨度，向我們展示的較少是想象的薩烏爾的演變/改宗，較多是他那不受待見的情人的演變。直到在他看來，在小說家看來，“于消逝之物中瞥見一縷新型美”變得可能。但這種美麗依賴于消逝，不是元神耗盡。薩烏爾是這消逝的組成部分。鬼臉兒將會無兒無女，他的殘廢的小鸚鵡也這樣——與格雷戈里·薩姆沙及其創造者是一路人。[[690]](#_690_9)

此外，薩烏爾已經在內心深處是個鬼臉兒、秘魯人、敘事人了，何以還要被塑造成一個猶太人/前猶太人呢？無疑地，略薩部分地想借此表示他說過的那話的意思：他曾評論說，當他創作《敘事人》的時候，所思所慮正是猶太人和瑪奇根加人之間的差異而非類同。但是這差異其實不是他進而論列的那一種。跟數世紀以來的情形相比，今天猶太人的滅絕更不可想象。富裕、叫囂的以色列是中東地區最強大的國家，世界霸主美國為它的生存提供了無條件保障，歐洲亦然。（這種無條件性的現代根源在于，歐洲猶太民族在1940年代差點兒被歐洲人阿道夫·希特勒的歐洲人執法官滅了種。）然而對瑪奇根加人來說，他們像世界各地其他幾百個小“部落少數族群”一樣，沒有任何保障，完全可能無聲無息地滅絕。

猶太人的主題，在小說某些地方感覺是生拉硬拽進來的，它似乎有可能用于驅邪的目的。在我們這個慘痛世紀的盡頭，大概3500年之久的猶太史已經可用作一種普遍的比喻，象征“雖歷盡劫難”而終得保全的“文化孑遺”。這種“有益指教”恰恰只有一個當代猶太人才能提供，不僅提供給瑪奇根加人，還可以說是提供給巴爾加斯·略薩的國內和國際讀者們。在藤森時代，這樣的可能性不會向單單一個秘魯的鬼臉兒敘事人敞開的。此時此刻我們認識到“前猶太人”（ex-Jew）這個畫謎對作者的矛盾的重要性。其中，“猶太人”作為一個符號，代表“歷盡劫難的希望”所寄；“前”字并未取消“猶太人”，而是在它一旁為地方性絕望騰出了空間：薩烏爾·蘇拉塔斯，在劫難逃的救世主。

最后，我們要理解，薩烏爾是當地克里奧耳女人和波蘭猶太移民的混種后裔，通過他的母親系身于秘魯，又通過他的父親擺脫了秘魯，正是靠了這種身份，他才被置放在這樣的地位上：既是N.和瑪奇根加人之間的想象的中間人，又是他們共同的魅惑者；要不是他，他們在小說中沒有任何聯絡點。我們正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用腹語術表達受迫害、受壓制的少數族群已變得無法容忍（不僅是道德上）。鬼臉兒是文化要求權的法庭上作者不在犯罪現場的證人。

就在這一刻，我們能夠分辨二十世紀晚期的《敘事人》與薩默那么令人信服地論述過的十九世紀典范小說之間極為深遠的差別。后者大多數寫成于民族主義未竟歷史的拋物線早期，當時，借用西蒙娜·薇依的話說，以為一個人只要向前走就是向上走，這么想是非常可能的。那時還不存在文明的每一記錄同時也是野蠻的記錄這種觀念。然而《敘事人》想到了本雅明這個悖論的真理性，同時接納了它的全部項。我們可以說，《敘事人》“表演”了超越它和逃避它的不可能性。也許這是我們時代的唯一方式，民族小說、民族敘事只能夠賴此來恰當地書寫、重寫、再重寫。

在小說開頭，N.說起秘魯——他想逃脫而未遂的秘魯——是他的malhadado país。Malhadado不僅可以理解為“不幸的”，也可理解為“倒霉的”“被詛咒的”，乃至“該死的”。這個形容詞和表示“國家”“家鄉”“民族”的單詞放到一塊兒，讓我們感受到悲劇的音色、羞愧的語義。我們將不得不學會對此習以為常。

## 17 民族之善

如果誰試圖將“我的國家，無論對錯”改成“我的宗教，無論對錯”，他立即就能明白民族主義和宗教的分野所在。后一種說法是不可思議的矛盾。伊斯蘭教之于穆斯林，基督教之于基督徒，或印度教之于印度人，怎么可能是錯的呢？

不過這種差別不應全從表面價值來看。因為設若民族至少假定上可能是錯的，那這種錯是現世的，總是相對于一種超越的正義或善。于是，從與宗教的永恒的善不相干的角度，我們要提的問題是，這種正義的源頭是什么，考慮到民族（不管想起來多么堂皇）都在歷史之內：人們沒有給它在天堂或地獄保留一席之地。下文我將設法草述，有保證的民族之善的三個互相聯系的寄居處是什么。

### 未生者

對這三個寄居處的第一個，最好的說明莫過于馬克斯·韋伯的一段奇語，那是1895年他接受弗萊堡大學教職時發表的著名就職演說中的一番話。[[691]](#_691_9)這篇演講的大部分是對他的新國家即德國之現狀的哀怨。韋伯厭倦地看著周遭的人事，認為容克統治階級完蛋了。“Sie haben ihre Arbeit geleistet und liegen heute im ökonomische Todeskampf.”［他們使命已盡，今天在經濟上垂死掙扎，痛苦不堪。］從作為一個整體的德國市民階級那里，什么好事都別指望。“Nur allzu offenkundig sehnt ein Teil des Grossbürgertums nach dem Erscheinen eines neuen Cäsar,der sie schirme—nach unten gegen aufsteigende Volksklassen—nach oben gegen sozialpolitische Anwandlungen,deren ihnen die deutsche Dynastien verdächtig sind.”［德國市民階級的上層圈子恬不知羞地渴盼有個新凱撒，他將上臺保護他們——下則對抗成長中的大眾階級，上則對抗他們猜疑德國王室懷抱的社會政治改革之心。］另一個圈子“ist längst versunken in jene politische Spiessbürgerei,aus welcher die breiten Schichten des Kleinbürgertums noch niemals erwacht sind”［沉入了政治市儈主義中，小市民階級的廣大階層永遠沒有從中覺醒過來］。他相信無產階級全然不成熟：“weil es für eine grosse Nation nichts vernichtenderes giebt,als die Leitung durch ein politisch unerzogenes Spiessbürgertum,und weil das deutsche Proletariat diesen Charakter noch nicht verloren hat,deshalb sind wir seine politischen Gegner.”［一個大國的最大危險莫甚于被一群政治上茫然無知的市儈所領導，而德國無產階級至今尚須擺脫這種市儈氣，有鑒于此，我們在政治上反對工人執政。］[[692]](#_692_9)人們可能從這種分析中輕易得出結論：德意志民族——這位年輕博學的教授本人除外——全盤皆錯。但是韋伯也帶有一種迥然不同、乍一看很怪異的口氣。這段話值得全文照引：[[693]](#_693_9)

Und—um ein etwas phantastisches Bild zu brauchen—vermöchten wir nach Jahrtausenden dem Grab zu entsteigen,so wären es die fernen Spuren unsres eignen Wesens,nach denen wir im Antlitz des Zukunftsgeschlechts forschen würden.Auch unsre höchsten und letzten irdischen Ideale sind wandelbar und vergänglich.Wir können sie der Zukunft nicht aufzwingen wollen.Aber wir können wollen,dass sie in unserer Art die Art ihrer eignen Ahnen erkennt.Wir,mit unsrer Arbeit und unsrem Wesen,wollen die Vorfahren des Zukunftsgeschlechts sein.

［說得略為夸張一點，如果從現在算起數千年之后我們死而復生，我們會在那些未來族類的相貌中搜尋我們自己生存的依稀印記。誠然，即使我們在此世的至高、終極理想也會改變和消逝，因此我們并不奢望把它們強加于后世。但我們確實期望，未來將在我們的稟性中認出它自己祖先的稟性。我們期望，通過我們的勞作和生存方式，成為未來族類的先人。］

這段話帶著千年至福的音色，我們能夠從中看出回響著宗教沖動的某種東西。這位清醒的比較宗教社會學家狂亂地想象有不可勝計的日耳曼人，幾千年之后，在自豪地想象著……韋伯！而且，這些沒出生的日耳曼人好像強加了義務在1895年的想象者身上，他已經在想象自己死了。起而迎合未來的期望，這是他和他的世紀末的讀者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同樣引人注目的是，數千年以后，那些未來的日耳曼人沒留下任何社會學或政治的特征。他們不是容克，市民階級，也不是無產階級。他們不再翹盼凱撒，甚至也不奉守“我們在此世的至高、終極理想”。這里的時態可以說是將來完成時。正是這無數的未來日耳曼人的未生性，保證了他們的善。

將韋伯的話當作在他威嚴赫赫、保守節制的知識生涯中一個精神錯亂的眩暈時刻，從而草草打發，未免有些輕率。每個國家政治中，每天都在使用這相同的虛夸比喻，只是表述得少些怪氣和詩意罷了。歸根到底，就是以未生者之名，我們被要求刻苦工作、納稅完賦、不吝奉獻，為的是保存傳統、減少國債、保護環境、守衛邊疆，而且如果必要的話，為我們未生的后代獻出我們的生命，雖然我們不能確保以本人的名字命名其中一人。如果我們是美國人，我們不會認為這些未生者是石油億萬富豪、福利騙子、缺席父親、美國中部的市儈、種族主義狂徒和內城歹徒的未來復制品，那些人眼下亂七八糟地糾纏著我們的想象力。未生者除了他們的美國身份，根本沒有任何社會特征；恰是這單色的純粹，保證了他們的善，也允許他們給我們強加義務，這種義務，如果是從當今活著的——為韋伯起見，比方說1995年在世的——諸多美國人那里領受的，我們可能心生怨懟。

我們可以換個角度來看這種韋伯式愿景。潛藏于這位偉大社會學家的呼告下的道德情感，明顯是對1895年德國的羞恥。如果有人問，面對什么人讓他感到這種羞恥，答案似乎一目了然：是Zukunftsgeschlecht（未來族類）的面容。羞恥是未來族類將“在我們的稟性中認出它自己祖先的稟性”這一千禧年希望的反面。這種態度里并沒什么是德國特有的。比如，我們想想那些美國人，他們不是到了應征年齡的男子，卻起勁反對華盛頓在印度支那的不光彩的野蠻冒險，說“它令我為祖國感到羞慚無地”。[[694]](#_694_9)這種政治羞恥，我們只在面對善和純真時才會感覺到，它讓我們在后來人面前抬不起頭。

### 已死者

東石（East Rock）是一處壯觀的絕壁，高聳在新英格蘭的破落小鎮紐黑文上方，那里有一座巨大——而且一點也不可笑——的紀念碑，紀念民族先烈的當地代表。它的基座四面刻著男人和男孩的名字，他們死于四次很不一樣的往日戰爭：反抗喬治三世那個英格蘭的英勇的獨立戰爭；1812年針對同一敵人的不夠英雄的小規模戰斗；1848年對墨西哥進行的邪惡的帝國主義冒險活動；1861—1865年創巨痛深的內戰。不同尋常的是，這一紀念碑視所有這些亡人絕對等同；不管他們是死在光榮的戰場還是可恥的戰場，絲毫不予區別對待。因而他們生命的犧牲與歷史的正義或不義徹底分離了。把他們全部供奉在犧牲者的位置上，就堂而皇之地達到了這種分離。民族先烈可以說已經買了單，結清了他們的道德賬簿。民族英烈從來不是殺人者。這一點，我們只要設想一下紐黑文對學術好事者的反應即知，這些好事之徒經過多年精心研究之后，向市民們建議，在紀念碑上銘刻的每個英名后面，應該加上叫這個名字的人所殺敵人的名字或數目。畢竟，美國的紫心勛章，就像英國的維多利亞十字勛章一樣，通常是授予傷亡者，不是殺戮者的。誰若被引到越戰紀念碑前哭泣，那是為了死在印度支那的大約六萬名美國人，不是為了他們人人各出了一份小力消滅掉的三百多萬男人和婦孺。

民族主義人種學家也注意到紐黑文紀念碑用以記錄民族先烈的那種銘刻風格，通覽一下其他國家里的國家公墓和紀念碑，可知這種風格再平常不過了。初看起來，記下實際的個人姓名可能像是為陣亡者保留了某種殘余的個體性。但轉眼之間我們就會覺察到它與韋伯的千年至福時刻的關聯。因為這些姓名已被剝奪了一切實際的社會學意義，僅僅在某些情況下可能讓人謹慎推知誰誰誰有愛爾蘭、意大利或蘇格蘭血統。沒有階級，沒有宗教，沒有年齡，也沒有政治。（轉成德國人的話說，沒有容克，沒有市民階級，也沒有無產階級。）優先權也沒有：于是采用通常的電話簿的字母表順序。死者成了“純一的美國人”，正是在這種純一性中，善穩當有靠。

紐黑文一定還有少許居民，他們知道這個那個名諱紀念的是他們的家族先祖之一。但是，考慮到自1865年（那時最新一批死者升了天）以來，多少年頭過去了，死者的后人們不可能對他們有什么個人記憶。紀念碑的游客們絕大多數把單個的姓名看作可互換的符號，表示它們如今共有的東西。今天去東石的朝圣者們，被置于韋伯的未來德國人的那個地位上；他們被誘導著極力在自己的稟性中認出他們（集體）祖先的稟性。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民族的已死者和民族的未生者，浩浩蕩蕩、數不勝數地，如何互相映照，給根深蒂固的民族之善提供了最佳擔保。恰是他們聯合而成的那種幽魅，使他們成為過去完成時、將來完成時的美國人。

### 在世者

這下有人該問了：活著的人也能有助于保證國家的善嗎？兩篇新近發表的分別論及美國和印度的優秀文章提示了這樣的可能性。

在勞倫·伯蘭特（Lauren Berlant）的《幼稚公民權理論》中，她先講述了一段說明問題的插曲，那是杰出的激進黑人作家奧黛·羅德（Audré Lorde）念念不忘的幼時生活中發生的。[[695]](#_695_9)羅德后來回憶說，1947年，她的父母帶著她和她的姐姐菲莉絲踏上了去華盛頓特區的國家朝圣之旅。父母小心瞞著孩子們，這趟旅行的原因是，菲莉絲作為黑人小姑娘，被禁止和她中學畢業班的同學們一道，參加學校組織的國都一游。在華盛頓，這家人依然發現自己被當成了不完全的美國人。他們可以在餐館點冰激凌，但不許在店內吃。羅德記得，那一刻她身體上感到惡心，特別是因為她最近剛寫過一篇天真的愛國詩，歌頌巴丹（Bataan）的英雄們。[[696]](#_696_9)但是伯蘭特寫到，就在同一時刻，這位黑人小女孩決定，她要“寫信給總統，再給國家一次機會，不要摧折她對它的渴望”。

再一次機會，再一次機會——美國文化喧囂不已的基本習語之一。然而韋伯不也出于精神上的惡心，著書立說，要再給德國一次機會，不摧折他對它的渴望嗎？難道我們大多數人，盡管困難重重，不想再給我們的國家一次機會嗎？

伯蘭特的文章接下來以較為輕松的筆調，分析了馬特·格羅寧非常流行的諷刺性電視連續劇《辛普森一家》當中的一集。那一集名叫《莉薩先生去華盛頓》，明顯是戲仿二戰前深受喜愛的幼稚的愛國影片《史密斯先生去華盛頓》。這一集故事開頭講到，小莉薩·辛普森被選派去華盛頓，參加以“我為什么愛美國”為主題的少年作文競賽。她突然降臨了國家的首都，同行的有她的小市民爸爸霍默，沒腦子的媽媽瑪吉，玩世不恭、驕縱刁蠻的哥哥巴特。但是她對華盛頓和美國之善的天真信仰，因她碰巧看見她的不誠實的眾議員收受開發商的賄賂，被砸得粉碎。那開發商在打她心愛的當地自然公園的主意。莉薩撕掉了她的作文初稿，重新寫了一篇，主題是“華盛頓惡臭”，馬上輸掉了伯蘭特所稱的這場“國家沙文主義競賽”。但是然后——變變變！——一位喬裝成FBI的仙女出人意料地現身，抓了那個眾議員，他立即成了信仰再生的基督徒。因此莉薩先生斷定，說來說去，“這個體系真的管用”，美國真的是“棒極了”。

格羅寧料定，他的被逗樂的觀眾們確信體系簡直不起作用，美國離“棒極了”還差得遠。那么為什么他無論如何需要表現一個愛國者呢，尤其是一個上當受騙、傻里傻氣的小女愛國者？或許是因為，他也希望被人認為給了美國又一次機會。莉薩先生確保了他的良好用心。[[697]](#_697_9)

盡管如此，莉薩·辛普森擔保民族之善的資格在掐著跑表奔跑。我們可以設想，順著這條道跑了十二年以后，終有一天，她可能在上午成為初次投票的公民，下午去拜訪她的墮胎醫師。她終究是個可替代的角色。她臨時充當了國家的一般兒童的替身，他們不光對性懵懂無知，也尚未被成人政治參與的日常骯臟玷污身心。這類國家兒童——在美國——是美國人。但同樣的兒童在每一民族想象中都露面了，各自帶著它自身的輕微的地方性變調。即將降臨的未生者的一種先頭部隊。

約瑟夫·奧爾特的一篇闡幽發微的文章，提示了民族之善一種更含糊的活著的擔保人。他在該文中考查了北印度最近興起的激進“男人獨身”運動。[[698]](#_698_9)該運動的代言人對國家的印度教（男）青年的道德和肉體墮落發出了洪亮的公開譴責：他們即便不是流于市儈習氣，起碼也是享樂主義、手淫、不信教、游手好閑、玩世不恭、自戀和色欲。這種腐朽被歸因于國家政治階級的腐敗、消費資本主義、“好萊塢”和西方非道德性的無情侵入。它的實際藏身地其實是在年輕男子的身體。根據印度教源遠流長的生命形而上學（bio-metaphysics），精液不但是生殖所需的物質，也是男人深層的生命之本。它不該浪費在手淫、夢遺甚或交媾上，而該為了道德、精神和肉體的健康珍惜它，保藏它。就是這個緣故，獨身的再度流行才被標舉為印度男子氣概全面恢復的必要基礎。

忽視與早些時期的歐洲的相似之處，是說不過去的。喬治·莫斯和其他諸人的著作業已表明，十九世紀晚期的歐洲政治家、道德家、科學家和宗教領袖是多么強烈地為民族退化的憂懼所困，那種憂懼常常著眼于他們各自民族的男青年。[[699]](#_699_9)社會弊病的花名冊跟奧爾特的當代北印度大同小異：享樂主義、手淫、男子女化、不信教、神經衰弱、變態、實利主義，有時甚至還有（西方的）資本主義。貝登堡（Baden-Powell）的男童子軍，德國的漂鳥（Wandervogel）運動，都屬于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系列努力之一，想轉變先前一代人對“青年意大利”、“青年愛爾蘭”之類的較為天真的側重。幾乎所有這些后起的運動都宣揚自我制欲、嚴格的攝生法（有時包括飲食規則），還有兄弟情誼；它們全都如印度教的獨身倡導者所為，利用了地方性的男性禁欲主義的古老傳統。[[700]](#_700_9)要是有誰想說印度教傳下來的男性健康的“精元”論有點異域情調，那他不妨仔細思量一下，“健康”——放到本地習語中去理解——對疑慮不安的、最終是政治性的美國自我表征已變得多么要緊。對（男性）觀眾體育的執迷，部分源于體格健壯的青年男子身體的無盡壯觀場面，它可以當作民族的男子氣概與非腐朽的全豹之一斑，欣然享用。反之，美國醫學協會的統計數據所揭示的各種疾病（癌癥、心臟病、早老性癡呆、艾滋病等）的全國發病率這些東西，只要有可能，就不叫它落入長著人形的公眾視野之內。[[701]](#_701_9)

北印度獨身運動的另一個顯著層面是，那些年輕的追隨者磨煉自己，較少是為個人得救，首要的是為母親印度——這絕對不是傳統的。正是她充當了磁體，圍繞著她，身心失調、混亂不堪的無數印度青年男子，把自己編入秩序井然的力場中（在各種意義上）。從隱喻上說，正是她使得他們全部面朝同一方向，朝向她，不左顧右盼，也不回頭張望：靠近她，但決不匯合或合一。[[702]](#_702_9)在“正常的”核心家庭里，有一個婦女，對她，年幼的男子們不得有性欲之想，卻全都必得致獻無與匹敵、無條件、感恩戴德的忠誠：她就是母親。（他們不能指望哪天一高興就把她攆走，父親對那樣的命運可不高興。）推而廣之就是母親之邦（Motherland），如母親印度、母親意大利、母親阿根廷等，她有權博得同樣的禁欲而恭順的奉獻。我們都知道國家全體公民賴以理解他們彼此間關系的那些比喻：他們是安提戈涅的兄弟和姐妹，不是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男朋友和女朋友，更不用說女朋友和女朋友了。[[703]](#_703_9)公民的兄弟友愛中，凡涉及性欲的都消除了。我們在凝視著，不是凝視彼此的身體，或者探察彼此的眼睛，而是凝視正前方。

這種想象方式，向我們展示了民族之善的最后一個源頭：為一種政治亂倫禁忌所框限的兄弟情誼的可能性。[[704]](#_704_9)據報道，海灣戰爭期間，許多美國飛行員在炸彈或機身上涂寫了意味深長的話：“薩達姆，彎腰吧。”這也許很尋常，但是如果一個人意識到下面這點就會覺得它不尋常了：即便對美國最狂熱的仇視克林頓的人來說，炫耀汽車保險杠上粘貼的標語“比爾，彎腰吧”，那會多么令人難以置信。政治強奸，哪怕是假想的，也被從國家公民權的禁欲想象中排除掉了。

這一切里存在某種有價值之物——雖然這好像很奇怪。它是我們能夠在莉薩先生、在墨西哥冒險行動的可替代的陣亡者、在年輕的韋伯教授的幻想、在政治羞恥、在將來完成式中偵測到的同一價值。這些例子各自以不同卻相關的方式表明了，為什么不管一國政府犯了什么罪行，它那一時的公民支持了什么罪行，“我的國家”終究是善的。在這些愁苦的千禧年時代里，這樣的善可以為益世而棄嗎？

# 索引

（條目后的數字為原書頁碼）

Abadilla,Rolando 阿瓦迪利亞，羅蘭多，223

Abdul Rahman,Tunku 阿布杜爾·拉赫曼，東古，310

Achenwall,Gottfried 阿亨華爾，格特弗里德，37

Acton, John Dahlberg- 阿克頓，約翰·達爾伯格，58—60

Aditjondro,George 阿迪宗德羅，喬治，137

Aguinaldo,Emilio 阿奎納多，埃米利奧，6,49,199,248,253

Aguinaldo,Rodolfo 阿吉納爾多，魯道福，223

Alatas,Ali 阿拉塔斯，阿里，137

Alter,Joseph 奧爾特，約瑟夫，365—366

Althusser,Louis 阿爾都塞，路易，291

Ancient South-East Asian Warfare (Wales) 《古代東南亞的戰爭》（威爾士），4

Anwar Ibrahim 安瓦爾·易卜拉欣，311

Aquino,Agapito “Butz” 阿基諾，阿加皮托·“巴茨”，193

Aquino,Jr., Benigno 小阿基諾，貝尼尼奧，193,208

assassination 暗殺，216,223

Senate 參議員，210

Aquino,Sr., Benigno 老阿基諾，貝尼尼奧，193

Japanese occupation 日本占領，204

Aquino,Corazón (née Cojuangco) 阿基諾，科拉松（娘家姓許寰哥），23,24

cacique democracy 地方巨頭民主制，278

changes wrought 造成的變化，225—226

economic state 經濟狀態，309

family background 家族背景，192—193,203

new regime in power 上臺的新政權，216—220

Aquino,Herminio 阿基諾，埃米尼奧，193,222

Aquino,Paul 阿基諾，保羅，193

Aquino-Oreta,Teresita 阿基諾—奧雷塔，特雷西塔，193

Araña,Juan 阿拉尼亞，胡安，349

Arun Dewathasin 阿倫·德瓦塔辛，187

Athit Kamlangaek 阿鐵·甘朗逸，272

Aung San Suu Kyi 昂山素季，12,327

Bacon, Henry 培根，亨利，48

Baez, Joan 貝茲，瓊，291

Balagtas,Francisco 巴爾塔薩爾，弗蘭西斯科，234

Balzac,Honoré de 巴爾扎克，奧諾雷·德

La Comédie Humaine 《人間喜劇》，334

Barthes,Roland 巴特，羅蘭，37

Barton,Roy 巴頓，羅伊，9

Basco y Vargas,José 巴斯科·巴爾加斯，何塞，195

Belaúnde Terry,Fernando 貝朗德·特里，費爾南多，349—350

Belo,Carlos Ximenes 貝洛，卡洛斯·西門內斯，135

Benda，Harry 班達，哈里，19

Benjamin,Walter 本雅明，沃爾特，297,333

the Erzähler 講故事的人，350—352

Berlant,Lauren 伯蘭特，勞倫

“The Theory of Infantile citizenship” 《幼稚公民權理論》，364—365

Bismarck Archipelago 俾斯麥群島，5

Bolívar,Simón 玻利瓦爾，西蒙，199

Bonifacio,Andrés 博尼法西奧，安德烈，6,23

commemoration 紀念，253—254

execution 處死，50

forms secret society 組建秘密社團，198—199

murder 謀殺，199

Rizal's execution 黎剎的就義，228

Bonner,Raymond 邦納，雷蒙德

Waltzing with a Dictator 《與獨裁者跳華爾茲》，214

Boonsanong Punyothayan 汶沙儂

assassination 暗殺，141,185

Bossuet,Jacques Bénigne 波舒哀，雅克·貝尼涅，59,60

Boutros-Ghali,Boutros 布特羅斯—加利，布特羅斯，138

Bo¸wo¸radet,Prince 波沃拉德，親王，164

Bowring,John 包令，約翰，175

Bracken,Josephine 布拉肯，約瑟芬，256

Brading,David 布雷丁，戴維，259

Braudel,Fernand 布羅代爾，費爾南德，262

Brecht,Bertolt 布萊希特，貝托爾特，29

Brezhnev,Leonid 勃列日涅夫，278,288

Brooke,Rupert 布魯克，魯珀特，51,52

Burgos,José 布爾戈，何塞，229,257

Calosa,Pedro 卡洛薩，佩德羅，64

Carey,Peter 凱里，彼得，134

Carlos III (Borbón) 卡洛斯三世（波旁），195

Carter,James Earl 卡特，詹姆斯·厄爾，133,314

Casement,Roger 凱斯門特，羅杰，349

Casey,William 凱西，威廉，216

Chalard Hiransiri 差拉·希蘭西里，187

Chaliand,Gérard 沙利昂，熱拉爾德

The Penguin Atlas of Diasporas (with Rageau) 《企鵝散居族地圖集》（與拉若合著），44

Chaowalit Yongjaiyut 差瓦立·永猜裕，272

Chatchai Choonhawan 差猜·春哈旺，191

Chiang Kai-shek 蔣介石，214

Child of All Nations (Pramoedya) 《萬國之子》（普拉姆迪亞），292—293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urcell) 《東南亞華人》（珀塞爾），4

Chomnā Sakdinā Thai ( Jit Phumisak) 《今日泰國封建主義的面目》（集·普密薩），169

Clinton,William 克林頓，威廉

lectures Suharto 責備蘇哈托，138

Cojuangco,Eduardo 許寰哥，愛德華多，193,213

Cojuangco,Jr.,José 許寰哥，小何塞，278

Cojuangco,Sr.,José 許寰哥，老何塞，193,208,222,223

Cojuangco,Melecio 許寰哥，梅萊西奧，192

La Comédie Humaine (Balzac) 《人間喜劇》（巴爾扎克），334

Corpuz,Onofre 208,科爾普茲，奧諾弗雷，258—259

Cortés,Hernán 科爾特斯，埃爾南，259

Costa Gomes,Francisco 科斯塔·戈麥斯，弗蘭西斯科，132

Cox,Steve 考克斯，史蒂夫，137

Cromwell,Oliver 克倫威爾，奧利弗，37

Cuenco,Antonino 昆哥，安東尼奧，222

Cuenco,José 昆哥，何塞，222

Cuenco,Mariano 昆哥，馬里亞諾，222

Curzon,George Nathaniel 寇松，喬治·納撒尼爾，55

D'Alembert,Jacques 達朗貝爾，雅克，107

De Gaulle,Charles 戴高樂，夏爾，1

de la Larra,José Mariano 德拉·拉臘，何塞·馬里亞諾，232

de la Puente,Juan 德拉·普恩特，胡安，61—62

de la Torre,Carlos María 德拉·托雷，卡洛斯·馬里亞，228

del Pilar,Marcelo 德爾·皮拉爾，馬塞洛，23,232

The Dawn of Indonesian Nationalism (Nagazumi) 《印尼民族主義的黎明》（永積昭），79

Dewey,George 杜威，喬治，200

Dickens,Charles 狄更斯，查爾斯，355

Diderot,Denis 狄德羅，德尼

Encyclopédie 《百科全書》，107,119

Diponegoro 蒂博內哥羅，32

rebellion 起義，122

Disraeli,Benjamin 迪斯雷利，本杰明

Sybil,or The Two Nations 《西比爾，或兩個民族》，63

Tancred,or The New Crusade 《坦克雷德，或新十字軍》，63,64

Donovan,“Wild Bill” 多諾萬，“野比爾”，311

Dostoyevsky,Fyodor 陀思妥也夫斯基，費奧多爾，355

Durano,Jesús 杜拉諾，赫蘇斯，222

Durano,Thaddeus 杜拉諾，撒迪厄斯，222—223

Dylan,Bob 迪倫，鮑勃，291

Earth of Mankind (Pramoedya) 《人世間》（普拉姆迪亞），292—293

Echols,John 埃科爾斯，約翰，19,20

Educational Progress in Southeast Asia (Furnivall) 《東南亞的教育進步》（弗尼瓦爾），4

Eliot,George 艾略特，喬治，355

Emerson,Rupert 埃莫森，魯珀特

Government and Nat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with Mills and Thompson) 《東南亞的政府與民族主義》（與米爾斯、湯普森合著），4

Encyclopédie (Diderot) 《百科全書》（狄德羅），107,119

Engels,Friedrich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63

Enrile,Juan Ponce 恩里萊，胡安·龐塞，213

Euripides 歐里庇得斯，244

Felipe II (Habsburg) 菲利普二世（哈布斯堡），194,195,262,319

Felipe V (Borbón) 菲利普五世（波旁），260—261

Fernandez,Doreen 費爾南德斯，多琳，233,236

interview with Guerrero 對格雷羅的訪談，259—262

El Filibusterismo (Rizal) 《起義者》（黎剎），23,198,235

Fitzcarrald,Fermín 菲茨卡拉爾多，費爾明，348

Fitzcarraldo (film) 《菲茨卡拉爾多》（電影），348

Flood, Thadeus 弗勒德，撒迪厄斯， 143,162,167

Footprints in the Mire (Pramoedya) 《泥沼里的足跡》（普拉姆迪亞），292—293

Ford, Gerald 福特，杰拉爾德，132,314

Foundational Fictions (Sommer) 《核心小說》（薩默），355—357

Fraser,Donald 弗雷澤，唐納德，293

Furnivall,John 弗尼瓦爾，約翰， 9,318

Educational Progress in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的教育進步》，4

Welfare and Progress in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的福利與進步》，4

Galdós see Pérez Galdós 加爾多斯，參見 佩雷斯·加爾多斯

Geertz,Clifford 格爾茨，克利福德，19

“Inner Indonesia” 內印尼，80

Geertz,Hildred 格爾茨，希爾德雷德，87

Gellner,Ernest 蓋爾納，恩斯特，64

George III (Hanover) 喬治三世（漢諾威），61,363

George V (Windsor) 喬治五世（溫莎），52,55

Gillego,Bonifacio 希列戈，博尼法西奧，222

The Glass House (Pramoedya) 《玻璃屋》（普拉姆迪亞），292—293,338

Gogol,Nikolai 果戈理，尼古拉，354

Goncharov,Ivan 岡察洛夫，伊萬，355

Gorbachov,Mikhail 戈爾巴喬夫，米哈伊爾，277

Gordon,Katharine 戈登，凱瑟琳，223

Gordon,Richard 戈登，理查，223

Government and Nat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Emerson et al.) 《東南亞的政府與民族主義》（埃莫森等人），4

Gramsci,Antonio 葛蘭西，安東尼奧，291

Groening,Matt 格羅寧，馬特

The Simpsons 《辛普森一家》，365

Guerrero,Cesar María 格雷羅，塞薩爾·馬里亞，248

Guerrero,Leon María 格雷羅，萊昂·馬里亞，233

bowdlerization of Rizal 對黎剎的刪節，241—243

creates anachronism 造成時代錯誤，244—245

de-Europeanization of Rizal 對黎剎的去歐洲化，244—245

delocalization 去地方化，243—244

demodernization 去現時化，238—239

excises readers 排除讀者，239—240

family history 家族史，248—249

life and background 生活與背景，247—250

racial identity 種族認同，257—258

strategic translation of Rizal 對黎剎的策略性翻譯，236—239,259—262

and Tagalog language 和他加祿語，255

Today Began Yesterday 《今始于昔》，250

Guerrero,Wilfrido 格雷羅，維爾弗里多，249

The Gunman/Mue Puen (film) 《槍手》（電影），174—175,189

Gusmão,Xanana 古斯芒，沙納納，8,137

Habibie,Burhanuddin 哈比比，巴哈努鼎，vii, 317

El Hablador (Vargas Llosa) 《敘事人》（巴爾加斯·略薩），25,337—338

the Erzähler and hablador 講故事的人和敘事人，350—356

extremes of Peruvian society 秘魯社會的極端，356—359

synopsis 梗概，338—347

Haly, Alex 哈利，亞力克斯

Roots 《根》，71—72

Hall,D.G.E. 霍爾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史》，4

Hardenburg,W.H. 哈爾登堡，349

Harrison,Francis 哈里森，弗朗西斯，202

Hassan,Mohammad (“Bob”) 哈桑，穆罕默德·（“鮑勃”），307

Hatta,Mohammad 哈達，穆罕默德，7

organized popular support 有組織的民眾支持，279

Hayden,Ralston 海登，羅爾斯頓，9

Hearst,William Randolph 赫斯特，威廉·倫道夫，200

Heng Samrin 韓桑林，17

Herzog,Werner 赫爾佐格，維爾納

Fitzcarraldo 《菲茨卡拉爾多》，348

Hindley,Donald 欣德利，唐納德，281

Hirohito 裕仁天皇，3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Hall) 《東南亞史》（霍爾），4

Hitler,Adolf 希特勒，阿道夫

Sukarno's speech 蘇加諾的演說，1—2

Ho Chi Minh 胡志明，7

Hobbes,Thomas 霍布斯，托馬斯，37

Hobsbawm,Eric 霍布斯鮑姆，埃里克，64

Holt,Claire 霍爾特，克萊爾，19

Honasan,Gregorio 霍納桑，格雷戈里奧，217

Horthy,Miklós 霍希，米克洛什，30

Hugo,Victor 雨果，維克多，54

Hun Sen 洪森，78

Ibnu Sutowo 伊布努·蘇托沃，314

Imam Supardi 伊馬姆·蘇帕爾迪，82

Jackson,Andrew 杰克遜，安德魯，49

Jaew,“Sia” 雅俄，“大亨”，188

Jefferson,Thomas 杰斐遜，托馬斯，49

Jit Phumisak 集·普密薩

Chomnā Sakdinā Thai 《今日泰國封建主義的面目》，169

Joaquín,Nick 華金，尼克，207,259

John (Plantagenet) 約翰（金雀花王朝），57

John Paul (Karol Wojtyla) 約翰·保羅（卡洛爾·沃伊蒂瓦），135,136

Johnson,Lyndon 約翰遜，林登，146

and Marcos 與馬科斯，214

Vietnam 越南，288,308

Kadji 卡吉，85—88

Kafka,Franz 卡夫卡，弗朗茨

Die Metamorphose 《變形記》，344,352

Kahin,George 卡欣，喬治，18—19

Kartini 卡蒂妮

Through Darkness to Light 《從黑暗到光明》，79

Kasian Tejapira 加信，泰差皮拉，297—298

Kennedy,John F. 肯尼迪，約翰，212

Kennedy,Paul 肯尼迪，保羅，67

Kethavy,Kim 凱薩維，金，71

Key,V.O.基，273

Kissinger,Henry 基辛格，亨利，132,133,169

visit to Peking 訪問北京，269

Kitti Wuttho 吉滴烏斗，167,171

Kriangsak Chomanan 江薩·差瑪南，186,271

China and Vietnam 中國和越南，312

Krit Sivara 吉·西瓦拉，182

Kukrit Pramote 克立·巴莫，141

Kun, Béla 庫恩，貝拉，30

Lacson,Jr.,Daniel 拉克松，小，丹尼爾，223

Lacson,José Carlos 拉克松，何塞·卡洛斯，223

Lacson,Rafael 拉克松，拉斐爾，207

Lacson-Locsin, Soledad 拉克松—洛欽，索萊達，233,234

Lansdale,Edward 蘭斯代爾，愛德華，207,219

Laqueur,Thomas 拉克，托馬斯，51

Lasker,Bruno 拉斯克，布魯諾

Human Bondage in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的人性枷鎖》，4

Peoples of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各民族》，4

Laurel,Sr.,José 勞雷爾，老何塞，204,249

Laurel,Salvador 勞雷爾，薩爾瓦多，223

Lawrence,David Herbert 勞倫斯，大衛·赫伯特，355

Lawrence,Thomas Edward 勞倫斯，托馬斯·愛德華，63

Le Pen,Jean-Marie 勒龐，讓—馬里，72—73

Lee Kwan-yew 李光耀，15,311

Lenin,Vladimir Ilich 列寧，弗拉基米爾·伊里奇，173

Léopold II (Saxe-Coburg) 利奧波德二世（薩克森—科堡），349

Leskov,Nikolai 列斯科夫，尼古拉，352,354

Lincoln,Abraham 林肯，亞伯拉罕，47—49

Lobato,Nicolau 洛巴托，尼古勞，134

Lobregat,Maria Clara 羅布雷加特，瑪麗亞·克拉拉，198

Lon Nol 朗諾，171

Lopez-Padilla Olive 洛佩斯—帕迪利亞，奧利弗，223

Lorde,Audré 羅德，奧黛，364

Louis XV (Bourbon) 路易十五（波旁），53

Louis XVI (Bourbon) 路易十六（波旁），121

Luce,Gordon 盧斯，戈登，9

Luna,Antonio 盧納，安東尼奧，23,233,253

Mabini,Apolinario 馬比尼，阿波利納里奧，6,23,232—233

honor 尊崇， 253

MacArthur,Douglas 麥克阿瑟，道格拉斯，204,205

Machado de Assis, Joaquim 馬查多·德·阿西斯，若阿欣，231

Magsaysay,Ramón 麥格賽賽，拉蒙，207,219,250

Mahan,Alfred 馬漢，阿爾弗雷德，200

Mahathir bin Mohamed 馬哈蒂爾·賓·穆罕默德，304

Mangoenkoesoemo Goenawan 芒坤庫蘇摩，古納萬，85,104

Mangoenkoesoemo,Tjipto 芒坤庫蘇摩，笈多，85

Mann, Thomas 曼，托馬斯，355

Mao Tse-tung 毛澤東，167,209

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大革命，288

economics 經濟學，301,302

and Nixon 與尼克松，269

Marcos,Ferdinand 馬科斯，費迪南德，16,23

and Aquino's cousin 與阿基諾的堂兄，193

becomes president 成為總統，210

cacique dictatorship 地方巨頭獨裁制，276—277

emigration of native Filipinos 土著菲律賓人的徙居，306

entrenches power 鞏固權力，213—216

and Guerrero 與格雷羅，250

murder conviction 謀殺罪，249

rents for military bases 出租軍事基地，308

revolt against 反馬科斯叛亂，217

support for 支持馬科斯，211—213

suspension of rule of law 法治的中止，203

and the US 與美國，308—309

Marcos,Imelda 馬科斯，伊梅爾達，214,215

Martí,José 馬蒂，何塞，311

Marx,Karl 馬克思，卡爾，291,293

Maspéro,Henri 馬伯樂，9

Maybury-Lewis,David 梅伯里—劉易斯，戴維，25

McKinley,William 麥金萊，威廉，200

Melville,Herman 梅爾維爾，赫爾曼，355

Die Metamorphose (Kafka) 《變形記》（卡夫卡），344,352

Michelet,Jules 米什萊，朱爾，57

Misbach 米斯巴赫，30—31,35

Misuari,Nur 米蘇阿里，努爾，211

Mosse, George 莫斯，喬治，366

Mountbatten,Louis 蒙巴頓，路易斯，3

Moynihan,Patrick 莫伊尼漢，帕特尼克，133

Mue Puen/The Gunman (film) 《槍手》（電影），174—175,189

Muhammad the Prophet 先知穆罕默德，124

Murdani,Benny 穆達尼，本尼，133,134,136,138

Murtopo,Ali 穆托波，阿里，133

Mus,Paul 馬斯，保羅，9

Musil,Robert 穆齊爾，羅伯特，48,355

Posthumous Papers of a Living Author 《生前遺著》，46—47

Nagazumi,Akira 永積昭

The Dawn of Indonesian Nationalism 《印尼民族主義的黎明》，79

Napoléon I 拿破侖一世，54

Napoléon II 拿破侖二世，54

Narong Kittikajon 納隆·吉滴卡宗，154

Ne Win 奈溫，327

Nehru,Jawaharlal 尼赫魯，賈瓦哈拉爾，7,132

Ngo Dinh Diem 吳庭艷，300

Nixon,Richard 尼克松，理查德，169

and China 與中國，269

and Marcos 與馬科斯，214,308

Noli Me Tangere (Rizal) 《不許犯我》（黎剎）2,23,24,198

anachronism created by Guerrero 格雷羅造成的時代錯誤，224—225

bowdlerization by Guerrero 格雷羅的刪節，241—243

commentary to readers 向讀者發表的評論，239—240

de-Europeanization 去歐洲化，244—245

delocalization 去地方化，243—244

demodernization 去現時化，238—239

Guerrero's strategic translation 格雷羅的策略性翻譯，233,235—238,259—262

plot and style 情節與文體，229—232

use of Tagalog 他加祿語的運用，232—234,241,255

Nu 吳努，7

Osmeña,Emilio 奧斯梅尼亞，埃米利奧，222

Osmeña,John 奧斯梅尼亞，約翰，221

Osmeña,Jr.,Sergio 奧斯梅尼亞，小，塞爾吉奧，210,215

Osmeña,Sr.,Sergio 奧斯梅尼亞，老，塞爾吉奧，203,204

Osmeña,Thomas 奧斯梅尼亞，托馬斯，222

Pahlavi,Reza 巴列維，禮薩，214

Pak Chung Hee 樸正熙，214

Panič,Milan 帕尼什，米蘭，71

Papandreou,Andreas 帕潘德里歐，安德烈亞斯，71

The Penguin Atlas of Diasporas (Chaliand and Rageau) 《企鵝散居族地圖集》（沙利昂和拉若合著），44

Peoples of Southeast Asia (Lasker) 《東南亞各民族》（拉斯克），4

Pérez Galdós,Benito 佩雷斯·加爾多斯，貝尼托，232

Petty,William 配第，威廉

Political Arithmetic 《政治算術》，37,38

Phahon Phonphayuhasena 披耶·帕鳳裕庭，176

Phao Siyanon 炮·西耶儂，140,177

dealing with enemies 對付敵人，172

Phibun Phibunsongkhram 披汶頌堪，140,145,176—177,311

and the monarchy 與君主制，163—164

Phimonladham 披莫丹，172

Phiphat Rotwanitchakorn (“Sia Huad”) 披帕·羅瓦尼差空（“滑頭大亨”），190—191

Pigeaud,Theodoor 皮若，特奧多爾，9

Pipit Rochijat Kartawidjaja 卡塔維查亞，293—294

Pizarro,Francisco 皮薩羅，弗蘭西斯科，259

Poem of a Time of Darkness (Ronggawarsita) 《黑暗之時》（龍加瓦西塔），77—79

Poensen,Carel 普恩森，卡雷爾，123

Poh 傅，190,191

Pol Pot 波爾布特，17

support from China 中國的支持，271

Political Arithmetic (Petty) 《政治算術》（配第），37,38

Pollard,Jonathan 波拉德，喬納森，71

Posthumous Papers of a Living Author (Musil) 《生前遺著》（穆齊爾），46—47

Pramarn Adireksan 巴曼·阿滴列山，171

Pramoedya Ananta Toer 普拉姆迪 亞·阿南達·杜爾，291—293

Buru Quartet 布魯島四部曲，337

Child of All Nations 《萬國之子》，292—293

Earth of Mankind 《人世間》，292—293

Footprints in the Mire 《泥沼里的足跡》，292—293

The Glass House 《玻璃屋》，292—293,338

She Who Gave Up/Dia Jang Menjerah 《她投降了》，40—42

Praphat Jarusathien 巴博·乍魯沙天，22,140,142,146,268—269

collapse of dictatorship 獨裁制的崩潰，270

compared to Sarit 與沙立相比，153

downfall 垮臺，154

thievery 盜財，276

Prasit Kanjanawat 巴實·坎亞那瓦，303

Prem Tinsulanonda 炳·廷素拉暖，271—272

Pridi Phanomyong 比里·帕儂榮，6

Prophetic Lament for Sri Ayutthaya 《先知哀大城》，139

Proust,Marcel 普魯斯特，馬塞爾，334

Purcell, Victor 珀塞爾，維克多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華人》，4

Putu Wijaya 普圖·維查雅，337

Quezon,Manuel 奎松，曼努埃爾，203,204,205,274

Quirino,Carlos 季里諾，卡洛斯，249

Quirino,Elpodio 季里諾，埃爾皮迪奧，206

Raffles,Stamford 萊佛士，史丹福，122

Rageau,Jean-Pierre 拉若，讓—皮埃爾

The Penguin Atlas of Diasporas (with Chaliand) 《企鵝散居族地圖集》（與沙利昂合著），44

Rama IV 拉瑪四世，162,295

Rama V 拉瑪五世，162,163,176,268

Rama VI 拉瑪六世，157,163

Rama VII 拉瑪七世，163

Rama IX 拉瑪九世，171

intervenes against dictatorship 出手反獨裁，289,312

Ramos,Fidel 拉莫斯，菲德爾，280

Reagan,Ronald 里根，羅納德，219,271

campaign against Evil Empire 對抗“邪惡帝國”的運動，290

and Marcos 與馬科斯，309

Recto,Claro 雷克托，科拉羅，249,250

prevents female suffrage 阻止女性選舉權，252

Rinkes,Douwe Adolf 林克斯，杜韋·阿道夫，123

Rizal,José 黎剎，何塞

bowdlerization by Guerrero 格雷羅的刪節，241—243

commemoration 紀念，49—51

commentary to reader 向讀者發表的評論，239—240

demodernization 去現時化，238—239

El Filibusterismo 《起義者》，23

European influence 歐洲的影響，244—245

execution 處決，198,228

family 家庭，229

last poem to Las Filipinas 給菲律賓的訣別詩，256—258

life and education 生活和教育，227—229

Noli Me Tangere 《不許犯我》，2,23,24

satire worries Guerrero 譏諷困擾著格雷羅，251—253

style 文體，229—232

use of Tagalog 他加祿語的運用，232—234,235—238,241

Rizal,Paciano 黎剎，帕西亞諾，229

Robertson,Walter 羅伯遜，沃爾特，250

Romulo,Carlos 羅慕洛，卡洛斯，249—250

Ronggawarsita,R. Ng. 龍加瓦西塔，104,122

Poem of a Time of Darkness 《黑暗之時》，77—79

Roots (Haley) 《根》（哈利），71—72

Rousseau,Jean-Jacques 盧梭，讓—雅克，54

Rowlandson,Mary 羅蘭森，瑪麗，60—61,62

Roxas,Manuel 羅哈斯，曼努埃爾，205—206,275

Rushdie,Salman 拉什迪，薩爾曼，232

Saavedra,Alonso/Alvaro de 薩阿維德拉，阿隆索/阿爾瓦羅·德，261,262

Sacirbey,Mohammed 薩希爾貝，穆罕默德，71

Saddam Hussein 薩達姆·侯賽因，136

Salazar,António de Oliveira 薩拉查，安東尼奧·德·奧利維拉，131

San Martín,José de 圣馬丁，何塞·德，333

Santos,Rufino 桑多斯，魯菲諾，253

Sanya Thammasak 訕耶·探馬塞，155,270

Sarit Thanarat 沙立·他納叻，22,140,142,268

absolutism 獨裁制，277,283

changes ideological atmosphere 改變意識形態氛圍，164—165

dealing with enemies 對付敵人，172

dictatorship 獨裁制，145—146

landholding 擁有土地，147

powerful presence 強權存在，153

state killings 政府謀殺，177—178

thievery 盜財，276

and Vietnam 與越南，312

Sasanasophon 薩沙納索朋，172

Scherer,Savitri 謝勒，薩維特里，102

Schrieke,Bertram 施里克，貝特蘭，9

Seksan Prasertkul 社山·巴色素軍，295—296

Semaun 司馬溫，130

Sénghor,Léopold 桑戈爾，利奧波德，44

Seno Gumira Adjidarmo 塞諾·古米拉·阿吉達摩，355

Serat Centhini 《真蒂尼》，105—107

compared to Suluk Gatholoco 與《加多羅科神秘書》相比，127

conjuring 變戲法，115—119

dream of phantasmagoric utopia 幻影式烏托邦的夢想，119—121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d class antagonism 知識生產與階級對抗，107—111

sexuality 性，111—115,120—121

Shakespeare, William 莎士比亞，威廉

The Merchant of Venice 《威尼斯商人》，35

She Who Gave Up/Dia Jang Menjerah (Pramoedya) 《她投降了》（普拉姆迪亞），40—42

“Sia Huad”(Phiphat Rotwanitchakorn)“滑頭大亨”（披帕·羅瓦尼差空），190—191

Sihanouk,Norodom 西哈努克，諾羅敦，7

Simatupang,Iwan 西馬圖龐，伊萬，337

The Simpsons (television) 《辛普森一家》（電視劇），365

Sin,Jaime 辛海梅，218

Sinclair,John 辛克萊，約翰

Statistical Account of Scotland 《蘇格蘭統計紀事》，38

Sison,José Maria 西松，何塞·馬里亞，211

Sjahrir,Sutan 薩里爾，蘇丹，279

Snouck Hurgronje,Christiaan 史努 克·胡格倫治，克里斯蒂安，123

Soetomo,Dr.蘇多摩醫生，21,24

Budi Utomo 至善社，80—81,100—104

childhood and education 童年和教育，89—97

father 父親，94—98,102

friendships 友朋，85

grandfather 外祖父，85—88,93—94

life 生活，81—82

traditional and progressive currents 傳統的和進步的思潮，88—89

uncle's teachings 舅父的教誨，92

Soewardi Soerjaningrat 蘇瓦爾迪·蘇占寧拉，31—32

La Solidaridad (journal) 《團結報》（報刊），229

Sommer,Doris 薩默，多麗絲，350,356,359

Foundational Fictions 《核心小說》，355—357

Somoza,Anastasio 索摩查，阿納斯塔西奧，214

Soufflot, Jacques-Germain 蘇弗洛，雅克—熱爾曼，53

Soyinka,Wole 索因卡，沃萊，44

Stahl,Max 施塔爾，馬克斯，137

Stalin,Josef 斯大林，約瑟夫，67,290

Starke,Hortensia 斯塔克，霍滕西婭，197—198,224

Statistical Account of Scotland (Sinclair) 《蘇格蘭統計紀事》（辛克萊），38

Stephenson,George 斯蒂芬森，喬治，63

Suchinda Kraprayoon 素金達·卡巴允，272

Sudirman 蘇迪爾曼，279

Sudisman 蘇迪斯曼，83,103

Sudsai Hatsadin 色賽·哈沙丁，158

Suharto 蘇哈托，12

invasion of East Timor 入侵東帝汶，132—138,314

midnight murders 午夜謀殺，287

Nehru's Opposite 尼赫魯的反面，132

New Order 新秩序，282—283,304

overthrows Sukarno 推翻蘇加諾，16

political regime 政治體制，314—317

repression of Marxism 對馬克思主義的鎮壓，287—288

super-tycoons 超級大亨，315—316

takes power 掌權，299

and the US 與美國，314

Sukarno 蘇加諾，7

anti-western foreign policy 反西方的對外政策，287

collapse of economy 經濟崩潰，313

coup against 反蘇加諾的政變，299

on Hitler 論希特勒，1—2

organized popular support 有組織的民眾支持，279,281,287

overthrown 被推翻，16

Suluk Gatholoco 《加多羅科神秘書》，122—129

sexuality 性愛，125—126

suppression 被壓抑，123—124

Sumulong, Francisco “Komong” 蘇穆隆，弗朗西斯科·“科芒”，193,223

Šušak, Goyko 蘇薩克，戈伊科，74

Sybil,or The Two Nations(Disraeli)《西比爾，或兩個民族》（迪斯雷利），63

Taagepera, Rein 塔格佩拉，賴因，71

Tagore,Rabindranath 泰戈爾，拉賓德拉納特，232

Tancred,or The New Crusade (Disraeli)《坦克雷德，或新十字軍》（迪斯雷利），63,64

Tanizaki,Junichiro 谷崎潤一郎，335

Tanjuatco,Emigdio 陳華哥，埃米迪奧，193

Tan Ling Djie 陳粦如，315

Templar,Gerald 坦普勒，杰拉德，13

Teng Hsiao-p'ing 鄧小平，186,277,290

Thai Rath (newspaper) 《泰國日報》（報刊），183

Thanin Kraiwichian 他寧·蓋威遷，186—187

Thanom Kittikajon 他儂·吉滴卡宗，22,140,142,146,171—172,268—269

collapse of dictatorship 獨裁制的崩潰，270

compared to Sarit 與沙立相比，153

downfall 垮臺，154

thievery 盜財，276

“The Theory of Infantile Citizenship” (Berlant) 《幼稚公民權理論》（伯蘭特），364—365

Thongchai Winichakul 通猜·維尼察古，296—297

Through Darkness to Light (Kartini) 《從黑暗到光明》（卡蒂妮），79

Tirtoadisuryo 迪爾托·阿迪·蘇里約，292

Tocqueville,Alexis de 托克維爾，阿列克謝·德，38

Today Began Yesterday (Guerrero) 《今始于昔》（格雷羅），250

Tolstoy,Leo 托爾斯泰，列夫，355

Townsend,Peter 湯森，彼得，342

Trujillo,Rafael 特魯希略，拉斐爾，214

Tudjman,Franjo 圖季曼，弗拉尼奧，73—74

Turgenev,Ivan 屠格涅夫，伊萬，355

Twain,Mark 吐溫，馬克，105,355

Tyminski,Stanislaw 蒂明斯基，斯坦尼斯瓦夫，71

Utharn Sanidwong 烏坦·沙尼東，172,173

Uthit Naksawat 烏迪·那沙瓦，172

van Akkeren,Philippus 范艾克倫，菲利普斯，123

Van Niel,Robert 范尼爾，羅伯特，79—80

Vargas Llosa,Mario 巴爾加斯·略薩，馬里奧，333

the Erzähler and hablador 講故事的人與敘事人，350—356

extremes of Peruvian socity 秘魯社會的極端，356—359

El Hablador 《敘事人》，25,337— 338

synopsis of El Hablador 《敘事人》梗概338—347

Velasco Alvorado,Juan 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胡安，349—350

Voltaire (Francois Marie Arouet) 伏爾泰（弗朗索瓦·馬里耶·阿魯埃），54

Wahidin Soedirohoesodo 瓦希丁，蘇迪羅胡梭多，99—101

Wales,H.Quaritch 威爾士，夸里奇

Ancient South-East Asian Warfare 《古代東南亞的戰爭》，4

Walesa,Lech 瓦文薩，萊赫，71

Waltzing with a Dictator (Bonner) 《與獨裁者跳華爾茲》（邦納），214

Warner,Michael 沃納，邁克爾，62—63

Warouw,Rudolf 瓦魯烏，魯道福，136—137

Washington, George 華盛頓，喬治，49

Weber,Max 韋伯，馬克斯

ominous lecture about state of Germany 對德國現狀的不吉演說，360—363

Welfare and Progress in South-East Asia (Furnivall) 《東南亞的福利與進步》（弗尼瓦爾），4

White Peril《白禍》，168

Wilkinson,R.J. 威爾金森，9

William I (Oranje-Nassau) 威廉一世（奧倫治—納塞），122

Wilson,Harold 威爾遜，哈羅德，310

Wilson,Woodrow 威爾遜，伍德羅，202

Winstedt,Richard 溫斯特德，理查德，9

Wolters,O.W.沃爾特斯，12—13

Xanana Gusmão see Gusmão,Xanana參見 古斯芒，沙納納

Zola,Émile 左拉，埃米爾，334

# 注釋

#### 導言

[[1]](#_1_107)這一講話的官方書面版本是Soekarno（蘇加諾），Ilmu Pengetahuan Sekadar Alat Mentjapai Sesuatu （《以科學知識為求取之具》，Jakarta: Departemen Penerangan Republik Indonesia，Penerbitan Chusus no. 253，1963）。該演說的更多引文，對其論題的某些分析，以及與戴高樂的修辭術的一個比較，參見拙著《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第2章。

[[2]](#_2_102)這一瞬間出現在第八章（“Recuerdos”[回憶]）。參見José Rizal，Noli Me Tangere（Manila: Instituto Nacional de Historia，1978；根據1887年柏林初版膠印），第43頁。這部小說的一個相當不錯的新英譯本1997年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題目未變。[中譯本《社會毒瘤》，陳堯光、柏群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這是根據1902年英譯本翻譯的。“maquinalmente”本義為“機械地、自動地”。——譯注]

[[3]](#_3_97)這個詞的字面意思是“南方的異域”，是“北洋”或者“北方的異域”的反義詞。但是“洋”這個字含有水的部首，所以這兩個詞都用來表示在北京看來跟海相聯的那些地方。令人好奇的是，“北洋”不僅用來指遼寧和山東的兩個半島，而且甚至包括直隸，那是帝國首都所在的濱海省份。（因此在1920年代，掌控著北京的軍閥稱作北洋系。）長城以北的廣袤區域從未被這樣叫過。類似地，“南洋”既用來指華南的沿海省份，特別是廣東和福建，也包含馬來群島（今日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但不包含陸路可通的緬甸和老撾。（感謝許慧文[Vivienne Shue]對此的指點。）

[[4]](#_4_97)英屬緬甸、馬來亞、新加坡，美屬菲律賓，荷屬東印度，在直接軍事進攻中通通淪陷。由于維希政權是軸心集團的盟友，日本人直到1945年3月都沒有鏟除法國人。不過，此前他們作為“盟友”維持了一種統治性的存在，殖民地的維希政權只能俯首聽命。在暹羅，識時務的軍事獨裁者鑾披汶·頌堪為了避免最壞的結果，早早地就同東京結盟了，但是他仍然不得不允許日軍穿越他的國土，而且還得在其他方面服從他們的命令。

[[5]](#_5_89)令人敬畏的例外也許是法國殖民時代的學者喬治·克代斯（Georges Coedès）的杰作，《印度支那和印尼的印度化國家》（Les États hindouisés d'Indochine et d'Indonésie, Paris: E. de Boccard，1948）。在對十五世紀前被梵化的這些國家所進行的這項宏偉比較研究中，“東南亞”、“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亞”僅僅是簡記的地理名稱，但也足可表明緬甸和菲律賓不在它的范圍內。當二十年后這部書終于有英譯本出版的時候，美國冷戰的年代誤植將標題變成了《東南亞的印度化國家》。

[[6]](#_6_83)可別誤解了：印度教和密宗大乘佛教早在基督紀元之初就已傳到東南亞的某些地區，最遲從四世紀開始成為宮廷禮拜的基礎。不過可以確信，很多世紀以來，大部分人是萬物有靈論者。印度教崇拜和佛教崇拜可以相互競爭或融合，不會卷入難以收拾的沖突中。直到十二世紀末，重大變化才發生了，那時一種更加樸質苦修的佛教形式——小乘佛教（Hinayana或Theravada）——從錫蘭傳入，把它的前輩們越來越擠到一邊去了。

[[7]](#_7_81)形形色色的（mottled）——“其特點表現為色片的不規則安排”，似乎比“白種的”或“高加索人的”在視覺上更準確，在道德上少些可疑。

[[8]](#_8_81)關于這一制圖革命的最權威著述，當推東猜·維尼察古著，《圖繪暹羅：一個民族的地理體史》（Thongchai Winichakul，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

[[9]](#_9_77)從公元一世紀下半葉到十世紀中葉。最權威的著作是基思·韋爾克·泰勒的《越南的誕生》（Keith Welker Taylor，The Birth of Vietna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10]](#_10_75)但是不存在集團（bloc）的意思。所有團體都尋求同帝國主義宗主國的進步團體結盟。印尼的革命者與澳大利亞、埃及和尼赫魯的新獨立的印度建起了有效紐帶。所有激進的左翼組織不同程度上都跟蘇聯和（1949年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接上了頭。

[[11]](#_11_71)東南亞的某種不穩定性在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成員國中依然顯著。當地國家中只有暹羅和菲律賓加入了，它們的盟友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新西蘭、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亞。

[[12]](#_12_69)這一遙遠而人煙稀少的地區，從19世紀末開始由北婆羅洲公司經營，直到日本軍隊將它的商業政權掃落在地。太平洋戰爭結束后，白廳接管了它。

[[13]](#_13_67)蘇加諾對倫敦這一舉措怒不可遏，最終引起他的政府與哈羅德·威爾遜在東方的殘余帝國之間的半武裝對抗。這起事件的大多數戰斗發生在婆羅洲，在那里，廓爾喀人雇傭兵或許是履行了他們最后一次抗擊使命。

[[14]](#_14_63)在過渡時期——即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成立與東南亞國家聯盟的創建之間，暹羅成了遍及那些大陸國家的大規模美國干涉的軍事、經濟和政治中心。

[[15]](#_15_63)這個論題在我以下論文中有詳盡闡述：“美國東南亞研究的變化中的生態學”，收入Charles Hirschman，Charles F. Keyes和Karl Hutterer編，《前途未卜的東南亞研究：美國視角下的反思》（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Balance: Reflections from America），Ann Arbo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1992，第25—40頁。

[[16]](#_16_63)弗尼瓦爾部分地算個例外。他早在1930年代就開始發表對英國在緬甸的殖民主義的辛辣批評，不過那只是在他辭去殖民地公職以后。

[[17]](#_17_57)然而應當注意的是，第一代“東南亞專家”（Southeast Asianists）中，許多人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在美國軍隊里服役，或者是從戰前的大學圈子里抽調到戰略服務處（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和海軍情報處（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的。戰后有很多人留在國務院經年，是進步的、反殖的核心，直到麥卡錫主義興起，將他們逐出為止。（戰略服務處是中央情報局的前身，始建于1942年，1945年10月解散，此后它的職能和職員就由國務院和國防部接收。真正的中央情報局到1947年方才成立。）

[[18]](#_18_55)這類課程的編排需要展現冷戰之前的統一性因素，展現比那些年的政治沖突“深層”一點的東西。這絕不是一帆風順的：標準的（通用的）有關該地區的歷史教科書（初版于1971年，吉隆坡，牛津大學出版社）在其最新的修訂版中，依舊可悲地名曰《尋找東南亞》（In Search of Southeast Asia），就很說明問題。最有意思的“統一因素”肯定是對稱親屬系統和隨妻居住模式的廣泛流行，這兩者都傾向于給予婦女較好的社會地位。這里有一個顯著的對比，就是中國、日本和印度盛行的父系的、從夫居的系統，那使婦女嚴重地降到從屬地位。一個不太要緊的共同因素是，東南亞沿海一帶，但不是北部和西部，都使用發酵的魚和軟體動物制成的調味品，這賦予當地烹飪一種獨特而相近的風味。

[[19]](#_19_56)試比較同處冷戰時期，卻將“西歐”和“東歐”研究劃分開來的刻板得多的界限。

[[20]](#_20_54) 最卓越的典范是康奈爾大學有關東南亞的埃科爾斯藏書（Echols Collection），目前有西方語言和當地語言的將近50萬種印刷卷冊、縮微膠片與縮微平片，還有23000種期刊——比國會圖書館的收藏多一半。同一時代里，歐洲帝國中心那些財政捉襟見肘的大學，哪怕是在名義上采納了一種東南亞研究模式的地方，往往都專注于本國的前殖民地，專注于使用現存的卷帙浩繁的殖民檔案。

[[21]](#_21_55)雖然大部分來自東南亞的學生自然而然地做著有關他們祖國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研究，可是到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已經有少許人在做本地區其他國家的研究了——這在以往年代里幾乎不可設想。

[[22]](#_22_55)這種古怪的權威是多么不可思議的真實，這一點最初給我深刻印象是在某個時候，我意識到從來沒人憤怒地問過我是哪國公民（其實是愛爾蘭），雖然我的口音顯然不是美國的。十年后，當我被美國眾議院一個小組委員會傳喚，去為印尼占領下的東帝汶的問題作證時，我感受到相同的輕微驚訝。我從不曾到過東帝汶，我對它的語言一竅不通，對它的歷史和政治只有極其模糊的概念：這都不妨礙一個資深的東南亞專家覺得自己有資格介入，也沒有妨礙該小組委員會當初召我作證！

[[23]](#_23_55)這種認同感不是偶然的。1962年3月政變后，緬甸軍事獨裁政府事實上禁止學生出國留學。因戰爭四分五裂的印支國家正在戰場上消耗它們的青年。印尼人則為1965—1966年的恐怖飽受創傷。馬來西亞那時還唯英國是從，沒送多少學生去美國。

[[24]](#_24_53)此處有些悖論。沃爾特斯一直是軍事總督杰拉德·坦普勒的深沉的景慕者，后者讓定居的“華人”社區付出高昂代價，將25萬華人強制性地隔離到“新村”之中，從而費盡周張地解決了戰后馬來亞共產主義叛亂的最大麻煩。但是自從沃爾特斯成為學者以后，他就毅然欣然地把他的工作限制在歐洲人尚未染指的那個東南亞了。短小精悍地展現了他的觀點和學問的，是他的《東南亞視角下的歷史、文化與宗教》（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Singapore: Institut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82。

[[25]](#_25_51)根本不是恰以同一種形式表現的。如我在別處提到的，（荷蘭人的）聯合東印度公司用盡一切辦法（包括禁奢法令、居住地隔離、強制遺產調節，還有利用與之勾結的商業精英），斷然認定不講任何形式“中國”話的一些人的華人身份。在菲律賓群島（Las Islas Filipinas），這樣的人法律上稱為“梅斯蒂索人”（mestizos），有他們自身特別的納稅義務、居住的可能選擇，等等。“Mestizo”總是間接地表示外來的。參見拙文《東南亞的人口普查和政治》（“Recensement et politique en Asie du Sud-est”，Genèses，26 [1997年4月]），第55—76頁。“華人”應當以相同的句法規則讀如今天的“亞洲人”。西方國家的人們相信“亞洲人”的巨量存在，但是很少有幾個“亞洲”的人同樣抱有這種稀奇觀念。

[[26]](#_26_51)瑪麗·薩默斯·海德惠斯（Mary Somers Heidhues）清晰地勾畫了種種變異。閩南人在菲律賓、爪哇，還有馬六甲、檳榔嶼、新加坡和堤岸—西貢等商業飛地占有優勢；廣州人在馬來亞鄉村以及直到二戰前在柬埔寨占支配地位；潮州人在暹羅、蘇門答臘和二戰后的柬埔寨；客家人在北婆羅洲和西婆羅洲；而遲來的海南人主要定居在越南南部和暹羅。在緬甸，很大數量的移民是從云南經陸路而來的。定居密度也大相徑庭。殖民地的馬來亞位于一個極端；二戰前夕，這個半島上的“華人”實際上多于“馬來人”。與此相對，在荷屬東印度群島、緬甸和老撾，“華人”比例可能從未高過5%。參見她的《東南亞的華人少數族群》（Southeast Asia's Chinese Minorities），Hawthorn, Victoria: Longmans Australia，1974，第2—6頁。

[[27]](#_27_49)參見鄭力人，“英屬馬來亞的海外華人民族主義，1894—1941”（Liren Zheng，“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British Malaya, 1894—1941”），康奈爾大學博士論文，1997年。

[[28]](#_28_49)我所熟悉的東南亞三國語言中，全都有對“華人”的貶抑詞匯，但是只有蘇哈托的印尼執意要求官方使用這種詞匯。于是就有了這樣可嘆可哀的情境：華人血統的年輕人在讀者問答專欄或別的地方，用英語單詞“Chinese”來自稱。（Saya seorang Chinese ［我是華人］，而不是自我貶低的Saya seorang Cina ［我是中國佬］。）雖然對華人的普遍怨憎在本地區處處都很平常，二十世紀暹羅和菲律賓卻不曾經歷過反華大屠殺或種族騷亂；適成對照的是，從1910年代現代政治開幕以降，印尼的這種暴行史就綿延不絕。

[[29]](#_29_49)1996年秋我在耶魯大學給研究生授課時，體會到了這個難題的尖銳性。這些學生中間有一個是美國出生的，說話是地道的美國腔，他堅持說他“絕對是”中國人。另一個學生出身于大陸精英的國民黨人家庭，他告訴我他認為自己是臺灣人，來耶魯有部分原因是為了學會流利地說臺灣話。第三個發了一通脾氣，因為他在美國老是被挑出來當作中國人。“我不是中國人，”他說，帶著必勝的微笑，“我是新加坡人。”

[[30]](#_30_49)李光耀在1957年首次成為首席部長（Chief Minister），這歸功于那時勢力強大的有組織左派的支持。一旦掌權，他就同英國人配合，力圖壓制這些盟友。倫敦關心的是讓新加坡脫離左派的掌握，尤其是考慮到毗鄰的言論過激的印尼政府；這就導致它構想出馬來西亞這個計策，不穩定的新加坡將被吸納進去。保守的馬來領導人起初對這么多華人加入他們的國家這種前景心存顧慮，現在也被說服同意了，因為公認為“土著的”沙巴和沙撈越將同時移交給他們。這一合并僅僅維持了兩年（1963—1965），主要因為李光耀的野心不止于做個市長。到那時為止，他已經獲得了對新加坡的絕對控制，可以決定讓這個城市成為世所公認的國家了。

[[31]](#_31_45)參見杰拉德·陳（Gerald Tan），《東盟：經濟發展與合作》（AS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1996，第188—190頁。

[[32]](#_32_45)陳可真是個好“新加坡人”和“東盟主義者”（ASEAN-ist），他謹慎地不提這樁麻煩事。參見陳，《東盟》，第12頁。

[[33]](#_33_45)參見陳，《東盟》，第12頁。

[[34]](#_34_43)這真的是僅有的可能性。沒有哪個成員國具備打國家間常規戰爭的軍力。何況，這些軍隊多半在忙著鎮壓自己的國民，支撐現有的威權政體。

[[35]](#_35_41)也許值得說一說使這一策略原則合理化的唯一的意識形態公式：“亞洲價值”（Asian values）。首先也是最醒目的，它們不是——謝天謝地——“東南亞價值”。理由很充分：主要皈依基督教的菲律賓1986年廢除了它的獨裁政府；君主制的佛教國家暹羅自1970年代末以來也時作時輟地“民主化”了。這兩國都沒有表現出對“亞洲價值”的任何真正興趣。盡管蘇哈托獨裁政權統治了數十年之久，但一心只掃門前雪且深刻分裂的印尼也沒有這種興趣。喧囂聲主要來自新加坡專政國家，較小程度上也來自吉隆坡屹立不倒的馬來政府，它們各自基于自身的緣由，熱衷于在非宗教基礎上（“亞洲”一詞，在后共產主義時代，首要地意在掩蓋/取代宗教差異）將其行為合理化，并與北方和東方的“儒教”世界搭建起有利可圖的橋梁。

[[36]](#_36_41)截至本文寫作時為止，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越南、暹羅和老撾的國家領導人都已年逾古稀。緬甸的“政界元老”奈溫還要更老。很奇怪，只有柬埔寨有個年輕的“鐵腕人物”。

[[37]](#_37_41)這本書即經典的《印度尼西亞的民族主義和革命》（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2）。它的顯著特點是假定了印尼的絕對現代性，這——唉！——在他的學生的著述里見不著了。它對“爪哇猿人”（Java Man）、古代王國和編年史，甚至早期的殖民主義都不置一詞。它假設印度尼西亞是隨著它的民族主義運動形成的。

[[38]](#_38_38)卡欣在形成東南亞研究的上乘傳統上具有中心地位，這不能輕描淡寫。他在太平洋戰爭的最早日子里就開始了他同亞洲的聯系，那時他幫助一個貴格會教徒進行活動，要迫使拘押在西海岸的日裔美國人的那些債務人履行義務。后來他參了軍，受訓馬來（印尼）語，為的是空降到爪哇或蘇門答臘的日本人后方。軍事就是軍事，他最后其實是在意大利服役。1948年他作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一名學生，動身去印度尼西亞做田野工作，當時反抗重返印尼的荷蘭人的革命戰爭正在展開。他成了許多印尼領導人的密友，當他回到美國后，在華盛頓為他們的事業積極從事院外活動。《印度尼西亞的民族主義和革命》對我這一代的東南亞專家施加了強大的學術和道德—政治影響力。1960和1970年代，他是批評美國卷入印度支那的最早、最杰出的東南亞專家。從這場戰斗中產生了《美國在越南》（The United States in Vietnam，New York: Bell，1967），是與約翰·劉易斯（John F. Lewis）合作的；還有精湛的《干涉：美國如何卷入越南》（Intervention: 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New York: Knopf，1986）。1990年代，他回歸印尼研究，結撰成《以顛覆為對外政策：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在印尼的隱秘潰敗》（Subversion as Foreign Policy: The Secret Eisenhower and Dulles Debacle in Indonesia，New York: New Press，1995），是同奧德麗·卡欣（Audrey Kahin）合著的。

[[39]](#_39_36)泰國專家不久之后也形成此風。但是一直到1980年代，越南語、緬甸語和菲律賓語的知識才被認為是有關這些國家的專家們常規上必備的。

[[40]](#_40_36)二戰期間及戰后她都在美國國務院任職，直到為抗議麥卡錫主義的荼毒而辭職。

[[41]](#_41_36)見拙著《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導論。

[[42]](#_42_36)“美國時代”始于美國對1947年11月政變者的支持，終于1975—1976年間美國軍隊的最后撤離與暹羅的美國軍事設施的關閉。我在我的《鏡像：美國時代暹羅的文學與政治》（Bangkok: Duang Kamon，1985）里，透過泰語文學的鏡頭考察了這一時代的全貌。

[[43]](#_43_36)黎剎在1896年底就被西班牙人處決了。六個月前皮拉爾在巴塞羅那貧困而終。博尼法西奧在1897年5月被他的篡奪者阿奎納多的部下謀殺。盧納也是被阿奎納多的人暗殺——在1899年6月。美國征服菲律賓以后，馬比尼（他腰以下部位都癱瘓了）拒絕向新殖民政權宣誓效忠，被流放到美國新近的另一獵物，西屬馬里亞納群島。1903年，在返回馬尼拉幾個月后，他死于霍亂。

[[44]](#_44_34)這里我忍不住要講一段有代表性的逸事。在這些未遂政變的最后也是最厲害的一次的巔峰時刻，我發現自己蜷縮在首都的摩門教禮拜堂的墻角下，躲避可能的坦克和直升機的火力。挨著我的是個叛亂的下級軍官，一直咒罵著美國人，他認為是美國人在幫助阿基諾政權。我擔心他把我當作美國人，朝我發泄怒火；只是在這個軍官盯住了另一個蜷縮著的人的時候，這種擔憂才減輕了。那個人身寬體胖，帶著兩架照相機，他緊張地自稱是德國人。讓我大吃一驚的是，年輕的造反者向這個矮胖的家伙行了個“嗨！希特勒！”的禮，熱情地向他詢問隆美爾陸軍元帥的健康。這是一個絕佳機會，我偷偷溜之大吉，躲到掩護人的禮拜堂背后更遠的地方去了。

#### 第一部 分民族主義的長弧

[[45]](#_45_34)Takashi Shiraishi，An Age in Motion, Popular Radicalism in Java, 1912—1926（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第193頁。

[[46]](#_46_34)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修訂版（London: Verso，1991），117頁。［該書中譯本見吳叡人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譯注］

[[46-1]](#_46_1_1)很奇怪，蘇瓦爾迪沒有注意到這些紀念儀式的喜劇性和倒退性。它不是去提醒荷蘭的男人女人們記住他們祖先真正英勇的業績：1581年從菲利普二世的帝國中宣布獨立，或是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在1648年讓馬德里最終接受那一獨立；它只是慶祝神圣同盟擊敗拿破侖，慶祝維也納會議將一個平庸的君主制強加給有著悠久共和傳統的一個民族，慶祝它被強行并入新王國——今天的比利時

[[46-2]](#_46_2_1)這些詩體回憶錄有很大一部分文本見于Ann Kumar，“Dipanegara （1787?—1855）”，Indonesia，13（1972年4月），第69—118頁。

[[47]](#_47_34)Imagined Communities，第22—36頁。

[[48]](#_48_34)“人世間”是Bumi Manusia的漢譯，這是偉大的印尼作家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Pramoedya Ananta Toer）關于印尼民族主義起源的四部曲之第一部的題目。

[[49]](#_49_34)參見雷諾茲（Craig J. Reynolds）的高深討論：Thai Radical Discourse: The Real Face of Thai Feudalism Toda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Southeast Asia Program，1987）。

[[50]](#_50_34)參見A. Th. Manusama，Komedie Stamboel of de Oost-Indische Opera（Batavia［Jakarta］: n.p.，1922）的精彩說明。馬努薩瑪提供了暫時的全部劇目，計有四十三出戲，這些戲劇在主題特征上全然是世界性—地方性的，這也充分說明了我上文的論點。有九出戲來自《天方夜譚》，九出來自當地的民間故事和傳奇，六出來自波斯，六出來自印度，三出來自中國，十出來自歐洲（第24—27頁）。在這最后一組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有《威尼斯商人》和《哈姆雷特》，還有《布拉班特的珍妮維芙》、《夢游女》、《魔鬼羅伯特》等等。

[[51]](#_51_34)Peter Boomgaard，Population Trends, 1795—1942（Amsterdam: Royal Tropical Institute，1991）詳細記述了這一嘗試，以及它與從前為了稅收和徭役而進行的調查所形成的對比。

[[52]](#_52_34)美國先行一步的原因將在下文論及。

[[53]](#_53_34)1820年代和1830年代已經被說成是“統計熱”的時代，那時英美率先成立了統計學會。參見Paul Starr，“The Sociology of Official Statistics”，見William Alonso和Paul Starr編，The Politics of Numbers（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6），第24，15頁。

[[54]](#_54_34)以上材料，我多受惠于斯坦福大學的馬克·文特雷斯卡（Marc Ventresca）。

[[55]](#_55_34)分別指黑人和白人的第一代混血兒，黑人血統占1/4的混血兒，黑人血統占1/8的混血兒。——譯注

[[56]](#_56_34)例如，在1840—1910年間，美國人口普查中的“尼格羅人”（Negro）大類下包含了四小類：穆拉托人、夸德隆人、奧托隆人、黑人。參見William Petersen，“Politic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Ethnicity”，見Alonso和Starr編，The Politics of Numbers，第208頁。

[[57]](#_57_34)此處信息是人口普查局紐約市辦事處在電話里友善提供的。

[[58]](#_58_34)作為一位年輕的剛毅無情之士（esprit fort），他于1654年被護國公派往愛爾蘭，去統計那里能夠充作系統的殖民剝削和壓迫之基礎的人口與財富。

[[59]](#_59_34)特請參見Starr，“The Sociology of Official Statistics”，第13—15頁，以及其中所引的資料來源。

[[60]](#_60_34)參見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一書膾炙人口的第12章（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Paris: Pagnerre，1850），第226—234頁，特別是230頁。“在我們這個時代，結社自由已成為反對多數暴政的一項必要保障”（著重號為引者所加）。難道多數派——且不論暴虐的多數——在舊制度（ancien régime）下是可以當真設想的嗎？

[[61]](#_61_34)大概應該在此處提醒讀者：雖說是這樣，但人口普查包含了兩種有區別的序列類型——定類（categorical）和定距（scalar）序列。第一類的范例是性別，它只可取兩種互斥的終身不變的可能性；第二類的范例是收入分配，它展開了一長系列的梯級，梯級的兩端曖昧不明，結果億萬富豪和乞丐貧民弄得沒影了。定距格式給人們提供了一切可能性，可以在他們的一生中沿這些梯級上下移動。由此生發出一種令人愜意的烏托邦念頭：在人口普查中，性別變成定距的，有好些個分段的級別，而收入變成二擇一的、定類的——不妨干脆劃分為富人和窮人。

[[62]](#_62_34)然而主辦這次調查的并非殖民地政府，而是馬尼拉市政廳，實施調查依靠的是教會組織而非政府機構。

[[63]](#_63_34)沒人真正嘗試著去統計，居住在紙面上是西屬菲律賓的土地上的眾多穆斯林與山地部落異教徒究竟有多少人口。

[[64]](#_64_34)那時候，先是馬尼拉，然后是其他港口，被推動著向國際貿易開放門戶，結果外國人此時第一次在那里露面。而且，汽船的到來使得居民的在場/缺席成了一個現實問題。

[[65]](#_65_34) 對菲律賓人口統計及其政治的格外精致的討論，可見Onofre Corpuz，The Roots of Filipino Nation（Quezon City: Aklahi Foundation，1989）一書第一卷附錄，第515—570頁。

[[66]](#_66_34)這個故事可以見他的文集Tjerita dari Blora［布洛拉故事集］（Jakarta: Balai Pustaka，1952），第279頁。

[[67]](#_67_34)有人可能認為，在“一個”政府辦公室里的“一個”打字員應當可以作為職業加以普查。但是整段文字說明此處的“打字員”是一個全球性的序列。

[[68]](#_68_34)參見J.J. Woltjer，Recent Verleden（Amsterdam: Balans，1992），第414頁。

[[69]](#_69_34)參見以下的精彩兩章：Margo A. Conk，“The 1980 Censu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以及William Petersen,“Politic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Ethnicity”，收在Alonso和Starr編，The Politics of Numbers。彼得森論“‘西班牙裔美國人’（Hispanics）的創造”的尖銳篇章特有說服力。

[[70]](#_70_34)參見 “Exodus”，Critical Inquiry，20（Winter 1994），第314—327頁。

[[71]](#_71_34)Gérard Chaliand和Jean-Pierre Rageau，The Penguin Atlas of Diasporas（Harmondsworth: Viking，1995）。法文原版（Atlas des Diasporas）由Odile Jacob書局出版于1991年。

[[72]](#_72_34)彼得·沃茨曼（Peter Wortsman）英譯（Hygiene, Col.: Eridanos Press，1987），第61—63頁。

[[73]](#_73_34)“官方民族主義”這個術語是休·希頓—沃森（Hugh Seton-Watson）在其杰作《民族與國家：對民族起源與民族主義政治的探討》（Nations and States: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N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Boulder, Col.: Westview，1977）［中文版見吳洪英、黃群譯，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譯注］中創造的。我在拙著《想象的共同體》（London: Verso，1983; 增訂版，1991），特別是其中第6章里，改寫和擴充了它的內涵。在其十九世紀的源頭中，此即馬基雅維利式的“謀略民族主義”（policy nationalism），王朝國家和古老的貴族階層企圖靠它來利用大眾民族主義現存模式（“克里奧爾共和國的”和“種族語言的”）的元素，以圖自存。1918年后民族國家開始劇增，幾乎處處激起這些國家利用王朝君主的謀略工具。

[[74]](#_74_34)Edward F. Concklin，The Lincoln Memorial（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7），第45頁。

[[75]](#_75_34)同上，第44頁。

[[76]](#_76_34)這種沒道理在電視劇《辛普森一家》有一集的某一段很可樂地表現出來，那一集名叫“莉薩先生去華盛頓”，在那兒，巴特·辛普森的小妹妹莉薩去向劈木人的塑像求問。她的聲音淹沒在一片嘈雜的成人游客的請求聲里：“我沒法讓我的小孩正確刷牙，”“現在是買房的好時機嗎？”“我能做點什么來改善這個國家？”“我留著胡子好看嗎？”劈木人一動不動的沉默不會讓誰覺得苦惱。對《辛普森一家》這一集的妙趣橫生的分析，可參見Lauren Berlant，“The Theory of Infantile Citizenship”，Public Culture，vol. 5（Spring 1993），第1—16頁（重印在Geoff Eley和Gregor Suny編，Becoming National: A Reader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第495—508頁）。

[[77]](#_77_34)此處的終極模型是每個國家的國旗。

[[78]](#_78_34)這種光暈部分地是“藝術杰作”的光暈，可由它們的市價與即便是高仿品的價格之間的巨額差異估量出來。但是《宮娥圖》（Las Meninas）有其自身的特殊光輝。我記得，在普拉多（Prado）博物館，它是收藏在一間半明半暗、為它獨占的房間里的唯一油畫。

[[79]](#_79_34)例如Reynaldo Clemeña Ileto，Pasyón and Revolution: Popular Movements in the Philippines, 1840—1910 （Manila: Ateneo de Manila Press，1979），第77頁及206—207頁。

[[80]](#_80_32)朝圣者們每逢黎剎節都如期而至，但是沒有官員迎候他們或向他們致辭，也沒有動用警察來驅散他們。

[[81]](#_81_32)到1860年代，美國政府由白人成年男性的近乎普遍的選舉權選舉而成，這已超過一代時間了；美國軍隊在戰時是通過選民—公民的強制性征兵征募而來的。因此政治家們強烈意識到死者是選民，或者如果還是十幾歲的青少年，按規定也注定是要成為選民的；而且，他們的男性遺屬仍將繼續參加選舉。這種情形，與（國家）獨立戰爭期間的差異不言而喻。難道這沒有說明，為什么福吉谷（Valley Forge）的陣亡者們被任其名湮姓沒、無標無識嗎？

[[82]](#_82_32)以下部分多擷取自Thomas Laqueur，“Memory and Naming in the Great War”，見John R. Gillis編，Commemoration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第150—167頁。

[[83]](#_83_32)此處有兩股動力在起作用：統治階級的傲慢自大和官方民族主義。建筑工程部那位常任大臣寫道：“我們必須不遺余力地讓這些公墓盡可能有吸引力，防止它們通過親屬們常愛豎立的丑陋不堪的雕像，而成為法國鄉村里的礙眼之物。”（同上，第155頁）然而俗不可耐的“親屬們”的強制性缺席，也保證了軀體始終如一地是“國家財產”。

[[84]](#_84_32)本段內容多摘自G. Kurt Piehler，“The War Dead and the Gold Star: American Commemoration of the First World War”，見Gillis編，Commemorations，第168—185頁。

[[85]](#_85_32)有關先賢祠的一種優秀歷史敘述，參見Valérie-Noëlle Jouffre，Le Panthéon（Paris: Éditions Ouest-France，1994）。改變發生在1791年4月，就在米拉波死后，國民議會投票選擇安放他的遺體的地點，要配得上他為大革命做出的英勇貢獻。（哎呀不好，他在1793年11月又被匆匆“褫奪了圣賢頭銜”，因那時發現了涉及他的政治歷史的危害性文件。）伏爾泰于1791年7月遷入，盧梭兩年后遷入。馬拉的遺骸在那里從1794年9月只待到1795年2月，然后遭遇了米拉波的命運。

[[86]](#_86_32)約夫雷提供了一份71位名人的名單，他們在先賢祠有墳墓或骨灰甕。考慮到這幢建筑變幻無常的歷史，不用奇怪這其中大多數人在革命時期和拿破侖時期如日中天，到如今卻默默無名。先賢祠作為莊嚴的愛國場所的復興，是隨著第三共和國到來的，特別仰仗維克多·雨果于1885年的安葬。后來又安葬了一些名人，其中包括埃米爾·左拉，讓·饒勒斯，讓·穆蘭，最近的有讓·莫內。

[[87]](#_87_31)參見Laqueur，“Memory and Naming”，第163頁。

[[88]](#_88_33)Times Armistice Day Supplement I，1920年11月20日，第1頁，轉引自前揭書，第158頁。

[[89]](#_89_32)在我們這個時代，華盛頓特區那黑色花崗巖的、名字刻得像疤痕累累的“越南墻”也有這種光暈，人們還在它面前蜂窩狀地悼亡。

[[90]](#_90_32)就是這種反向的目的論，把“大戰”（the Great War）改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讓以色列國成了華沙起義的始祖。因此不存在民族的創始者，或者毋寧說創始者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此時此地的“我們”。

[[91]](#_91_32)John Dahlberg-Acton，Essays in the Liber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第五章，第134頁。

[[92]](#_92_32)這不表示欺騙性選舉流傳不廣；然而，假若不是甚至在像伊斯蘭教的伊朗（那里煞費苦心地拒斥“西方的”政治價值觀）這樣的社會里，選舉都成了現代性和文明的標志，那這樣的欺騙本來是不必要的。連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也走上了選舉之路。

[[93]](#_93_32)Acton，Essays，第154，146頁。阿克頓采用的波舒哀引文在此以法文原文形式給出。“Politique tirée de l'Écriture Sainte”，見Oeuvres de Bossuet（Paris: Firmin Didot Frères，1870），第一卷，第304頁。

[[94]](#_94_32)請注意《理查二世的悲劇》第二幕第一場的這一有名段落，它常被援引來斷言莎士比亞的一種早期民族主義：“這一個君王們的御座，這一個統于一尊的島嶼，這一個莊嚴的大地，這一個戰神的別邸，這一個地上的天堂……這一個幸福的國土，這一個英格蘭。”［中文引文見朱生豪譯《莎士比亞戲劇集》（十二），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譯注］不過，除了戰神和君王們之外，這個地上天堂沒什么明顯的居民，肯定沒有蘇格蘭人、威爾士人、英格蘭人和康沃爾人的大雜燴，他們許多人原本言語不通。

[[95]](#_95_31)Mary Rowlandson，“A Narrative of the Captivity and Restauration of Mrs. Mary Rowlandson, 1682”，見Charles H. Lincoln編，Narratives of Indian Wars, 1675—1699（New York: Barnes Noble，1952），第132頁。Squaukheag就是今天的Squakeag，在馬薩諸塞州諾斯菲爾德（Northfield）市的比爾平原（Bear's Plain）附近。

[[96]](#_96_31)令人驚訝的是，即便在百年之后，《獨立宣言》也沒有以“美洲人”的名義講話，在它廣為稱引的絕妙開篇之后，收尾卻是憤憤不平地抱怨喬治三世強加于他的大西洋彼岸的“英國臣民”的種種委屈。

[[97]](#_97_31)參見Nancy Armstrong和Leonard Tennenhouse，The Imaginary Puritan: Literature, Intellectual Labor, and the Origins of Personal Lif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第204頁及所引文獻。

[[98]](#_98_31)轉引自D. A. Brading，The First America: The Spanish Monarchy, Creole Patriots, and the Liberal State, 1492—1867（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第200頁。

[[99]](#_99_31)布雷丁也注意到，早在十六世紀，有些克里奧耳人知識分子業已開始既在西班牙征服者當中，又在印加王族中認祖歸宗。同上，第14章。

[[100]](#_100_31)Michael Warner，The Letters of Republic: Publ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第32頁。這一證據強烈暗示，蓋爾納所謂工業主義是民族主義興起的歷史源頭這種主張站不住腳。（參見他的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隨處可見。［中譯本見韓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譯注］）有人還會補充說，十九世紀早期歐洲民族主義最為顯眼的大多數地區——比如愛爾蘭，希臘，波蘭，波希米亞，幾乎全然不見工業進步。

[[101]](#_101_31)Benjamin Disraeli，Tancred, or The New Crusade（1847; London: Longmans, Green Co.，1882），第378頁。 年輕的蒙塔丘特勛爵（Lord Montacute）認為他的英格蘭、他的歐洲遭到啟蒙理性主義、資產階級商業主義及法國大革命傳統的致命威脅，于是動身輕舟駛往圣地巴勒斯坦，在“這個世界的造物主屈尊造訪過的此世的唯一地區”（第421頁）尋求靈魂的復活。這一探索把他領向在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種種歷險，那是后來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T. E. Lawrence）政治冒險活動的原型。他在歷險中受到智慧勇敢的希伯來人的指引，也只得靠媽媽和爸爸——貝拉蒙特公爵夫人和公爵救他出險境。這部小說尤為醒目的是猶太人迪斯雷利在巴比倫式放逐中發現自身“族群身份”（ethnicity）的方式。他在十三歲上，就遵父命接受洗禮，加入英國國教而英國化了。蒙塔丘特大富大貴，不像英國人，但可以說精神上是猶太教的（迪斯雷利再三堅持說基督和使徒們全是猶太人）：他是這位未來的聯合王國保守黨首相的妙趣橫生又自命不凡的自我投射。

[[102]](#_102_31)這一非宗教的使命被理解得有多快，在《坦克雷德》的一段對話中有趣地表現出來（第162頁）。主人公向伯蒂小姐也是貝萊爾夫人建議說，她和她的夫君加入他的耶路撒冷朝圣之旅：

“那絕不可能，”伯蒂小姐說，“奧古斯塔斯斷斷不會同意；他離開倫敦不能超過六個禮拜，他太想念他的俱樂部了。要是耶路撒冷不過是人們想去就去的地方，事情還有商量；比方說要是有鐵路通向那里的話。”

“鐵路！”坦克雷德叫了起來，一臉驚恐。“到耶路撒冷的鐵路！”

“不，我想永遠不會有的，”伯蒂小姐沉思著說，“那里車輛不通。”

[[103]](#_103_31)參見Eric Hobsbawm，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New York: Mentor，1962），第166—167頁。［中譯本見王章輝等譯，《革命的年代》，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譯注］

[[104]](#_104_31)這個進程典型的工業性方面是官方在該時代發明了成人教育。

[[105]](#_105_31)“An interview with Pedro Calosa”，見David Sturtevant，Popular Uprisings in the Philippines, 1840—194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6），第276頁。

[[106]](#_106_31)這個論題在拙著《想象的共同體》（修訂版，London: Verso，1991）第十章有詳盡闡發。

[[107]](#_107_31)Information Please Almanac, Atlas, and Yearbook, 1987（Boston: McGraw-Hill，1987），第787頁；Information Please Almanac, Atlas, and Yearbook, 1993（Boston: McGraw-Hill，1993），第830頁。這些表格缺少1980年的數字，它大概介于八百萬到九百萬之間。

[[108]](#_108_31)Perry Anderson，A Zone of Engagement（London: Verso，1992），第353頁。亦見該書所引文獻。［中譯本見佩里·安德森著，郭英劍等譯，《交鋒地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譯注］

[[109]](#_109_31)“Immigration”，The New Funk and Wagnalls Encyclopedia，共25卷（New York: Unicorn，1945—1946），第19卷，第6892頁。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2（New York: World Almanac，1992），第137頁。

[[110]](#_110_31)參見Paul Kennedy，“The American Prospect”，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93年3月4日，第50頁。

[[111]](#_111_31)New York Times，1997年2月8日。

[[112]](#_112_31)參見“In Europe's Upheaval，Doors Close to Foreigners”，New York Times，1993年2月10日。請注意，這些數字不包括全世界據估計存在著的2500萬政治流亡者，他們多半住在祖國之外那些污穢不堪的“臨時”住所里。

[[113]](#_113_31)資料源于美國人口普查署的圖表，轉引自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2，第942，944頁。

[[114]](#_114_31)“For the Cambodian Vote, a Fourth of July Flavor”，New York Times，1993年2月17日。

[[115]](#_115_31)去年男女同性戀者的彩車獲得科克市一等獎。但是在紐約，愛爾蘭人的舊制度（the Ancient Order of the Hibernians）陰魂不散，就好像同性戀與愛爾蘭特性鑿枘難合似的。結果，“真正的愛爾蘭”就西移到了大西洋彼岸的一個新地方。

[[116]](#_116_31)1980年代末的倫巴第聯盟（Lega Lombarda），如今的北部同盟（Lega Nord），雖然與這些運動并非嚴格可比，卻也說明，接近于族群化的某種東西甚至能夠威脅到一個可謂的核心國家，讓它分崩離析。這個聯盟對南方意大利人經常持有傲慢鄙夷的態度，仿佛后者是低人一等的另一種族。

[[117]](#_117_31)十九世紀以來這點上有個重要變化。如今要求將這樣的人遣送回“他們自己的民族—國家”是做得到的，但在一百年前，這等天佑的家國尚不存在。

[[118]](#_118_31)Praful Bidwai，“Bringing Down the Temple: Democracy at Risk in India”，The Nation，1993年1月23日，第86頁。

[[119]](#_119_31)這樣的人為數甚眾。南亞以外地區的南亞人，據官方統計有870萬。細目如下：歐洲1,482,034（其中1,260,000在聯合王國）；非洲1,389,722；亞洲1,862,654（其中1,170,000在馬來西亞）；中東1,317,141，大多在海灣國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957,330（其中730,350在圭亞那和特立尼達）；北美728,500（其中500,000在美國）；以及太平洋地區954,109（其中839,340在斐濟）。韋納（Myron Weiner）教授友好相告：雖然這個表格統計的是國外的南亞人，但輸出移民的主要地區長期以來就在目前的印度疆域內。他還相信這些數字太保守了：比如，最近的美國人口普查顯示，美國的印度裔人口將近900,000。照他的估計，極有可能的是，居留海外的印度人的真實總數在1100萬到1200萬之間。“Introduction: Themes in the Study of the South Asian Diaspora”，見Colin Clarke，Ceri Peach和Steven Vertovec編，South Asians Overseas: Migration and Ethnicity（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第2頁。

[[120]](#_120_29)參見《亞洲周刊》（Asiaweek）廣泛詳盡的報道，1996年7月26日。

[[121]](#_121_29)一個象征性人物是加拿大公民蘇薩克（Goyko Šušak）。他是以渥太華為基地的成功的比薩餅商人，百萬富豪，多年經營建立起了一個龐大的右翼網絡，網羅了“海外的”北美克羅地亞人，運用他從中榨取的豐富資金，為圖季曼首次競選克羅地亞總統收買選票，給自己贏得了克羅地亞國防部長寶座的回報。參見《紐約時報》1994年1月16日的出色訪談。他在五角大樓的良好人脈給他博取了退役美國將軍們的幫助，他們謀劃了克羅地亞對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č）軍隊的閃電戰勝利。

[[122]](#_122_29)參見“Revenge of the Armenian Diaspora”，Financial Times，1994年9月15日。

#### 第二部分 東南亞：國別研究

[[123]](#_123_29)R. Ng. Ronggawarsita，Serat Kala Tida （［Surakarta］: Persatuan，［1933］）.

[[124]](#_124_29)我很隨意也很粗糙地從第2、3、8節翻譯過來的。爪哇原文如下：Mangkya darajating praja/Kawuryan wus sunya ruri/Rurah pangrèhing ngukara/Karana tanpa palupi/Ponang para mengkawi/Kawileting tyas maladkung/Kungas kasudranira/Tidhem tandhaning dumadi/Ardayèng rat déning karoban rubéda//Ratuné ratu utama/Patihé patih linuwih/Pra nayaka tyas raharja/Panekaré becik-becik/Parandéné tan dadi/Paliyasing kalabendu...//Amenengi jaman édan/Éwuh ayahing pambudi/Mèlu édan nora tahan/Yèn tan mèlu anglakoni/Boya kaduman melik/Kaliren wekasanipun. 這里甫帕蒂（bupati）指的是非王族的宮廷高官。全靠了托尼·戴（Tony Day），我才第一次注意到這首詩。

[125]我在《語言與權力》第一章更詳盡地討論了傳統爪哇的權能觀念和意象。

[[126]](#_126_29)龍加瓦西塔的話語大概是對十九世紀爪哇精神普遍危機的最尖銳最直白的表述，當時荷蘭殖民統治穩穩當當地鞏固了自身。但是其他許多文本曲曲折折地傳達了同樣的感受。比較一下這兩種文本當中的風格和主題是給人啟發的：一種是十九世紀以前的重要文本，如Babad Tanah Jawi（《爪哇史記》），另一種雖有點古怪卻典型地是十九世紀的詩歌，即Suluk Gatholoco（《加多羅科神秘書》）。《爪哇史記》以平淡樸素的語言講述了殖民前爪哇歷史上的血腥事件。在《加多羅科神秘書》里沒有暴力發生，它主要涉及一場虛構的神學爭論，發生在一些“阿拉伯化的”爪哇穆斯林與“爪哇化”伊斯蘭教的一個倡導者之間，后者以行走四方、賣弄大道理的一根陰莖的形式出現（gatho=陰莖，ngloco=手淫）。但是它詞藻華麗激烈，令人難忘。

[[127]](#_127_29)Akira Nagazumi，The Dawn of Indonesian Nationalism: The Early Years of Budi Utomo, 1908—1918（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Occasional Papers Series no. 10，1972）.

[[128]](#_128_29)納恩（Godfrey Raymond Nunn）《印尼報紙：國際聯合會的一覽表》（Indonesian Newspapers: An International Union List. Taipei: Chinese Materials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Occasional Series no. 14，1971）所羅列的1900—1925年間的報紙中，大約25%名稱里含有以下詞語的一個或多個：matahari（太陽），surya（太陽），bintang（星星），nyala（光輝），suluh（火炬），pelita（明燈），sinar（閃光），cahaya（光照），api（火焰）和fajar（黎明）。另一些報刊包含這樣的詞匯：muda（年輕的），baru（新的），gugah（覺醒的）。

[[129]](#_129_29)書名其實是卡蒂妮的編者阿本達隆（Jacques Henry Abendanon）在1911年出版她的遺信時起的。但是他跟“覺醒”運動走得很近，也同情該運動，他的書名選擇同那個環境若合符契。參見Hildred Geertz為Radèn Adjeng Kartini，Letters of a Javanese Princess（New York: Norton，1964）所寫的序言，尤其是第15—16頁，第23頁。

[[130]](#_130_29)Robert Van Niel，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Indonesian Elite（The Hague: van Hoeve，1950），第173頁。

[[131]](#_131_29)“內印尼”指的是爪哇島、巴厘島和馬都拉島及其“印度教化的”人口。普里亞伊指的是傳統爪哇的上層階級的官僚和文人。實際上，至善社的創始人無一例外都是爪哇族的人。參見Nagazumi，Dawn，第39頁。

[[132]](#_132_29)關于這些目標的詳情，參上書，第157—160頁。

[[133]](#_133_29)Van Niel，Emergence，第57頁。著重號是引者所加。

[[134]](#_134_29)正是這種顯然源自西方的組織新穎性，促使某些西方學者將印尼（和東南亞）的民族主義解釋為西方舶來品，斷定該民族主義的起始年代就是西式組織形成之時。（比如，1906年緬甸佛教青年會在仰光的成立常被當成標志了緬甸民族主義運動的開端。）參看Brian Harrison，Southeast Asia, A Short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1954），第236—237頁。

[[135]](#_135_29)例如，Lintong Mulia Sitorus在其Sedjarah Pergerakan Kebangsaan Indonesia（Jakarta: Pustaka Rakjat，1951）中寫道：“直至十九世紀末，有色民族依舊酣然熟睡，這時候白種人正在所有領域忙得不亦樂乎。”（第6頁）

[[136]](#_136_29)School tot Opleiding van Inlandsche Artsen——本土醫生培訓學校。

[[137]](#_137_29)Van Niel，Emergence，第224頁。

[[138]](#_138_29)有關這些政黨的詳情，參見Jan Meinhard Pluvier，Overzicht van de ontwikkeling der nationalistische beweging in Indonesië in der jaren 1930 tot 1942（The Hague: van Hoeve，1953）。

[[139]](#_139_29)“五萬人跟在他的靈柩后面；人民的這位仆從的形象活在老百姓心里，他們對他感恩戴德。蘇多摩的確是非同凡響的人物，是民族主義運動幾十年歷史上最尊貴的領袖之一。”Daniel Marcellus Georg Koch，Batig Slot: Figuren uit het oude Indië（Amsterdam: De Brug/Djambatan，1960），第145頁。有關蘇多摩生平的權威性綜述，見Imam Supardi，Dr. Soetomo—Riwajat Hidup dan Perdjuangannja（Jakarta: Djambatan，1951）。

[[140]](#_140_29)這是永積昭《黎明》一書的判斷，第34頁。有關STOVIA發展的細節，還有它的課程和學生群體的特征，參見Van Niel，Emergence，第16頁。

[[141]](#_141_29)對印尼自傳的一些探討，見Savitri Scherer，“Harmony and Dissonance: Early Nationalist Thought in Java”（康奈爾大學博士論文，1975年），第188—189頁。關于印尼傳記和自傳的具體研究，見謝勒對蘇多摩、笈多（Tjipto Mangoenkoesoemo）和基·哈查爾·德萬托羅（Ki Hadjar Dewantara）的論述；又見Taufik Abdullah，“Modernization in the Minangkabau World: West Sumatra in the Early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見Clare Holt編，Culture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第179—245頁；Rudolf Mrázek，“Tan Malaka: A Political Personality's Structure of Experience”，Indonesia，14 （1972年10月），第1—48頁；John D. Legge，Sukarno: A Political Biography（New York: Praeger，1972）。

[[142]](#_142_29)所以他與胡志明和緬甸第一任總理巴莫博士（Dr. Ba Maw）幾乎完全是同齡人。

[[143]](#_143_29)更詳細的情況參見Scherer，“Harmony”，第191—200頁。這里甫帕蒂指的是爪哇傳統的地方貴族。

[[144]](#_144_29)同上，第30頁。

[[145]](#_145_29)Supardi，Dr. Soemoto，第2—8頁。

[[146]](#_146_29)Radèn Soetomo，Kenang-Kenangan（Surabaya: n.p.，1934），第118—119頁。

[[147]](#_147_29)雖然在現代印尼語中，penghidupan和kehidupan這兩個詞語差別相當大（也許相當于“生活方式”和“生活”），蘇多摩在這段話里似乎是可互換地運用它們。

[[148]](#_148_29)同上，封二。

[[149]](#_149_29)同上，第3頁。蘇多摩在括號里加了荷語單詞biografie，似乎他對他的印尼讀者能否理解“我的生活史”這個短語不大有把握。

[[150]](#_150_29)比較另一位恰好是爪哇人的印尼領袖、印尼共產黨總書記蘇迪斯曼（Sudisman）的言辭，1967年特別軍事法庭宣判他死刑，他在庭上的辯護演講中說：“我是個生在爪哇的共產黨人，所以按爪哇人的風俗，我有義務說幾句話向大家道別：首先，matur nuwun，我感謝在斗爭歷程中幫助過我的所有人。”（Sudisman，Analysis of Responsibility，Benedict Anderson英譯 ［Melbourne: The Works Cooperative，1975］，第24頁）

[[151]](#_151_29)lelakon是個出了名無法翻譯的爪哇語詞。它像是“天命”、“角色”、“生活目標”和“道德責任”的某種混合物。

[[152]](#_152_29)Soemoto，Kenang-Kenangan，第4頁。這句諺語字面上是說：“豆子怎能丟掉豆萁？”tabi'at這個詞在此譯成“人格”（character），也可翻成“本性”（nature）。

[[153]](#_153_29)同上，第6頁。

[[154]](#_154_29)回憶錄里出現的其他所有人物亦然。有少許時刻，他們有些人似乎改變了——比如，蘇多摩那位望子成龍的母親知道了宦途艱難，官位不總是能帶來幸福。但是蘇多摩說得很清楚，真正的“她”壓根未變。她只不過是對世界的本性丟掉了某些幻想。Soetomo, Kenang Kenangan，第25頁。

[[155]](#_155_29)在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這一事實：Kenang-Kenangan只字不提二十世紀初年東南亞人體驗到的“震驚世界”的三大事件：1905年亞洲的日本漂亮地擊敗了歐洲的俄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與此相對，后來的幾乎所有印尼自傳都同世界歷史前進中的步伐緊密聯系起來。例如參見Sutan Sjahrir，Out of Exile，Charles Wolf, Jr. 英譯（New York: John Day，1949）; Cindy Adams，Sukarno: An Autobiography as Told to Cindy Adams（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1965）；Ali Sastroamidjojo，Tonggak-tonggak di Perjalananku（Jakarta: Kinta，1974）。

[[156]](#_156_29)古納萬（Goenawan Mangoenkoesoemo）死的時候，據說笈多評論道：“這下蘇多摩失去他的dhalang了。”Soetomo，Kenang-Kenangan，第95頁。

[[157]](#_157_27)Soetomo, Kenang-Kenangan，第13頁，著重號系引者所加。

[[158]](#_158_27)pesantrèn——傳統爪哇的伊斯蘭學校。這里同別處一樣，蘇多摩首先給出爪哇語單詞，然后為他的非爪哇語讀者翻譯成印尼語。

[[159]](#_159_27)這段話的語義學意味深長。蘇多摩總是用令人起敬的“深奧”詞語ilmu（顯然是爪哇語ngèlmu的譯文）指代“傳統的”爪哇和伊斯蘭學問。這種意義上的知識，總是關于何為“實在的”或本體上真實的。就我所知，他從不曾用這個詞指稱在荷蘭學校所學的東西。

[[160]](#_160_27)Sekolahan（荷蘭語“學校”一詞的本土化）沒有什么特別的呼應。蘇多摩在此淡淡一提，讓人懷疑他對這些西化學校的態度。我們或可設想，這句話應當理解成是與“沒人把土地租給糖廠”相對應的。

[[161]](#_161_27)ilmu kebatinan——內心的知識——是最高形式的傳統爪哇宗教學問，西方人一般稱之為“爪哇神秘學”。

[[162]](#_162_27)Soetomo，Kenang-Kenangan，第10—11頁。

[[163]](#_163_27)同上，第12頁。rampok harimau是爪哇語rampog macan的印尼語譯文，它是豹或虎與一群武裝的人之間的角斗。

[[164]](#_164_27)同上，第17頁。著重號系引者所加。被譯成“高地位”的原詞是kebangsaan，它一般指“民族”或“種族”。我懷疑它可能是kabangsawanan（高貴階層）的誤印。

[[165]](#_165_27)不過要注意到，從我們的歷史視角看來，舊時代必定大致重合于龍加瓦西塔的“黑暗之時”。

[[166]](#_166_26)《加多羅科神秘書》的陰莖主人公就被描寫成一個上癮的鴉片吸食者。

[[167]](#_167_26)Hildred Geertz，The Javanese Family: A Study of Kinship and Socialization（Glencoe: The Free Press，1961），第105頁。

[[168]](#_168_26)這里提到的是殖民地著名的提倡破除舊習者愛德華·道維斯·戴克爾（Eduard Douwes Dekker，1820—1887），他以穆爾塔圖里（“我受夠了”）為筆名，于1859年發表了一部很大程度上是自傳的小說，名叫《馬格斯·哈弗拉爾的奇遇》（Max Havelaar，中譯本由施輝業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譯注）。它尖銳抨擊十九世紀殖民政府的不公，和被籠絡的爪哇統治階級的殘酷、腐化，在東印度引起轟動，并幫助促發了一場改革運動。

[[169]](#_169_26)Soetomo，Kenang-Kenangan，第13頁。

[[170]](#_170_26)同上，第14頁。著重號系引者所加。

[[171]](#_171_26)蘇多摩展現了同穆爾塔圖里的鮮明差異。最令這位荷蘭人義憤填膺的事情之一，就是掌權的本地官僚施加的私人化的（即獨斷專行的）“裁斷”（justice）。

[[172]](#_172_26)見下文，第94頁。《回憶錄》里的相關段落在第66—68頁。

[[173]](#_173_26)Soetomc, Kenang-Kenangan，第4頁。

[[174]](#_174_26)同上，第3頁。

[[175]](#_175_26)同上，第7頁。

[[176]](#_176_26)同上，第22頁。

[[177]](#_177_26)參見拙著《語言與權力》，第1章，尤其是第33—35頁。

[[178]](#_178_26)我清楚地記得，我從前那位雅加達的音樂老師，他那一代最優秀的古典音樂家之一，當他看到他的末日正步步逼近的時候，是怎樣漸漸舍棄他的全部財物和家庭責任的。無法想象，還有什么比這更優雅而決然。

[[179]](#_179_24)有關二十世紀初葉達爾文主義觀念在爪哇的影響，比如可參見Bernhard Dahm，History of Indones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Praeger，1971），第30頁；Nagazumi，Dawn，第45，53，185頁（注80）。

[[180]](#_180_24)tembang，經典爪哇歌曲；uran-uran，民間歌曲。

[[181]](#_181_24)Soetomo，Kenang-Kenangan，第15—16頁。

[[182]](#_182_24)Soetomo, Kenang-Kenangan，第58頁。試比較普拉姆迪亞的美麗故事“Anak Haram”，見他的Tjerita dari Blora （Jakarta: Balai Pustaka，1952），第227—262頁。

[[183]](#_183_24)比如，“嗬”和“駕”，這種聲響用來叫公牛左轉和右轉。

[[184]](#_184_24)Soetomo，Kenang-Kenangan，第55頁。

[[185]](#_185_22)同上，第56頁。

[[186]](#_186_22)同上，第68頁。

[[187]](#_187_22)同上，第65，68頁。

[[188]](#_188_22)同上，第64頁。

[[189]](#_189_22)同上，第61—62頁。

[[190]](#_190_22)同上，第65頁。這方面更多的情況，見下文，第93頁。

[[191]](#_191_22)這一側重點的完整要旨將在下文展現出來，見第95—97頁。所有這些，在緬甸領袖吳努（U Nu）的自傳《星期六之子》（Saturday's Son，U Law Yone英譯，New Haven，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中，有一個異常相似的地方。在第1章，“燃燒的青春”里，吳努興高采烈地描繪了他的形象：一個年輕的說謊者、騙子、小偷、青樓常客、可卡因和鴉片的淺嘗者。不過在這個事例中，我確信作者是打算跟釋迦牟尼生活的結構形成一種系統對應。

[[192]](#_192_22)Soetomo，Kenang-Kenangan，第65頁。很難知道怎樣翻譯這段引文的后一部分，因為印尼語沒有時態的自動指示。也許蘇多摩在此同時指涉過去和現在。

[[193]](#_193_22)penthol——爪哇粗話，相當于“白癡”或“蠢貨”。甚至今天都還能從非爪哇人的嘴里聽到這種說法。

[[194]](#_194_20)Soetomo，Kenang-Kenangan，第65頁。

[[195]](#_195_20)生動例子不少，也許其中最感人的是，蘇多摩講述了他父親對待女性的“過度現代的”（hypermodern，原文如此）態度。他太“進步”了，想讓他的女兒們都接受良好的荷蘭教育，結果鄰里懷疑他成了基督教徒！“常常在工作后的夜里，他會把女兒們一個接一個地抱在腿上，或者慢悠悠地、柔聲地唱丹邦歌哄她們。他還常常會脫口說起我們民族對婦女的不公［ketidakadilan］。”同上，第48—49頁。

[[196]](#_196_20)比較一下艾布·哈尼法（Abu Hanifah）——蘇多摩政治上的后一代人的領導者——敘述時那種沾沾自喜的殖民地方式。他描述了他如何完全被荷蘭人接納，不像他的朋友和同班同學那樣受排斥，因為他對荷蘭語和西方習俗有超群的理解力。Abu Hanifah，Tales of a Revolution（Sydney: Angus & Robertson，1972），第39—40頁。

[[197]](#_197_20)關于爪哇思想里的pamrih，參見拙著《語言與權力》，第51—53頁。

[[198]](#_198_20)Soetomo，Kenang-Kenangan，第66頁。請注意kemerdékaan（自由）一詞在這個道德語境下的有趣反用，這個詞對下一代印尼人來說無比珍貴。

[[199]](#_199_20)Lé或許不可翻譯。它是kontholé（他的小雞雞）的一種簡略形式，爪哇語里對小男孩的一種慣常昵稱。爪哇民間故事傳說，當閃電企圖攻擊法力無邊的基·阿庚·斯拉時，這位圣賢抓住它，把它牢牢綁在附近一棵樹上。直到哭哭啼啼的閃電答應永遠不再攻擊它這位俘獲者的后代，它才被釋放了。這些后人——爪哇人民——在他們帽子上戴著那棵毒樹的葉子，就會被認出來。到現在，有一些爪哇村民如果雷電天氣里出門在野外的話，還戴著這些樹葉。

[[200]](#_200_20)Soetomo，Kenang-Kenangan，第66頁。再次請注意，讓蘇多摩印象深刻的是言語里的堅定信念，也即聲音重于意義。

[[201]](#_201_20)同上，第66—68頁。

[[202]](#_202_20)bèndi——兩輪馬車。在爪哇鄉村的某些地區，即便今天bèndi都還是一種地位象征。

[[203]](#_203_20)不尋常的是，蘇多摩并沒有特別注意這一歐式早餐，在世紀之交，對茉莉芬（Madiun）的爪哇人世界來說，那諒必是稀罕的東西。

[[204]](#_204_20)Soetomo，Kenang-Kenangan，第67—68頁。

[[205]](#_205_20)蘇多摩所引的他父親的話一概如此，但是他外祖父的話卻總是先給出爪哇語，再譯成印尼語。

[[206]](#_206_20)參見有關他外祖父如何憑借長期的禁欲克己，贏得了地位更高的妻子的芳心那段敘述，同上，第11頁。亦見《語言與權力》，第24—25頁。

[[207]](#_207_20)Soetomo，Kenang-Kenangan，第69頁。

[[208]](#_208_20)同上。

[[209]](#_209_20)這在回憶錄里是很少見的例子之一，蘇多摩先用印尼語詞，再用爪哇語來“解釋”它，而不是反過來。nurun，就其靠抄襲來作弊這個涵義而言，好像是最近才從爪哇語進入印尼語的。比如，以下這本標準字典就找不到這個義項：Welfridus Joseph Sabarija Poerwadarminta，Kamus Umum Bahasa Indonesia （Jakarta: Perpustakaan Perguruan Kementerian P.P. dan K.，1954）。

[[210]](#_210_20)我想，這段話在書中安放的位置——就在蘇多摩“改變性格”之前——支持了這個觀點。見下文，第97—99頁。

[[211]](#_211_20)模仿過去是、現在也是傳統爪哇教學法的主要手段，不論是在舞蹈學校還是在pesantrèn（伊斯蘭學校）。

[[212]](#_212_20)Soetomo，Kenang-Kenangan，第69—73頁。

[[213]](#_213_20)同上，第70頁。請注意這里對荷蘭術語（intellect和geheugen）的運用。它顯示了人格構成觀念上西方和爪哇的巨大分歧。不妨比較前面提到的batin，和下文對budi的評論，第103頁。

[[214]](#_214_20)模仿悖論的進一步糾纏不清。

[[215]](#_215_20)Soetomo，Kenang-Kenangan，第71頁。但是蘇多摩接著說，他太理解那些被認為“愚笨”的學生的苦惱了，所以開始經常幫他們做作業，也允許他們抄襲他的（第72頁）。似乎如果不圖個人私利（pamrih），作弊就是正當的。

[[216]](#_216_20)同上，第69頁。

[[217]](#_217_20)同上，第74頁。著重號系引者所加。

[[218]](#_218_18)“我跟父母的關系，對父母的愛，直到父親去世的那天，都不是很親密。我同爸媽相處不太安逸自在，所以我對他們講爪哇雅語［bahasa kromo］。而且我感到對他們愛不如敬［eerbied］。那時候，我的愛僅指向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同上，第63頁）

[[219]](#_219_18)這句似乎語法混亂。蘇多摩寫的是tiada merasai（不能感受），而語意只需要merasai。

[[220]](#_220_18)Soetomo, Kenang-Kenangan，第74—75頁。

[[221]](#_221_18)同上，第75頁。

[[222]](#_222_18)同上，第76頁。mengheningkan cipta（爪哇語，ngeningaken cipta）意思是為了集中一個人內在生命的冥想實踐。在此蘇多摩用上了他邦義爾那位舅父的教誨。

[[223]](#_223_18)同上，第78頁。

[[224]](#_224_18)這象征性地表現在所敘述的鄰里們言辭的聲音與其意義的脫節上。不妨對比一下這種脫節與蘇多摩敘述中以下兩者所顯示的內在一致：格貝的sambatan盛會（上文）和他對瓦希丁醫生的感情（下文）。

[[225]](#_225_18)也許這里與爪哇哇揚戲（wayang）的基本主題之一有相似之處：年輕的主人公同父親分離，又長久尋覓，要找到他。這個矢志不渝的年輕人，除了有個智慧的精神領袖（瓦希丁醫生？）外，孤身待在叢林里，沉思默想著，要發現心愿得遂的辦法，此際就是分離的頂峰時刻。他凝神聚氣的深邃造成了gara-gara，或謂宇宙的翻騰（至善社的形成？）。當失散良久的父親承認主人公真是他的后人（turunan）的時候，通常戲劇沖突就解開了。關于這個主題，參見K. P. G. A. A. Mangkunagara VII，On the Wayang Kulit (Purwa) and Its Symbolic and Mystical Elements，Claire Holt英譯（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Southeast Asia Program Data Paper no. 27，1957），第11—16頁。

[[226]](#_226_18)Soetomo，Kenang-Kenangan，第80—81頁。在這段話里，如常見的那樣，蘇多摩將荷蘭語或印尼語翻成爪哇語來表達他的情感的微妙之處。請注意末尾那句話的句法——從“我”（I）到“這個人”（one，我對此處orang的陋譯）的轉換——表達了他對自我主義和個人私利（pamrih）的絕棄，或許也是從蘇多摩個人向全體爪哇少年讀者的移動。

[[227]](#_227_18)試比較龍加瓦西塔《黑暗之時》最后兩部分，題為Sabda Tama和Sabda Jati。

[[228]](#_228_18)就在前一段（第80頁），蘇多摩轉述了瓦希丁所講的他本人的一個故事。在某個地方，他希望召開一次會議籌集獎學金，但荷蘭副行政長官持反對態度。于是，當地的普里亞伊雖然私下里愿意參加，也都不敢去了。因此瓦希丁走進荷蘭人辦公室（這里句法變了，蘇多摩接替了瓦希丁的敘述），一言不發地站在那兒，直到副行政長官看見他。他表現得像是十分敬畏，拜倒在荷蘭人的辦公桌下，擺出恭恭敬敬（sembah）的神態，用最謙卑的語言說話，“副行政長官先生變得sabar［克制住了自己］，就在此刻他的面色變得柔和，露出了微笑。副行政長官先生說道：‘醫生，您的目的當得起最強的襄贊。如果您在一次會上宣講，那會很不錯，這樣我的全體官員都能聽取您的意見。’于是在副行政長官——雖然他起初打算阻撓醫生的目標——的幫助下，［瓦希丁醫生］贏得了不尋常的關注。”這段插曲的輕微反諷——與為了達到高尚目的不惜接受屈服一樣，典型地是爪哇特色的。

[[229]](#_229_18)Koch，Batig Slot，寫道：“尋求社會改良的斗爭比政治更吸引他［蘇多摩］。他向他的國家和他的人民散播愛。”（第139頁）

[[230]](#_230_18)參見拙著《語言與權力》，第1章。

[[231]](#_231_18)參見Scherer，“Harmony”，第212—223頁。對蘇多摩政治思想的全面討論，亦見第207—247頁。

[[232]](#_232_18)參見《語言與權力》，第1章。

[[233]](#_233_18)對照一下表現彌漫于格貝的sambatan中的和諧時那種壓倒性的聽覺描寫。

[[234]](#_234_18)Scherer，“Harmony”，第218—239頁。佳美蘭與政治的這一聯系不只是蘇多摩的一種怪癖。我曾從梭羅的年老宮廷樂師那里聽說，有一首特別的佳美蘭樂曲，叫做“Dendha Séwu”，習慣上在當朝王室面臨難關時演奏。樂曲本身沒什么技巧上的難度，因而要是宮廷大樂師不能盡善盡美地演奏，這就會被當成大禍臨頭的一個確定兆頭。

[[235]](#_235_18)蘇多摩說，他的大印尼黨（Parindra）“傾盡全力爭取他們［上層普里亞伊］的支持，以便能夠促使他們遵照自身的義務（darma），即不辜負其貴族血統的一個真正的剎帝利的義務，獻身于國家和人民”。摘自蘇多摩1935年12月25日對大印尼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所做的演說，題目是“Bekerdja dengan tiada mengenal buahnja”，轉引自Scherer，“Harmony”，第235頁。

[[236]](#_236_18)在《回憶錄》第20頁上，蘇多摩提到，他外祖父對孩子不打算進入土著政府失望透頂，要求他最起碼得養一匹馬騎，那是普里亞伊身份的標志。“真沒想到，實現我外祖父愿望的時機來到了。我當醫生，需要去拉伍山區給人們看病的時候，我養了兩匹馬，它們每天輪流載我去村民那里。”變調的一個美妙意象：鄉村醫生成為新普里亞伊。蘇多摩還回憶說（第42頁），他父親堅持對幾乎每個人都用爪哇雅語講話，如此一來，他成了傳播“民主方式”的最早一批人之一。蘇帕迪（Dr. Soetomo，第36，38頁）注意到，蘇多摩做著完全一樣的事情，習慣于對他的司機蘇摩（Pak Soemo）用格羅摩語（krama）說話。不過，蘇多摩和他的父親在科柯語（ngoko，低等的、常用的爪哇語）和格羅摩語之間選擇了“廢除”科柯語（可謂向上拉平），這或許是很獨特的。永積昭（Dawn，第193頁，注26）提到，就在至善社問世后不久，出現了一場運動，名喚“爪哇島”（Java Dwipa），它鼓吹廢除格羅摩語（可謂向下削平）。差不多同時的薩明主義（Saminist）運動也毅然拒絕對官員們使用格羅摩語。參見Harry J. Benda 和 Lance Castles，“The Samin Movement”，Bijdrage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125（1969），第234頁。

[[237]](#_237_18)“在此我表達對她的無盡感激是再合適不過了。我的妻子是個真愛她的國家的人。因此她了解和體察我的愛國，時常鞭策和激勵我更深地愛吾土愛吾民，并將那種愛心見之于現實的言行。我的妻子也是個愛她的人民的人。因此她理解我對我的人民的義務，時常鞭策我去證明我對我的人民的愛。我的妻子站在她的人民中間，而不是高踞他們之上。因此她的愛是真正有生機的。作為一個真正的荷蘭婦女，我的妻子熱愛自由、正義和平等；因此她無法容忍充滿歧視的環境，討厭看到會污染她的民族的令名的行為。正由于這些情感，她時常鞭策我繼續戰斗，參加到廢除這種歧視的斗爭中去。”（Soetomo，Kenang-Kenangan，第127—128頁）

[[238]](#_238_18)Budi utama是至善——盡管不自然——的印尼人。

[[239]](#_239_18)試比較蘇迪斯曼的《分析》：“我們為斗爭而活著，為活著而斗爭。我們活著不單單為了生命本身，我們活著還要勇敢地保衛生命，直到我們的心臟停止跳動。從一個人類生靈誕生之時起，從他作為一個嬰兒的第一聲啼哭到他的最后一口氣，生命就是一場斗爭。有時候他要面對一場艱苦的斗爭，有時候他要面對一場殊死的戰斗。并非場場戰事都以勝利告終。但是生命的目的就是要敢于加入這一殊死戰斗，同時贏得勝利。這是每個斗爭著的人的夢想，共產主義者也不例外。這也是我的生活夢想。因為假如沒有夢想，沒有理想，生命就是空虛荒蕪的。”（第24頁）

[[240]](#_240_18)參見Taufik Abdullah，“Modernization in the Minangkabau World”，第215—218頁。作者提到了西蘇門答臘的早期現代化改革者之一馬哈拉賈（Datuk Sutan Maharadja），“馬來新聞業之父”，他從1891年到1913年相繼參與了這樣一些報紙：Palita Ketjil［螢光］，Warta Berita［新聞通訊］，Tjaja Soematera［蘇門答臘之光］，Oetoesan Melajoe［馬來信使］，Al-Moenir［啟蒙］，以及Soeloeh Melajoe［馬來火炬］。請比較邁斯納對大約同一時期中國的相似意象的精彩討論，見Maurice Meisner，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尤其是第21—28頁。

[[241]](#_241_18)轉引自Nagazumi，Dawn，第42頁。

[[242]](#_242_18)這成了蘇多摩的著名同代人德萬托羅（Ki Hadjar Dewantara）創建的“學生園”（Taman Siswa）學校系統的教育哲學中一個核心主題。

[[243]](#_243_18)比如，他在東爪哇建立的農民組織“農民團結會”（Rukun Tani），在1933年已有125個分部，成員逾20000，輕松成為附屬于民族主義運動的最大農村組織。參見John Edward Ingleson，“The Secular and Non-Cooperating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Indonesia, 1923—1934”（莫納什大學博士論文，1974年），第419頁。關于大印尼黨的成功壯大，參見Susan Abeyasekere，“Relations between the Indonesian Cooperating Nationalists and the Dutch, 1935—1942”（莫納什大學博士論文，1972年)，第127—131頁。

[[244]](#_244_18)據貝倫德（Behrend）說，今天，在印尼與荷蘭的各種公共藏書中，可以找到這首詩八大校訂本里的98種不同底本。已知的最老版本源于1616年的一份井里汶（Cirebon）抄本。最全的《真蒂尼》是差不多有25萬行詩的皇皇巨著，貝倫德認為它完成于1814年。據稱它是由一個詩人委員會編纂的，那些詩人是當時梭羅王儲——后來成為巴固甫握諾五世（Pakubuwana V）——的近侍。相傳王儲派遣使者到爪哇各地和馬都拉島，搜羅每一種可能形式的爪哇學問，收錄到最終文本里去。參見Timothy E. Behrend，“The Serat Jatiswara: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a Javanese Poem, 1600—1930”（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博士論文，1988年），第79—84頁。

[[245]](#_245_18)Serat Tjentini，R.Ng. Soeradipoera，R. Poerwasoewignja和R. Wirawangsa編（Batavia ［Jakarta］: Ruygrok，1912—1915）。貝倫德相信，這一首創行動是由學者—官僚、當時的巴達維亞人文與科學協會（the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會長林克斯（Douwe Rinkes）發起的，他擁有萊頓那里編纂的版本， 然后就送往梭羅由蘇拉迪普拉（Soeradipoera）和他的助手們核校，最后由協會出資在巴達維亞出版。Behrend，“Serat Jatiswara”，第89頁。僅有的另一部有分量的羅馬字版本，在六十年之后以四卷形式出版，勉強涵蓋了1912—1915年版本內容的一半，它就是Serat Centhini，Tardjan Hadidjaja編（Yogyakarta: U.P. Indonesia，1976—1977）。

[[246]](#_246_18)對《真蒂尼》海量資源最為充裕的開采，當屬特奧多爾·皮若（Theodoor Gautier Thomas Pigeaud）論爪哇和馬都拉的傳統表演藝術的百科全書式著作：Javaansche Volksvertoningen（Batavia: Volkslectuur，1938）。杰出的民族音樂學家孔斯特（Jaap Kunst）在他的不朽之作《爪哇音樂》中引用了涉及音樂的許多短節（Music in Java: Its History, Its Theory and Its Technique ［增訂第三版，Ernst L. Heins編］。The Hague: Nijhoff，1973; 1934年 尼約夫初版名為 De Toonkunst van Java）。亦見S. Soebardi，The Book of Cabolèk: A Critical Edition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Notes :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Javanese Mystical Tradition（The Hague: Nijhoff，1975；基于他1967年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博士論文）。

[[247]](#_247_18)Ann Kumar，“The Peasantry and the State on Java: Changes of Relationship, Seven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ies”，見James Austin Copland Mackie編，Indonesia: Australian Perspectives（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1980），第577—599頁。為這篇論文，她利用了自己以前的幾篇專論研究，還利用了埃爾森（Robert Elson）、王福涵（Onghokham）、皮若（Theodoor Pigeaud）和施里克（Bertram Schrieke）的優秀經驗研究。

[[248]](#_248_18)我認為貝倫德關于完整版《真蒂尼》成書于1814年的年份測定是合理的，也將1777年視為《百科全書，或科學、藝術和手工藝大詞典》最終增訂本的出版年代。

[[249]](#_249_18)孟德斯鳩和達朗貝爾有貴族背景，盡管后者是私生的。狄德羅、伏爾泰和盧梭是資產階級或下層階級出身。

[[250]](#_250_18)《百科全書》已經運用了最易查找的分類學原則——字母表順序來編排它的詞目。《真蒂尼》中沒有超出其敘事和韻律要求的排序原則。找到一個詞條的唯一辦法，就是熟習這首詩。

[[251]](#_251_18)參見拙著《語言與權力》，第1章，那里討論了爪哇的權能（Power）觀。

[[252]](#_252_18)參見拙著《想象的共同體》，第3章。

[[253]](#_253_18)我們注意到，授予宮廷詩人和太史的官銜，很少高于統治者頒賜給高級舞蹈師傅和佳美蘭樂隊領班的官銜。

[[254]](#_254_18)存在許多以百科全書式的周詳探討入室行竊術的有趣抄本。

[[255]](#_255_18)在皮若的《爪哇民間表演》（Javaansche Volksvertoningen）中（第35—36頁），他講到巡游藝人“無疑是大群流浪者和漫游者的組成部分，他們必定曾是古時候爪哇社會流動人員中的關鍵分子”。他提到的其他分子還有貨郎、商賈、桑特里（santri）和帶著隨從的satria lelana（被流放的或無主的“武士”），后一種人常常“難以跟土匪區分開來”。

[[256]](#_256_18)但是孔斯特于1930年代初收集的出色統計資料還是可作參考的（Music in Java，第570—571頁）。那時爪哇和馬都拉的人口略少于4,100萬［據下文估算，疑為410萬。——譯注］。然而他算出有17,282支管弦樂團，其中包括以培羅格（pélog）音階或斯侖特羅（sléndro）音階進行演奏的12,477支“全套青銅佳美蘭樂隊”；還有6,362個不同類型的哇揚戲班，多半是哇揚布爾哇。保守地假定一支全套青銅佳美蘭樂隊需要10—12個熟練演奏者（包括后備隊員和學徒），我們即可估計熟練樂師的數目約為12×12,000=144,000人。（我認為同一些演奏者可能經營稍小的、非全職的佳美蘭樂隊。）如果我們除去婦女（她們極少公開演奏佳美蘭樂器，除非是gendèr［金屬佳美蘭］）和兒童，這就意味著佳美蘭的技能密度（skill density）大致是，10個青年或成年男性中有1人是樂師。誠然，這些樂師大多數不是云游者，而是村民，他們的主要生計在務農。即便如此，這種技藝和才能的深度還是非同一般的。認識到多數哇揚戲班屬達朗所有，而且僅由他的直系親屬成員“表演”，我們可以估計熟練的木偶操縱者人數大約是15,000人，或者說120個青年或成年男性中有1人。同樣，只有少數人主要靠這種手藝謀生。

把這些數據映射回十九世紀初期顯然成問題。但我想不出有什么明顯理由說明這些比例應該更低；而且考慮到1900年后初等、中等教育的興起，它開始將年輕人拉出傳統的學徒生涯，因此很可能這些比例更高一點。

[[257]](#_257_18)我在此用“專業的”一詞，既指技能和知識水平，又指收入和社會地位的首要來源。

[[258]](#_258_18)比如，著名民族學者威爾肯（George Alexander Wilken）觀察到，“達雅克人中間好男風是一種普遍的惡習”（Verspreide Geschriften，Frederik Daniel Eduard van Ossenbruggen編 ［The Hague: van Dorp，1912］，3，第389頁）；大名鼎鼎的伊斯蘭教專家胡格倫治（Christiaan Snouck Hurgronje）寫到了“最壞的那種邪惡在亞齊地區的泛濫成災”，其象征就是流行的seudati（斯達帝舞），里邊所唱的詩歌“與戀童癖臭味相投”（The Achehnese ［Leiden: Brill，1906］，2，第246，222頁）。說話刻薄的醫生雅各布斯（Julius Jacobs），于1880年代初造訪巴厘之后，講到男孩子們打扮成女子模樣進行的許多舞蹈表演，評論說：“你要知道他們是些男孩，看著巴厘社會各階層的男人們掏出他們的鋼镚（中國硬幣），想圖個與這些孩子一舞的機會，有時是以極其怪異的姿勢，那可夠惡心的；你要了解到，這些孩子，他們有時是在數小時的直立姿勢訓練后，雖然可能精疲力竭，還要被逼著同出價最高的人完成種種水平動作，好讓這個男人撫摸，讓那個男人親吻，你會更加厭惡的。”（Eenigen tijd onder de Baliërs, eene reisbeschrijving, met aanteekeningen betreffende hygiène, land- en volkenkunde van de eilanden Bali en Lombok. ［Batavia : Kolff，1883］，第14頁，著重號系原文所有。）

到殖民末期，討論采取了一種較為平和的語氣。比如，關于布吉人和望加錫人，參見Hendrik Chabot，Verwantschap, Stand en Sexe in Zuid-Celebes（Groningen-Jakarta: Wolters，1950），第152—158頁（“Homosexualiteit”）；C. Nooteboom，“Aantekeningen over de cultuur der Boeginezen en Makassaren”， Indonesiē，2（1948—1949），第249—250頁。關于爪哇和馬都拉，參見Pigeaud，Javaansche Volksvertoningen，第299—304，322—324頁；J.B.M. de Lyon，“Over de Waroks en Gemblaks van Ponorogo”，Koloniale Tijdschrift（1941），第740—760頁。

[[259]](#_259_18)Serat Tjentini，第2章第17節到第4章第30節。引文出自第4章，第29節。在這里及后面全部引文中，我把原始文獻中的拼寫現代化了。

[[260]](#_260_18)同上，第4章，第54—60節。引文出自第57節。

[[261]](#_261_18)同上，第74—84節。引文出自第76節。

[[262]](#_262_18)以下引文出自第4章，第56—60節。

[[263]](#_263_18)格羅摩語是表達禮貌—尊敬程度的爪哇語。

[[264]](#_264_18)這一段的引文出自Serat Tjentini，第74—84節。

[[265]](#_265_18)Serat Tjentini，第3章，第19—23節；第37章，第332節。

[[266]](#_266_18)同上，第3章，第1—18節。

[[267]](#_267_18)同上，第39—48節。

[[268]](#_269_18)同上，第48章，第28—33節。

[269]同上，第42—52節。

[[270]](#_271_18)Serat Tjentini，第37章，第256—261節。

[[271]](#_272_18)昂格隆是由懸掛著的竹管構成的樂器，演奏者敲擊，竹管彼此碰撞，叮當作響。

[[272]](#_272_18)Kinsey （1894—1956），性學大師；Houdini（1874—1926），魔術大師；Cagliostro（1743—1795），術士和冒險家。——編注

[[273]](#_273_18)參見Peter Brian Ramsay Carey，“Changing Javanese Percep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entral Java, 1755—1825”，Indonesia，37（1984年4月），第1—47頁。該文博雅精辟地說明了在“全本”《真蒂尼》完成之前六十年里，中爪哇所經歷的經濟和社會變遷。聯合東印度公司在1740年吞并了爪哇北部沿海地區，在1750年代又平定了自1670年代以來肆虐該島內地的無休止的繼位戰爭，這有著矛盾的后果。一方面，和平的重建容許了農業產量和商業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它推進了更加系統的征稅。那個時代的特點是稅款包收機構（tax farm）的飛速蔓延，通常是華人經營的，特別是涉及鴉片、市場稅和鄉村關卡方面。漸漸地，繳稅必須是現金（一般是中國的鉛幣和東印度公司的銅幣）。為了能夠以這種形式繳納，農民不得不抵押他們的莊稼或在市場上出售更大部分。因此到那個世紀之交的時候，意義重大的爪哇經濟的貨幣化就發生了。

[[274]](#_274_17)有關十八世紀晚期和十九世紀初期中爪哇軟弱無能的政治，最好的研究有Merle Calvin Ricklefs，Jogjakarta under Sultan Mangkubumi, 1749—1792（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Ann Kumar，“Javanese Court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Record of a Lady Soldier. Part I: The Religious,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 of the Court”，Indonesia，29（1980年4月），第1—46頁；Peter Brian Ramsay Carey編，Babad Dipanegara: An Account of the Outbreak of the Java War (1825—1830)（Kuala Lumpur: Art Printers，1981）。

[[275]](#_275_17)能夠很好揭示爪哇幸存的君王們（包括《真蒂尼》作者們的那些雇主）的路易十六時代特征的，莫過于他們沒有采取任何創造性的舉措，使1780年后壓垮了東印度公司和尼德蘭聯邦（United Provinces）的那些災難為我所用；那些年里，尼德蘭聯邦卷入了英國、法國和新生的美國之間的戰爭。1795年，法蘭西革命軍隊占領了低地國家，在它的庇護下建立了巴達維亞共和國，倫敦做出了種種回應，其中之一是從東印度公司手中攫取了錫蘭。1798年，巴達維亞共和國接管了已經破產有年的東印度公司，并承擔了它1.43億荷蘭盾的債務。（參見Clive Day，The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Dutch in Java ［London: Macmillan，1904］，第80—81頁。）1806年，拿破侖讓他的弟弟路易做了低地國家開天辟地第一個王，但到1810年又以他“人性的躁狂”（manie d'humanité）為由罷黜了他，專橫地將這片土地并入宗主國法國。倫敦的還擊是，到1811年為止，奪取了荷蘭全部海外屬地，包括爪哇在內，后者在那一年不戰而落入史丹福·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的人手里。對這些發展的簡短而資料豐富的敘述，可以參見Bernard Hubertus Maria Vlekke，Nusantara: A History of Indonesia（Brussels: Editions A. Manteau，1961），第11章。拿破侖個性鮮明的妙語的出處，在沙瑪（Simon Schama）的精彩著作里：Patriots and Liberators: Revolution in the Netherlands, 1780—1813（New York : Knopf，1977），第543頁。

[[276]](#_276_17)參見Carey，“Changing Javanese Perceptions”，第4節，第5節。

[[277]](#_277_17)有關強迫種植制度的政治和經濟面相，最上乘的研究無疑是Cornelis Fasseur，Kultuurstelsel en Koloniale Baten, De Nederlandse Exploitatie van Java, 1840—1860（Leiden: Universitaire Pers，1975）。

[278]見上文第4章。

[[279]](#_279_17)在第7章第52節，該詩提到了它叫做rispis pérak的東西。rispis顯然是recepis的爪哇語譯文，指的是總督羅赫生（Rochussen）于1846年2月4日引入的一種特殊憑證，為的是孤注一擲地療治他的前任遺留下來的財政和貨幣亂象。Recepis可以按固定匯率兌換荷蘭的銀本位的鑄幣，結果成了東印度第一種穩定的殖民政府通貨。到1854年貨幣法頒行的時候，它被銀盾正式取代，雖然直到1861年它才完全退出流通。參見“Muntwezen”， Encyclopaedie van Nederlandsch-Indiē（The Hague/Leiden: Nijhoff/Brill，1918），2，第793—811頁，尤其是第803—804頁，rispis-pérak（銀rispis）一定指的是1854—1861年間代替了紙憑證的銀幣。所以《加多羅科》一書不可能在1850年代末之前創作出來，而且既然鉛字印刷版本（參見下面注釋）出版于1873年，我們可以猜想它大約完稿于1860年代。這首詩極可能是在東爪哇的諫義里（Kedhiri）作成的，那個地方遠離了王家宮廷，而作者是到那時為止不為荷蘭人所用的一小群文人中的一員。

[[280]](#_280_17)Carel Poensen，“Een Javaansch geschrift”，Mededeelingen vanwege het Nederlandsche Zendelinggenootschap，17（1873），第227頁。這位優秀的傳教士在此不失時機地針砭了伊斯蘭教的飲食禁忌。

[[281]](#_281_17)Christiaan Snouck Hurgronje，“De betekenis van den Islâm voor zijne belijders in Oost-Indiē”，Verspreide Geschriften（Bonn and Leipzig: Schröder，1924），4，第15頁。該文最初發表于1883年。

[[282]](#_282_17)Douwe Adolf Rinkes，Abdoerraoef van Singkel（Heerenveen:“Hepkema”，1909），第130頁。

[[283]](#_283_17)Philippus van Akkeren，Een gedrocht en toch de volmaakte mens: A Monster, Yet the Perfect Man（The Hague:“Excelsior”，1951），第1頁。上文第157頁注釋2—4的引證，我是從范艾克倫書中第1頁吸收的。

[[284]](#_284_17)根據Gerardus Willebrordus Joannes Drewes，“The Struggle between Javanese and Islam as illustrated by the Serat Dermagandul”，Bijdrage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122（1966），第309—365頁，第314頁。范艾克倫寫道，他用于研究的那個印刷版本，是某個版本的“第二次印刷”，出版者是著名的爪哇迷、爪哇華人出版商、諫義里的陳坤水（Tan Khoen Swie）。但他沒有注明這一次或前一次印刷的日期。

[[285]](#_285_17)因為侮辱伊斯蘭教。以上記述摘自Drewes，“The Struggle”，第313—315頁。

[[286]](#_286_17)因為就在那時，對正在興起的受過西化教育的爪哇中產階級來說，該詩明目張膽的猥褻的性語言（普恩森所謂“以污穢不堪的方式”）正變成令人尷尬之事，他們決心要使“爪哇特性”（Javanism）在他們自己眼里，以及在普恩森們眼里，具有維多利亞時代的那種體面正派。

[[287]](#_287_17)“長得不像個正常男孩/他的身體縮成一團/皺巴巴的皮膚粗糙干燥/壓根就沒有鼻子/眼睛，或耳朵；他的快樂只在/睡了又睡，夜以繼日，沒完沒了//可是一旦從沉睡中喚醒/就任性胡鬧，不聽哄勸……相貌難看，像個麻袋/他的睡眠舉世無匹/睡著了如同死尸/他也是既無眼睛又無耳/只有上唇對下唇/筋骨無形跡。”爪哇文如次：warnané tan kaprah janmi/wandané apan bungkik/kulité basisik iku/kelawan tanpa nétra/tanpa irung tanpa kuping/remenané anéndra sadina-dina/Yèn ngelilir lajeng monthah/tan kena dèn arih ... Awon dedegé lir keba/lèmboné kepati-pati/yèn néndra anglir wong pejah/nora duwé mata kuping/amung ing lambé iki/nora duwé otot-balung. 出自《加多羅科》的這段及其他引文，拼寫已經現代化。這拙劣的譯文摘自我對全詩的英譯本，發表在Indonesia，32（1981年10月），第108—150頁；33（1982年4月），第31—88頁。

[[288]](#_288_17)以此觀之，這首詩的第一部分描述了男性器官/男人的成長歷程：從潛伏狀態，經由割包皮（“剪掉”）的折磨，直到成熟的性能力與初涉性事的期盼。

[[289]](#_289_17)阿莽拉加的頭銜，Sèh，是sheikh（［阿拉伯的］王子）的爪哇語說法，這說明那時候伊斯蘭傳統和更古老的爪哇傳統是多么不自覺地混融無間。

[[290]](#_290_17)不過應當提到的是，佩爾濟瓦提在性搏斗中與加多羅科完全是不相上下的。事實上，詩里說加多羅科最終輸給了她（即是說，性交后陽具軟綿綿地滑出了陰道）。

[[291]](#_291_17)Serat Tjentini，第37章第309—328節。

[[292]](#_292_17)爪哇文如次：sinung wahyu bisa nyrékal/iya sesamaning urip/nora sangu ing wicara/sakèhing bicara bangkit/nora sinau nulis/sakèhing sastra pan putus。

瓦尤這個詞通常用來指一種神秘的光輝，它降落到命定要當王的人頭上。用在這里，它象征文學—修辭的天賦，這使人想起爪哇王權到1860年代所陷入的困境，也許還暗示爪哇的唯一希望有賴于它獨立的文學知識階層。

[[293]](#_293_17)爪哇文如次：Wonten carita winarni/anenggih ingkang negara/Jajar iku ing naminé/pan wonten ratu digjaya/agagah tur prakosa/jejulukira sang Prabu/Mahraja Suksma Wisésa/Tuhu ratu kinuwasa/kéringan mancanegari。

[[294]](#_294_17)我的英譯如次：“惡狠狠地賈巴爾說道：/‘我可已經厭煩透頂/跟一條無尾狗爭長論短！’/加多羅科正色相告：/‘你給我的名稱合理合情/我的先祖經歷一代又一代/從來沒人拖條尾巴在后邊/所以無人有尾非是虛言/再說所謂“狗”，其實是“源頭”/這“無尾”恰說明/我真真是個人，沒有/尾巴搖，不像你祖先/你們卻是另一副相貌/是什么玩意？長著個剃了須拔了發的腦袋/你們到底產自荷蘭、中國、西北的印度/還是打孟加拉來？’”爪哇文如后：Ngabdul Jabar ngucap bengis/apegel ati mami/rembugan lan asu buntung/Gatholoco angucap/bener gonira ngarani/bapa biyung kaki buyut embah canggah//ya padha buntung sedaya, tan duwé buntut sayekti/basa asu makna asal/bunting iku wis ngarani/ulun jinising jalmi/tan buntut kaya bapakmu/balik sira wong apa/dhasmu gundhul anjedhindhil/apa Landa apa Cina apa Koja//apa sira wong Benggala。

[[295]](#_295_17)“且說我一天天吞吃的/我單揀出最燙的那一點/最苦的那一點/這樣我丟棄的每一塊渣團/變得高似又一座山/為了這緣故它們的頂上/個個向外噴著火煙/燒焦的殘余是我所食/我所消耗的klèlèt/是那結成山殼的石與巖/實不相瞞，若非我丟掉火熱的煙渣/這些山峰根本不存在/萬一我禁絕了拋渣團/它們頃刻間消失在眼前/你不妨親自來檢查/看看我肛門拉出的寶貝/我的話是真還是假！”爪哇語是：Kang sun-pangan dhéwé saban ari/ingsun pilih ingkang luwih panas/sarta ingkang pait dhéwé/déné tetinjaningsun/kabèh iki pan dadya ardi/milanya kang prawata/kabèh metu kukus/tumusing geni sun-pangan/ingkang dadi padhas watu lawan curi/kalèlèt kang sun-pangan//sadurungé ingsun ngising tai/gunung iku yekti durung ana/ing bésuk iku sirnané/lamun ingsun wus mantun/ngising tai kang metu silit/lah iyu nyatakena/kabèh sakandhaku。

“渣團”（turd）指吸鴉片之后煙管中留下的渣滓。所以“丟渣團”有一個內行才懂的含義，即進入鴉片導致的玄妙恍惚狀態。

[[296]](#_296_17)Behrend，“The Serat Jatiswara”，第212—216頁。關于爪哇歌詩間關系的精致、敏銳的論述，參見 Martin F. Hatch，“Lagu, Laras, Layang: Rethinking Melody in Javanese Music”（康奈爾大學博士論文，1980年）。

[[297]](#_297_17)引自S. Padmosoekotjo，Ngèngrèngan Kasusastran-Djawa（Yogyakarta: Hien Hoo Sing，1960)，1，第22—23頁；R. Hardjowirogo，Patokaning Njekaraken（Jakarta: Balai Pustaka，1952），第66—67頁。本段的其他引文都出自這兩本書。

[[298]](#_298_17)這一段的英文和爪哇文本，參見拙著《語言與權力》，第212頁。

[[299]](#_299_17)幾年前，作為一次實驗，我在非正式聚會上請一位年輕的爪哇詩人“朗誦”這一段。他試了兩次，但每次都唱不下去，因為他笑得太厲害了。

[[300]](#_300_17)參見亞當（Ahmat B. Adam）的出色研究：The Vernacular Press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Indonesian Consciousness（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Southeast Asia Program，Studies on Southeast Asia no. 17，1995）。

[[301]](#_301_17)參見Takashi Shiraishi，An Age in Motion: Popular Radicalism in Java, 1912—1926（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第8—9頁。

[[302]](#_302_17)有關殖民地教育體系蹣跚進步的簡潔敘述，參見George McT. Kahin，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2），第31—32頁。

[[303]](#_303_17)在這方面，亦見拙著《語言與權力》，第267頁。

[[304]](#_304_17)參見Steve Cox and Peter Carey，Generations of Resistance（London: Cassell，1995）。

[[305]](#_305_17)例如，可參見David Wilson，Politics in Thailand（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7），第IX章；Fred W. Riggs，Thail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a Bureaucratic Polity（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Press，1966），附錄B。

[[306]](#_306_17)這種取向的一個自由主義變種是，用西西弗斯式的語言，將10月6日說成是把民主政府引入暹羅的令人沮喪的無盡失敗中的又一起失敗。關于這一點的絕妙范例，參見Frank C. Darling，“Thailand in 1976: Another Defeat for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Asian Survey，17: 2（1977年2月），第116—132頁。

[[307]](#_307_17)《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76年4月16日）在對1976年4月選舉的描述中，講到了“接二連三的槍擊、爆炸和其他暴力事件，主要針對的是左翼的和改革派的政黨”。《巴差查文摘周報》（Prachachart Weekly Digest，20 ［1976年3月16日］，21 ［1976年3月23日］）羅列了1974—1976年間政治暗殺的近五十位受害者的姓名，他們全是左派。

[[308]](#_308_17)有關緊隨著1938年披耶·頌·素拉德（Phraya Song Suradet）“叛亂”的鎮壓活動，參見Wilson，Politics in Thailand，第261頁。1949年3月3日，四位著名的議員和前內閣部長在轉監途中，被炮·西耶儂的警察謀殺。參見Samut Surakkhaka，26 Kānpattiwat Thai lae Ratthaprahān 2089—2507 （《二十六起泰國革命與政變，1546—1964》）［Bangkok: Sue Kānphim，1964］，第472—489頁。1952年12月，兩位卓越的東北政治家，丁·蒲里帕（Thim Phuriphat）和珍·西里康（Tiang Sirikhan）失蹤了。后來揭露出是被炮·西耶儂的警察勒死了。參見Charles F. Keyes，Isan: Regionalism in Northeastern Thailand（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Data Paper no. 65，1967），第34頁；Thak Chaloemtiarana，“The Sarit Regime, 1957—1963: The Formative Years of Modern Thai Politics”（康奈爾大學博士論文，1974年），第118頁。

[[309]](#_309_17)譬如，參見Thak，“The Sarit Regime”，第266—269頁，其中敘述了幾起公開處決：1959年7月5日處決素帕差（Suphachai Sisati），1961年5月31日處決空·贊達翁（Khrong Chandawong）和通潘·素提瑪（Thongphan Sutthimat），1962年4月24日處決倫·蓬旺（Ruam Phromwong）。他儂—巴博時代的受害者屬于完全超出了知識分子與政客小圈子的那些集團。比如，1975年由內務部實施、該部自己的監察長主管的一項官方調查，證實了學者的指控：1970—1971年里，在博他侖（Patthalung）府，至少有70人被清共行動指揮部（Communist Suppression Operations Command）就地處死。報告寫道：“士兵們逮捕的共黨嫌疑分子，多數被處死了。以前，士兵們會把這些嫌疑分子射殺在路邊［原文如此！］。但是后來他們改變了殺人作風，采用了紅油桶殺戮法，以便毀滅一切可能證據。軍士會將嫌疑分子亂棍打昏，然后丟進紅油桶里，活活燒死。”Bangkok Post，1975年3月30日。有關不問青紅皂白地用凝固汽油彈轟炸北部少數族群苗族［Hmong］的村落，參見Thomas A. Marks，“The Meo Hill Tribe Problem in Thailand”, Asian Survey，13: 10（1973年10月），第932頁；Ralph Thaxton，“Modernization and Peasant Resistance in Thailand”，見Mark Selden編，Remaking Asia（New York: Pantheon，1971），第265—273頁，尤其是第269頁。

[[310]](#_310_17)這些警察穿著平民服裝，由警車護送，警車閃著燈，前邊是摩托車警衛開道。除了偷了白蘭地酒和香煙之外，他們給克立的豪宅造成的損失估計達50萬美金。New York Times，1975年8月20日。恰在同一時刻，國立法政大學（Thammasat University，學生激進主義的精神家園）遭到襲擊，有些地方被紅衛隊（Red Gaurs，見下）的右翼小流氓付之一炬，而肇事者逍遙法外。

[[311]](#_311_17)這次謀殺發生在2月28日。參見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76年3月12日。

[[312]](#_312_17)1976年2月15日，穩健的新勢力黨的曼谷總部被右翼小流氓用燃燒彈炸毀。參見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76年2月27日。雖然有個小流氓在這過程中被炸斷一條胳膊，但警方仍以“證據不足”為由將他釋放。3月21日，曼谷鬧市區有大批游行者，他們要求美國駐軍全部撤離，這時一顆炸彈飛來，炸死四人，傷者多多。參見Prachachart Weekly Digest，22（1976年3月30日），第1頁。

[[313]](#_313_17)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76年4月9日。

[[314]](#_314_17)也許在此應當強調，本文主要關心的是新社會構成和新文化趨勢的出現，所以特意不大關注這些舊統治集團，或者像軍隊和內務部這類強大的官僚機構。這些集團和機構的政治作用在有關現代泰國政治的文獻中已經廣泛討論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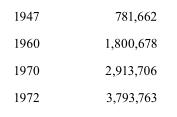
[[315]](#_315_17)這個短語我想是里格斯（Riggs）創造的，參見他的《泰國》，第11頁。不過這里的基本思想構成了威爾遜《泰國政治》的中心，該書是那個時期最最有影響的研究。

[[316]](#_316_17)Thadeus Flood，“The Thai Left Wing in Historical Context”，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7: 2（1975年4—6月），第55頁。在這篇優秀論文里，作者從布蘭查德等人《泰國》一書（Wendell Blanchard等，Thailand ［New Haven: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1957］，第484—485頁）中引用了以下幾句有意思的話：“［泰國農民］能否設想一種沒有地位高下之分的社會環境，這很難說。農民和其他社會地位低的人從不把這樣一種社會體系看作是特別不合理或苛酷的，而且泰國不存在全面社會壓迫的歷史。”

[[317]](#_317_17)參見G. William Skinner，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 History（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7）；以及他的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ailand（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8）。亦見Donald Hindley，“Thailand: The Politics of Passivity”，Pacific Affairs，41: 3（1968年秋），第366—367頁。

[[318]](#_318_17)Frank C. Darling，Thai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s Press，1965），第29頁。書中提到，1932年推翻絕對君主制時，泰國經濟的95%掌控在外國人和華人手里。

[[319]](#_319_17)在四分之一世紀里，曼谷—吞武里都市群的人口增長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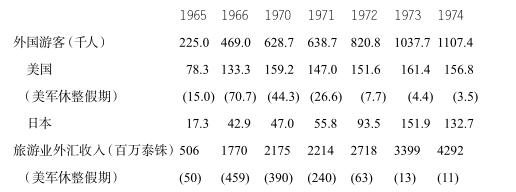


參見Ivan Mudannayake編，Thailand Yearbook, 1975—1976（Bangkok: Temple Publicity Services，1975），第E28頁。

[[320]](#_320_17)Darling，Thailand，第29，61，170—171頁。到1949年，美國同暹羅的貿易已增長到最近的戰前水平的20倍。到1950年代末美國購買了暹羅90%的橡膠和大部分錫。

[[321]](#_321_17)這一分析思路是在撒克斯頓《現代化》一文里詳盡發展出來的，第247—251頁。

[[322]](#_322_17)下表提示了這一旅游業規模的某些指標：



注：在評估1972—1974年數據的顯著性時，我們必須記住當時的高通脹率。資料來源：世界銀行，“泰國：當前經濟前景與精選的發展議題”，第二卷（統計資料附錄），1975年11月14日，表8.7。在這些年里，旅游業位居外匯收益最高的八大行業之中。

[[323]](#_323_17)有關沙立的無比倫比的資料來源，是塔克的《沙立政權》一文。至于他在泰國軍隊美國化當中所起的作用，尤請參見第120—122頁。不過達林的《泰國》一書對沙立—華盛頓關系的美國一方的論述很有參考價值。

[[324]](#_324_17)沙立特別支持美國在老撾的進攻行動。鑾披汶生于中部泰國的大城附近，在其基本取向中是個“泰中人”；而沙立在很多方面都是東北人。他的母親來自泰老邊境的廊開，他本人在那兒度過了一段童年時光。通過母親，他緊密聯系著富米·諾薩萬將軍（Gen. Phoumi Nosavan），后者長期被五角大樓視為萬象的右翼—軍國主義的獨裁者人選。

[[325]](#_325_17)披汶時代從來沒有什么國家計劃。暹羅的第一個國家發展六年規劃是沙立政府擬定的，1961年正式開始實施。有關這一規劃，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奴顏婢膝地聽從了國際復興與開發銀行的建議，參見Pierre Fistié，L'Évolution de la Thaïlande contemporaine（Paris: Armand Colin，1967），第334—335頁。但亦見塔克《沙立政權》，第327—328頁，其中主張沙立沒有允許自己完全受國際技術官僚的指導。

[[326]](#_326_17)雖然披汶在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實質上是個獨裁者，但在1948—1957年當總理的第二個漫長任期里，他處于一個軟弱得多的位置。他被1947年的政變集團重新扶上臺，只是一種有名無實的首腦，能夠用來為他們的政權添上某種國際“風采”而已。披汶的屹立不倒，主要是因為美國的支持，以及他在日趨對立的警察總監炮·西耶儂與沙立將軍兩派之間的圓滑平衡。到1958年、1959年政變時，沙立削弱了警察的權力，讓他控制的軍隊成了泰國政治生活無可爭辯的主宰。

[[327]](#_327_17)對泰國吸引外國投資者的一個概述，參見Fistié，L'Évolution，第337頁。

[[328]](#_328_17)根據《紐約時報》1968年4月14日的說法，當時有46,000人的部隊駐扎泰國，每月還有5,000人的軍隊從越南到此過休整假期。1967年10月2日的《國家》雜志列出了46,000人的軍隊，從事經濟和宣傳活動的人員7,000名，以及8個空軍基地。

[[329]](#_329_17)對比1960年和1970年各部門的就業人數，可以部分顯示這一轉型：



取整的數字是根據世界銀行《泰國》第二卷（1975年11月14日）表1.2計算而得。1960—1965年，國民總收入年增長7.5%，國內總投資年增長14.4%。參見“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o the Executive Directors of the World Bank on a proposed loan to the Industrial Finance Corporation of Thailand”，1976年9月1日，附錄I。Clark Neher，“Stability and Instability in Contemporary Thailand”，Asian Survey，15: 12（1975年12月），第1100—1101頁，給出了1959年到1969年間年均8.6%的GNP增長率。

[[330]](#_330_17)例如，參見Fistié，L'Évolution，第353頁；Robert J. Muscat，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ailand : A Study of Economic Growth（New York: Praeger，1966），第138頁。

[[331]](#_331_16)詳細情況及略圖，參見Thak，“The Sarit Regime”, 附錄IV。

[[332]](#_332_16)這種后果的生動證據，見Howard Kaufman，Bangkhuad: A Community Study in Thailand（Rutland, Vt. and Tokyo: Tuttle，1976），第219—220頁。考夫曼1954年研究過Bangkhuad，那時它還只是曼谷外緣一個小小的農村社區；17年后重訪那里，他發現：1954年1萊（相當于0.4英畝）土地價值3,000泰銖（約合150美元），到1971年漲到250,000泰銖（約合12,500美元）。此外，最值錢的土地不再是最肥沃的，而是最靠近開發中的道路系統的。塔克《沙立政權》（第337—338頁）提到，主要公路沿線的許多有地農民被霸道的官員及其幫兇直接趕走了事，不給任何補償。

[[333]](#_333_16)參見佚名，“The U.S. Military and Economic Invasion of Thailand”,Pacific Research，I: 1（1969年8月3日），第4—5頁，其中引用了商務部，OBR 66—60，1966年9月，第6頁。Neher，“Stability”，第1110頁，講到租佃和債務“陡然猛漲”。Takeshi Motooka，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ailand（Kyoto: Kyoto University，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71），第221頁以下，說到：（1）根據泰國政府1963年的農業調查，中央平原的耕地有60.8%是佃農或半自耕農在經營。（2）從他自己在巴吞他尼府（離曼谷很近）某區的局部研究來看，90%的在耕農民是佃農。另一方面，租佃急增的論點最近又遭到猛烈抨擊，見Laurence Stifel，“Patterns of Land Ownership in Central Thailand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64: 1（1976年1月），第237—274頁。關于北部清萊府日漸增長的地主所有制、債務和地契篡改的某些比較性材料，參見Michael Moerman，Agricultural Change and Peasant Choice in a Thai Villag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第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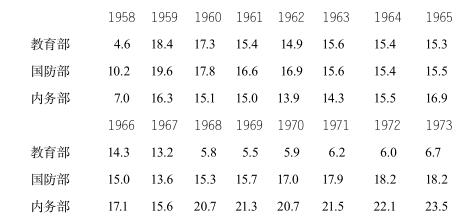
[[334]](#_334_16)這種流動甚至在這波繁榮之前就很廣泛了。Mudannayake編，Thailand Yearbook, 1975—1976，第E30頁，提到在1960年，多達四分之一的曼谷人口是別處出生的。

[[335]](#_335_16)這個時代所造就的此等“非官僚”新富的一個顯例，是龐大的社會正義黨1974—1976年間的首腦，他威·金巴吞先生（Mr. Thawit ［‘Dewitt'］ Klinprathum）。他是一個貧寒的政府官吏的兒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比中學高出許多，以做記賬員開始工作，月收入10美元。后來他當過三輪車夫、貨運職員、巴士司機，諸如此類。如他的正式傳記所記載的，“當他拿到快遞與運輸組織（ETO——一家國有公司，同JUSMAG關系密切）的轉包合同，致力于卸載和運輸設備時，他就認識到對拖車的需求。他用他的積蓄和銀行貸款，買了兩輛拖車，運送重型機械和設備……他開始為美國聯合軍事顧問團（JUSMAG）和農村發展促進會（ARD）承運設備。德威特先生選擇了恰當的時機購買拖車，因為機械化正成為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由于擁有拖車和吊車的本地公司別無第二家，他的公司——拖車運輸公司——就攥緊了運輸軍事設施的合同……當全國運輸網絡擴張的時候，他的貨倉擴大了，他的拖車和卡車總共有好幾百輛。”Bangkok Post，1974年12月24日（社會正義黨買下的特別廣告版）。著重號系引者所加。到1974年，“德威特”成了億萬富翁，有一幢屬于自己的八層辦公大樓。

[[336]](#_336_16)靠右兩列數字很可能大大偏低。特別是E類必須包含農村零售商店店主和商人的數字，雖然沒有辦法哪怕大致說出他們有多少。

[[337]](#_337_16)Neher，“Stability”，第1101頁；Frank C. Darling，“Student Protest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ailand”, Pacific Affairs，47: 1（Spring 1974），第6頁。想理解像泰國這樣的資本主義社會里的階級形成，要緊的是去研究“不事生產的”分子（學童，大學生，等等）。為了營建和延續他們的地位/財富，新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群體把他們的孩子們領進了教育機構。當我們看到“享特權的孩子”以及兩代人的權力時，我們才知道一個階級（而不是乍然興起的精英）何時真的漸趨形成。貴族可以靠通婚來強化自身，資產階級做不到，起碼不能同等程度地做到。教育往往代替了婚姻。

[[338]](#_338_16)參見達林《學生抗議》一文第6頁。這些數字應當放在塔克《沙立政權》（第437—438頁）所引的預算統計資料的背景下來理解，該資料顯示了1953—1973年間教育部、國防部和內務部的開支占總預算的百分比。為簡潔起見，我只給出他對1958—1973年間數據的計算結果。



如果我們記得初等教育的費用出自內務部的預算，那么中等和高等教育的開支規模（表現為教育部的預算）就相當驚人。

[[339]](#_339_15)Kaufman，Bangkhuad，第220頁，注意到在非常靠近曼谷的這個社區，1954年只有6%的十幾歲青少年在上隨便什么形式的中學。

[[340]](#_340_16)比如，參見David K. Wyatt，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Thailand: Education in the Reign of King Chulalongkor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第1章；以及他早期的論文，“The Buddhist Monkhood as an Avenue of Social Mobility in Traditional Thai Society”，Sinlapakorn，10（1966），第41—52頁。

[[341]](#_341_16)亦見上引書，第149頁；Kaufman，Bangkhuad，第220頁，評論說，到1971年，這個社區60%的十幾歲青少年都進了中學。

[[342]](#_342_16)同上，第229—231頁，提供了這個主題的一些極好材料。Hans Dieter-Evers，“The Formation of a Social Class Structure: Urbanization, Bureaucratiz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ailand”，見Clark D. Neher，Modern Thai Politics（Cambridge, Mass.: Schenkman，1976），第201—205頁，指出自1932年政變時期以來這個趨勢就在逐步發展。從他研究過的一個高級文官樣本來看，1933年前進入政府部門的那些人有26%擁有國外大學學位；二戰后進入的那些人中，這個數字是93%。

[[343]](#_343_16)在此需要強調的是人們以為可能的流動程度，亦即公眾意識的變化。不必驚詫，實際的流動沒有那么激動人心，如克拉夫特的抽樣調查所示：



資料來源：Richard Kraft，Education in Thailand: Student Background and University Admission（Bangkok: Educational Planning Office，Ministry of Education，1968），轉引自 Mudannayake編，Thailand Yearbook, 1975—1976，第117頁。克拉夫特估計，政府官員的孩子獲準讀大學的可能性，比農民家的孩子大267倍（工廠主和實業家的子女也比后者大35倍）。

[[344]](#_344_16)與二戰后世界權力從歐洲向美國的普遍轉移相一致，泰國教育金字塔的頂端變成了加利福尼亞、印第安納和紐約的大學教育，而非倫敦和巴黎。Harvey H. Smith等，Area Handbook for Thailand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8），第175頁，說在1966年，留學國外的4000名泰國青年中，有1700人是在美國。（有充足理由相信，這兩個數字都是不切實際地偏低。）而近至1955年，留學國外的泰國人總數還只有1969人（Evers，“Formation”，第202頁）。

[[345]](#_345_16)例如，參見Thanet Aphornsuwan，“Khwām khluanwai khong nak suksā Thai nai yukh rk （早期泰國學生運動）”，見Witthayakorn Chiengkun等，Khabuankān nak suksā Thai adīt thung patchuban （泰國學生運動史）（Bangkok: Samnakphim Prachan Siao，1974），第28頁；Sawai Thongplai，“Some Adults'Ideas about Some Youngsters”, Prachachart Weekly Digest，22（1976年3月30日），第15—18頁。

[[346]](#_346_16)Neher，“Stability”，第1101頁；Darling，“Student Protest”，第8—9頁。

[[347]](#_347_16)試比較曼谷的消費者價格指數的以下數據（1962年為100）：1964，102.9；1965，103.8；1966，107.7；1967，112.0；1968，114.4；1969，116.8；1970，117.7；1971，120.1；1972，124.9；1973，139.5；1974，172.0；1975年1—8月，176.4。數據摘自World Bank，“Thailand”，（1975)，II，Table 9.1。Neher，“Stability”，第1100頁，給出的通脹率是：1972，15%；1974，24%。

[[348]](#_348_16)意義重大的是，當這一對獨裁者在1969年舉行全國選舉時，民間的反對黨民主黨——它在某些方面是新資產階級各階層的代表——囊括了曼谷的全部席位。這次全勝應當看作是中產階級參與1973年10月14日事件的前兆。關于民主黨人的全勝，參見J.L.S. Girling，“Thailand's New Course”，Pacific Affairs，42: 3 （Fall 1969），尤其是第357頁。

[[349]](#_349_16)此處值得一提的要緊事情，是反對他儂—巴博政權的最終示威的規模。Neher，“Stability”，第1103頁，給出的數字是500,000人——這是泰國史無前例的大示威了。

[[350]](#_350_16)國內總投資的年增長率，1960—1965年為14.4%，1965—1970年為13.5%，1970—1975年降至5.1%。國際收支形勢自1973年以來迅速惡化。



資料來源：《國際復興與開發銀行行長的報告與建議》，附錄I，1976年9月1日。

[[351]](#_351_16)實際上是沙立宣布罷工和組織工會為非法的，這既是為了挫敗左翼反對派，也是為了鼓勵外國投資。內爾《穩定》一文（第1100頁）指出，“1973年發生了兩千余起勞工罷工，幾乎全是發生在1973年10月起義之后［著重號系引者所加］，1974年前六個月統計出大約有1500起罷工。與此相對照，1969—1972年三年間，總共不過發生了100起罷工。”訕耶政府提高了60美分的日最低工資，先是提到1美元，后來（1974年10月）提到1.25美元。Indochina Chronicle，1975年5—6月。

[[352]](#_352_16)有些經營不善的泰國企業的利潤率肯定直接依賴獨裁政府所保證的極其廉價的勞動力。

[[353]](#_353_16)1966年，向政府登記的30,672家制造企業中，僅5%雇用人數超過50人。Smith等，Area Handbook，第360頁。

[[354]](#_354_16)“很奇怪，職業學校畢業生找工作這么難辦。在鄉村地區，只有25%的人能夠找到工作；在大曼谷區域，形勢好不了多少，只有大約50%就了業。”Mudannayake編，Thailand Yearbook, 1975—1976，第110頁。

[[355]](#_355_16)意味深長的是這一事實：在1973—1976年間，也許最為好戰的勞工工會是旅社與賓館工人聯合會，由大名鼎鼎的活動家貼蓬（Therdphum Chaidee）領導。（到1976年，暹羅單單一流賓館就至少有50家，雇用了三萬多人。Bangkok Post，1975年5月22日。）再沒有人比薪水微薄的侍者或女服務員更加苦澀地看到，他們有些同胞實際上過的是何等窮奢極欲的生活。頗可說明問題的是，聯合會好戰性的主要目標，不是外資或華人的賓館（它們通常十分樂于承認工會，并通情達理地跟它打交道），而是泰國人（新老富豪）擁有的賓館，后者執意以恩庇方式對待雇員。1975年最為暴烈的罷工，是在市中心豪華的律實他尼（Dusit Thani）酒店爆發的，當時泰國人管理層雇用了紅衛隊的槍手來破壞罷工。參見《曼谷郵報》1975年5月30日所做的敘述，其中還引用了總理克立·巴莫對他所謂“私人軍隊”的激烈批評。

[[356]](#_356_16)Chaktip Nitibhon，“Urban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Estate in Thailand”，見Prateep Sondysuvan編，Financi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ailand（Bangkok: Sompong Press，1975），第249頁，記述說，1967—1971年間，曼谷登記的車輛數增加了15%（路面增長了1%）。1973年，隨著32萬多輛車的登記，暹羅首都容納了全國車輛總數的一半有余。

[[357]](#_357_16)例如，參見Somporn Sangchai，“Thailand: Rising of the Rightist Phoenix ［原文如此！］”,見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976（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76），第361—362頁。

[[358]](#_358_16)“警方說，來自婺天他崴（Uthane Thawai）建筑學校的大約300名學生，手持炸彈、棍棒、槍支和其他武器，［昨天］行進到國家體育場前面的帕度萬（Pathumwan）工程學校，同300名帕度萬學生進行了一場近距離戰斗。”（The Nation，1975年6月17日）稍早和隨后的一些對抗包括以下這些：（1）1974年10月29日，在律實（Dusit）建筑學校、暖武里（Nonthaburi）工程學校與邦散（Bangsorn）工程學校的學生間發生一場交鋒，丟了一顆炸彈，炸死一個小男孩，炸傷十四人（Bangkok Post，1975年12月9日）。（2）12月26日，邦散工程學校與北曼谷工程學校的男生干了一仗，用上了炸彈和步槍，一名學生被殺，多人受傷（The Nation，1974年12月27日）。（3）1974年12月27日，在律實建筑學校和阿齊瓦希帕（Archivasilpa）學校的兩伙人之間的斗毆中，三名學生受了嚴重的刀傷和槍傷。（Bangkok Post，1974年12月28日）1975年1月22日，邦散學校和北曼谷學校間一場變本加厲的瓶制炸彈、步槍和手榴彈的大戰，導致《曼谷郵報》一位攝影記者斃命（Bangkok Post，1975年1月23日和24日）。（4）6月12日，來自拉瑪六世工程學校、邦散工程學校、婺天他崴建筑學校、暖武里工程學校、帕度萬工程學校和其他職業學校的男生們爆發一系列瓶制炸彈和塑料炸彈混戰，兩名學生身亡（The Nation，1975年6月13日）。（5）6月18日，阿齊瓦希帕學生與巴士工人和建筑工人發生爭執，之后學生們用火焰炸彈炸毀了幾輛巴士，造成重大傷害（The Nation，1975年6月19日）。這些學校當中，只有拉瑪六世工程學校有幾分（左派的）政治聲譽。

[[359]](#_359_16)Bangkok Post，1975年6月1日

[[360]](#_360_16)私人交流。關于職校畢業生中的失業率，試對照前面第203頁的注釋1。

[[361]](#_361_16)紅衛隊諸集群的兩位較有名的頭目直接上通ISOC。他們是巴潘·翁堪（Praphan Wongkham）和色賽·哈沙丁（Suebsai Hatsadin），前者被認出是“國內安全行動指揮部的一名27歲職員”，后者是從前掌管ISOC“山地部落處”（Hill Tribes Division）的特別上校戍賽·哈沙丁（Special Colonel Sudsai Hatsadin）之子。Bangkok Post，1975年6月1日；Norman Peagam，“Rumblings from the Righ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75年7月25日。眾所周知，紅衛隊的其他集群分別控制在以下兩人手里：韋通·耶沙瓦（Withoon Yasawat）將軍，駐扎在老撾、受雇于中央情報局的泰國雇傭部隊的前領導人；差猜·春哈旺（Chatchai Choonhawan）將軍，前任警察總監炮·西耶儂的連襟，泰國民族黨（Chat Thai）的頭號人物，還是克立·巴莫政府（1975年3月—1976年4月）的外交部長。應當一提的是，ISOC也大量滲透進了教育部負責職業教育的部門，是NVSCT（全泰職業學生中心）幕后的出錢人和操縱者。NVSCT是龐大的NSCT（全泰學生中心）的小規模、攻擊性的右翼對手，后者在自由主義時期是左翼學生活動分子的先鋒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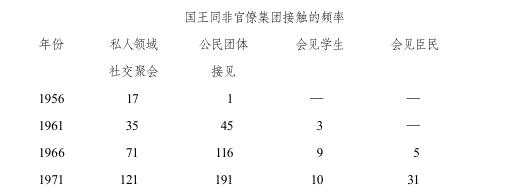
[[362]](#_362_16)雖然紅衛隊的主體大概是小資產階級出身（泰國工人階級讓子女念書念到中學或職業學校的可能性甚微），但是有可能——甚至很可能有一部分是從前面第148頁提到的進城無業人口中招募的。

[[363]](#_363_16)總理他寧·蓋威遷（Thanin Kraiwichian）在1976年10月17日的一次廣播節目中講到：“面臨貧困的另一個人群，是季節性工人、輔助工、新畢業生和其他失業者。眼下的失業人數已逾百萬。”FBIS（對外廣播新聞處）每日報道，1976年10月18日。著重號系引者所加。

[[364]](#_364_16)他們起了重要作用的事情有：在1976年競選運動期間威嚇自由主義人士和左派分子；驅逐試圖在村里組織農民和佃農協會的學生活動分子；在1976年10月6日政變前夕要求社尼·巴莫（Seni Pramote）政府三名“進步”部長（素林·馬沙滴［Surin Masdit］，川·立派 ［Chuen Leekphai］，丹龍·拉塔比帕［Damrong Latthaphiphat］）辭職；還有10月6日當天的暴行。例如可參見，Sarika Krirkchai，“Do Not Corrupt the Village Scouts”, Prachachart Weekly Digest，23（1976年4月6日），第14—15頁。

[[365]](#_365_16)后面幾句話所包含的有關鄉村童子軍的很多信息，出自這篇富于啟發、資料翔實的文章：Natee Pisalchai，“Village Scouts”，見Thai Information Resource（Australia），no. 1（1977年5月），第34—37頁。

[[366]](#_366_16)塔克《沙立政權》（第414—425頁）提供了關乎三種這類技術的有益資料。第一，國王增加了他所主持的婚禮的絕對數量，也增加了牽涉到資產階級夫妻的婚禮較之皇親、貴族或軍人婚禮的相對數量。第二，通過老練地分配官方勛章，君王得以從新興資產階級那里征集到巨額款項，形式上他們是為慈善（1966年后是為反共）組織和運動捐款。（但是，捐款甚至也取之于貧窮的三輪車夫，特別是為了“平民主義的”形象制造目的。）第三，這位統治者格外醒目地增加了他同官場外各集團的私人接觸。



本表摘自《沙立政權》，第422頁。如塔克正確評論的，這一切活動“清楚表明，君王正在發展與冉冉升起的（私有）中產階級部門的聯系”。

[[367]](#_367_16)那提（Natee）記載說，1976年9月和他一道申請加入童子軍佛統（Nakhon Pathom）分部的496名同伴中，70%的人年紀在35到42歲之間，2—5%是年輕人，剩下的大多六七十歲。他還說，“參加這個計劃的人多數相當富裕”。參見“Village Scouts”，第34—35頁。其實，大概不富不行，因為受訓者須購買昂貴的徽章和團隊彩色相片；每天掏40—50泰銖的伙食費；做宗教捐獻；為在選美和賽舞大會上穿的考究服飾買單。（同前，第36頁。）

[[368]](#_368_16)雖然府尹經常是童子軍的地方主席，出錢之事卻故意留給了注重聲望和地位的地方聞人。（同上，第34—35頁。）

[[369]](#_369_16)精彩的描述可參見同上，第34和37頁。那提的團隊被拉去參觀皇家勝地華欣鎮附近的那黎宣（Naresuan）傘兵訓練營。（這些傘兵部隊在10月6日暴行中的所作所為密切配合鄉村童子軍。）受訓者所受教導的風貌，或可從要求他們學會的歌曲中管窺一二。這些歌曲有：“醒來吧，泰國人！”“皇太后頌”“國王頌”“他們就像我們的爹娘”“守時”，還有“干什么都行！”上演的戲劇的主題包括共產黨人在地獄受盡折磨的場景。

[[370]](#_370_16)1975年6月，各美軍基地的2000名“安保衛兵”發動了一場蔚為壯觀的罷工。衛兵們不但要求政府保障他們將來的生計，還指控最高司令部貪污了美國彌補給他們的超過8,000,000,000泰銖（約合$400,000,000）的離職金。最高司令部參謀長江薩·差瑪南（Kriangsak Chomanan）將軍匆忙否認了這一控告。The Nation，1975年6月19日，21日。全泰學生中心（NSCT）大力支持衛兵們的要求，而且很奇怪，還同他們中間一些人發展出親近的工作關系。

[[371]](#_371_16)人們一定想象得出，這些社會集團的人獲悉下述事情時所體驗到的震驚：1975年1月22日，洛坤府府尹凱·七彼達（Khlai Chitphithak）的官邸，被大約3000人的憤怒人群燒為平地。人們普遍懷疑這個府尹在處理為最近的大洪災災民提供的救濟物資上貪污、瀆職，他被迫悄悄逃往曼谷。Bangkok Post，1975年1月23日和24日。

[[372]](#_372_16)盡管有弗勒德（Flood）的佳構《泰國左派》（Thai Left Wing）匯集的材料，我還是要這么說。弗勒德巧妙表明了關于泰國左派的現實連續性因素，但也表明了——也許不是有意的——它直到最近多么受壓制和邊緣化。

[[373]](#_373_16)這話對游擊區里的泰國共產黨的適用程度，絲毫不亞于力求參與議會政治的左翼分子。是的，君主制在1930年代經歷了一段艱難時期，以至于拉瑪七世自愿接受遠遁英格蘭。但是似乎不存在消滅君主制本身的現實問題，所求者不過是讓它與國際上尊崇的憲政標準相一致。

[[374]](#_374_16)到1894年，近代類型的國防部才建立起來。

[[375]](#_375_16)有關這種依賴性的種種事實，是近現代暹羅歷史編纂學的老生常談。但是傳統上它們被按照善意而正統的方式，解釋成統治者的“現代”和“進步”的標志。有關暹羅東北（Isan，伊森）如何在拉瑪五世、六世、七世當政時被曼谷征服的極富教益的描繪，參見凱斯（Keyes），《伊森》，第三章（“泰國［原文如此］控制的加強”）。他強調了外部和平，鐵路、公路、電報和電話系統的擴展，以及國家管理下的“現代”教育這三方面的重要性。

[[376]](#_376_16)歐洲帝國主義對泰國君主制產生的后果，在另外兩方面也很重要。第一，它改變了繼位的有效原則，從政治才干和資歷轉成了準長子繼承制。要是按帝國主義到來前的條件，拉瑪六世或七世本來不可能登上王位，因為他們很缺乏現實的政治—軍事能力。第二，它終止了開創新王朝的可能性。實現這一點一定是在世紀之交就已開始了。像鑾披汶和沙立這樣有才無情的人物，在諸多方面極似拉瑪一世，卻不再能夠開啟新的皇族世系。然而，在鑾披汶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所執行的擴張主義和領土收復主義政策中，我們可以看到王朝的歷歷輪廓。可以說，他是在恢復大暹羅（Greater Siam，緬甸、柬埔寨、老撾和馬來亞都占它幾塊地），就像達信（Taksin）大帝和拉瑪一世先他而為的那樣。

[[377]](#_377_15)參見Wilson，Politics in Thailand，第18頁。

[[378]](#_378_15)這里同日本德川時期幕府將軍與天皇的關系有著奇特的相似之處，這一點可能不會完全逃過披汶的注意。

[[379]](#_379_15)傳統老撾和暹羅的權力斗爭的賭博中，重要的獎品之一就是某種受人膜拜、富含神力的物體（特別是佛像），它們被西方許多暹羅史家當作保護神來提及。1932年后，人們覺察到有一種興趣在發展起來：控制作為神器的國王。皇家的國內境遇或許促進了這一趨勢。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拉瑪八世還是個孩子，多數時間在海外求學。（結果，那時的暹羅幾乎沒有皇家的親身在場。）二戰后不久他回國，但差不多立即在一個如今依然撲朔迷離的情形下中槍身亡。他的弟弟即位，就是當今國王，其時也尚未成年，因之不能發揮獨立的政治作用。

1971年保護神化達到一個壯觀的峰巔，當時他儂元帥組織了一場反對他本人的政府的政變，然后現身電視，在觀眾們面前莊嚴地打開一封據稱是那位保護神表示贊成的信，信是用金盤端出來的。

[[380]](#_380_15)然而他的確做了努力，要給自己披上佛教的合法性外衣，尤其是在緊張不安的時刻。例如1956年，當他的政權日薄西山的時候，他拿政府的錢整修了1239座廟宇。（1955年，這個數字還只是413座，而1954年更是區區164座。）參見Thak，“The Sarit Regime”，第128頁。他也耗金無數，用于佛歷2500年的慶祝活動（1957年），還企圖不讓君主制分享這隨之而來的榮耀。作為回敬，宮廷針鋒相對地置身該進程事外。同上，第129—130頁。

[[381]](#_381_15)披汶之“恢復民主”在1957年的舞弊選舉中臻于頂點，對此的描述，參見Wilson，Politics in Thailand，第29—31頁。現代暹羅政治史上最古怪的諷刺之一是：曼谷市中心著名的民主紀念碑——1973年10月14日示威及之后的學生激進主義最重要的視覺符號，竟是暹羅踞位最久的獨裁者建造起來的。

[[382]](#_382_15)對沙立玩弄傳統符號這方面的分析，見Thak，“The Sarit Regime”，第397—402頁。1959年底、1960年初，國王和王后首次離開這個國家，訪問了西貢、雅加達和仰光。1960年6月和1961年1月之間，他們先后訪問了美國、英國、西德、葡萄牙、西班牙、瑞士、丹麥、挪威、瑞典、意大利、比利時、法國、盧森堡及荷蘭（請注意這些國家有一半都多少稱得上君主制）。在沙立于1963年末死去之前，他們出訪了更多的國家：馬來西亞、巴基斯坦、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和菲律賓。隨著馬來西亞和聯合王國王室成員的來訪，對泰國君主制的國際“承認”水到渠成。

[[383]](#_383_15)同上，第410—425頁，有精彩的詳細描述。塔克也提到，皇室有組織地、直接地參與了反共、平叛的宣傳運動。

[[384]](#_384_15)沙立愿意為人犯處決和其他體制暴力承擔個人責任，這完全符合十九世紀前泰國國王的作風。

[[385]](#_385_15)參見Mahāmakuta Educational Council編，Act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Buddhist Order of Sangha （Bangkok: The Buddhist University，1963），其中全文收錄了1962年條例及其取代的管理制度（1941年起生效）。1941年體系是三分的，權威在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間分劃。1962年體系創立了一個單一的行政—司法統治集團。石井米雄（Yoneo Ishii）說得很對，新規定完全泯除了“民主的理念，那本是前一法令的精神”。（參見他的“Church and State in Thailand”，Asian Survey，8: 10 ［1968年10月］，第869頁。）它們還允許世俗當局（警察）無需征求僧伽當局意見就逮捕僧人，我相信這是開先河的。

[[386]](#_386_15)關于這個案件，參見Somporn，“Rightist Phoenix”，第384頁；S.J. Tambiah，World Conqueror and World Renounce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第257—260頁。盡管這兩個人，帕·披莫丹（Phra Phimonladham）和帕·薩沙納索蓬（Phra Sasanasophon），已經被法庭徹底宣布無罪，但掌權僧伽太怯懦、貪財或妒忌，沒有恢復他們的原位。1973年10月后，為他們平反昭雪的一場靜悄悄的運動展開了，起初收效甚微。然后到1975年1月12日，在現代泰國史上沒有先例的一樁行動中，許多年輕僧人在曼谷的瑪哈泰寺絕食示威，除非僧王同意重理此案，否則拒絕進食（The Nation，1975年1月13日）。示威引起轟動，1月17日，僧王屈服，答應本月內恢復名譽。（Bangkok Post，1975年1月18日。）1月30日，一個特別任命的僧伽委員會終于為兩人洗清罪名。（Bangkok Post，1976年2月23日）

僧王頌德·帕·阿力雅翁沙達雁（Somdet Phra Ariyawongsakhatayan）在起初的陷害中與沙立合謀，1971年12月18日，他在一起交通事故中死得讓人毛骨悚然。許多泰國人都認為他的下場是濫用權力的因果報應。

[[387]](#_387_15)參見Charles F. Keyes，“Buddhism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ailand”，Journal of Asian Studies，30: 3（1971年5月），第551—567頁，尤其是第559—565頁；另見Ishii，“Church and State”，第864—871頁。

[[388]](#_388_15)宏揚佛教的沙立死后，結果顯示他靠貪污聚斂了1.4億美金的財富，養了大約80個情婦。參見塔克，《沙立政權》，第427—430頁，他還引述了有關這樁丑聞的許多當代泰語文獻。

[[389]](#_389_15)史密斯等人《區域手冊》的“教育與社會”部分（第175—177頁）對此有樸實的說明。

[[390]](#_390_15)關于這一點的一些有用材料，參見Chatcharintr Chaiyawat的文章，“Protests divide the monkhood”, Bangkok Post，1975年2月23日。亦見Kaufman，Bangkhuad，第224—226頁，提供了一個地方社區環境下的類似資料。1971年左右，對高級僧侶的胡作非為的諷刺性評說，開始可以公開聽到。例如參見Phra Maha Sathienpong Punnawanno，“Phra Song Thai nai Ro¸ b 25 Pī” （泰國僧伽廿五年），見Sangkhomsat Parithat （社會科學評論），9: 6（1971年12月），第28頁。這條引證我受惠于頌汶·素森蘭（Somboon Suksamran）先生的未刊稿，“泰國政治中的佛教僧侶”。在導致他儂和巴博被推翻的一系列抗議示威期間，僧侶們日益作為同情的見證人到場。

[[391]](#_391_15)1974年11月19日，有一群共百名僧人，手挽著手，實際上組成了一場大規模農民示威的第一線。那些農民11天前就來到曼谷，力陳土地改革的要求。Somboon Suksamran，“The Buddhist Monkhood”，第6頁。可以想見，這一舉動在“中庸的”和右翼的新聞界激起了發瘋般的反應，它們冷著臉堅持說，僧伽過去始終超脫政治，應當繼續發揚。12月8日，“激進”僧人空素法師（Phra Maha Jad Khongsuk）宣布成立“泰國佛教徒聯合會”，以期推進僧伽的民主化與佛徒教育的社會服務取向。Prachathipatai，1974年12月9日，亦見Bangkok Post，1974年12月10—12日。前面第215頁注釋2提到的、發生于1975年1月的絕食示威，是叫做Yuwasong（青年僧侶）的一個團體組織的，它向1974年以來的全泰學生中心（NSCT）學到很多有關政治組織的東西。

[[392]](#_392_15)比如，參見空素法師在“泰國真是佛教國家嗎”研討會上的演講，發表在Phā Tat Phutsasanā （給佛教動手術），Bangkok: Pharbsuwan Press，1974，第48—49頁，轉引自Somboon Suksamran，“The Buddhist Monkhood”，第22頁。

[[393]](#_393_15)對吉滴烏斗職業生涯和政治思想的最佳敘述，見Charles F. Keyes，“Political Crisis and Militant 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Thailand”，見Bordwell Smith編，Religion and Legitimation of Power in Thailand, Burma, and Laos（Chambersburg, Pa.: Wilson，1977）。這篇文章包含了對吉滴烏斗著名的1976年演說——“殺死共產主義者不是過錯”的精妙透析。凱斯引用演說文字如下：“［殺死共產主義者不是殺人］因為不管誰破壞國族、國教、君主制，這等獸類就不是完全的人。所以，我們必定不想殺人，但想殺死魔鬼（Māra）；這是全體泰國人的義務……當我們殺一條魚，做成一道燒菜，放進一個和尚的化緣缽里時，正好與此相似。殺魚肯定有罪孽，但我們把它放到和尚的化緣缽里，就增進了大得多的功德。”凱斯的譯文是根據Kitti Wuttho，Khā Khōmmūnit mai bāp（Bangkok: Abhidhamma Foundation of Wat Māhadhātu, 1976）。自由主義報刊、全泰學生中心和其他人高聲抗議這篇演說的“反佛教”性質和吉滴烏斗在秘密極右組織納瓦朋（Nawaphon，見第220頁注釋2）的成員身份，但僧伽統治集團對此視若無睹，拒不給予哪怕是溫和的申斥，盡管先前他們曾以“不合僧侶身份的政治活動”為名，準備將空素等人（暫時）趕出所在寺院。

[[394]](#_394_15)參見Thanet，“Khwām khluanwai”，第30頁。

[[395]](#_395_15)參見Neher，“Stability”，第1101頁。

[[396]](#_396_15)重中之重的是才華橫溢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詩人、語言學家、隨筆作家和社會評論家集·普密薩（Jit Phumisak）的各種著作，他剛過36歲就被獨裁政府的特務殺害。1974年之前，他的多數著作要么是甫一出版即遭查禁，要么只能以手稿形式存在。在他儂—巴博政權下，人所共知的是，哪怕提一提集·普密薩的名字都是忌諱。然而1974—1975年，他的Chomnā Sakdinā Thai nai Patchuban （今日泰國封建主義的面目）出了三版，成為整整一代激進化青年人的圣經。

[[397]](#_397_15)可見一斑的是1976年11月6日他寧政權的公共關系處發表的惱羞成怒的如下評論：“我們的文化，被我們的祖先和風俗［原文如此！］保持著的文化，受到了忽視，說它過時了，認為它是一只恐龍或者別的滅絕生物。有些人不敬父母，學生蔑視老師。他們奉行一種外來的意識形態，沒有意識到這樣的行為對我們的文化多么危險，也聽不進更了解那種意識形態的那些人的忠言。過去三年里，國家安全時時受到威脅。對國家安全表示關注的任何人，都遭到自稱有進步思想的那些人的嘲弄，認為他們是官僚社會的廢物……”FBIS每日報道，1976年11月8日。

[[398]](#_398_15)有趣的是，創立于1974年的極右組織納瓦朋（總理他寧被普遍認為是它的成員），它的重要組成部分過去是（現在還是）中老年的大學教授。這些人多是在國外二流大學拿的文學碩士學位，向獨裁政府獻媚早有前科，被年輕人看待他們的那種公然批評甚至鄙夷的方式激怒了，那些年輕人拿的是一流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受到了反戰運動的理想主義影響。在許多要案中，一些大學高官被罷免，罪名是腐敗、可恥的怠惰和無能、替國家官僚機構暗中監視學生。關于納瓦朋，譬如可參見Keyes，“Political Crisis”，第8—12頁。

[[399]](#_399_15)第一個案子，案主是左翼學生活動分子巴登·丹龍乍龍（Praderm Damrongcharoen），他被控在為一家無名學生雜志寫的詩里影射國王。巴登很幸運，最終于1975年2月底被判無罪（事詳The Nation，1975年3月1日）。第二個案子涉及記者社尼·宋那（Seni Sungnat），他因在狂熱的右派報紙《暹羅之星》上批評王后的一篇演講，被控冒犯王后。1976年2月4日，社尼被判兩年監禁。（參見Prachachart Weekly Digest，15 ［1976年2月10日］，第36頁。）對一名右翼記者的懲處，清晰表明了“大逆不道罪”（lèse majesté）的起訴并非只是針對左派的別有用心的弄權，而是根源于真心的文化—意識形態恐慌。

[[400]](#_400_15)Kaufman，Bangkhuad，第229—231頁，精當描寫了一個地方社區里的這種沖突。

[[401]](#_401_15)他儂—巴博政府立即恢復與金邊的外交關系，在1970年夏差點兒就要向柬埔寨派遣泰國軍隊，支援朗諾政權和美國—南越的“進駐”。甚至在1950年代初，當高棉國王諾羅敦·西哈努克在他爭取柬埔寨獨立的“國王十字軍”（Royal Crusade）過程中來到曼谷，披汶政府就帶著不加掩飾的輕蔑對待他。參見Roger M. Smith，Cambodia's Foreign Policy（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5），第48頁。不過，柬埔寨的政治變局并不是全然沒有越過國界被人利用。例如吉滴烏斗證明他反共的好戰性有理，部分根據就是據稱在柬埔寨內戰的最后階段，共產主義者大肆屠戮高棉和尚。

[[402]](#_402_15)那時候，軍隊獨自擁有全國一半以上的電臺，以及曼谷除一家之外的全部電視臺。參見全泰反法西斯陣線（National Anti-Fascism Front of Thailand），“Three Years of Thai Democracy”, Thailand Information Resource，No. 1（1977年5月），第3頁。

[[403]](#_403_15)巴曼是日本大企業的知名合伙人，也是最近死去卻無人哀悼的警察總監炮·西耶儂的連襟。炮·西耶儂在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的暴虐行為，前文已簡要列舉過。

[[404]](#_404_15)Natee，“Village Scouts”，第35頁，聲稱，這起殺戮發生之前數小時，佛統的鄉村童子軍訓練營舉行了模擬演練：殺死“壞學生”并懸掛其尸首。他也證實，真實生活中的殺人者有幾個就出自這一營地。

[[405]](#_405_15)菩提樹庭園已經成為反抗獨裁的全國象征，因為1973年10月推翻他儂和巴博的示威活動正是從這個庭園出發的。

[[406]](#_406_15)值得注意的是，由一個典型的暴發戶人物創辦的《暹羅之星》，開設了報道鄉村童子軍活動的一個定期專欄。有錢的捐獻者和積極分子可以看到他們的名字被廣為傳揚，甚至間雜在皇室、貴族、政府要員們的大名中間。該報因而是發動一場迅捷、暴力的鄉村童子軍動員運動的當然場所。

[[407]](#_407_15)裝甲師廣播電臺的后臺老板烏坦（Utharn Sanidwong na Ayutthaya）上校，是王后的親戚，從而也是太子的親戚。參見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77年2月11日。他在10月5—6號的造謠中的核心角色，標示了宮廷是推翻立憲議會政權的同謀。另一個有影響的煽動仇恨者是烏迪·那沙瓦（Uthit Naksawat）博士，他是康奈爾大學的畢業生，Chomrom Witthayu Seri（泰國獨立廣播集團）的總裁。

[[408]](#_408_15)這是他們陷入近乎宇宙論恐慌（cosmological panic）的一個怪誕卻典型的信號：他寧政權竟然禁止泰國學校講授一切（就是說，即便是右翼的）形式的政治理論。參見New York Times，1976年10月21日；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76年11月5日。

[[409]](#_409_15)從最近游擊區電臺的廣播中，以及從曼谷流傳的地下傳單中，這一點清晰可見。很有意思的是，有跡象表明，某些心懷不滿的右翼集團正變得越來越持批判態度，即使不是批判作為一種制度的君主制，起碼也是批判當今在位者及其配偶。

[[410]](#_410_15)在本文展示的分析里，我特意聚焦于泰國政治格局中的新元素。我確實無意暗示新資產階級各階層不只是曼谷權力結構中的次要元素；從統治集團的觀點看來，他們也許甚至是不可靠的次要元素。有啟發性的是，10月6號政變之后，軍政府盡可能回到壓制的老“行政”模式。紅衛隊被勒令停止活動，或者被打發到北部、東北和南部作戰地帶，據報道他們在那里傷亡慘重。納瓦朋被奉勸別再露面。烏坦上校被解除了對裝甲師廣播電臺的控制。眼下居高位的將軍們全是“穩健派”，也許寧愿以沙立—他儂—巴博風格執政。但是我們懷疑這可能最終不復可行。新資產階級各階層在那兒，新地方地主在那兒——這些昔日的盟友不可能被安然忽視或遺棄。或許將軍們也不可能解決這些階層的種種問題。繁榮不太可能某一天攜舊日之勢歸來；昔時的意識形態嚴整性（seamlessness）不可能修復；失業率增大；官僚機構變得更加人滿為患，開支龐大；大學的怪象似乎無計可施。新右翼群體經歷過了政治參與，想要再次將他們全盤排斥在外，不大現實。妖怪已經從魔瓶中放出來了，軍政府或其繼任者想把它再永久裝回去，可就難上加難了。

[[411]](#_411_13)引文出自Charles R. Boxer，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London: Hutchinson，1965），第249頁。

[[412]](#_412_13)最完整的英文敘述見Thawatt Mokarapong，History of the Thai Revolution: A Study in Political Behaviour（Bangkok: Chalermnit，1972）。

[[413]](#_413_13)詳見Thak Chaloemtiarana，Thailand: The Politics of Despotic Paternalism（Bangkok: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of Thailand，1989），第48頁。

[[414]](#_414_13)1946年6月9日，21歲的國王拉瑪八世被發現在他的龍榻上中彈身亡。他死亡的原委從未澄清過。但是泰國軍方（由于盟軍對披汶跟東京的戰時結盟很惱火，它在1945年后暫時靠邊站了）抓住這次事件，指責文官政府合謀了對國王的所謂謀殺，最后在1947年底推翻了該政府。舉行這種擺擺樣子的公審，是炮·西耶儂將軍操縱的。對國王之死（附帶著對替代性解釋的重要考察）與這些審判的最完整描述，參見Rayne Kruger，The Devil's Discus（London: Cassell，1964）。該書在暹羅一直被禁。

[[415]](#_415_13)對沙立政權的最完整敘述，參見塔克的《泰國》。“銅嗓子”（bronze-throat）沙立1963年死于肝硬化，可是他的政權在他的兩大副手他儂陸軍元帥和巴博將軍的控制下，存活到1973年。

[[416]](#_416_13)同上，第193—195，203—204頁。

[[417]](#_417_13)“縱火犯”的處決是在曼谷大商業區王家田廣場上執行的，就在大王宮前面，受害者們背靠莊嚴的瑪哈泰寺的院墻，站成一排。

[[418]](#_418_13)一上臺，沙立就廢除現存憲法，關閉議會，取締政黨和工會，逮捕數以百計的知識分子、政客和記者，建立嚴厲的審查制度。他死后，這種冷酷控制稍稍緩解，一部臨時憲法最終出臺，（飽受操縱的）選舉也舉行了。

[[419]](#_419_13)受害人——有的是死人，多數還活著——被安保部隊放進裝滿汽油的舊油桶里焚燒。參見Norman Peagam，“Probing the ‘Red Drum' Atrocities”，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75年3月14日。

[[420]](#_420_13)因為被懷疑親共，班那賽村被燒成平地，許多村民被就地處死。參見Marian Mallet，“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October ’76 Coup”，見Andrew Turton，Jonathan Fast和Malcolm Caldwell編，Thailand: Roots of Conflict（Nottingham: Spokesman，1976），第80—103頁，第82頁；David Morell和 Chai-anan Samudavanija，Political Conflict in Thailand （Cambridge, Mass.: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1981），第169—172頁。

[[421]](#_421_13)參見Morell和Chai-anan，Political Conflict，第80—81頁；Patrice de Beer，“History and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ailand”，見Turton，Fast和Caldwell編，Thailand，第143—194頁。

[[422]](#_422_13)參見Andrew Turton，“Limits of Ideological Domin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Consciousness”，見Andrew Turton和Shigeharu Tanabe編，History and Peasant Consciousness in Southeast Asia（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no. 13，1984），第19—73頁。

[[423]](#_423_13)參見本書前面第七章，尤其是第161頁。

[[424]](#_424_13)權威著作是兩部書：G. William Skinner，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7，1958）。

[[425]](#_425_13)對這一時期階級形成的詳細討論，參見本書前面第七章。

[[426]](#_426_12)參見Suthy Prasartset，Thai Business Leaders: Men and Careers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1982）。

[[427]](#_427_12)對此的簡潔明快的敘述，參見Morell and Chai-anan，Political Conflict，第146—150頁。

[[428]](#_428_12)想想暹羅在美國戰爭努力中的大量共謀行為，泰國資產階級有足夠理由害怕報復。

[[429]](#_429_12)參見這篇格外詳盡、見識廣博的文章：Anek Laothamatas，“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Thailand: New Patterns of Influence”，見Asian Survey 28: 4（1988年4月），第451—470頁。阿內克指出，在1979年，僅四個府擁有地方商務會所，但是到1987年，所有七十二府都把它們建起來了。而且，這些商務會所的府際聯盟還利用議會的途徑，奮力拼爭，日漸成功地擴張了它們相對于首都（既有首都的官僚，也有首都的大資產階級）的勢力。

[[430]](#_430_12)阿內克有幾個顯著的數字說明這一點。在1963—1973年軍人獨裁者沙立、他儂和巴博控制下的三個內閣中，確切地說，商人有2人，不到總數的4%。在1975—1976年以選舉為基礎產生的內閣中，商人有35人，約占40%。1976年10月6日政變之后的一段時期里（1976—1980年初），這個比例降至13%。在1980年代（1980—1986）恢復的以選舉為基礎的議會系統中，它又躥升到將近44%。同上，第455頁。

[[431]](#_431_12)對這些謀殺的附有翔實統計資料的嚴謹探討，參見Morell和Chai-anan，Political Conflict，第225—253頁。

[[432]](#_432_12)多數謀殺都是在小鎮和村子里干的。它們極不均衡的地理分布（北部居多）突顯了中央政府本身無預這種暴行。

[[433]](#_433_12)最惡名遠揚的是所謂“紅衛隊”，其中許多人是出自中情局駐老撾“秘密部隊”的前雇傭兵，他們的行動，聽命于在武裝力量的“國內安全行動指揮部”（ISOC）里占主導地位的派系。但也有鄉村童子軍，它是有王室撐腰的右翼治安維持隊。參見前文第七章，第157—160頁（邊碼），以及該處所引文獻；還有Morell和Chai-anan，Political Conflict，第241—246頁。

[[434]](#_434_12)在1976年10月6日政變之后的最初一段時期里，王室與政變領導人達成的一項笨拙妥協方案，產生了以最高法院法官他寧為首的極右卻是文官執掌的政府。幾乎剛過了一年，這個政府就被江薩將軍，一個異常老謀深算的軍人政客，兵不血刃地推翻了。說服北京停止支持泰共，以換取暹羅在支持紅色高棉反抗入侵的越南軍隊上的合作，這是江薩的韜略。當“小瓶”作為王儲出家儀式上的貴賓突然現身曼谷的時候，這筆交易就公開定案了。（在暹羅，習慣上大多數年輕男子都要做短期的和尚。）

[[435]](#_435_12)他出版過涉及強奸、洗腦和共產主義威脅的一些神經兮兮的書。

[[436]](#_436_12)在一篇早期的演說中，他寧愚蠢地把他的政府比作一只柔弱的軟體動物，需要又硬又厚的外殼保護，這外殼將由軍隊、宮廷與正在激增的右翼治安維持隊來提供。

[[437]](#_437_12)不排除這種可能性：有的將軍樂于看到脾氣暴躁的差拉快點去和上帝作伴。

[[438]](#_438_12)軍方自身正日漸意識到，在歷經巨變的泰國社會，夢想一種新的沙立式軍隊專制統治已經過時了。

[[439]](#_439_12)“Sia”是潮州話“大亨”的泰語化說法。早先這個詞只對泰國華人使用，包含著輕蔑和敬畏交織的曖昧情感；晚近它越來越多地用于節節攀升的泰國泰人大亨，輕蔑感少了，敬畏感多了。

[[440]](#_440_12)雖軍隊亦然。自江薩1977年10月奇襲得手以來，兩次政變企圖均告完敗。它們的領導人是一群心比天高的上校，被不嚴謹地稱作“青年土耳其黨”（Young Turks），從未能夠把軍隊統一起來支持他們的圖謀。然而很說明問題的是，青年土耳其黨的“綱領”宣稱他們負有拯救國家的使命，但與其說是從共產主義手中拯救，不如說是從貪婪的大資本家手里拯救。這些理想主義者的薪水與購買他們郊區豪宅所需的款項之間的缺口，提示了他們缺乏政治說服力的另一個緣故。

[[441]](#_441_12)泰國華裔泰差拜普家族擁有龐大的曼谷城市銀行。年輕一代中有兩位泰差拜普在1986年競選議員成功——這是該家族首次認為值得將它的子孫推入選舉政治；其中一位還是湄公酒業集團董事會前主席。披帕先生的朋友通常喚作“老八大亨”（eighth Sia），意思是說，他的全部七位兄長也都是位重名顯的大亨。

[[442]](#_442_12)這個組織不在國家警察總署控制之下，而是一種特別的準軍事隊伍，受武裝部隊管轄。它最初的創立，是作為反共平叛運動的組成部分。

[[443]](#_443_12)Philippine Star Week，1987年3月8—14日。

[[444]](#_444_12)1987年7月，她估計在未來六年里，償債將花費政府稅收的40%和全部出口收益的27%。1986年的經濟增長率是0.13%。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1987年7月28日。

[[445]](#_445_12)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1987年2月12日；以及菲律賓歷史學家卡利南（Michael Cullinane）友好地提供的信息。他是作為進步黨（Progresistas）候選人參加競選的，那時的所有黨派中，該黨最明目張膽地堅持與美合作。上面這篇文章似乎不可信地表示，梅萊西奧的祖父，某個叫“馬丁”·許寰哥的人，才是這個統治家族真正的移民創始人。

[[446]](#_446_12)埃米迪奧是人民力量黨總書記。何塞·“佩平”·許寰哥是聯盟另一主要組成部分“菲律賓民主黨—戰斗黨聯盟”（PDP-Laban）的主席。

[[447]](#_447_12)Time，1987年1月5日。

[[448]](#_448_12)有關這個階層，最權威的書仍然是Edgar Wickberg，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1850—1898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

[[449]](#_449_12)關于大帆船貿易，參見William L. Schurz，The Manila Galleon，重印版（New York: Dutton，1959）。此外，一些開明的教士和官員，驚駭于美洲殖民者的野蠻勒索，他們施加壓力，迫使馬德里試圖在菲律賓做些改良，時斷時續地禁止無官職的西班牙人在外省居住。

[[450]](#_450_12)有關西屬菲律賓的文獻頗為豐富，但尤請參見James L. Phelan，The Hispaniz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Spanish Aims and Filipino Responses, 1565—1700（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9）；Nicholas P. Cushner，Spain in the Philippines: From Conquest to Revolution（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1971）；Renato Constantino，The Philippines: A Past Revisited（Quezon City: Tala，1975），第一和第二部分；許多令人嘆服的論文，參見Alfred W. McCoy和Ed. C. de Jesus編，Philippine Social History: Global Trade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s（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1982）。

[[451]](#_451_12)借用他們在伊比利亞半島的經歷，西班牙人稱這些東南亞穆斯林為“摩爾人”（“摩洛人”）。這個名稱過了四個世紀還繼續在使用。今天，那些尋求從菲律賓獨立出來的穆斯林，就松散地團結在他們所稱的“摩洛民族解放陣線”的旗號下。菲利普二世的魂靈一定被逗樂了。

在歷史學/人類學上有關“摩洛人”（Moros）的最佳資料來源是：P.G. Gowing，Muslim-Filipinos—Heritage and Horizon （Quezon City: New Day，1979）；Cesar Adib Majul，Muslims in the Filippines（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1973），和他的The Contemporary Muslim Movement in the Philippines（Berkeley: Mizan，1985）；T.J.S. George，Revolt in Mindanao: The Rise of Islam in Philippine Polit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有關摩洛族內兩個較大的種族—語言群體的重要專著有：Thomas Kiefer, The Tausug: Violence and Law in a Philippine Muslim Society（New York: Holt, Reinhart & Winston，1972）；Reynaldo Clemeña Ileto，Magindanao, 1860—1888: The Career of Dato Uto of Buayan（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Southeast Asia Program Data Paper no. 32，1971）。

[[452]](#_452_12)典范之作是Horacio de la Costa，The Jesuits in the Philippines, 1581—1768（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但亦參見Gerald H. Anderson編，Studies in Philippine Church History（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9）；以及敏銳地挑戰傳統觀念的這部書：Vicente L. Rafael，Contracting Colonialism: Translation and Christian Conversion in Tagalog Society under Early Spanish Rule（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

[[453]](#_453_12)單在馬尼拉的周邊省份，截至十九世紀末，教士們聚斂了超過50萬英畝的土地。關于這些發展的基本文獻是Dennis Morrow Roth，The Friar Estates of the Philippines（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77）。

[[454]](#_454_12)該詞源出閩南語的“生理”（sengli），意為經商的人。西班牙人和閩南人那時都還無法想象“華人”的概念，這對我們這個民族主義時代是個告誡。在這方面，他們遠遠落后于阿姆斯特丹的聯合東印度公司，十七世紀的這家大型跨國公司，認真致力于涉及刑罰、司法和“禁止奢靡”的努力，迫使它治下的目標群體認識到他們歸根結底是“華人”。

[[455]](#_455_12)這一點上的敘述及隨后幾段，節略自魏克伯格，《菲律賓生活中的華人》。

[[456]](#_456_12)參見David Steinberg，“Tradition and Response”，見John Bresnan編，The Marcos Era and Beyo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第44頁。這本書還包含了阿爾塞（Wilfredo Arce）和阿瓦德（Ricardo Abad）論“社會形勢”的論文，以及比列加斯（Bernardo Villegas）論“經濟危機”的論文。

[[457]](#_457_12)The Manila Chronicle，1987年7月19日。她接著說：“放棄土地，就是跟你從小被教導的一切作對。這就好似改換你的宗教信仰。”另一個女強人，椰子莊園主，女眾議員瑪麗亞·克拉拉·羅布雷加特（Maria Clara Lobregat）哀訴說：“土地就在那里，一年又一年，你發展起對它的某種依戀之情。就像你有一幢多房間的房屋，你被要求跟別人共享這些房間。”

[[458]](#_458_12)尤請參見Horacio de la Costa，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ism and Other Essays（Manila: Solidaridad，1965）；John N. Schumacher，The Propaganda Movement: 1880—1895 （Manila: Solidaridad，1973）；Cesar Adib Majul，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Ideas of the Philippine Revolution（Manila: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1967）；Renato Constantino，Insight and Foresight（Quezon City: Foundation for Nationalist Studies，1977）。

[[459]](#_459_12)“這些人”包括——在沒有親炙歐洲教育的邊緣——唐·梅萊西奧·許寰哥。

[[460]](#_460_12)這兩部小說有好幾種英語譯本，最新的是拉克松—洛欽（Soledad Lacson-Locsin）所譯，火奴魯魯，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97，1998。

[[461]](#_461_12)關于卡蒂普南及其發動的革命，權威的民族主義著述有：Teodoro A. Agoncillo，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The Story of Bonifacio and the Katipunan（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1956）；和Malolos: The Crisis of the Republic（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1960）。阿貢西羅的論文遭到伊萊多（Reynaldo Clemeña Ileto）的名作《帕西恩與革命：菲律賓民眾運動，1840—1910》（Pasyón and Revolution.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1979）的削弱，后者無疑是論十九世紀晚期菲律賓的最深刻、最銳敏之作。亦見T.M. Kalaw，The Philippine Revolution（Kawilihan, Mandaluyong, Rizal: Jorge B. Vargas Filipiniana Foundation，1969）。

[[462]](#_462_12)遲至1960年，美國式獨立過了十五年，決定推廣他加祿語作為官話和國語過了三十年，仍然只有不到45%的人口理解這種語言——稍多于聲稱懂得英語的40%人口。參見1960年人口普查資料，轉引自Onofre D. Corpuz，The Philippines（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1965），第77頁。

[[463]](#_463_12)參見Milagros C. Guerrero，“The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Elites of Luzon during the Revolution, 1898—1902”，見McCoy和de Jesus編，Philippine Social History，第155—190頁；Nick Joaquín，The Aquinos of Tarlac, An Essay on History as Three Generations，未刪節版（Manila: Solar，1986），第一部分。

[[464]](#_464_12)Teodoro A. Agoncillo，The Writings and Trial of Andrés Bonifacio（Manila: Manila Bonifacio Centennial Commission，1963），該書內含了大多數相關的他加祿語文獻和譯成英語的文獻。

[[465]](#_465_12)參見伊萊多在《帕西恩與革命》里常常是痛心疾首的敘述。

[[466]](#_466_12)古巴和菲律賓的當代反殖運動的懸殊命運很有啟發性。在古巴，美國帝國主義聲稱站在革命者一邊，趕跑了西班牙人，建立了它自己的軍事統治達四年時間，然后扶植了一個半獨立的共和國，不過這個共和國完全處于它的經濟控制之下。該島所具有的戰略價值遠低于金錢價值。對菲律賓而言，情況大體上倒過來了。華盛頓的戰略家們，目眩于他們海軍的首次盛大的全球環航，在馬尼拉灣的這個良港看出了一個完美的跨太平洋的“加煤港”，向中國滲透、對日本側翼包圍的出發點。這些“基地”只有憑借政治手段即殖民化才能守住，特別是不讓競爭的帝國主義列強插足。自此迄今，美國與菲律賓的關系最終是以軍事考慮為中心。對美國干涉背后的思想的簡明敘述，可參看William J. Pomeroy，American Neo-colonialism: Its Emergence in the Philippines and Asia（New York: New World，1970），第1、2章。1897年，阿爾弗雷德·馬漢艦長被委派到麥金萊的海軍顧問團，他從這里販賣他的帝國海權論，產生很大影響。

關于美國時代的文獻汗牛充棟。經典之作是Joseph Ralston Hayden，The Philippines—A Study in National Development（New York: Macmillan，1942）。最佳的現代指南是斯坦利（Peter W. Stanley）鞭辟入里又賞心悅目的大作：A Nation in the Making: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99—192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以及他后來主編的書冊：Reappraising an Empire: New Perspectives on Philippine—American History（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亦見Norman G. Owen編，Compadre Colonialism: Studies on the Philippines under American Rule（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Papers o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no. 3，1971）；還有弗蘭德（Theodore Friend）無心地道出真相的書：Between Two Empires: The Ordeal of the Philippines, 1926—1946（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一本有益新書是Daniel B. Schirmer和Stephen R. Shalom，The Philippines Reader: A History of Colonialism, Dictatorship and Resistance（Boston: Southend，1987），第1、2章。

[[467]](#_467_12)參見Leon Wolff，Little Brown Brother（London: Longman，1960）；Russell Roth，Muddy Glory: America's “Indian Wars” in the Philippines, 1899—1935（West Hanover, Mass.: Christopher，1981）。剛剛受洗的“菲律賓人”進行了頑強抵抗。鎮壓行動耗去了至少5000名美國人的生命和6億當時還是金本位制的美元。也許這高昂的代價，以及派遣軍的“印第安獵人”的心態，說明了美國人慘無人道的原因。菲律賓人中的死傷比為5∶1。少說有2萬人在行動中喪生，另有20萬人死于戰爭引起的饑荒和瘟疫。受命平定負隅頑抗的薩馬島的“杰克”·史密斯將軍告訴他的手下：“我不想要俘虜。我希望你們去殺，去燒；你們燒殺得越多，就越讓我高興。”薩馬島要變成“荒無人煙之地”。第43步兵團的軍士霍華德·麥克法蘭（Howard McFarlane），給緬因州費爾菲爾德（Fairfield）鎮《日報》寫信說：“［1900年］3月29日，星期四，我們連的18人殺死了75個下賤的大刀手，10個下賤的槍手……如果我們發現誰還沒死的話，我們有的是刺刀。”Wolff，Little Brown Brother，第360，305頁。

[[468]](#_468_12)但是選舉權是高度受限、以財產為基礎的。甚至在二戰前夕，也僅僅14%左右的潛在選民獲準投票。

[[469]](#_469_12)在華金《打拉的阿基諾家族》（第155—198頁）中，我們會以特寫鏡頭般的細致入微感受到這一變化。

[[470]](#_470_12)參見Teodoro A. Agoncillo，A Short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New York: Mentor，1969），第169頁；David Wurfel，“The Philippines”，見George McT. Kahin編，Governments and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第二版（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4），第679—777頁，在第689—690頁。

隔壁，就在荷屬東印度，1930年代的殖民政府大約雇用了25萬官員，其中90%是“土人”。參見拙文，“Old State, New Society: Indonesia's New Order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2（1983年5月），第480頁。

[[471]](#_471_12)這樣的策略并不總能保證和諧。這些地方巨頭家族的成員們常常在當地選舉中彼此爭吵、爭搶。但是可以有把握地說，當統治者和反對派領袖、執政黨和在野黨都出自同樣一些家族時，一個寡頭集團的確已然當道。

[[472]](#_472_12)全面敘述請參見弗蘭德《兩大帝國之間》，第3—11章。華金的《打拉的阿基諾家族》（第3—5章）在拉家常式的細節里，娓娓講述了阿基諾總統的公公的角色。

[[473]](#_473_12)麥克阿瑟和菲律賓淵源頗深。他的父親阿瑟·麥克阿瑟將軍，曾經是最初的美國遠征軍的副司令，1900年5月取代了他那可憎的長官奧蒂斯（Elwell Otis）將軍。他掌權掌到1901年7月4日，那時“文官統治”代替了軍人統治。麥克阿瑟家族在這個群島上還有大筆商業投資。

[[474]](#_474_12)對這些上躥下跳的高貴流氓的好玩的幾瞥，見Renato和Letizia Constantino，The Philippines: The Continuing Past（Quezon City: Foundation for Nationalist Studies，1978），第五章。有關日本占領的權威文本，依然是David Joel Steinberg，Philippine Collaboration in World War II（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7）。不過亦見Hernando J. Abaya，Betrayal in the Philippines（New York: A.A. Wyn，1946）；還有麥科伊（Alfred McCoy）的論文，收在他本人主編的Southeast Asia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Southeast Asia Studies，Monograph Series no. 22，1980）。

[[475]](#_475_12)有關日占期間的農民抵抗及其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干部的關系的經典文本，是Benedict J. Kerkvliet，The Huk Rebell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亦見Eduardo Lachica，The Huks: Philippine Agrarian Society in Revolt（New York: Praeger，1971）；和“Documents—The Peasant War in the Philippines”，Philippin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view，23: 2—4（1958年6—12月），第375—436頁（匯編的這些文獻，初編于1946年，提供了關于土地集中水平、農民無地程度、租佃率和對佃農的剝削等方面的珍貴資料）。另外，請注意《團結》期刊的精彩專號（Solidarity，No. 102 ［1985］），它主要專注于對人民抗日軍（Huk）起義的回顧性探討。

[[476]](#_476_12)比如，參見Resil B. Mojares，The Man Who Would be President: Sergio Osmeña and Philippine Politics（Cebu: Maria Cacao，1986）。這部杰作展現了，當父親老塞爾吉奧·奧斯梅尼亞在華盛頓做流亡副總統的時候，兒子小塞爾吉奧如何通過給馬尼拉的日本占領政權供應物資，大把大把地撈錢。

[[477]](#_477_12)參見威廉·曼徹斯特（William Manchester）富于啟迪的著作：American Caesar: 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Boston: Little, Brown，1978）。

[[478]](#_478_12)奎松于1944年客死美國，暫時由他的副總統老塞爾吉奧·奧斯梅尼亞繼任。麥克阿瑟瞧不起奧斯梅尼亞，認為他老朽陳腐，在個人做派上太西班牙化了。

[[479]](#_479_12)Wurfel，“The Philippines”，第761頁。

[[480]](#_480_12)受困于憲法修正案的法定人數要求，羅哈斯發現，除非以恐怖主義和選舉舞弊的罪名，剝奪代表人民抗日軍控制地區的反對派眾議員的資格，就再沒辦法獲得必要的變革。參見Kerkvliet，The Huk Rebellion，第150—151頁。

[[481]](#_481_12)參見Friend，Between Two Empires，第258—260頁。

[[482]](#_482_12)菲律賓軍隊還很稚弱，是名副其實的“次等軍隊”。換句話說，它屬于那種雇傭軍之列，種族分裂，裝備和訓練很差，適用于“國內治安”的目的：我們在整個晚期殖民世界都找得到這種軍隊。（獨立以后，它們以前的一些軍士——諸如阿敏［Idi Amin］、拉米扎納［Sangoulé Lamizana］、蘇哈托、博卡薩［Jean-Baptiste Bokassa］之類，都在不祥的停戰中成了上校和將軍。）這跟工業化世界的“上等軍隊”適相對照，后者包括蘇聯軍隊在內，自制武器，軍事學院畢業生充任軍官，技術尖端，財源充足，有能力實施重大的對外攻擊。

[[483]](#_483_12)正是私人軍隊的搶掠，甚于其他任何東西，促成了1948年人民軍反政府的公開叛亂。精彩的敘述，參見Kerkvliet，The Huk Rebellion，第五章。

[[484]](#_484_12)他擊敗的對手不是別人，正是同為寡頭的老唐·何塞·勞雷爾，戰時傀儡共和國的總統。

[[485]](#_485_12)私人武裝只在這樣的狀況下出現，或許是一條普遍規律。這些軍隊在阿基諾總統的任期內重現，表明了政府軍的虛弱與廣泛的社會分裂。

[[486]](#_486_12)今日所謂“民團”（vigilantes）的最近的前身。參見The Aquinos of Tarlac，第221頁以下。

[[487]](#_487_12)很典型地，即便是菲律賓共產黨也擋不住地方巨頭政治的影響。1940年代末，它的高層領導有卡斯托·亞歷杭德里諾（Casto Alejandrino），一個大地主家庭的子弟；還有拉瓦（Lava）家的兄弟們，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一位叔叔曾是阿奎納多革命軍的上校）。他們最終與人民軍最高領袖路易斯·塔魯克（Luis Taruc）吵得不可開交，后者出自佃農家庭（他的祖父、外祖父都曾當過卡蒂普南軍的軍士）。沒什么好奇怪的：出身名門者支持好戰的平民左派。這一信息來源于《團結》編輯希歐尼·荷西（F. Sionil José）最近對卡斯托·亞歷杭德里諾、赫蘇斯·拉瓦、路易斯·塔魯克和弗雷德·紹洛（Fred Saulo）進行的非凡的聯合訪談，該訪談發表于上文引用過的《團結》1985年專號上。

[[488]](#_488_12)參見前中情局官員阿爾文·斯卡夫（Alvin Scaff）雖樸實無華但很有價值的書：The Philippine Answer to Communis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特別是第3—6章。

[[489]](#_489_12)Raymond Bonner，Waltzing with a Dictator: The Marcoses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Policy（New York: Times，1987），其中引用的解密文件細致描繪了蘭斯代爾—麥格賽賽的關系。在1953年競選運動期間，蘭斯代爾執意要讓麥格賽賽的全部講話稿都由中情局的一位密探（公開身份是《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捉刀。當他發現總統候選人有一次竟貿然用了一個菲律賓人寫手時，這位火冒三丈的“文靜”美國人徑自走進麥格賽賽的辦公室，把他擊倒在地（第39—40頁）。

[[490]](#_490_12)就是這個時候，費迪南德·馬科斯與科拉松的丈夫小貝尼尼奧·阿基諾開始名揚全國。

[[491]](#_491_10)參見Frank H. Golay，The Philippines: Public Policy and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1）。亦見布雷斯南（Bresnan）所編之《馬科斯時代》中的比列加斯（Villegas）一章，特別是第150—155頁。這位好心的經濟學家溫和地如此說道：“如果有誰想要為這種錯誤的經濟政策尋找一種政治解釋，他會在羽翼初成的民主制的缺陷中找到它；在那個民主制里，權力依舊集中在擁有大量土地的前紳士階層之手，他們在五六十年代已經搖身變成了工業企業家。關稅、財政和貨幣改革須得經它批準的菲律賓立法機關，被一些集團所支配，這些集團代表的正是因過度保護而嬌生慣養的工業部門。”

[[492]](#_492_10)這一自由的國際知名象征是專揭丑事的《菲律賓自由新聞》。較不為人所知的是，掌控它的洛欽家族激烈反對它的全體職員的任何形式的工會化，不惜采用無恥、粗暴的手段阻撓之。

[[493]](#_493_10)The Philippines，第86頁。

[[494]](#_494_10)參見華金《打拉的阿基諾家族》（第273—286頁）的俏皮講述。路易西塔今天無疑是菲律賓最有名的大莊園，而且在土地改革之前，仍然掌握在許寰哥家族手里。唐·何塞是從一家法國人出資、西班牙人經營的公司得到它的，那家公司被持續的“勞工騷亂”搞得心灰意冷。在1950年代中期，它的糖料總站為1000名糖料作物種植園主提供服務，而它的年產值達1800萬比索。

[[495]](#_495_10)參照Corpuz，The Philippines，第77，105頁。

[[496]](#_496_10)馬科斯時代并未啟動這一進程，不過是加速了它而已。今天，70%的人口生活在世界銀行高高在上的貧困線以下。《菲律賓每日詢問報》（Philippine Inquirer，1988年1月17日）最近一篇文章提供了曼谷和馬尼拉的有啟發性的人口統計學比較資料。曼谷出生率為25‰，嬰兒死亡率為17.2‰；馬尼拉的相應數字是63.9‰和69.5‰。

[[497]](#_497_10)我記得1960年代末在雅加達，一群光著身子的貧民區孩子，在距離最高法院一位法官的宅邸三十碼開外的泥地上踢足球。曼谷一些最有錢的家庭的住宅，仍舊坐落在離臭氣熏天、藏污納垢的擅自占住者的住房群僅一箭之遙的地方。但是隨著新的、隔離的郊區發展起來，馬尼拉的方向是大勢所趨。

[[498]](#_498_10)關于這個系統的混亂無序，結構最為整嚴的說明依然是Thomas Nowak和Kay Snyder，“Clientelist Politics in the Philippines: Integration or Instabi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68（1974年9月），第1147—1170頁；以及他們的“Economic Concentr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Philippines”，見Benedict J. Kerkvliet編，Political Change in the Philippines: Studies of Local Politics Preceding Martial Law（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4），第153—241頁。

[[499]](#_499_10)New York Times，1967年8月9日。同一篇報道記述了許寰哥家對阿基諾政治生涯的資助，以及阿基諾警衛森嚴的家宅庭院（六幢加利福尼亞風格的小平房，把一個巨大的游泳池圍在中央）。對于當前環繞著這位遇刺身亡的參議員的殉教者傳記，這篇報道算是一副有效的解毒劑吧。

[[500]](#_500_10)New York Times，1969年11月16日。馬科斯在這次競選運動中花別人的錢如流水，以致物價上漲18%，比索的黑市價下跌50%，他還不得不從華盛頓要了1億美元租借軍事基地的預付款。同上，1969年12月6日。他曾捐助尼克松1968年競選運動一百萬美元，這對他的境況的確很有助益。（據他在1966—1969年間的行政秘書拉斐爾·薩拉斯［Rafael Salas］所言，轉引自Bonner, Waltzing with a Dictator，第141頁。）

[[501]](#_501_10)今天幾乎沒有菲律賓人說西班牙語，但是某種偽貴族光環仍然籠罩著伊比利亞文化這個概念。寡頭集團的年長成員喜歡被稱為“唐”和“唐娜”。大莊園在意識形態上依舊未被美國化。小孩依然壓倒性地以西班牙名字受洗，縱使后來他們取得美國式的或當地的昵稱（比如，Juan“Johnny”Enrile，Benigno“Ninoy”Aquino）。

[[502]](#_502_10)Wurfel，The Philippines，第691—692頁。據書中說，到1920年代初，花在教育上的經費已經達到各級政府年度開支的將近一半。識字率在1903—1939年間翻了一番，從20%增至49%。到后面這個年份的時候，差不多27%的人口會講英語，這個比例高于任何一種當地語言，包括他加祿語。

[[503]](#_503_10)新人民軍的高層領導最初多由菲律賓大學的畢業生組成。今天情況依然如故，不過程度稍減。黨的許多關鍵文件沒有他加祿語版本，從這一點可以判斷，該領導層似乎仍然用英語思考。

[[504]](#_504_10)比較一下古巴、中國和越南“革命后”相似社會階層向海外的移民，這可以說是“革命前”的。跟東南亞其他地區相比，這里存在著很有教益的差別。印尼的蘇哈托政權比起馬科斯政權來，鎮壓人民要殘酷得多、厲害得多，但是移民群體很小。荷蘭的吸納能力較低，而且1945年后，印尼放棄了荷蘭語，改用“印尼語”——兩者都不是世界語言。緬甸（直到1963年）和馬來西亞都是英語教育，但自1950年代末以來，倫敦政府對殖民地的移民越來越不待見。

[[505]](#_505_10)對馬科斯政權作為一個政權，沒有令人滿意的全面研究。但是關于它的重要人物和它的政策，卻有卷帙浩繁的有用文獻。邦納的書敘述了馬科斯家族同各色各樣的美國總統和總督們的關系，并非一貫準確，但還不錯，特別有趣味。除此之外，參見：Gary Hawes，The Philippine State and the Marcos Regime: The Politics of Export（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David A. Rosenberg編，Marcos and Martial Law in the Philippines（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9）；Alfred W. McCoy，Priests on Trial （Victoria: Penguin，1984）；R. J. May和Francisco Nemenzo編，The Philippines After Marcos （New York: St. Martin's，1985）；Walden Bello等，Development Debacle: The World Bank in the Philippines（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Food Development Policy，1982）；Walden Bello和Severina Rivera編，The Logistics of Repression: The Role of U.S. Assistance in Consolidating the Martial Law Regime in the Philippines （Washington DC: Friends of the Filipino People，1977）；Filemon Rodriguez，The Marcos Regime: Rape of the Nation （New York: Vintage，1985)；Stephen R. Shalom，The U.S. and the Philippines: A Study of Neocolonialism（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1981）；Robert B. Stauffe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Coup: Transnational Linkages and Philippine Political Respons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1: 3（1974），第161—177頁；Carolina G. Hernandez，“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Contemporary Philippine Society”, Diliman Review（1984年1—2月），第16—24頁；還有前引的布雷斯南主編的文集。

[[506]](#_506_10)遵循美國的憲政實踐，上校以上軍銜的一切軍事委任，都需國會批準。有野心的軍官們知道怎么謀取出路，一意巴結有權勢的國會政客；這些政客利用他們的地位，通過決定自己寵幸的受庇護者的防區，在軍隊內部建立私人派系。一當選舉時節到了，囊中揣有地方司令官，總是很便利的。對菲律賓軍隊的最充實的研究，還是Carolina G. Hernandez，“The Extent of 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in the Philippines, 1946—1976”（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博士論文，1979年）。其中論及馬科斯操縱預算、晉升和教育思想體系，以確保獨裁政府的建立，尤為有趣。

[[507]](#_507_10)邦納的記敘，以解密的美方文件為基礎，是最為詳盡的。《與獨裁者跳華爾茲》，第5—6章。

[[508]](#_508_10)蘇比克和克拉克機場是知名度最高的兩個基地，但是作為一個整體的基地群，包括了兩個極端：既有超機密的圣米格爾的電子竊聽設施，也有超公開的海約翰要塞娛樂城。后者剛好位于討人喜歡的碧瑤山岳勝地外面，照法律上說來屬于美國空軍，但實際上屬于馬尼拉富人。它差不多就是由游泳池、高爾夫球場、網球場、保齡球場、電影院、小餐館、跳舞夜總會等構成的。只要拿得出美金，誰都可以享用這些娛樂設施。我最近造訪了這個“基地”，幾個小時游逛下來，沒碰上一個美國人，不論軍人或是文官，只看到數百個富裕的菲律賓人在消遣快活。

[[509]](#_509_10)同上，第3章。

[[510]](#_510_10)同上，第140—141頁。

[[511]](#_511_10)最好的敘述見Hawes，The Philippine State。

[[512]](#_512_10)準確點說，馬科斯攫取了洛佩斯巨型企業集團的控股公司Meralco，該集團控制著馬尼拉電力公司、全國第二大銀行，外加輸油管線、一家煉油廠和一家大建筑企業。

[[513]](#_513_10)參見Resil B. Mojares，“The Dream Lives On and On: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Osmeñas, 1906—1990”，見Alfred W. McCoy編，An Anarchy of Families: State and Family in the Philippines（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3），第312—346頁，在第316頁。

[[514]](#_514_10)參見Lena Garner Noble，“Politics in the Marcos Era”，見Bresnan編，Crisis in the Philippines，第85頁。清繳武器行動雖然在該國北部和中部地區成效斐然，但在穆斯林的南方卻一敗涂地。在正式宣布戒嚴令后沒多久，摩洛民族解放陣線發動了大規模叛亂，很顯然，這受到一種恐懼感的促發：他們擔心，解除了武裝的穆斯林人口將完全聽憑馬尼拉和基督教多數派的宰割。

[[515]](#_515_10)參見David Wurfel，Philippine Agrarian Policy Today: Implementation and Political Impact（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Occasional Paper No. 46，1977）；Ernesto M. Valencia，“Philippine Land Reform from 1972 to 1980: Scope, Process and Reality”，見Temario Rivera等編，Feudalism and Capitalism in the Philippines（Quezon City: Foundation for Nationalist Studies，1982）。有關新近的一系列視角，參見專門致力于農業改革問題的《團結》專號（106—107 ［1986］）。

[[516]](#_516_10)這個詞用在這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在馬科斯統治下被查禁的唯一一部好萊塢大片是《教父》。犀牛皮下的一只虱子。

[[517]](#_517_10)軍官們的“福布斯公園”，這個可笑地冠以“科林斯式花園”名號的新高級住宅區，在我最近訪問這個大都市期間，是我甚至不能打車進去的馬尼拉唯一地區。

[[518]](#_518_10)民族主義很重要。它使得“馬科斯是美國人的tuta（走狗）”這種左派說法廣為流傳。當然，私底下，左派領導層充分意識到，馬科斯其實是該國總統中間最不馴服的一個。邦納的書證實了這一評價，它表明費迪南德比他華盛頓的那幫對手狡猾得多。他把卡特那個自負的小基辛格、負責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理查德·霍爾布魯克納入彀中，在1971年為基地的新五年協定要價5億美元。里根，從1960年代起就是馬科斯的老朋友，把他那個昏庸的副總統打發去馬尼拉，告訴馬科斯說：“我們喜歡你的堅持民主原則和民主過程。”中情局局長凱西，在他早年做進出口銀行行長那會兒，努力辦妥了該行迄今為止最大一筆對外貸款（6.44億美元），為中呂宋一個頗受關注的核能項目提供資金。（這個項目一直沒有完成，雖然貸款利息占了菲律賓每年償債總額的10%。）馬科斯接受了承包商西屋公司（Westinghouse）的8000萬美元賄賂，而西屋公司同時將它的報價提高了400%。參見Waltzing with a Dictator，第307—309，265頁。

[[519]](#_519_10)參見Francisco Nemenzo的妙文：“A Season of Coup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Philippine Politics”, Diliman Review，34: 5—6（1986），第1，16—25頁。

[[520]](#_520_10)核心的判斷一定是基于對華盛頓長遠目標的估計，中、南美洲的事件進程充分證明了那些目標的合理性。對菲律賓左派的多形態文化的極有用介紹，參見Randolph G. David編，Marxism in the Philippines（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Third World Studies Center，1984）。

[[521]](#_521_10)有關教會政治，參見休史密斯（Dennis Shoesmith）所撰的一章，收在May和Nemenzo編，The Philippines After Marcos；揚布拉德（Robert Youngblood）的兩篇論文：“Church Opposition to Martial Law in the Philippines”, Asian Survey，18（1978年5月），第505—520頁；“Structural Imperialism: An Analysis of the Catholic Bishops'Conference of the Philippin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13（1982年4月），第29—56頁。亦見Edicio de la Torre，Touching Ground, Taking Root: Th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hilippine Struggle（Quezon City: Socio-Pastoral Institute，1986），作者是最有社會擔當、最富思想性的當代菲律賓神職人員之一。

[[522]](#_522_10)她的一項重要成就是孔拉多·巴爾維格（Conrado Balweg）同志/神父的“易幟來投”，他是一個好戰的、有超凡魅力的（前）神父，馬科斯統治時期，他就已經在呂宋島科迪勒拉地區受壓迫的高地少數族群中間，拉起了自己的游擊隊伍。新人民軍在宣傳中尊之為人民英雄，黨—教合作的模范，私下里卻批評他的耽于女色和不時發生的“不服從”；現在它公開指責他是機會主義者和反革命分子。軍隊一如既往地不信任、不喜歡他，尤其是因為他“易幟”的條件——即阿基諾應允建立真正“自治”的科迪勒拉地區，看起來為在穆斯林的西南地區的出賣鋪平了路。

耐人尋味的是，1987年上映了有關巴爾維格的一部非常成功的商業電影。真實的巴爾維格是個極端復雜的人物，可在電影中他表現得像是馬尼拉自由中產階級的代理人，英勇地抗擊軍隊的野蠻殘暴和共產主義者的背信棄義——當然，是為了人民。

[[523]](#_523_10)他們也沒有被真正鼓勵回國。菲律賓沒有多少適合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匯款在緩解政府面對的外匯危機上作用很大。對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大量流向沙特阿拉伯和海灣地區的非中產階級菲律賓移民來說，情況也是這樣。有可能菲律賓如今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國民勞工凈輸出國之一。

[[524]](#_524_10)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1987年7月23日。

[[525]](#_525_10)Manila Chronicle，1987年7月23日。據報道，有個驚慌失措的巨室建立了四十家分立的空殼公司，以求保住它擁有的土地。

[[526]](#_526_10)大眾民主研究所實施的一項抽樣調查，轉引自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1988年1月24日。（所加的著重號是想強調新立法機構的“復辟”性質。）這一條和下一條文獻，我要感謝Mojares，“The Dream”，第312頁。

[[527]](#_527_10)“Sonny move vs. Barcenas explained”, Sun Star Daily，1987年10月29日。奧斯梅尼亞家族在戒嚴令下經歷了艱難的時光。小塞爾吉奧·奧斯梅尼亞在1971年臭名昭著的米蘭達廣場事件中受了重傷（自由黨——屬于寡頭集團，但是反馬科斯——在馬尼拉鬧市區進行競選集會，發生了手榴彈爆炸。馬科斯宣稱那是新人民軍所為，但是人們普遍相信，殺手是馬科斯收買的軍方的人或囚犯）。戒嚴令宣布后，他流亡加利福尼亞，1984年死在那里。約翰起初為馬科斯宣布戒嚴令喝彩，之后也終于步了叔父的后塵遠走加利福尼亞，在阿基諾遇刺后才回國。

[[528]](#_528_10)副總統薩爾瓦多·“多伊”·勞雷爾（Salvador“Doy”Laurel）的統一民族民主組織（Unido）；何塞·“佩平”·許寰哥的菲律賓民主黨—戰斗黨聯盟（PDP-Laban）；保羅·阿基諾的人民力量黨（Lakas ng Bansa）；參議員霍維托·薩隆加（Jovito Salonga）的自由黨。唯有自由黨可以追溯到戒嚴令前的時代。

[[529]](#_529_10)親政府的聯盟贏得了200個議席中的150個。左派在“新政治”這個包羅龐雜的組織同盟旗號下參選，僅獲得區區兩席。

[[530]](#_530_10)Manila Chronicle，1987年7月25日。

[[531]](#_531_10)Manila Bulletin，1988年1月18日。

[[532]](#_532_10)奧斯梅尼亞的勝利代表了統治家族的最理想結果：它在國家議會里有一個成員，控制著省政府，管理著最大的地方商業中心。請注意，托馬斯擊敗的對手，何塞·“博伊”·昆哥，是現任參議院議長安東尼奧·“托尼”·昆哥的弟弟，參議院前議長、已故的馬里亞諾·昆哥的孫子。

[[533]](#_533_10)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1988年1月22日；Philippine Star，1988年1月23日。

[[534]](#_534_10)Philippine Star，1988年1月22日；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1988年1月21日。她的意思當然是說，從費迪南德和伊梅爾達手里“回來”。

[[535]](#_535_10)Manila Bulletin，1988年1月21日。

[[536]](#_536_10)參見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1988年1月22日，其中描述了阿瓦迪利亞的經歷；Manila Times，1988年1月19日，其中講述了這個打手如何從他的馬尼拉單人牢房乘坐飛機（政府出錢）到北伊羅戈的投票所。科拉松的顧問們或許樂于見到阿吉納爾多“加入體制”而又遠離馬尼拉。即便阿瓦迪利亞（軍隊領導人堅持認為他不該獲準擔任公職）這個事例，也可能有助于達到這一目的：向人們展示這次選舉真的多么自由。

[[537]](#_537_10)軍方泄露了據說是新人民軍的一張通告，上面警告說：“所有候選人，若想在游擊區域從事競選活動，為他們自身的安全起見，必須從我們這里獲取安全通行證。菲共—新人民軍不對沒有通行證的人負責。”奎松省的一位游擊隊領導人在接受法新社采訪時，證實了新人民軍對候選人課稅，表示那些錢將被用于“促進革命”。據傳，這樣的“選舉通行證”每張要賣1萬到3萬比索（500美元到1500美元）不等。軍方聲稱，全部候選人的大約10%（即15000人）花錢買了這種通行證。參見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1988年1月18日。

[[538]](#_538_10)Malaya，1988年1月21日。

[[539]](#_539_10)Manila Bulletin，1988年1月21日。

[[540]](#_540_10)政府宣稱這些選舉平靜得出奇：總共只有124例死亡，相比之下，1987年5月11日國會選舉有204人死亡，1986年總統選舉296人，1981年總統選舉178人，1980年地方選舉411人，1971年（戒嚴令前的）國會競選運動534人。Malaya，1988年1月19日。但是正如《菲律賓世界日報》（1988年1月20日）正確指出的，無論是1986年還是1981年的競選運動，都只有4位候選人被殺——絕大部分遇害者是“小蝦米”而已。1988年1月的新現象在于，足足三分之一的死者是實際的角逐者。

[[541]](#_541_10)1987年夏，馬尼拉的自由主義報刊天天都在憂心忡忡地報道說，有一些極端主義反共治安團，它們形成了一種全國性的、協調行動的系統，正在發展壯大，為它們提供資金的是寡頭集團、美國中情局和偏執的美國前將軍辛洛布（Singlaub）。1988年1月，在競選運動期間，這個廣泛的法西斯主義陣線實際上從報端消失了。不消說，那些團體并未解散。很明顯，到那時為止，大多數團體都拋棄了辛洛布式的便衣，回到作為地方暴徒幫伙的本分，各自被招募去增強特定的、有爭議的當地豪強的地方權力，尤其是在選舉中。毫無疑問，這些幫伙是階級鎮壓的工具，常常同地方軍隊和警察密切協作。它們在持續不斷的內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正是它們的分散和地方主義，表明地方巨頭多么自信，也表明他們感到多么沒必要一齊去向軍方搖尾乞憐。

[[542]](#_542_10)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1988年1月23日。最后一句話的末尾顯然引人誤解，也許應當理解成“沒什么東西吃”，或者是“吃不到任何肉類（any meat）”。［在美語中，meat還包括果肉、禽蛋等。——譯注］

[[543]](#_543_10)Noli Me Tangere（Manila: Instituto Nacional de Historia，1978），我自己英譯的。［本章及下一章的安德森英譯，漢譯時參照黎薩爾，《社會毒瘤》，陳堯光、柏群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略有改動。——譯注］

[[544]](#_544_10)據殖民時代最后一次人口普查（1939年），菲律賓1600萬總人口中，26.5%能說英語，25.4%說他加祿語，2. 6%說西班牙語（Andrew B. Gonzales，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The Philippine Experience So Far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Press，1980］，第62頁）。

[[545]](#_545_10)最好和最有名的，是德比希爾（Charles E. Derbyshire）和博科波（Jorge Bocobo）的兩個譯本。

[[546]](#_546_10)據格雷羅本人后來講述，他只是在最后一刻才決定不拿他的譯本參賽。他坦言原因在錢上。獎金不過1萬比索，他還得交出版權。他把分期付款的版權在菲律賓賣給了《馬尼拉時報》，在國外賣給了知名的倫敦出版公司朗文出版社。參見Edilberto N. Alegre和Doreen G. Fernandez，The Writer and his Milieu: An Oral History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Writers in English（Manila: De La Salle University Press，1984），第79—80，85頁。

[[547]](#_547_10)同上，第75頁。

[[548]](#_548_10)“官方民族主義”這個術語，最先是休·希頓—沃森創造的，關于它的解釋，參見拙著《想象的共同體》，第六章。

[[549]](#_549_10)José Rizal，The Lost Eden（Noli Me Tangere），Leon Ma. Guerrero英譯（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1）。下一段的全部引文都出自譯者導言（第ix—xviii頁）。此后引自該譯本的引文將只標明頁碼。

[[550]](#_550_10)其實他的《起義者》譯本奉行了相同的策略，但為便利計，我這里的分析僅限于《不許犯我》。

[[551]](#_551_10)黎剎的確希望，他的小說能有若干冊落到殖民政權和可憎的修士手里，他無疑很享受這樣的景象：他們對他那些夾針帶刺的話局促不安。

[[552]](#_552_10)第32，44，47，80頁。

[[553]](#_553_10)例如，試比較西語的《不許犯我》第148、219和352頁，與英譯的《失去的伊甸園》第167、250和405頁。

[[554]](#_554_10)1981年格雷羅回憶說：“當我開始在《自由報》上班的時候，我才學習他加祿語。真的，我的他加祿語是支離破碎的。現在不算壞了，不過，以前可是糟透了！”Alegre和Fernandez，The Writer and his Milieu，第85，86頁。

[[555]](#_555_10)試比較西語的《不許犯我》第217、218、220和294頁，與英譯的《失去的伊甸園》第247—249頁和337頁。

[[556]](#_556_10)試比較西語的《不許犯我》第145、224和226頁，與英譯的《失去的伊甸園》第164，257和259頁。

[[557]](#_557_10)第七章（“Idilio en una azotea”［屋頂花園之歌］）有一個副標題，是未經翻譯的希伯來文；第五十三章是意大利文標題“Il Buon Di Si Conosce da Mattina”（一天的天氣取決于早晨）；第五十七章簡單地題名為“Vae Victis!”（拉丁語，戰敗者唯有任人宰割）。

[[558]](#_558_10)這里提到的是海涅最后的、最深奧的詩集之一，Die Götter in Exil。

[[559]](#_559_10)試比較西語的《不許犯我》第38頁（Chloe），49頁（Astarte and the Diana of Ephesus），126頁（Actaeon），168頁（Sigismund and Dornröschen ［白雪公主］），189頁（Leonidas and Pluto），298頁（Argus），351頁（Ariadne, Minos, and Bacchus），與英譯的《失去的伊甸園》第41，52，137，191，214，341和404頁。

[[560]](#_560_10)原文及安德森英譯是現在時，格雷羅英譯是過去時。漢譯實在難以表現這種變換。——譯注

[[561]](#_561_10)以下各段的傳記材料摘自W.M. Guerrero，The Guerreros of Ermita（Quezon City: New Day，1988），第3—4，16—21，24—25章，尤其是第24章；基里諾（Carlos Quirino）為格雷羅獲獎的黎剎傳記《第一個菲律賓人》所寫的略顯狡猾的導言， The First Filipino（1963），第xv—xix頁；以及菲律賓外交部發布的一份生平新聞稿，C輯第52號，1966年5月9日。

[[562]](#_562_10)費爾南德斯曾問格雷羅，他自認為他的主語言是什么，格雷羅答道：“當然是英語。”費氏又問：“不再是西語啦？”格氏答曰：“我熟習西語，但不如英語。”Alegre和Fernandez，The Writer and his Milieu，第86頁。

[[563]](#_563_10)參見《馬尼拉時報》上登載的報道，1959年10月2日。

[[564]](#_564_10)它是“受命于”馬科斯的外交部長羅慕洛而寫的一篇文章的增補版，該文意在反駁流亡政客勞爾·曼格拉普斯（Raúl Manglapus）所作、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的一篇反戒嚴令文章。在格雷羅死前不久同費爾南德斯的訪談中，他公開地、痛心疾首地自我貶低了他生命的大部。雖然作為翻譯家、傳記作者、記者和評論家，商業上大獲成功，但是說“我不能自稱為作家”，事實上他自責做了雇傭文人，寫了“一些無聊的俗套小說”，“靠［給雷克托等人］當捉刀人謀點稻粱”（Alegre和Fernandez，The Writer and his Milieu，第71—73頁）。

[[565]](#_565_10)這里的論題在拙著《想象的共同體》第二章有詳盡論述。

[[566]](#_566_10)讀這本小說，我們知道有西班牙、香港、德國和美國，但它們無例外地都“在舞臺之外”。

[[567]](#_567_10)原文如此，疑為cleric或clergy（教士階層）之誤。——譯注

[[568]](#_568_10)這就是奧坎波（Ambeth Ocampo）那本關于黎剎的妙趣橫生又實事求是的書《沒穿外套的黎剎》（Rizal without the Overcoat ［Manila: Anvil，1990］）如此新人耳目、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

[[569]](#_569_10)我們在此不是察覺一種“宣福”（beatification）嗎？憑借這種形式，好辯的革命領導人被巧妙地變成了沉默的圣人（santos）。

[[570]](#_570_10)這種對西班牙帝國內普遍模式的驚人偏離，只在巴拉圭差堪比擬，瓜拉尼語相較于西班牙語，一直是那里的現用國語。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這兩個地區，出于特殊的歷史原因，主要的政治權力長期掌握在神職人員手里，他們既想讓土人皈依，又想剝削土人。不像其他大多數西班牙人，這些教士把學習當地語言當作他們的事業，以便用教眾所理解的語言，將上帝的真理傳播給后者。（世俗權力本身還很弱小，它也認識到，通過現代教育系統推廣西班牙語的成本，遠遠超過了從這兩個資源相對貧乏的殖民地所能獲取的收益。）但是由于西班牙殖民主義在菲律賓年代久遠，教士無處不在，是以伊比利亞語對當地語言影響廣泛。有些語言學家估計，菲律賓主要區域語言的詞根，多達四分之一是源于西班牙語。

[[571]](#_571_8)統計數字可以揭示真相。1903年，殖民政府約5,500個文官職位中，菲律賓人占據了不到半壁江山。到1921年，他們占據了14,000個這類職位的90%。到1930年代中期，比例升至99%。參見Teodoro A. Agoncillo，A Short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New York: Mentor，1969），第169頁；David Wurfel，“The Philippines”，見G. McT. Kahin編，Governments and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4），第689—690頁。

[[572]](#_572_8)決定性的轉折于1921年到來了，那時梵蒂岡迫于美國壓力，將菲律賓的西班牙耶穌會轉至印度，菲律賓移交給紐約—馬里蘭教省。參見Martin Noone，The 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O'Doherty, Archbishop of Manila（Quezon City: R.P. Garcia，1988），第146頁以下。這樣，到1930年代初格雷羅就讀耶穌會著名的馬尼拉雅典耀大學的時候，它已經是一所美國機構，不再是西班牙機構了——就像半個世紀前黎剎在那兒上學時那樣。

[[573]](#_573_8)這種態度持續到獨立以后。1950年代，研究印尼和暹羅的美國學者忙著修習印尼語和泰語，可是他們研究菲律賓的同仁，在1970年代前，一般沒有投身于他加祿語的學習。

[[574]](#_574_8)之所以說它是個神話，是因為早在1927年，約99%的公立學校教師是菲律賓人！參見David Wurfel，Filipino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Decay（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第9頁。

[[575]](#_575_8)提醒一下我們自己：婦女只在1918年后才獲準參加選舉，數百萬黑人被剝奪公民權直到1960年代。這種提醒不會有害處。

[[576]](#_576_8)格雷羅對他學生時代的回憶很啟發人：“那時候，文學士的課程中，文學高居頂端——在雅典耀就是這樣。據說它是精英課程……［不過］我想我們沒有仔細研讀過哪怕是一出莎士比亞戲劇……我們甚至不讀你或許會稱之為上世紀的文學的那些書，越現代的讀得越少。我們甚至不認識海明威、福克納這樣的人，更別提費伯和凱瑟了……十足的文化沙漠！”Alegre和Fernandez，The Writer and his Milieu，第72—73頁。

[[577]](#_577_8)我的順著這些思路的想法，受戴維·布雷丁（David Brading）的精彩巨著啟發良多：The First America: The Spanish Monarchy, Creole Patriots and the Liberal State, 1492—1867（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578]](#_578_8)對這一觀點的全面思考，參見拙著《想象的共同體》第十章，“人口普查、地圖和博物館”。

[[579]](#_579_8)這個名字據說是阿爾瓦羅·德·薩阿維德拉（Alvaro de Saavedra）在1527—1529年間杜撰的，他是麥哲倫環球航行探險隊的成員。

[[580]](#_580_8)事實上瑪麗亞·克拉臘是西班牙的達馬索神甫與甲必丹蒂亞格之妻、可能是梅斯蒂索人的唐娜庇亞通奸關系的產物。

[[581]](#_581_8)例如，想想《起義者》中那位西班牙自由主義學生桑多瓦爾。

[[582]](#_582_8)這種緘默里是否有一種前兆，預示了馬卡帕加爾總統1962年對沙巴主權的正式主張？——它肯定不是菲律賓的古老領土。

[[583]](#_583_8)參見Niels Mulder，“Philippine Textbooks and the National Self-Image”, Philippine Studies，38: 1（1990)），第84—102頁，在第88頁，援引N. Carmona-Potenciano和T.T. Battad，Our Country and its People，第一卷，（Manila: Bookmark，1987），第3—5頁。

[[584]](#_584_8)同上，第84—102頁。

[[585]](#_585_8)參見Corpuz，The Roots of the Filipino Nation（Quezon City: Aklahi Foundation，1989），第ix頁，第2頁。

[[586]](#_586_8)Culture and History（Mandaluyong: Solar，1988），第14頁。

[[587]](#_587_8)例如可參見John N. Schumacher, S.J.，Revolutionary Clergy: The Filipino Clergy and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1850—1903（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Press,1981）；Horatio de la Costa, S.J.，The Jesuits in the Philippines, 1581—1768（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

#### 第三部分 東南亞：比較研究

[[588]](#_588_8)在殖民化地區，當然不存在選舉殖民政府的問題，或殖民政府本質上對新立法機關負責的問題。在沒有遭受殖民化的暹羅，1932年后國王被認為只是國家元首。問責性（accountability）是隨著行政部門的國家化，才開始猶猶豫豫地發展起來的。

[[589]](#_589_8)參見Benjamin A. Batson，The End of the Absolute Monarchy in Siam（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Thawatt Mokarapong，History of the Thai Revolution（Bangkok: Thai Watana Panich，1972）。

[[590]](#_590_8)Harvey H. Smith等，Area Handbook for Thailand（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8），第161頁。

[[591]](#_591_8)本段概述的這些進程，在前面第七章“撤退癥狀”里有詳細闡發和實錄。

[[592]](#_592_8)關于本段及隨后三段描述的這些活動，最好的參考資料是David Morell和Chai-anan Samudavanija，Political Conflict in Thailand: Reform, Reaction, Revolution（Cambridge, Mass.: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1981）；John L.S. Girling，Thailand: Society and Politics（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593]](#_593_8)這一段和下面幾段的論證，摘自前文第八章“現代暹羅的謀殺與演進”。

[[594]](#_594_8)對1980年代泰國政治的最佳綜述，參見James Soren Ockey，“Business Leaders, Gangsters, and the Middle Class: Societal Groups and Civilian Rule in Thailand”（康奈爾大學博士論文，1992年）。

[[595]](#_595_8)1991年2月，泰國軍隊“軍校五班”（Academy Class 5）的野心勃勃的領導人，利用武裝部隊內部對差猜·春哈旺文官政府各種政策的憤怒，發動了一場成功的政變。政變領袖素金達安排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商人和前外交官就任首相，保證不身履其位。當1992年春他違背初衷時，一場流血的政治危機開始了，導致他在臨近五月末的時候垮了臺丟了臉。然后，1992年秋季選舉重建和鞏固了文官政府。

[[596]](#_596_8)尤請參閱Ruby Paredes，Michael Cullinane和Alfred McCoy的精彩論文，見Ruby B. Paredes編，Philippine Colonial Democracy（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Press，1989）；Peter Stanley的機智之作，A Nation in the Making: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99—1921（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Glenn A. May，Social Engineering in the Philippines（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1980）。

[[597]](#_597_8)V.O. Key, Jr.，Southern Politics in State and Nation（New York: Vintage，1949）.

[[598]](#_598_8)參見Andrew B. Gonzalez，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The Philippine Experience Thus Far（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1980），第58頁，連同文獻引文。

[[599]](#_599_8)1939年的《哈奇法案》是一項前所未見地影響深遠的法律，旨在建立起協調一致、按功過升降的國家行政機構，防止它被霸道的、不擇手段的政客們濫用。要弄清當時美國的慣例與北歐的相距多遠，又與菲律賓的相距多近，我們會注意到，法案的規定禁止在全國選舉中威脅、恐嚇或脅迫選民；禁止通行的那些習慣做法：許諾給予和拒絕給予某種工作和失業救濟，以此作為對政治活動的酬報或懲罰；宣布美國的行政文官介入聯邦公職候選人的提名和選舉為非法。

[[600]](#_600_8)關于這些，參見前文第九章菲律賓的“地方巨頭民主制”，第205—206頁。

[[601]](#_601_8)對人民軍興衰史的經典敘述，參見Benedict J. Kerkvliet，The Huk Rebell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

[[602]](#_602_8)1947年，華盛頓做出安排，對它在菲律賓的23個海陸空軍事基地進一步續租99年。馬尼拉實際上被告知，美國會在無限期的將來管理菲律賓的國防，菲律賓無需真正的武裝力量。即使在今天，獨立快半個世紀了，菲律賓軍隊跟東南亞其他任何大國的軍隊比起來，仍然更加操練不善，裝備低劣，組織紊亂。再者，美國有一種成規：一切高級軍事晉升和任命都須國會批準；菲律賓被迫接受了這條規矩，這在軍官團里刺激了宗派傾向和對政治庇護的尋求。

[[603]](#_603_8)參見諾瓦克和施耐德的文辭洗練、資料扎實的分析：Thomas Nowak and Kay Snyder，“Clientelist Politics in the Philippines: Integration or Instabilit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68（1974年9月），第1147—1170頁。

[[604]](#_604_8)參見邦納那本妙趣橫生、敘述詳盡的書：Raymond Bonner, Waltzing with a Dictator（New York: Times Books，1987），特別是最后三章。

[[605]](#_605_8)人們大概回想得起，1985年底，他決定要求舉行一次出其不意的總統選舉，以此向美國證明他的國內合法性。他料定，自己憑借“武器、力氣和財氣”的法門，贏得了過去三十年的選舉，這次故伎重施必將再奏凱歌。但是如今美國人反對他了，而且如邦納所揭示的（同上），中情局代表科拉松·阿基諾投入了戰斗。

[[606]](#_606_8)對阿基諾政權的波旁特征的細致討論，見上文第九章。

[[607]](#_607_8)日本人把東印度分割成三塊不相連屬的地域：第25兵團控制的蘇門答臘、第16兵團控制的爪哇，以及海軍控制的“大東部”（Great East）。每個地域各有其不同的偽國民議事會。

[[608]](#_608_8)參見George McT. Kahin的經典著作：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2）；對革命早期階段的更細致探討，見拙著：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

[[609]](#_609_8)印尼選舉民主制的關鍵研究見Herbert Feith，The Decline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n Indone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2）；對1955年選舉的一項卓越的精細研究，見同一作者，The Indonesian Elections of 1955（Ithaca, NY: Cornell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1957）。

[[610]](#_610_8)Donald Hindley，“President Sukarno and the Communists: The Politics of Domestica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56（1962年12月），第915—926頁。

[[611]](#_611_8)有關這一切的經典著述，參見Daniel S. Lev，The Transition to Guided Democracy: Indonesian Politics, 1957—1959 （Ithaca, NY: Cornell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1966）。至于他最新的評價，參見他一針見血的論議：“On the Fall of the Parliamentary System”，見David Bourchier和John Legge編，Democracy in Indonesia, 1950s and 1990s（Clayton，Victoria: Monash University，Centr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4），第38—42頁。

[[612]](#_612_8)對這整個問題的熱烈而與時俱進的探討，尤請參見上引論文集中以下諸人的文章：Ruth McVey，Herbert Feith，Jamie Mackie，Daniel Lev，Adnan Buyung Nasution，Greg Fealy，Anton Lucas。

[[613]](#_613_8)原文如此（Oslovian）。諾貝爾文學獎是由瑞典文學院評選并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頒發，只有和平獎由挪威諾貝爾委員會負責，并在奧斯陸頒獎。普拉姆迪亞多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譯注

[[614]](#_614_8)這些小說，原著均由雅加達的哈斯達·密特拉（Hasta Mitra）出版社出版，原名分別是Bumi Manusia （1979），Anak Semua Bangsa（1980），Jejak Langkah（1985）和 Rumah Kaca（1988）。通行的英譯本是紐約的威廉·莫羅（William Morrow）公司出版的，英文標題分別是This Earth of Mankind （1991），Child of All Nations（1993），Footsteps（1994）和House of Glass（1996）。［前三部中譯本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分別是《人世間》（1982），《萬國之子》（1983），《足跡》（1989）。最后一部未見中譯。——譯注］

[[615]](#_615_8)它最先譯成英文并發表在《印度尼西亞》雜志上（Indonesia，40 ［1985年10月］，第37—55頁）。

[[616]](#_616_8)參見Seksan Prasertkul，“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hai State and Economic Change”（康奈爾大學博士論文，1989年）。

[[617]](#_617_8)參見他的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

[[618]](#_618_8)參見Kasian Tejapira，“Commodifying Marxism: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Thai Radical Culture, 1927—1958”（康奈爾大學博士論文，1992年）。

[[619]](#_619_8)Bangkok Post，1998年3月12日，第5頁。

[[620]](#_620_8)在將要討論的這一時期的大多數時候，緬甸和印支諸國是被戰爭撕裂的社會主義或準社會主義經濟。資本主義的文萊和新加坡基本上存而不論，因為從本質上看，它們一個是石油酋長國，另一個是自治城邦。

[[621]](#_621_8)1950年代，在毛澤東獲勝后逃竄到緬甸的國民黨軍隊，聽信中情局的唆使，控制了種植罌粟的緬甸東北大片地區。暹羅早在1948年已是美國盟友，它是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創始成員國之一，最后在越南戰爭的白熱化階段容留了數萬美國軍人和軍用飛機。吳庭艷的南越是美國的創造物；諾羅敦·西哈努克的柬埔寨中立政府，1970年在美國默許下被推翻了。老撾的各種不穩定的右翼政府，斷斷續續都有華盛頓給它們掏錢。杜勒斯哥倆武裝和補給了1957—1958年蘇加諾印尼的那場大規模地區叛亂。菲律賓不僅是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創始成員國之一，也是西太平洋地區美國許多至關重要的軍事基地之所在。

[[622]](#_622_8)具有象征意義的是，豐田公司在1980年代籌劃為馬來西亞生產號稱的“國民車”，現代集團在1990年代中葉才找到時間企圖為印度尼西亞做同樣的事——幸而未遂其功。

[[623]](#_623_8)這種自加的孤立被美國人蓄意安排的貿易禁運強化了很長時間。

[[624]](#_624_8)1930年代大蕭條期間，這一流動減慢下來，那時殖民列強收緊了移民管制。在戰后獨立時代，它基本上趨于終止，只除了一群富商，人少卻很顯赫，在中共掌管中國大陸后帶著財富逃出來：多數去了美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但也有一些人落腳曼谷、馬尼拉和雅加達。

[[625]](#_625_8)在今日印尼，唯一被稱作“公民”（WNI—Warga Negara Indonesia）的人是“華人”，這很說明問題。其他所有人都是國家的兒子/女兒。

[[626]](#_626_8)1970年代中期，泰國議會議長是精明的律師和商人巴實（Prasit Kanjanawat）。報上的漫畫時常取笑——不過并無惡意——他那濃重的“華語”口音。我想，這樣的情形在任何一個前殖民地國家都是不可思議的。

[[627]](#_627_8)Gerald Tan，AS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1996），第111頁。

[[628]](#_628_8)Jomo K. Sundaram等，Southeast Asia's Misunderstood Miracle: Industrial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ailand, Malaysia and Indonesia （Boulder, Col.: Westview Press，1997），第83頁。這本書恰在金融危機前付梓，它做了精心研究，對“奇跡”的脆弱性提出了有先見之明的警告。

[[629]](#_629_8)括號中數字出自Tan，ASEAN，第101和104頁。菲律賓的數字似乎高得難以置信。

[[630]](#_630_8)我那聰明絕頂的年幼的印尼養子，在他褊狹的家鄉所能提供的最好中學里上學，十七歲時來到美國，沒有一點基本的地理知識，也沒有一點基礎的世界歷史知識，只有對他自己國家歷史的歪曲得不像樣的了解。在更一般的層面上，去國外深造的政府獎學金的分配都有一種強烈的趨勢：它的分配基礎不是智識成績，而是家庭關系、族群背景和政治忠誠。

[[631]](#_631_8)罪魁禍首是穆罕默德·“鮑勃”·哈桑（Mohannad“Bob”Hassan，又名鄭建盛［The Kian Seng］），他是“華人”血統，至少名義上是穆斯林。他先是做木材采運業，后來通過一個關系卡特爾控制了全球膠合板國際貿易的支配性份額（1990年代初是78%），賺了幾十億。蘇哈托重新當選總統后宣布的新內閣中，他受命主管商業，是32年來第一個“華人”部長。

[[632]](#_632_8)1970—1987年間，總就業人數中制造業所占份額實際上在下降，從12%降至10%。1980—1985年間，該國記錄下了若干負增長：工業2.3%，制造業1.8%，建筑業6.9%。Tan，ASEAN，第75頁。

[[633]](#_633_8)我們可以接著說，壓倒性的美國勢力（軍事存在始終多于經濟存在）的終結，為菲律賓更直接地與較富裕的鄰居（特別是隔海相望的臺灣）打交道，開辟了道路。

[[634]](#_634_8)倫敦小心排除了殼牌公司的文萊，那是兩塊飛地的小小聯合體，方圓5780平方公里，陸上完全被沙撈越包圍著。新加坡長期執政的獨裁者李光耀之所以同意最初的合并，是因為在對付新加坡左翼反對黨上面，他認為需要幫助。到1964年，他已打垮了這個反對黨，開始幻想自己是吉隆坡的大腕選手；那時節，馬來人的政治精英幾乎是委婉地攆他走了。

[[635]](#_635_8)在1969年5月的選舉中，執政的聯盟黨表現太差，特別是在都市化的雪蘭莪州，結果吉隆坡爆發了有政治圖謀的反華人的暴民狂熱行為。將近兩百人被殺，戒嚴令頒布了，全國被置于全國行動理事會的獨裁統治之下幾達兩年。總理拉赫曼（Tunku Abdul Rahman）喪失了全部實權，1970年不得不辭職。從此以后，對1969年5月事件重演的憂慮，一直是對華人野心的一種強力約束。

[[636]](#_636_8)這個以選舉為基礎的政權的穩定性，有賴于這些領導人培養馬來人的野心和虔誠情感。雖然印尼和馬來西亞共享一種通用語言（有些差別，相當于英語和美語之別），但在前者，馬來族是一個小之又小的少數族群（聚居在蘇門答臘的東部沿海地區），而印尼馬來語（Bahasa）對于廣大的多數民族是第二語言。印尼引以為榮的反抗歐洲殖民主義的革命斗爭史，促成了對沒有這類經歷的半島“小兄弟”的某種溫和輕蔑。印尼殖民前的歷史遺跡比馬來西亞的偉大得多，它的當代文化也更具世界性，它的現代藝術家、作家和公共知識分子給世人留下了深刻得多的印象。

[[637]](#_637_8)馬來西亞人口稀少是個重要因素。目前約有兩千萬，是暹羅人口規模的33%，菲律賓的28%，印尼的10%。過去十年里，勞動力短缺——部分是食利傾向引致的——刺激了來自孟加拉和印尼的合法與非法的客籍工人（Gastarbeiters）潮涌而入。當國民中的失業率上升時，這些人很多要被遣送回國。有待觀察的是，國民可能會有多樂意回到卑下的職業上去。

[[638]](#_638_8)要不了多久，年老的、口出狂言的馬哈蒂爾不得不去任，這似乎很可能。有望繼位的是安瓦爾·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當前的財政部長，比他小一輩。他對金融危機做過一些公開評論，那些評論因其務實和自我批評的調子而聞名。

[[639]](#_639_8)鄧小平成功訪問了曼谷，在那里他與將軍們相談甚歡，并出席了皇太子（暫時）出家做和尚的受戒儀式。這種成功不好向一股抵抗力量解釋清楚，后者視曼谷統治者為封建分子、買辦和法西斯美國的傀儡。

[[640]](#_640_8)新時代的象征就是“國家維持和平委員會”（NPKC）發布的一號公告——曼谷證券交易所翌日將如常開放。另一項時代標志是在1992年5月暴亂期間，反抗者們能夠在CNN上看他們自個表演，也能通過他們的移動電話挫敗軍隊的通訊管制。然而，就在最后電視里的舞臺造型中，還可見些微古風：NPKC領導人素金達將軍，與以前的將軍、當時的民眾運動領導人占隆一起，拜倒在國王腳下。

[[641]](#_641_8)遲至1978年，尚有數萬人被囚禁在印尼的古拉格，其中包括該國的大作家普拉姆迪亞。對已經關在死囚區逾二十年的共產黨領導人的處決，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末。

[[642]](#_642_8)這個詭計有雙重好處：結構上防止了單一的反對派冒出來，又緩和了國外對獨裁制的批評。

[[643]](#_643_8)雅加達的另一個笑話于焉浮現：蘇加諾給自己安上終身總統的頭銜，而蘇哈托將終其一生讓自己安享總統寶座。

[[644]](#_644_8)該政權的一項較為詭詐的舉措，是改變國家的拼寫體系，表面上是要使之符合馬來西亞的拼寫體系，實際上卻是要從正字法上將蘇哈托的統治與之前行之有效的一切分隔開來。

[[645]](#_645_8)在反殖革命（1945—1949）、半自由主義民主制（1949—1959）與蘇加諾的威權主義—民粹主義訓導民主制（1959—1965）期間，華人差不多總是在內閣中有其代表，在幾乎所有政黨的領導層中有其地位。顯著的例外是1951年后的印尼共產黨，就在那一年，它當時的領導人，一個名叫陳粦如（Tan Ling Djie）的混血華裔，被年輕有為的“本土”新秀們清除掉了。從此直到1965年的末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沒有一個華人成員。

[[646]](#_646_8)一般引用的數字是300億美元上下。比如參見，New York Times，1998年1月16日。

[[647]](#_647_8)蘇哈托子女們的暴發戶心態的一個典型事例，是他的幼子托米笑納了蘭博基尼豪華賽車制造公司。這類引起轟動的“投資”，在鄰國馬來西亞大概是無法想象的。

[[648]](#_648_8)起碼正式說來是如此。新加坡的李光耀，74歲，比蘇哈托小兩歲，1959年成為總理，到1990年才交出這把交椅。但他依舊是執政黨的首腦，也是“內閣資政”，照樣決定這個自治城邦里關系重大的一切事務。緬甸的奈溫將軍，如今87歲了，當政26年之后于1988年起正式引退，據傳對政治上要緊的政策問題仍可一言而決。怪得很，1997年9月，亦即在他從公眾視野消失約莫十年以后，他像侏儒怪一樣又露面了，短暫訪問了不堪金融危機之苦的蘇哈托。他們談了些什么？也許是他們作為裕仁天皇的帝國軍隊訓練出來的年輕軍人那段共同的少不更事的時期？（附帶提一下，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72歲，菲律賓的拉莫斯70歲。）

[[649]](#_649_8)對他們來說，影響個人發展的戰斗經驗來自東帝汶。

[[650]](#_650_8)從下面這則掌故我們可以略識哈比比的才智。幾年前他的導師委派他去主管官辦的伊斯蘭教知識分子協會，他在紐約會見虔誠的候選成員時語驚四座，他告訴他們說，先知穆罕默德不過是播放真主的衛星廣播節目的“一臺電視機”。

[[651]](#_651_8)這是蘇哈托1966年推翻蘇加諾時的任所。

[[652]](#_652_8)1930年代末，他畢業于中爪哇一所私立的穆斯林中學，然后參加了殖民地的雇傭軍（荷蘭皇家東印度軍），在那里升為中士。日本人接管后，他轉去他們的警察部門，后來又轉去本土的輔助部隊，那是日本人組建來準備迎戰盟軍襲擊的。1945年秋天，反殖革命爆發了，這時他又加入國民軍，成了一名下級軍官。1950年代中期，他晉升為中爪哇的軍隊司令官，后因腐敗被解職。但是1961年他成功地卷土重來，做了陸軍戰略指揮部的首長。在他那一代高級軍人中，他是為數不多的從未出國受訓的人之一。他不是這樣一個人，可以設想自己欣欣然退隱到佛羅里達、夏威夷或里維埃拉，終老于斯。

[[653]](#_653_8)詳參拙文，“Recensement et Politique en Asie du Sud-Est”, Genèses，26（1997年4月），第55—76頁。

#### 第四部分 所遺何物？

[[654]](#_654_8)“他們那個時代”應該理解得適度寬泛些。比如，《戰爭與和平》出版于1860年代末，小說背景安排在俄羅斯，時間剛好早于托爾斯泰出生的1828年，也就是他父親的時代。

[[655]](#_655_8)時代誤植在兩個方向起作用。一方面，我們看到一種對合乎“時代”的著裝和室內裝飾的著迷，它不懈地強調簡·奧斯丁小說的“攝政時期風格”（“這些書是偉大的歷史小說”！），而發笑的讀者們很少想到那些東西。另一方面，電影動用了知名男女演員飾演伍德豪斯先生和他的可人女兒，從而必定會產生現代版本的平庸化。（“甲或乙演這個或那個角色多出彩呀。”）在這兩個方向，效果都是將關聯性或感染力盡量消泯于無形。

[[656]](#_656_8)Foundational Fictio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657]](#_657_8)如果瓊·佛朗哥（Jean Franco）說得沒錯，第一本真正的拉美小說，即何塞·華金·費爾南德斯·德·利薩爾迪（José Joaquín Fernández de Lizardi）的《癩皮鸚鵡》（El Periquillo Sarniento），到1816年方才發表。參見她的An Introduction to Spanish-American Literatu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第34頁。

[[658]](#_658_8)薩默最富啟迪的附加命題之一是，夫婦生活作為烏托邦征兆的這個主題，往往在這些小說中塑造出本世紀大體絕跡的一類男女主人公。男主角令人側目地女性化和色情化，女主角卻胸懷公益、獨立自主、“敢作敢為”。

[[659]](#_659_8)普拉姆迪亞之外，印尼獨立以來還出了兩位堪稱卓越的小說家，這兩人都可謂強烈地親近于“魔幻現實主義”。基督徒巴塔克人伊萬·西馬圖龐（Iwan Simatupang）英年早逝，在1959年，也就是他的國家獨立十年之內，業已創作出令人驚嘆的《紅色的紅》（Merahnya Merah）；巴厘人普圖·維查雅（Putu Wijaya）的筆墨生涯貫穿了蘇哈托的“新秩序”全期，創作了大量小說、短篇故事和其他虛構作品，也都透著“魔幻現實主義”格調，其中最像阿斯圖里亞斯風格的是讓人驚悚的《膽量》（Nyali）。

[[660]](#_660_8)當然有一種地方性的變調。如我在《想象的共同體》中提到的，主人公先后娶了一個神經衰弱的歐亞混血美人，一個激進的華人偷渡者，和一個來自荷屬東印度最東端的手握兵器的穆斯林公主。黎剎的《不許犯我》，說來奇怪，范圍沒那么遼遠。形式上看，推動它的情節發展的，是梅斯蒂索人男主角伊瓦臘對他青梅竹馬的梅斯蒂索女友瑪麗亞·克拉臘不得善果的愛。但是民族的能量出于他和埃利亞斯的關系，后者是他的革命的、土著的鏡像，最后為他獻出了生命。

[[661]](#_661_8)這個主題，還有別的許多主題，在謝平的論文里有出色分析。參見Pheng Cheah，“Spectral Nationality: The Idea of Freedom in Modern Philosophy and the Experience of Freedom in Postcoloniality”（康奈爾大學博士論文，1998年）。

[[662]](#_662_8)下文中，我將參考1991年版的《敘事人》原著（El Hablador, Barcelona: Biblioteca de Bolsillo，1991），雖然該書初版于1987年。引文的英譯出自鄙人之手，盡管我也受益于海倫·萊恩的英譯本——The Storyteller （London: Faber & Faber，1991）。

[[663]](#_663_8)《敘事人》引文的中譯，參考了孫家孟的中譯本，見《誰是殺人犯·敘事人》，《略薩全集》之三十七，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特向原譯者致謝。——譯注

[[664]](#_664_8)薩默在她論《敘事人》的絕好文章中，為了探討這個組織的超出《敘事人》所言的現實，廣泛引證了戴維·斯托爾（David Stoll）的《傳教士還是帝國創始人？拉丁美洲的威克利夫〈圣經〉翻譯會》（Fishers of Men or Founders of Empire? The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Zed Press，1982］）。1950年代初，彼得·湯森（Peter Townsend），墨西哥總統拉薩羅·卡德納斯（Lázaro Cárdenas）從前的朋友和傳記作者，在反共的美國創辦了語言學院。它從美國國際開發署和中情局接受了大筆資助，用于它在整個低度發展世界的傳道工作，但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到1970年代中期，它簡直快成以下這些政府的官方機構了：墨西哥、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巴拿馬、蘇里南、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玻利維亞，以及巴西。“威克利夫在印第安人中間的影響，其他跨國組織無一能及。它對印第安人語言和忠誠的熟練掌握，它的后勤系統和官方聯系，都無與匹敵。”然而沒過多久，“每個政府都面臨了相同的令人憂慮的現象：印第安人日漸明顯地、好戰地組織起來了，對這樣一種趨勢，暑期語言學院如同別的許多掮客一樣，大體是無心地起了推動作用。識字率的提升、貿易語言和群際接觸都有助于這些散居社群的成員們自認為是一體的族群。”1976—1981年間，暑期語言學院被逐出巴西、墨西哥、巴拿馬、厄瓜多爾和秘魯。參見Sommer，“About-Face: The Talker Turns”, Boundary 2，23: 1（Spring 1996），第91—133頁，在第101—102頁。

[[665]](#_665_8)具體提到的有弗朗斯·瑪麗·卡瑟維茨—勒納爾（法國人），約翰遜·艾倫（北美人），格哈德·貝爾（瑞士人），華金·巴利亞勒斯神父（西班牙人），還有卡米諾·迭斯·坎塞柯和維克多·J.格瓦拉（秘魯人）。卡瑟維茨—勒納爾（Casevitz-Renard）1972年開始發表關于瑪奇根加的著述，她的第一篇論文是 “Les Matsiguenga”,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s Américanistes，61（1972），第215—253頁；艾倫·約翰遜（Allen Johnson，不是約翰遜·艾倫）開始于1975年，處女作是“Time Allocation in a Machiguenga Community”, Ethnology，14（1975），第301—310頁；格哈德·貝爾（Gerhard Baer）開始于1976年，那年的代表作是“Was Mythen Aussagen: Das Beispeil der Matsigenka, Ost-Peru”，Paideuma，22（1976），第189—198頁，1984年隨之出版了《秘魯東部瑪奇根加人的宗教》（Die Religion der Matsigenka Ost-Peru，Basel: Wepf）；對巴利亞勒斯神父（Father Barriales），我只找到一本《瑪奇根加人》（Matsigenka，S.A. Victoria: Heraclio Fournier，1977）；卡米諾·迭斯·坎塞柯（Camino Díez Canseco）從1977年開始發表論文，第一篇是“Trueque, Correrías e Intercambio entre los Quechuas Andinos y los Piros y Machiguengas de la Montaña Peruana”, Amazonia Peruana，1: 2（1977），第123—140頁。（在此，我們也許是第一次發現一份刊物是專門研究秘魯亞馬遜地區的。）迄今為止我沒看見格瓦拉的任何東西。

[[666]](#_666_8)我說不上對這些人具有任何知識，這一部分多仰賴于如下文獻：(1) Dan Rosengren，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 Leadership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and Dominance among the Matsigenka of the Peruvian Amazon （Göteborg: Göteborgs Etnografiska Museum，1987），Etnologiska Studier, 第37卷；(2) Beverly Yvonne Bennett，“Illness and Order: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mong the Machiguenga and Huachipairi” （康奈爾大學博士論文，1991年）；(3) Matsigenka 詞條，Encyclopedia of World Cultures（New York: G. K. Hall，1994），第7卷（South America），第230—232頁。我也較為粗略地查閱過多明我會傳教士的以下文本：P. Fr. Vicente de Cenitagoya，Los Machiguengas （Lima: Sanmarti y Cia，1943）；P. Andrés Ferrero，Los Machiguengas: Tribu selvática del sur-oriente peruano（Salamanca:“Calatrava”Libreros，1966）；還有上面引用的Father Joaquín Barriales的Matsigenka。《敘事人》第五章所講的帕恰卡姆埃和雅康托羅的故事，是依據Cenitagoya著作的第185—189頁提煉而成的。

[[667]](#_667_8)轉引自Rosengren，In the Eyes，第3頁。

[[668]](#_668_8)同上，第31頁。

[[669]](#_669_8)瑪奇根加人的命運很大程度上無人留意。但是再往北去，沿著普圖馬約河的秘魯上游，施于當地土人的同樣橡膠熱暴行突然演變成了涉及“部落少數族群”命運的最早的國際大丑聞之一。稱得上“模范”人物的是身敗名裂的愛爾蘭愛國者羅杰·凱斯門特（Roger Casement）。由于揭露了利奧波德二世政府在尚不屬于比利時的剛果的野蠻行徑，他早已馳名世界，又因他1912年的報告，作為瀕危少數族群的保護人再添令譽。那篇報告披露了他的直接先行者、美國冒險家—旅行家哈爾登堡（W.E. Hardenburg）謂之“魔鬼天堂”的地方。1909—1913年，凱斯門特是英國駐里約熱內盧領事。他根據哈爾登堡的報道采取適當行動，尋找切入點。他發現惡棍頭目是胡安·阿拉尼亞（Juan Araña），這是個秘魯企業家，資本不足，但利馬的政治關系“過硬”，再跟英國后臺老板合組了“秘魯亞馬遜公司”。凱斯門特也得知，阿拉尼亞雇用了數量可觀的（英國的）巴巴多斯黑人充當工頭、打手和劊子手。正是基于倫敦城應為普圖馬約恐怖行為負責這一點，凱斯門特贏下了一場連續舉行的聽證會。1911年，喬治·“溫莎”五世授予他有點怪誕的爵士頭銜，表彰他為英國的體面所做的貢獻。五年后他被摘除了這種曖昧的榮譽，那時，1916年復活節起義剛剛過去，他因背叛英國的罪名遭到審判。1916年8月3日，凱斯門特被處決。有關這些事情，參見W.E. Hardenburg，The Putumayo: The Devil's Paradise（London: T. Fisher Unwin，1912）；Roger Sawyer，Casement: The Flawed Hero（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第7—9章；Brian Inglis，Roger Casement（London: Hodder & Stoughton，1973），第三部分。

[[670]](#_670_8)引文出自Bennett，“Illness and Order”，第113頁。

[[671]](#_671_8)對照一下附在羅森格倫和貝內特兩書后的淵博書目，可以看出自1970年代初期以后“科學的”出版物的一種突然、飛速的數量增長。

[[672]](#_672_8)參見羅森格倫饒有啟發的敘述，In the Eye，第176—185頁。

[[673]](#_673_8)這是貝內特的結論，“Illness and Order”，第155頁。

[[674]](#_674_8)我無力查遍這全部報道，但羅森格倫和貝內特的著作如此周詳，他們的書目如此廣博，如果說他們的專業同仁的著述中有某篇提到過敘事人，而他們竟不予理睬，這似乎難以置信。再說，盡管N.聲稱多明我會修士時常在其作品中談起敘事人，但他們從未出現在本書第453頁注釋1提及的多明我會修士寫作的三篇文獻中。

[[675]](#_675_8)Sommer，“About-Face”，第113頁。我對《敘事人》的看法有別于她，但我從她的著作里獲益匪淺。

[[676]](#_676_8)冒著惹惱讀者的危險，我將盡量把英語中story-teller這個粗俗的陳詞拒之門外。

[[677]](#_677_8)參見“Der Erzähler: Betrachtungen zum Werk Nikolai Lesskows”，見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en （Frankfurt-am-Main: Suhrkamp，1961），第409—456，在第409頁。（以下的英譯引文系本人修改英譯本原文而成，參見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s，Harry Zohn英譯 ［New York: Schocken，1969］，第83—109頁。）這一行將消亡正與瑪奇根加人的命運相呼應。［本雅明的引文的中譯，以王斑譯《講故事的人：論尼古拉·列斯克夫》為本，有改動。該文收入《啟迪：本雅明文選》，漢娜·阿倫特編，張旭東、王斑譯，三聯書店2008年版。特向原譯者致謝。 ——譯注］

[[678]](#_678_8)參見“Der Erzähler: Betrachtungen zum Werk Nikolai Lesskows”，見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en （Frankfurt-am-Main: Suhrkamp，1961），第410頁。

[[679]](#_679_8)同上，第412頁。有啟發的是，左恩把Hörer譯作“readers”（讀者），把fühlbar macht 譯作“making it possible to see”（造成……瞥見……的可能）。

[[680]](#_680_8)同上，第413—414頁。

[[681]](#_681_8)同上，第415—416頁。

[[682]](#_682_8)同上，第420—421頁。

[[683]](#_683_8)“事實上，對任何一個故事，‘后來怎樣了？’總是個合情合理的問題。然而小說家則止于寫下‘劇終’，邀請讀者加入生命意義的預兆性實現，無望越此雷池半步。”“吸引讀者去讀小說的是這么一個愿望：以讀到的死亡來暖和自己寒顫的生命。”同上，第427—428頁。看來要譯出原文那惡毒的詞序是不可能的：“Das was den Leser zum Roman zieht, ist die Hoffnung, sein fröstelndes Leben an einem Tod von dem er liest, zu wärmen.”

[[684]](#_684_8)［英文：It was Vera Petrovna who told me the story about the four horses found frozen up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Volga during the bitter winter of 1834.］“魔幻現實主義”之于列斯科夫和果戈理，就如會腹語術的人之于老祖母，在她周圍很少有藝術大師的光暈飄浮著。

[[685]](#_685_8)在東南亞殖民地，早期的譯本是傳教士與百無聊賴的官員懷著業余的古文物學和人種學興趣出版的。往后，專業人種學家，甚至還有某些作家，都插手了。最終，在后殖民時代，國家的人類學家，國家的男女文人，間或還有兩者的結合體，紛紛趕來了。我曾幫著翻譯過泰國1960和1970年代的短篇故事，收集在《鏡像：美國時期的暹羅文學與政治》（In the Mirror: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Siam in the American Era，Bangkok: Duang Kamon，1985）里，其中有兩個關于“少數民族”的故事，飽含著同情心。故事之一涉及一出悲劇，發生在海上族（Sea People，指摩根族，“海上吉普賽人”——譯注）的一個偏遠貧困的濱海村莊里，它被寫來作為當代曼谷以武力爭雄的國家政治的一種寓言。另一則故事出于一位赫蒙族（Hmong）小伙子之口，半帶牧歌風味，故事讓這個少年懵懂地稱他自身的民族為“苗族”（Meo），這是曼谷官場所用的輕蔑術語。1990年代，一位天才的爪哇作家，痛心于身處雅加達征服者鐵蹄下的東帝汶人的命運，發表了關于他們的一系列故事，是從他的相識故舊那里聽來的。考慮到在被占的東帝汶占主導的“美洲式”狀況，這位年輕人——他可算是征服者的子侄輩——聰明地選擇了爪哇形式的魔幻現實主義。參見Seno Gumira Adjidarma，Saksi Mata ［眼見為實］（Yogyakarta: Bentang，1994）。這本書翻成英語用了中規中矩的標題：《目擊者》（Eyewitness，New York: Harper Collins International，1995）。

[[686]](#_686_8)我們前面說過，在提名道姓的人物中，唯有施耐爾先生據說（兩次）真的聽到敘事人講故事，但在這兩個場合他都發現那娓娓述說的事情莫名其妙。只有耳朵接收到的東西，他不能當作好的指教加以言傳。

[[687]](#_687_8)這種解釋同薩默的開創性著作——略薩想必讀過——的若干論點如此嚴絲合縫，以至于不能排除學院的殷勤或取笑的成分的可能性。但它也與前文所引的本雅明的話一致：“寫小說意味著在人生的表征中把不可通約性推向極致。”然而：我們須得立于何地，好容許自己將瑪奇根加人看作秘魯人，看作秘魯的“人口統計學的極端”之一呢？（《綠房子》當然是略薩的一部早期作品。）

[[688]](#_688_8)El Hablador，第71頁。

[[689]](#_689_8)看起來，“極端的差異”不僅是地理上的或社會—經濟的，它們也延伸到人類史的兩端。

[[690]](#_690_8)略薩說過，他半帶驚恐地迷戀于愿為一種思想犧牲一切的那種人。這對在這些思想方面沒有個人偏好的人們而言，大概很平常。不平常的是略薩的創造力在他的某些小說中虛構出了這般人物。一個精彩的例子是《狂人瑪伊塔》（1984）的主人公瑪伊塔，他是個注定失敗、徒勞無功、膽怯地搞同性戀的地下馬克思主義者。

[[691]](#_691_8)原文可參見Wolfgang J. Mommsen和Rita Aldenhoff編，Max Weber: Landarbeiterfrage, Nationalstaat und Volkswirtschaftspolitik, Schriften und Reden, 1892—1899 （Tübingen: J.C.B. Mohr，1993），第2卷，第545—574頁。可用但不一定辨析入微的英譯文收在Keith Tribe編，Reading Weber（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89），第188—220頁。［該文中譯見馬克斯·韋伯，《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甘陽選編，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75—108頁。此處引文多有借鑒，特此鳴謝。——譯注］

[[692]](#_692_8)著重號系韋伯所加。

[[693]](#_693_8)這關鍵段落出現在德文版的第559頁上。

[[694]](#_694_8)這種話里邊有某種舒心愜意的東西，它使人覺得像在宣傳一句口號：羞恥萬歲！

[[695]](#_695_8)伯蘭特的文章很容易在下面這本書里找到：Geoff Eley和Ronald Gregor Suny編，Becoming National: A Reader（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第495—508頁。

[[696]](#_696_8)當帝國主義日軍于1942年初占領了美屬殖民地菲律賓時，最后的美國人—菲律賓人的主要軍事據點是巴丹要塞。1942年4月，殖民地的美軍高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倉惶逃往澳大利亞后，巴丹投降了。

[[697]](#_697_8)可以拿當今的一位成年男子代替莉薩先生嗎？也許能說明問題的是，她最近似的競爭者是阿甘，后者可愛的棒極了愛國主義有賴于智力遲鈍。

[[698]](#_698_8)Joseph S. Alter，“Celibacy, Sexual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nder into Nationalism in North India”，該論文在“Dimensions of Ethnic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Asia”會議上提交，會議由威斯康星大學和馬凱特大學國際研究中心主辦，1993年2月。另見他的The Wrestler's Body: Identity and Ideology in North Indi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尤其是第5—6，8，10章。

[[699]](#_699_8)George L. Mosse，Nationalism and Sexuality: Middle-Class Morality and Sexual Norms in Modern Europ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另見Andrew Parker，Mary Russo，Doris Sommer和Patricia Yaeger編，Nationalisms and Sexualities（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1992），尤其是Eve Kosofsky Sedgwick和Seth Koven寫的那兩章。

[[700]](#_700_8)這些藥方，有的在我們這個充滿焦慮感的世紀末時代也現身了。最古怪的莫過于這一做派：celibacy（獨身）這個過時的單詞，新近從美國的心靈高閣上搬下來了，撣去灰塵，擦得锃亮，然后在全國的上流客廳里窘迫地展示出來。

[[701]](#_701_8)眾多電視觀眾將永遠看不到被老年癡呆癥摧殘的羅納德·里根，富蘭克林·羅斯福患過小兒麻痹癥的火柴桿似的雙腿，或是正在經受化療的萬寶路牛仔。

[[702]](#_702_8)在南印度，“母親泰米爾”已在控馭一種與之匹敵的禁欲獻身——有時達到自殺以為祭品的程度。參見下面這本書的出色敘述：Sumathi Ramaswamy，Passions of the Tongue: Language Devotion in Tamil India, 1891—197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尤其是第1頁和第3章（“Feminizing Language, Tamil as Goddess, Mother, Maiden”）。

[[703]](#_703_8)要明白這一點，只需認識到，赫爾穆特·科爾、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或胡斯尼·穆巴拉克，在電視上稱呼他們各自的國家為“我的孩子”，這是怎樣不可能的事情。

[[704]](#_704_8)北印度的陰影在華盛頓上空隱隱出現。最能代表禁欲的、獻身的獨身者兄弟情誼的美國機構，當然是軍隊，就它而言，傳統規則（除了一些不顯眼的例外）讓人人直視正前方。男女同性戀者增加了眼睛斜視或下視的令人憂慮的可能性。女兵則提供了這樣的永恒可能性：當眾的兄妹變成私下的情人。我們距伊巴密濃達有兩千五百多年了。